普希金全集

6

浙江文艺出版社



肖 马 吴 笛 主编

普希金全集

评 论

邓学禹 孙 蕾 译

6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徽亮　王雯雯
舒建华　王晓乐
装帧设计：张妙夫
封面电脑制作：王海明

肖马　吴笛　主编
普希金全集6·评论
邓学禹　孙蕾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桐庐县瑶琳镇新村路3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5　插页 4　字数 506000　印数 0001－3000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941-0/I·861　定价：30.00元

目　录

文论与政论

草稿 笔记 提纲 计划

边　　注

有待考证的作品



俄国戏剧之我见[①]

如果想要议论他人，是否必须先说说自己？对于一位批评卡拉姆津《俄国史》的无名氏，是否有必要用一副陈旧的“卢日尼基隐者”[②]的面具呢？为了将德国女郎莱诺勒同苏格兰的柳德米拉和楚瓦什姑娘奥尔加进行比较，就非得把作者真面目隐匿于“芬兰村”之后吗？最后，对于一位崇爱法兰西演员和厌恶俄罗斯戏剧的人，是否有必要装扮成一个独眼断臂的残疾人，似乎缺少一只眼睛、一条手臂就使他有权信口雌黄和写出文理不通的俄语？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而有关本人的履历、出生证明、亲朋好友名册以及本人的辩护，此处均未列出。读者与我素无瓜葛，因而对此是丝毫不会感到委屈的。如果读者感到闲极无聊，不妨浏览一下拙文《关于俄国戏剧之我见》，而不必深究我撰写和发表此文的动机。

---

① 这是保存在作者已誊清手稿中的一篇文章，首次发表于1895年。Н·И·格涅季奇在手稿上题有如下字句：“这是А·普希金的一篇短文，当时他正徒然地追求谢苗诺娃，后者正是在此期间把短文送交我的。”М·Е·洛班诺夫在格涅季奇题词“短文”一词处，加上“总的说来，一部狂妄自负的”字样。写作时间应不早于1820年1月。由于短文送交给Е·谢苗诺娃时尚未完成，因而可以推测，普希金是在1820年5月之前写作的。未完成的文章送给谢苗诺娃的原因，可能是普希金从彼得堡流放外地。看来，普希金打算在《祖国之子》杂志上发表此文。

② 常见于《欧罗巴通报》上的一个化名。

公众造就了戏剧天才，而我们的公众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在一场歌剧、悲剧或芭蕾舞剧开演之前，一位年轻人在池座前10排挨座走动，同所有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交谈着。

——你是从哪儿来的？

——从谢苗诺夫省，从索斯尼茨省，从科洛索夫省，从伊斯托明省。

——你可真走运！

——她今儿个要演唱，她要表演，她还要跳舞。

——咱们给她鼓掌，喝彩！

——请她出来谢幕！

——她有多么迷人可爱，瞧她那双眼睛，她的脚！真是天才！

大幕徐徐升起，我们这位年轻人，还有他的朋友们，在座椅间倒来倒去，不停地赞叹、鼓掌。我无意在此责难青年人的热情和轻浮，我知道，他们应当受到宽容的对待。但是，我们可以信赖这样的评论员的意见吗？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深受公众爱戴的歌唱家，在表演鲍尔迪埃或德拉·马丽亚（Della Maria）的咏叹调时唱走调，勉强地拖完。行家看门道，爱好者凭感觉，他们都出于对天才的尊敬而沉默着。其他人则出于信任而鼓掌，出于礼貌而高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一位悲剧男演员拉开嗓门，比平时更响地吼叫起来，被震昏的顶层楼座变得狂热，整个戏院似乎要被狂热的掌声震裂。

一位女演员……不过，已经够了。我只是想要说：我们不应当根据公众喧闹的赞誉来评价演员们的才能。

还有一点看法。池座里相当一部分人都是位居显要。他们思想深刻，在表露内心活动时极为谨慎。他们工作辛劳，对欧洲和祖国的命运极为关注，因而难以欣赏戏剧艺术（何况是俄罗斯的

戏剧艺术)。如果在6点半钟，这些先生从营房和议会来到剧院，坐在预订好的头几排位子上，这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繁忙工作后的愉快休闲，倒不如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仪。就凭他们那种冷漠和漫不经心的神态，根本无法要求他们有正常的理解和判断，更不用说某种情感的活动了。因此，他们对于大石剧院只是一种尊贵的装饰，既不属于戏剧爱好者，也不属于知识渊博或者是意见偏颇的戏剧评论家之列。

再有一点，我们时代的这些大人物脸上总是带着与他们职务不可分的那种乏味、高傲、庸碌的单调印记。这些总是占位优先的观众，看喜剧时皱眉头，看悲剧时打呵欠，看歌剧时打盹儿，可能只有在看芭蕾舞时才提起精神。这样的观众难道不只能给最勤奋的演员浇冷水吗?不是只能给演员的心灵带来厌烦和迷惘吗?如果造物主赋予这些演员以心灵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俄国的演员是否应当受到这种致命的冷漠的对待呢?让我们来对悲剧、喜剧、歌剧和芭蕾舞剧分别作一些分析。我们尽可十分严厉或宽容，但应做到特别公正不偏。

谈到俄罗斯悲剧，人们说的是谢苗诺娃[①]，可能也仅仅是说她一人。谢苗诺娃具有天赋的才能、美丽和真挚的情感。她是自然而然成长为演员的。她从来都是独一无二的。渺无生气的法国女演员乔治，以及老是亢奋的诗人格涅季奇，只能向她暗示一下艺术的奥秘，而这些是她坦诚的心灵早就彻悟了的。谢苗诺娃的表演总是自然，明快，动作高雅，具有灵气，体态匀称，清纯，给人以灵感，更有真正的激情，这一切都属于她自己，而不是从别人模仿来的。她的表演弥补了不走运的奥泽罗夫剧本的不足，塑造了安提戈涅和莫伊纳的形象。她使洛班诺夫四平八稳的诗句获

① 谢苗诺娃(1786—1849)，戏剧演员。

得生气，人们正是通过她的朗诵，才喜爱卡杰宁的充满力量与热情、但却缺乏兴味与和谐的斯拉夫诗歌。从几位诗人共同翻译的花哨的、但不幸现在已显得十分平庸的诗句里，我们听到的只有谢苗诺娃的声音，是这位女演员的天才在舞台上挽救了这几位诗人蹩脚的译作。谢苗诺娃是独一无二的。偏颇的流言，小道传闻，一时的哄闹，都停息下来，而她仍然是悲剧舞台的主宰。也曾有人想将杰出的喜剧演员瓦尔贝尔霍娃同谢苗诺娃相提并论。前者扮演的狄多纳令人想起装腔作势的塞利梅娜（就是她演的《妒妻》，也还极似一位迦太基女王）[1]，但是，瓦尔贝尔霍娃才能的真正崇拜者大概已经忘记，她虽有头顶桂冠、身披锦袍的辉煌时刻，而这些场合，她都十分理智地不过分显露锋芒，以弥补一些不太成功的表演。

不久前，年轻、甜美、有点儿羞怯的科洛索娃，身着安提戈涅简朴的衣衫，在轰鸣的掌声中出现在戏剧舞台上。17岁芳龄，美丽的眼睛，美妙的双唇（当然，还有不离口的迷人的微笑），甚至连吐词中的些微缺陷，都使我们的剧坛裁判们赞叹不已。他们异口同声作出判决，把萨申卡·科洛索娃称为谢苗诺娃可靠的继承人。在她演出的时间里掌声不绝。悲剧结束时，她被狂热的欢呼声请出来谢幕，而当天，科洛索娃夫人，迷人的女儿的迷人的母亲，[2]穿着俄罗斯的装束，洋溢着母性的骄傲，在接着的一场芭蕾舞中出台时，整个剧场为之欢呼，轰动。这位幸福的母亲含着热泪，默默地向如醉如痴的观众致谢。这真是我国剧坛史无前例的盛事。我在此只是平铺直叙，不作任何评论。科洛索娃接连饰演

---

① 有的人会认为瓦尔贝尔霍娃夫人在《妒妻》中的角色是最好的。这是绝对不公正的。难道他没有看到过她在《厌世者》、《无心的赌注》、《无忧无虑的人》以及其他剧目中的演出？——普希金原注

② 原文为拉丁文。

了三个角色，都同样获得成功。但结果怎样呢？观众对她的才能和美丽所表现出的狂热逐渐冷却，赞美之声变得有节制，掌声沉寂下来，人们也不再将她同无可比拟的谢苗诺娃相提并论了。不多时，她出场时几乎是面对一个空空如也的剧院。最后，在一次纪念演出中，她饰演察伊拉，整个剧院都睡着了，只是到一幕相当乏味的轻松小歌剧的末尾，当基督徒察伊拉（她在悲剧第五幕中毒而死）身着紫色长袍，系金色腰带，出现在舞台上，跳起俄罗斯舞蹈，大声唱起“在菜地上，在果园里”的时候，观众才纷纷醒来。

如果科洛索娃少同几位禁卫侍从副官周旋，更多地注意自己所演饰的角色；如果她努力去改正自己单调的唱法、尖厉的喊叫以及发 P 时的巴黎式吐音（这种发音方式在客厅里也许还中听，但在悲剧舞台上就显得不得体了）；如果她的举手投足能够自然一些，而不是那样矫揉造作；如果她不仅是模仿谢苗诺娃的面部表情，而且努力去学习后者对角色的深刻理解的话，那么，人们可以指望，随着时间的发展，她将成为一位真正出色的演员——不仅是容貌姣好，而且聪慧过人，具有深厚的艺术造诣和无可争辩的才华。美丽的姿色转瞬即逝，天才却经久不谢。如今，谁还会去谈论卡拉蒂金娜呢？她自己都承认，如果是用诗的形式写出的话，她连自己角色台词的词意也没法弄懂。狂热的公众曾经一度对雅可夫列夫迷人的情妇的才能喝彩不已，可是现在当她和他合法的遗孀同时出现时，谁也拿不准她俩之中，哪一个更莫名其妙，更乏味。谦逊、不引人注目的雅布洛奇金娜，却洞悉悲剧中主人公挚友这一角色的无足轻重，朗诵诗句时虽然平淡无奇，但起码从不影响主要角色的表演，因而较上面二人更受欢迎。

谢苗诺娃长期同古怪而又感情炽热的雅可夫列夫同台演出。后者即使是在清醒的时候也使人想起醉醺醺的塔利姆。当时，我

们的舞台上有两位悲剧男演员！雅可夫列夫去世了，布良斯基取代了他的位置，却不能代替他。也许布良斯基更端庄体面，台风更显高雅，对观众更为尊敬，更了解自己扮演的角色，他不会因自己突发毛病而中断演出，然而他的唱腔多么冷漠！多么单调！多么沉重。

像我那样喝吧，
只是别醉糊涂了。①

雅可夫列夫常常喷发出令人称羡的才气，有时是塔利姆似的粗俗的才气。布良斯基却无论何时何地都万变不离其宗，总是面带微笑的芬加尔、特泽、奥罗兹曼、雅宗、德米特里——这些角色都同样死气沉沉，刻板生硬，拘束乏味。你对他说：老兄，放松一些，不要拘束，把性子使出来！可这都是白费。他在舞台上的动作拘谨，笨拙，平淡无奇，他既不善于控制自己的声音，也不会控制自己的姿态。布良斯基演的悲剧从未让人感动，而他演的喜剧又不能使人发笑。尽管如此，作为一位喜剧演员，他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甚至是真正的长处。

至于谢尼科夫、格鲁哈列夫、卡明诺戈尔斯基、托尔切诺夫等人，就留给楼下厢座的观众去评论吧。起初，这几位演员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可是后来连顶层楼座的观众也对他们嗤之以鼻，这样，他们就销声匿迹了。我们应将鲍列茨基从这些受到冷遇的演员中排除出来。有人认为，是爱情上的不幸际遇使他走上悲剧舞台。他不具备雅可夫列夫那样伟岸的仪态，甚至没有布良斯基那种颇为顺眼的形体，他的唱腔更单调乏味，总的说来，他的演技

① 引自克雷洛夫寓言《音乐家们》。

劣于布良斯基。当然，说起来也并不那么简单。[1] ——尽管如此，我还是更喜爱鲍列茨基。鲍列茨基富于情感，他扮演的俄狄浦斯以及老贺拉斯的角色，使人感受到心灵的激情。鲍列茨基仍然有前途。只要去掉所有陋习，彻底改进方法，采取新的表现手法，鲍列茨基就能成为一位具备内外在潜力的有价值的演员。

现在放下悲剧这个粗俗领域，转而对喜剧天才作一些分析吧。

① 原文为法文.

论 散 文[①]

达朗贝尔有一天对拉哈尔普说："别在我面前夸比丰了，此人写过这么一段话：人类所有东西中最为高贵的，就是这种高傲的、热血的动物，等等。可是为什么不简单地说是马呢?"拉哈尔普对哲学家这种枯燥无味的判断颇感惊讶。但是达朗贝尔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并且，我得承认，我几乎也同意他的见解。

顺便提一下，上面说到的比丰，是一位伟大的写生作家。他的文笔饱满，生动，永远都是叙事散文的楷模，他的某些画面表现出大家手笔。至于我们一些作家，能说些什么才好呢？他们不屑于用简明的语言去描写最平凡的事物，他们总是想画蛇添足，用各种了无生趣的比喻去使幼稚的散文变得生动起来，这些人在说"友谊"这个词的时候，总是要添上：这种神圣的感情，其高尚的热焰……等等。本来应当说："凌晨"，可他们却写道："初升太阳第一抹霞光照亮了东方蔚蓝色天空的边际。"啊，这有多么新颖，难道仅仅是因为它更长一些，所以才更好吗?

我们来读一读一位戏剧爱好者的报告：这位深得喜剧女神塔

---

① 这是1822年所写的一篇文章的草稿。1884年首次发表。草稿开头"达朗贝尔有一天对拉哈尔普说……"引自居维的《比丰传》。普希金记忆有误，将居维文中的里瓦罗尔写成拉哈尔普。

利亚和悲剧女神美利波美娜精髓的年轻女士，阿波罗慷慨地赋予她……。我的上帝，你干脆写上“这位年轻美貌的女演员”，然后再继续写下去。你要知道，谁也不会去注意你那些花哨的用语，谁也不会对你说声谢谢。

该死的吹毛求疵的文学批评家，你的无休止的忌妒在俄罗斯诗坛天空散布令人昏昏欲睡的毒药，你那令人生厌的愚钝只能同无休止的怨恨相比。我的上帝，为什么不干脆说“马”呢？这样不是更简短吗——某杂志的发行人先生？

伏尔泰可算得上合理运用语言的典范，他在《米克罗梅加斯》一文中嘲笑了丰特奈尔在细腻表达上咬文嚼字，此事是后者永远也不能原谅的[①]。

准确和简练——这就是散文的首要特点。散文要求有思想，思想，——没有思想的华丽词藻是什么用处也没有的。诗歌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然而即使是诗歌里，我们的诗人们也不妨具有大量比平常更为重大的思想内容。如果老是沉溺于对已逝青春年华的回忆，[②] 我们的文学是很难向前发展的）。

问题——我国文坛谁的散文最佳？回答——**卡拉姆津的**。这还算不上很大的赞誉，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位可尊敬的……

……

① 顺便谈一谈语言问题，此句应说成 Не мог ему того простить 或是 Не мог ему то простить？看来这个词形不是取决于受语气词 Не（不）支配的动词 Мог（能），而是取决于要求第四格的补语的不定式 простить（原谅）。然而，Н·М·卡拉姆津却是另一种写法。——原注

② 普希金在此指当时许多哀歌作品的一个时髦而又流于俗套的主题——对已逝青春的怨尤，并常同一个濒于死亡的青年的主题相结合。

致《祖国之子》出版者的一封信[1]

近四年来，我有幸成为一些杂志评论的对象。这些评论常常是偏颇的，常常是下流的，有的不值一顾，有的则因路途遥远而无法回答。对于公众而言，一位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作家的辩解不会引起兴味。我默默地打算在新出版的作品中改正以任何方式向我指出的缺点。偶尔我也怀着极为感激的心情，读到一些赞许和鼓励。我感到的不仅是我诗歌中的某些优点，尽管是很微小的，还有人们高尚地表露出对我的宽容和友善。

现在我必须打破沉默。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出于对我的友情，着手出版我的诗作《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并在书中附上《出版者和反浪漫主义者的对话》一文。这一对话大约是杜撰的。如果说在已出版的古典派作家中，有不少人在判断力度上与维堡方向来的那一古典主义者相近，那么他们中还没有一个人的表达能像后者那样尖锐而又彬彬有礼。

这篇《对话》不见悦于我国文坛的一位大法官，他在《欧罗巴通报》第5期发表了《出版者与古典主义者的第二个对话》。在这篇《对话》中，我读到以下字句：

---

① 刊登于1824年5月3日出版的《祖国之子》第18期。

出版者："这么说，你不喜欢我这篇对话了？"古典主义者："我得承认，是的。很遗憾，你把这篇对话在普希金的诗集里印出。我想作者本人也会感到遗憾的。"

作者非常高兴有机会对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礼物表示感谢。《出版者同维堡方向（或瓦西里岛）来的古典主义者的对话》，与其说是为俄罗斯，不如说是为欧洲而作，因为在俄罗斯，浪漫主义的反对者的势力已经十分弱小和不甚显眼，不值得如此引人注目的驳斥。

在其他方面，我无意也无权作任何抱怨。我怀着真诚感动的心情，接受不知名批评家对我的赞扬。

亚历山大·普希金

于敖德萨

论我国文学发展缓慢的原因[1]

我国文学发展速度减慢，通常认为有如下原因：1）普遍使用法语，轻视俄语。我们所有的作家都对此抱怨不已，但是除去他们之外，这又是谁的过错呢？除去那些从事诗歌创作的人，俄语对谁也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我们还没有文学，没有一本像样的书籍。[2]我们从襁褓中起，就从外国书籍吸取知识，我们甚至习惯了用外国语言思考。我们时代文明的提高要求有重要的思想对象作为精神食粮，因为它已经不可能满足于想像与和谐的漂亮游戏，然而学术性、政治和哲学，还没有用俄语来阐述——而抽象的语言在我们这儿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的散文也还很不成熟，因而在简单的信函中，我们不得不去"创造"一些短语，来说明最简单事物的含义；就连我们的"娇懒"也宁可用外国语来表达，因为其固定搭配形式早就是现成的，为众人所熟知的。

---

① 这是一篇1824年所写的草稿，1824年公开发表。是由刊登于1824年《北极星》上A·别斯土舍夫的文章《1823年俄国文学之一瞥》引发的一篇短文。别斯土舍夫指出，社会上热衷法语，轻视祖国语言，并写道："关于其他使文学进程缓慢的原因，我们将再作论述。"普希金的札记正是从这几个词开头的。

② ……在我亲爱的祖国，

杂志数千种，好书无一本。

我对后半句诗甚表同意。——普希金原注

可是有人会对我说，俄国的诗歌已经达到高度文化水准。我同意，杰尔查文的一些颂歌尽管文笔欠流畅，语言不规范，仍充满一位真正天才的激情；还有鲍格丹诺维奇的《心肝儿》，可读性很强，不亚于拉封丹的诗句和篇章；克雷洛夫可能超越了除拉封丹以外的我们所知的寓言作家。再有巴丘什科夫，这位有幸同罗蒙诺索夫一道战斗的人，为俄语作出了像彼特拉克为意大利语所作的同样贡献；还有，如果茹科夫斯基自己少翻译一些，他的作品就会被译成世界所有的语言。

《茨冈》的注释[①]

一

在欧洲相当长的时期没有弄清茨冈的起源。有的人认为，他们发源于埃及——至今在一些地方仍把他们看作埃及人。英国的旅行家最终解决了所有疑点——已经证明，茨冈属于印度最下等的种姓——“帕里亚”。语言以及可称为他们信仰的东西，甚至面部特征和生活方式，都是可靠的证明。茨冈人眷恋野性的自由，尽管伴随这种自由的是贫困的生活，政府为改变这些流浪汉无所事事的生活所采取的措施使他们厌烦。他们在俄罗斯和英国过着游牧生活。男人干着生活所必需的事：贩马、饲熊、欺骗、偷盗。妇女则从事占卜、唱歌和跳舞。

在摩尔达维亚，茨冈构成居民的大多数。有趣的是，在比萨拉比亚和摩尔达维亚，奴隶制度仅存于这些被征服的原始自由的忠实信徒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去过本书中忠实描绘的野蛮的游牧生活。他们不同于其他茨冈之处在于他们具有很高的纯洁道德观。他们不从事盗窃、欺诈，然而他们却同样具有野性，同样贫

① 计划作为长篇叙事诗《茨冈》注释的草稿，1855年发表。第二段札记中的引文出自普希金本人当时还没有出版的一首诗歌《自比萨拉比亚致巴拉丁斯基》。

穷，同样喜爱音乐，同样从事粗活，他们的贡赋是皇后陛下的无限进账。

二

注释：比萨拉比亚自古闻名，对我们来说，这应是一块充满奇趣的地区。

它曾受到杰尔查文的赞颂，
并且充满俄罗斯的光荣。

但是至今我们关于这个地区的概念，都是从两三个旅行者不正确的描述中获得的。我不知道，利普兰迪编著的《比萨拉比亚历史及统计记述》是否能得以出版，此书是军人的优秀品质和真实的学术性结合的产物。

对阿·别斯土舍夫《1824年—1825年初俄国文学之一瞥》的反驳意见[①]

别斯土舍夫提出，一切民族的文学都是遵循普遍的自然规律发展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文学发展的第一个时代是天才成长。

看来，作看想要说的是：任何一种文学都有自己的逐渐发展和衰落过程。不是这样的。

作者把文学的第一个时代称为“强烈情感和天才创作”的时代。“这样的圈子在逐渐紧缩……对新事物的渴望在不断寻求尚未被汲取的源泉，而天才们摆脱人群，投身探寻精神和物质世界的新天地，并且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如此等等。因而，一个新的时期正在到来，但是别斯土舍夫先生把这二者混为一谈，他继续写道：“在这个创造和收获的时代之后，是平庸、惊讶、总结的时代。抒情诗之后出现小歌谣，喜剧取代了悲剧；但是历史、评论、讽刺总是文学的小分支，这种情况在各地大体一致。”不是这样的。希腊诗歌，我们不能妄加评论——因流传至今的文献太少。关于

① 对1825年《北极星》(1825年3月21日出版)刊登的别斯土舍夫的文学述评的评论，1834年公开发表。普希金的反驳是以别斯土舍夫文章头几句话开始的：“一切民族的文学，在完成自身进程时，都遵循着普遍的自然规律。它发展的初期都是强烈情感和天才创造上升的时期。”文章接下来的部分引起普希金的反驳。最后一条感想则是因别斯土舍夫的“我们有批评，但却没有文学”一句话而发。

希腊的文艺评论，我们也知之不多，但是我们知道：希罗多德生活年代早于天才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1]，奈维乌斯先于贺拉斯，恩尼乌斯早于维吉尔，卡图卢斯在奥维德之前，贺拉斯在毗提利安之前，而卢卡努斯和塞内加的出现则还要晚得多，这一切都不能纳入别斯土舍夫先生普遍的界定。

我们不禁要问，当代文学中哪一个表现出了别斯土舍夫先生任意规定的渐近性呢？浪漫主义文学发端于八行两韵诗[2]，宗教神秘剧、小叙事诗、韵文故事的出现，均先于阿里奥斯托、卡尔德隆、但丁以及莎士比亚的创作，而鲍普和艾迪逊之后有拜伦、莫尔以及骚塞。浪漫主义诗歌在法兰西长期处于襁褓状态。弗朗西斯科一世时期最优秀的诗人是马罗。

他创作了八行两韵诗，促进了巴拉达诗体的繁荣。

但散文已具有相当的优势：蒙田、拉伯雷都是马罗的同时代人。

请问：我们在哪里看得见别斯土舍夫定义的影子呢？

我们有文艺评论吗？它在哪儿？我们的艾迪逊、拉哈尔普、施莱格尔和西斯蒙迪又在哪儿？我们对哪些作品作过分析评论？哪些人的文学见解为人民广为接受？我们又可以引用、依靠哪些人的文学批评？

别斯土舍夫先生自己接下来说道：“批评、反批评、再批评，我们都见得太多了，而像样的批评家却太少了。”

---

① 普希金此处有误，希罗多德（前484？—前425）是埃斯库罗斯（前525—前456）晚一些的同时代人。

② 根据19世纪最初25年的历史观，浪漫主义文学发源于12世纪行吟抒情诗人的诗歌。

论斯塔尔夫人，兼论A·穆……夫先生[①]

斯塔尔夫人的所有著作中，《十年放逐》一书应当首先受到俄国人民的注意。迅速捕捉事物的犀利观察力，富于惊人新意和真实性的见解，以及作者笔端流露出的亲善、感恩之情——这一切都给这位不平凡的外国妇女的才智和情操赢得了荣誉。下面是一篇手稿里有关斯塔尔夫人的记叙："读着她的《十年放逐》，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深深为俄罗斯贵族的亲切款待所感动，因而没有说出她的目光所接触到的一切[②]。我没有勇气就此去责备这位心地高尚，富于辩才的外国妇女，正是她第一个将公正还给历来都是外国作家无知毁谤对象的俄国人民。"手稿作者没有勇气否认的"宽厚"，正是构成书中描写我们祖国的那一部分的精华。斯塔尔夫人离开了俄国这个神圣的避难所，这个她曾受到信赖和真诚款待的家。好像在履行一颗高尚心灵的义务，她总是带着尊敬和谦

---

① 该文发表于《莫斯科电讯》1925年12期。文章是因《祖国之子》1825年第10期刊登的《斯塔尔夫人的芬兰纪事片段及对其评论》而写的。《评论》的作者是A·A·穆汉诺夫（1802—1834），当时在芬兰任扎列夫斯基将军的副官。文章末尾的小诗借用自П·A·维亚泽姆斯基致M·T·卡切诺夫斯基的讽刺信（载1820年《祖国之子》）。普希金对原诗稍作更动，维亚泽姆斯基原诗为：

你尊重别人时，就会受到别人尊敬。

② 此处指1812年以前的彼得堡上流社会。

逊的口吻谈论俄国人民，赞美时满怀真诚，批评时十分谨慎，从不将家丑外扬。让我们也对这位尊贵的客人表示感激之情，我们将永远纪念她，就如同她纪念俄国人民的好客精神一样。

离开俄国，斯塔尔夫人是穿过芬兰悲凉的荒漠前往瑞典的。垂暮之年，远离她所珍爱的一切，七年中饱受拿破仑暴政的迫害，历尽参与欧洲政治斗争的辛酸。此时（1812年秋）她自然无法保持欣赏大自然美景所必需的爽朗心境，黝黑的山岩、沉睡的森林和湖泊在她心头引起凄凉苦闷，这是不足为怪的。

她的未完成的笔记就在芬兰景色的晦暗描写中搁笔了。

A. M. 先生[①]在重新浏览斯塔尔夫人这本书时，恰巧发现了最后这一片段。他把它译成相当晦涩的散文，并附上如下对斯塔尔夫人梦幻式的评论："姑且不谈书中表现出的轻率，缺乏观察力，对当地的无知。这些已经使熟悉这位（还写过一本关于德国的小册子）作家创作的读者吃惊了。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故事本身，它同一些吹毛求疵的法国人的鄙俗饶舌如出一辙，这些人不久前对我们一无所知，却怀着巨大的希望来到俄国，受到我慷慨的不适当的好心肠的同胞（但在思维方式上却不是我的同胞）热情的款待。"

这是什么样的语言？这是什么腔调？两三页笔记同《海豚》、《科林娜》、《对法国革命的看法》等有什么关系？A. M. 先生所说的吹毛求疵的法国小人，同被拿破仑迫害，却受到俄国皇帝大度庇护的奈克尔的女儿之间又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读过斯塔尔夫人作品的人——A. M. 先生接着写道——只会感到惊讶不解，为什么一望无垠的林海……等等对这位《科林娜》的作者只产生单调乏味的印象！"接着 A. M. 先生又以他自

① 《祖国之子》第10期。——普希金原注

己作现身说法写道："不！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敞开的心扉在承受这么多强烈的印象时所体验到的激动，我将永远铭记这儿的晨曦……等等。"接下来，A. M. 先生用完全不同于斯塔尔夫人的语言描绘北方大自然的景色。

接着他又建议这位已经故世的女作家**随意通过一个翻译去向马车夫们询问火灾发生的原因**。

A. M. 先生显然也不喜欢关于狼群和熊靠近阿布大学的戏言，然而他自己也开起玩笑来。他说："难道那儿接受教育的 400 位学生是在把自己培养成捕兽者吗？如此，准确一些，她该把这所学校称之为狗舍。难道斯塔尔夫人再也找不到别的方法来探寻造成教育发展滞缓的原因，而只能迫使读者同自己一道在芬兰的林海雪原上奔驰，追捕熊、狼，并且振振有词地说，为什么要在熊穴狼窝里去猎捕呢？最后，由于我们这位小姐怯弱的心灵所感受到的惊恐……"等等。

谈论这位小姐时应当用有教养的人的有礼貌的语言。这位小姐从拿破仑那里得到的赏赐是受到迫害，从君主们那里得到的是信赖，从全欧得到尊敬，而从 A. M. 先生那里得到的却是杂志上一篇算不上俏皮，但十分失礼的小文章。

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先要学会尊重别人。

CT. AP[①]

1825 年 6 月 9 日

① CT. AP 是"老阿尔扎玛斯人"的缩写。

论莱蒙特君为克雷洛夫寓言法译本所作序[1]

我国文学爱好者们为奥尔洛夫伯爵的举措感到由衷的高兴，虽然他们也估计到，翻译的方法尽管相当出色，但有许多不足，会给我们无法翻译的诗人的寓言带来一些损害。许多人急不可耐，欲先一睹莱蒙特[2]先生的序言为快。这篇序言写得的确十分出色，尽管还不完全令人满意。总的说来，在作者根据道听途说写成的片断中，他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然而，作者自己所作的推断，结论却是非常正确的。遗憾的是这位著名作家对有些问题涉及不多，而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应当是十分引人注意的。读着他的文章[3]，不由得有些遗憾，就像有时听一位非常聪明的人的谈话一样，由于拘于某些礼数，他有许多东西没有说透，常常回避说出明确的看法。

作者先对我国文学作了泛泛的评述，又简短地谈及俄罗斯语言，他认为俄语是自古就已存在的语言，并不怀疑它有能力逐步完善，他还引用一些俄国人的话推断说，俄语极具乐感，表达方式十分丰富。

---

① 发表于1825年。

② 莱蒙特（1762—1826），法国历史学家。

③ 我们读到刊登在《祖国之子》上的译文，法文原作尚没有机会看到。——原作者注。

这些意见不难得到证明，作为文学的材料。斯拉夫-俄罗斯语言对于欧洲其他语言来说，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性：俄语的发展是十分幸运的。公元11世纪，古希腊语突然向它敞开了自己词汇和谐的宝库；赠与它周密的语法规则以及优美的表达方式；总之，俄语承继了古希腊语的财富，这样就使它避免了缓慢的完善过程。俄语本身就极富乐感和很强的表现力，从此之后，它又获得了规则性和灵活性。民间方言应当同书面语不同，但后来这两者互相接近，而这就是赋予我们交流思想的天然要素。

莱蒙特先生认为，鞑靼人的统治给俄语留下了锈迹。这是不对的。外族语言的传播不可能靠马刀、纵火，而只能靠本身的丰富和优越性来实现。那些既没有文学，也没有贸易、法律的野蛮游牧部落，能给我们带来哪些要求新词表达的新概念呢？鞑靼人的入侵没有给高度文明的中国人的语言留下任何痕迹，而我们的祖先，虽然长达两世纪呻吟于鞑靼人的压迫下，但都是用自己的母语向俄罗斯的神祇祷告，用俄语诅咒恐怖的统治者，用俄语相互倾诉痛苦。我们从当代希腊也可看到相同的明证。民族语言的保存对于一个被奴役的民族具有何等的作用呢？探讨这个问题会使我们偏离主题太远。无论如何仍有50个左右的鞑靼词语进入了俄语。立陶宛战争同样没有对我们语言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只有我们的语言才是我们多难的祖国唯一不可侵犯的财富。

彼得大帝在位时期，俄语由于需要引进一些荷兰语、德语和法语词汇而受到明显的歪曲。这种时髦的影响也波及到受皇帝和大臣庇护的作家身上。幸运的是：罗蒙诺索夫出现了。

莱蒙特在一段评论中谈及罗蒙诺索夫的才智，但他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并没有把罗蒙诺索夫看作是和伟大的彼得一世共同建立了功勋的伟大人物。

罗蒙诺索夫将非凡的意志力同非凡的领悟力紧密结合，贯通

教育的所有领域，对科学的渴望成为这个充满激情心灵的强烈追求。他是历史学家，修辞学家，力学家，化学家，矿物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他研究过多种学科，造诣极深。是他首先深入研究祖国历史，制定祖国社会语言的规则，给古典演讲术以法则和范例。他同不幸的里赫曼诺夫一起预见到富兰克林的发现。他创建工厂，并亲自制造机器。他还创造了镶嵌画，丰富了艺术领域。最后，是他给我们掘开了诗歌语言的真正源泉。

诗歌是少数生而为诗人者的特殊追求。它要求诗人贡献出他毕生的观察、感受和心血。研究一下罗蒙诺索夫的生平，我们会发现，精密科学一直是他所喜爱的主要的活动领域，诗歌创作有时是一种娱乐，更是常为职务所需的练习。要在我们第一位抒情诗人身上去寻找炽热的激情和想像力，恐怕是徒劳的。他的语言平直、生动，是对斯拉夫书面语言的深厚知识以及书面语同民间语言可喜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说赞美诗译文以及其他一些模仿圣书崇高体诗歌的力作，才是罗蒙诺索夫的最佳作品。①它们将永远是俄罗斯文学的纪念碑；它们还将长久成为我们学习诗歌语言的榜样；有人抱怨上流社会的人士不读罗蒙诺索夫的作品，并且要求一个已经去世70年的人仍然是公众喜爱的作家，不是十分奇怪吗？似乎罗蒙诺索夫这样的伟大的人物的荣誉，还需要加上一点时髦作家名声！

在提到我国社会文化阶层专门使用法语的情况时，莱蒙特君俏皮但公正地指出，俄语因此一定要保持自己极可宝贵的清新和

---

① 我们有趣地看到，特列佳科夫斯基狡狯地嘲笑罗蒙诺索夫的斯拉夫风格，并一本正经地建议他吸收一些有良好教养的社会的语言的轻快和华丽。令人惊奇的是，苏马罗科夫在他的半句诗中准确地说出了作为诗人的罗蒙诺索夫的真正价值所在。

他是我们国家的马莱伯，犹如品达！

终于出现了马莱伯，他是法国第一人……等等——原注

纯朴，还有表达的率直。我不想为我们对祖国文学的成就表现出的冷漠去辩解，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我们的作家因此而失去一些自满，至少我们的语言和文学能获益匪浅。是谁使法国诗歌脱离了古典主义的古老模式？是谁为拉辛的悲剧，甚至老高乃依的严厉的诗神涂脂抹粉呢？是路易十三世的宫廷宠臣们。又是谁给18世纪作家的作品添上一层冷冰冰的礼貌和俏皮的光泽呢？是杜·德芳，布弗莱尔，布·伊皮奈夫人们这些可爱的高雅的女士们的圈子。但是弥尔顿和但丁写作并不是为了博得女性赏识的微笑。

对法语严厉而又公道的评论，给作者带来公正不偏的声誉。真正的教育应当是公正的。莱蒙特以法国散文语言为例，断言：与其说是诗人们，不如说是散文家们将给俄语带来欧洲共同性现象。俄译者对这种表示法感到不快，如果原文中写成 Civilisation Européenne（欧洲文明），那作者差不多就是正确的了。

姑且说，俄国诗歌已经达到高度文明：时代的启蒙文明要求精神食粮，头脑已经不满足于和谐的想像的游戏，但学术、政治和哲学还没有用俄语来阐述，玄学的语言在我们这儿根本不存在。我们的散文还很不成熟，因而在简单的信函中，我们不得不去“创造”一些短语来说明最简单事物的含义，就连我们的“娇懒”也宁可用外国语来表达，因为其固定搭配形式早就是现成的，为人们熟知的。

莱蒙特君的文章涉及到我们克雷洛夫生活和习惯的某些细节。他说：克雷洛夫一种外语也不会说，而只是懂一点法语。**这不是事实**——译者在注释中提出尖锐的反驳。——事实上，克雷洛夫懂得欧洲主要语言，特别是他同阿尔菲耶里一样，在50岁高龄学会了古希腊语。如果在别的国家，一位名人的这种特点早就会在各种杂志上大加颂扬，而我们在著名作家传记中只是满足于

写上出生年月、详细的供职履历表，而事后却又抱怨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知之太少。

在本文结束时，我想说，我们应当感谢奥尔洛夫伯爵，是他挑选了一位真正的人民诗人来向欧洲介绍北方的文学。当然，没有一位法国人敢于把其他一个什么人放在拉封丹之上，但是我们却可以更喜欢克雷洛夫，而拉封丹和克雷洛夫也将永远受到自己同胞的喜爱。有一位人士说得好：天真、单纯(naïveté，bonhomie)是法国人天生的品质。与此不同的是，我国人民性格的显著特点却是快活的狡狯、嘲弄以及生动的表达方式。拉封丹和克雷洛夫是我们两国人民精神的代表。

H. K.①

8月12日

附注：我以为没有必要再去指出一些明显的错误。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些错误是可以谅解的。例如，认为克雷洛夫同卡拉姆津相似（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以及说我们的语言似乎完全不适合于短长格诗式等等。

---

① H. K. 大约是由普希金（Пушкин）这一姓氏的最后两个辅音字母而来。

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①]

我们的文艺评论家们还不同意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关于这个问题种种相互矛盾的概念，我们是从法国报界人士那里得来的。他们通常把所有他们看来是带有幻想和日耳曼意识形态印记，或是建立在迷信预兆和民间传说基础上的一切，都归为浪漫主义。这个定义是极不准确的。诗歌可能同时表现出这些特征，然而却属于古典主义范畴。

如果我们仅仅以诗歌创作的精神为依据，而不考虑诗歌的形式，那么我们永远也无法从定义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卢梭的赞歌在精神上当然有别于品达的颂歌，尤维那利斯的讽刺与贺拉斯的讽刺不同，《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不同于《埃涅阿斯纪》，但所有这些著作都属于古典主义。

属于这一类的应当是这样一些诗歌：其形式为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熟知，或是其典范已流传至今。因而可划入这一类的应有：长篇史诗，醒世叙事诗，悲剧，喜剧，颂歌，讽刺，书信，仿英

① 这是1825年一篇未完成的文章的草稿。1855年首次发表。文章是因欧洲和俄国出版界围绕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产生的激烈争论而作的。普希金指出，问题本身的提法就不令人满意。他还特别指出法国报刊人士的提法。之后，普希金根据本文的原则，又另写了一篇题为《论俄罗斯文学之贫困》。关于法语引文参见《对阿·别斯土舍夫一篇文章的反驳》一文的注释。

雄史诗，牧歌，哀歌，讽刺短诗以及寓言。

那么什么样的诗歌应当列入浪漫主义诗歌一类呢？

是这样的诗歌：其形式不为古希腊、罗马人所熟知，其原先的形式已发生变化，或为其他形式所取代。

我以为没有必要在此多谈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诗歌：每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对于古代宏伟不朽的创作都一定有充分的了解。我们只是来看一看现代民族诗歌的产生和逐渐发展的过程。

西部帝国迅速走向没落，最终衰亡，其科学、文学和艺术也随之衰败，启蒙运动之火熄灭了，愚昧无知的阴霾笼罩着血腥的欧洲，只有拉丁文侥幸保存下来，在教会藏书库的尘埃中，教士们从羊皮纸上刮去卢克莱修和维吉尔的诗句，写上自己的编年史和富于诗意的传说。

诗歌在如日中天的法国苏醒——诗韵在罗曼语言中得到回响。诗的这种新的装饰，乍看不甚了了，但对于现代民族文学的发展，却有着重大意义。音的加倍重读效果悦耳，克服创作中的困难总给人以满足——对节奏、对称的喜爱乃是人类头脑所固有的特点。诗人们作起韵律诗的游戏，去发明诗的多种可能的变体，构想艰涩的形式，于是出现了一节二韵诗（virelai），巴拉达体诗，回环体诗，十四行诗等等。

由此必然出现表达上的牵强和古人所没有的矫揉造作，俏皮代替了八行两韵诗所无法表达的感情。甚至在现代一些最伟大天才的作品中也可看到这些不幸的痕迹。

但是，头脑不可能仅满足于和谐的游戏，想像力要求画面和故事情节，诗人们转向灵感的新的泉源，开始歌唱爱情和战争，使民间传统再获新生，于是出现了小叙事诗、浪漫诗和韵文故事。

对古代悲剧的模糊概念以及教会庆典仪式导致神秘剧的产生。这些作品几乎都有一个固定模式，遵循同一样板。不幸的是

当时没有一个亚里士多德来为神秘剧制定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

对于欧洲诗歌的精神产生根本影响的是两大事件——摩尔人入侵和十字军远征。

摩尔人给欧洲诗歌注入爱情的狂热和温柔，对美好事物的热衷以及东方式的华丽雄辩，而骑士们则带来对上帝的虔诚，敦厚朴直，对英雄业绩的概念以及哥德弗雷德和理查德远征兵团的豪放性格。

这就是浪漫主义诗歌简单的开端。如果它的发展仅到此为止，那么法兰西批评家们对它们的严厉判决就会是公正的了。然而浪漫主义诗歌的领域迅速繁荣昌盛，并成为古代诗神的强有力的竞争者。

意大利学会了它的史诗。半非洲化的西班牙掌握了悲剧和长篇小说。英吉利则骄傲地推出斯宾塞、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的名字来同但丁、阿里奥斯托抗衡。在德国，情况却相当奇怪，这里占显著位置的是辛辣、嘲弄的新讽刺诗，其纪念碑似的人物应是雷尼克·福克斯。

法国诗歌当时尚处于襁褓时期：弗朗西斯科一世时期最优秀的诗人创作了八行两韵诗，促进了巴拉达诗体的繁荣。

然而散文却具有很大优势，蒙田、拉伯雷都是马罗的同时代人。

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在他们的文学天才出现之前，早已存在民间诗歌，因而他们是在现成的道路上发展的。阿里奥斯托的《奥尔兰多》之前也已有史诗形式，而德·维加和卡尔德隆的创作之前也已有悲剧存在。

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诗歌发展尚处于幼年时代，缺乏固定的方向，缺乏力量。路易十四世时期的有识之士理所当然地因其毫无价值而嗤之以鼻，并使其转向古代样板。布瓦洛发表了诗歌

的“古兰经”，从而受到法兰西文学的尊崇。

这种在前院形成，而从来再没有进一步登堂入室的伪古典主义，摆脱不了某些先天的陋习，因此，我们从其本身看到包裹在严格古典主义形式中的浪漫主义的矫揉造作。

附注：但是，不能因此认为法国没有任何纯浪漫主义诗歌的重要作品。拉封丹和伏尔泰的童话以及后者的《处女》，即带有纯浪漫主义的烙印，其他大量的对他们的模仿之作就不用多谈了。(这些模仿的作品大都十分平庸，它们只是在忘乎所以，而不是在诗歌价值方面更进一步。)

关于诗歌《恶魔》

我认为，批评家错了。[1] 许多人持有与他相同的看法，有的人甚至指名道姓，似乎这就是普希金想要在自己这部奇怪的诗歌中刻画的人物，看来他们是不正确的。至少我觉得《恶魔》的创作是出于另一种目的，更多是精神方面的目的。

在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一颗还没有因阅历而变得淡漠的心对于美是能够接受的。它轻信而易受伤害，现实中永恒的矛盾逐渐在它身上产生怀疑，这种痛苦的情感虽持续不久，逐渐消失，但却永远摧毁了心灵中最美好的希望和充满诗意的预兆。难怪伟大的歌德把否定精神称作人类永恒的敌人。普希金是不是也想要在《恶魔》中体现这种否定或怀疑的精神，并简明地勾勒出它的特征以及它对我们时代精神可悲的影响呢？

① 这句话针对《祖国之子》1825 年第 3 期的一篇文章而言。题为《寄往高加索的一封信》的文章中说道："普希金的恶魔是难以想像的——作者想要呈献给读者的是一个用情感和诡计引诱缺乏经验的青年的诲淫诲盗者。"

关于安德列·谢尼耶[①]

安德列·谢尼耶31岁时成了法国革命的牺牲品，长久以来提到他的只有夏多布里昂的寥寥数语，两三段文字，对他的去世所带来的损失表示遗憾。他的作品终于被发现，并于1819年问世。无法克制悲恸之情……

① 这是保存在普希金文件中的一篇草稿，作于1825年。

论 悲 剧[①]

所有创作的品类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戏剧，而戏剧创作中最离奇的又莫过于悲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观众必须忘掉时间、地点和语言，必须发挥想像力，以便符合普通语言中的诗意和虚构。法国作家深谙其中奥妙，因而定出了古怪的规则：情节整一，地点整一，时间整一。引人入胜乃是戏剧艺术的首要规则，因而情节一致必须得到遵守。然而地点和时间一律的限制过多，由此便产生出某些不便，情节开展时，受到场景的局限。阴谋诡计，爱情的表白，国事会议，庆祝饮宴，所有这一切都在一间屋子里进行！事件发展过分迅速、地点受到限制，主人公挚友……**低声旁白**，如此违背常理，在两处场景表现牵强不自然等等，而这一切都毫无意义。遵循浪漫派的道路不是更直截了当吗？浪漫主义缺少一切规则，但却不缺少一切艺术。

兴趣——即统一。

悲剧和喜剧的糅合，情节的紧张化，有时是必要的民间词语的精雕细琢。

① 这是普希金在创作《鲍里斯·戈都诺夫》期间所写的一篇草稿。1916年公开发表。文中反映19世纪20年代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关于三一律（时间、地点、情节）以及关于悲剧同喜剧相互融合的争论。

论文学中的人民性[①]

曾几何时，谈论人民性，要求人民性，抱怨文学作品缺少人民性，对我们来说已是习以为常，但却没有人想过去为人民性下一个定义。

好像我们有一位批评家这样认为，人民性在于从祖国历史中选择素材。

然而，要否认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哈姆雷特》、《一报还一报》及其他著作中具有巨大的人民性，恐怕是徒劳的。维加和卡尔德隆经常迁徙各地，从意大利短篇小说和法兰西小叙事诗借用悲剧题材，阿里奥斯托歌颂查理大帝、法兰西骑士、中国女皇，拉辛也是从古代历史中汲取悲剧题材的。

然而未必能说：这些作家的作品缺乏伟大的人民性。另一方面，正如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十分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在《彼得颂和俄罗斯颂》里，除了姓名是俄罗斯的，其他还有什么人民性可言呢？在《克谢尼亚》（主人公克谢尼亚在季米特里的营地上，用

① 这是涉及20年代俄国批评界关于人民性的争论的一篇文章的草稿，1855年正式发表。普希金特别注意到别斯土舍夫发表在《北极星》上的一篇文章（文中指出俄国社会轻视俄语的现象——参见《论我国文学发展缓慢的原因》）以及B·丘赫尔别凯发表于《姆涅摩辛纳》上的一篇文章（参见《驳〈姆涅摩辛纳〉刊载的丘赫尔别凯的两篇文章》）。

六音步抑扬格同亲信议论父母权力）中又有什么人民性可言呢？

另有一些人认为人民性表现在语言方面。他们看到人们用俄语表达思想，使用俄罗斯短语，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作家的人民性是一种只有他的同胞才能完全正确评价的品质，而对其他人，这种品质要么并不存在，要么就是一种罪过。有学识的德国人对拉辛笔下主人公的恭顺感到愤恨不平，法国人在卡尔德隆身上似乎看到要求同对手决斗的科里奥南的影子时，却笑了起来。而这一切都带有人民性的印记。

气候、统治方式、信仰，使每一个民族都具有特别的面貌，这或多或少也反映在诗歌这面镜子里。这就是思想和情感的方式，这就是大量的仅为某民族独有的信仰和风俗习惯。

驳《姆涅摩辛纳》刊载的丘赫尔别凯的两篇文章[①]

《姆涅摩辛纳》杂志刊载的《论我国诗歌之发展方向》、《与布尔加林谈话录》两篇文章，可说是近两年来一切反对浪漫主义文学言论的基础。

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聪明的有识之士。姑且不去议论他正确与否，他到处为自己思想方式作解释，并且为自己的论断提出证据，这在我国文坛倒是鲜见的现象。

还没有人去反驳他，是因为人们同意他的见解，还是因为人们都不想去同一个看来强有力和经验老到的大力士对抗呢？

尽管如此，他的许多论断在各方面都是错误的。他把俄罗斯诗歌划分为抒情诗和史诗两类，把古代诗人的作品列人第一类，而

---

① 这是对丘赫尔别凯两篇文章评论的草稿，其中一些片段于1855年发表，全文发表则是在1927年。普希金对B·丘赫尔别凯的两篇文章进行评论。第一篇是《近数十年来我国诗歌，尤其是抒情诗歌的发展方向》（《姆涅摩辛纳》第2期，1824年6月），另一篇为《与布尔加林谈话录》（同一杂志第3期）。普希金指的是丘赫尔别凯文章中以下地方：第一篇中“力量，自由，灵感——是任何一种诗歌的不可或缺的条件”；第二篇中涉及贺拉斯的一段话，“……他几乎从来就不是一位富于真正激情的诗人。请问能把一个与真正的灵感格格不入的人称为诗人吗？”在两篇文章中，丘赫尔别凯都为颂歌辩护，认为它是最高的抒情形式，而反对20年代主宰俄国抒情诗坛的哀歌。

茹科夫斯基及其后继者则被他划归第二类。

现在姑且认为他这种划分法是正确的，我来研究一下，这位批评家是如何决定这两类诗歌等级的。

“我们，例如……”[①]此处原文照录，因为其中见解同我们的看法一致。

诗歌的力量何在？在于创新，在于结构布局，在于文笔吗？

自由？文笔的自由，结构的自由——但是，罗蒙诺索夫的文笔有什么自由可言？庄严肃穆的颂歌又要求什么样的结构呢？

灵感？心灵具有生动感受印象，因而也是对概念迅速进行想像的倾向，正是这促进了对印象和概念的阐释。

灵感是诗歌和几何学都同样需要的，批评家把灵感和激情混为一谈了。

不，决不是这样的。激情排除了宁静这一美的必不可少的条

① 丘赫尔别凯的两篇文章中都没有这样的字句，看来属普希金本人的文字，被错误地加上引号（极可能应读为“例如”）。“我们”这个词，一般说来不足以作为究明引文的根据，在丘赫尔别凯文章中仅出现过三次，其中只有一处能与普希金评论的上下文吻合。现录此段以供参考：“我们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对已逝去的青春表示留恋；无休止地咀嚼，翻来覆去地咀嚼这种留恋的感情，并且抢先在期刊上炫耀自己的沮丧。如果这种伤感情绪不是一种修词格的话，任何一个人看到我们那些刚出襁褓的恰尔德·哈罗尔德们，都会认为我们俄国的诗人生下来就已经是些老头了。到处都是相同的画面：月亮，当然是阴郁、苍白的；悬崖峭壁和茂密树林，在它们原先没有的地方忽然出现，森林，总要千百次地添加夕阳西坠其后；晚霞，偶尔还有长长的暗影和幽灵，不可见的东西，鄙俗的讽喻，劳动，温柔，宁静，欢乐，悲愁，作者的娇懒，读者的厌烦等等苍白无力、缺乏品位的体现；特别是还有蒙蒙烟雾：水面雾蒙蒙，针叶林一片雾蒙蒙，田野雾蒙蒙，诗人头脑里一片雾蒙蒙。”——原编者注

件。激情不要求智慧的力量为前提（后者乃是他们对整体关系中令人愉悦的部分）。激情不持久，不常在，因而不能产生真正伟大的完美（而没有这种完美，也便没有抒情诗歌）。

激情是某一次想像力所处的紧张状态。灵感可以没有激情，而激情却不能脱离灵感而存在。

荷马无可比拟地高于品达。颂歌，更不用说哀歌了，处于史诗的低级阶段。悲剧，喜剧，讽刺，都比它更需要创造、想像(fantaisie) — 对大自然的全面的知识。

但是，颂歌中没有结构，也不可能有。颂歌唯一的结构已经是崇高才智的果实。品达的《奥林匹克竞技胜利者颂》有什么结构呢？杰尔查文最优秀的作品《瀑布》又有什么结构可言呢？

颂歌不要求长期不间断的劳动，而没有这一点是不会产生真正伟大的作品的。

论国民教育[①]

近来一连串事件揭示出许多可悲的事实。缺乏教育和道德导致众多的青年陷入犯罪的迷途。其他民族由于局势左右和经长期准备而发生的政治变革，在我们这里却突然变成了玩弄阴谋权术。15年前，年轻人仅仅热衷于服兵役，力图在社会教养方面表现出类拔萃，或是以恶作剧引人注目。文学（当时是如此地自由）不具有任何方向性，教育也从未偏离最初的规划。10年过后，我们再看到的是：自由主义思想已经成为良好教育必不可少的幌子，谈话内容带有完全的政治性质；文学（受到最恣意专横的书刊检查的压制）变成了对政府进行诽谤的手抄传本和蛊惑人心的歌谣。最后，我们还看到，出现了不少秘密社团以及或多或少带有血腥味和丧失理性的阴谋活动。

显然，对于其不幸的代表人物已在我们眼前牺牲的那一代人的精神和风尚所产生的影响，应当归于俄国军队1813年和1814年的远征以及在法国和德国的驻留。应当相信，那些一度同情阴

① 这是普希金根据尼古拉一世的旨意撰写的一份报告，1884年正式发表。报告写作于1826年11月15日，米哈伊洛夫斯克村。1826年9月30日，宾肯多夫曾致函普希金："皇上希望您着手研究青年教育这个问题。您可以利用所有余暇时间。您还有完全、充分的自由，决定呈报您的想法和看法的时间和方式。这个问题定会给您一个广泛的领域，因为您从亲身的经历看到错误教育体制的所有致命有害的后果。"

谋家思想方法的人们如今已翻然醒悟。因为一方面他们明白了他们的企图和手段是如此微不足道，另一方面也看到大势所趋，政府力量无比强大。战争中牺牲者的兄弟、友人和同志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自己的思考，而逐渐冷静下来，理解到它的必要性，并从内心给予谅解。但是应当保护正在成长的一代新人，他们尚不具备任何生活经验，却很快要带着青春的激情和欢乐，登上生活舞台，准备接受生活中的一切印象。

对我们的国家产生影响的，并非只有外国的意识形态。教育或者最好是说缺乏教育，乃是万恶之根源。1826 年 7 月 13 日发布的最高宣言中说道：**这种思想上的放任（它是无节制贪欲的源泉），这种一知半解，这种以道德沦丧开始，以毁灭终结的陷于虚幻极端的冲动，不应归咎于教育，而只能归于比体力上的无所事事更为有害的脑力上的无所事事，以及缺乏坚定的认识**。我们要接着说一句：唯有教育才能遏制新的丧失理智的行为，才能防范新的社会灾难。

官衔已成为俄国人民的崇尚，这也正是彼得大帝所希望的。这也正是当时俄国状况所要求的。在其他国家的年轻人大约在 25 岁左右完成学业，而我们这里，年轻人却极力尽早进入仕途，因为他必须在 30 岁就成为一名统帅或一品文官。他进入社会时可说是既没有任何坚实的知识，又缺乏良好的规范：任何思想他都会感到新鲜，任何一条新闻都可能对他产生影响。他缺乏判断能力，不知道相信什么，反对什么。因而他就会成为第一个想要在他面前表现出优越感，或是想利用他的伙伴的盲从者或是可怜的应声虫。

当然，取消官衔（至少是文职官衔）会有极大的好处，但是这个措施也如同对长久以来人们习惯奉为准则的决定进行改变一样，会带来无数的麻烦。然而至少可从职衔制度本身吸取一些教训，使官职成为教育的目标和结果，应当把所有青年人吸收进社

会上受政府监督的各类学校，让他们在学校宁静的环境里，而不是在军营的喧嚣中接受教育，丰富自己的知识并成熟起来。

俄国的家庭教育是最差和最不符合道德规范的：儿童自幼就被奴仆簇拥着，看到的尽是丑恶的榜样。他自己不是专横任性，就是俯首帖耳，奴性十足。他不懂得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人们的相互关系，什么是真正的荣誉。他的教育局限于学习两三门外国语和某个聘来的教师讲授的各门科学的基础知识。私立寄宿学校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公私立学校的教育一般都在学生16岁时结束。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无论如何都要制止私人教育。

应当用一切手段来改善与当前教育相关的一些不利的方面(如延长士官及初级文职官员任期)。

取消考试。先皇确信早于他的一代人无能，因而希望为受过教育的青年一代开辟道路，并对那些道德沦丧、不学无术的老朽稍加限制，因面发布考试的命令。这是一项十分民主化，又是十分错误的措施，因为它将整个新的一代都挤人了军界，而对贵族教育和文职部门构成严重打击。又因为在俄罗斯一切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卖，所以考试对于教授们来说成了一个新的交易领域，考试就像一所糟糕的关卡，年迈的有残疾的守关人为了金钱，把那些不会绕道而行的人放进关来。于是（从那一年起），**不是国立学校培养的年轻人，在进入仕途时就得不到任何优先，并无权要求考试。**

取消考试使老的九品文官和六品文官兴高采烈，这对于那些认为自己的子弟受到委屈的家长们的不满，正是一个极好的反应。

至于赴国外留学，则没有任何必要加以禁止。只需用国内教育的一些不利因素加以限制即可。因为首先，要想获得出国留学许可的人并不多；其次，外国大学的教育尽管有其不便之处，但对我们而言，它比起宗法制教育来，弊端要无可比拟地少得多。我

们知道，屠格涅夫曾就读于哥廷根大学，尽管他存在着政治上的狂热，但在他激进的同伴中，仍以其道德品质和温和节制著称——这正是真正教育和良好知识的结果。因此，只有通过取消或至少是大大抑制私人教育的办法，政府才能较好地着手社会教育的改进工作。

兰开斯特教育法已经引入我国军事教育体制，并且处于极佳状态。

作为俄军军官培养基地的士官学校，需要进行结构上的改造，需要对处于极糟的无人过问状态的道德风尚进行严格监督。为此，需要由优秀学员组成警察部门；对他人的告密应不予理睬，此种现象甚至应受到惩罚，一切控诉均应通过警察部门转达至首长。对于学员中传抄的手稿应严加注意。下流猥亵传抄物一经发现，即应严惩，而对散布蛊惑人心宣传品的人则应从士官学校开除，但以后的工作不应再受到压制：青少年或成人由于未成年时的过失而受到惩罚是可怕的，但不幸的是它在我们这里却是极其平常的事。

必须废除体罚。应当及早向学员灌输荣誉和仁爱的信条；不要忘记，他们也将有权施行以棍棒和树条体罚；过分冷酷的教育会使他们成为刽子手，而不是长官。

在中学，贵族学校以及大学附属寄宿学校应当将学制至少延长三年，并据此提高毕业时授予的职衔。

把培养神职人员的宗教学校的改造，当作国家一项具有高度重要性的工作来抓，这要求进行充分的特别的研究。

低年级学科不需作重大改变，但看来语言学习占时过多。例如，法语在上流社会本已相当熟练，为什么还要用 6 年功夫来学习呢？拉丁语或希腊语又有什么用？在必需的东西尚明显感到不足时，还能容许奢侈吗？

几乎在所有的学校中，孩子们都学习文学，组织社团，甚至

在社会杂志上发表作品。但这一切都使学生偏离学业，使他们养成对些微成就沾沾自喜的习惯，限制了他们本来就有很大局限性的思想。

高级政治类课程应在高年级后期讲授。应当教授法学，按照萨伊和西斯蒙第的最新体系讲授政治经济学，还应开设统计学和历史课程。

历史课程在低年级应当完全按年代、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事件，而不必添加道德或政治方面的议论。为什么要给幼小的心灵强加上片面的总是不牢固的倾向性呢？但毕业班历史课（特别是现代史）的讲授方法应当彻底改变，对于民族精神的差异，国家需要及其理由，可平心静气地指出，不要故弄玄虚，不要曲解共和思想的论述，不要去羞辱两千年来一直被过高评价的恺撒被刺事件，但应当把布鲁图斯说成是国家根本法的维护者和复仇者，而恺撒则是一个利欲熏心的暴乱者。总的说来，不要使受教育者在踏入社会时对共和思想感到惊讶和新奇。

俄国历史应当根据卡拉姆津的著作进行讲授。《俄国史》不仅是一位伟大作家的作品，而且也是一位正直的人所建立的功绩。俄罗斯人对于俄国反而知之甚少。除去俄国历史之外，俄国的统计学、法律亦需开设特别课程，对俄罗斯的研究必定会引起高年级贵族青年的兴趣，他们正在准备用信仰和真理来报效祖国，并抱定宗旨，真诚、努力地同政府一道为改善国家政令建立功勋，而不是丧失理智地密谋破坏，阻碍政府规划的实施。

对于国民教育如此重大的问题，我本来没有勇气将自己极不充分的意见送呈政府审查，唯一驱使我完成交付给我的任务的动力，乃是我心中的宏愿：忠诚努力，不负圣恩。皇上的关切给我以极大的鼓励，恭请陛下恩准我呈上我对一些较为熟悉的问题的看法，以供御览。

关于文集《北方的诗》[①]

这套文集是由我国文学界的代表人士编纂而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从这些文集来评价我国文学的发展和成就。几首好诗，数篇引人入胜的从东方语言翻译过来的散文作品，巴拉丁斯基、维亚泽姆斯基的名字，是《北方的诗》这个莫斯科第一部文集的成功的保证。

杜曼斯基的诗歌《希腊颂》和《致敖德萨诸友》语言准确、和谐，显露出不容置疑的才能。在其他诗人中，我们第一次高兴地看到穆拉维约夫的名字，并对他寄予厚望。至于我们的同道舍维列夫君，此处就不多说了。

我们只想提出的是，阿·诺罗夫君不应去翻译但丁的作品，而奥兹诺比申君则不宜译安德列·谢尼耶，德利比拉德尔君从阿拉伯文翻译的诗歌，我们就让阿拉伯的报人们去为自己的民族诗人的荣誉去辩护吧，至于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他的附录给鞑靼人读起来也许是相当不错的。

一篇关于彼特拉克和罗蒙诺索夫的散文诙谐有趣。的确，这两位伟人有着一些共同之处。他们都是自己祖国的文学的奠基人，都希望在一些重要领域留名青史，然而事与愿违，他们作为人民

---

① 这是为《莫斯科通报》所写的文章。文集《北方的诗》1827 年 1 月问世。

诗人的名声却更为显赫，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各自国家的政治状况存在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同样具有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同样立志于教育。最后，他们都同样赢得自己同胞的敬爱。但是，P君还指出：彼特拉克钟爱劳拉，而罗蒙诺索夫则崇敬彼得和伊丽莎白女王，彼特拉克能用拉丁文写作，并创作出叙事诗《阿非利加》(即 Africa)，而罗蒙诺索夫却没有用拉丁文写过叙事诗。P君在其引人入胜的插叙中讲道，有一位老者从西班牙步行来到罗马寻访李维乌斯，另一位老者，还是一位盲人，步行到罗马，为的是看一眼彼特拉克——这样奇妙的例子，我们的罗蒙诺索夫还举不出来；最后，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有一天问彼特拉克：为什么不向腓力普自荐，等等，但是他（P君）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罗蒙诺索夫又会说些什么？

P君很久没有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位山里人[①] 的诗歌如此清新，如此完美，它的魅力就不用说了，这一点他应归功于古人；但是读完他写的全部作品之后，我感到他很善于把非常多的意大利的东西甚至是所谓的奇喻移入自己的作品。这一点他很走运。”此公高论令人怀疑。

① 指罗蒙诺索夫。

叶甫盖尼·巴拉丁斯基的诗歌[1]

人们盼望已久的巴拉丁斯基诗集终于问世，我们借此机会匆匆来谈一谈我们对这位第一流的、（可能）还没有得到自己同胞充分评价的诗人的看法。

巴拉丁斯基的几部处女作已引起人们的注意。行家们惊奇地发现他最早的作品匀称和谐，表现出不寻常的成熟。

诗歌才能这种早熟的发展，可能取决于环境，但已经向人们预示了诗人极为出色的创作。

巴拉丁斯基的初期作品是哀歌，在这方面他也是出类拔萃的。如今否定哀歌成为时髦，就如同古时人们极力嘲笑颂歌一样；但是，如果说罗蒙诺索夫和巴拉丁斯基的模仿者们都同样让人难以忍受，那么由此还不能得出结论说，抒情类[2] 和哀歌类就应当从诗坛寡头们的职官录中清洗出去。

再说，我们这里几乎不存在纯粹的哀歌。古代哀歌在作诗法方面独具特点，但有时也会变得像田园诗，靠近悲剧，有时又采取抒情的手法（当代的例证就是歌德）。

---

① 这是一篇评论巴拉丁斯基1827年11月出版的诗集的文章的草稿。巴拉丁斯基原定于1824年出版这部诗集。1827年出版的诗集以分为三部的哀歌开篇。普希金关于巴拉丁斯基诗歌的评论1884年曾部分发表，1887年全文发表。

② 抒情类，意指“颂歌式”。

论拜伦的剧作

英国的批评家们对拜伦爵士的戏剧才能提出异议。看来，他们是对的。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异教徒》、《唐璜》中表现出独特的创造性，而一当进入戏剧领域，他就变成了一个模仿者：在《曼弗雷德》里，他模仿《浮士德》，只不过把一些民间场景和礼拜六[①]调换成别的、照他看来是更高尚的场面。但《浮士德》是一代诗圣的绝世之作，它是现代诗歌的典范，就像《伊利昂纪》是古希腊文学的纪念碑一样。

在其他悲剧作品中，拜伦的样板大约是阿尔菲耶里[②]。《该隐》仅仅具有戏剧的形式，但它不连贯的场景、抽象的议论，的确应属于怀疑主义诗歌《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一类。他对世界和人类的本性投以片面的一瞥，然后转过身去，沉浸于他的自我之中。他呈献给读者的是他自己的幻影。他重复塑造自己，有时是裹着缠头的变节者，有时是披着斗篷的海盗，有时是苦行中呻吟的异教徒，最后，有时又是四处飘泊的……，他终于达到了目的，塑造一个统一的（就是他自己的）性格，除了散布于他作品中的某些讽刺性的乖常行为，他把一切都归到这个阴沉、强有

① 《浮士德》中巫婆狂欢夜会。

② 阿尔菲耶里（1749—1803），意大利剧作家。

力、具有非凡神秘魅力的人物身上。当他着手创作他的悲剧时，他就把这个阴郁、强有力性格的组成部分分配给剧中人物，于是他就把一个伟大完整的性格分割成数个渺小得微不足道的人物。拜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他又重新钻研《浮士德》，并模仿它来创作《变体畸形人》(他想以此来改正杰作)。

书信、随想及评论摘录①

真正的品味不在于对某个词、某个短语下意识的否定，而在于对恰当与合情合理的感觉。

*

一个缺少天分的学者就像一位可怜的毛拉，他把《古兰经》撕成碎片，吞进肚子里，以为这样他就浸透了穆罕默德的精神。

*

作家作品的单调表明了他的头脑（也许还是思想深刻的头脑）的片面性。

*

斯特恩说，我们最强烈的快感结束时，总是伴随着一种几近

① 载于1828年《北方花朵》文集。

病态的战栗。[1] 令人难以忍受的观察者！他该认识一下自己；许多人大约还不会觉察出这一点。

*

有人抱怨俄国妇女对我们诗歌态度淡漠，并认为其原因是她们对祖国语言的无知，但是有哪一位女士读不懂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或者是巴拉丁斯基的诗歌呢？问题在于各地的妇女都是一样的。大自然赋予她们精明的头脑与激动的感情，却差不多没有给她们感受优雅事物的能力。诗歌从她们耳旁滑过，却不能深入她们的心灵；她们对诗的谐和无动于衷，请注意一下她们是如何唱流行的浪漫曲的，如何把一些最自然的诗歌歪曲得不像样子，破坏了韵律，打乱了韵脚。您再听听她们对文学的议论吧，你会对她们粗糙、扭曲的概念感到惊讶……而且极少例外。

*

我忽然想起，您说：不可能，不，н. н. 您说得不对，事情不是那样的。

*

我们越是冷静，越是深思熟虑，越是审慎，就能越少一些受到嘲讽的攻讦。自私自利可能使人厌恶，但并不可笑，因为它是异常明智的。但是有一些人，他们是那样温柔地爱着自己，那样

[1] 普希金引自斯特恩《感伤的旅行》。

欣喜地对自己才能表示惊讶，那样动情地考虑自己的福利，那样自怜地想到自己的失意，以至在他们身上连自私自利也带上热情、多愁善感的可笑的一面。

*

没有人能像巴拉丁斯基那样，思想中包含丰富的情感，情感中具有高尚的审美力。

*

缺乏礼貌的例子

一些亚细亚民族的男人，每天醒来，都要感谢神没有把他造成女人。

穆罕默德否认女人具有灵魂。

在法国这个以礼仪著称之邦，语法庄严宣布阳性是最高尚的。

有一位诗人把自己创作的悲剧送交一位著名的批评家审阅。手稿中有这样一行诗：

我是一个人，曾经身陷迷途。

批评家在诗下面划了一杠，犹豫起来，女人能称作人吗？这使人想起据说是彼得一世的一句名言：女人非人，母鸡非鸡，准尉非军官。

甚至一些自称为女性最虔诚崇拜者的人，都不认为女人具有

同我们一样的智慧，因而他们设身处地为妇女理解的弱点着想，专为妇女出版了一些学术小册子，就像为孩子出的儿童读物一样。如此等等。

*

特列佳科夫斯基有一天来向舒瓦洛夫控诉苏马罗科夫。"阁下，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那么狠地打了我的左脸，直到现在它还挺疼的。""怎么啦，老弟？"舒瓦洛夫回答说，"你的左脸痛，可你却捂着右脸。"

"啊，阁下，您说得有道理。"特列佳科夫斯基边说边把手挪到另一侧脸上。特列佳科夫斯基一生中不止一次挨揍。在沃伦斯基的案卷中记载着，此人在一个节日要求宫廷诗人瓦西里·特列佳科夫斯基作一首颂歌，但颂歌没有写好，于是这位气盛的御前大臣就用手杖惩罚失职的诗人。

*

我们有一位诗人自豪地说：尽管在我们的诗歌里可以找到没有意义的东西，但却找不到散文。连拜伦对自己的一些诗也解释不清。没有意义的东西有两类：一类是由于缺乏感情和思想，只能以文字来掩饰；另一类则是由于感情和思想丰富，而文字表达能力不足。

*

“一切超越几何学的事物，也超越我们。”[1] 帕斯卡尔如是说。在这之后，他写成了自己的哲学思考！

*

一首无可挑剔的十四行诗同一部史诗有同样的价值。[2] 一篇出色的讽刺短诗比一本蹩脚的悲剧还要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说“一顿可口的早餐比坏天气要好一些”吗？

*

所有的体裁都是好的，乏味的除外。[3]这句话第一次说出来是非常好的，但如此伟大的真理岂可一本正经地重复？伏尔泰这句话成了文学怀疑论者肤浅批评的根据，但无论如何，怀疑主义只算得是思考的第一步？不过有人[4] 发现，就连伏尔泰也没说得同样地好。

*

旅行家安塞洛谈到一种语法，它确立了我国语言的规划，却

① 引自帕斯卡尔《思想录》。

② 原文为法文，引自布瓦洛的《诗艺》。

③ 原文为法文，引自伏尔泰的喜剧《浪子》的序言。

④ 指丘赫尔别凯。

没有出版；他谈到一部俄国小说，它使作者扬名，却仍然是一部手稿；他还谈到一出喜剧，它是俄国戏剧出类拔萃之作，但从未上演过，也没有刊行过。在后一种情形，安塞洛差不多是正确的。有趣的空话！

*

一位老不收心的好色之徒 Л. 说："从道德的角度上看，我是好色的，但从好色的角度看，我又是有道德的。"

*

灵感是心灵具有生动感受印象，对概念进行思考，对印象、概念加以阐释的一种倾向。几何学和诗歌都同样需要灵感。

*

有些外国人断言，我国古代的贵族缺乏荣誉观（point d'honneur)，他们大错特错了。荣誉如果说在于准备为维护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则而牺牲一切的决心，那么这种荣誉感在我国古代的门阀等级制中尽显其丧失理智的辉煌。贵族或失宠被黜，或面对极刑，都将谱系纷争交由沙皇法庭裁决。年轻的费多尔消除了高傲的贵族反对派，做到了连强有力的伊凡三世、他性格急躁的孙子以及暗中怀恨的戈都诺夫也拿不定主意做的事。

*

为自己祖先的荣耀而感到自豪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而对祖先的荣耀不敬，则是一种可耻的怯弱。卡拉姆津说，“国家法规把对祖先的崇敬列入一个有教养的公民的品德范畴。”[①] 希腊人甚至在最屈辱的时刻也不忘自己光荣的起源，因而无愧于自己的解放。在整个民族被认为是美德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在个别人身上成为恶习呢？这种为某些哲学家表现出的大众化的嫉羡所证明的偏见，只能为卑下的利己主义的传播效力。认为我们的子孙将会因我们留传给他们的名字而受到尊敬的想法，难道不是人类胸怀的一种极其高尚的期望吗？

我的子孙将因这块土地而对我感恩戴德。[②]

*

有这样一种说法：秘密会社乃是民族间的外交手段。[③]但哪一个民族会把自己的权利托付给秘密会社？哪一个自尊的政府又会同这些秘密会社进行谈判呢？

---

① 引自《俄国史》，引文有改动。卡拉姆津原文为：“善良的俄罗斯人应当具有更多的耐心，遵循政府把对祖先的崇敬列入一个有教养的公民的品德的法规。”

② 原文为法文，引自拉封丹的寓言《长者与三位青年》。

③ 原文为法文。

*

拜伦说：他决不会去动笔描写一个他没有亲眼见到过的国度。但是在《唐璜》里，他却描绘了俄国，而且有几处与实地情况不符。例如：他谈到伊兹迈尔肮脏的街道；唐璜乘坐带篷马车，让人提心吊胆的无弹簧马车沿着铺石道路动身到彼得堡去。伊兹迈尔是在严寒的冬季攻占的，敌军的尸体为大雪覆盖，胜利者就在这些尸体上行进，却对城市的洁净感到惊奇。天哪，多么洁净啊！……冬季的马车不会使人提心吊胆，而冬季的道路也不是石面的。此外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错误。拜伦读过许多关于俄国的书，向人询问过俄国的情况。看来，他喜爱俄国，熟知俄国现代史。在自己的长诗中，他时常说到俄国和我们的风俗。他的撒丹纳巴勒斯之梦使人想起苏沃洛夫战争时期华沙的一幅漫画。[①] 他借尼姆甫罗德这个人物刻画了彼得大帝的形象。1813 年拜伦曾打算经波斯到高加索。

*

精明还算不上是有智慧的证明。愚人，甚至疯子有时也会惊人地精明。还可以加以补充：精明极少与天才（天才通常都是朴实无华的）相合，也极少与总是光明坦荡的伟大性格为伍。

---

① 撒丹纳巴勒斯之梦，指拜伦的悲剧《撒丹纳巴勒斯》（第 4 幕，第 1 场）中撒丹纳巴勒斯的独白。普希金所说的漫画不是在华沙，而是 1795 年在伦敦出版的。漫画中描绘了苏沃洛夫将占领华沙后砍下的妇女和儿童的头颅呈献给叶卡捷琳娜女皇。

我不知道在何处，但不在我们这里，
有一位可敬的米达斯爵士——
他有着一颗平庸低下的心灵——
为了不在滑溜的路上摔倒，
他匍匐向前，终于爬上
人所共知的官位，
并成为一位人所共知的绅士。
关于米达斯，我们想再说上两句：
他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和谋略，
只有算不上出色的小聪明，
他傲慢冷漠而内心怯弱，
表面上却彬彬有礼。
想要逢迎我的主人公的人，
不知怎样捧他才行，
他们一致决定，称赞他很精明。

普希金

*

阁下：您不谙正字法，而且写的东西言之无物。我仅恳求阁下，不要以有教养的公众的代言人自居，不要以三种文学争论的裁决者自居。谨致衷心的问候。

*

Coquette（卖弄风情的女子），prude（过分拘谨的女子）。卖

弄风情的女子一词早已俄语化了，但 prude 则尚未译成俄语和被广泛使用。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在理解（妇女的）名誉方面过分拘谨的女人——一本正经的女人。这种特点表明思想上的不纯净，这在女士，特别是年轻的女士身上，是令人厌恶的。年长的妇女虽然见多识广，又有许多忌惮，清纯仍然是青春年华的最佳装饰。假正经的人，不管怎样，要么非常可笑，要么令人厌恶。

*

有些人无论对于祖国的光荣，或是祖国的苦难，都漠然置之。他们只了解自波将金公爵以后祖国的历史，只了解一些他们的庄园所在省的各项统计。然而他们却认为自己是爱国主义者。原因是他们喜欢空谈。他们的孩子穿着红色衬衫跑来跑去。

*

莫斯科是女仆居室，而彼得堡是前厅。

*

应当争取大多数人站到自己这一边：注意不要使愚昧的人受到冒犯。

*

《俄国史》的问世（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3000 册不到一个月即销售一空，这对卡拉姆津自

己也是大出意料。上流社会的人们都争相阅读自己祖国的历史。这部书对于他们是一个新的发现。古代俄罗斯似乎是被卡拉姆津发现的，就如同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一样。有一段时间，这部书成了人们谈论的唯一话题。不过我得承认，没有比我所听到的一些社会上的议论更荒谬的了，这些谗言会使任何一个人放弃建功立业的抱负。有一位夫人（而且是十分可爱的一位）当着我们的面翻开第二部大声读道："弗拉季米尔收斯维亚托波洛克为义子，然而却不喜欢他……然而！为什么不用但是呢？然而！你能感觉到您的这位卡拉姆津一文不值吗？"各种杂志没有刊登对他的评论：我们还没有人能够对卡拉姆津这部巨著进行研究和评价。卡切诺夫斯基赶忙抓住序言。尼基塔·穆拉维约夫，一位聪明、热情的年轻人，对序言（序言！）作了分析。米哈伊尔·奥尔洛夫在致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则抱怨卡拉姆津，为什么没有在著作开头一段出色地写入关于斯拉夫人起源的假说。这就意味着向历史学家要求的不是历史，而是别的什么。还有一些好说俏皮话的人则是在餐桌旁用卡拉姆津的风格改编了李维乌斯的头几章。然而却没有谁对这位在功成名就的时刻蛰居在书斋之中，将整整12年生命献给默默的不知疲倦地劳动的人表示一句感谢。书中对俄国历史所作的注释证明了卡拉姆津的渊博才学。这是他在对于一些人来说求知的年月已告结束、致力教育已为仕途奔波取代的时候获得的。许多人忘了卡拉姆津的《俄国史》是在俄国这样一个专制的国家出版的，也忘了皇上恩准卡拉姆津免予书刊检查。这一信任的表示，实际上使他有责任尽可能谦虚温和。我要再说一遍，《俄国史》不仅是一位伟大作家的创作，同时也是一位诚实的人的功绩。[①]

① 选自普希金未出版的笔记。

*

杰尔维格的田园诗使人感到惊异。要完全从19世纪返转到古希腊的黄金时代，这需要有何等丰富的想像力，而要具有何等不寻常的美感，才能通过拉丁文或德文翻译去参透希腊的诗歌，此种华美，此种愉悦，此种反面多于正面的魅力，它不容许感情中有任何紧张的成分，不容许思想中存在隐晦、混乱，不容许描写中有多余的和矫揉造作的成分。

*

法国文学诞生于前室，之后再没有进一步进入客厅。

《书信、随想及评论摘录》的资料[1]

前　言

我的叔叔有一天病倒了。他的一位朋友来看望他。“我真寂寞啊，”叔叔说，“我本想写作，可又不知道写些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他的朋友回答说，“随感，文学和政治评论，讽刺肖像，诸如此类都可以写。这很容易。塞内加和蒙田都是这么写作的。”叔叔的朋友走了，于是他照着朋友的建议开始写了起来。早晨，送给他的咖啡味道很糟，这让他十分恼怒，于是他发出带有哲学意味的议论；无所事事使他感到难过，并且立刻写下：我们有时候为真正的无所作为感到难过。这时给他送来了一份杂志，他翻阅起来，并在里面看到一位浪漫主义拥护者写的关于戏剧艺术的文章。我的叔叔是一位铁杆古典主义者，他思考了一会儿，于是又写下：不管现在的批评家们如何批评，较之莎士比亚和卡尔德隆，我更喜爱拉辛和莫里哀。叔叔还写了二三十篇类似的随感，就躺下睡觉了。第二天，他把写的东西送交一位编辑，后者客气地向他表示感谢。从此以后，叔叔就常常心满意足地在杂志上读到自己的随感。

---

[1] 此处收集了前文的一些未誊清的手稿片断。

*

苏马罗科夫在俄语方面的造诣高于罗蒙诺索夫，而他的评论（在语法方面的）也是论据充分的。罗蒙诺索夫对此没有答辩，或是以玩笑敷衍过去。苏马罗科夫要求尊重诗歌创作。

*

如果所有的话都已经说了，您为什么还要写呢？只是为了把说得很朴素的话再说得漂亮一些？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不，我们不想诋毁人类的智慧，它协调概念的能力就如同语言协调词汇的能力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在这个意义上，维亚泽姆斯基公爵一个妙不可言的玩笑是完全有道理的：他在为使得俄国诗歌如此渺无生气的形容词泛滥的现象辩解时风趣地说道：所有的名词都已经是现成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用形容词去重新修饰它们。严谨的人们沉思起来，并开始认真地去证明，就连动词、副动词以及其他词类也都早已是现成的了。

*

我们有些人把散文当成诗歌来使用，可并不是由于生活上的必需，也不是为了表达必要的思想，而仅仅是表现一种愉悦的形式。

*

你可以去咒骂所有的男人，历数他们的罪过，他们没有一个人想为自己辩解；但是你只要对一位女性稍存不敬，所有的妇女就会对你群起而攻之——她们会万众一心，汇织成一副罗网。

*

我们贪婪地阅读伟人札记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自尊心。如果我们不管在什么方面（如看法、情感、习惯，甚至是缺点和过失方面）与一位著名的人物相似，我们就会感到高兴。或许我们会发现，在看法、习惯和弱点方面，我们同那些卑微的人们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如果我们听了他们表白的话。

*

Kc.认为某篇作品十分拙劣。“您怎样才能证明这一点呢？”“那有什么？”他天真地让我相信，“要是我，也可能会这么写。”

*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散文极为生动。他具有十分独到地表达思想的罕见的才能——幸运的是，他思考的内容在我等众人之中亦相当少见。

*

有各种各样的勇气。杰尔查文写道："雄鹰翱翔于霄汉，"当幸福"发出令人恐惧的笑声，把自己的脊背转向你时，你看到围绕你的梦幻的光华熄灭了"。

对瀑布的描写：

恍若钻石般晶莹的山峰
从九天之上坠落。

茹科夫斯基是这样讲述上帝的：

他将自己裹在莫斯科的烟尘之中。

关于勇敢的蚂蚁，克雷洛夫说道：

它甚至孤身向蜘蛛冲去！

卡尔德隆把闪电称作天堂向尘世传话的火舌。

弥尔顿说，地狱的火焰只能勉强分辨地狱永恒的黑暗。

我们认为这些表达方式是有勇气的。因为它们有力地、非同寻常地向我传达了明晰的思想和诗意的画面。

法国人至今还对拉辛的勇气感到惊讶，因为他使用了"石板"（pavé）这个词。

他虔诚地吻你神殿的石板。

而德利尔则为自己使用了 vache（奶牛）一词感到自豪。屈从于这种渺小、任性的批评的文学是可鄙的。如果诗人只是靠类似的、对爱好的偏见的胜利扬名的话，那么（无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缺点），他们的命运都是可悲的。

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勇气，即发明创造的勇气。在这里，宏伟的结构充满创造性的思想——莎士比亚、但丁、弥尔顿的勇气，歌德在《浮士德》、莫里哀在《伪君子》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就属于这一类。

重复一些俏皮词句显得拙劣。讽刺短诗难道是可以翻译的吗？此处我指的不是散发出诗的魅力的具有古典抒情诗风格的讽刺短诗，也不是马罗的压缩了生动故事的讽刺短诗，而是布瓦洛以两韵诗下定义的讽刺短诗。

如果祖国文学爱好者的头衔……[1]

如果祖国文学爱好者的头衔本身就值得尊敬，并且还有点意义，那么我赞成公众的意见，不管多么缺乏天分，我应有权受到公众的某些注意。1761 年我出生在一个虽然诚实，但不富有的家庭，因而不能享受长期以来大量开辟出来的教育资源。我必须满足于一位教区执事所教的课程，不过，他虽然职位低下，但博学多才。我对于美好事物，特别是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应当归功于这位可敬的先生的培养。他给我一本库尔干诺夫先生编著的《语文读本》，我几乎从不释手，8 岁时我已可全文背诵。自那时起，我可斗胆地说，无论出版了什么东西，没有一部俄语作品，一篇俄语译文，一本俄语杂志（这里包括家政的、烹调的书籍，甚至日历）是我没有读过的，或者退一步说，是我所不了解的。如今通常都非难上了年纪的人盲目地眷恋过去和憎恶当前的一切，但是我不应受到这样的责难。我对我国文学的成就总是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看到当前一些杂志对为俄罗斯和全人类带来荣誉的作家的作品，以及对我们可爱祖国教育状况所作的如此丧失理智

---

① 一篇文学批评性质的模拟作品的草稿，作于 1827 年。1884 年曾作为《戈留辛诺村的历史》的开头部分发表。这一片段普希金曾部分用于《别尔金小说集》的前言，以及《戈留辛诺村史》之中，但此处描绘的人物更大程度上成为塑造费奥菲拉克特·科西奇金这一形象的素材。

的和如此不公正的毁谤，感到愤慨。这些杂志本身不就是我国教育取得巨大成就的最雄辩的证明吗？有哪一本外国杂志能在思想深刻方面超越《欧罗巴通报》，在学术性上超过《北方档案》，在令人愉快的多样性方面赶得上《莫斯科电讯》，而在其他一些特点上超过《祖国之子》、《莫斯科通报》以及《北方蜜蜂》等杂志呢？在这个问题上，可敬的《欧罗巴通报》、《北方档案》、《莫斯科电讯》、《北方蜜蜂》等杂志的出版者们当然是会表示同意的。正是这些不公正的丧失理智的毁谤迫使我第一次在作家们的天地发表意见，并且正如菲利莫洛夫先生在关于他的一本文集即将面世的一篇动人的报刊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当无情的命运女神还在纺织生命之线的时候，我期望为我尊敬的同胞们作一点有益的事。

论奥林的悲剧《科赛尔》[1]

拜伦爵士的著作中没有哪一部能像《海盗》那样在英国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虽然它的价值要逊色于他的其他许多作品。例如：在激情的描绘方面，不如《异教徒》；在人类心灵展示方面，不如《围攻科林斯》、《锡隆囚徒》感人；在悲剧的力度上，不如《帕里西纳》；在思想深度和真正浪漫主义的抒情高度上，不如《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的第三首和第四首歌；而在惊人的莎士比亚式的多样性方面，又逊于《唐璜》。《海盗》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应当归功于主人公的性格。书中主人公使我们神奇地想起另一人来，他那可怕的意志操纵着欧洲的一部分，威胁着另外一部分。至少英国的批评家们认为拜伦怀有这种意图。但是诗人在《海盗》中也塑造了一个几乎出现在他所有的作品里的人物形象，而最后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一书中，这个形象以他本人的面目出现。不管怎样，诗人从未对自己的意图加以说明：认为自己同拿破仑相似使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

拜伦极少关心自己作品的结构，或者从来不加考虑：几个相

---

[1] 这是1827年写的对奥林所著悲剧《科赛尔》的一篇评论开头部分的草稿。1855年首次公开发表。草稿结尾部分谈到结构问题的原因是：B·H·奥林于1824年在一篇评论《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文章中，责备普希金的这部作品缺乏结构。

互连接松散的场景，已足够被他用来表现深邃的思想情感和画面。英国批评家认为他不具有戏剧天才。拜伦为此不无抱怨。问题在于拜伦认识并且喜欢的只是一个性格（就是他自己的）。除了散见于他的作品中的一些乖张的行为，他都集中到这个阴沉、强烈而又如此充满神秘魅力的人物身上。而当他写悲剧时，他却把这个阴沉有力性格组成部分的特点，分散在剧中人物身上，于是他就把一个巨大完美的形象分解成好几个微不足道的人物。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悲剧虽然具有诗意的美，但却总是低于他的才智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长诗中的戏剧部分（《帕利西纳》是个例外）缺乏任何价值的原因。

如果一位作家从长诗《海盗》中仅仅撷取了只够得上一篇蹩脚的西班牙小说的结构，并且要根据这个幼稚的结构创作一部戏剧三部曲，而且把拜伦使人陶醉的深沉的诗歌，替换成只配得上已故的科泽布的倒霉的模仿者的装腔作势的蹩脚散文，我们对这样一位作家会怎样想呢？而奥林就是这样做的。他写了一部浪漫主义悲剧《科赛尔》——完全是模仿拜伦之作。我们不禁要问：拜伦诗歌中是什么使他惊叹不已呢？——难道只有结构？啊，崇拜者们！

致《莫斯科通报》出版人的一封信[1]

感谢您参与决定《戈都诺夫》的命运，您渴望读到它的心情对我的虚荣心是一个极大的满足。现在，当有利条件齐备，此书出版已有可能时，我却预见到一些我以前未曾料及的困难。

自1820年后，我远离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社会生活，仅仅从一些杂志来观察我国文学发展的方向。读到关于浪漫主义的激烈争论，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古典主义的四平八稳、完美无缺以及其模仿者平庸单调的作品目录，饱受这些折磨的读者的兴趣要求另一种强有力的感觉，并且在新的民间诗歌混沌但却是沸腾的泉源中去寻求这些感觉。我感到十分奇怪的是，我们还十分幼稚的文学，虽然还没有在哪种类别提出楷模之作，但某些作品已使公众阅读的品味变得迟钝。我认为我们从幼年就如此熟悉的法国文学也许就是上述现象的原因。我真诚地坦言，我所受的教育使我对可敬的公众心怀恐惧，我看不出迎合公众、跟随时代精神有什么可耻之处。这一条自白引出了另外更为重要的一条。好吧，我忏悔，我在文学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如果不是更坏的话），而且一

① 这封信当时并未在杂志上发表。看来，普希金没有写完。1855年首次发表。导致普希金撰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舍维列夫的一篇文章《1827年俄国文学评述》（载《莫斯科通报》，1828年第1期），此文对出现于报刊上的剧作《夜。丘多夫修道院的修士斗室》评价极高。关于此事，季托夫于1828年2月11日致包戈廷信中曾经谈及。

切文学宗派对我而言都是同等的，它们都表现出有利的一面，也表现出不利的一面。文学的良心是否应当受到仪式、形式等迷信的奴役呢？为什么作家不像他遵从自己的语言规则一样，服从自己民族文学中公认的习惯呢？他应当不顾规则的困难努力掌握自己的专业，就如同他应当不管语法的桎梏去掌握好语言一样。

我坚信我国戏剧舞台陈旧的形式需要更新，因此我是按照莎士比亚老人的体系来安排我的悲剧的，并且把古典主义三一律中的两个①作为牺牲祭品放在他的祭坛上，而勉强保留了第三个。除了这赫赫有名的三一律，还有一个法国评论界没有提及（他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对其必要性提出反对意见）的统一，即文体的统一，这是法国悲剧不可缺少的第四个条件。然而西班牙、英国和德国戏剧却摆脱了它的束缚。您会感觉到我遵循一个多么诱人的榜样。

还有什么要说的呢？亚历山大体诗（六音步抑扬格）被我改换成五音步自由体诗，在有些场景甚至降低到可鄙的散文水平，我的悲剧不分幕次——我已经在想：公众会对我大为感谢。

我自愿放弃了为经验所证明、习惯所肯定的艺术体系提供的便利，尽力忠实刻画人物性格和合乎历史发展的时代事件去取代这种敏感的缺陷——一句话，我写的是一部真正浪漫主义的悲剧。

然而当我更为仔细地阅读杂志中刊登的批评文章时，我开始怀疑我关于我国文学出现的浪漫主义改革趋向的想法，是大受其骗了。我看出来，人们通常对浪漫主义的理解是指带有忧郁和梦幻印记的作品。根据这条任性的定义，我们时代一位最富独创性

① 古典主义三一律中的两个，即时间整一，地点整一。普希金只保留了三一律中的情节整一。

的作家（他虽不总是正确，但却总是能得到神魂颠倒的读者满意的首肯）毫不犹豫地将奥泽罗夫划入浪漫主义诗人之列。再有，我们杂志界的一些文艺批评家们不客气地将但丁和拉马丁相提并论，并且自以为是地在文学方面将欧洲分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部分。他们将南方拉丁语区划归前一类，而将北方的日耳曼部落列入后一类。这样一来，但丁（我们伟大的父亲阿利吉耶里），阿里奥斯托，洛佩·德·维加，卡尔德隆，塞万提斯，全都落入古典主义一翼。看来，由于《莫斯科通报》出人意料的帮忙，胜利毫无疑问将属于这个阵营了。

这一切大大动摇了我作为作家的信心。我开始怀疑我的悲剧赶不上时代的潮流。

然而我读到一些被吹捧为浪漫主义诗歌的浅薄之作。我在诗里连浪漫主义诗歌真诚、自由发展的影子也看不到，看到的只是法国伪古典主义的装腔作势。很快我就得到了证实。

您已经读过刊登于《莫斯科通报》第1卷的《鲍里斯·戈都诺夫》的片段。皮明的性格并非我的发明。在他身上我汇聚了我们古老编年史中所有使我迷恋的特点：朴直忠厚，动人的温顺，幼稚而充满智慧的纯朴，对于沙皇天赋权力的虔诚，没有丝毫的浮华和偏见——这些都从早已逝去的古老岁月的珍贵文献中散发出来。在这些古老文献中的库尔勃斯基大公充满怒气的编年史与其他编年史相比，特别引人注目，就如同逃亡者伊凡的生平较之万念俱寂的修士们的平静生活更具吸引力一样。

我觉得这个性格对于俄国人民全然是新的，而又是熟悉的，古代编年史家感人的朴直为卡拉姆津如此深刻地理解并生动地表现在自己不朽的著作里，也给拙诗增添了光彩，并赢得读者们宽容

的一笑。结果呢？一些聪明人把注意力转向皮明的政治观点，认为它们已经落后于时代；有的人则表示怀疑，难道没有韵脚的诗也能叫诗吗？З.君则表示他喜欢《妇女杂志》中的场景胜过《鲍里斯·戈都诺夫》。可敬的公众严厉的裁决就到此结束。

由此可得出什么结论呢？这就是З.君和公众是正确的，而杂志编辑诸君却因以错误信息引我尝试写作而难辞其咎。在法国文学影响下接受教育的俄国人已经习惯法国文学批评界肯定的规则，而且不愿见到同这些规则格格不入的东西。引进新的东西是危险的，而且看来也没有必要。

您是否想要知道，还有什么阻碍了我出版我的这部悲剧？即书中有可能给人以影射、暗示、讽刺等口实的地方。由于法国人，我们还不懂得戏剧作家怎样才能摆脱自己的思维方式，以便完全置身于他所描写的时代。法国人写悲剧时面前放着一份自由主义的报纸《立宪报》或一份保皇派报纸《日报》，而他之所以写悲剧，是为了用六音步诗迫使苏拉、提比略、列昂纳达[①]说出作者本人对维莱尔或者是坎宁的看法。由于这种别出心裁的方法，在当今法国舞台上，我们可以听到大量头头是道的报刊语言，而真正的悲剧却没有了。请注意，在高乃依的作品里，你看不到影射。除了《爱丝苔尔》和《贝蕾妮斯》外，拉辛的著作里也没有影射。法国戏剧年表认为《布里塔尼居斯》中有对路易十四世宫廷声色犬马、寻欢作乐的暗示。

---

① 指三部法国悲剧：1821年朱依的《苏拉》，1828年阿尔诺的《提比略最后的日子》，1825年皮什的《列昂纳达》。

他从来是照章说话行事的。[①]

但是这位机灵的宫廷诗人拉辛居然斗胆破口大骂，将路易影射为尼禄。这有几分可信呢？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拉辛写出这部绝佳之作。他充满了罗马帝国塔西陀的精神；他在刻画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和暴君的宫廷时，并没有想到凡尔赛宫里的芭蕾舞，就如同休谟或是沃波尔（我记不清究竟是谁）在类似情形下评论莎士比亚一样。这种大胆影射本身就是拉辛根本没有考虑这种手法的明证。

① 原文为法文，引自拉辛的《布里塔尼居斯》（第4幕，第4场）。有一种看法，说诗中影射路易十四参与芭蕾舞演出，其根据是布瓦洛在给莫里申纳尔的一封信（1707年）中说道，路易在听到这些诗后便不再参加宫中芭蕾舞演出。

驳《阿特涅依》刊登的一篇文章[①]

《阿特涅依》第4期刊登了一篇分析《奥涅金》4、5两章的文章。

浪漫主义在该文作者看来只是帮助诗人摆脱窘迫的保留条件。

在分析小说中人物性格时，他认为他们一般都是缺乏道德的。他对奥涅金持否定态度，因为他一面公开地合乎道德地对待挚爱他的塔吉雅娜，一面又握奥尔加的手，不怀好意地想以此嘲笑自己的朋友。

他感到奇怪，沉静的（?）爱好幻想的（?）（公正些说，应当是热情的坠入情网的）连斯基居然会为纯粹琐事，要求与奥涅金决斗，并且把自己冷漠的未婚妻叫做卖弄风情的女子，轻浮的孩子（因为年轻人通常为了大事才进行决斗，而恋人从不会为琐事而产生忌妒）。

他还对塔吉雅娜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她一见着奥涅金，就神魂颠倒地爱上了他，并且给他写情书——而这当然是不成体统的。

---

① 这是一篇文章的草稿。首次发表于1930年。普希金撰写此文的原因是《阿特涅依》杂志1828年第4期刊登了一篇署名为符（M'·A·德米特里耶夫）的对《叶甫盖尼·奥涅金》两章进行分析的文章。普希金没有发表对分析的反驳，但将部分看法于《叶甫盖尼·奥涅金》成书时收入注释中。

最后，他还认为这两章放在哪儿都不合适，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同他争辩了。

至于说到诗歌本身，批评家对它还相当宽容，赞不绝口——虽然在《奥涅金》上述两章中发现 291 处小错，还有上百处颇使受老式教育的人感到别扭的地方。

这 291 处小错中，有许多都值得商榷。其中许多也不需要该文作者长者般宽大的辩护——对属于爱好的一切事物任何人都可赞赏或否定。但是，这位批评者对语言和内容方面的一些指责，却是错误的。因此我决定向他解释一些语法和修辞方面的规则，这与其说是为了他个人，不如说是为了使年轻的文学家们受到一些教益。

以 времян（时代）为例，这么说，杰尔查文说“глагол времен（时代的语言）”是错了？

但巴丘什科夫（他看来同杰尔查文一样常犯错误）也说：

> 弗拉基米尔时代（времян）的
> 古俄罗斯及其风尚。

что звук пустой（犹如空泛的声音）代替 подобно звуку（如同声音一样），как звук（像声音一样）。——在田野上等等。

语气词 что（犹如）取代常用的 как（如同）常用于歌谣和清纯悦耳的民间语言中。克雷洛夫便经常使用 что。

顺便谈一谈克雷洛夫。青年作家们，请倾听一下民间的语言——你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在杂志上找不到的东西。

暴风雨的阴影覆盖
微微现出鱼肚色的晨曦。

一个句子中第一格（常作主语）与第四格（常作补语）形式相似时，可能产生歧义。至少应当按照自然词序写下整个句子。

遗憾，极度的痛苦使人窒息。——这是最简单的隐喻。

我不想连续争吵两个世纪。——好像，有关于否定词 не（不）的使用规则。……

俄语语法还不完备。我想说的是：首先，所谓的诗歌创作的自由，使我们从罗蒙诺索夫时代起，就可在否定语气词 не（不）之后，使用第二格或第四格。例如：……

其次，语法规则规定，受否定语气词直接支配的主动动词要求第二格，以代替第四格。例如：Я не пишу стихов（我不写诗）。但如果主动动词不受否定语气词支配，而是取决于受否定词 не（不）支配的另一词类，那么这个动词之后要求第四格补语，我不想写诗，我不会写诗。在下面的句子中：我不能允许他动手写诗。难道动词“写”受语气词“不”的支配吗？

如果批评者稍加考虑，或许他会同意我的意见。

清新、纯真的亲吻。

不说“清新、纯真嘴唇的亲吻”——这是非常简单的隐喻。

无忧无虑的孩子们，
脚下的冰刀刻划着冰面，
发出吱吱的声响。

批评者摘引这几行诗是想要表明这样的意思：孩子们在冰上滑行。完全正确，这一正确的解释说明批评者颇有悟性。

肥胖的白鹅迈动绯红的脚掌，
本想投入碧波的怀抱（лоно），
却小心翼翼地踏上光滑的冰面。

诗中лоно不是指深度，而是指胸怀。

壁炉呼出微微的热气……

又是简单的隐喻。

剽悍的飞奔的带篷雪橇。

又是隐喻。

人声鼎沸，马蹄声阵阵。

童话故事的表达法（鲍瓦·科洛列维奇）。

年轻的作家们，请读一读民间故事，你们就看到俄罗斯语言的特点。

“把ропот（抱怨声）读成роп，把топот（马蹄声）读成топ该有多么愉快”等等。我想向我的批评者指出，роп，топ等等在俄国许多省民间经常使用。注意：我们还有机会听到用стукот（敲击声）代替стук。

如果我们的拘泥的批评家尚有疑虑，我们是否可以使用修辞格和比喻手段，在这方面他们本也可获得一些他们学业预科阶段的一些知识，那么他们对于卡尔德隆、莎士比亚或是我们的杰尔查文的“粗鲁”又会说些什么呢？他们对杰尔查文关于波将金的诗歌又会说些什么呢？

他敢于掂量俄国人的气魄，
叶卡捷琳娜的力量
他是否想要凭借这气魄和力量
把你的轰鸣声送上
古罗马曾经屹立其上的绝壁
让它震动整个寰宇？

或者关于战争的描写，他

垂下戴着桂冠的头颅。

或是……

那些自称为古老语法捍卫者的人们至少应当有一些小学生水平的语法和修辞知识——并且还应当有一些俄语特点的知识。

论诗的语言①

成熟的文学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时期，人们对艺术作品的单调，上流社会千篇一律语言的局限感到厌烦。转而寻求新鲜活泼的民间语言以及原来受到鄙视的古老的俗语。例如：有一个时期，法国感到厌烦的上流社会人士对巴德的诗赞赏备至，如今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的作品开导了许多人。但是巴德缺乏想像力和诗的情感，他的俏皮诙谐的作品仅仅散发着小贩和搬运夫广场语言表达出的欢快情绪。英国诗人的作品则不同，它们饱含深沉的感情和诚实的普通人的语言表达出了诗意的思想。而我们这里，这个时期尚未成熟，所谓的神的语言对我们还十分新奇，我们还把任何一个写了几十首带韵脚抑扬格小诗的人统统称为诗人。我们不仅没有想到过使诗歌语言走向朴素的优美，相反，甚至连散文我们也力图给它增添一些华丽色彩。至于摆脱千篇一律修饰的诗歌，我们则还不能理解。茹科夫斯基和卡杰宁的一些尝试未获成功，原因不在诗歌本身，而在于他们所构想的情节。很少人认识到黑贝尔作品译文的价值，而认识叙事诗《凶手》的独创性和力量的人就更少了。这部叙事诗完全可以同毕格尔、骚塞最好的作品媲美。请看凶手对他的恶行的唯一见证者——月亮的诉说：

① 作于1828年。

瞧吧，瞧吧，你这个秃子！

这行诗充满真正的悲剧力量，对于一些轻浮的不懂得有时恐怖也可用荒谬可笑来表达的人而言，它只会显得极其可笑。《哈姆雷特》中幽灵一场就是用戏谑甚至低俗的语言写的，但这种哈姆雷特式的戏谑却使人毛骨悚然。

巴拉丁斯基的《舞会》

我们的诗人们不能再抱怨批评家们和公众过于严厉——而是相反。我们只要发现一位年轻的诗人有一些作诗技巧，一些语言知识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就会迫不及待地去给他加上天才的头衔，为了几首尚称通顺的小诗——我们会在杂志上**以全人类的名义**向他温情地表示感谢，对于一些蹩脚的译文、手稿的模仿，我们还会不知高低地拿去同歌德、拜伦的不朽之作相提并论。于是我们这里一下子涌现出好几位我们自己的品达、阿里奥斯托和拜伦，还有三四位**为我们的时代带来荣誉的作家**——这样的慈悲心肠虽然可笑，但却无害。然而一位真正的天才更多信赖的是他自己建立在对艺术热爱基础上的判断，而不是文艺批评家的草率决定。何必要去剥夺报刊杂志的盛典给表面镀金的平庸诗人们带来的无害的满足呢？

我们的诗人中，巴拉丁斯基是最少受到杂志界青睐的一位。是因为他的作品表现出的思想感情真挚明快，表达准确，品位高洁，结构严整，给予人们的印象反不如流行诗歌的夸张？还是因为我们这位诗人的一些讽刺短诗激起了并不总是很温和的批评界的愤慨？无论如何，批评界对于他表现出要么是不负责任的冷漠，要么甚至是一种不友善的态度。且不提著名的乐天派温和的《友善》杂志那些著名的玩笑，为了对年轻的作家们有所教益，这里

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埃达》这部作品以朴实无华为特色,叙述充满魅力,色彩绚丽,着墨不多但却独具匠心,刻画人物方面十分出色,可是,它的问世只给《北方蜜蜂》上一篇不体面的文章和大约是《莫斯科通报》无力的反驳授以口实。而《莫斯科通报》对于我们这位第一流的哀歌诗人的诗集又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与此同时,巴拉丁斯基却沉着地一步一步向完美迈进。他的近作就是一位成熟的天才结出的硕果。现在是巴拉丁斯基在俄国诗坛占有早就属于他的一席之地的时候了。

载于《北方花朵》的他的最近一部长诗《舞会》更加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部杰作洋溢着独创的美和非凡的魅力。诗人以惊人的艺术力在快速的叙述中使调侃同热烈的语调、玄妙同诗意结合在一起。

长诗以描写莫斯科的一个舞会开头。宾客如云,戴着华丽头饰的上了年纪的夫人靠着墙壁就坐,迟钝地注视着人群,而肩披绶带、佩戴勋章的达官贵人则专注于牌局,只是有时候站起身,走过来,

望一眼,阵阵提琴声伴奏下
翩翩起舞的身影。

年轻漂亮的女郎周旋于他们之间。

骠骑兵潇洒地捻着胡须,
作家拘泥地说着俏皮话。

突然,人们骚动起来,相互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尼娜公爵夫人突然离开了舞会。

整个大厅充满窃窃低语：
“她回家去了！
她突然感到头昏不适。”——真的吗？——
“刚才还开心地跳卡德里舞，
忽然变得渺无生气。”——原因在哪儿？
啊，天哪！请您说说，公爵，
请您说说，您的太太，
公爵夫人出了什么事情？

“上帝才知道，”公爵正专注于玩波斯顿牌戏，带着做丈夫的特有的无所谓的表情回答道。这时诗人出来代替公爵作了回答，而回答就构成了长诗。

尼娜的形象特别引人注目。她的性格对我们说来是完全新的；由于诗人惊人的艺术力而多方面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诗人为这个形象创造出独特的语言，并用它表达诗人自己玄妙的全部色彩——为了女主人公，诗人慷慨地献出哀歌全部的温馨和诗歌的全部魅力。

她充满对世俗偏见的鄙视，
是否像嘲弄
乡巴佬的矫揉造作一样，
嘲笑妇女的崇高美德？
她把什么人招引入自己的门庭？
是热衷于追逐女人的老手？
还是面目俊秀的新出道年轻人？
那些关于她轻佻的胜利，

以及艳情绯闻
难道还没有让人腻烦?

然而，她的光彩夺目的艳丽
如同一块磁石勾人心魄，
她纯洁无瑕的双唇
现出一撕谄媚的微笑，
任何一位美丽的少女
都会向她俯首称臣。
蔚蓝色双眸流露出虔敬，
羞涩的双颊散发出清新，
她会将这些都奉献给她，
只为博得她充满淫欲的
黑眼睛夺目的一盼，
并且吻一吻她那炽热的双颊。
卡利忒斯三女神中的任何一位
在这位专横的菲亚女神面前
都会自惭形秽。

在同你推心置腹的交谈时，
她是多么迷人!
多么善解人意，多么温存，
她的双眸闪烁着何等的殷勤!
但有时她也会燃烧着忌妒的愤怒，
语言恶毒，面目狰狞，
简直是一个新的美狄亚!

然后，一颗颗泪珠
在她眼中滚动，
她心中极度痛苦，
饱受煎熬的泪水涌动在眼中，
谁不愿擦除那忧伤之泪，
谁不愿留存美丽的颜容？

在描写女主人公时，诗人有时也会采用严厉的否定和谴责的口吻，带着做作的冷漠谈到她的死，嘲讽地描述她的葬礼，并以戏谑结束自己的长诗，但这些都是徒然的。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钟爱自己不幸的感情炽烈的女主人公。他甚至也使我们不知不觉地对这个堕落的但仍然具有魅力的人物的命运产生病态的同情。

阿尔塞尼才是不幸的尼娜应该爱的人。他牢牢地掌握她的思想，并且由于从未完全满足过她的情欲和好奇心，所以才能始终保持住对她的决定性的、占主导地位的影响。

文学年表片段[1]

饱学之士的心能包容如此的愤怒！

两位著名报人之间的纠纷，以及其中一位同书刊检查机关的争讼闹得沸沸扬扬。本文试图对事情的原由作一历史性的阐明。

去年末，《欧罗巴通报》的编辑希望在新的1829年同时以出版者的身份出现，他向当时对这两个学术称谓的差别还不大弄得清楚的公众宣布了这一意图。批评家们一致的看法使他坚信《欧罗巴通报》内容贫乏，涉及面不广，此外，他被对文学软弱无力的现状的深厚同情所驱使，允诺运用自己的力量使这份杂志内容更为广泛和多样化。他期望今后目光更加远大，思想更加解放，行动更加坚决。他打算在风俗志这个广阔无垠的领域干一番事业。众所周知，卡拉姆津在风俗志方面是领头人，但他开辟的小径逐渐消失在不毛的冻土带里了。“我要亲自来做这件工作，”可敬的编辑说道，“但我不会拒绝别的文学工作者参加我的劳动。”这最后一点，这同样美好的意愿，这种对俄国文学值得赞赏的关切，这

① 本文1829年3月27日作于莫斯科，最初拟在《涅瓦文集》刊登，但在9月，被书刊检查部门禁止刊印。后以压缩形式发表在1830年《北方花朵》上。普希金还以此为题写过一篇讽刺诗《受到杂志侮辱的人》。题词取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1章，但其中“饱学之士”原书为“神祇”。

种对同行的大度宽容，使我们至为感动和欢欣鼓舞。我们将会十分高兴地欢迎《欧罗巴通报》著名的编辑的第一批著作问世，庆祝他获得首批成果。他深厚的知识我们早已耳闻，到时（即现在的1829年）必将结出丰硕的成果。他历史主义评论的火炬将会照亮上述风俗志领域的冻土带，而在报刊杂志嘈杂的争吵声中沉寂了的文学法则，将由一位造诣颇深的编辑来阐释。他不会把自己具有深刻思想的研究，局限于对《俄国史》的卷首页提些看法，或甚至是局限于对貂脸的论述，他中肯的洞察力最终会深入卡拉姆津的整个创作，对他探索的体系作出评价，指出新思想的泉源，并对不足之处进行增补。至于文艺批评本身，我们将不再听到某个老学究[①]喋喋不休的唠叨，或是某个醉醺醺的讲习班学员[②]不体面的吼叫。卡切诺夫斯基的评论对于文学将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年轻的作家们不会把这些评论当作一些报刊丑角写的庸俗笑话来取笑逗乐，而著名的作家也不会轻视他的见解，因为他们听到的是对自己作品从学术品位高度所作的冷静的具有权威性的评价。

可以大胆地说，我们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卡切诺夫斯基先生将实现他在《欧罗巴通报》征订广告中以诗的语言阐述的计划。然而长期注视着自己同行文学活动的波列沃依先生却不相信《通报》的承诺。他并不停留于默默怀疑，他在去年《莫斯科电讯》第20卷发表一篇文章，对可敬的《欧罗巴通报》的编辑发动猛烈的攻击。他让人们注意卡切诺夫斯基先生大约是不经意使用的几个不太得体的用语，接着说道：

如果他（指《欧罗巴通报》）这个老朽能够承认自己不学

① 指М·Т·卡切诺夫斯基。

② 指Н·И·纳杰日金。

无术，谦虚行事，稍加学习，抛弃掉自己可笑的偏见，并且公正不倚地发表意见，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乐意尊重他对自己弱点的意识，学习和认识真理的愿望，大家也都会乐意听取他的见解。

真是奇怪的要求！到了《欧罗巴通报》的“年纪”就不再学习，不会摒弃根深蒂固的偏见？谦虚是白头的装饰，但不是文学必不可少的东西；如果说波列沃依先生所要求的意识也值得某些尊重的话，那么是否可以从一位可敬的没有病态羞耻和同情的老者嘴里听到这种意识呢？

那么，《欧罗巴通报》的出版者到目前为止又做了些什么呢？——波列沃依先生继续写道——他的著作权在哪里？有哪一块他劳动耕耘过的土地他可以竖起自己的旗帜？哪里存在他的神赐乐土？年轻一辈已经超越《欧罗巴通报》的出版者，他们在《欧罗巴通报》的出版者原地不动、呆坐 20 多年的时候大踏步向前，这并没有错。而今《欧罗巴通报》才看到奇怪的争论，梦到有如响钹鸣锣的漂亮而空洞的言词，不是让人感到惊异吗？

对此我们来作答复：

如果卡切诺夫斯基先生没有写出过一本稍值得注意的书，20 年中没有发表一篇出色的文章，却为自己赢得不朽的声誉，那么，当他终于能认真地干起来的时候，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卡切诺夫斯基先生在原地不动坐了 20 年——这我同意，但是如果他生活中毫无追求，又何从谈什么年轻人超越他呢？卡切诺夫斯基先生对维尔斯托夫斯基的音乐作了错误的评论：难道他是音乐家吗？卡

切诺夫斯基先生翻译了《特雷莎与法尔多尼》[1]，这又怎样？

至此，我们以为波列沃依先生是不正确的，因为初看起来是颇有根据的意见中出现了某种倾向性。我们原希望卡切诺夫斯基先生能作出无可争议的反驳，或是像许多著名作家通常对于一些报人有失体面的带有倾向性的乖张行为所作的回答那样，保持高尚的沉默。但当读完以下《欧罗巴通报》24期为自己一位可敬的同事纳多乌姆科[2]（一位为自己的时代和杂志带来真正荣誉的伟大作家）写的编者按语时，我们感到惊讶不已。

> 在此我郑重宣布，我无意与贝尼格纳争吵，因为我一向不愿参与无益的争论，而且现在我也无权参与。我已采取另外的措施，以保护自己不受这位贝尼格纳和其他人轻率任性的伤害，如果我不是考虑到这不良用心的后果会涉及我所任公职的荣誉以及我有幸继续在其中工作的杂志的尊严，那么《电讯》上的文章，我也是不屑一读的。——编者。

这扑朔迷离的按语引起我们极大的不安。可敬的编辑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以保护自己不受贝尼格纳先生轻率任性的伤害**？**贝尼格纳先生的轻率任性是什么意思**？**考虑到这不良用心的后果会涉及公职的荣誉和杂志的尊严**，又是什么意思？（顺便说一句，最后这一句至今无论在逻辑或语法方面，都仍然是含混不清的。）

《欧罗巴通报》众多的拥戴者读了这几句阴沉、严厉、没有头绪的词句，心里为之一震。人们不敢想像，米哈伊尔·特罗菲莫维奇骑士般的愤怒会使他作出怎样的事来。幸而不久一切都真相

---

① 《特雷莎与法尔多尼》，莱昂纳尔作的一部感伤主义小说。

② 纳多乌姆科，Н·И·纳杰日金的化名。

大白了。

作为《欧罗巴通报》出版人，受到污辱的卡切诺夫斯基先生以编内教授、四等文官和骑士的身份要求法律的保护，并上诉至检查委员会，控告检查官通过波列沃依先生的文章。

尽管对以上按语中可怕的想法表示理解，但我们对可敬的编辑徒劳无功的行动感到遗憾。波列沃依先生的文章中，并没有伤害卡切诺夫斯基先生人格的词句。《莫斯科电讯》出版人以尊敬的口吻谈到他的文学活动，并没有提及他的公职，他家庭生活的隐秘以及他的人品。

又一位人物登台了，检查官C·H·格林卡作为应诉人出现。他的讲话、书信、文稿都表现出他热烈无畏的精神。他怒气冲冲的雄辩吸引住了许多人，尽管我们对可尊敬的教授满怀尊敬和忠诚，我们还是希望他勇敢的对手获得胜利。因为教育和文学的效果要求一定程度的自由，而自由是英明的良好的章程赋予我们的。B·B·伊兹迈洛夫为祖国文学作出过许多贡献，又以自由表达温和而又公正的见解获得广泛的赞赏。

与此同时，《莫斯科电讯》怒不可遏的出版人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勇敢地重申第一篇文章的观点并为之辩护。文章对卡切诺夫斯基的文学生涯逐年进行剖析，对他所有活动进行评价，把他所有无意识的口误都翻出来示众。波列沃依先生还证明，可敬的编辑享有学者的声誉，就说是可信的吧，然而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些二手翻译和不知从哪儿借用的几篇文章，他就再没有创作出什么东西了。贫乏微薄更应当得到惋惜遗憾，而不是责难，但更为重要的是，波列沃依先生指出，米哈伊尔·特罗菲莫维奇竟然数次在自己批评文章中进行人身攻击；他指责《电讯》的出版人是制造他罪过的工厂（我们的贵族都知道，这是个可怕的污点）；他还不止一次辱骂波列沃依先生，说他是最下流的商人（又一个可

怕的指控），并且所有这些非难都使用了猥亵、带侮辱性的词语。这里，我们就站在波列沃依先生一方来了。没有人比我们更尊重真正的世袭贵族，因为它的存在具有国家级重要性，然而在科学的共和国里，族徽和布满尘埃的御书铁券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无论你是出身下层或是国务活动家，无论你是勤奋的教授，诚实的检查官，还是闯荡四方的商人，在批评的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有一次已经指出这种贵族陋习有失体统，但有益的真理是不妨多次重复的。

然而长久以来受到尊重的作法就是这样的。我们也责备波列沃依先生过分急躁，不够沉稳。我们还十分动情地关注着这位可敬的长者，他受到如此之大的批评，以至于为了保持自己学术上的荣誉，他不得不同俄语字母打交道，用令人吃惊的方式对它进行改造。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无论如何，米哈伊尔·特罗菲莫维奇在希腊字母方面的知识从今后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曾急迫地期待事情的结局，书刊检查总局的决定终于以对胜负双方同样有利的和平中止了争论，恢复了文学界的平静。

评别斯土舍夫-柳明在《北方之星》杂志社出版的一册文集[①]

旅游归来，我得知别斯土舍夫君利用我不在的机会，在他的一本文集里刊印了我的几首诗。

不尊重文学著作所有权的现象在我们这里已习以为常，因而对别斯土舍夫君的行径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例如，费多罗夫先生也曾以我的名义出版了大约是帕纳耶夫的一位侍从所作的莫名其妙的哀歌。别斯土舍夫的文集偶然落到我手中，当我在前言中读到出版人向为他（别斯土舍夫先生）提供剧作（其中5篇付印）的安先生温存地表示谢意时，说实话，我感到极为惊奇。安君提供的剧作中，5篇确实是我的作品，其他几篇则完全不知为何人所作。安君收集了我许久以前写的，但不准备用来发表的诗歌，并且大度地用自己的诗取代了无法通过检查的诗歌。但是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和地位，为自己以前的和别人的作品负责，毕竟不是令人愉快的事，因而我郑重向安君宣告，如再有类似情况发生，我将不得不寻求法律的保护。

① 这篇评论的草稿，普希金生前没有发表。此文的背景是：M·A·别斯土舍夫已经自称是与普希金接近的作家的文学敌人，但却在自己一本《北方之星》的文集（1829年7月出版）中未经普希金同意刊登了7首署名为An. 的诗歌。其中6首为普希金所作，包括《致恰阿达耶夫》等，另一首则为维亚泽姆斯基的作品。

论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

许多据认为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其实都不是他的作品，而只是经他修改而已。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在风格上与人们熟悉的他的手法大不相同，但明显地可纳入他的戏剧体系，并且带有他自由、豪放手笔的印记，因此应当认为这是莎士比亚本人的作品。悲剧中反映了诗人生活时代的意大利，它的气候、激情、节日、温馨，它的十四行诗，它富于色彩的语言和奇喻。莎士比亚就是这样来理解戏剧的地域性。除了朱丽叶和罗密欧这两个莎士比亚创造的多姿的充满魅力的人物之外，梅尔库蒂奥这位当时青年骑士的典型，文雅、高尚、重情义，是整个悲剧中十分杰出的人物。

① 刊载于1830年《北方花朵》，并附有编者按语："选自A·C·普希金作品手稿。"根据手稿判断，这是普希金已完成的评论，而非片断。

关于《悼念骑兵上将拉耶夫斯基将军》一文[1]

去年末，一篇名为《悼念骑兵上将拉耶夫斯基将军》（1829年9月16日逝世）的文章问世。这篇简短扼要的述评，我们以为是一位通晓军旅事务的人士所作，文章洋溢着高尚热烈的语言和情感。但愿这枝笔对这位英雄和善良的人的丰功伟绩和个人生活作出更全面的叙述。我们还惊奇地发现悼念文章作者难于理解的疏漏：他没有提到这位父亲于血腥的1812年带到战场上的两位少年！……祖国对此并未忘却。

① 首次刊登于《文学报》1830年第1期《集萃》栏内，无署名。短评手稿仍然保存完好。草稿末尾有“H·H·拉耶夫斯基的子女为罗蒙诺索夫的外孙”的字样，并有附注“H·H·拉耶夫斯基为波将金公爵的孙辈”。普希金指的是：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夫人是罗蒙诺索夫的外孙女，即罗蒙诺索夫的女儿叶林娜·米哈依洛夫娜（夫姓为康斯坦丁诺夫）之女，并且是Г·А·波将金的侄辈。《悼念》一文为M·Ф·奥尔洛夫所作，发表时未署名。

莫斯科文学家协会[1]

几位以自己的作品和道德风范为我们的时代带来真正荣誉的莫斯科作家，鉴于我国文学的艰难处境，并且对漂亮的空话感到厌倦，于是决定建立本协会，其目的有二：传播库尔干诺夫和特列佳科夫斯基健康批评的规则和阻止变节者、嘲笑者行为过头和有失体面。

协会首次会议于本年 10 月 17 日在位于小布朗纳雅大街的前印刷厂校对 X 先生宅邸举行。是日宾客云集，数位近邻的夫人亦赏光莅临大会。

一本不朽小说的著名译者特兰达菲尔先生被一致推举为协会主席。

尼科迪姆·涅维日金被一致选为协会秘书长。这是一位出身于忠实仆役阶层的年轻人，他不久前在文学方面已取得出色的成就，虽然他的文章有一种奴仆腔调，但还是表现出成为文学鉴赏倡导者的潜力。

会议期待斯拉夫卓夫的光临，但他由于在集市上一圈极顺的牌局作庄时得了齿龈脓肿而无法到会。

---

① 这是一篇针对《欧罗巴通报》编辑部的讽刺性拟作的未完成草稿。1884 年首次公开发表。

特兰达菲尔先生致开幕词，他动人地描绘了我国文学所处的困境和尚未受到特兰达菲尔先生批评的光芒照耀的、在黑暗中奋斗的作家们的困惑。他极其雄辩地说服大家着手干实事。“至今为止，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呢？尊敬的听众们，”他说道，“我们翻译了一些小说，为此我们从什里亚列夫那儿获得了 700 卢布，我们对《俄国史》的卷首页作了分析——这是无可争议的不朽的劳动，当然还是非常不够的。”

主席致词之后，涅维日金先生宣读定于下一年（即 1830 年）出版的，名为《亚细亚巨蟹座》的新杂志的方案。

该杂志将每月出版 1 期，每月包含 4 个栏目。

第 1 栏，高雅文学，有从波兰文转译的拜伦作品，青年讲习班学员的诗作，特兰达菲尔先生札记片段；协会秘书长先生还朗读了可敬的特兰达菲尔先生少年时代的描写示范。与会者愉快地听了商人年幼时的可爱的恶作剧的故事，甚至那时他就已显出长大定有出息的气质。

第 2 栏，评论。

关于康斯坦的小说《阿道尔夫》的翻译[①]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已完成康斯坦绝佳的小说《阿道尔夫》的翻译，即将刊行。《阿道尔夫》属于为数不多的两三部小说之一。

这些作品反映出了时代，
将当代人如实刻画出来，
他们那卑鄙龌龊的灵魂，
他们的自私自利的冷酷，
他们对幻想无限的追逐，
他们虽然有愤世的精神，
到头来却只是空忙一场，

① 首次刊登于《文学报》1830年1月第1期的《集萃》栏内，未署名。普希金的这篇短评在书刊检查过程中引起一些麻烦，于是，同杰尔维格共同负责杂志编辑的索莫夫于12月28日致函奥多耶夫斯基，信中写道："普希金就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所译杰明·康斯坦的小说《阿道尔夫》（译本准备在莫斯科出版）写了一篇短评，但书刊检查官员认为，该小说属被查禁的外国书籍之列，故拒绝签署该篇短评。为此请告：小说《阿道尔夫》是否的确属于外国禁书之列？"看来，奥多耶夫斯基的通知解决了检查官员的疑虑。维亚泽姆斯基的译本于1831年问世。译者在卷首对普希金的献辞中说道："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这部作品的优越之处，所以，当我在乡间着手翻译的时候，立刻想到要让它接受你的裁判。"

这一切都写得跃然纸上。[1]

康斯坦是第一个把这种性格推上舞台的人，接着拜伦爵士的天才使其变得家喻户晓。我们急迫地期待本书的问世。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是如何运用自己的老练生动的文笔，去征服原著语言的严谨协调，文雅，热情洋溢而玄妙，我们对这些十分关注。《阿道尔夫》的翻译是一次真正的再创作，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

① 引自《叶甫盖尼·奥涅金》第7章，此处引用智量译文。

荷马的《伊利昂纪》[①]

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院士 H·格涅季奇等译，1829 年圣彼得堡俄罗斯帝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制，两卷集（第 1 卷共 15 章，354 页，第 2 卷 362 页，大 4 开本）。

人们久已热切盼望的《伊利昂纪》俄译本终于问世！当作家们为一些短暂的胜利所陶醉，大部分人热衷于华丽的小玩艺儿，当天才远离劳动，时尚对恢宏古代的典范不屑一顾，当诗歌创作不再是虔诚的奉献，而只是一种轻率的活动的时候，我们怀着深厚的崇敬和感激之情仰望着这位诗人，是他豪迈地将自己一生最好的岁月献给了这非同一般的劳动，无私地奋斗，完成了这一崇高的业绩。现在，《伊利昂纪》的俄译本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要着手本书的研究，以便逐渐向读者介绍这部对我国文学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

① 载《文学报》1830 年 1 月 6 日，未署名。参见《关于〈伊利昂纪〉一篇短评的说明》。《伊利昂纪》的译本于 1829 年 12 月 29 日问世。这是格涅季奇的毕生大事。在《文学报》出版的当天，他给普希金写了一封短信，对后者的短评表示感谢："在我的文学生涯中，我还没有读到过有人对我的劳动作出如此公允的评价，这使我感到十分愉快、欣慰！"

关于报刊评论[①]

有一本刊物想要告诉人们，我们这里《文学报》根本无法生存，原因很简单：我们没有文学。如果这种论断是对的，那么我们也用不着文学批评了。然而事实是，我国文学作品无论数量多么有限，但毕竟还有，它们生存、消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我们刊物中的批评要么局限于干巴巴的作者生平介绍，几条讽刺性的意见，多少带点戏谑的一般性的友好的赞扬；要么就变成出版人同撰稿人、校对或其他人的家常通信——“为我的一篇新写的文章腾出一块版面来。”一位撰稿人写道。“好的。”出版人回答说。这些都刊登在刊物里。不久前一本刊物的文章说到火药。“您会得到火药的！”排字工在意见中说道，而出版人对此表示反对：

对强劲的火药——给它谩骂，
对无力的火药——鄙视。

这种家庭式的玩笑应当是有注解的，可能是非常逗乐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它们暂时还没有什么意义。

① 载于1830年1月11日《文学报》第3期。

有人会说，批评应当只是研究那些有明显价值的著作。我不这么认为。有个别这样的作品，就其本身而言并无什么价值，但获得相当的成功，并有相当的影响。在这方面，从道德角度的研究就重于从文学角度的研究。去年有几部书出版（其中包括《伊凡·维日金》），关于这些作品，评论界本可写出不少具有教益和有趣的批评文章。但是我们在哪里看到过对这些书的分析和解说？不用说活着的作家们，连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和冯维辛都还在等候艰难的审判。那些华丽的头衔，无条件的赞誉，陈腐的惊叹，已不再能使头脑健全的人满足。不过，《文学报》与其说是对于公众，不如说是对一些由于不同原因不能在彼得堡或莫斯科的某家杂志露面的作家们，曾经是必要的。

关于文艺批评的对话

A：你读过《伽拉忒亚》最近一期里И. И. 的一篇评论吗？

B：没有，我从不读俄国的批评文章。

A：这您就不太公平了。再没有什么能让您对俄国文学的现状有更好的了解了？

B：怎么？难道您真的认为，报刊评论就是我们文学作品的最高裁判吗？

A：一点也不。但是它让我们了解作家之间的关系，他们知名度的大小，还有公众的主流看法。

B：我不用看《电讯》，就知道现在流行普希金的叙事诗，还有我们谁也不懂的浪漫主义诗歌。至于拉伊奇先生同波列沃依先生以及卡切诺夫斯基先生同布尔加林先生的关系，我毫无兴趣……

A：不过还是挺有趣的。

B：您喜欢拳击手吗？

A：为什么不呢？咱们的贵族拿他们取乐，杰尔查文还写诗歌颂他们。我非常喜欢维亚泽姆斯基同一个报界刺头儿决斗，还有奥尔洛夫伯爵同马车夫打斗。这是人民性的特征。

B：您谈到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可您得承认，上层文学界中他独自一人参与了辩论。

A：这对文学来说却是更糟。如果所有受到公众尊敬和信赖的

作家都担负起控制舆论的责任，那么不久，批评就会变得不同于它现在的样子。例如，读一读格涅季奇或克雷洛夫关于当前哀歌创作的高见，一定是有意思的。看一看普希金分析霍米亚科夫悲剧的文章，不也是很有趣吗？这几位先生关系密切，可能还经常互相交流对作品的看法。为什么不让我们也参加他们关于文艺批评的谈话呢？

B：公众对于文学的成就态度相当淡漠——真正的文学批评对它毫无兴味。人们只是偶尔看一看两位编辑的争斗，顺便听一听一位作者的自白，然后耸耸肩头。

A：这可是您的想法。要是我，就会停下来看个究竟，听个明白，并且为把对手击倒的人鼓掌喝彩。如果我是一个作家，我会认为对于攻击——不管它是什么性质的——不进行还击，这就是怯懦。让随便什么个街头小流氓给你脸上抹黑算什么贵族风度！你看看一位英国的爵士，他随时准备回敬一个绅士彬彬有礼的挑战，用库亨莱特手枪决斗，或者脱掉燕尾服，在十字街头同一个马车夫斗拳。这才是真正的勇敢。而我们无论在文坛或是社会生活中都过分拘谨，过分缺乏男子气概。

B：我的文艺批评毫无透明度可言。可能，就连我们的作家也从不读俄国刊物，也不知道读者对他是褒是贬。

A：请原谅。但普希金对《欧罗巴通报》是每期必读，虽然，用他生动的话来说，这本刊物骂他，“在门内偷听，人们在过道里如何把他议论”。

B：这可太有趣了！

A：有趣。但至少完全可以理解。

B：普希金也写了讽刺短诗回敬，还要怎样？

A：但是，讽刺不是文学批评——讽刺短诗也不是反驳。我是为着文学的功效操心，而不仅是为了个人的好处。

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或1612年的俄罗斯人[①]

M·H·扎戈斯金文集，莫斯科H·斯杰潘诺夫印刷厂，1829年，共3卷（第1卷255页，第2卷166页，第3卷263页，12开本），卷首页印有花饰。

小说一词当前是指以虚构故事展开的历史时代。瓦尔特·司各特招引了一大批模仿者，但所有这些人离这位苏格兰叙述故事的魔术师还相差甚远。他们颇似阿格里帕的弟子，招来古代的恶魔，却不会控制它，结果作了自己鲁莽行为的牺牲品。他们在描写他们想要把读者带进去的那个时代时，本身就背着旧习惯、各种偏见和旧影响的沉重包袱。取下人物头上的插满羽毛的圆形软帽，你会看到当代理发师做的发型，透过亨利四世时代镶有花边的燕尾服，露出当代花花公子浆硬的领带；哥特时期女主人公在

① 载于《文学报》1830年1月21日，未署名。本文草稿中，在“一大批模仿者”数字之后，尚有“但除库柏和曼佐尼之外，所有这些人离这位苏格兰叙述故事的魔术师还相差甚远”一句（句中指库柏的小说《奸细》和曼佐尼的《约婚夫妇》）。在“多么缺乏生活气息！”之后，尚有“一位聪慧的夫人将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小说比作一幅蹩脚差劲的石印画”等字样。这表明，普希金所说的司各特的一些平庸的模仿者，是指阿尔弗雷德·德·维尼及其小说《圣·马尔》，而前面的一些评论也都是针对这位作家的。

坎潘夫人那儿接受教育，而16世纪的国务活动家们阅读《泰晤士报》和《争鸣》。多少矛盾，多余的细节，多大的遗漏，多么矫揉造作！又是多么缺乏生活气息！然而就是这样平庸的作品仍有人阅读。这是因为像斯塔尔夫人说的那样，一些人只了解自己生活时代的历史，因而不能发现小说里时代颠倒的现象？还是因为古代的描写，甚至是平庸和不真实的描写，对于被眼前日常单调的花哨弄得迟钝的想像力可能仍然具有难言的魅力？

我们得赶紧声明，以上的责难完全不是针对《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的。扎戈斯金先生准确地把我们带到1612年。我们善良的人民、贵族、哥萨克、僧侣、绿林好汉——这一切都被准确地捕捉到了。人物的行为、感情就如同米宁和阿南拉阿米·帕利岑动荡的时代人们所行所感那样。古代俄罗斯生活场景是多么生动迷人！基尔沙，阿列克塞·布尔纳什，费哥卡·霍米亚克，地主科佩钦斯基老爷，首领叶列梅依等人物性格的刻画是何等真实鲜明！小说的事件自然而然地汇入历史事件广阔的框架之内。作者似乎并不急于讲述自己的故事，他时而对细节详加描绘，时而又对旁枝末节稍加叙述，但从不使读者感到厌倦。人物对白在使用民间语言的地方总是十分生动和富于戏剧性，表明作者的才能，但当扎戈斯金先生描写历史人物时，他无可争论的天赋似乎就离开了他。米宁在尼日哥罗德广场的演讲显得无力，缺乏民间语言的表现力和激情。贵族杜马描绘得缺乏色彩。还可以指出二三处微小的时代颠倒错误，几个语言和服饰方面的缺点。例如，新的表达法将世袭贵族代替贵族出身的人（如编年史所说：正派男子）；以 охотиться（打猎）代替 ездить на охоту（骑马行猎），用 пользовать（治病）代替 лечить（医病）。后两个用语并非如作者认为那样属于民间俗语，而只是粗俗社会的语言。Быть в ответе（负有责任）古时指的是任大使。有几个谚语，作者使用时没有注意

它们的本义。如将 слова из песени не выкинешь（歌曲的词一个也不能去掉）写成 слова из сказки не выкинешь（童话里的词一个也不能去掉）。歌曲中词构成诗行，因此它的词一个也不能去掉，否则便会破坏它的结构，而童话则有所不同了。然而这些微小的缺点，以及《莫斯科通报》[①]本年度第1期中指出的一些不足，是瑕不掩瑜的，丝毫无损于《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名符其实的光辉的成功。

① 《莫斯科通报》本年度将以其在1827、1828年的形式出版。这本杂志总是以其饶有兴味的文章，实事求是的评论和与人为善的态度独树一帜。它原先的同仁将继续参加杂志的出版工作。——普希金原注

评《萨姆松手记》[①]

法国报刊登载了《萨姆松（一个巴黎刽子手）手记》即将问世的消息。这是预料之中的。人们对新奇和强烈印象的渴望到了何等地步！

在18世纪哲学上诱人的《忏悔录》之后，接着出现了同样诱人的政治方面的自白。我们已经不满足于看到衣冠楚楚的人，而是想随着他一起走进他的私室，甚至更进一步。而当我们对这些也感到厌倦的时候，又出现了一群令人怀疑的人和他们可耻的自述。亨利叶塔·维尔松、卡扎诺娃和一个当代女性的不知羞耻的笔记。我们似乎还觉得不够，又一窝蜂地拥向一个警察局暗探的狡诈的自白，和一个死刑犯对这些自白的解说。刊物中充斥着见证人的证词。连诗人雨果也不耻于从中为自己充满火焰和污秽的小说寻找灵感。于是现代作家的行列之中只差一位刽子手了。最后，这位刽子手作家也出现了，而且说来丢人，他的《手记》获得成功大概是无可怀疑的了。

有些人盘算着利用读者缺乏道德观念的好奇心，用自己的笔

① 载《文学报》1830年第5期《集萃》一栏中，未署名。手稿仍保存完好。评论中提到的《刽子手手记》并非确有其事：有许多法国作家都以萨姆松的名字出版过这种《手记》。本文中普希金所指更多是恐怖小说流行一时的法国文学总的方向，而不是《手记》本身。

来重写可能是目不识丁的萨姆松的叙述。对此，我们并不称羡，但也不想否认。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表白的时代，所以也是急切（虽然带着几分嫌恶）等待巴黎刽子手《手记》面世。想看看他同活着的人们之间有些什么共同之处？他会用什么样的野兽的语言来解释自己的思想？这部使梅斯特伯爵写出如此富于诗意，如此骇人听闻文章的著作会告诉我们些什么？那个在40年血腥生涯中目睹许多被处决者（其中有令人敬重的、使人憎恶的、著名的、无名的）临终战栗的人，会对我们说什么呢？所有这些人都是他短暂的相识——一个个在我们眼前依次走向断头台，而他这个凶残的小丑正扮演自己一成不变的角色。蒙难者，恶棍，英雄——轩昂的受难者，他的刽子手，沙尔洛塔·科尔德，淫妇都-巴里，疯人路维，暴乱分子维尔通，毒杀自己双胞胎的药剂师卡斯滕，手刃孩童的帕帕武安——所有这些人，他们那最后的恐怖的时刻在我们眼前重现。他们的头颅发出最后的呼叫，一个接一个在我们眼前掉落……。这本刽子手的书在满足我们残酷的好奇心之后，还要在图书馆占据一席之地，供未来的历史学家学术研究时查阅。

关于冯维辛的《哈尔迪娜公爵夫人家谈录》[①]

不久前，有一家刊物提出这样的疑问：登载于《文学报》第3期的《哈尔迪娜公爵夫人家谈录》是否确为冯维辛所作？首先，这位已故作家的亲侄儿保证这篇作品的可靠性；其次，人们认为，模仿《纨袴子弟》和《旅长》作者手笔并非易事：对冯维辛精神和风格稍有研究的人，就会立刻辨认出《家谈录》这种精神和风格的不容置疑的征象。这篇文章十分出色，不仅因为它是一件文学珍品，而且也由于对40年前占主导的风俗、舆论所作的引人入胜的描写。哈尔迪娜公爵夫人对索尔万卓夫称“你”，他对她也是如此。她责骂女仆，为什么不让客人进梳妆室来，“难道你不知道，我喜欢在男人面前穿衣服?”“夫人，这可怪丢人现眼的。”女仆回答说。“蠢货，这是高兴的事。”公爵夫人反驳道。这些大约都是录自现实。由此也可看出对于巴黎风尚的模仿。索尔万卓夫形象的塑造无愧于曾经描写普罗斯塔科夫一家的手笔。为了能乘坐几匹马纵列牵引的轿车，他进入了官场。他夜晚在牌桌上度过，而在机关阅读复杂案件时睡觉。他觉得公文不合理，对他人的意见

① 载于《文学报》1830年第7期（1月31日出版），发表时未署名。手稿保存完好。《文学报》曾刊登冯维辛未发表的《哈尔迪娜公爵夫人家谈录》（选自《诚实人之友》）。但《北方蜜蜂》（第10期）对《家谈录》是否确为冯维辛所作表示怀疑。

表示同意完全是出于懒惰和对事情漠不关心。他把农民卖去当兵，高谈阔论教育的重要性，他出于爱面子，从不收受贿赂，但却无动于衷地原谅索取贿赂的人。总而言之，他是一位真正的上个世纪的俄国老爷，正是天性和半拉子教育把他变成这个样子。兹德拉沃梅斯尔这个人物颇像普拉甫金和斯塔罗东，虽然他身上少了一些迂腐气。读罢《哈尔迪娜公爵夫人家谈录》，对冯维辛无缘描写我们当代风情，不禁感到十分惋惜。

《晨星》[1]

1830年丛刊，M·马克西莫维奇出版，1830年莫斯科大学印刷厂印刷（共256页，16开本），卷首页印有花饰[2]

这集丛刊里我们看到一些著名作家的名字，还有几位女士的诗作，这真是意外的盛事，是我国文坛令人振奋的新事物。

但是这本丛刊中最杰出的一篇文章，应当得到的不是漫不经心的读者匆匆一瞥，而是更多的注意，这就是基列耶夫斯基先生所作的《1829年俄国文学述评》。作者属于莫斯科青年文学家学派，这个学派是在德国哲学的影响下成立的，并且已经培养出像舍维列夫这样受到伟大歌德注意和称赞的作家，以及英年早逝，为诗友们痛悼的韦涅维季诺夫。基列耶夫斯基先生的几篇评论文章发表在《莫斯科通报》，并引起了不多几位真正有眼光的行家的注意。也许《评述》产生较大的影响并不是因为文中思想更为成熟（应当说，这是毋庸置疑的，尽管作者的思维倾向过于循规蹈距），

① 载《文学报》1830年第8期（2月5日出版）。发表时未署名。据维亚泽姆斯基证明为普希金所作。1月9日出版的文集《晨星》上刊登了基列耶夫斯基（当时与莫斯科哲学爱好者小组接近，日后为著名的斯拉夫主义者）的《评述》，此文引起普希金的注意。

② 斯米尔金书店出售，每册10卢布。——普希金原注

而是因为他的一些见解表达得十分尖锐，出人意外。

基列耶夫斯基先生将公民感的成就看得高于战争功勋的荣誉，在文章开头，他认为新的《书刊检查法》“在长时期中都是关系俄国福祉的重大事件，比我们在多瑙河以及阿拉拉特彼岸所取得的胜利更重要，比攻占阿尔泽鲁姆更为重要，也比俄罗斯的旗帜插上察里格勒城头的荣光更重要”。他还把上世纪文学明显的进展归功于这部检查法。“我们的杂志更多是引用国外刊物的作品：翻译作品，尽管大多数是蹩脚的，传达给我的多是我们邻国人民智力活动的印迹，从而结果是我们的文学不知不觉地越来越接近全欧洲生活。我们报刊界人士的相互攻讦，他们有失体面的贼叫，他们野性的腔调，他们古怪的个性，他们的彬彬有礼，**都不是都市人应有的**——这些都恰似一个刚出襁褓的小儿的不协调的动作，而这样的动作对于发展体力，对于将来的健康和美是必需的”。

一开头，在探讨19世纪文学的性质时，基列耶夫斯基先生提到三位作家，在他看来，是这三位作家决定了我国文学的精神。但他将精彩的篇章首先用来纪念那位“把俄国人民的教养水平向前推进半个世纪，并将自己一生用于为祖国造福”的人。可能连卡拉姆津的第一流教养水平也要归功于这个人。“他不久前才在莫斯科近郊与世长辞（基列耶夫斯基先生语），但已被人遗忘。莫斯科是他光辉活动的中心地和见证。他的名字到现在才勉强为我们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所知晓，而且如果不是卡拉姆津谈到过他，可能许多人在阅读本文时才第一次知道诺维科夫和他的同志们的事业，并且对离我们如此之近的事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人们对他已经淡忘，而曾经同他一道奋斗过的人如今各奔东西，消失在各自的愁苦奔波之中；其中许多人已离开人世，但他们所开创的事业却留存下来。它还有生命力。它将结出硕果，并会受到后世人

们的感激。

“诺维科夫不是传播，而是在我们心田种下对科学的热爱和对读书的兴趣。根据卡拉姆津的叙述，在诺维科夫之前，莫斯科两爿书铺，每年销售额为 1 万卢布，数年以后，书店增至 20 个，销售额增至 20 万卢布。此外，诺维科夫还在俄罗斯其他城市和边远城市开设书店，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作品几乎是免费赠送。他并且把自己活动的参加者派到各地，不久，不仅是俄罗斯欧洲部分，甚至西伯利亚的人们也开始读书了。那时，我们的祖国乃是我国教育编年史中几乎唯一的重大事件——**公众舆论**的诞生——的见证人（尽管时间不长）。”

文章作者认为卡拉姆津的博爱教育的影响是 19 世纪文学第一时期的特征，茹科夫斯基的理想主义是第二时期的中心，而普希金这个现实的诗人则是第三时期的代表。接着他便开始对上世纪文学进行评论。

“《俄国史》第 12 卷是宏伟劳动的最后的硕果，也是他那对于每一个俄罗斯人都十分神圣和有益的一生的最后一项丰功伟绩，看来，这部著作还以其雄辩的力量，巨大的容量，描写的真实，画面的鲜明、严整，以及卡拉姆津风格凝重的闪光、清纯、钻石般的坚定超越以前诸卷。总的说来，《俄国史》的价值随着已逝的时代而增加。时间距当代越近，我们祖国的命运就越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事件越复杂，在他想像的明镜中，在俄国人民这颗纯净的心灵里反映得越清晰协调”。

基列耶夫斯基先生把长诗《波尔塔瓦》也归入历史类作品之列。“的确，”他说，“在已发表的对这部长诗的 20 篇评论中，一半以上议论的内容是，长诗中描写的人物和事件是否确实与历史相符——这可说是评论家们对普希金最高的赞誉。”作者承认长诗表现出作家巨大的成熟的才气，也指责其中缺少兴趣的统一，对

自由体诗歌而言，这是“所有统一律中唯一必须遵守的，否则便得不到它们法规的宽恕”。作者以此来解释亚·普希金最后的一部，差不多也是最好的一部长诗取得微小成功的原因。

“茹科夫斯基，”作者继续写道，“发表了他翻译的席勒的《大海》、《胜利者之歌》以及《伊利昂纪》的一些连续的片段。从他的译文中，我们第一次看到在其他译文中所没有的荷马的品质：有的东西在别的人那儿是高傲或低下，在他那儿则是质朴和高尚；在其他人那里杳无生气，无精打采，在他那儿却充满活力、勇气，使人感动；他这里一切都会有暖意，一切都得到升华——可能这正是一种错误，如果美可能是错误的话。”——作者这里指的是科斯特罗夫。就在去年，我们对格涅季奇译的《伊利昂纪》还没有任何自豪感。

“茹科夫斯基的《大海》鲜明地使我们想到他以往的诗作。同样的声音，同样的情感，同样的奇特，同样的魅力。看来，他以往诗歌的弦都在这感人肺腑的心曲中得到共鸣。然而，这里也有不同之处——这里有某种比他以前的诗歌中更为深沉的东西。”

在德国学派的青年诗人中，基列耶夫斯基先生提到舍维列夫、霍米亚科夫以及丘特切夫。前两位的真正才能是无可辩驳的。但霍米亚科夫写过一本《叶尔马克》，而这部悲剧应写专文评论。

深厚的感情使年轻的批评家写出感人的词句。关于已故的韦涅维季诺夫，他的朋友，这位天才之中的天才，他写道：

“韦涅维季诺夫生来就要在自己祖国的教育事业中大展鸿图，成为祖国诗坛的骄傲，可能还会是祖国哲学的奠基者。谁能带着爱深入探讨韦涅维季诺夫的作品（因为只有爱才使我们能充分地理解）；谁能从支离破碎的残卷中发现他们共同发源的痕迹，激励着他们的精神的统一；谁能理解与这个充满诗意心灵谐和一生紧密相连的深邃的思想——谁就能发现这位浸透时代悟性的哲学

家，发现这位深刻、独特的诗人，他的每一份情感都得到他的思想的阐释，而每一个思想都因他的心灵而亲切感人；他的理想不用艺术来加以装饰，而是生来自然就是美的；他的最好的诗是他充实的谐和的心灵的本来面目和自由的发展。因为大自然慷慨地赋予他才华，并使这些多种多样的才华达到协调平衡。正因为如此，一切美好的同他都是血肉相连。正因为如此，他是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寻求艺术所有奥秘的答案，在自己的心灵中读到最高法则的轮廓，并洞悉创造的美的真谛。正因为如此，自然才能为他的智慧、他的心灵所领悟，他能够

明察自然神秘的胸怀，
如同窥视友人的心灵。

“智慧和心灵的共鸣是他精神的最突出的特点，就连他的幻想也更多是思想和情感交响的乐曲，而不是想像的游戏。这证明他更多是为哲学，而不是为诗歌而生。已经付印，不久即将问世的他的散文作品还将证实我们所说的这番话。”

这里，作者有力而又机智地证明德国哲学家对我们一些作家所起的影响占有优势。我们这些作家虽然没有什么出众的才智，却能更清楚地指出他们所得到的别人的东西的价值。“这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有两类文学家，一部分人遵循法兰西学派，另一些人则遵循德国学派。我们在前一部分人的著作里找到什么呢？我们看不到他们有**思想**（因为法国思想本身已经陈旧，因而已不是思想，而是一些共同的地方，法国人自己也是从德国人和英国人那里借用思想的）。我们在他们那儿能看到的极少，而且是偶然同机智结合在一起的文字游戏，还有几乎总是没有品位，经常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戏谑。难道不能是别的样子吗？机智和品位只能在良好的

社会圈子里培养出来，我们有多少作家能有幸属于这个圈子呢?”

“相反，在那些熟读德国思想家著作的文学家的作品里，几乎总是可以发现某些值得敬重的东西，哪怕是一点思想的影子，哪怕是对这种影子的追求。”

基列耶夫斯基先生在维亚泽姆斯基公爵身上找到了证明：真正的天才在任何地方、任何方向、任何影响下，都会放出夺目的光彩。“然而，”作者说道，“尽管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才气过人，尽管我们可以称他是我们作家中最敏锐的，但只有在像他的《……惆怅》中心灵的声音强于理智的声音时，他才达到另一个高度。”

作者不同意有些人断言法兰西倾向在巴拉丁斯基的作品中也占主导地位。他认为巴拉丁斯基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独具一格的诗人。“要品味出巴拉丁斯基诗歌所有的精微之处，需要具有比读其他诗人作品时更敏锐的听觉和更加凝神专注。他的作品我们读得越多，就能发现越多的新的、初看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深藏于生活本身，但不是为任何人都能领悟的诗的真实征兆。即使在艺术方面，又有多少人能够充分评价他的诗歌的价值，他的短语和表达的严谨，他的优美的节奏，他的高尚的气魄？如果一个良好社会的理想会突然出现在某一个我们不知道的首都，那么这个社会的精英层里就没人懂得别的语言了。”

作者公正地认为《埃达》——一部最具独创性的哀歌作品——高于《舞会》，后者是一部虽然华丽，但稍欠雅致、感染力、才情、深度和稍显拘泥的长诗。在确定杰尔维格男爵诗歌的特点时，批评家说道：“任何一种刻板的模仿，都必定是平淡和杳无生气的。只有出于热爱的模仿才会富于诗意甚至创造性。但即使是在后一种情况，我们难道可以全然忘掉自己吗？我们喜爱榜样，其原因是否是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同我们的精神要求相吻合的特点？这就是在所有成功地模仿古人的作品中新颖的永远都是新颖的原

因。再说一点，没有一部古代经典作家作品的真正优美的翻译，是不带有我们智慧的先辈所不了解的那种精神状态的印迹的。宗教情感，这应当归功于基督教；充满激情幻想的爱，这是阿拉伯人和蛮人的礼物；形形色色的幻想，这是欧洲数世纪混乱局面同追求完美潮流斗争的必然结果；最后，思考取得对情感的优势，由此而产生追求统一和集中的倾向……”等等。

在议论我国某位剧作家的作品时，作者如此开心地描绘了戏剧舞台的现状，我们虽不完全赞同他的看法，但又不能不将原文照录于下：

“总的说来，我国戏剧舞台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几乎所有上演的喜剧都是模仿法国人之作。虽然品位、礼仪、机智、语言的纯洁以及一个良好社会所必须具备的一切，正是那些使法国喜剧有别于所有其他国家喜剧的品质，这些都是我们的戏剧完全缺乏的。我国的舞台不是作为反映我们生活的一面镜子，而只是仆人所居下房的一面放大镜，而我们戏剧界的缪斯的步子，再也没有超出这个下房一步。在下房里，她就像在家一样，她的会客室、书房、大厅、化妆室全在这儿，只要不是站在马车仆人的位置上出访邻国的缪斯们，她就整天在这儿打发日子，而为了更逼真地塑造一个俄罗斯的喜剧女神，就必须让她穿上仆役的制服和长靴。

“这就是我国土生土长喜剧的共同特点，而且几乎没有例外。这种状况的原因部分在于：从冯维辛到格里鲍耶多夫[①]，我们还没有过一位真正的喜剧天才，而且众所周知，一位不平凡的人物，一种不平凡的思想，只会给智慧以单一的发展方向。一个力的平衡

① 看来作者表达有误，他大概是想要说：“除冯维辛和格里鲍耶多夫外。”——原编者注

只有通过另一个力来求得；一位天才的弊端只有由另一位与之对立的天才的出现来加以纠正。

"顺便也可向我们的喜剧作家们说一两句，他们选择这种方向的作法不尽合算……而且无论他们的语言如何低俗，无论他们肆意的戏谑是多么污秽，无论他们的噱头是多么粗俗和赢得顶层楼座观众的多少哄笑，他们是无法赶上普通百姓的；他们也永远达不到自己真正的理想——任何一个马车夫只须用一句话就会把他们的喜剧砸个粉碎。"

作者在列举1829年间出版的译作时指出，受到我国文学家喜爱的外国诗人主要有6位：歌德、席勒、莎士比亚、拜伦、穆尔和密茨凯维奇。

作者对某些在不同程度上出色的，但不能列入纯文学领域的作品不予注意，转而讨论叙事类作品。过去的一年，叙事类作品产量颇丰，但《伊凡·维日金》无可争辩地由于其不平常的成就更值得注意。前两版不到一年即销售一空，第3版正在印制。基列耶夫斯基先生对这部作品作了严厉而尖锐的判决，[1] 但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布尔加林先生这部道德-讽刺长篇小说取得难以置信的成功的原因。

"引人注意的是，"基列耶夫斯基先生说道，"去年共出版俄文字母课本约10万册，斯拉夫文字母课本近6万册，基本信念问答手册6万册，法文字母课本约1.5万册，总的说来，本年度课本发行量较上一年度多出三分之一。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就是我们的不足之处，这就是公众合理的要求。"

我们应当尽快结束这篇过分冗长的文章了。基列耶夫斯基先生还简要地论述了我国杂志的现状，它们争论的实质，丛刊的情

① 参见《晨星》，《俄罗斯语言文学述评》，第73页。

况以及一些外国名著的译文，然后以下面的悲怆的沉思作为自己文章的结尾：

“如果我们从同其他国家文学的关系来考察我国的文学，如果有一位文明的欧洲人把自己国家的智慧珍宝展示在我们面前，并且问我们：你们的文学在哪儿？你们有哪些作品可在欧洲面前感到自豪？我们能怎样回答他呢？

“我们可以让他看《俄国史》，我们可以让他看杰尔查文的颂歌，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的一些诗歌，克雷洛夫的寓言，此外，我们还能找到什么欧洲水平的著作呢？

“让我们不偏不倚地承认这个事实：我国人民智力生活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文学。但我们还可以感到欣慰的是：我们拥有精神财富——这是其他一切的保证，我们拥有希望和对于我们祖国伟大使命的思考！”

读完这段伤感的结束语，我们不禁露出微笑。但我们要向基列耶夫斯基先生指出，在一位年仅 23 岁的批评家就能写得如此出色，如此雄辩的《文学评述》的国家里，肯定是有文学存在的，而且这个文学成熟的时刻并非遥不可及。

卡累利阿，或马尔法·约安诺夫娜·罗曼诺娃的流放生涯[①]

记叙体诗歌，共分四部分。费多尔·格林卡著，圣彼得堡金泽印刷厂印刷，1830年版（8开本，112页）[②]。

我们的诗人当中，Φ·H·格林卡也许是最具特色的一位。他既不鼓吹古希腊的和法国的古典主义，也不盲从歌德或近代的浪漫主义：他的风格不像罗蒙诺索夫雄伟浑厚，不像杰尔查文鲜明和文风不一，也没有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创立的学派的和谐准确的特征。在哀歌体赞美诗中，很容易发现格林卡的风格，就像在富于隐喻的诗篇中辨认出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在讽刺性寓言中辨认出克雷洛夫一样。对于韵律和风格漫不经心，用语时而大胆创新，时而平淡无奇，朴质而又精致，一丝萎顿与亢奋的热情共存，诗意的宽厚，温馨的情感，单调的思想，新颖的画面（有

① 载《文学报》1830年第10期（2月15日出版），未署名。Φ·H·格林卡作为幸福联盟的成员，最初被流放至奥隆涅茨省的彼得罗扎沃茨克。正是在这里，他于1829年写成了长诗《卡累利阿》，并于1830年初出版。引起普希金写这篇评论的不仅是长诗的文学价值，也是书中表现出的对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的同情。φ·格林卡曾有文字说明本文出自普希金之手。

② Г·М·巴拉宾大楼26号，出版商、书商涅佩岑处出售，每册6卢布，邮购7卢布。——普希金原注

时是微小的画面）——这一切都给他的作品打上了一种特殊的印记。长诗《卡累利阿》更加证实了我们的这种看法。这部著作如同一面镜子，反映出了我们诗人的优点和不足。这里我们不作任何分析评价，摘录数段以飨读者。

（僧人向马尔法·约安诺夫娜讲自己抵达卡累利阿的经历）。

夏季，我来到这块土地，
那时酷热难耐，
一切都被烟尘覆盖；
森林中大火肆虐，
卡累利阿大地一片火海！……
火光冲天，驱走了黑夜，
太阳失去了光彩，
像一块燃尽的煤块！
火势熊熊，排山倒海，
如同战争中一面长长的旗幡，
在枝头狂扫、蔓延，
倒映在荒凉的湖面，
这可怕的景象，
令人心惊胆战；
野兽、飞禽、鱼儿都纷纷逃窜，
以免葬身火海。
那时我们只觉得，
启示录里早就预言的
世界末日似乎已经来临。
大地上一切都受着

贪婪火舌的煎熬，
受着四窜狂焰的炙烤；
炽热的巨石发出劈拍的断裂声，
——这火光，这大火，
这世界烟火弥漫的景象，
使我想起了奥米尔的诗歌
《森林之火》中的诵唱。
但是秋天给我们送来乌云，
如注的雨水降服了火魔，
松散的灰烬变成沃壤，
它带来的丰收使人欢畅！……

蛮荒的卡累利阿！
一叶扁舟，鼓满风帆，
带我飞驰在湖面；
我翻越山梁，
穿过葱郁的密林、峡谷；
从沙洛美海湾
到叙萨尔群岛，
到处是一片荒凉，
一直到珍珠河，
一直到遥远的北方森林，
郁闷的船夫从未看到
城郭和塔楼，
只有偶尔出现几小块耕地
高悬在贫瘠山崖之间，
一切都杳无生气……直到西南季风

呼啸着穿过森林刮向奥涅加河，
它像一个强盗，蛮横地扑向小舟。
在两岸松树的呻吟声中，
撕扯着桅杆上的风帆。
然而荒凉的卡累利阿大地，
您的秋天却是无比绮丽，
它拿起调色板和神奇的画笔，
用绚丽夺目的色彩涂抹枝叶，
好似千万琥珀、宝石、黄金，
点缀、闪烁在树丛。
还有山楂树的红色的鬈发，
悬吊在大理石台阶上。
就在这些巨石之间，
我有时听到踯躅在林间小道上的
畜群的窸窣声，
长着一双大角的头下，
铃儿叮当作响。
这地方我感到如此荒凉，
不多的村屯散落其间；
但林木丰盛的卡累利阿，
它没有文字的语言却十分甜美。
我好像又一次
来到亚夫松尼亚；
我不由得想要一次又一次
重复它的语言：字母 Л
发出如此悦耳的声响。
还有一点我几乎受到蒙骗：

举目远眺，到处是松林、云杉，
它们的脚下延伸着一片
裸露的灰色岩床。
这地方，我心里想，只有严寒，
这里是严冬的巢穴。
我走着走着……突然……玫瑰！
玫瑰欢快地展露出笑脸！
我又一次忘却自己身处北国，
一丛丛娇艳的玫瑰，
伴着灰色的巨石，
就如同一群可爱的少女，
团团围住一位白头老爹。

我饱览这片土地的景色，
鬼斧神工令人惊叹，
这里发生过伟大的奇迹！
但谁能说出它出现的时间？
水流坠落造成巨变，
（从什么高度，仍然是个秘密）
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
很久很久以前，北方
坚硬的山岩犹如巨坝，
将洪水蓄拦，但巨变的时刻
终于来临！
威力无边，无尽头的汹涌浪涛，
同古老的山岩展开激战，
无情地撕扯着大地的表面，

于是，缝隙变成了湖泊。
它们共有的长条形状，
使我得出这个结论。
但是，洪流冲出樊篱，
忘却了往日的禁锢生涯
仍旧翻滚奔腾，一路抛撒着巨砾。
最后静止下来，从疯狂的奔驰之中
显现出了—— 我们祖国的一面镜子——
它就是新生的“奥涅加”!

这里春天总是姗姗来迟：
蛮荒的卡累利阿的群山之间，
布满幽深的峡谷，
那里积雪犹如丘冈，
湖上的冰层长久地
固执地紧偎着湖岸。
在草地上已经常可以看到，
不畏霜雪的蓝色雪莲，
还有，在近岸峭壁裂隙之上，
焕发出生机的五颜六色的苔藓。
而灰色的不规则的冰块
(如果我们从高处远眺，)
如同一些巨大的暗色斑点。
从湖面袭来阵阵逼人的寒气……
一切生命悄然无息，山间
卡累利阿的白桦瑟缩可怜，
已是阳春五月，然而早晨

这里仍然是闪烁着银色的晶莹……
大地长久杳无生气……突然
这里和那里生命开始苏醒；
一股暖意微微拂过大地，
沉睡的生命眨眼间现出生机：
天鹅列阵展翅飞翔，
飞向它们熟悉的栖息地；
蜘蛛在松枝间穿梭织网；
成群的飞虫，
欢快地嘤嘤歌唱，
百灵鸟高高钻入云霄，
稠李醉人的芳香，
经久不息，向远处飘扬……
在这些神秘的原始密林里，
成群地栖息着红胸鸲。
在日落后的恬静时刻，
草地、针叶林和荒僻的丘岗，
到处都响起它们的歌声。
它们不停地歌唱，歌唱……
直到黎明才逐渐停息：
它们是想用歌声来讲述，
它们经常度过严冬的地方。
在这个温暖的国度所见所闻……
还是为一种预感而焦虑万分？
它们预感到，从密林深处
从那荒凉的白海，
如同死神一般无法抗拒，

刮来丰裕和色彩的毁灭者，
它会像瘟疫把一切生命在瞬间扼杀。
甚至时常在暖洋洋的盛夏，
大自然也会停住欢声笑语，失去生机！

独木舟沿苏纳河行驶。
蓝天如同地毯铺垫在我们脚下。
一座座孤零零的树林，
倒悬在碧波之中。
明亮如镜的水面，
一切都显得平静、恬适。
四周是一片无声的世界。
深不可测的河底，
五彩斑斓的石块清晰可见。
在灰色巨大的山岩那边，
沿岸的田野一片金黄。
在这丰茂的夏日，我尽情吸着
草场飘逸来的芳香。
这是什么在喧哗？
荒野中传来嘈嘈低语，
这声音越来越响，突然——
犹如万马奔腾，
使人胆战心惊！
轰鸣声，撞击声，
——一定是有地方在建造城池；
呼啸声，喊叫声，
　　一定是在砍伐整座森林！

亿万颗寒星在旋转、闪烁，
潮润、晶莹粉尘的旋风，
纵情飞舞，寒气逼人，
“基瓦奇，基瓦奇，回答我，是你吗？……”
它的回答是一阵风暴！……
它——从我们不知的古远年代起，
就是威力无边的巨无霸，
翻腾咆哮在四座峭壁之上，
不断送出珍珠、白银的巨浪；
而当阳光从高空
射到它晶莹的肋部，
一条奇幻的七色彩虹，
如一条缎带围在它的腰间。
它参差陡峻的山梁
有如座座纪念碑屹立荒原。
这就是基瓦奇白日的雄姿！
而在夏夜的霞光下，
它更加令人赏心悦目：
天空好像想要坠落下来，
在它身上碎成一千片，
只是为了在下边一平如镜的河面，
又重新铸成一片完整的天……
我要留在这里！这里生活自由自在地流淌！
啊，这起伏涌动的生活的幸福！
你在哪儿？——在富人豪华的宫殿里？
在肮脏的穷极奢侈的许诺里？
还是在林海莽莽的卡累利阿，

在基瓦奇永恒轰鸣声中?

精灵在林海莽莽的卡累利阿荒无人烟的地方建立起自己的王国。下面是我们的诗人对这些精灵的描述：

在那群山之中
生活着一村一村的精灵！
他们同我们完全一样！住在高大的屋子里，
只不过屋顶是三角形。
他们酷爱狩猎捕鱼。
他们的一切也同我们一样：
他们之中有平民、贵族爵位，
有法院、裁判庭和衙门，
但是他们没有舞会、摩登的女贩，
没有马车、拜访、浮华虚荣，
也没有徒劳无益的奔波；
他们没有挥霍浪费，没有破产，
当然，也就没有贫困！
他们的计数、过秤和度量绝无欺骗，
连法官们的袍服上
也从不缝有口袋，——
只有一点我不能向你保证：
他们是否和我们一样有诗坛，
作者全集，以及阅览厅？
“他们那儿有杂志吗?”
对不起，没有，但也更少争论。
文学界有一些厚颜无耻之徒，

他们从不称呼他人的姓名和父名，
只是为了在批评的幌子下
可以随心所欲地公开辱骂别人；
这同健康的思想是何等格格不入！
有谁在哪儿能找到这样的法律，
它使人们不受礼节的约束？
并且似乎理所当然地
使他们有权随心所欲，
有时由于个人的分歧，
大声喊叫，炮制文章和公开漫骂？
然而在精灵的社会里——
就在那远处的巨大峭壁之上——
所有的人都是那样友善！那样谦逊！……
人间的种种罪孽使他们，
可怜的精灵们，感到窒息！
如果尘世间愚蠢的行为，
阴谋诡计和恶作剧
使他们感到厌烦，
他们就带上有四只眼睛的猎犬
走进森林！并变成树木的形状。
有时是比云杉还高的参天巨木，
有时又如小草一般藏匿于草丛！
他们在一起嬉戏，淘气，欢笑，
他们相互叫唤，追逐，戏弄……
聪明博学的理论家，如果
你到他们那里，结果会是怎样？
你渊博的学问再也帮不上忙。

你会气得发疯：眼前是一片漆黑。
而精灵悄悄地说："你是笨蛋！
往这儿来，有学问的人，
　　这是肮脏的深渊！"……
有时，一些小官吏不也是这样？
他们玩起惯用的手法，
不停地询问，查证，
连最老到的法官
也常常被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关于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评论文章[①]

有几家报刊因在论战中语言低俗受到责难，他们却指责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是我国文坛屡见不鲜的漫骂之风的始作俑者。这种指责是不诚实的。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批评文章具有一个敏锐的善于观察的独创的思想家的特点。你常常不同意他的思想，但它们却迫使你去思考。甚至在他的见解明显同我们公认的概念相矛盾的地方，他非凡的推理（discussion 讨论）的力量和诡辩的才能都不由得引起你的注意。他讽刺短诗式的分析可能会有伤一些作者的自尊心，但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可以大胆地说，他从来没有对他对手的人格进行侮辱；而他们却总是超越文学论战的界限，而且常常是欲图对维亚泽姆斯基进行攻击，招致社会成员甚至普通公民对他们的愤怒。那么是不是应当对这些人表示愤慨呢？我们以为不必。这些人主要是情有可原地对礼数无知，而不是怀有不体面的意图。——礼数感取决于教育和其他一些条件。上流社会人士有着自己的思想方法，以及对于其他阶层无法理解的偏见。你怎样才能对一个爱好和平的阿留申人说明白两个法国军官的决斗

① 载《文学报》1830 年第 10 期（2 月 15 日出版）《集萃》栏，未署名。手稿保存完好。这篇短评是因为《莫斯科电讯》第 1 期及《北方蜜蜂》第 12 期中对维亚泽姆斯基和他的评论方式发起的攻击而写的。维亚泽姆斯基发表在《晨星》文集上的一篇文章是：《A. 与 Г. 书信片断》。

呢？他们气量如此狭窄，会使他感到非常奇怪，而他差不多也是对的。

我们报刊界的人士还从来未考虑过走出“体面”的界限，其证明就是：在这类责难面前表现出一种温厚的惊奇，以及对其作品更多带有上层社会思想和对社会生活具有敏锐认识印记的作家所作的指责。

论当代的卫道士[①]

但是，让他们来判定，什么是上流社会认可的，什么是不被认可的，哪些书是女士们可以读，哪些又是不能读的，什么样的用语适于客厅（或者用这些先生的话来说：小客厅），这不是十分可笑吗？看看他们以他们大概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在其间露面的上流社会的庇护人自居，不是很有趣吗？在一些学术性刊物中看到关于某个用语令人厌恶的缺乏道德的郑重其事的论断以及关于**上流社会女士**的引证，不是让人感到奇怪吗？袖手旁观那些可敬的教授被上流社会的玩笑弄得面红耳赤，难道不令人羞愧？他们可知道，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装腔作势和华而不实，比起民间鄙俗的东西（vulgarité）反令人难以忍受，而且正是这种装腔作势暴露出这个社会的无知？他们何必要去了解，庶民们的一些不加掩饰的独特的用语，在上流社会也经常使用，而丝毫无伤大雅，而另一方面，那种乡巴佬式的客套、拘泥的双关语，却只能引起众人的讪笑？一个良好的社会不是只能存在于上层圈子内，而是在凡是有诚实、聪明和有教养的人的地方都能存在。

这种把自己装扮成上流社会人士的癖好，有时也使我们的一

① 这是一篇草稿，1884年首次发表。草稿为上一篇文章（《关于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评论文章》）之续篇，但在第一次发表时被删除。

些报人们落入有趣的尴尬场面。他们之中有一位认为，不应当在女士面前谈论跳蚤，而且为此严厉斥责一位——你猜是谁——一位年轻有为的宫廷显贵。有一本杂志激烈抨击一部长诗有失体统，[①] 因为其中描写了一位青年深夜进入一位睡着的美人的屋里。而当一位颇为腼腆的评论者对这部长诗像对待薄伽丘或者卡斯蒂的淫秽小说一样来进行分析的时候，彼得堡的女士们都已经在读这本书，并且可以背诵其中许多片段。不久前，一部历史小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使女士们暂时放下手头的流行小说和历史札记，专心来阅读它。结果呢？一张报纸要作者注意，小说的一些平民场面中使用了骇人听闻的词汇：**狗崽子**。难道可以这样吗？万一我们女士们的目光落到这种闻所未闻的用语上，他们会说些什么呢？——他们又会对冯维辛说些什么呢？后者给叶卡捷琳娜女皇朗读自己的《纨袴子弟》，其中每一页上那个蛮横无礼的普罗斯塔科娃都骂叶列梅耶夫娜是**狗娘养的**。我们当代的道德卫士们关于人们争相阅读《心肝儿》[②]这部作品以及这部佳作取得成就又会说些什么呢？他们对于杰尔查文的戏谑性的颂歌以及德米特里耶夫的美丽的童话，又作何感想呢？《摩登太太》[③] 不是同《努林伯爵》一样不道德吗？

① 指纳杰日金在《欧罗巴通报》1829年第3期中对《努林伯爵》的一篇评论。

② 《心肝儿》，鲍格丹诺夫的长诗。

③ 《摩登太太》，德米特里耶夫的诗体童话。

1830年《涅瓦文集》[①]

E·阿拉迪因出版，圣彼得堡 普留索夫遗孀印刷厂印刷，1830年版（16开，486页，乐谱22页）。

《涅瓦文集》的出版已是第六个年头了。这些年来，它有了明显的改进。现在问世的这本文集没有过多追求表面的花哨。出版者这样做是十分明智的，文集丝毫没有因此受到损失。文集中刊载的缅希科夫的三封信是十分引人入胜的历史文献。《珍宝的故事》乃是至今为人所知的巴依斯基最佳的作品，而雅济科夫则使诗歌栏增色不少。

该诗人一出现在文坛，就以语言的炽热和力量使人惊叹不已。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绝对地掌握着每一行诗，每一个句子。看来，没有什么事物在诗意方面是他所不能领悟和不能用他独具的生动笔墨来表达的。令我们惋惜的是，至今他还没有走出十分狭窄的圈子的界限；我们也感到十分震惊，一家以语言错误达到荒谬程度而出名的杂志的出版人，居然异想天开，似乎他能够在一些模拟的讽刺诗中冒充雅济科夫明晰、准确、充满内涵的文笔。

① 载《文学报》1830年第12期。

《俄罗斯人民史》

尼古拉·波列沃依著，第1卷，莫斯科　奥古斯特·谢笛印刷厂印刷，1829年版（8开本，368页）。书末附有公元862－1055年俄罗斯大公谱系表。①

一评

我们绝无分析一些书籍名称和序言的癖好，虽然我们有责任就这些书向公众作出说明。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波列沃依先生所著《俄罗斯人民史》的第1卷，于是我们不得不来对献辞的头一行作一番讨论：**“献给我们时代的第一位历史学家，尼布尔先生。”**请问是谁和怎样授权波列沃依先生来为一些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作家排定位次的？尼布尔先生是否因波列沃依先生的垂青，将他升入我们时代一流历史学家之列而应当对波列沃依感恩戴德呢？对于波列沃依先生来说，他是否过于自负了？为什么从第一页开始就激起读者的反感呢？读者们对作家由于自尊心而产生的狂妄的行为总是缺乏信任感，对傲慢无礼深恶痛绝。献辞本身大

① A·斯米尔丁书店出售。全12卷，定价40卢布，邮购45卢布。——普希金原注

概也不会使得读者们同波列沃依先生和解。主宰献辞的唯一思想，唯一的一个词，是比令人嫌恶的“我”更为拙劣的“我”。我们来听听波列沃依先生是怎样说的：“当教育和启蒙以建立在对人类命运高度审视基础上的友谊联盟来团结所有的民族，当崇高的思考，哲学观察的结果，过去和当前的伟大真理，成为各民族共同的财富，并且迅速为相距遥远的国度的居民共同分享的时候……”，那时　　您会怎样想呢？**“我们不揣冒昧把我所著的《俄罗斯人民史》呈献给您。”**

结尾好极了，完全配得上前言！[①]

接下来：“我在卡拉姆津之后写作俄罗斯历史的决心从未有过动摇；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忠实地反映了俄罗斯的历史；我了解事件的细节，我作为一个俄罗斯人对这些事件有深刻的感受；我像一位世界公民那样不偏不倚……”那就悉听尊便吧：稍稍自我吹嘘一下是可以的，何必要丢掉对自己有利的哪怕是一点点机会呢？接下去：“它（波列沃依先生的描写）将不会有负于您（尼布尔）的垂鉴。愿我的呈献能向您证明，在俄罗斯，您会像在其他文明之邦一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和敬重。”又来了！怎么能自封为整个俄罗斯的代表呢？紧接着献辞之后是序言。序言开场白的语言晦涩，矫揉造作，其自相矛盾、废话连篇，都极似在《莫斯科电讯》上发表的、《斯拉夫人》以独特的风趣分析过的一篇论述俄国历史的哲学论文。

我们斗胆向波列沃依先生进一言，他在《俄罗斯人民史》开始付印的时刻攻击《俄国史》，这样做至少是不太高明的。如果他

① 原文为法文，是拉辛喜剧《讼棍》里的一行诗。

能更真诚、更公正地对待卡拉姆津，如果他能更谦逊地谈到自己，那么人们也会更乐意欢迎他出现在以他的那位先行者不朽的著作为标志的领域里。他也就可能避免那些如果说不完全公允，但也是合乎情理的非难了。对享有盛誉的名字表示尊敬，并不是卑劣（正如某位人士危言耸听地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过），而是一个文明人的第一特征。只有那些轻浮无知之辈才会去污辱这些名字，这就好像古希腊根据五人院的命令，希俄斯岛上的所有居民都可满嘴污秽一样。

卡拉姆津是我们的第一位历史学家，也是最后一位编年史家。从批判方面看，他属于历史，从敦厚和格言方面看，他又属于编年史。他的批判就在于对传统进行科学的对比，在于敏锐地探求真理，在于鲜明、忠实地描写事件。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重要的事件，都被他出色地描述。他的叙述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这是因为史料不足：他并未用随意的猜测去代替史实。他在道德方面的思考，以其修士般的质朴，赋予他的叙述难以言表的古代编年史的全部魅力。他把它们当作色彩加以使用，但并不认为它们具有非常的重要性。“我们要指出，这些格言，”他在受到诸多批评，而仍然甚少被理解的序言中说道，“对于严肃的人而言，或者是一半真实，或者是极为平常的真实，这些在我们寻求事件和性格的历史中没有重大价值。”不应当把个别的思考看成强行把叙述方向转向某一既定的目的。历史学家总是在严谨地叙述事件之后，再得出一个结论。而您却迥然不同，波列沃依先生什么都没有：悉听尊便，就像我们的祖先说的那样。

波列沃依先生说，卡拉姆津历史第12卷第5章尚未完稿，而其开头部分同前四章已誊清并准备付印，他同时提出一个问题：“历史学家是在什么时候构思的呢？”

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当卡拉姆津的第一批著作为他所赢得的公众如饥似渴地阅读的时候，当他和谐的笔写出的每一部新作获得令人称羡的成就的时候，他已经在思考俄罗斯的历史，并构思自己将来的作品了。也许在第12卷尚未动笔的时候，历史学家已经在考虑死神同他最后的思考猝然相遇的那一页了……波列沃依先生如果稍加思考，自然也会对自己唐突的问题感到惊讶的。

二评

瓦尔特·司各特的影响在与他同时代的创作各领域都可感觉到。法兰西历史学家新的学派就是在这位苏格兰长篇小说作家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他向他们指出了全新的、以前所没有料到的史料，虽然已有莎士比亚和歌德创作的历史剧的存在。

波列沃依先生强烈感觉到巴朗特和梯也尔的优点，以一个年轻新信徒无限的热忱接受了他们的思想方式。他沉迷于对史实的小说般的生动描写（这些史实在我们面前已是清楚得有如编年史般一览无遗），竟异想天开地否认一切其他历史的存在。我们不想从波列沃依先生的言论来对他进行评论，因为从他的言论不可能得出任何肯定的结论，我们依据的是《俄罗斯人民史》写作的基本精神，是波列沃依先生保持珍贵的古代色彩的努力，以及他对编年史材料的频繁借用。然而波列沃依先生想要有别于卡拉姆津，独树一帜的愿望太明显了，他的书名不是别的，而只是对《俄国史》简单的模仿，就连波列沃依先生的叙述方式也只是对那位历史学家叙述的仿效。

《俄罗斯人民史》以斯堪的纳维亚地理环境和半开化的土著居民的风俗的描写开头（模仿梯也尔），但是，一转到当今被称为俄罗斯的土地和在那里生息的民族的描写时，波列沃依先生对自己

民族学概念的阐述就像他在序言中的哲学议论一样含混不清。他要么是自相矛盾地重复卡拉姆津早已清晰表达的内容，要么涉及一些同俄罗斯人民的历史完全无关的东西，而且使读者厌烦的是他的口头禅："于是我们看到……，由此可以得出……，我们已经扼要地勾勒出这幅伟大图卷的主要特征……。"然而我们却什么也没有"看到"，由此什么也没有"得出"，而波列沃依先生虽然连篇累牍，也没有"勾勒出"伟大图卷的主要特点。

同卡拉姆津分庭抗礼的念头，不时把波列沃依先生引向在细琐的问题上吹毛求疵，和发表空洞的、大部分是不公允的意见。他一会儿同意塔蒂谢夫的看法，一会儿引证罗森坎普夫的观点，一会儿又肯定地、但没有证据地重复卡切诺夫斯基先生的一些怀疑的暗示。他承认向察里格勒远征的历史是可信的，但又怀疑当时奥列格是否有陆军率领。"他的兵士能从什么地方通过呢？至少不也得通过保加利亚吧。"为什么不行呢？这在体力上是不可能的吗？在反驳卡拉姆津对一个短语 на ключ 含义的解释时，他自己却毫无根据地猜测起来。或者卡拉姆津进行猜测也是不对的：ключ（产业的象征）如同哥萨克的锅一样，当时可能表示"共同的产业"、劳动组合等意思。[①] 在一份古代契约中有一处，卡拉姆津读为：милым ближникам（至爱的近亲），其根据是已烧掉的三圣教堂抄本。波列沃依先生认为，在其他一些抄本中，由于抄写者的任性，作 милыми малым 亲爱的和年轻的人，但也强调"烧掉的"这个词，他读为 малым（年轻的，年少的），但译成 дальним（远房的），——远房的近亲！我们且不去说这个可笑的矛盾；把遗产交付给远亲而不顾近亲，是什么意思呢？

---

① 如：стряпчий с ключом ведал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ю частью двора.（杂务侍从总管宫内庶务。）再如：在小俄罗斯语中，ключевать 的意思是管理经济。

《俄罗斯人民史》第1卷写作的草率令人吃惊。波列沃依先生断言，原始野性的诗歌温暖着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心灵，吟唱诗人的诵唱燃起了他们的激情，宗教则加强了他们生来具有的独立自主、蔑视死亡的倾向（蔑视死亡的倾向！），而斯堪的纳维亚人为别尔塞凯尔这个名称感到骄傲等等。而刚刚过了3页，波列沃依先生又要人们相信：不是荣耀把他（斯堪的纳维亚人）引向战斗，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荣耀，食品、衣物的匮乏和对战利品的贪婪才是他远征的原因。波列沃依先生在斯堪的纳维亚勇士的初级公国中还没有看到俄罗斯国家的雏形，却认为奥尔加是一位统一诸侯建立中央体制的英明缔造者，而弗拉基米尔则企图专权。关于封地，波列沃依先生一会儿认为是东方专制的方式，一会儿又认为是当时在欧洲已很普遍的封建制度。《莫斯科通报》中指出的讹误疏漏令人难以置信。

波列沃依先生在自己的序言里十分巧妙地告诉人们，历史著作的语言问题如果不是完全多余的话，也是极其次要的。他几乎是带着蔑视的态度谈论语言问题。

狐狸夫人，可能有人会相信您的话……[①]

不管怎么说，语言乃是《俄罗斯人民史》最差的一个方面。当然不能因而否定波列沃依先生具有机敏的想像力和生动感受的才能；但写作艺术对他是如此生疏，以至于他作品中的画面、思想、语言——一切都变得歪曲、混乱、晦涩难懂了。

① 原文为法文，引自卢梭《讽刺短诗集》第2卷第14首。

附记：我们公开地说出了我们对《俄罗斯人民史》的观点，但对于这本书引起的一些批评也不应保持沉默。在一位学者、知名的教授出版的一本杂志中刊登了一篇文章[①]，其中诟骂达到发狂的地步：在30多页粗暴嘲笑和漫骂里面，没有一条实质性的批评，没有一条有教益的资料，只有对出版者看法的引证。这些看法倒是十分有趣的，祖国历史的爱好者一定会急不可待地期望看到它的证明。在谈到波列沃依先生时，《莫斯科通报》最不可原谅地完全置自己的责任于脑后——最不可原谅，是因为《莫斯科通报》的出版者证明，他天生具有礼数感，因而他这样做是有意蔑视礼节。难道保持冷静的头脑，对我们的批评界同行就这么困难？至少也应当回忆起一首古老故事的教诲吧：

虽然是同样的一句话，
但你不该那样说出口来。

① 充斥于这篇文章中的摘录，的确可以成为胡说八道的典范，但文章本身却并未因之而少许生色。——普希金原注

波列沃依《俄罗斯人民史》第2卷[①]

一

各种报刊所提出的矛盾和疏漏，当然不能表明波列沃依不学无术（这些失误只要假以时间考虑或核实，都是可以避免的），而只是表明他行事草率和仓促。波列沃依先生在自己的注释中谈到卡拉姆津，嘲笑他的著作时所流露出的轻蔑态度，伤害了我们对这位伟人尊敬的高尚感情。而且这样的轻率和孟浪，极大地损害了波列沃依先生在一小部分有文化教养的明白事理的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因为他们对他的信任感已经开始动摇------如果还没有完全丧失的话。他本应从他们那里赢得信任。现在，我们在阅读《俄罗斯人民史》的时候，对作者劳动的严谨和研究的可靠性已不寄予厚望，而是对每一个字都不断要得到证实，如果我们自己缺乏耐心或者不能去核实的话。《俄罗斯人民史》是由一些在写作精神方面经常缺乏联系的章节组成，它更像杂志上刊登的零散论文，而不像一部由一个人统一构思，贯穿着统一思想的著作。

尽管存在着这些不足，《俄罗斯人民史》在许多敏锐的见解方

① 本文为一篇草稿。波列沃依《俄罗斯人民史》第2卷于1830年8月末问世。普希金带着书去鲍尔金诺，这篇文章就是在那里写成的。

面（注意：此处的敏锐，我们不是指我们快活的批评家们如此钟爱的玩笑，而是指综合概念并从中得出新的正确结论的才能），在叙述生动性方面（虽运用不甚得当），在观点和看法方面（缺乏远见，时常不够正确，但一般说来比较新颖，值得批评探索），仍值得注意。

刚问世的第2卷，我们认为大大优于第1卷。

1）其中没有自相矛盾的序言，自相矛盾和连篇废话都大为减少；

2）对卡拉姆津攻击的语气也大为收敛；

3）叙述本身也不再是对卡拉姆津叙述方式的模仿，而是波列沃依先生自己的东西。

第2卷以对11世纪欧洲一般状况的概述开篇。

二

波列沃依先生能感觉到真理的存在，但却不善于去寻找它，而只是在它周围盘旋。

他认识到俄罗斯同西欧曾是完全隔离的。他也感到造成隔离的原因。但他把当代历史学家的体系用于俄罗斯的想法很快使他远离了初衷——他又看到了封建主义（他称之为家族封建主义），又在这种封建主义身上看到扼杀封建主义的手段，并认为它对于年轻俄罗斯实力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在于：在**公国混战**（卡拉姆津生动地称之为分封公国之内讧）时期，俄罗斯并没有得到壮大和发展，恰恰相反，是削弱了，并轻易地成为鞑靼人的牺牲品；贵族政治还不是封建主义，等待俄国历史学者研究的是贵族政治，而不是从未存在过的封建主义。我们来作一些说明：

封建主义是个别现象。

贵族政治是普遍的。

俄国当时不存在封建主义。

只有瓦兰吉亚人的姓氏在独立地统治，力图建立一个大公国。

封建家族是另一回事（vassaux 属国）。

大贵族都依附于大公居住在城市；

他们没有去巩固自己的领地；

没有聚集于小家族之内；

他们不与国王为敌；

不向城市提供有偿救援。

然而，

他们又是沆瀣一气的；

在朝中有人关照他们的权益；

他们结成了联盟，

他们被认为是首领；

他们也叛逆作乱。

大公们无需同人民联合便能平定他们的叛乱。

贵族势力变得强大有力。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三世牢牢将它控制在手中，伊凡四世则对之大加杀伐。在沙皇王位交替期间，贵族权力有了极大的增长——贵族权力可以继承——由此而产生门阀制度，至今人们仍习惯以幼稚的眼光观察这个现象。不是费多尔，而是雅济科夫，即小贵族，消灭了门阀制度和大贵族身份，对这个词的理解不是就宫廷爵衔，而是就贵族势力而言。

我们那时还没有封建主义，这只是更糟。

三

古代史以神人告终。波列沃依先生如是说。这是正确的。基

督教乃是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一次精神上和政治上的转折。在这个神圣的过程中，世界消失了，又重新得到恢复。古代史是埃及、波斯、希腊、罗马的历史。那些处于欧洲体系以外的国家真是悲哀啊！为什么波列沃依先生要用上数页篇幅来重复18世纪偏颇的见解，并且把西罗马帝国的崩溃看作古代史的终结呢？似乎罗马帝国分解为东罗马和西罗马帝国，还不是罗马及其腐朽制度的终结似的。

基佐对基督教历史的一个事件——欧洲启蒙运动——作了解释。他发现了它的萌芽阶段，描述了它渐进的发展过程，并且他抛开一切无关的非本质的带有偶然性的东西，透过黑暗、血腥、动乱，最后是黎明的世纪，把它呈现在我们面前。您对法兰西历史学家的伟大优点有较深的了解，但请您也要了解，俄罗斯同欧洲其他部分从来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研究俄罗斯的历史，要求像基佐从西方基督教历史提炼出思想和公式一样提炼出另一种思想和公式。请不要说：**决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如果当真如此，那么历史学家就会成为天文学家，而人类生活的事件也会像日蚀一样，在日历上得到预言。但是预见不是代数学。人类的头脑，用民间的话来说，不是先知，而只能猜测。它可以看到事物发展的一般过程，能够从中得出时常能为时间证明是正确的意义深远的推测，但它不可能预见某一具体的**事件**——天意的强大的瞬间工具。18世纪一位敏锐的人士对法兰西国民议会以及俄罗斯的强劲发展作了准确的预言，但没有人预见到拿破仑和波利尼亚克的出现。

英国是漫画和模仿的发源地[1]

英国是漫画和讽刺模仿的发源地。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为讽刺图画提供了借口，任何一部成功之作都会被人模仿。在英国伪造著名作家文笔的技巧可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次，有人给瓦尔特·司各特看一首似乎是他的诗作，“这首诗好像是我写的，”他笑着回答说，“我写作的时间这么长，写的作品这么多，当然不敢说没有写过这种荒唐的东西！”我想，我们的著名作家中未必有人能在不久前的一些莫斯科杂志里辨认出模仿他们的赝品。这类玩笑要求具有少有的文字能力；一个好的模仿者应能掌握多种语言风格，而我们一些模仿者却仅勉强能掌握一种。不过我们也不乏十分成功的例子，波列沃依先生对基佐和梯也尔的模仿就非常有趣。

① 载《文学报》1830 年第 12 期。

对一篇评论《伊利昂纪》的短文的说明[1]

莫斯科一家杂志登录了《文学报》第2期刊载的关于《伊利昂纪》的广告，并且声言，这份关于格涅季奇先生译著的宣传暴露出文坛不能容忍的门派观念。作为证明，它还让人们注意《文学报》上的一段话："《伊利昂纪》俄译本对于我国文学一定会具有重要影响。"而格涅季奇先生在译著的序言中还赞扬了杰尔维格男爵。

这就是我们的批评家十分轻视规则的最好证明。这个规则是：评论应限于文学范围内，不应当把对其他无关情况的猜测掺和进来，而这些猜测大部分是既不公允也不礼貌的。关于《伊利昂纪》俄译本的广告是我们写的，而且刊登时杰尔维格男爵并不在编辑部。我不得不说一下，目前杰尔维格男爵同格涅季奇的关系不是很友好的，但无论如何，这并不妨碍他们互相尊重。格涅季

① 载《文学报》1830年第12期（2月25日出版）。这篇短评是由拉依奇发表在《加拉提亚》1830年第4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拉依奇认为，评论格涅季奇《伊利昂纪》俄译本的短文的作者就是《文学报》编辑杰尔维格，于是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本也会相信对这一部在某些方面的确有着重要意义的著作的宣传，如果这个宣传不是过分夸张和不显露出文坛不能容忍的门派精神的话。"

草稿中，在"当杰尔维格男爵不在编辑部的期间"之后还有一段话："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对《伊利昂纪》24章译文仓促地作出评论，我只是一般地广而告之，如此而已。因为由于我不懂希腊语，担心我的评论会失之片面。"

奇出于他特有的高尚情操，公开地谈过对杰尔维格才能的看法，赞扬了他的诗作。这在当前俄国文坛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范例。[1]

[1] 难道《伊利昂纪》的俄译本果真如此拙劣，而需要格涅季奇去收买赞美之词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批评家同翻译者的友谊虽然是假定的，但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偏不倚，也必须对后者的作品骂上几句？——普希金原注

拉依奇先生认为有必要……[1]

拉依奇先生认为有必要对那些不承认他有才能的批评家们进行回击。他在本年度《加拉提亚》杂志第8期刊登了以下的说明：

为了使某些人不致误解，现将我的作品清单公布如下：

1. 宴会上的愁绪
2. 友人圈内的诀别之歌
3. 霞草
4. 致友人
5. 阿梅拉
6. 彼得罗尼致友人
7. 敖德萨之夜

还有我的一些其他小诗——译作。那些诽谤者们是在哪里挑出想像之力、感情上装腔作势以及（恭请注意以下两个词的含义！）缺乏想像力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反驳是无可争议的。

---

① 载《文学报》1830年第13期（3月2日出版），未署名。普希金对拉依奇的抨击是后者对普希金一篇关于格涅季奇的《伊利昂纪》译本短评的嘲笑引起的。参见《对一篇评论〈伊利昂纪〉的短文的说明》一文（第145页）。

评《维多克手记》①

有一期《文学报》中提到巴黎一个刽子手的《手记》，警察局暗探维多克侈谈道德的作品是一种极令人嫌恶的非同寻常的现象。

请想像一下，有这样一个人，他无名无姓，没有栖身之地，靠告密维持生计，娶了一个他的职业使他必须监督的女人为妻，他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既无耻又卑鄙的骗子，然后请再想一想，这样一个人的侈谈道德的书会是什么货色？

维多克在其《手记》中自诩为爱国者，地道的法国人（un bon françsais），似乎维多克居然还会有什么祖国！他想要人们相信，他曾在军中服役，他不仅获准，甚至有书面指示可随意乔装打扮，有时还炫耀那枚骑士团勋章，而这便在咖啡馆中激起了那些靠一半薪俸（officiers à la demi-solde）度日的诚实的穷人们的愤慨。他厚颜无耻地吹嘘他和一些同他有过来往的已故著名人士的友谊（谁没有过青年时代?何况维克多还是一个善于曲意奉承的务实的人物）。他装腔作势地谈论良好的社会，好像他也会被这个社会接纳一样，他还严厉地评论一些著名的作家们，部分是期望得到他们鄙视，部分则出于其如意算盘。维多克关于卡西米尔·德·

① 载《文学报》1830年第20期。

拉·维纳和本雅曼·贡斯当的论述，正是因其荒谬而一定会引人入胜的。

谁能够相信，维多克居然虚荣心极强！每当他读到出版界人士对他的文笔（维多克的文笔！）的反应颇为不恭时，他总是暴跳如雷。在这种情形下，他都要去告密，指控自己的敌人缺乏道德，思想放纵，并且高谈（而且是一本正经地）高尚情操和独立的见解。肝火过旺在其他舞文弄墨之辈身上也许显得十分可笑，但在维多克身上表现出来却多少使人感到慰藉，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人性即使遭到最卑劣的贬低，但对于人类视为神圣的概念的崇敬还没有丧失殆尽。

由此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密探，杀害萨姆松的刽子手维多克的《手记》等等，并没有使居于主导地位的教会、政府，甚至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观念，感到受了侮辱；然而却不能不承认，它们对于社会体面来说是奇耻大辱。难道民政当局不应当对这种新的完全逃避法律监督的勾当加以恰当的注意吗？

昆虫集锦[①]

普希金作诗

花姑娘，小不点儿！
小到眼睛看不见。
——克雷洛夫

我收藏的昆虫
对我所有的亲朋开放；
这是个色彩斑斓的家族，
为了它们，哪里我没有翻寻？
然而，种类却十分齐全。
瞧——这是俗称花姑娘的瓢虫，
瞧——这是凶恶的蜘蛛，
——这儿还有俄罗斯甲虫，
瞧——这是小黑蚂蚁，
这又是一种小甲虫。
收集这么多昆虫有什么用？
整整齐齐在一个镜框里，
它们一排一排地，

① 载《文学报》1830年第43期。

被钉于我的讽刺短诗。

刊登在本年度《雪莲》文集里的这首诗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所有刊物都作出了反应，但大多数反响冷淡。这首诗有幸博得两首讽刺模拟之作，它们发表在《欧罗巴通报》和《莫斯科电讯》上。《通报》上的模拟小诗轻松、俏皮，《电讯》上的作品语法、逻辑严谨，内容丰富。我们仅在此发表经作者订正的这首重要的诗作。不久之后还将出版专集，其中附有序言、注释、作者生平，本诗所引起的所有批评文章以及对这些批评的反驳。专集将附有精美套色昆虫图片。邮购价 25 卢布。

儿童读物

一

浮躁的小孩[1]

阿辽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小孩，但是太浮躁和骄傲。他什么也不想好好去学。老师批评他的时候，他总是用各种借口为自己狡辩。当人们责备他不重视法语和德语时，他回答说，他是一个俄国人，稍稍懂得点外语对他就足够了。拉丁语在他看来，只有学究才去钻研；语法他也不想去学，因为他不满意那种为乡村学校编写的课本，他在等待一部新的富于哲理的语法。他觉得逻辑学是上个世纪的科学，不值得我们这个文明的时代来学习。当老师批评他翻阅外文读本后面的词汇表时，他念了一串外国人的名字——谢林、费希特、库赞、基林、尼布尔、施莱格尔等等——作为回答。结果呢？尽管阿辽沙聪明，有天分，但他只懂得头四条算术法则，俄语也念得相当蹩脚——他的无知出了名，伙伴们都嘲笑阿辽沙什么都不懂。

---

① 这是对尼古拉·波列沃依的讽刺。

二

说谎的小孩[1]

帕甫鲁沙是个爱整洁、心地善良、勤勉的好孩子，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他说不上三句话就要扯起谎来。他的爸爸在他命名日那天送给他一匹小木马。帕甫鲁沙对别人说，这匹马曾经是查理十二世皇帝的坐骑，就是他从波尔塔瓦战役逃跑时骑的那一匹。帕甫鲁沙还对人说，他父母家的小厨子是个天文学家，驭手是个历史学家，他家喂养家禽的普罗什卡作的诗比罗蒙诺索夫还要好。开头，小伙伴们都信以为真，但很快就识破了，从此，甚至在他说真话的时候，也再没人相信他了。

三

教区神父的儿子瓦纽沙[2] 是一个非常顽皮的小孩。他成天都同小伙伴在外边玩耍，在泥里打架，把自己过节的衣裳涂满了污渍。每当一位有派头的先生从他们的身旁走过，瓦纽沙总是向他伸出舌头，跟在他后面奔跑，使劲地叫喊："醉鬼，废物，色鬼！不正经的，写书的下流坯！不信神的虚无主义者！"——还把污物向这人扔去……有一天，这位被他弄得满身泥污的有派头的先生发火了，他抓住瓦纽沙一撮翘起的头发，用拐棍狠狠揍了他一顿。瓦纽沙哭着跑回家去向父亲告状，老神父对他说道："活该，你这坏蛋，愿上帝保佑那些不嫌弃揍你的人健康长寿。"瓦纽沙感到十分悲伤，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努力改正了。

---

① 这是对巴维尔·斯维尼因（1788—1839）的讽刺。

② 这是指《欧罗巴通报》的批评者H·H·纳杰日金。

致《文学报》出版者的一封信[1]

贵报与人为善，公正不倚的精神令人钦佩——但我必须说，我不能同意贵报关于批评和论战所流露出的看法。

首先，你们时常谈论礼节，但请你们注意，就是《文学报》在对它所分析的所有书籍都力求做到同样有礼和尊重时，它无疑也犯了违犯礼节规则的错误。在公共场合，你的肘部碰撞了同你谈话的人，您会请对方原谅——这很好。但是，如果您在秋千游艺场上散步，碰撞了一个小贩，您大概就不会用法语对他说："请原谅。"您在叫一辆马车，您会对车夫说："上科洛姆纳去。"而不会说："劳驾，麻烦您送我到科洛姆纳去。"对《俄国史》的批评也各有不同，例如×××[2]。

在我们一些受到公众信赖和尊敬的作家之间，不对批评进行反驳，似乎已习以为常。他们中极少有人说出自己看法，而且常常也不是为自己辩解。这种习惯对于文学是十分有害的。这样的反批评至少有双重好处：纠正错误意见，扩大对艺术的健康的理

① 这是一篇论战性文章的草稿。1855年部分发表，1884年全文发表。普希金以读者致《文学报》编辑部的一封信的形式，触及批评和论战的风格问题。文中普希金对维亚泽姆斯基的文章《关于论战的几句话》（载《文学报》1830年，第18期，3月27日出版）作了回答。

② 指尼古拉·波列沃依。

解。你们会说，报刊上的批评大部分是人身攻击和嘲骂，而公众对于文学成就的态度十分冷淡。

有人会反对说，有时发起进攻的人本身就十分可鄙，卷入同他的争论只会玷污自己。这样的话，您就去向公众解释，向公众道歉吧。维多克辱骂了您。可请解释一下，为什么您不打算以任何方式对他进行反击呢？在这方面我非常喜欢你们杂志上的一篇极好的文章。

文集出版人[1]

"天哪，我到彼得堡已经三个多月了。我走遍了所有的接待室，向所有的办公室主任鞠躬，可到现在还没得到一个职位。我的钱也花光了，还欠了债，而我是个退伍的穷光蛋，弄不好，他们会把我送进坟墓的。"

"那你想到哪个部门工作？"

"上哪个？我的天哪！难道我不是俄罗斯人吗？我什么都能干。当然啰，我还是想有个钱多点的位子。现在是人命关天，什么事我都乐意去干。"

"你就连一个肯帮助你的恩人都没有？"

"恩人？我的天哪！在每个部里我都有三个恩人。他们都在为我张罗，为我向上报告，可我还是一块面包都没有。"

"这么说，担任公职对你不太合适。你还是干点别的什么吧！"

"你说干点什么呢？"

"比方说，搞文学。"

"搞文学？我的天哪！到 43 岁头上才开始文学生涯。"

---

① 1830 年写的一些讽刺性戏剧场景的草稿。1857 年发表。剧中别斯蒂金这个人物是指《北方之星》的出版者别斯土舍夫—柳明。参见：《评别斯土舍夫—柳明在〈北方之星〉杂志社出版的一册文集》。

“这算什么？那个卢梭呢？”

“卢梭，可能别的事他什么也不会干。他又不打算当一个受气的小警察局长。再说他还是个有学问的人，我也在莫斯科大学念过书哩。”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办个杂志吧。”

“杂志？有谁会来订呢？”

“少不了。俄国这么大，愿意订的人有的是。”

“不，老兄，如今你可哄骗不了他们。他们都学乖了。都这么说，光知道要钱，杂志可不送来，要不就不送够。谁愿意去为35个卢布打官司？”

“那么，你就去写维日金吧？”

“维日金？我的老天！写维日金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能在四个月里给您写上四大卷，一点也不比奥尔洛夫和布尔加林差，不过，到时候我也就饿死了。”

“要不这样吧，你去出版一个文集。”

“怎么去办呢？”

“就像这样，你去向我们那些文学家们央求几个剧本，你自己再来点什么。想一个书名，再定一些标题小花边，送去印出来就成了。”

“说实在的，我同这些先生谁也不认识。”

“这有什么。你自己找上门去，对他们说，你是诗坛的新手，第一次走上这荣耀的舞台，你决心出版一部文集。这时候你就向他们请求帮助和庇护。”

“啊，你是这么想的，可不是吗？我是没办法，就是出文集我也愿去干。”

“我建议你可别拖拖拉拉的。”

“我今儿个就开始去拜访。”

“这才对，祝你一切顺利。”

（诗人的书房。屋内杂乱无章。屋中间有一张桌子。诗人正同三位年轻人玩骰子。）

诗人（把掷骰子的杯子摇得叮当作响）：该我上手了。手里有7点了……9点……9点加上7点……9点……我的了……谁要下注？

客人：运气不错，我下。

诗人：（自言自语地）手里有7点了……这是谁？

文集出版人上（对着一位客人说）：我早就渴望能拜望您。请允许您的一个虔诚的崇拜者……您卓越的作品……

客人：你搞错了，我除了票据什么也不写，这位才是主人……。

文集出版人：请允许您的一位虔诚的……

诗人：请别客气……我很高兴有幸同您认识……请坐，请……

文集出版人：您正忙着呢……请原谅，我打扰您了。

诗人：啊，不不……咱们接着玩，手头有7点了……3点——真不走运（把骰子递给下家）。

客人：我要100卢布的注。

诗人：我下注……（四人接着玩），真不走运……（他斜眼看了一下文集出版人）。

文集出版人：我是第一次走上这光荣的舞台，我打算出版一部文集……希望您……

诗人：过第五手了！每回我都不行……您打算出一本文集？选个什么书名？帕司，我不再下注了。

文集出版人：《东方之星》……我希望，您不会拒绝用您珍贵的作品使它生辉……

诗人（拿起杯子）：对不起；我下100卢布。手上有9点……啊——原来是这样。这简直是怪事，第一手我都过不了（吐痰，转动椅子）。这个讨厌的文集出版人，他一来我手气就背了。

文集出版人：我希望，您不会拒绝用您的珍贵的著作使我的文集生辉……

诗人：说实话，我手头没有诗歌，都叫那些搞杂志的，出文集的要走了……我全下……什么？又过了！……这简直不可思议。这该死的出文集的家伙。

文集出版人（立起身来）：我希望，如果您手头有暂时不用的剧本……

诗人（把他送到门边）：我一定去找一本，然后给您送来。

文集出版人：请相信我，这都是由于情况极为特殊，我现在贫困交加，还有老婆、孩子。

诗人（把他送出门外）：费了大劲才摆脱了他的纠缠。真是活见鬼的事。

客人：谁的事？你的还是他的？

诗人：说实话，我的事更糟。你把自己的诗歌交给一个笨蛋去编文集，然后另一个笨蛋却在杂志里把你的诗骂得体无完肤。老婆、孩子。让他见鬼去吧……又有人来了，谁在那儿？

（仆人上。）

诗人：我对你说过多少遍，别把那些出文集的人放进来。

仆人：可谁知道他是不是出文集的？

诗人：笨蛋，这一眼就看得出来。该我上手了：手上已经有7点……

（众人继续玩骰子。）

小酒店

（别斯蒂金和文集出版人共进午餐。）

“喂，拿酒来。”

“已经是第九杯了！可钱都得我来付——可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你会明白，咱们的文集怎么编法：从我这方面，我可以提供34首诗歌，其中5首署名A. П.，另5首署名E. Б.，还有5首落款为K. П. В.[1]剩下的那些都是无名氏的。在前言里，我要对把诗歌投寄给我们的诗人先生们表示感谢。散文方面我们是绰绰有余：那篇《文学评论》可真叫火药味十足，里面痛骂了我们那些出名的作家，还有我们那些贵族们……你是知道的。”

“不，不，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看得出你是从不读我那本杂志的……你懂吗，贵族（当然，这是讽刺的意思）是那些不愿同我们打交道的作家，可能他们认为我们这帮人低他们一等。开头我们还没觉察到，差不多一年前我们算看出来了。从那时候起，我们就狠狠地骂他们……现在你明白了吧……”

“明白了。”

“拿酒来！这帮贵族……（当然，我这话是讽刺的意思）……自以为，我们进上流社会是会被挡驾的。我倒想看看，是谁挡我的驾，我哪点不如别人。你看看我穿的衣裳……。”

“一点也不差，可不是吗？……”

---

① A. П.，指A·普希金；E. Б.，指E·巴拉丁斯基；K. П. В.，指维亚泽姆斯基公爵。

“它只不过旧了点，在跳蚤市场我让人骗了……再说，我也不会在一家小酒店里炫耀衣着。可是在舞会上……啊，在舞会上我可是非常讲究穿戴的，这是我的一个弱点。你要是看到我在舞会上的样子……我舞跳得棒极了，我会跳法兰西卡德里尔组舞，你不相信……（摇晃着站起来，跳舞）怎样?”

“好极了。”

（别斯蒂金碰了一下杯子，它掉到地上摔破了。）

“天啦，杯子摔得粉碎……这又得加到账上，还是一只雕花玻璃的呢。”

“什么算到账上，把它粘起来，就得了（他拾起玻璃碎片，递过去）。”

（文集出版人叹着气付账，搀着已经站不稳的别斯蒂金走出酒店。）

“就这样吧，咱们要一辆马车。”

别斯蒂金说：“劳驾……扶我上车，你就偏着身子坐着，[①] 咱们到涅瓦大街去兜兜风。我喜欢讲究穿戴，这是我的一个弱点。”

“这可是我最后的一点钱了！我的天哪！”

“可以见一下你家老爷吗?”

“不行啊，他还在睡觉呢。”

“怎么，12 点还在睡觉?”

“他 6 点钟才从舞会回来。”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见着他呢?”

---

① 当时彼得堡盛行一种叫作“吉他”的廉价敞篷马车，这种车只能载一位乘客，像骑马一般坐在座位上，如果挤着，也可坐两个人，但其中一位需侧身而坐。

“差不多什么时候都不行。”

“你们老爷在什么时候写作呢？”

“我没法知道。”

“真是不走运！……禀告你们老爷，就说有人来拜望……还有，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哪位作家？……”

论 批 评[①]

一般的批评。批评是科学。

批评——是揭示艺术和文学中的美和不足的科学。

批评建立在对艺术家和作家所遵循的法则的透彻的了解上，建立在对典范之作的深入研究和对当代重大事件的积极的观察上。

这里姑且不谈公正不倚——如果有人在批评中遵循的原则不是对艺术的热爱，而是别的什么，此人必定会堕落到被某种卑下的自私的动机所盲目操纵的一帮人的水平。

哪里没有对艺术的热爱，哪里就没有真正的批评。温克尔曼说：您想要成为艺术的行家吗？那就尽力去热爱艺术家，去发现他创作中的美吧！

---

① 普希金构思的一篇文章的草稿，作于1830年，1928年首次发表。这篇短评是针对Ф·布尔加林代表的批评中所谓的"商业"方向。正是布尔加林在其批评活动中遵循"卑下、自私的动机"，无原则地迎合对其文学创作缺乏分辨力的读者的趣味。普希金关于诗的"对艺术纯真的热爱"的公式，包含了诗歌创作的原则性和独立性，绝不能同"为艺术而艺术"的公式相提并论。因为，对于普希金说来，艺术本身就是具有思想性的。

《鲍里斯·戈都诺夫》序言的草稿[1]

一[2]

既然您一定要看我的这部悲剧，谨遵命寄上。但我有一点要求，希望您在开始阅读悲剧之前，先浏览一下卡拉姆津《俄国史》的第1卷。书中妙趣横生，充满对当时历史微妙的暗示，这极似我们基辅和卡明的双关语。应当弄懂它们，这是必需的条件。

遵循莎士比亚的榜样，我仅限于大力描写时代和历史人物，而不去追求舞台效果和浪漫主义的激情，等等……这部悲剧的风格是混和的。当我要塑造普通、粗鲁的人物时，风格就可能是粗犷、通俗的，——至于其中一些低俗猥亵之处，请不必留意：这些都是匆忙中写成的，在誊写时就会清除干净。写一部没有爱情纠葛的悲剧的想法一直吸引着我。但是且不说爱情极为适合我那位冒险家的主人公浪漫主义和充满激情的性格，我让季米特里爱上玛

---

① 这是拟定作为《鲍里斯·戈都诺夫》序言的几篇草稿。第一篇草稿是以致H·H·拉耶夫斯基的一封信的形式写成的，但普希金对自己在1825年1月下半月写的这封信的草稿作了修订和补充（参见第8卷）。草稿所注日期为1829年1月30日。其他几份草稿是1830年，当这部悲剧出版的问题已告解决时写就的。除第4篇是在1884年发表外，其他几篇均于1855年发表。

② 该节原文为法文。

丽娜，是为了更加突出她那非同一般的性格。在卡拉姆津的书中，这一点只是一笔带过。当然，这是一位独特的美人儿。她只有一种激情——贪慕虚荣，其强烈疯狂的程度，令人难以想像。请看，她垂涎王位，沉醉于无法实现的梦幻之中。她随时准备委身于任何一个人，只要此人给她以登上不现实的王位的微弱希望。她可以同一个犹太人在其令人嫌恶的床铺上，或是同一个哥萨克在帐篷里共枕。请看，她是以何等的勇气承受战争、贫困、羞辱的痛苦，同时又像一位女皇一样同与其平起平坐的波兰国王进行谈判，最后凄惨地结束了自己不寻常的风风雨雨的一生。我只是用了一幕来描写她，如果上帝让我多活些时候，我会再来写她。她强烈的情感使我激动不已。她正如柳鲍米尔斯克夫人的表亲所说的那样，像一个十足的波兰女人。

加甫里拉·普希金——我的一位先祖。我是依据历史和家庭文献记载来塑造这个人物的。他作为一个军人，作为宫廷近侍，特别是作为一个阴谋家，都是聪明过人的。正是他同普列谢耶夫以其闻所未闻的果敢，保证了自立为王者的成功。然后，我在文献中又发现，他是1612年保卫莫斯科的七位长官之一，1616年同科济马·米宁一道主持杜马会议，接着是担任尼日尼军事长官，然后是被推举参加罗曼诺夫加冕庆典的人们中的一位，后来又成为大使。他像法国国民公会的省督一样，什么事都做过，甚至还是一个纵火犯，这一点可从我在波戈列内依（烧毁的）古城堡遗址——即被他作为对某件事的惩罚而焚毁的那座城市——发现的一份文书得到证明。

我还有意再来写舒依斯基。他是一个集勇敢、狡狯性格的力量于一身的独特的历史人物。他是戈都诺夫的奴仆，又是最早投向季米特里的大贵族之一。他第一个参与了阴谋活动，请注意，也是他自己想担负起实现阴谋的任务；他叫喊，他控诉，他由一位

军事统领被贬为普通一兵。他随时准备牺牲性命。季米特里在刑台上将其赦免，流放他乡，然后这位可爱的冒险家又以其特有的轻率的宽宏，召他回朝，并且恩礼交加。然而这个几乎丧身于断头台斧下的舒依斯基，又在做些什么呢？他在忙于策划新的阴谋，并且屡屡得手。他迫使人们推举他为沙皇，然后又垮台——即使在他垮台时，他还保持着比他一生之中更多的尊严和精神力量。

季米特里和亨利四世有许多共同之处。像亨利四世一样，他勇敢，宽容，好夸耀。像亨利四世一样，他对宗教十分冷淡——他们两人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都喜好享乐和战争，他们都沉溺于不切实际的谋划，他们两人又都是阴谋的牺牲品……但是，亨利四世不应对克谢尼亚的事负责——事实上，这一可怕的指控并未得到证实，因而我本人以为，不应当去相信。

格里鲍耶多夫批评我对约夫的塑造。主教约夫是一位极富智慧的人物，但我由于疏忽，却把他写成了一个傻瓜。

我在创作我的《戈都诺夫》时，我也在思考悲剧的问题——如果我想要来写一篇序言的话，那肯定会引起一场纠纷——悲剧也许是最难为人理解的体裁。人们总是力图把悲剧的法则置于逼真的基础上，但戏剧的本质要排除的却正是逼真。我们且不去谈时间、地点等问题，在一座分为两部分的大厅里，台上的演员对大厅另一部分的2000名观众视若不见，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逼真可言呢？

语言问题。 例如：拉哈尔普的菲洛克泰特听了剧中人皮洛斯一长段台词之后，用纯正的法语说道：“啊！我听到了希腊语甜美的声音。”这一切不都是人为的不真实吗？真正的悲剧天才所关心的任何时候都只是性格和环境的真实。请看，高乃依在《熙德》里的作法是何等大胆：“啊，您是希望遵守24小时的规则？那

就请吧!”他立刻就罗列出足够用4个月的事件。没有什么比对公认的规则作一些小修小补更可笑的了。阿尔菲耶里深深感到剧中人的旁白十分滑稽可笑，他取消了这种形式，但却把独白拖得很长。多么幼稚。

这封信比我想像的要长得多。请加以保存，因为一旦要写一篇序言时，可能用得着。

1829年1月30日于圣彼得堡

二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决定出版这部悲剧，虽然一般说来，我对自己作品的成败总是抱着相当平心静气的态度，但我得坦率地说，我对于《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失败却十分敏感，而对其失败这一点，我几乎已经深信无疑了。关于自己的这部作品，我只能像蒙田那样说：这是一部严肃认真的著作。[①]

这部我在与世事隔绝、远离令人心寒的社会的状况下写成的悲剧，是我不懈劳动的果实，它给了我一个作家所能享受到的一切：富有生气，充满灵感的工作，内心确信我为此付出了全部力量，最后还有少数卓越人士的赞誉。

有些人的意见对我至为珍贵，他们差不多都已读过我的这部悲剧。但是，我的读者中却缺少了一位，正是这一位赋予了我这部悲剧的思想，正是他的天才激励和支持着我，他的赞扬对于我的想像力是最甜美的奖赏，也是我在孤独劳动中唯一的慰藉。

---

① 原文为法文。

三

对莎士比亚、卡拉姆津以及古代编年史的研究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以戏剧形式来表现现代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时期。我不为其他任何影响所干扰，在自由广阔地塑造性格以及在结构朴实和不刻意追求方面，我模仿莎士比亚；在事件明快发展方面，我跟随卡拉姆津的方法；而通过编年史我则力求揣摩当时时代的思想方式和语言特征。史料丰富无比！我不知道我是否善于利用这些史料，但至少我的劳动是勤奋的，严谨的。

我对这部戏剧的出版久久犹豫不决。以前我的诗歌的成败与否，报刊上对某一诗体小说的赏识或严厉的结论，都很少触动我的自尊心。赞扬的评价没有使我忘乎所以，而在读到最具侮辱性的分析时，我也竭力去猜测批评家的意见，尽可能平心静气地去弄清他的责难所指。而如果有时我对于这些责难没有作出回答，这并非由于我对它们的轻蔑，而仅仅是因为我深信《奥涅金》的某一章高于或低于另一章，对于我国文学来说，都并无区别[①]。但是我要坦率地说，我这部戏剧的失败将会使我感到难过，因为我坚信，对于我国舞台更适宜的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民众的规范，而不是拉辛悲剧的宫廷习俗，而且任何一个失败的工作都可能延缓我国舞台的改革过程（A・C・霍米亚科夫的《叶尔马克》与其说是一部戏剧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抒情作品。它的成功应归功于它写作时所用的诗句）。

我现在来作一点个别的说明。我所运用的五音步抑扬格诗体，通常为英国人和德国人所采用。我国使用这种形式的首例是在

① 原文为法文。

《阿尔吉瓦人》中；A·冉德尔在以自由体诗歌写的一部优美的悲剧的片段中，主要也运用这种形式。我在第二音步保持了法国五音步诗的行间停顿，——看来，我错了，这样做的结果是自动使自己的诗失去了它所特有的多样性。也还存在一些粗俗的玩笑和民间场面。如果诗人能够避免这些，当然很好——一个诗人不应当出于善意就变为低俗——，而如果不能避免呢？他也大可不必挖空心思去用别的什么取代它们。

我在历史中发现我的一位祖先曾在那个不幸的时代起过重要作用，对礼数的微妙不假思索，虽然怀着热爱，[1]但不无贵族的傲气，我就把他搬上了舞台。我对拜伦的诸多模仿中，贵族的傲气是最可笑的。构成我国贵族阶层的已是新的贵族；古老的贵族已经没落，它的权利已同其他阶层的权利平等，一些庞大领地早已被分割为小块，被消灭，全都没落了，有些人，甚至他们的后裔等。旧贵族的身份即使在明白事理的平民眼里也不再表示任何优越性，而对于先辈荣耀的孤芳自赏自会招来“怪异”或“毫无意义地模仿外国人”的责难。

① 原文为法文。

对一些批评的反驳[1]

一

作为一个俄罗斯作家，我总是认为自己有义务注视当前文学的动态，总是特别注意地阅读我所引起的一些批评文章。坦率地说，赞誉作为一种显然的、可能也是真诚的赏识和友善的象征，使我感动。即使在读到那些最不友好的分析文章时，我敢说，我也总是力求弄清我的批评者的思想方法，注意他的论断，不是出于自尊心受到伤害而迫不及待地去驳斥它们，而是尽可能地把作者的身份放到一边，力求同他们达到一致。不幸的是我发现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们都不能彼此了解。至于说到那些唯一目的就是不择手段来对我进行侮辱的批评文章，我只想说，它们使我十分恼怒，至少在最初几分钟是这样，因而这些文章的作者在确信他们的著作没有白费之后，可以心满意足了。如果说在16年的写作生涯中，我从未对一种批评（更不用说诟骂了）作出反应，这当然不是出于对它的轻蔑。

批评的状况本身就表明了整个文坛素质的水平。《欧罗巴通

① 1830年秋，普希金在鲍尔金诺逗留期间，开始撰写一篇长文，来对他从事文学活动以来的作品所受到的评论作一番评述。本文没有完成。

报》的分析和《北方蜜蜂》的评判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们暂时既不需要施莱格尔，也不需要拉哈尔普。因为当批评尚处于襁褓阶段时，对它表示轻视，就意味着蔑视年轻的文学，只是因为它还不够壮大。这样做是不公正的。正如我国的文学可以自豪地在欧洲面前推出卡拉姆津的《俄国史》，杰尔查文的一些颂歌，克雷洛夫的一些寓言，茹科夫斯基的1812年赞歌[1]，以及北方哀歌的几朵小花——我们的批评界也可以提出一些个别的充满光辉思想、深刻见解和可贵的敏锐感的文章。但是它们还只是个别的现象，彼此远离，因此还不具有分量和恒定的影响。它们的成熟尚需时日。

我没有对我的批评者作出回击，也不是因为我缺少愿望、兴致，或是不够认真；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批评家们对读者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我得承认，为了驳斥他们，我就得去重复那小学课本里的和老生常谈的真理，去谈论语法、修辞和字母表，这使我有些汗颜，而最让人尴尬的是在没有指责的地方为自己辩护，一本正经地说：

> 而我敢断言，我的诗是好的。[2]

或是由于无事可作，而在公众面前打笔墨官司，并且竭力逗他发笑（我对此毫无兴趣）。例如，我的一位批评家，而且是一位好好先生，大约是分析《波尔塔瓦》时，只是摘引了其中一些段落，没

---

① 指《俄罗斯军营中的歌手》。

② 原文为法文，引自莫里哀《厌世者》第1幕第2场。

有作任何评论，就断言这样的诗本身就十分蹩脚。[1]对此我能怎样去回答呢？而他的同志们几乎都是这样做的。我们的批评家们惯常这样说：这很好，因为它不错；这不好，因为它很糟。简直无法使他们摆脱这种方法。

还有一点原因，而且是主要的，就是懒惰。对于这样的逻辑混乱和行事草率，我还从来没有如此生气过，以至要拿起笔来进行驳斥。现在，处于难忍的免疫隔离期，我没有书可读，没有朋友可交流思想，为了打发时间，我突发奇想，要对我所能回忆起的所有批评作出反驳，并对自己的作品作些评注。我请我的读者相信（如果上帝还会送给我读者的话），我再也想不出比这更愚蠢的事好做了。

《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一般说来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只有《欧罗巴通报》的一篇文章对它作了毫无根据的非难以及提了一些揭露长诗创作弱点的实质性“问题”，关于这部长诗，好像再没有什么贬斥之词。甚至还没有人指出它的平淡。有人因为某些稍带情欲的描写，因为第二版中我删除掉的“啊！可怕的景象，枯瘦的巫师/用他满是皱纹的手抚摸着……”等诗行，因为我记不清楚是哪一首诗的开头“你枉自隐藏在阴影里……”等诗句，因为模仿《十二个睡美人》等而指责这部长诗缺乏道德，而且，仅仅因为最后一条就可以对我痛斥一番，说我缺乏审美感。为了迎合小市民的口味而模仿（特别是在我这种年龄）这部描写童贞女的诗歌作

① 此话引自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第7章的一篇评论（载《加拉提亚》1830年第14期，题为《本身就很蹩脚的诗》，其作者为С·拉依奇，但普希金误认为这是对《波尔塔瓦》的评论。

品是不可饶恕的。其他一些指责则显得十分空泛。那么《鲁斯兰》中是否哪怕是有一处地方在戏谑放肆方面可与例如人们经常向我提起的阿里奥斯托的恶作剧相比呢？再说我删除的地方只是对阿里奥斯托（《奥兰多》，第5首歌，第8组八行诗）最微不足道的模仿。

《高加索的俘虏》是第一部描写性格的失败之作，我好不容易才驾驭了它。这本书由于其中一些哀歌式和描写性诗句，比我写的其他东西都更受欢迎。然而尼古拉·亚历山大·拉耶夫斯基和我却对它笑了个够。

《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不如《俘虏》，同《俘虏》一样，读起来有一点令我神魂颠倒的拜伦的味道。莎莱玛同玛丽雅一场颇有戏剧优点。看来，还没人对它进行评论。但拉耶夫斯基对下面几行诗却捧腹不已：

> 在性命攸关的厮杀中，
> 他常常把马刀高高抡起，
> 突然就凝固在这个姿式里。
> 他狂乱地环顾四周，
> 面色变得苍白……

年轻的作家还不善于描写激情的生理活动。他们的主人公总是颤抖着，狂野地哈哈大笑，牙齿咬得咯吱作响等等。这一切就像情节剧一样可笑。

记不得是谁向我指出过，被镣铐锁在一起的强盗竟然游水过河，令人难以置信。这件事是真实的，就发生在1820年我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尔时期。

——————

我们的批评家们让我安静了许久，他们真是功莫大焉。我一直身居异乡，处于逆境之中。人们还是习惯认为我仍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我记得头几篇不友善的文章是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发表之后开始出现的。《阿特涅依》上刊登了一篇关于这两章的分析文章，它良好的风度，良好的文笔以及它古怪的吹毛求疵的精神使我惊讶。最为平常的修辞格和换喻都会使批评家裹足不前：**可以用酒杯发出咝咝的声音来代替杯子里的酒发出咝咝的声音吗？可以用壁炉呼出微微的热气来代替热气从壁炉散出来吗？忌妒的疑心**这样的用语不是过于大胆了吗？还有**不可靠的冰面呢？**

您是怎样看的，下面两行是什么意思？

……孩子们
用冰刀响亮地切割着冰面！

批评家猜测说，意思是：孩子们穿着冰鞋在冰上飞奔。

批评家认为下面几行：

肥胖的白鹅迈动绯红的脚掌，
本想投入碧波的怀抱
小心翼翼地踏上光滑的冰面……

应当成写：

> 肥胖的白鹅迈动绯红的脚掌，
> 想要畅游——

并且正确地指出，用红色的脚掌在冰面是游不远的。

诗歌中有几处语言的自由运用：在否定语气词 не 之后使用了宾格而不是主格；время（时间，时代）的复数主格使用了 времян 的形式，而不是 времен（就像巴丘什科夫一首诗中一样）：

> 弗拉基米尔时代（времян）的
> 古俄罗斯及其风尚。

这些都使我的批评家大为困惑。但特别激怒了他们的是下面的一行诗：

> людскую молвь и конский топ.
> （人声鼎沸，马蹄声阵阵。）

他们说："我们这些学习过古语法的人就是这样来表达思想吗？难道可以这样糟蹋俄语吗？"之后，《欧罗巴通报》对这行诗又极尽嘲弄之能事。молвь（话语）是一个地道的俄语词。топ（蹄声）代替 топот，就像 шип（嘶嘶声）代替 шипение[①]一样经常使用，因而用 хлоп（砰的一声）代替 хлопание，也并不违反俄语的基本精神。不巧的是这行诗并非我的创作，而是完全摘自一首俄罗斯

① Он шип пустил по-змеиному 他发出蛇一般的嘶嘶声。——古诗

童话故事：

И вышел он за врата градские, услышал конский топ и людскую молвь。（他走出城门，忽然听到马蹄阵阵，人声鼎沸。）

波瓦·科罗列维奇

研究古代歌谣、童话故事以及其他对于全面透彻了解俄语的特性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批评家对它们采取轻视的态度是没有道理的。

再有一行诗：

Два века ссорить не хочу.
（我不想争论两百年。）

批评家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语法里是怎样说的呢？受否定语气词支配的主动态动词要求补语为主格而不是宾格。例如：Я не пишу стихов.（我不写诗。）但我的这行诗里，动词 ссорить（争吵）不是受语气词 не（不）的支配，而是受动词 хочу（想要）支配。因而，上面那条规则是不适用的。再举一个例子：Я не хочу позволить вам начать писать…стихи.（我不想允许你开始写……诗。）难道否定语气词的电流必须通过这些动词的全部线路，并在名词身上得到反应？我认为不是这样。

顺便来谈谈语法问题。我的书中 циган（茨冈）的复数主格都写成 циганы，而不是 цигане，татар（鞑靼人）的复数主格写成 татаре，而不是 татары，为什么？因为所有以 анин，янин，арин，ярин

结尾的名词，其复数主格词尾为 ан，ян，ар，яр，其复数主格词尾为 ане，яне，аре，яре 。而所有以 ан，ян，ар，яр 结尾的名词，其复数主格词尾为 аны，яны，ары，яры，而复数主格词尾为 анов，янов，аров，яров。

只有姓氏是个例外。потомки Г. Бургарина（布尔加林先生的后裔）应称作 Г. Г. Бургарины，而不是 Г. Г. Бургаре。

有不少人（顺便说一句，还有卡切诺夫斯先生，看来，不能责备他缺乏俄语的知识）把动词 решать（解决，决定）的人称形式写成 решаю（第一人称单数），решаешь（第二人称单数），решает（第三人称单数），решаем（第一人称复数），решаете（第二人称复数），решают（第三人称复数），而不是写为 решу，решишь 等。решу 的变位同 грешу（犯罪，有缺陷）。

外国人的姓氏以 е、и、о、у 等元音字母结尾者不变格，而以 а、ъ、ь 结尾者若为阳性则变格，若为阴性则不变，但我们有不少人却在这一点上犯错误。他们写道：Книга，Сочинненая Гётем（歌德著的书。）

应当怎样写才对，турков（土耳其人的复数宾格或主格）或是турок（土耳其女人的复数宾格或主格）？这两种写法都是正确的。турок（土耳其男人）和 турка（土耳其女人）都同样可以使用。

我从事写作已经16年了，但批评家们仍然在我的诗歌中发现5处语法错误（而且都是正确的）：

1. Остановлял взор на отдаленные громады（他的目光凝聚在远方的高山上）；
2. На теме гор（在山林的黑暗中）；
3. 把 выл（嗥叫）误为 воил；
4. Был отказан（遭到拒绝）有误，应为 ему отказали；
5. 把 игумен（男修道院长）的受格 игумну 误写为 игумену。

我对批评家总是真诚地表示感谢，并随时改正所指出的错误。在散文方面我的错误更多，而说话则更差，差不多同某君写作一样。

不少人把 юбка（裙子）写成 юпка，把 свадьба（婚礼）写成 сватьба。在派生词中字母 д、б 从来不能用 т，п 代替。我们说：юбочница（专做裙子的女裁缝）和 свадебный（婚礼的）。

двенадцать（十二）而不是 двьнадцать。две（二）是从 двое（两个）简化而来，就像 тре（三）是从 трое（三个）简化而来一样。

有人这样写：тълега，тельга。写成 телега 不是更正确吗？（телега——大车，源于 телец——牛犊一词。例：Телеги запряжены

волами. 大车都套上了公牛。)

普通老百姓(既不读外国书籍,幸而也不像我们一样用法语来表达思想)的口语同样值得深入研究。阿尔菲耶里就是在佛罗伦萨的集市上研究意大利语的。我们偶尔也不妨去倾听一下莫斯科烤圣饼的女人们的交谈,她们的语言之纯正、正确,令人惊讶。

莫斯科地方的口音过于软绵绵,而且任意性较强。辅音 щ 和 ч 在其他辅音之前的发音发生了变化。我们甚至把 женщина(妇女)中的 щ 读成 ш,把 ночлег(过夜、寄宿)中的 ч 读成 с(见波格丹诺维奇)。

奸细就如同字母 ъ 一样。他们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才需要,而没有他们也完全可以应付,然而他们已经习惯于见缝就钻。

一些诗段的删除不止一次引起责难。《叶甫盖尼·奥涅金》里一些诗段是我不能或不愿发表的,这一点并不足怪。但是一些诗段被删除之后,也打断了叙述的内在联系,因此在它们原先的部位都做有标记。用其他的诗段来取代,或者把我保存下来的部分加以修改和组织不是更好吗?但十分惭愧,我对此事太疏懒了。我还要谦恭地承认,《唐·璜》里也有两个诗段被删掉了。

费多罗夫先生在一本即将出版的杂志里对第四章和第五章（《叶甫盖尼·奥涅金》）所作的分析中颇多溢美之词，但他又指出，有几段描写秋天的诗都是用“已经”这个语气词开头，他称之为“已经，已经”体，而在修词学上这叫做“头语重复”。他还批评了“母牛”这个词，责备我把高尚的、大约也是显贵的小姐们称为“小丫头”（这当然是极不恭敬的），同时却把村姑叫做“姑娘”：

> 姑娘在茅屋里
> 一边纺纱，一边放声歌唱……

第六章没有人作评论，甚至也没指出《欧罗巴通报》中的拉丁文印刷错误。顺便说一下：自从皇村学校毕业以后，我从未翻过拉丁文书籍，拉丁语几乎完全遗忘。人生苦短，没有时间去重翻旧书。好书不断涌现，但如今已没有人用拉丁文写作了。而在14世纪情况则相反，拉丁语为社会生活所必需，并被视为一个有教养的人的首要象征。

对于第七章的评论，我是在外做客，无暇顾及《奥涅金》的情况下，在《北方蜜蜂》里读到的。……我只是见到写得非常好的诗和关于甲虫的十分可笑的戏谑。我的诗是这样的：

> 黄昏时分，天空渐渐暗淡，

溪水静静流淌，甲虫嘤嘤诉唱。

批评家对这个新形象的出现表示高兴，并期望它比其他形象更具有始终一贯的性格。不过，看来却没有一条实质性的意见或一种批评的思想。别的批评家的文章，我还没有读到，因为，说实话，我也没工夫去读。

注意：有人认为《北方蜜蜂》那篇评论是布尔加林先生所作，这是冤枉他了：1）评论诗写得太好，2）散文又太差，3）布尔加林先生是不会说，关于莫斯科的描写是从《伊凡·维日金》剽窃的，因为布尔加林先生没有说过，《鲍里斯·戈都诺夫》剽窃了他的小说。

我们一些批评家的戏谑以其天真令人吃惊。[①] 请看一个真实的趣闻：皇村学校有一位低年级学友，本来不应当提到他的，这是位心地善良但头脑简单的小伙儿，并且每门功课都名列榜末。有一次，他居然写了两行轰动全校的诗：

哈哈哈，嘻嘻嘻，
杰尔维格会写诗。

时值1830年，我们，我同杰尔维格，在举足轻重的《欧罗巴通报》第一期中，看到这样一个笑话：文集《北方花朵》划分为

① 普希金引用《欧罗巴通报》1830年第2期上对《北方蜜蜂》的评论。（《北方蜜蜂》编辑布尔加林出版的）《祖国之子》第16期刊登了一篇攻击杰尔维格的谩骂式文章，其中说道："如果德国人也懂得俄语的话，那么他们也会说和《欧罗巴通报》同样的话——这是诗！嘻！嘻！嘻！"

散文栏和诗歌栏——嘻，嘻！我们当时有何感受呢？您就想想看，我们为遇到这么一位老相识而高兴！这还不够。这个“嘻嘻”看来是如此有趣，就连《北方蜜蜂》也大加称赞并予以转登：“‘嘻嘻’在《欧罗巴通报》里总是使用得非常巧妙、诙谐。”

青年的基列耶夫斯基对我国文学作了生动的富于思想的评述。在谈到杰尔维格时，他使用了这样咬文嚼字的话语：“他古老的缪斯有时罩上了现代忧郁的坎肩。”这样的说法当然很可笑。为什么不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杰尔维格的诗歌有时表现出现代诗歌的忧郁。我们的一些评论撰稿人（基列耶夫斯基对他们的反应相当不恭）兴高采烈起来，他们拾起这件坎肩，把它撕成碎片，并且已经有一年的时光了，他们仍在以这些破布片来炫耀，企图嘲笑我们的公众。我们假定，他们这种玩笑每次都能成功，他们由此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公众对于文学几乎是毫无干系的，而少数的文学爱好者相信的最终不是不断重复的笑话，而是坚定地虽然是缓慢地显露头角的健康批评和公正无私的见解。

你自己受用吧。[①]我国人民极富活力的语言中，这个用语正逐渐取代另一个更客气，但同样独出心裁的说法：“把您治人之道用于您自己身上。”这两种说法都同样为一些不拘礼节的，却能恰到好处地利用自己对手的戏谑和讽刺的人所使用。“你自己受用吧”，

① 这个用语的起源是：一位善说俏皮话的人向自己的对手作了一个猥亵的手势（把拇指夹在食指和中指间），说道：你吃了吧。而他机灵的对手马上回答说：“你自己受用吧！”（专为客厅女士或评论撰稿人所称呼的贵族女士而注。）——原编者注

当前已是我们报刊论战的主要动力——例如：出现了一首讽刺诗[①]，其中讲到福玻斯本想请一个人坐下，但立刻吩咐仆人把此君送出门去，因为此人语言粗俗，还有一股为良好社会不能容忍的傲气。很快又出现一首针对这首诗的讽刺短诗，里面叙述同一件事，只不过要差一些，而且还带有“你自己受用吧”的题词。

一位诗人想要用诗歌描述一下自己收藏的奇特的甲虫——那些反应敏捷的杂志立刻就叫嚷起来：“你自己就是甲虫，你的诗也是甲虫，就连你的朋友也是甲虫。你自己受用吧。”

一些带有一官半职的评论家先生[②]突然心血来潮，想要对一位同行进行攻击。理由是：他不是贵族。别的人士却随心所欲地嘲笑那些贵族评论家们的狭隘偏执。人们斗胆要问，这些封建男爵，这些傲慢地要求我们那些谦和的同行们出示族徽和文书的陌生骑士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样答复的呢？带有一官半职的评论家先生们沉默了一会之后，激烈地驳斥说，文学领域没有什么贵族；在自己的同行面前以贵族出身妄自尊大（特别是对于那些贵族中的小市民而言）显得滑稽可笑；即使对于一个真正的贵族，如果散文蹩脚，诗歌平庸，那么连600年历史的文书也是帮不了忙的。真是个厉害的“你自己受用吧”！不幸的是，有人在《文学报》找寻到对非贵族同行发起迫害的贵族评论家们。而公众呢？公众，作为不偏不倚、通情达理的裁判，总是对最后向他申诉的人的意见表示同意。例如：当前公众就完全赞同我们的看法：即，“你自己受用吧”这句话一般说来只是表明缺乏机敏，

① 指巴拉丁斯基的讽刺短诗《福玻斯的宫廷来了一个作家》（载《文学报》1830年第33期）。对这首讽刺短诗，H·波列沃依立即发表一首署名为哈姆雷托夫的讽刺模拟短诗《来了一位诗人，他被送上了帕纳塞斯山顶》（载《莫斯科电讯》附刊《新作家》1830年第13期）。

② 指布尔加林。

或是表明使用者对读者们的健忘抱有极大希望；装腔作势，口是心非，只会像中国第一号趣闻中说的那样，贬低文学家令人尊敬的称号。

为什么有人把《文学报》的出版人以及其编辑部的同仁称为贵族呢（当然，评论家们俏皮地写道，这是讽刺的意思）？那么，他们的贵族作风何在呢？就在于他们出身贵族吗？不，所有的刊物都曾信誓旦旦地说过，没有人会去取笑人们的身份。那么，是在于贵族的傲气吗？不，《文学报》已经证明，它的主要编辑人员都反对这种可笑的妄自尊大情绪，并且要求身居官职的评论家们尊重平民出身的同行。或者是在于他们追求上流社会的文风？不，他们是力求保持一个良好社会的文风，而且还向其他同行鼓吹这种文风，但他们是在荒漠中宣传，得不到任何回应。不是他们厌恶俗语，并用愚笨（niaiserie）来取代它（注意，不仅是俗语）。不是他们时而认为某一用语是纤夫用语，另一个又是农民用语，第三个对女士们又是不成体统的。并不是他们老是在谈论什么客厅的女读者和贵族（?）女士。也不是他们自诩为上流社会的庇护者；不是他们经常写一些肉麻的小文章，力求附会风雅，模仿上流社会的腔调，就像使女和副官们转述自己主子的说话一样。不是他们出身高贵，侮辱他人而又不参与斗殴。[①]不是他们在审理贵族文书，宣布某人为市民，某人为贵族。也不是他们把具有600年历史的贵族说成是市民阶层；不是他们把十分可疑的族徽同自己的肖像一道印制出来。那么凭什么说他们是贵族呢？（不言而喻是意在讽刺了。）

---

① 原文为法文。

在一份（差不多是官方的）报纸里说到我的先祖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汉尼拔是彼得大帝的教子、养子和心腹（后一点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亲笔信中可以看出），①他是曾经征服纳瓦林角的那个汉尼拔之父（见皇村Φ·Γ·奥尔洛夫纪念碑），曾官至元帅等等——但他是一位船长用一瓶烧酒买来的。我的先祖如果是买来的，大概非常便宜，但他却遇到这样一位船长，他的名字受到每一个俄罗斯人的并非无缘无故的尊敬。一个外来民，若是对俄罗斯人，对俄国，对她的历史和光荣缺少感情，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一个人身受俄罗斯的恩惠，却污辱我们历史最神圣的篇章，诟骂我们最杰出的同胞，并由于对同代人不满而嘲笑祖先的尸骨——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从阿尔兹鲁姆返回之后，我给优素波夫公爵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并且……引起一些人对我的不满。上流社会的人们在这方面具有高度的敏锐感。有一位批评家把我的信函看作是一个意大利修道院长的逢迎谄媚——并且在一篇从《弥涅尔瓦》（法国社会一政治刊物）转载的文章中，让一位有权势的人每周四召我共进午餐。人们就是如此感知事物，如此描述社会习俗的。

① 戈利科夫说，他先是皇上侍从，但彼得发现他的才能之后……等等。戈利科夫错了。彼得一世时并未设宫廷侍从一职，皇帝起居由勤务兵侍候，如奥尔洛夫，鲁缅采夫——均为历史名族的始祖。——原编者注

二

关于《茨冈》，有一位女士指出，整个长诗里只有一个诚实的人物，这人物还是一头熊。已故的雷列耶夫十分愤怒：为什么要让阿乐哥带着一头熊走村串巷，向围观的人们收钱。维亚泽姆斯基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雷列耶夫曾要求我把阿乐哥写成一个铁匠，这样会无可比拟地高尚得多。）而最好还是让他成为一名八品文官，或者是一个地主，只要不是一个茨冈人。这样一来，说真的，也就不会有这部长诗了，那就更好了！

或许，我的悲剧不会取得任何成功。一些刊物对我怒目以待。对于公众来说，我已经不再拥有主要的吸引力：文学声名所必需的青春活力和新颖。再则，一些主要场景已经发表，或是在一些人的模仿之作里变相刊登。我随便翻开布尔加林先生的历史小说，碰巧发现关于自立为王者的出现，在他的书中也是由舒依斯基公爵来向沙皇报告的。我的书中，鲍里斯·戈都诺夫单独同巴斯曼诺夫商谈消灭门阀制度的问题，——布尔加林先生也是这样写的。但这些都是戏剧的虚构，而不是历史传说。

除了各种文学方面的非难，有人还责备我《叶甫盖尼·奥涅金》售价过高，并认为这是利欲熏心。对于那些从未出卖过自己的作品，或作品从未卖出去的人而言，说这种话当然很高尚，但是《北方蜜蜂》的出版者们怎能重复同样的可爱的责难呢？书的价格不是由写书的而是由卖书的来决定的。在诗歌方面，需求者

的人数有限，他们大体只是能花5卢布买一张戏票的人。我们假定，书商是以每册1卢布的价格购得全部印出的书，他仍然以每册5卢布的价格售出。当然，此时作者可着手进行廉价的第2版的出版事宜，但书商到时自己也会削价出售，并因此而使新版价格降低。我们这些市民作家们对于这样的商业流通是很熟悉的。我们知道，书籍价格低廉并不证明作家没有私利，只是或者表明对该书的需求量大，或者说明根本销售不出去。我们要问：是印刷2万册，以每册50戈比出售，或是印刷200册，以每册50卢布出售，哪一种方式更为有利呢？

克雷洛夫，这位在所有方面都是最具人民性的诗人最具人民性和大众性[①]，他的寓言的最近版本的价格也不能与我们所说的规律相左。寓言（还有小说）是文学家、商人、上流社会人士、女士、使女、小孩都要读的。但抒情诗的读者只有那些诗歌的爱好者。而他们会人数众多吗？

我们已经十分习惯读那些幼稚的批评文章，甚至不觉得它们十分可笑。试读一下下面一段对拉辛《菲德拉》所作的分析（如果这部悲剧不幸是由当代俄国人写的），我们会作何感想呢？

“没有比作者先生所选用的题材更令人厌恶的了。一个有夫之妇，身为人母，却恋上了一个年轻的傻瓜，她自己丈夫的养子!!!!这是何等不成体统！她居然不知羞耻当着丈夫面承认自己淫乱的私情!!!!这还不够，这个福利埃滥用丈夫对她的轻信，把下流可鄙的谎言强加在无辜的希波吕托斯身上，出于对女读者的尊重，我们还没有胆量来解释这种无稽之谈!!!凶恶的老头没有弄清真相，

① 原文为法文。

不分青红皂白，便诅咒自己的养子!!接着希波吕托斯被处以烈马分尸的极刑!!!菲德拉服毒自尽，她的令人厌恶的心腹亦投水自杀。这就是我们的作家们一点也不脸红地写出的东西，此等人……(接下来是人身攻击和诟骂)；请看我们的文学堕落到了何等地步，一个满脸粉刺，荒淫无耻，嗜血如命的老巫婆!”让这些批评家的良心来作证吧。难道不是这样吗？他们每天都用更华丽的文笔来分析一些在价值上当然不可与拉辛同日而语，而在道德方面的确一点也不比拉辛高明的作品。我们要问：对这样的批评难道应当严肃认真地去进行回答吗？哪怕这些批评是用拉丁文写的，并被他们的好友捧为思想深刻之作。

如果《纨袴子弟》这部独一无二的充满人民性的、纪念碑式的讽刺作品，这部曾受到叶卡捷琳娜和她的宫廷精英们赞赏的作品，出现在我们今天，那么我们的杂志对冯维辛的正字法恐怕会大肆嘲笑，在看到普罗斯塔科娃骂帕拉什卡是**骗子**，是**狗崽子**，把自己比作一只**母狗**时，一定会惊恐万分!!“女士们会怎么说!”批评家会惊呼，“这个喜剧会落到女士们手里的!”——的确非常可怕!这些先生对女士们应当使用的语言该是多么温柔细腻!但在什么地方，怎样才能听一听呢!而我们的女士们（我们不妄加评论）对他们既不听，也不读，她们只读这位粗鲁的不善于用空洞的思想来取代俗语的瓦尔特·司各特。

三

《努林伯爵》给我招来不小的麻烦。有人认为它（恕我直言）诲淫诲盗——当然，这是在报刊上，而公众对它却颇为垂青——并且评论家中没有人出来为它辩护。一个年轻人胆敢深夜潜入一位年轻妇女的的闺房，并且吃了她一记耳光!真是骇人听闻!有

的人怎敢把这样下流污秽的东西写进书里！作者问道：如果彼得堡的女士们处在娜塔丽雅·巴甫洛芙娜的地位，她们会怎样作呢？真是无礼已极！为了我这篇不幸的小故事（顺便说一句，写作时作者头脑冷静，注意不失体统），有人动员了整个古典主义，整个欧洲文学来反对我！我相信我的批评家们的羞怯腼腆，相信他们的确认为《努林伯爵》是不道德的。但是，当问题涉及“体统”的时候，怎么又提到古人呢？难道他们对诙谐小说的作者们如阿里奥斯托、薄伽丘、拉封丹、卡斯蒂、斯宾塞、乔叟、维兰德、拜伦等的了解只是一些姓名？难道他们连波格丹诺维奇和德米特里耶夫的作品也没有读过？有哪一个学究敢于去指责《心肝儿》缺乏道德和不成体统呢？有哪个阴沉的傻瓜会去指责《时髦太太》这部轻松、诙谐小说的杰出样版呢？还有杰尔查文——伟大的无可非议的杰尔查文的爱情诗歌呢？我们且不谈诗学价值的不同，《努林伯爵》即使在随意性和说笑的生动性方面，也要比他们逊色。

这些批评家先生找到了一个奇特的方法，来判定一首诗歌的道德水准。他们中的一位有一个 15 岁的侄女，另一位认识一个 15 岁的姑娘——因而根据她们父母规定，凡是不许可她们阅读的书籍，都被称为“不成体统的”、“缺乏道德的”、“下流猥亵的”等等！仿佛文学只是为过了 16 岁的姑娘而存在！可能，一位慎重的师长决不会把任何一个经典作家，特别是古代诗人的全集拿给她们，甚至她们的兄弟辈去阅读。正是为此才出版了各种“文选”、选段，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公众不是 15 岁的少女，也不是 13 岁的男孩。公众，谢天谢地，可以毫无危险地阅读善良的拉封丹的寓言、善良的维吉尔的牧歌以及批评家先生们自己阅读的一切，如果我们的批评家除了自己杂志的校样以外，还读点什么的话。

这些先生们对于体面问题如此慎重其事，使人想到用一方手

帕羞涩地搭在桃丽娜裸露胸脯上的答尔丢夫，他们恰如其分地受到使女有趣的反驳：

> 但是，你太容易受到诱惑，
> 躯体对你的影响难以抗拒！
> 说实话，我不懂，是什么样的热情将你主宰，
> 而我对情欲的反应十分淡漠，
> 即使你赤身裸体出现在我面前，
> 我也不会受到你肉体的诱惑。

《欧罗巴通报》对把努林比作一只正在抓（цапцарапствующий）母猫的公猫（真是一个有趣的动词：цапцарапствую 我抓，цапцарапствуешь 你抓，цапцарапствует 他抓）感到愤怒。说实话，整个《努林伯爵》里找不到这样的比喻，也找不到 цапцарапствую（我抓）这个动词；再说，即使里面有，又有什么不得了呢？

不道德的作品是那些其目的和行为都在于动摇社会幸福或人类尊严赖以为基础的法则的作品。那些目的在于用淫荡的描写激起人们邪念的诗歌，只能贬低诗的价值，把它的琼浆玉液变成使人激狂的物质，把诗神缪斯变成丑恶的卡尼迪亚。但是，由于真诚的欢快和想像力一时的闪耀所激发出的诙谐，只有在那些对道德只有幼稚、模糊概念，把道德同说教混为一谈，并且只看到文学的教育作用的人看来才是缺乏道德的。

顺便说一下：我自13岁开始写作，差不多同时开始发表作品。许多有损于甚至像我这样不高的天分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我都希望把它们销毁掉。有一些东西一直像责备一样折磨着我的良心……但无论如何，对于我少年时代一些劣作的发表，特别是对于一些人的恶作剧，我不应负什么责任。在费多罗夫先生出版的一本文集里，在那些天知道从哪里搜寻来的我的诗歌中，居然有一首显然是帕纳耶夫先生诗歌誊写员的文笔写成的田园诗。别斯土舍夫先生在某一本文集的序言里对向他提供诗歌的某位安……先生致谢，并说，不是所有的都值得发表。

这位安……先生没有任何权利拥有我的诗作，随心所欲地改动，并把它们同自己的作品一起投寄别斯土舍夫先生的文集。这些诗歌我早已忘却，或者并非为发表而作（如《我悄悄对你说，她妩媚可爱》）。我在19岁时写出这样的东西或可原谅，但在更成熟、庄重的年龄来公开承认却是不可原谅的（如《致尤里耶夫》）。

重读那些极尽谩骂之能事的批评文章，我发现它们都十分有趣，我不明白，当初我怎会对它们产生抱怨情绪。看来，如果我想要嘲笑它们的话，除了将它不加按语全文转登，恐怕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但是我也看到，最粗鲁的谩骂在印刷术的神奇作用下也会获得一定的分量。我们仍然觉得：印刷出来的纸着来都是神圣的。我们仍然这样认为：这怎么可能是胡说和不对的？要知道，这是印刷出来的呀！

书本的遭遇各有不同。[1]《波尔塔瓦》没有取得成功，可能，它也不配获得成功。但是，我以前比这差得多的作品所受到的热情欢迎已经把我宠坏了，再则，这是一部完全独创的作品。可我们正是因为它而论战不休。

我们的批评家们向我解释失败的原因——他们是这样说的：

首先，他们向我申明，从未有人看到过，一个年轻女人居然爱上了一个老头，因而马丽亚对老首领的爱情（注意，这是已为历史证实的）是不可能存在的。

　　你是切斯顿，那又怎样？我就算知道，但却不相信。

这样的解释不能使我满意：爱情是一种最为任性的激情。这里姑且不谈每天比焕发的青春、理智和美更为常见的道德败坏和愚蠢行为。想一想神话传说、奥维德的《变形记》、莱达、提利拉、帕西察亚、皮格马利翁——您就会承认，所有这些虚构并不与诗学格格不入。还有用自己在飘泊和战斗中的故事赢得苔丝德蒙娜芳心的老黑人奥赛罗呢？……还有曾赋予一位意大利诗人以灵感，写出他最好的悲剧的米拉呢？

他们对我说，玛丽雅（或马特辽娜）是被虚荣心，而不是被爱情所打动。对一个大法官的女儿来说，去做盖特曼（首领）的妻子真是件了不起的荣誉！接下去他们又说，马泽帕是一个凶恶、愚蠢的小老头。把马泽帕塑造成一个凶恶的形象，我为此抱歉，但我看不出他是一个善良之辈，特别是在他安排处死被他诱惑的少

---

[1] 原文为拉丁文。

女的父亲的时候。一个人的愚蠢，或者是通过他的行为，或者是通过他的语言显露出来的。马泽帕在我的史诗里的行为完全同历史一致，他的语言则是对他的历史性格的说明。他们指出，我的史诗中的马泽帕心胸狭窄，极不易忘却旧怨，还有，这个小俄罗斯的盖特曼不是一个大学生，不会为了一记耳光或是扯了一下胡须而动复仇的念头的。这又是被文学批评所推翻的历史——又是**“我就是知道，也不相信！”**马泽帕是在欧洲接受教育的，此时，贵族荣誉的概念极其强烈——马泽帕会长久记住他受到莫斯科沙皇的屈辱，并且一有机会就会进行复仇。这就是他阴险、残忍的一贯性格的特征。扯波兰人或是哥萨克的胡须是常有的事，就像扯俄罗斯人的连鬓胡一样。赫梅尔尼茨基为了他从（好像是）恰普利茨基那里受到的所有委屈，根据（16—18世纪）波兰共和国的判决，得到他敌人剃下的胡须作为补偿（见康尼斯基编年史）。

在我的史诗中，老盖特曼预见到失败，在单独同心腹一起的时候，咒骂年轻的卡尔，把他叫做（好像是）乳臭未干的小儿，疯疯癫癫的家伙。批评家若有其事地指责对瑞典国王的看法没有根据。我的书中有一处说到马泽帕对谁都缺乏依恋的感情，批评家立刻引用书中**马泽帕自己说的话**，他要马丽亚相信，**他爱她胜于荣誉，胜于权力**。应当怎样回答这样的批评呢？

有些词，如：**胡须、尖叫、站起来、马泽帕、啊嗬、是时候了**——在批评家们看来都是低俗的纤夫的用语。我该怎么办呢？

《欧罗巴通报》中有文章指出：史诗的书名就是错误的，我没有把书名定为《马泽帕》，大概是为了不使人想到拜伦。正是这样。但这里还有另一层理由：卷首题词的问题。《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手稿，我曾定名为《哈列蒙》，但是略带伤感的题词（当然它比整个史诗还要好）吸引了我。

顺便说一下，在评论《波尔塔瓦》时，批评家还提到拜伦的

《马泽帕》。但他们是怎样去理解他的呢！拜伦只是从伏尔泰的《查理十二史》了解到马泽帕的。他只是被这个无比依恋烈马，在草原上驰骋的人的画面所震惊。这个画面当然是极富诗意的，但你再看看，他是怎样利用这幅图画的？你再也看不到马泽帕、查理的形象，也看不到那个阴沉、可恶、使人痛苦的人物，这个形象几乎充斥拜伦所有的作品，但（让我的一位批评家失望的是）在《马泽帕》中却偏偏没有，拜伦根本没有去考虑他。拜伦只是呈现一系列一个比一个更令人惊叹的画面——如此而已，但却是何等炽热的创作！何等博大敏锐的手笔！如果这个被诱惑的女儿和被处死的父亲的故事落到他的笔端，那么，可能再也没有人在他之后再去触动这个可怕的题材了。

在《沃依纳罗夫斯基》[1] 里，我第一次读到这样的诗句：

> 受难者柯楚别依的妻子
> 和他们被诱惑的爱女。

我吃惊的是，诗人怎会忽略了如此可怖的情景。

把一些虚构的恐怖强加在历史人物身上的做法既不明智，也不宽宏。即使在史诗中，我觉得，诽谤也是不足取的。但是刻画马泽帕这个人物形象时，放过如此触目惊心的历史特征则是更加不可饶恕。然而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厌恶的对象！没有一丝善良、体谅的情感！没有丝毫令人慰藉的特点！引诱、敌意、背叛、狡诈、怯弱、凶残……杰尔维格感到惊讶，我怎会去写这样的题材。强

① 《沃依纳罗夫斯基》，雷列耶夫的长诗。

烈的性格，投射在所有这些恐怖现象之上的深刻的悲剧性阴影，这就是吸引我的东西。《波尔塔瓦》的写作，我只用了数日的工夫，我不可能把写作时间拖得过长，否则我就会把一切都放弃掉的。

有一份报纸公开地说，我算得是贵族中的小市民。准确一些应当说，我是小市民阶层中的贵族。我的家族乃是最古老的贵族之一。普希金家族起源于一个普鲁士移民拉查，或拉恰，一个贵族（一位受尊敬的人，编年史家言）。他于神圣的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涅夫斯基公国时期来到俄罗斯（见《俄罗斯编年史家》及《俄国史》）。由他分出许多普希金家族的支系，穆辛-普希金，博布里谢夫-普希金，布图尔林，米亚特列夫，波沃多夫等等。卡拉姆津（出于对阿历克谢·伊凡诺维奇伯爵的敬意）曾提到穆辛-普希金家族的一些人。在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血腥贬黜之后幸存的少数贵族中，史家指出有普希金的姓氏。在鲍里斯·戈都诺夫在位时期，普希金家族受到迫害，明显地是门阀斗争的受害者。Г·Г·普希金（即我在悲剧里塑造的那一位）属于那个富于历史特征的时代诸多杰出人物之列。还有一位普希金家族的人，在沙皇政权交替时期，据卡拉姆津所言，曾统率一支军队，单独同伊兹马洛夫忠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推举罗曼诺夫家族当政的过程中，四位普希金家族的人曾在选举文书上签字，其中一位，官居御前侍臣，还在议会关于清除门阀行动的文件上签了字。彼得当政时期，他们都持反对立场，他们中的一人，御前大臣费多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曾卷入茨克列尔的阴谋活动，并同后者及索科夫宁一道被处决。我的曾祖父娶海军上将戈洛温伯爵（俄罗斯第一位安德列骑士勋章获得者）之女为妻。他由于妒忌或精神病发作而杀死自己的妻子，年轻时即死于狱中。他的独子，我

的祖父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在1762年动乱期间一直忠于彼得三世，因不愿宣誓效忠于叶卡捷琳娜，而同伊兹马洛夫一起被监禁于要塞之中（这两个姓氏的奇妙遭遇！参见留利埃尔和卡斯特尔的作品）。两年后被叶卡捷琳娜下令释放，此后一直受到女皇的尊敬。他不再入政府部门供职，在莫斯科和自己的乡村领地度过余生。

如果说做一个古老的贵族就意味着模仿一位英国诗人，那么这种模仿是十分偶然的。在英国爵士对自己封建特权的留恋之情，和对已故的、其往日的荣耀并未带给我们官爵和荫护的先祖们的不含私念的尊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因为当前的显贵大部分都是在帝国时期出现的新兴家族。

然而无论我的出身如何——出身于挤入贵族行列的市民，或是出身于历史悠久的贵族——俄罗斯最古老的家庭之一，其先人的名字几乎可见于我国历史的每一页，这对我的思想方式没有任何影响。虽然至今我没在任何地方披露过这些事情，而且这与他人也没有关系，但我丝毫也无意放弃家族的传统。

无论我的思想方式是怎样的，我从未向任何人流露过对贵族阶层的民主派的憎恶。对我而言，它是我们伟大文明的人民中的一个自然的必不可少的阶层。看一看周围发生的事，读一读古老的编年史，当我看到一些古老的贵族已经不复存在，另一些日益没落，消亡；一些新的姓氏，新的历史名字，虽然取代了一些古老家族的位置，但却因没有受到任何庇护而日渐衰落；贵族的名字不断被贬低，最终成为暴发户、甚至闲极无聊的人们插科打诨的笑料——当我目睹这一切，不禁无限惋惜。

一个有教养的法国人或英国人对于古代编年史的每一行都感到异常珍贵，因为里面记载了他先祖，一位忠诚骑士的名字，他在某个战役中牺牲，或于某年从巴勒斯坦返回祖国。但是卡尔梅

克人既没有贵族，也没有历史。野蛮、卑劣、愚昧，是不懂得尊重过去的，而只会匍匐拜倒在现今面前。[1]我们还有这样一些留里克家族的后裔，他们更珍视的是他们叔伯的星章，而不是自己家庭，也就是自己祖国的历史，而您却把这看作他的尊严！当然，也有高于家族显赫的尊严，这就是个人的尊严。但我曾拜读过苏沃罗夫亲自撰写的家谱，苏沃罗夫并没有蔑视自己的贵族出身。

米宁和罗蒙诺索夫这两个姓氏的分量，可能就超过了我们所有的名门望族。难道他们的子孙为这个姓名感到自豪也很可笑吗！

注意：公正地说，波列沃依先生在一些显贵面前卑躬屈膝，曲意奉承，这不应受到非难，相反，我们倒是要责备他对长者、名分、荣誉所表现的幼稚狂妄的不敬，和对已故者和生者的轻蔑态度。

另一家报纸说我其貌不扬，我的肖像都过于美化。对这种人身攻击，我没有予以回答，虽然它深深地触动了我。

有人说我英俊漂亮，或是其貌不扬；是出身于古老的贵族，或是平民；善良或者凶恶；在显贵面前卑躬屈膝，或者甚至不点头问候；是否玩牌等等——这些同批评家或是读者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未来的传记作者（如果上帝会派一个人为我作传的话）关心的事情。批评家和读者只关注我的作品，仅此而已。这番议论

---

① 普希金在同布尔加林论战时，错误地将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进行对比，难以令人信服地否定历史传统，其中包括尚未脱离游牧生活的民族对过去的尊重。作出这种牵强对比的原因是：普希金身上还存在某些贵族的偏见和弱点——众所周知，正是这个弱点引起了雷列耶夫和别斯土舍夫的讽刺性批评。

似嫌浮浅。对作家的抨击以及这些抨击引发的作家的自我辩护，是走向关于所谓社会人士(hommes publics)行为辩论公开性的第一步，是走向具有高度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条件的第一步。在这种关系中，那些理应受到人们轻视的作家、辱骂者、诽谤者都可能做一些真正的好事：逐渐形成一种尊重公民个人名誉的风气，增强作为一个有教养的民族纯净民风基石的社会舆论的力量。

于是，学者和作家的群体，无论他们是什么出身，都将站在所有教育战线的前列，站在向文明进军的前列。对于自己命中注定事事挨头炮，遭受一切痛苦和危险的境遇，他们不应只表示出怯弱的愤怒。

试驳某些非文学性质的责难①

> 无论我的习惯和规则怎样
> 使我避开任何性质的论战，
> 我仍然没有完全放弃自卫
> 的权利。
>
> 骚塞

一

有人向我国一位著名作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从不对批评进行反驳。他回答说，批评家们不理解我，我也不理解我的批评家们；如果我们再到公众面前去打官司，大概连他们也没法理解我们。这使人想起一段古老的讽刺诗：

> 一个聋子向聋法官状告另一个聋子，
> 聋子叫嚷道，他牵走了我的牛。
> 没那回事，另一个聋子吼叫着回答说，
> 我已故的爷爷早就拥有这片荒地。

① 这篇未完成的文章经加工整理后，即成为《对一些批评的反驳》一文。但某些部分在新文中得到保留。如在短文《不久前在北京发生了……》之后的一段《你自己受用吧》即原封不动地用于《对一些批评的反驳》中，本文中此处省略。

鲁法官判决道：你们为什么要互相攻击？
你们俩都没事，有罪的是那个妞。

如果抨击属纯文学性质，而且受影响的仅是被骂得体无完肤的作品的销售，那么，（像《俄罗斯人民史》出版者摆出贵族派头的现身说法那样），可以**对批评者不予回答**。但出于自我尊重，不能因为懒惰或心肠善良，便对那些侮辱性的人身攻击和不幸当前已成为家常便饭的诽谤中伤置之不理。公众不应当受到如此的不尊重。

如果说在16年的写作生涯中，我从未对一种批评（更不用说诟骂了）作出反应，这当然不是出于对它的轻蔑。

批评的状况本身就表明了整个文坛素质的水平。《欧罗巴通报》的分析和《北方蜜蜂》的评判，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们暂时既不需要施莱格尔，也不需要拉哈尔普。因为当批评尚处于襁褓阶段时，对它表示轻视，就意味着蔑视公众（愿上帝饶恕）。正如我国的文学可以自豪地在欧洲面前推出卡拉姆津的《俄国史》，杰尔查文的一些颂歌，克雷洛夫的一些寓言，茹科夫斯基的1812年赞歌，《伊利昂纪》的俄译本，以及北方哀歌的几朵小花——我们的批评界也可提出一些个别的充满光辉思想和可贵敏锐感的文章。但是它们还只是个别的现象，彼此远离，因此还不具有分量和恒定的影响。它们的成熟尚需时日。

我没有对我的批评者作出回击，也不是因为我缺少兴致，或是不够认真；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批评家对读者没有什么影响。我看到，最没有根据的议论在印刷术神奇的作用下，也会获得一些分量。我们仍然觉得：**印刷出来的东西都是神圣的**。我们仍然认为：这怎么可能是胡说和不对的？要知道，这是印刷出来的。不过我得承认，我羞于在公众面前打笔墨官司和竭力去逗他们发笑

（对此我没有丝毫兴趣）。为了驳斥我的批评家们，我就得去重复那些小学课本里的和老生常谈的真理，去谈论字母表和修辞学，在没有指责的地方为自己辩护，这颇使我汗颜。而最令人尴尬的是一本正经地说：

而我则敢断言，我的诗句是好的。[1]

因为我们的批评家通常总是这么说：这不错，因为它很好；而这不好，因为它很糟。你怎么也不能把他们从这里拉出来。

还有一点原因，而且是主要的：就是懒惰。对于这样的逻辑混乱，行事草率，我还从来没有如此生气过，以至要拿起笔来进行驳斥和加以证明。现在，处于难忍的免疫隔离期，我没有书可读，没有朋友可交流思想，为了打发时间，我突发奇想要对那些如今十分时髦的非文学的责难，而不是对严肃的批评（对此我总也打不定主意）进行驳斥。我斗胆请读者相信（如果上帝还会送给我读者的话），我也想不出比这更愚蠢的事好做了。

———

我们的一位伟大同胞[2] 有一次对我说（他屈尊对我关注，并经常反驳我的看法），如果我们国家有书籍出版自由的话，他就携妻将子离开这里到君士坦丁堡去了。[3] 一切事物都有它邪恶的一

① 原文为法文，引自莫里哀的《厌世者》。此句与《对一些批评的反驳》中的引文稍有出入。

② 指卡拉姆津。

③ “到君士坦丁堡去了”在这里是指：这些年月专制制度在土耳其较之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横行无忌，公民被剥夺了一切政治自由，其中包括言论自由。而土耳其的书刊检查被认为是最严厉的。

面——不尊重公民个人名誉、随意诽谤中伤乃是印刷自由主要的不利因素之一。我们这里，人身攻击受到出版检查的限制，于是有人便寻找到间接的方式，即拐弯抹角的办法来进行人身讽刺。在这方面开先例者非××莫属。[①] 此君在自己的一份杂志上刊登了一则令人捧腹的关于两位中国评论家的轶闻，这两人因从事有损文学家称号的诈骗勾当而被法官判 处以竹棒杖身。这一则中国趣闻使得公众十分开心，并且受到我国评论家的喜爱，此后，只要一位报人迁怒于某人，他的报纸的篇页上便会立刻出现一篇国外（而大部分是来自中国）通讯，其中往往是用一个杜撰的或无名作家来影射他的对手，对其百般渲染，进行丑化。这些中国趣闻其中大部分如果说没有给作者的俏皮带来发明家的荣誉，至少也达到了它写作的报复中伤的目的。如果在这些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矛头所指十分明显的诽谤中还看不出其攻击对象就是自己，这未免过于懦弱怕事了。如果某人在报刊上遭到攻击，含沙射影地说一位身份如何，年龄多少的先生偷窃这样一些东西，例如从别人口袋拿走一块手巾，那么，此人就应当作出反应，起面为自己辩护，这倒不是出于对办报纸的重视，而是出于对公众的尊重。放任一个坏蛋对您诽谤，这算得是什么贵族的骄傲呢？英国的爵士从不会拒绝同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用一枝库亨莱特手枪进行决斗，同样也不会拒绝同一个醉醺醺的马倌用拳头一分高低。我们有一位文学家，[②] 听说还曾经服过军役，拒绝同人用手枪决斗，他的理由是：他这一辈子见到的血比他的对手见过的墨水还多。真是有趣的借口。对于这样的，用夏多布里昂的话来说是出身高贵，

---

① 普希金在此指布尔加林，此人以《中国轶闻》或来自中国的报导等形式在《北方蜜蜂》上多次发表文章，诬蔑同时代作家。

② 指布尔加林、杰尔维格曾要求同他决斗。

侮辱他人而又不参与斗殴[①] 的人来说，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有一次，某人发表了一篇（官方的）文章，里面说，有这样一位拜伦的模仿者，常在《文学报》发表评论文章的法国诗人，是一个卑劣、缺乏道德的人，而另一位评论家则聪明、谦逊、勇敢，他先是忠实地为一个祖国服务，然后又效忠另一个祖国。那位法国诗人的回答，大概真的会使这位有两个祖国的谦逊、勇敢的评论家永世难忘：

人们对此都加以嘲笑，但我却笑不出来。[②]

不久前，北京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③]一位书生写了一部悲剧，他很久没有送去出版，但不只一次在北京一些体面的圈子里朗读，甚至把手稿交给几位官吏传阅。另有一位书生（以下是一串中国式的骂街）或者是在过道里听到这部悲剧（听说，他有这个毛病），或者是从一个官员的珍品匣里偷到这部手稿，然后，匆匆把这部本来就很拙劣的悲剧改编拼凑成一部非常无聊的小说。写悲剧的这位书生，虽然缺少天分，但为人忠厚，抱怨了几句之后，就不打算再去理会剽窃他的作品的人，但是那位写小说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此处指责布尔加林剽窃《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内容。普希金将事实公之于众：他把手稿呈交给宾肯多夫，布尔加林正是从后者那里获得这份手稿的。后来，普希金在布尔加林的《自立为王者季米特里》中发现对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剽窃，从而公开谈论此事。布尔加林为此于 1830 年 2 月 18 日致函普希金，向他保证，他并没有读到过《鲍里斯·戈都诺夫》，只是听说而已。此外，他还写了一篇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评论，他在文中断言，普希金"从《聪明误》抄袭了大量内容，而且，请勿动怒，还对另一部著名作品（指布尔加林的《伊凡·维日金》）进行剽窃"。

的书生却为人精明狡狯，且极不安分，他担心被揭发出来，于是首先发难，声嘶力竭地叫嚷说，写悲剧的樊和无耻地剽窃了他的成果。樊和勃然大怒，立刻把小说家樊慧告到北京道德法庭，等等，等等。

二

A：你读过《文学报》第 45 期上的一篇评论吗？里面把我们的评论家们同 18 世纪的民主主义作家相提并论。

B：看过了。

A：你觉得怎样？

B：相当不合时宜。

A：当然是太不像话。这些文人们如此侮辱自己的同行，难道不感到惭愧吗？

B：我同意。

A：俄国的评论家们还没有受到过如此有损尊严的比较！

B：请原谅，这我就不能同意你的看法了。

A：这是怎么回事？

B：刚才我没弄懂你的意思。我还以为，你是认为 18 世纪的民主主义作家受到侮辱了呢。（报纸里说得好）我们的评论家根本不能同他们相提并论，然而还是有人在进行比较。

A：哪能呢？像法国作家这种人还是根本没有的好！你瞧吧，我们那些评论家一想到有人把他们同法国作家相比，准会气得发疯的。

B：你知道《文学报》提到的法国作家都是些什么人吗？

A：我怎会知道。

B：那么让我来告诉你吧！他们是道德高尚的托马斯，襟怀坦荡的杜克洛，意志坚定的萨姆托尔以及其他一些同样富于智慧、诚

实的人，不朽的天才，然而又是才能出众的文学家。

A：但是他们为什么受到《文学报》抨击呢？

B：我正要说这件事。

A：杂志上怎能刊登这样的诽谤文章呢？那些聪明、诚实的文学家会不会高喊：我们要送他们上绞架，送上绞架！把贵族们吊在路灯上？

B：请原谅，老兄，我又听不懂你的意思了。报上根本没有这些东西。

A：怎么没有呢？等等，我身上就带得有报纸……（从口袋抽出报纸）。啊，你是对的，你说得对。上面只是说了，他们的讽刺短诗本身就埋下了批评的种子，——难道几首讽刺短诗就种下了法国革命的种子？

B：关于法国革命，《文学报》一句话也没说，而且这作得对。

A：得了吧，你瞧瞧，读一下：把贵族们吊到路灯上去，[1] 把他们绞死，绞死。好的，干吧。[2]

B：你就从中看到了法国大革命？

A：那么请问，你又是怎样看的呢？

B：这不过是狂热平民的叫喊。

A：那么这叫喊又意味着什么呢？

B：意味着当时的平民充满反对贵族的愤怒情绪，并且对非平民的一切东西都一概反对。

A：我这下弄懂你的意思了。可是，为什么平民要对贵族充满愤怒呢？

B：因为，从很早起，贵族对于平民就是一个可鄙可憎的阶级。

A：这么说，我是对的了。“把贵族们吊到路灯上去”这句叫

①② 原文为法文，引自1793年的一首革命歌曲《好的，干吧》。

喊就包含着革命。

B：你不对。“把贵族们吊到路灯上去”这声叫喊只不过是法国革命微不足道的插曲——一出壮丽戏剧中的一段丑陋的闹剧。

A：而那些诚实、善良的作家就是这场闹剧产生的原因！如果果真如此，那当然是蓄意如此了！

B：大概是吧！

A：顺便说一句，[①] 你对波利尼亚克看法如何？

B：亲爱的，你知道我同你是从不谈论政治的。

A：那么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我们的文学家吧。你看过报纸杂志没有，为了这篇评论，有人大骂《文学报》，骂它的出版人和编辑人员？

B：还没读到。

A：那你就读读这个（递给他一本杂志）。

B：这些点是什么意思？

A：啊！我问过这件事——这儿原来是些难听的骂人的话，检查官没有通过。

B：（交还杂志）遗憾，这些骂人的话可能还有点内容，而在印出来的文字里却没有。

A：再给你看点别的（递给他另一本杂志）。

B：（读完之后）这里边有骂人的话，不过内容却不多。

A：看来，你是支持《文学报》的了？你早就变成一个贵族了吧？

B：我怎么会成贵族呢？贵族是什么意思？

A：贵族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从来不读杂志的！你明白吗？《文学报》的出版人和编辑人员，还有它的读者——都是贵族（当

① 原文为法文。

然是讽刺的意思）。

B：随你的便吧。我在这里边看不出有什么意思。我自己作为一个搞文学的，常读《文学报》，因为我希望了解它的见解，当然也遗憾地看到，《文学报》有时也会有一些人身攻击，嘲讽，反击，驳斥，为一些琐事进行论战（这种事让巴什基尔文人去做也许可以），但我从未看到《文学报》表现出贵族傲气，或对其他阶层的排斥。杰尔维格男爵、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普希金、巴拉丁斯基等人是不是贵族，这同我无关。他们也从不谈论这些。但是，他们为以波列沃依先生为代表的有文化的商界辩护，这做得很好，而如今为一个文明的贵族辩护则是做得更好。

A：不管怎么说，《文学报》的评论可能伤害到一些无辜的人。

B：你怎么了，你是在开玩笑，还是你自己就是无辜的人 这些无辜的人是谁？

A：还有谁？《北方蜜蜂》的出版人。

B：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北方蜜蜂》可敬的出版人的思想方法是众所周知的，《文学报》是不可能伤害他们的，而波列沃依先生在他们的阵营之中，受到他们的庇护，会是很安全的。

A："对读者的警告"[1]是什么意思？这是针对谁的？你会说是针对评论家的，可是我在想，是不是针对出版检查机关的？

B：就算是针对检查机关的吧，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我们有了检查机关，那么，社会阶层最好也能像个人一样受到保护，免遭一些公然的恶意的攻击。对于一个阶层的缺点、弱点，应当允许和应当进行抨击，但对某一阶层进行嘲笑，仅仅是因为它是这一阶层而非另一阶层，则是不好和不允许的了。而我们的评论家们是在对谁进行攻击呢？他们攻击的对象不是在彼得一世和以后

① 原文为法文。

诸皇帝当政时期起家的，大多数已成为当今显贵，真正的富有、势力强大的新贵族——他们并不那么愚蠢[①]。我们的评论家们在这个新贵族面前，倒是毕恭毕敬。他们攻击的对象正是古老的贵族，古老贵族由于领地的分割，目前已成为中等阶层，即一个可敬的勤劳的文明的阶层，我们大多数文学家所属的阶层。嘲弄这样一个阶层（而且还是在官方报纸上）是不妥当的——甚至是欠明智的。我们假定，法国民主主义作家的讽刺短诗引发了“把贵族们吊到路灯上去”的呐喊，我们这类讽刺短诗虽然还不如他们的俏皮，但却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你想想看，我们这里贵族一般说来是指的什么？它同人民的关系又是如何？还要给你作些解释吗？

A：不用了，我明白了，非常明白了。看来，你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有的杂志会那样热衷地为《北方蜜蜂》辩护呢？

B：这是因为物以类聚。

A：为什么起初甚至连一些有思想、高尚的人们都认为这篇评论应当受到指责呢？

B：这是因为，在我们这里政治问题从来就是扯不清楚的。我们的一些杂志无意碰上了一个这类问题，却被他们自己造成的局面吓住了。一只巴掌拍不响，没有对立的双方就没有争论，你是搞政治的，这对你是很明白的，不是吗？我们那些民主派的杂志，对贵族进行攻击之后……

A：你又来了！……民主主义的！杂志！你真是个不怀好意的人。

B：那你又要我怎样去称呼那些宣称反对贵族的杂志呢？无论是直意或转意，它们都是民主派杂志。因而他们既然要攻击贵族，

① 原文为法文。

也就必定会遭到反击，而这个反击就来自《文学报》。这一切都极其自然，甚至还给人以慰藉。不过，政治问题对我们可能还是新闻……。

A：你知道吗？我想把我们的谈话投送给《文学报》的出版人，让他刊登出来为自己辩护。

B：这位出版人会做得很好的。对于有些非难，不论它们出自何人，不应当不加驳斥，听其自由泛滥。

论阿尔弗雷德·缪塞[①]

正当语言优美动听，但嫌单调的拉马丁在一个老题目“宗教的和谐”下写他的新的虔诚的《沉思录》时；正当了不起的维克多·雨果准备出版他光辉的虽显生硬的《东方诗歌集》(Les orientales)的时候，正当不幸的怀疑论者德洛姆以一个不断完善的新手的面孔重露头角[②]，并且在整个法国文坛都以命令宣布严格的道德风尚和礼貌的时候，一位青年诗人带着他的一本故事和歌谣集[③]，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引起了惊人的骚动。看来，缪塞是仅仅以歌颂死亡的罪孽、凶杀和通奸为己任的。充斥于他诗歌中的淫荡的画面，其生动强烈，可能还要胜过已故的帕尔尼的最露骨的描写。道德问题他不屑一顾，对于劝谕和说教，他总是挖苦嘲弄，不幸的是还做得讨人喜欢。对于亚历山大诗体（六音步抑扬格）他极为不恭，时常破坏它的规则，有时歪曲得令人吃惊和惋惜。他歌唱月亮的诗句，只有处身16世纪祥和气氛中的一位诗人才敢于写出来，那时既没有布瓦洛，也还没有拉哈尔普、雷

① 本文作于1830年秋。普希金生前未发表。首次公开发表于1855年。

② 1829年，圣·伯夫假托一个已故诗人的名字出版了自己一部抒情文集《约塞夫·德洛姆的一生，诗歌和思想》。1830年，他又匿名出版了诗集《慰藉》。参见普希金对这两本书的评论。

③ 指缪塞的第一部集子《意大利和西班牙故事集》(1829年)。

大曼以及高乃依诸位先生。这位年轻的诗坛怪杰受到了怎样的对待呢？你不禁为他提心吊胆。你以为会看到各种报刊的愤怒，以及社会对他高高举起的戒尺。结果完全不是这样。这位可爱的浪荡子的公然的顽皮，如此使人目瞪口呆，如此讨人欢喜，批评界不仅没有加以责备，反而自己出来为他辩护。批评界宣称，《西班牙故事》并不能说明什么，强盗、杀人犯也可以描写（即使初衷不在于揭示这种行当是多么不可取）——而同时仍然可以做一个善良诚实的人。还有那些生动的寻欢作乐的画面，对于一个才20岁的诗人来说，是可以原谅的。诗人的家人在读到这些诗时，肯定不会像报刊那样惊慌，并认为他是一个异端。一句话，诗歌是虚构，它与散文般的生活真实毫无共同之处。感谢上帝！尊敬的先生，您早就该这么说了。令人不解的是，到了19世纪，居然还要使早已被莫里哀嘲讽的古板拘泥复活，对于公众还要像成人对付孩子那样，不允许公众阅读那些你们自己却尽情享受的书籍，对一切东西无论恰当与否，都要贴上一些劝谕的标签。公众只会对这一套感到可笑。它对自己的监护人们恐怕连“道谢”也不会说一声的。

《意大利和西班牙故事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以其非凡的生动而与众不同。其中以《波尔西亚》一篇最有价值：夜间幽会的场景，情人由于妒忌而头发突然变得灰白的画面，一双情侣在海上的喁喁私语——这一切都无比美妙。戏剧随笔火中取栗[①] 预示着法国一位浪漫主义悲剧作家的出现。而在中篇小说《马多歇》里，缪塞是第一位把拜伦的风格用于自己完全不是笑话

① 原文为法文。

的戏谑的作品里的法国诗人。如果我们能够像那位英国诗人[1]那样去理解贺拉斯的一段话，那么我们就会同意他的意见：用体面的方式表现平常的事物是十分困难的。

① 在《唐璜》的题词"Difficile est propié communia dicere（拉丁语：平常的事物很难表达完美）中，Communia 的意思不是指平常的，而是指人所共同的（此处说的是人所共知的一般的，与虚构相对的悲剧对象。见 ad Pisones）。《唐璜》描写的对象仅属拜伦一人。——普希金原注

论人民的戏剧及剧本《市长夫人马尔法》[①]

美学自康德和莱辛的时代之后，获得了如此明晰、广博的发展，而我们却仍然停留在戈特舍特陈腐、晦涩的概念上，重复一些老生常谈：美就是对优美的自然的模仿，以及艺术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的功利性。为什么清纯的大理石或青铜雕像要比那些涂抹上彩色的雕像更受喜欢？为什么诗人更喜欢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提香的维纳斯和贝尔弗迪的阿波罗又有什么功利性呢？

逼真仍然被认为是戏剧艺术的主要条件和基础。但如果有人向我们证明，戏剧艺术的本质恰恰是排除逼真，又当如何呢？我们在阅读一本史诗或小说的时候，时常会沉入幻觉，感到书中所描写的事件并不是虚构，而是真实情况。而在颂歌和哀歌中，我们则可能这样想，诗人描述了自己一种真实状态下的真实感受。但是，在一间被分为两部分的大厅里（其中一部分坐满了观众，他们都赞同……等等）哪里会有什么逼真呢？

如果我们认为逼真就是要求服装、色彩、时间、地点方面严

① 这是普希金的一篇分析M·包戈廷的剧本《市长夫人马尔法》的文章，未完成。在引言部分，普希金阐述了自己在创作《鲍里斯·戈都诺夫》期间形成的戏剧艺术观点。此文作于1830年秋，分别发表于1830年和1842年。

格地保持一致，那么我们会看到，一些最伟大的剧作家也并不遵守这一条规则。莎士比亚剧作中的罗马扈从，却保持着伦敦市参议员的习惯。卡尔德隆的主人公科里奥南向执政官抛手套，要求决斗。拉辛的剧本里，半开化的依波利特说起话来，居然像一个有良好教养的青年侯爵。高乃依笔下的罗马人，或者像一些西班牙骑士，或者就是一些加斯科涅的男爵，而高乃依的女主人公克利特姆内斯特拉，竟由瑞士禁卫军护卫。[1] 尽管如此，卡尔德隆、莎士比亚和拉辛仍屹立于难以企及的高峰，他们的作品仍是我们研究和神往的对象……

我们应当向剧作家要求的是什么样的逼真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什么是戏剧？戏剧的宗旨何在？

戏剧产生于广场，是人民的一种娱乐形式。人民就如同孩童一样，要求趣味性和动作。戏剧能向他提供不平常的奇特的事件。人民要求强烈的感受，因而出现死刑这种刺激的场面。笑、怜悯、恐惧，是被戏剧的神奇作用所拨动的我们想像的三根弦。但笑很快就会减退，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戏剧活动的基础。古代的悲剧作家对于以笑作为戏剧的动力均嗤之以鼻。唯独民间讽刺加以掌握运用，并突破简单的滑稽模拟，获得了戏剧的形式。于是便产生了喜剧。应当指出，高雅的喜剧并不仅仅是建立在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物性格发展的基础上，这方面它同悲剧十分接近。

悲剧主要描写严重的罪行，超乎寻常的痛苦，甚至是肉体的痛苦（如：菲洛克忒斯，俄狄浦斯，李尔王）。但是，见惯不惊使感觉变得迟钝——人们的想像对凶杀、死刑逐渐习以为常，并漠然视之，而对人类激情、心灵感受流露的描写，则总使人感到新

---

① 普希金此处有误，他指的应是拉辛的《伊菲格涅亚在奥利德》第5章。

颖，引人入胜，宏大和富于教益。戏剧开始对人类激情和心灵产生引导的作用。

激情的真实，在拟定的环境中感受的逼真——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向剧作家所要求的东西。

戏剧脱离了广场，由于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要求而进入殿堂。诗人则进入宫廷。然而，戏剧仍然忠于自己最初的使命——影响群众，作用于大多数，使他们得到娱乐。但此时戏剧已放弃了通俗易懂的语言，并采用了时髦、精致的语言。

由此，在莎士比亚的民间的悲剧和拉辛的宫廷戏剧之间便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民间悲剧的作者的教育水平高于自己的观众，他明白这一点，因此他把自己自由的作品推向观众时，对自己高于观众充满自信，并可分明地预感到公众的认可。而在宫廷里则大不相同，诗人感到低于自己的观众，观众比他更有教养，至少他和他们都这么认为。他不能随心所欲和大胆地醉心于虚构。他力图揣摩这些社会地位与他不同的人们高雅的兴味。他唯恐损害这样崇高的称号，侮辱了这些傲慢的观众——由此便产生出卑怯的拘泥，可笑的已成为谚语的夸张（英雄，喜剧之王）[①]，习惯带着一种阿谀奉承的眼神去看身居高位的人，并赋予他们一种奇特的不自然的表达方式。例如，拉辛的主人公尼禄不是简单地说："我要藏在这间屋子里"[②]，而是说："隐藏在近处，我就可以看到你，夫人。"[③]阿伽门农唤醒自己的心腹，庄重地对他说道：

> 是的，是阿伽门农，是你的首领唤醒你。
> 醒来吧，认一认使你震惊的声音。

①②③ 原文为法文。

是的，是你的首领阿伽门农把你唤醒。

来吧，认识一下使你震惊的声音。①

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我们觉得就应当是这样。但是应当承认，如果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主人说起话来像一些马夫，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因为我们认为，即使达官显贵表达普通概念时也应当像普通人一样。

我无意，也无此胆识去判定这部或另一部悲剧的优劣，去阐述拉辛和莎士比亚、卡尔德隆和歌德体系的本质差异，只想尽快对俄罗斯戏剧艺术的历史作一些探讨。

戏剧在我国从来没有成为人民的需要。罗斯托夫斯基的神秘剧，索菲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女皇的悲剧，只是在宫廷和沙皇亲信贵族的宅邸演出，这些演出都是非同寻常的庆典，而不是日常的娱乐。俄国出现的第一批剧团并没有引起俄国人民的兴趣，因为他们对戏剧艺术不甚了解，对它的表现环境也不习惯。又出现了苏马罗科夫这样一个十分蹩脚的模仿者。他的悲剧充满违背常理的现象，语言生硬，矫揉造作，但因为是对巴黎娱乐方式的模仿，使人感到新奇，而受到伊丽莎白宫廷的喜欢。但这种呆板、缺乏表现力的作品，对于人民的爱好不可能有任何影响。奥泽罗夫感觉到这一点。他试图给人们一种大众的悲剧，并且认为，为此只要从人民历史中去选择题材就足够了。但他忘记了，法国一位诗人的悲剧的所有题材都是取自罗马、希腊和欧洲的历史，而莎士比亚最具人民性的悲剧都是取材于意大利故事。

① 原文为法文，是拉辛《伊菲格涅亚在奥利德》开头的几行诗。

在《季米特里・顿斯科依》[1] 之后，在《波扎尔斯基》[2] 这部尚不成熟的天才的作品之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悲剧作品。卡杰宁的《安德罗玛克》可能在真实情感的力度方面，在真正悲剧精神方面，可算是我国剧坛一部最好的作品，但也未能使谢苗诺娃之后变得沉寂的舞台复苏。

理想化了的《叶尔马克》[3] 是一部充满热烈的青春灵感的抒情作品，但不能算是一部戏剧作品。它的一切都与我们民族的风习、精神格格不入，一切，甚至令人陶醉的颇具魅力的诗歌也是如此。

喜剧要走运一些。我们还有两部讽刺剧[4]。

我们没有大众的悲剧，原因何在呢？不妨先探讨一下，它是否可能产生？我们知道，人民大众的悲剧诞生于广场，逐渐成熟，然后被引入贵族社会。而我们这里情形则正好相反。我们想要让宫廷诗人苏马罗科夫的悲剧屈尊进入广场——但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

我国的悲剧是依照拉辛悲剧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它能够摆脱自己的贵族习性吗？它怎样才能把自己四平八稳、一本正经、拘于礼数的对话转变为人民大众情感粗鲁畅快的抒发和广场式的自由议论呢？它怎样才能摆脱奴颜婢膝，怎样才能不受它已习以为常的规则的约束，不竭力使俄罗斯的一切去迎合欧洲，而走自己的路呢？它在哪里？向谁才能学到人民大众都能懂得的语言呢？人民大众情绪如何？人民大众的心弦如何？悲剧在哪里才能得到共鸣——简而言之，观众在哪里？大众在哪里？

但我国的悲剧要面对的不是大众，而仍是那个有局限的小圈

---

① 《季米特里・顿斯科依》，奥泽罗夫的悲剧（1807）。

② 《波扎尔斯基》，克留科夫斯基的悲剧（1807）。

③ 《叶尔马克》，霍米亚科夫的悲剧（1829）。

④ 指冯维辛的《纨袴子弟》和格里鲍耶多夫的《聪明误》。

子，而且会使这个圈子高傲的习惯受到侮辱；它要听到的不是共鸣、回响和掌声，而是一些琐细的纠缠不休的批评。它而前将会矗立起难以逾越的障碍，而为了搭起展示自己的舞台，它必须去改变、推翻许多世纪形成的风俗习惯和观念。

然而，在我们面前，大众悲剧的经验……

在开始评论《市长夫人马尔法》之前，我们应当感谢它无名的作者所作的辛勤的劳动——这是真正天才的保证。作者创作这部悲剧不是出于去满足渴望短暂成就的自尊心，也不是为了取悦不仅对浪漫主义戏剧毫无思想准备，甚至还坚决为其发展设置障碍的一般读者群。[①]这部悲剧完全是作者出于内心强烈的信念，全身心奉献给独立自主的灵感，在离群索居的劳动中写成的。在我国文学当前的状况下，没有这种献身精神是无法写出真正值得注意的作品的。

《市长夫人马尔法》作者的意图，是要展现一段在建立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历史事件：诺夫哥罗德的陷落。历史为作者提供了两位伟大的人物。第一位——伊凡，卡拉姆津对他令人生畏、冷酷的威严，已作过描绘；第二位是诺夫哥罗德，他的特征尚需考证。

剧作家应像命运一样公正，应当以对真理深入严谨的探索和青春、热烈生动的想像所赋予他的真诚，去推写一个行将灭亡的特权阶级的反扑，和为在广阔的基础上奠定俄罗斯国家而周密策

① 这里就更不用谈报刊了，它们的判决不仅对公众有决定性影响，甚至对于作家本身也是如此。作家们虽然蔑视这些报刊，但对它们刊登的嘲弄、谩骂却心存畏惧。——普希金原注

划的一次打击。作者不能玩弄小聪明，偏向一方，牺牲一方。在悲剧中说话的不应当是他，不是他的政治观点，不是他隐匿的或明显的倾向，而应当是已往时代的人物，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偏见。作者的任务不是去辩护、责难和作某些提示。他的任务在于真实地再现已逝的时代。《市长夫人马尔法》的作者是否满足了这些基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呢？

我们的回答是：满足了。如果说并非全书都是这样，这并不是他的愿望、信念和良知出现了问题，而是因为人性总不是那样完善。

伊凡充满了整部悲剧。他的思想带动整个剧情的发展，全部情绪和动作。第一幕中，诺夫哥罗德知道了他觊觎霸权的野心以及他出乎意料的军事行动。这个消息所引起的愤怒、恐惧、分歧、惊慌，已让人感到伊凡的威力。甚至他还没有出现，我们已同马尔法一样，感觉到似乎他就在面前。诗人又把我们带到莫斯科一方的阵营，来到愤怒不平的大公、大贵族和军事领袖之间。在这里，关于伊凡的思想主宰一切，支配着所有别的思想，所有的情绪。在这里，我们也可看出伊凡统治的强大，封地大公们压抑的反抗情绪，伊凡给他们带来的恐慌，以及对伊凡无限权威盲目的相信。大公们自然而清楚地明白他的行动，预测和阐述他崇高的意图；诺夫哥罗德的使臣们等候着他的来临。约安出现了。他对使臣们的讲话，证实了诗人已使我们产生的印象。冷峻、坚定的决心，强有力的责难，佯装的宽宏，狡猾的诉说，我们听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伊凡的声音，我们了解到恢宏的统一国家的抱负，感觉到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诺夫哥罗德通过自己的使臣对他作了回答。何等富于戏剧性的场面！何等符合历史的真实！对于一个俄罗斯特权城市的外交手腕捕捉得何等准确！伊凡并不在意他们

正确与否。他提出自己最后的条件，同时又为决战进行准备。但是精明的约安并不单靠武器来行动，对方阵营的背叛也助了他一臂之力。伊凡同虚构的波列茨基的一幕，在我们看来是经不起推敲的。诗人不愿过分贬低诺夫哥罗德的叛徒——由此而产生波列茨基的言语傲慢，以及约安的缺乏戏剧性的（亦即不真实的）宽容。有人会说，约安容忍波列茨基，是因为用得着他——这是事实。但在他面前，波列茨基恐怕不敢忘乎所以，这个叛徒大概也不会用诺夫哥罗德人放肆的语言去说话的。然而，伊凡却是何等沉着、完整地发挥了自己关于统一国家的思想！——应当指出，坦率、直爽——这才是这位统治者的魅力所在，也是他应有的特征。伊凡的最后一次讲话：

> 俄罗斯的贵族们，
> 领袖们，大公们……

我们以为不符合伊凡统治的精神。他用不着去鼓动他们的战斗热情，不用对他们解释自己行动的原因。“不用多说了，”他只须这样去讲，“明天就要战斗，准备好吧。”

我们已经了解了伊凡的意图，他的思想，他坚强的意志，暂时同他分别，当我们再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沉默着进入臣服于他的诺夫哥罗德。历史留传下来的约安的命令，在悲剧里也没有任何添枝加叶，没有作任何解释地原样保留下来。马尔法曾向他预言他家庭的不幸，他宗族的毁灭。对此，他回答道：

> 天意难违！如今大业已成，

我的心平静如水。

这就是伊凡的形象，这个形象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几乎每一细节都始终一贯。在刻画这个形象时，悲剧作者没站得低于自己的对象。他清楚准确地了解自己刻画的人物，非常了解，并且把这个形象不加任何戏剧性的夸张，没有任何背离常情之笔，也没有作任何招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巴拉丁斯基[1]

巴拉丁斯基属于我国优秀诗人之列。他独具一格，因为他善于思考。他在任何领域都会独具一格，因为他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思考，不受拘束而正确。他的诗歌和谐，文笔清新，表达生动准确，使任何一个稍有鉴赏力和审美感的人感到惊奇。除了他优雅的哀歌，以及人们极为熟悉和偶尔不成功的模仿的一些小诗，巴拉丁斯基还著有两部小说，如果是在欧洲，它们会给他带来荣誉，但在我国只是受到一些行家的注意。巴拉丁斯基第一批青年时代的作品曾受到热烈的欢迎，后来的更为成熟，更接近完美的作品，在读者中却反响不大。我们尽可能来说明一下其中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应当是巴拉丁斯基作品本身更趋完美和成熟。当诗人还是 18 岁的时候，他的观念、情感，与每个人都是共同、接近的。年轻的读者能够理解他，并且在他的作品中看到表现得如此清晰、生动、和谐的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但是岁月在流逝，年轻的诗人在成长，他的才能不断增长，观念有了升华，情感也在发生变化。而读者还是那一些，只是他们的内心变得更为冷漠，对生活的诗意更加无动于衷。诗人同他们距离逐渐拉大，最后完全同他们脱离了。他为自己而创作，如果有时也发表一些作品，遇

---

① 本文大约于 1830 年 10—11 月间为《文学报》而作。普希金生前未发表。

到的只是冷淡和不理解，只有在一些像他一样孤寂和被人遗忘的诗歌爱好者的心中，他才找得到对他的诗歌的回响。

第二个原因是批评和社会舆论的缺乏。在我们这里，文学还不是人民大众的一种需要。作者的名声是从一些同文学不相干的状况中获得的。公众极少对他们加以关注。读者层十分局限，他们通常都受杂志的操纵，这些杂志评论文学就如同评论政治经济学，而评论政治经济学时又像在评论音乐，也就是说，不假思索，凭道听途说，自己没有任何合理的规则和文学批评的知识，而且大部分还是从自身的考虑出发。巴拉丁斯基作为这些杂志冷落的对象，从来没有为自己辩解，也从来没有对报刊上的任何一篇文章作过回答。的确，要在没有明显非难的情况下，为自己辩护是相当困难的，而从另一方面看，蔑视那种幼稚的恶意和粗野的讪笑却相当容易，然而他们的评判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个原因——巴拉丁斯基的讽刺短诗，这些独具匠心，堪称典范的讽刺短诗，对俄罗斯诗坛领袖们从不留情面。我们的诗人从未屈尊参与报刊论战，一次也没有同我们博学的评论家们短兵相接（虽然他具有非凡的辩才），但却禁不住要在这些短小、辛辣、有趣的讽刺诗里强烈地表达出自己的见解。我们不能因此而责备他。如果没有这些讽刺短诗[①]，反倒非常遗憾了。

对自己作品命运的这种漫不经心，对在出版界或公众中的成功和他们的赞扬所表现出的一贯冷漠，在诗人身上是很突出的。他

① 法兰西诗学定义的讽刺短诗，Un bon mot de deux rimes orné（法语：双韵诗），已经过时了，它像所有的俏皮话一样，一开头都曾产生生动的效果，但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作用。相反，巴拉丁斯基的讽刺短诗则不是那样，诗中的讽刺思想一会儿采用童话，一会儿采用戏剧的手法；发展得更加自然、有力。作为俏皮的语言，它使我们发出会心的微笑，但我们也把它作为艺术作品反复捧读。——普希金原注

从不战战兢兢去迎合流行的口味和昙花一现的时髦的要求，从不为追求作品的效果而采取招摇和夸大的手法，他从不轻视成效甚微、不受人注意的劳动和艺术加工、严谨准确的劳动，他从不跟在某个红极一时的天才后面亦步亦趋，拾其牙慧。他走的是自己的路，而且不受任何拘束。现在是他占据文坛本应属于他的位置，跻身于茹科夫斯基之侧，高于《守护神和塔夫里达》的作者的时候了。

请读一读他的《埃达》(我们的批评家认为它毫无价值，因为他们要求长诗也要有事件)，读一读这部清纯动人的故事吧！您会发现作者以何等深沉的情感，描绘少女的爱情。请看看在同精明的诱惑者初吻之后的埃达吧。

她本想举起责备
甚至愤怒的目光，
但眼神里却没有愤怒，
她天真无邪的眸子里，
闪烁着欢乐的光辉。

她像一个孩子那样爱着，他的礼物使她欢欣，她同他嬉戏玩耍，无忧无虑地接受他的抚爱。但时间在流逝，埃达已不再是天真的孩子。

在你玫瑰的岩石上，
春天顽皮地显露出笑脸，
苔藓呈现出一片新绿，
鸟儿开始欢快地歌唱，

顺着花岗岩的河床，
溪水奔腾，闪着耀眼的银光，
清晨，从东方的森林，
飘来阵阵芬芳的清凉；
在山那边的山谷里，
已是春意盎然，百花争艳；
稠李馥郁的芳香，
在清新空气中飘荡：
神奇的春天的温馨，
对你是充满危险的诱惑。
不要去听鸟儿甜蜜的歌唱！
一梦醒来，站立在门廊上，
也不要把你的脸，
去偎依晨曦的清凉……

多么华丽、富有特点的描写！整段诗充满何等的温情！埃达坠入情网了……

一篇论述俄国文学的文章的提纲[①]

对既往的尊重——这是区别有教养和愚昧的标志。游牧部落没有历史，也没有贵族阶层。

在研究我国文学的时候，我们想带着景仰、好奇的心情，对它古老的文献作一回顾，并把这些文献同充斥着中世纪欧洲文学的无数模仿英雄史诗的，爱情的，朴质的以及讽刺性的长诗和浪漫诗作一些比较。

从这些初期的精神创作活动来观察我国人民的历史，将斯堪的纳维亚人占领的影响同摩尔人占领的影响作一些比较，必定是十分引人入胜的。我们就会发现法国 trouveuvs（11—14 世纪法国北部一种抒情诗）单纯的讽刺同我国古代流浪艺人狡猾的嘲弄的区别，以及半宗教式的神秘剧中的粗俗逗笑同我国老式喜剧的噱头的差别。

但是遗憾的是，我国古代文学已荡然无存。我们以前的文学是一片黑暗的荒漠，在这个荒漠上矗立起的唯一的一座纪念碑是《伊戈尔远征记》。

---

① 这是 1830 年写的一份提纲草稿，当年未进一步展开论述。直至 1834 年在《论俄罗斯文学之贫困》一文中，普希金才重新探讨这个问题。1855 年首次发表。

我国的文学是在18世纪突然出现的。这极似俄国贵族的出现，没有祖先，也没有谱系。

关于《努林伯爵》的札记[①]

1825年末我身居乡间，在翻阅《鲁克丽斯受辱记》（莎士比亚的一篇相当差的诗作）时，我忽然生出这样的感想，如果鲁克丽斯想到给塔（昆尼）一记耳光，结果又会如何呢？也许这一记耳光会使他的欲火冷却下来，并羞愧地退开去？鲁克丽斯也就不会举刀自刎了，普布利科拉[②] 也就不会气急败坏，布鲁托斯也就不会驱逐皇帝，于是世界和世界的历史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因而什么共和、执政、独裁者、卡图努斯、恺撒等的产生，都应归功于诱惑的冲动，就像前不久在我的邻县诺沃尔热夫斯克发生的一次事件一样。[③]

于是我产生了模仿莎士比亚这段故事的念头。我无法抗拒这双重的诱惑，用了两个早上就写成了这篇小说。

我习惯于在手稿上注明写作的年、月、日期。《努林伯爵》的写作时间是12月13—14日。世上的事有时会惊人地相似。

---

① 作于1830年，1855年首次发表。

② 莎士比亚的史诗中并没有普布利科拉（普布利亚·瓦列里亚）这样一个人物，这个名字只是在史诗之前的一个简短内容中提到过。看来，普希金指的是鲁克丽斯的丈夫柯拉廷纳斯。

③ 诺沃尔热夫斯克县事件，据同时代人的传说，是指阿历克塞·沃尔夫追求一位牧师女儿的艳事。

纳肖金札记[①]

（纳肖金口述于1830年，莫斯科）

我记忆中关于童年最早的一件事是：在一座宽阔的地主宅院里，我坐在一堆沙子当中（当时认为这是治疗佝偻病的最好方法）。我的周围是一群奶娘、嬷嬷，还有16个随时准备好轮流用一辆小推车把我飞快地从上房送到下房或是乡村集市上去的小厮。我还记得家父的一些事情。有一回，他决定上彼得堡去。大院里集合了一支庞大的车队，整装待发，门廊上满是人，什么骠骑兵、扈从、穿制服的仆人、侏儒、黑人、身着古式制服的退伍少校等等。父亲披了一件绿色大氅，在这些人中间十分显眼。一辆双轮轻便马车驶到门廊边。我被领到父亲跟前同他告别。他本想带着我一道走的，可是我哭了起来，我舍不得我的奶娘。父亲不高兴地把我推开，坐上车，就动身了。整个车队也跟着出发了。院子突然变得空荡冷清起来，家人们也都各自散去。从那以后直

① 纳肖金（1801—1854），同普希金相识于1818年，但他们成为至交则是在1826年普希金自流放地返回之后。普希金每次到莫斯科，通常均下榻于纳肖金家。这篇札记是纳肖金讲述的记录，但未完成。后来，1836年，根据普希金的建议，纳肖金自己动手写这篇札记，并交普希金进行文学加工，但最终也未完成。关于纳肖金的札记，普希金曾在《对暴乱的看法》一文中提到过。这篇札记首次发表于1841年。

到我10岁前的印象都已淡忘和模糊了。

这时情况有了变化。不过我还是先来谈一谈我的父母。我的父亲沃因·瓦西里耶维奇，曾官至陆军中将，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一位风云人物。他身材矮小粗壮，性格傲慢暴烈。传说中保留下来的几件轶闻会有助于对他的了解。在一次远征军事行动中，他战功卓著，但他却谢绝了一切奖赏，只是请求允许自己和许多下属休假。获准之后，他便同他们去了乡下。他们在那儿打猎行乐，一连住了几个月。而在此期间，战事又起。但这次立下战功的是苏沃洛夫。我父亲回到部队时，看到苏沃洛夫已经挂上了亚历山大勋章绶带。“啊，沃因·瓦西里耶维奇老弟，”苏沃洛夫指着自己的绶带对他说，“你在撵兔子的时候，我也为自己逮着了一只小红兽。”这个玩笑对本来就感到十分沮丧的父亲来说，简直是侮辱。他忍不住给了苏沃洛夫一记耳光，作为对他讽刺的回报。苏沃洛夫顿时气急败坏，冲了出去，坐上一辆驿车，直奔彼得堡，跪倒在女皇的脚下，控诉我的父亲。可能，女皇为了息事宁人，就劝说他不要再追究了。过了一段时间，女皇颁发诏书，授予我父亲格奥尔基勋章。诏书中说道，一位勇敢的军人，由于对另一位勇敢的军人的不敬，而失去他本应得到的奖励，但由于A·B·苏沃洛夫亲自请求，特授予此枚勋章。我的父亲没有接受这枚勋章。他说，除了自己，他不想对任何人感恩戴德。总的说来，他不仅从不承认有人高于他，也从不承认有人能同他平起平坐。波将金公爵说过，他（我的父亲）对上帝虽然虔诚尊敬，但仍然像对待下级军官一样。因此，当他还是少将时，上帝在他眼里只是一个旅长。波将金还说，当我父亲被升为中将时，你瞧吧，就连上帝在纳肖金心目中也进入第四等，成了体面的人了！一次，他被任命为驻扎在基辅省一个军的指挥官。到任不久，他便在城郊设宴招待全体军官和市政官员们。基辅市的城防司令一看席间觥

筹交错，无度地狂饮起来，便悄悄地溜走了。我父亲发觉城防司令不辞而别，不禁勃然大怒。他从桌旁跳了起来，命令全军集合，并亲自率领部队向基辅进发。一时枪炮声大作，全基辅没有剩下一扇完好的窗户。城市被攻占了，我的父亲押着他的俘虏——擅自从宴会逃跑的城防司令——胜利回营。保罗一世登基后，父亲退出军役。他对皇上解释退伍的原因："陛下性急，微臣性急，君臣恐不易共处。"皇上表示同意，并赏赐沃罗涅什省庄园一处。父亲过着优裕闲散的日子。从他出行的方式便可见到他日常生活的一斑。每次他要出门去什么地方，总是要求全家同行。走在队列最前面的是手执圆号、骑着一匹西班牙纯种高头大马的波兰人库利科夫斯基。他是因为那只长长的鼻子才得到库利科夫斯基的绰号的。他在我们家的职责是：每逢赶集，骑着骆驼去向农民们展示神灯。一路之上，他就用那只圆号发出休息和行进的信号。他的后面就是我父亲那辆双轮轻便马车（车后还跟着一辆双座四轮轿车，以备不时之需），驭手座下方是他宠爱的丑角伊凡·斯杰潘尼奇的座位。接下来是一串坐着我们全家，我们的夫人们，教师，奶娘，马车等等。之后是一辆长长的带有栅栏的平板车，上面装着 13 个小丑、黑人和侏儒，接着还有一辆同它完全一样的平板车，只不过是装着一些生病的细腿猎犬。然后是一只巨大的号角音乐八音盒，16 匹马驮着的吃食。最后是一辆载着卡尔梅克式帐篷和各种家具的平板车(因为父亲总是安排在露天宿营)。你就想想看，这么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该有多少人，多少乐手、厨师、饲养猎犬的以及各样的下人。

父亲的亲信之中有两个人应当特别提一下，他们是小丑伊凡·斯杰潘尼奇和黑女人马丽亚。这位黑女人是我父亲的贴身侍仆，身材高大，脾气极大，经常同我父亲交手打斗，但父亲却从不对她生气。伊凡·斯杰潘尼奇可是一位历史性的人物。他是以

“纳肖金家的小丑”而出名的。波将金一向讨厌丑角。他听到过许多伊凡·斯杰潘尼奇逗笑的故事，一次他同我父亲打赌说，小丑不会把他逗笑。于是，就把伊凡·斯杰潘尼奇叫来了。波将金吩咐把他带到窗下，命令他把自己逗笑。这个局面相当尴尬。伊凡·斯杰潘尼奇开始滑稽地模仿苏沃洛夫的样子，这迎合了波将金对苏沃洛夫隐秘的不友善心理。波将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立刻把他叫进房去，从此同他难舍难分。保罗一世对他也十分宠爱，伊凡·斯杰潘尼奇甚至可以在皇上房间里随意坐下。他的笑话极得皇上的欢心。有一次，皇上问他，“面包师能生产什么?”“小面包、面粉、花面包、面包干等等。”这个小丑回答道。“那么，库塔依索夫伯爵能产生什么呢?”皇上问。“刮脸刀、肥皂、皮带等等。”“那么，朕又能产生什么呢?”皇上又问。“仁慈、慷慨、官爵、绶带、法律、幸福等等。”皇上大悦，他从办公室走出来，对围绕着他的近侍们说：“宫里的空气也有传染性，你们想想看，连傻瓜也会奉承我了。再说一遍，傻瓜，朕能产生些什么?”——“你呀，皇上，”傻瓜突然发起火来，回答道：“你能产生糊涂的命令、皮鞭、西伯利亚，还有……。”皇上勃然大怒，他认为小丑如此大胆放肆，是受人支使，他要知道此人究竟是谁。伊凡·斯杰潘尼奇于是罗列了一串他所知道的权臣们的姓名。他立刻被抓了起来，装进一辆马车，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直到雷宾斯克市，他才被释放回来。亚历山大在位时，他也曾因为无礼放肆而被逐出彼得堡。他是六年前去世的。

我的母亲从某一方面来说，也同我父亲一样出众。她出身于涅利多夫家族。我的父亲有一次打猎迷路，来到涅利多夫府上，立刻爱上了他的女儿，而且第二天就举行了婚礼。母亲是一位具有非凡才智的女性。她懂得多种语言，其中有希腊语。英语是她在60岁时学会的。父亲深爱着我的母亲，但对她管束极严。父亲的

怪癖，使她吃足了苦头。例如，母亲惧水，父亲便在风雨天同她乘上一条小渔船在伏尔加河上顶风斗浪。有时，父亲为了使她习惯军旅生活，让母亲骑在大炮的炮筒上面，然后点燃导火索开炮。直到古稀之年，母亲仍然保持着贵族夫人的仪态。我还没有见过比她更有风度的老太太。

我的姐姐比我大几岁。她非常漂亮，就是在莫斯科也是公认的美人。我同弟弟是在家里接受教育的。我们家有一大群老师，外国教师和侍候我们的仆人。他们当中有两位特别使我难忘。一位是古板拘泥、扑了香粉的法国人，非常有学问。他是腓特烈二世的朋友，还同他一起表演过长笛二重奏。而另一位则是我头一回烂醉如泥的罪魁。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的功课时间太长，我感到十分厌倦无聊，在老师过问我弟弟学习的时候，我偷偷走过去，把两支蜡烛都吹灭了。我的母亲不在家里，恰巧整个屋子里除了这两支蜡烛，就没别的灯火了。而仆人们像平常一样都走了，老师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们，好不容易才点燃了蜡烛，好不容易才抓住了我。为了惩罚我的顽皮，他把我关进一间下屋里。凑巧这里放着各式各样的吃食。我真是说不出的开心，我首先发现了葡萄干和无花果，立刻便吃了个痛快。我还摸到一只四棱短口玻璃瓶。我打开瓶塞，用舌头舔了舔瓶口，味道十分香甜，接着又喝了几口，这东西挺让我喜欢。我又喝了不少，很快就瘫倒在地上了。这时候，我的母亲也回家来了。教师对她讲了我的恶作剧，并同她一起来到下屋。他们还能把我弄醒吗？我面色苍白，摇摇晃晃想要站立起来。地上是打碎了的酒瓶，我浑身就像《危险的邻居》里拉皮条的潘克拉蒂耶夫娜一样散发出酒味。我的母亲啊呀叫唤了一声……。第二天，我很迟才醒来，头疼难忍，模模糊糊还记得头晚发生的事情。我向窗外望去，一辆大车上堆满了我的老师的行李。奶娘对我说，因为这位老师把我关在下屋里，我母亲把他给打发了。

我们那些被称为贵族的作家们……[1]

我们那些被称为贵族的作家们养成了一种于文学极为有害的习惯：对批评不作回答。他们极少对批评作出反应并让公众了解自己的观点，而即使这样作了也并非为了自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们是真的藐视文学界的同行，或是认为自己的确就是贵族呢？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一些报刊称他们为贵族，是出于戏谑和讽刺（见《北方蜜蜂》、《北方墨尔库里俄斯》等等）；而如果他们也如同那些有良好教养的正派人们一样属于一个良好社会的话，那么就应当另写一篇同文学没有任何关系的专文了。

有一位贵族（我们仍然从讽刺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词）为自己辩解道，一个尊重自己和社会舆论的人认为，同某些人发生瓜葛是有损体面的，决斗与斗殴是不同的，再有，如果有人不愿同某人讲话，那么，谁也没有权力要求他去这么做。但这些都算不上是有力的借口。你如果走进一家小酒馆，那你就不要因为在那里听到的话生气——什么人说什么话嘛；如果在街上有人向你扔污泥，你不去揍他，而是提出同他用长剑决斗，那么未免太可笑了。如果有人要同你交谈，你却以沉默对之，从你的一面来说，这是一个善良的基督徒所不应有的傲慢和对人的轻侮。

① 作于1831年。同《致〈文学报〉出版者的一封信》等文相关。

对一些评论之评论[①]

我们有一些作家把俄国的杂志看成人民教育的代表、社会舆论的指南等等，并因此要人们给予这些杂志以《争鸣》和《爱丁堡评论》所受到的那种尊敬。

请先弄清词义，笛卡尔如此说。“杂志”一词在欧洲公认的含义是：反映一个党派的主张，由一些以知识、才智著称的人出版，并具有自己的政治方向和对事物产生影响的定期发行的小册子。杂志发行人阶层乃是国务活动家的摇篮——他们自己对此是很清楚的，因此在着手操纵社会舆论时，他们也担心因不诚实、草率唐突、贪图私利或是放肆无礼而降低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由于竞争日益剧烈，无知和庸庸碌碌不可能掌握杂志的垄断地位，没有真正才华的人也不可能经受住出版的考验。

请看一看，以上两份杂志在法国和英国是由谁出版的呢？在法国是夏多布里昂、马提尼克、佩罗纳，而在英国则是杰弗里、皮特。这同我们的那些杂志和杂志出版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我以我们文学家的良心来作证）？请问，《北方蜜蜂》有什么权利来指导俄国公众的舆论，《北方墨尔库里俄斯》又有什么样的号召力呢？

① 作于1831年。

圣·伯夫的两部诗集[1]

《约塞夫·德洛姆——生平，诗歌和思想》，
1829年，巴黎（1卷集，16开本）。

《慰籍——圣·伯夫的诗》，
1830年，巴黎（1卷集，18开本）。

两年前以《约塞夫·德洛姆——生平，诗歌和思想》为名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引起了巴黎评论界和公众的注目。书中没有序言，只用浪漫主义的文笔叙述了，如人们所说，死于贫病交加的一位不幸的年轻诗人的生平。已故诗人的友好向公众呈献这些在他文稿中寻获的诗歌和感想，对其中的不足以及德洛姆本人的迷误，则以他的年轻、病态的心理和肉体所遭受到的苦难予以体谅。诗歌显露出由于选材独特而鲜明反映出的非凡的才华。还没有人用任何一种语言能对苦闷作出如此准确的表述，也从来没有人对听命于情欲摆弄的令人怜悯的青春的迷误作过如此绝望的表白。眼望着被茂密枝叶遮掩的溪流，德洛姆想到的却是了此一生。他是这样想的：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对这两部诗集的评论载《文学报》1831年第32期。所引诗歌原为法文。

对于想要投水自尽的人，这地方十分方便，
任何一天，你只消来到这里，
把衣服藏在这棵白桦树后边，
然后，做出洗澡的样子，浸入水中。
但是，不要像疯子那样匆忙，
而是悠闲地环顾四周，凝望着
叶片上和水面的余晖，从容蹲下，
然后，你会突然感到一阵气紧，
四肢僵硬，那时，不要迟疑，
埋下你的头，永远不再抬起。
当我想要死去，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方式。
我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哭泣，忍受着苦难，
在我就要走完生命的路程时，
也像我活着时一样，没有一颗心
同我的心一起跳动，
但愿我死时也是这样——无声无息，
没有喧闹，没有喊叫，没有围观的邻人。
云雀将死，藏身于燕麦丛里，
当夜莺感到歌喉日渐无力，
寒风阵阵，羽毛渐稀，
它会像林间的回声，悄然消逝，
我也想要这样消失，只是要再过一两个月。
可能，在一年后的一个黄昏，
一位寻找迷途山羊的牧人，
或是一位走到河边的猎人，
会发现他的猎犬急冲向前，又狂吠着

回到他身边。
他举目望去，月儿也同他一道观看，
它惨白的光线落在这具尸体上，
他毛骨悚然，头也不回，向村里狂奔。
凌晨，几位当地的居民来到这里，
拉着这无名尸体的头发
把裹满泥沙的尸体拖到岸边，
他们会久久地议论如何处理我的尸体，
时而给荒诞的传说添加一些插科打诨。
终于，他们用推车把尸骸送到墓地，
草草把它钉进一副朽烂的棺木，
神父在上面洒过三遍圣水，
然后就把我留在那里，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姓名。

德洛姆的朋友维克多·雨果喜添贵子，他赋诗表示祝贺：

我的朋友，你又成了一个新生儿的父亲，
这是上天恩赐给你的又一个男孩，
他的出世只让他的母亲发出几声呻吟，
他可爱，清新，向着这苦难的人生露出欢乐的笑靥。
夜，我眼前似乎出现了你们全家的情景：
玫瑰色的婴儿在母亲雪白安详的胸脯上沉睡，
而你这个父亲，坐在炉边度过这不眠之夜，
你低垂着头，陷入沉思，不时地，
转过身去，仅仅为了多看一眼——啊！多么幸福！——
新生儿，他的哥哥，姐姐，还有母亲，
就像一个牧人为新生的羊羔无比欢欣，

就像一个庄稼汉在傍晚数着谷堆。
在这庄严的时刻，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
除了你，朋友，还有谁懂得你心的深邃，
有谁能懂得你无言的抚爱和眼泪，
温柔之中流露出的人类精神的瑰宝，
比巢中白鸽还要惆怅的雄鹰的叹息，
从花岗岩绝壁滚落的山泉，
还有挪威夏日照射下冰山融化
形成的无数涓涓溪流？
愿你生活幸福，有朝一日为我们诵唱
这无法言表的爱的超凡奥秘。

此时，我也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但不是在玫瑰花一般孩童天蓝的帐幔旁，
也不是在受到祝福浇灌的喜床边，
而是守候在一个死者的灵床前，
他是我的邻居，一位患痛风病的老人，
——肝脏结石夺走了他的生命。
他的侄女召我来到这里，
从晚上九点，我便独自守在他的灵前。
床头，一副黑色的木十字架（上面
还镶嵌着一个骨质耶稣受难像）
竖立在两支蜡烛中间，
旁边椅子上的盘子里浸着一支
对信徒至为珍贵的黄杨，我看见
死者在被单下直挺挺地躺着，
双脚并在一起，两手交叉放在胸前。

啊！真希望老人生前我就同他相识！
真想要吻一下他蜡黄的额头，同他告别！
如果我一直凝视着他僵直的肢体，
也许最终我会看到有一个东西
像小憩的人的脚一样微微伸屈，
蜡烛的火焰变成蓝色！我真想听到
灵床嘎吱作响，我真想祈祷！
但是什么也没有出现：没有神秘的恐惧，
　　也没有温情的回忆；
我似乎视而不能见，听而不能闻。
挂钟缓缓报出时辰，这难耐的寂静，
　　这愚蠢的梦幻使我精疲力尽，
我走到窗前，想吸取一些新鲜空气。
午夜的天空刚显露出一钩新月。
突然，在远处房屋的上空，
而不是在东方，迸发出朝霞般的红晕，
传进我耳鼓的不是歌声，
而是火灾中惊恐的犬吠声。

在这些病态的自白之间，在这些可悲的缺乏毅力的幻想之间，在这些对老隆萨早就受人嘲笑的诗歌俗气的模仿中，我们吃惊地看到充满清新、纯真感的诗。请看，他是以何等忧伤的美来描述自己的缪斯的！

不，我的缪斯不是长着乌黑长发，
天女般椭圆的眼睛，袒露着乳房，
和着尖厉的歌唱狂舞的珠光宝气的宫女；

不是洋溢着青春活力，有如玫瑰的佩里女神，
她闪光的翅膀使美丽的孔雀尾也会黯然失色；
也不是白翅膀和蓝翅膀的菲亚，
这两位情敌姊妹能使双目失明的孩子
重新看到天空和世界，只需他说一声：愿意。

她——啊，我的缪斯！——
不是一位恬静的处女，或号哭的孀妇，
一所荒凉的修道院或城堡唯一的住户。
她没有扈从，独自在拱门下漫步，
口中念着一个人的名字，走进骑士的墓室。
她屈膝跪拜，天鹅绒长裾铺撒在石板地面，
她的额头低垂到大理石灵柩上，
悠扬婉转地哭诉自己高洁的不幸。
不，——当你的悲愁孤独地在林间徜徉，
你是否注意到林子深处，一棵枯萎的树下
有一间茅屋？一泓清水从屋边流过。
一位年轻的姑娘在那里浣洗破旧的衣衫。
或许，当看到你的时候，她会埋下头来，
因为，尽管十分贫穷，她也是出生在一个清白的世家。
如果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她也会
同别的少女一样，倾倒上流社会，
如同一朵鲜花为爱情而盛开，
她也会乘着马车飞驰，参加游园和舞会，
她也会在阳台上倾听表达爱慕的歌唱，
或是用自己金色的竖琴去撩拨千百个倾慕者的心，
只是为着在无尽的掌声中看到知己的笑容。

但是上天对她一开始就摆出阴沉的脸，
她像一棵树苗，一出土就遭到冰雹的摧残，
缝衣，纺线，伺候年迈力衰，双目失明，
癫狂的父亲，成了她生活的唯一内容。

的确，他是以对痨病的医学描述来作为这幅优美画面的结尾的。他的缪斯咯着血：

……撕扯着心肺的咳喘
打断了她的歌声，把它变成喘息和呻吟，
从她病弱的胸膛挤压出鲜红的粘液。

在我们看来，整个作品中，下面的一首哀歌可说是完美之作，它完全可以同安德列·谢尼耶最好的作品媲美。

她在我心目中总是那样沉稳，矜持，
当她还是个孩子，就已经深明事理，
很少参加无忧无虑童稚的游戏。
当她的妹妹在草地上追逐奔跑，
是她首先向她们提醒，
回家的时间到了，
她已经听到教堂的钟声；
她提醒她们，不要走近水渠，
不要惊吓灌木丛里的驯鹿，
玩耍时不要靠近鸟笼。
妹妹们都乐意听她的吩咐。
转眼之间她已经到了十五岁花季，

除了过人的聪慧，她又增添了许多魅力：
微微隆起的胸部，沉静的额头，
深色秀发环绕的玫瑰花一般的脸庞，
文雅的双唇带着含蓄的笑意，
沉着，富于见地的话语令人欣喜，
温和，平静，却是坚定的声音，
还有几乎相连的漆黑的柳眉。
对家庭的责任感使她总是尽心尽力，
她举止持重，有度，从不忘乎所以。
她不像一般的少女那样充满幻想，
不像她们心不在焉地搁下手里的针线，
冥想着昨天和明天的舞会，
那位曾握了一下她的手的翩翩少年。
从来也没人见到过：她忘掉手中的女红，
双手撑住窗台，透过茂密的枝叶，
凝望着夕照下断续飞驰的云霞，
然后，突然用头巾捂住绯红的脸。
不，她总是告诫自己，明天的幸福
已随父亲的去世而完全改变，
作为长女，理应挑起全家的重担。
这颗年轻克己的心还没有尝到
使多少天真少女憔悴，神魂颠倒地惆怅。
这颗心总是把油然而生，使人怦然心动的
忧郁，令人心醉的不安，
模糊的愿望，以及混沌的躁动——
这些爱情的天然盟友全埋藏在深处。
她完全克制住自己的情感，即使

在拥抱母亲那温馨的一刻，她也说“您”。
游手好闲的青年虚假的奉承，
浮华的词句对她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当一颗受伤害的心向她倾诉不幸，
她明晰的额头会立刻布满阴霾，
她会像一个年轻的母亲同他恳谈，
苦难的生活，人间的不幸，并提出建议。
如今，她自己也成了妻子和母亲，
不过是出于理智，而不是爱情，
衡量她幸福的尺度只是尊敬，
她的丈夫已不年轻，可以做她的父亲。
她没有品尝到蜜月的浓情蜜意，
燕尔新婚的喜悦如昙花一现。
她的双眼和额头隐含着纯真的秘密，
但对此一个女人应当保持缄默。
她同从前一样地幸福，她使自己的生活
适应新的家庭责任。夏日傍晚时分，
做完家务，她穿着简朴的衣衫，
带着惹人怜爱的小女儿出来散步，
她们避开炽热的阳光，坐到阴凉的草地上。
这动人的景象令人心旷神怡。
她的生活从孩提时起，
如同晴空下无名的浪花，
缓慢，单调，但却庄严地流淌，
因为它们知道是涌向那永恒的岸边。
看到这谦和的生命静静地流淌，
温顺地屈从于人生的责任；

这清纯、透明、恬静的生活
使人摆脱尘世的喧嚣，得到安宁，
啊！看到这一切，我不禁又满心惆怅；
我想起了已经飞逝的岁月，
那动荡不安，没有欢乐，失去责任感的岁月，
啊，上帝，我还想到黄昏就要来临。

正当公众和批评界为这位颇有前途的天才英年早逝感到惋惜的时候，又突然传来消息说，诗人仍然健在。已经以一部《16世纪法国文学史》和出版隆萨的一部学术著作而著名的圣·伯夫，突发奇想，以虚构的И·德洛姆的名字印行了自己在诗歌方面的试笔之作。他之所以这样做，大约是担心会受到责难和难以通过严格的道德检查。对公众如此不光彩的愚弄和使人开心的收场，本来会有损于他的诗歌的成功，然而它却得到新学派狂热的认可，而作者也被接纳为这个学派新的一员。

在德洛姆的《思想》的一部分中，他阐述了他对于法国诗法的见解。批评家们赞扬了这些意见，认为它们准确、新颖、具有学术性。我们以为，德洛姆过分强调了所谓的法国作家浪漫主义学派创新的重要性，这些作家本身也还过分看重了诗的形式，诗行中的停顿，韵脚，某些古词、短语的使用等等的重要性。这一切当然不错，但太容易使人联想到婴儿的哗哩棒和尿布了。毫无疑问，法国的诗坛是最偏执的，而且我敢说也是缺乏根据的。例如，您怎样去为法语中消除**元音重复**（hiatus）的现象辩解，一方面，对于法国人来说，两个词之间有两个元音相连（如（a été，où aller）极不悦耳；而另一方面，他们为了语音和谐而寻求有两个元音连缀的名字：Zaîre，Aglaë，Eléonore。顺便说一下，法国人关于**元音重复**的规则应当归功于拉丁文的**元音省略**。根据拉丁诗法

的特点，以元音结尾的词，在另一元音前，将失去自己的元音。

布瓦洛用元音重复的规则取代了上述这条规则：

> 千万注意，可别让一个元音
> 在匆忙中碰上另一个元音。[①]

其次，怎么能永远为视觉，而不是为听觉去选韵呢？为什么韵脚应当在（单、复）数方面一致，即使在两种情况下发音都完全相同？然而，创新者们还没有触及这个问题；他们的企图未必会有什么结果。

去年，圣·伯夫又推出一本名为《Les Consolations》（《慰藉》）的诗集。在这些诗中，德洛姆在友人和一些德高望重的人们的劝导下成了回头的浪子。他已经不再极力拒绝宗教的慰藉，而只是情悄地犹豫：他真的不再去罗莎那里了，但他承认有时情欲难耐。他的文笔也变得正经起来。简而言之，人们在品位和道德方面都应当对他表示满意了。我们甚至还可指望，等到第 3 卷诗歌出来的时候，德洛姆将会像拉马丁一样以一位虔诚的上帝的信徒，和一位完全高尚体面的人士的面孔出现在人们面前。

不过，我们要坦白地说，我们虽然为一个浪子的转变感到欣慰，但却为一个诗人感到惋惜。不幸的德洛姆具有几乎是为所有新一代法国诗人所缺少的那种极为重要的特性，没有这种特性就没有真正的诗歌。这个特性就是真诚的灵感。今天，有位法国诗人经常对自己说：我们要信奉宗教，我们要作政治家[②]。而另一位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甚至说：我们要变得癫狂。[1]因而在他全部作品中反映出的只是奉命写作的了无生气、牵强附会和装腔作势，而再也看不到片刻自由情感的活动，一句话，作品中没有真正的灵感。但愿我们永远是诗歌中“不道德”成分的捍卫者（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与我们一些评论家经常使用的含义不同）！诗按其崇高、自由的性质而言，除了它自身，不应再有其他目的，尤其是不应当降低到用词句的力量去动摇人类幸福和庄严赖以为基础的永恒的真理，或者是把自己神圣的琼浆变为煽动情欲的鸩酒。但是，描写人类的弱点、迷误和情欲，不能说是不道德，正如解剖不是谋杀一样。在德洛姆的哀歌——他撕人心肺的自白，他对自己情欲和缺乏宗教信仰的窘迫描述，在他对命运，对自己的抱怨中，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不道德的东西。

---

① 原文为法文。

友情的胜利，或光明磊落的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奥尔洛夫[1]

我和与我相等的人一起走向演技场。

——西塞罗

在令我国不幸的文坛十分痛心的论战中，Н·И·格列奇和Ф·В·布尔加林十余年来为我们作出了令人欣慰的谐和的榜样，这种谐和是以相互敬重、心灵相通以及他们所任的文职、从事的文学活动相同为基础的。这一具有教育意义的联盟的标志是数量可观的文献。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称自己是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的学生；而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则赶忙宣称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是自己的精明强干的同志。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把自己的作品《自立为王者季米特里》奉献给尼·伊凡诺维奇，尼·伊凡诺维奇则将自己的《德国之旅》献给法杰依·维涅迪克托

---

① 载《望远镜》1831年第13期，署名为：费奥菲拉克特·科西奇金。此文因格列奇一篇《文学评论》（载《祖国之子》1831年第27期）而作。格列奇大肆吹捧布尔加林的《伊凡·维日金》，以回击纳杰日金在一篇文章中（《望远镜》1831年第9期）对这本书所作的全面否定的评价。纳杰日金的评论文章是因A·A·奥尔洛夫的3本小册子而写的。这3本小册子是：《赫楞草原人伊格纳特和西多尔，或伊凡·维日金的孩子们》（莫斯科，1831年），《伊凡·维日金的孩子，伊格纳特和西多尔在赫楞草原的婚礼》（莫斯科，1831年），以及《伊凡·维日金之死》（莫斯科，1831年）。

维奇。法·维涅迪克托维奇为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的《语法》撰写了一篇赞美的序言[1]，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则在《北方蜜蜂》（格列奇与布尔加林先生合办）上刊登对《伊凡·维日金》大加赞美的广告。多么令人感动的团结一致！现在，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认为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受到《望远镜》第9期上面一篇文章的侮辱，因而挺身而出，以其特有的直率和激昂为自己的朋友辩护。他在《祖国之子》（第27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当然会让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那些放肆的对手们张嘴结舌，因为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以下事实：

1）M·И·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晋升为公爵的时间是1812年6月。（第64页）

2）作为总司令机密的不是战斗行动，而是作战计划。（第65页）

3）司祭向迫近的敌人迎面走去，手中捧着十字架和圣水。（第65页）

4）书记穿着破烂的文官制服，戴着三角帽，外面套着一身白色贴身连衣裙，手持长剑，从屋里走出来。（第65页）

5）谚语"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是一则拉丁谚语，而且它是造成法国革命的真正原因。（第65页）

6）《伊凡·维日金》虽不能称为典范之作，但相对而言，它的出现仍是一种可喜的有益的现象。（第62页）

7）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居住在德尔普特附近自己的村子里，并请他（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不要给他寄送那些无稽之谈。（第68页）

由此可见，Ф·В·布尔加林以自己的才华和著作为自己的同

---

① 见格列奇著《语法》，格列奇印刷厂印制。——普希金原注

胞赢得了荣誉。这一点是应当加以证实的。

对此人们没有什么异议。我们要第一个站出来大声赞扬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的坦率，以及给他逻辑周密和情感激昂带来声誉的所向披靡的反驳。

但是友谊（这种神圣的感情）却使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炽热的心走得太远了。他的笔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的话：

“**那里面**（《望远镜》第9期）**采用了一个叫A·奥尔洛夫写的，莫斯科出版的**（不错，是莫斯科）**两本极不像样的小册子。**”

啊，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您这是给年轻的作家们作出了什么样的榜样？您在自己的文章里使用了些什么样的词语？而您的文章一开头就十分严肃地说：“我国自古以来，**人们对于评论者的恬不知耻、不学无术和不诚实理所当然地表示愤慨。**”那么您自己的温良恭俭，彬彬有礼，您著名的诚实又到哪里去了呢？请再读一下，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请再读一遍这几行字，您自己也会看出自己的轻率唐突，并为之感到痛心的！

“**两本极不像样的小册子！……一个叫A·奥尔洛夫的人！……**”我敢请可敬的公众作证，有哪一个批评家，哪一个撰稿人在谈论一位仍然健在的作家的作品时，敢于使用这种令人厌恶的词语？因为我尊敬的朋友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奥尔洛夫仍然健在人世！他仍然活着，尽管一些批评家对此心怀忌妒和愤恨；他仍然活着，这使书商感到欣喜，对他众多的读者则是极大的慰藉！

“**两本极不像样的小册子！……**”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的作品，同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一样受到俄国公众的喜爱，却被称为**极不像样的小册子！**——这真是闻所未闻、令人震惊的无礼，它不仅是对我的朋友（因为他也是居住在索科尔尼基附近自己的村子里，而且也请我不要把任何无稽之谈寄送给他），而且对于所

有的读者层都是极大的侮辱。[①]

“极不像样的小册子！”您有什么可用来说明这个不像样呢？您知道吗，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这两本**极不像样的小册子**已经销售5000册以上；奥尔洛夫先生的《维日金》同布尔加林先生的《维日金》一样受到读者青睐；而那些对这两种书都表示厌恶的有教养的读者层，对于他们不去读的作品是没法，也不应当参与评说的？

我不得已继续分析下去。

“莫斯科出版的（对，是莫斯科）两本极不像样的（极不像样！）小册子……”

莫斯科出版的，对，是莫斯科！……这又有什么不体面的？为什么对于第一个成为京城的莫斯科如此反感？我们已不止一次看到《祖国之子》和《北方蜜蜂》的出版者们对莫斯科所表现出的古怪的恶感。听到有人对母亲莫斯科，白石砌成的莫斯科，1612年饱受波兰人、1812年饱受一伙恶棍蹂躏的莫斯科，作出如此的反应，对于一个俄罗斯人的赤子之心是十分痛楚的。

莫斯科今天仍然是我们文化的中心：在莫斯科出生、成长和受到教育的，大部分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作家，而不是外来的移民，不是投机者。对于后者来说，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②]对这些人来说，在法兰西鹰旗下奔跑，或是用俄语来糟蹋俄罗斯的一切，都是无所谓的，对他们来说，只要吃饱肚子就行。

彼得堡的文学有什么好骄傲的呢？有布尔加林先生？……我们同意，这位伟大的，由于其才华和特点而受到尊重的作家，赢得了不朽的荣誉，但是奥尔洛夫先生的作品使得这位莫斯科的小

① 见《祖国之子》中对《晨星》的分析。——普希金原注

② 原文为拉丁文。

说家，如果不是高于他的彼得堡的同行，至少也是同他们并驾齐驱。尽管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和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之间存在一些分歧，尽管《祖国之子》的不当言词激起我理所当然的愤慨，我们仍然力求平心静气地对我国文坛两位如日中天的作家作一番对比。

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用语考究，富于魅力，在这方面比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略胜一筹，而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在叙述的生动和强烈方面占有优势。

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的小说思考周密，表明作者具有更大的耐心[①]（而且要求读者具有比这还要大的耐心）；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的小说则更短小精练，独出心裁，更引人入胜。

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更像一位哲学家，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则更具诗人气质。

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是一位天才，因为他发明了维日金这个名字，并且，他这种大胆的创新激起了庸俗模仿《索维斯特德拉尔》和《英国爵士》的热潮；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则是非常高明地利用了布尔加林先生的发明，并从中吸取了无限多样的效果！

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在我们看来，稍嫌单调，因为他的全部著作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维日金》：《伊凡·维日金》、《彼得·维日金》、《自立为王者季米特里》或《17世纪的维日金》，私人笔记，道德论文，全都离不开这同一个对象。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则是惊人的多姿多彩！除了多本《维日金》之外，他还有多少花朵点缀着我们的文坛！《瘟神同虎列拉相遇》、《鹰本会成为鹰，但母鸡把它吃掉了》或《出走的妻子》、《幸存的孤儿》、

① 著名的比丰说过："天才是一种高度的耐心。"——普希金原注

《一个商人的葬礼》等等。

但是，公正无私也要求我们指出，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无可争辩地具有比自己走运的对手优越的一面，这里我指的是他作品里的道德上的追求。的确，亲爱的读者诸君，有什么能比布尔加林先生的作品具有更强的道德感呢？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会清楚地懂得，撒谎、盗窃、酗酒、赌博等等是多么地不可取。布尔加林先生还给他的人物取了一些独出心裁的名字：凶手——诺热夫（由 нож 刀构成），收受贿赂者——维济亚特金（由 взятка 贿赂构成），笨蛋——格拉兹杜林（主要由 глаз 眼睛、дура 蠢货构成）等等。但历史的准确性唯独使他不能把鲍里斯·戈都诺夫称为赫洛波乌欣（由 хлопать 扇动和 ухо 耳朵构成，短语 хлопать ушами 意为莫名其妙），把自立为王者季米特里叫做卡托尔什尼科夫（由 каторжник 苦役犯构成），或是把马丽亚·姆尼舍克叫做什柳辛娜公主（由 шлюха 荡妇构成），然而这些人物在作品中却显得比较苍白。

在这方面，奥尔洛夫先生的确远远逊色于布尔加林先生。然而，连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最狂热的崇拜者，也承认他的作品由于说教而变得枯燥乏味；而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最热情的拥戴者，则批评他的作品有时有欠深思熟虑，但这一点可用天才的激情来加以谅解。

虽然如此，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的声望远不如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造成这种情况悬殊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善于钻营、好心的读者，是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的精明的同志，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的善于钻营！当《伊凡·维日金》还只是存在于其作者的想像之中的时候，《北方档案》、《北方蜜蜂》和《祖国之子》就迫不及待地大加喝彩。安塞洛先生在其法国之行时，就称还不存在的《伊凡·维日金》为最优秀的俄国

小说。《伊凡·维日金》终于问世，《祖国之子》、《北方蜜蜂》、《北方档案》更将它吹捧上天。人们争相阅读，许多人还通读完。与此同时，在《北方档案》、《祖国之子》和《北方蜜蜂》的每一期中，赞美之声不绝。这几家热心的杂志殷勤地请人们购买；鼓励、怂恿那些动作迟缓的读者；对那些出于卑劣的忌妒而没有读完《伊凡·维日金》的心怀恶意的人则威胁加以报复。

然而，亚历山大·安非莫维奇又使用了些什么样的辅助手段呢？

什么也没有，尊敬的读者！

他没有宴请那些不懂俄语的外国文学家们，用殷勤去在他们的旅途札记中求得一席之地。

他没有在他本人出版的杂志里吹捧自己。

他没有用卑躬屈膝的讨好和花言巧语去引诱读者订阅和购买。

他没有用粗俗喜剧式的海报文字写成的报刊广告来招摇撞骗。

他没有对任何一个批评作过回答，他没有把反对自己的人称作坏蛋、傻瓜、酒鬼、胆小鬼等等。

然而，他这样就使自己众多的敌人放下武器了吗？一点也没有。请看他的同行们是怎样评论他的：

“上述作品的作者激烈地冲击着我们不幸的俄罗斯文学，他想要摧毁俄罗斯诗坛，不是用炸弹，而是用燃烧弹，并且是在那些热心的出版商帮助之下。这些出版商，如一些熟知内情的书商对我们说的那样，为这位著名作家的每一篇手稿慷慨地付给 20 卢布的酬劳。作者是一位有学问的人，这从他作品俯拾皆是的拉丁词句可以看出。但这些拉丁词句的本质却表明，他正如《纨袴子弟》说的那样，‘对知识的奥秘望而生畏，于是知难而退’。那本

低俗的《老鼠葬猫，或带插图的荒诞故事》，同奥尔洛夫先生的作品相比，可说是《伊利昂纪》，'鲍瓦·科罗列维奇'则称得上是一位英雄，而我们可敬的作家还达不到他的水平，因此，他像一切不平常的事物一样值得人们注意[①]，……他的语言，叙述方式和开场，都只能同充斥于这些品位低下的著作的令人厌恶的画面，以及作家本人的勇气相匹配。在彼得堡，这样的货色恐怕也无法露面，没有一个街头兜售书刊的小贩（更不用说体面的书商了）会去出贩这类东西。奥尔洛夫先生有什么权利把自己的书中人物叫做：赫楞草原的居民，伊格纳特，西多尔，伊凡·维日金的孩子们，特别是《维日金》的作者正在出版一部同名小说的时候？……俄罗斯文学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种令人厌恶的现象。莫斯科出版界万岁!"（《北方蜜蜂》，1831 年第 46 期）

多么险恶和不公正的批评！我们已经指出对莫斯科无礼的攻击，但是为什么有人又非难可敬的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呢?……这是因为书商为他每一部作品付给他 20 卢布的报酬？那又有什么?我的朋友一想到自己得到 20 卢布之后，却为他人赚得 2000 卢布时，[②]一定会很高兴的。而另一方面，某位彼得堡的文豪却为自己一部手稿开价 3 万卢布，这使得面红耳赤的书商叫苦不迭。

有人把他通晓拉丁语列为罪状。当然，已经证实，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曾出版《贺拉斯》，但由他人为之注释）不懂拉丁语。难道他不朽的荣誉就归功于不懂拉丁语吗?

他们喋喋不休地说，奥尔洛夫先生是个学者。当然，也已经证实，布尔加林先生根本没什么学问。我要重复一个问题：难道不学无术是那么令人称羡的品质吗?

---

① 了不起的认识，请注意听！——普希金原注

② 历史事实！——普希金原注

这些还不够。他们威胁着要求我的朋友作出回答：他怎敢为自己的人物取用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使之熠熠生辉的名字？——但难道A·C·普希金在自己的《鲍里斯·戈都诺夫》里不是也大胆地刻画了布尔加林先生小说中的全部人物，甚至将许多地方使用在自己的悲剧（据说是5年前写成，还在手稿时即已为公众所熟知）里吗？

我斗胆请教于《北方蜜蜂》出版者的良心：这样的批评公正吗？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奥尔洛夫有什么过错？

我更斗胆请教尊敬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他无缘无故伤害了一位如此有才华的人（此人同他没有任何瓜葛，对他毫无了解，也没有写过任何反对他的东西），对此，他不深深地感到后悔吗？[①]

费奥菲拉克特·科西奇金

① 《祖国之子》第27期，第60页。——普希金原注

略谈布尔加林先生的小拇指及其他[①]

我不属于那些不爱记仇的文人之列。他们在公开的场合彼此辱骂，然后又可以当众相互拥抱言欢，像普罗拉斯和维索诺斯一样，互相赞扬，互相安慰地说：

看来，我们都吃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不，如果我一旦发怒，我的怒气便很久不会消退，除非我把积存在心头的各种侮辱性的见解、双关语、外国笑话等等发泄得淋漓尽致。而为了保持这种严酷的心理状态，我时常翻阅我详细记在一个专门的笔记本里的那些使我变得如此冷峻的文章。于是，近日在翻阅一些使我有机会为可敬的朋友A·A·奥尔洛夫辩护的反批评文章时，我偶然发现了如下一段话：

我决定这样做（为布尔加林先生辩护）的目的，不是要为布尔加林辩护，因为他的一根小拇指所含有的智慧和才能，要比许多评论家的头脑还要多。（格列奇和布尔加林先生共同出版的《祖国之子》第27期）

① 刊登于《望远镜》1831年第15期。

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原先怎会没有注意到这些十分动听，但却十分轻率的言词！我于是扳着手指来计算，那些头脑里的智慧还不如布尔加林一**根小拇指**的评论家可能是谁？猜测一下，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想用法杰依·维涅迪克托维奇的小拇指来吓唬什么人。

说真的，这个别出心裁的用语可能针对谁呢？谁才是这些评论迷呢？

是您，《望远镜》的出版人先生？可能，这根复仇的小拇指指的正是您，我就让您自己去为自己的脑袋辩护吧[①]。那么，又是别的什么人呢？

是波列沃依先生？虽然过去他们之间有过一些龃龉，虽然有过旅长夫人信件的故事，虽然有过对可爱的格里普希耶（法语：土灰色）的嘲笑[②]，虽然不久前还发生过“维尔霍格利亚德”（意为目光短浅）的绰号事件，等等。全欧洲都知道，《电讯》同《北方蜜蜂》和《祖国之子》是沆瀣一气的：这根**小手指**不是指向他的。

是伏耶依科夫先生？但这位出色的文学家极少从事评论，而是以出版各种看风使舵的文集，精心汇编暴露文坛骗局的文章而著称。《北方蜜蜂》精明的出版者看来是不会像俗话所说的，把指头伸到他嘴里去的，尽管这指头是上面提到的那根著名的小拇指。

是索莫夫先生？但《文学报》在完成自己唯一的丰功伟绩——完全摧毁布尔加林先生（在文学方面的）荣誉——之后，似乎还陶醉于自己胜利的桂冠之中，而格列奇先生大约也不会用这根顽

① “我同那些小手指能有什么关系？”出版家说道。——普希金原注

② 可爱的格里普希耶是指Н·А·波列沃依。《莫斯科电讯》的“时装”栏目里，谈到服装的颜色，“天蓝色，玫瑰色，格里普希耶（土灰色）”，后一词是法语“grispoussière”（土灰色）之讹。这引起《北方蜜蜂》对波列沃依的嘲笑。

皮的小拇指去挑逗《文学报》的痒处，打扰它幸福的清梦。

那么这根小拇指究竟是搔弄谁呢？谁才是这些评论家呢？博学的读者已经猜到了，这里指的就是在下，费奥菲拉克特·科西奇金。

举世皆知，没有人像我那样始终一贯地关注我们时代气势恢宏的进程。在（具有长足进步的）过去的10年间，我国在政治、精密科学和纯文学方面，出版了多少深刻和光辉的著作，因而理所当然地引起一直对我国心怀忌羡的欧洲的注意!对于这类现象，我从未忽视任何一个，而且关于任何一个，众所周知，我都写过至少一篇以学术性、思想深刻和风趣见长的文章。如果说，公正的义务要求我有时指出我所分析的作品中的不足，难道哪一位俄国作家先生能够抱怨本人，即费奥菲拉克特·科西奇金的傲慢或不学无术吗？或许，由于以波列沃依先生为榜样，我对自己的评价过高了一些，当然，我本来也可以用第三人称的口气来叙述，然后请我的朋友在这些公正的赞誉之下签上他的姓名，但是我厌恶弄虚作假，就是俄国的作家先生们也不会谴责我是在招摇撞骗的。

然而又怎样了呢？格列奇先生在那本在全欧洲有着广泛读者的杂志里发表文章，告诉读者，似乎他的同志一根小拇指的智慧和才能也比我的头脑多！这种评价对我说来是欺人太甚了！我认为我也有权向**整个欧洲**宣布，我不惧怕任何人的小拇指；因为，且不考虑头脑的问题，我可以请那些先生们相信，我的手指（单独一只，或五个合在一起）都能给予不论是什么人以加倍的报偿。我说完了![1]

拿起笔来的时候，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向可敬的公众大谈这些事情。对于我们这些贵族作家（这里，贵族这个词是表示讽刺的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意思）有这样的必要吗？对于报刊上的批评，我从未作过回答：友谊，受到侮辱的友谊，又一次促使我来帮助一位受到攻击的天才。

说实话，在我的那篇为A·A·奥尔洛夫热烈辩护的文章之后（这篇文章在莫斯科和彼得堡都极受公众的赞许），我没有料到，《北方蜜蜂》会重新对我高尚的朋友和我国第一座都城进行攻击。当然，这一次攻击远不如以往猛烈，但我决定不再沉默，直到我迫使那些猖狂攻击我的朋友的人，以及无理嘲笑我们古老莫斯科的《祖国之子》完全住口为止。

《北方蜜蜂》（第201期）在告示一部新的《维日金》问世时，说道："这部小说的名称不由使人联想到，它是对杰出作家，**怡然自得的**A·奥尔洛夫先生的作品的众多模仿之作的一部……而且，任何一部带有**第十五等**出版商的印记的莫斯科文坛的作品都使人不寒而栗。"**"怡然自得的奥尔洛夫先生……" 怡然自得的奥尔洛夫**是什么意思呢？啊，当然，如果说，怡然自得在于不受私欲和忌妒干扰的精神上的宁静；在于不被欺诈和虚假告密玷污的良心的纯洁；在于诚实和高尚的劳动；在于兢兢业业地发挥天赋的才能——那么，善良、不富有的奥尔洛夫的确是怡然自得的，而且他不会去艳羡骗子手的财富，恶棍的官爵，以及招摇撞骗者的名声！！！而如果怡然自得这个词另有用意（这里我不打算去解释），那么，一些人的癖好倒使我惊讶，这些人总把一些根本不可笑的事说成是可笑的，而且，他们甚至还不会用诙谐、轻快的词语来遮掩一下自己不体面的念头。

对于第十五等出版商的嘲弄，暴露了那些曾被我们的所谓的贵族作家讥笑的，有一官半职的出版家们的贵族派头。我想来重复一下同布尔加林先生的道德思考同样无可争议的真理："官衔不会使骗子变得诚实，不会给愚人以智慧，也不会使不识高低的庸碌之辈成为天才。菲尔丁和拉伯雷就没有做过枢密顾问，甚至连

八等文官也不是。一些平民知识分子虽然成为贵族，但只要他们具有天赋，有良好的教养，勤恳工作，而不是些装腔作势和厚颜无耻的人，那么他们也能成为受人尊敬的作家。”

我希望，我所作的这一点温和的反应是最后的一次，而且《北方蜜蜂》、《祖国之子》以及《北方档案》可敬的出版家们今后不再向我挑衅。我虽极少参加论战，但请注意，我的战绩却并不差。我主张息事宁人，但我也随时准备为我的朋友辩护。我不像那位中国评论家[①]，他总是纵容自己的同志，当面对他的胡说八道大加称赞，但却悄悄对别人说：“这个卑鄙的坏蛋老是挑起我同所有的正派人争吵，用他的友情玷污我的名声。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可是个机灵、能干的人！”

此外，我还认为应当宣布我手头也有一部小说，书名及各章标题如下，本书付印与否，尚须视情况而定：

维日金的本来面目

19 世纪历史——道德——讽刺小说

目　录

第一章　维日金出生在库德拉什金家的狗舍里。

第二章　维日金的第一次诽谤，服役卫戍部队。

第三章　小酒店的斗殴。长官大人！请准许我再喝点酒来醒酒吧！

第四章　同叶甫谢依的友谊。绒面粗呢军大衣，盗窃，逃亡。

第五章　Ubi bene，ibi patria。（拉丁语：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

① 这里说的是格列奇。

费·科西奇金

致《俄罗斯残疾人》文学增刊出版者的一封信①

我刚读完《狄康卡近乡夜话》，它使我感到震惊。这才是真正的欢快，它发自内心，无拘无束，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也没有任何拘泥。许多地方是多么富于诗意！多么真挚的情感！这在我们文坛是如此不同凡响，它使我一直沉浸在它的气氛里。有人告诉我，当出版者走进印刷《夜话》的车间时，排字工们都手捂着嘴巴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口来。技术员解释了工人们这么开心的原因。他对出版家说，工人们在排印那本书时，笑得喘不过气来。莫里哀和菲尔丁如果看到自己的作品使得排字工开怀大笑，大概也是会十分高兴的。我祝贺读者得到一部真正欢快的作品，衷心祝愿作家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评论家们按照自己的习惯，要抨击作者**用语不雅、格调低俗**等等，看在上帝份上，请站在作者一边吧。对我国文坛那些*可笑的女才子*②，那些永恒谈论着从来不读他们作品的出色的女读者，谈论着他们从来不被邀请的上流社会以及这一切的人，是我们用宫廷近侍特列佳科夫斯基的文笔加以嘲笑的时候了。

---

① 刊登于1831年第79期《俄罗斯残疾人》文学增刊。

② 原文为法文，是莫里哀同名喜剧中的一个人物。

穆拉维约夫的《圣地之行》[①]

1829年，欧洲注意的焦点集中在古城阿德里安堡，这里正在决定整整八年成为文明世界思考中心的希腊的命运。希腊获得了再生，[②]来自北方的强有力的援助，使它重新得到独立，恢复了自己独特的传统。

在谈判期间，我们战胜国阵营一位年轻诗人，鉴于君士坦丁堡的兵荒马乱，想到了圣殿的拱顶石，想到了现在由于巴特农和里克昂的断壁残垣而被基督教的欧洲遗忘的耶路撒冷 。他面前出现了实现内心宿愿、幼年梦想的可能。穆拉维约夫先生通过迪比奇将军的帮助，获准拜访圣地——他取道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前往。现在他出版了自己的旅途笔记。

我们怀着感动和羡慕的心情，阅读完穆拉维约夫先生的著作。“这里，在锡安山麓，”另一位俄罗斯旅行家说道，“每一个人，只要他还保持着热情和对伟人的爱，都笃信基督 ，每一个人都是信徒。”但吸引着我们这位年轻的同胞到那里去的不是为自己充满诗意的作品增添色彩的徒劳的愿望，也不是为自己倦怠、麻木的心寻求强烈感受的躁动的好奇心。他是作为一个信徒，一个虔诚的

① 作于1832年，1834年发表。《圣地之行》一书于1832年初问世。

② 1829年9月14日在此签订和约，从而保证了希腊的独立。

基督徒，一个渴望参拜救世主耶稣陵墓的纯朴教民，去朝觐圣地的。他周游希腊，心中充满一个伟大的思想，但他没有像夏多布里昂那样极力去利用《圣经》和《奥德修纪》中相互矛盾的神话。他行色匆匆，极少在一地逗留；他同怪僻的埃及改革家倾谈，深入到金字塔的内部，走进只有贝都印人黑色的帐篷和驼队的点缀才现出几分生气的荒漠，踏上了神赐乐土，终于他从高处看到了耶路撒冷……

关于萨利耶里[①]

在《唐璜》的首次公演仪式上，整个剧院都坐满惊异的行家们，人们都沉浸在莫扎特和谐的乐曲声中。突然响起一阵口哨声，所有的人都愤怒地转过头去，著名的萨利耶里为忌妒所煎熬，疯狂地冲出大厅。

萨利耶里于八年前去世。[②] 有几家德国杂志说，在病榻上，临终时，他似乎承认自己犯了可怕的罪行——毒死了伟大的莫扎特。

一个心怀忌妒的人，既然能吹口哨对《唐璜》喝倒彩，当然也可能对作曲家本人下毒手。

---

① 此文写作时间应早于1832年。1855年发表。

② 意大利作曲家安东尼奥·萨利耶里死于1825年。萨利耶里在临终时的确承认自己犯有谋杀莫扎特的罪行，但他的坦白是否真实，至今仍有争议。

一篇论述维克多·雨果的文章的开头[①]

众所周知，法国人是最反对诗歌的民族。他们最优秀的作家，这个机敏、正直的民族最负盛名的代表，如蒙田、伏尔泰、孟德斯鸠、拉哈尔普以及卢梭本人，都表明：美感对他们说来是何等格格不入和难以理解。

如果我们去注意看看在民间流传，并被普遍视为公理的批评成果，我们对于它的贫乏和不公允会感到惊讶。高乃依和伏尔泰被他们认为是同拉辛相等的悲剧作家，卢梭至今仍保有"伟人"的尊称。现在，令人难以忍耐的贝朗瑞被推崇为他们的第一位抒情诗人，他创作的一些诗歌生硬，造作，毫无激情和灵感，而在欢快和诙谐方面则远不如科勒精美的戏谑作品。我不知道，他们最终是否承认拉马丁干巴巴和没有生气的单调，但在10年前，他们还把他同拜伦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德·维尼伯爵的一部平庸小说《桑·马尔斯》被吹捧到瓦尔特·司各特伟大作品的高度。当然，他们对另一些作家的排挤，也如同他们对一些作家的偏爱一样是有欠公允的。在当今年轻的天才作家中，圣·伯夫知名度最低，然而，他差不多是最杰出的一位。

他的诗歌当然极具独创性，而更重要的是充满真诚的激情。

① 作于1832年，1855年发表。

《文学报》对圣·伯夫的诗歌十分称赞，但稍嫌过誉。当前，一位品德高尚和具有真正才华的诗人，维克多·雨果，不负彼得堡报刊界的厚望，出版了以《秋叶集》为题的诗集，这显然是模仿圣·伯夫的《慰藉》。

《巴维尔·卡杰宁作品及诗歌译作集》[①]

近日，《巴维尔·卡杰宁作品及诗歌译作集》问世了。

出版家（巴赫廷先生）在那篇相当出色的序言开头提到，П·А·卡杰宁一踏上文坛，就遇到极不公正的过分的批评。

我们倒是觉得，卡杰宁先生（和我们所有作家一样）更应当去抱怨批评界的缄默，而不是与它的严厉和偏颇纠缠。真正的批评在我们这里还不存在，因而要求它如何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文学也不过刚刚出现，正如一则不容置辩的谚语所说：既然没有，就没法说了。如果说公众还能满足于人们称之为批评的东西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明我们还不需要施莱格尔，甚至也不需要拉哈尔普。

至于公众对卡杰宁先生作品所表现出的有欠公允的冷淡，那么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公众对他的敬意。首先，这表明诗人厌恶以卑劣的手段去获取成功；其次，说明了诗人的清高。他从未力图去迎合公众中占主导地位的兴趣。恰恰相反，他总是走自己的路，为自己而创作，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写自己喜欢的东西。他的这种孤傲的清高，甚至发展到过分的地步。当他从事的诗的领域一旦成为时尚时，他会立刻将它放弃，并转向另一个既没有热

① 载于《俄罗斯残疾人》文学增刊1833年4月1日，第26期。

情的人群相伴，也没有某一位先行的作家为榜样的领域。因而，虽然他是浪漫主义第一批传播者之一，虽然他是第一个把民间语言和事物引入高雅诗歌范围的人，但当这一文学转变的新现象开始为读者大众喜爱时，他却放弃了浪漫主义，转向古典主义的偶像。

卡杰宁先生第一部出色的作品，是将毕尔格著名的《莱诺勒》译为俄语。《莱诺勒》由于茹科夫斯基雅而不信的模仿，已为我们所熟知。茹科夫斯基处理《莱诺勒》的方式，极似拜伦在《曼弗雷德》中对待《浮士德》的办法，范本的精神和形式都受到削弱。卡杰宁感觉到这一点，因此，他想要把《莱诺勒》原创的充满生命力的美展示给我们：他写成了《奥尔加》。但是，这用语的纯朴，甚至粗鲁，这取代了一串空中幽灵的恶棍，这代替夏夜月光映照下的乡村画面的绞刑架，都给不习惯于此的读者产生不愉快的印象，使他们感到惊愕。于是格涅季奇以这些读者的代言人自居，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偏颇受到格里鲍耶多夫的批驳。继《奥尔加》之后，卡杰宁发表了《凶手》，这可能是他抒情叙事的最佳之作。但它给人们的印象却更差：凶手在狂乱发作时，咒骂月亮（他恶行的见证）是秃子！受到弗洛里昂和帕尔尼熏陶的读者，对此哈哈大笑，认为这篇抒情叙事诗比任何对它的批评都还要糟。

这就是卡杰宁最初所受到的挫折。这对他此后的作品也不无影响。但在戏剧方面，他却取得了显然的成功。在杂志和各种文集里，时而刊登他的诗歌，人们终于开始公允地对待这些诗歌，但仍然十分吝啬和勉强。这些诗歌中比较突出的有《姆斯季斯拉夫·姆斯季斯拉维奇》，一部充满激情和动作的诗篇，以及极其朴实而又充满真正诗意的《久远的往事》。

在当前出版的这本书里，知识渊博的读者会发现有一首田园诗，其中对牧歌的特点（不是盖斯纳式的，拘泥古板的，矫揉造

作的，而是古老、纯朴、广阔、自由的牧歌特点）作了准确、优美的把握，一首忧郁的哀歌，选自《地狱篇》[1] 的 3 首诗的独具匠心的译文，以及十分引人入胜的富于诗意的关于熙德的浪漫曲集萃。

有识之士对于卡杰宁先生的艺术加工，六音步扬抑格的响亮动听，以及他的全部诗歌机理（这一点往往是被我们一些最优秀的诗人所忽视的），一定会给予公正的评价。

1833 年 3 月 14 日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指但丁《神曲》的第 2 部。

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①]

大道

听说新的莫斯科大道已经全部竣工，我忽然产生了到阔别已15年多的彼得堡去一趟的念头。我在快速公共马车行订下了座位（我觉得它要比原先的四轮邮车平稳一些），便在10月15日上午10点从特维尔关卡出发了。

坐在安稳的车厢里，在平坦的大道上奔驰，不必为马车是否结实操心，也不必为马匹和驿马费操心，我想起了上一次沿着老路去彼得堡的情景：为了免受乘坐驿车的种种不便，我购买了一辆廉价的带弹簧的四轮马车，带了一个仆人就上路了。不知我们之间是谁，伊凡或是我，在动身之前亵渎了神灵，使得整个旅途都极不顺利。那辆该死的马车过不了一会儿就需要修理。铁匠对我大敲竹杠，道路上的车辙和有些地方木板铺垫的路面，让我们吃足了苦头。我在这条破破烂烂的道路上折腾了整整六天，到达

① 这篇文章普希金本来准备发表，但由于书刊检查的原因而未能问世。写作时间为1833年12月至1834年4月。但《莫斯科》一章作于1835年1月。草稿及誊清稿均保存完好。在誊抄时，普希金作了一些删节，其中一些是出于书刊检查的考虑。1841年发表时，被书刊检查删除甚多。

彼得堡时，已是半死半活了。朋友们都嘲笑我娇生惯养，但我丝毫没有建立信使的英雄业绩的奢望，因此，在从冬季道路回到莫斯科之后，我再也不外出旅行了。

一般说来，俄国道路的状况（鉴于它的幅员辽阔）是不错的，而且，如果省督们的关心再少一些的话，它们还会更好一些。例如：草皮本是一种天然的路面，有什么必要把它铲除，再铺上一层下一场雨就会变成泥泞的浮土呢？修整道路是一项十分吃力的苦差，几乎没有任何好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进行压制和贿赂的借口。你去找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农民，让他修筑一条新路，他大约会首先挖掘两条平行的沟渠以疏导雨水。然而，40年前，有一位军政长官下令不是在道路两侧挖沟，而是构筑起护墙，这样一来，道路就变成了泥盒。夏季路况良好，但一到春秋两季，旅行者们的车辆就只好在田垅或荒野上行进了，因为在大道上车辆会深陷在泥泞里动弹不得，而徒步的行人却可以在护墙上方便地走动，他们为此而感谢那位英明的军政长官。这样的军政长官在俄国可是太多了。

宏伟的莫斯科大道是奉亚历山大皇帝的旨意开筑的；公共马车则是由私人团体购置的。也许就应当是这样：政府开辟道路，私人则寻求最有利的办法加以利用。

我不能不指出，自从罗曼诺夫家族登上王位以来，我们的政府在文明和教育领域总是走在前列，堪称表率。老百姓却总是无精打采，有时还不情愿地跟在后面。

准备行装的时候，我想要带上一本书，而不是馅饼和冷牛肉，因为吃饭的问题，我相当轻率地以为可以在途中的小饭店解决。带书则是因为我害怕和同车的旅客交谈。在监狱里和旅途中，任何一本书都是上帝的恩赐，甚至一本你从英国俱乐部回到家中或是准备去参加舞会的时候你不想翻开的书，此时对你也会像《天方

夜谭》那样引人入胜。当然，如果你的行囊里或快速公共马车上，碰巧有这么一本书的话。我想再说几句，在这种情形下，一本书越是乏味，就越好。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你会很快地一口气把它读完，它的内容会深深地镌刻在你的记忆和想像之中，不可能一再去翻阅了。一本乏味的书则恰恰相反，对它总是读读停停，这使你有时间去沉思，幻想，等到你从梦幻中醒来，你可以再去读那些忽略掉的地方。一本乏味的书会给你更多的消遣。乏味的概念是十分相对的。一本乏味的书很可能是一本好书，更不用说学术著作和为着纯文学目的而写的书了。许多读者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克拉丽莎》是一本沉闷、乏味的书，尽管如此，理查逊的这部小说仍然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

请看，旅行有多么好！

于是，在准备出门时，我特地到一位老朋友家去（我常常使用他的藏书），我请他为我找一本乏味的，但在某一方面是有趣的书。这位朋友本想给我一本道德——讽喻小说，他断言，再没有比它更乏味的书了，而且，它在读者中的遭遇这方面非常有趣。我向他表示感谢，我凭经验知道，道德——讽喻小说是多么难以抗拒。“等一等，”他对我说道，“我有一本你要的书。”说着，他从亚历山大·苏马罗科夫和米哈依尔·赫拉斯科夫的全集后面抽出一本书来，看来这是一本上世纪末出版的古籍。“请爱护它，”他神秘地说道，“我相信你会充分认识它的价值，并且不辜负我对你的信任。”我翻开扉页，看到书名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圣彼得堡，1790年，书名下是一行题词：

> 这怪物巨大肥硕，专爱胡作非为，
> 它的一百只大嘴，发出阵阵狂吠。
>
> 《蒂列马希达》第15章，第514頁。

这本因蛊惑人心而名噪一时的书，曾引起叶卡捷琳娜的震怒，并给它的作者招惹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如今已成了出版界的稀有品，它已失去往日的吸引力，只是在藏书癖尘封的书架上，或是长着大胡子的沿街叫卖的小贩的口袋里才能偶尔见到。

我向友人表示真诚的谢意，并带走了《旅行记》。这本书的内容是人们所熟知的。拉季舍夫写了若干段落，每段均以彼得堡至莫斯科沿途的驿站名为题。他在这些段落里抒发自己的思想，而不考虑它们的相互联系和先后次序。在黑泥村换马的时候，我从最后一章开始阅读这本书，于是，我就让拉季舍夫同我一道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了。

莫斯科

莫斯科！莫斯科！——拉季舍夫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满怀激情地赞叹道，并且扔掉了满蘸痛苦的笔，似乎一见到莫斯科白色建筑中教堂的金色圆顶，他脑海中的阴沉图画都烟消云散了……。已经到了符谢斯维亚茨科耶村，他同疲惫的读者告别；他请他的同路人在村口等他一会儿；在返回的路上，他会再去求索自己痛苦的真理，追寻自己大胆的梦想……但是现在他没有时间作这些。此时，他归心似箭，想要同亲人们一起，使自己平静下来，在莫斯科的氛围里得到排遣。再见，读者！车夫，快赶！莫斯科！莫斯科！

拉季舍夫的时代以后，发生了许多变化。在离开沉静的莫斯科，即将见到璀璨的彼得堡时，一想到我恬静的生活方式即将为等待着我的狂热和喧嚣所取代，我不禁有些惶然；我的头也旋转起来……

有一座特洛伊城，我们是特洛伊人。[1]的确，莫斯科同彼得堡曾经是难分伯仲。许多富有的不在朝廷供职的大贵族，离开宫廷的权臣，一些独立不羁、逍遥自在，喜欢说无害的刻薄话和以较少的开销待客的人们，都曾聚居于莫斯科。莫斯科曾经是全俄罗斯贵族会聚的地方，贵族们从全俄各省来到莫斯科过冬。英姿勃勃的年轻的禁卫军也从彼得堡蜂拥而来。在这个古老都城的每个角落，乐声震天，到处都是人群。贵族俱乐部的大厅里，每周两次聚会，人数达到5000。就是在这里，青年人相互结识，说亲定情，安排婚事。莫斯科以未婚妻闻名，就如同维亚兹玛以糖饼著称一样。莫斯科的筵席（多尔戈鲁基大公对其作过十分独特的描述）已进入谚语。莫斯科人的许多天真的怪癖，乃是他们独立性格的象征。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取乐，而不在乎旁人怎么看。莫斯科有过这样的事，一位有怪癖的富豪在一条大街上建了一座中国式的房屋，上面绘满青龙，还有撑着镀金雨伞的木雕官吏。另一位怪人则乘坐纯银所镶的四轮马车来到马丽亚林园。还有一位让5个黑人、仆人和侍从站立在四座雪橇后部的脚蹬上，夏天在大道上列队飞驰而过。讲究打扮的女士们一味摹仿彼得堡的时尚，在装束上也留下难以磨掉的印记。高傲的彼得堡在远处得意地笑了，却没有干预老妪般的莫斯科的生活。但是，这喧嚣的节日般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如今到哪里去了呢？那些舞会、宴席、怪人、恶作剧者，如今安在呢？——一切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待字闺中的美貌少女，对她们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使用“同街道一样老”[2]这句粗鲁的成语的。莫斯科的街道，由于1812年的缘故，比莫斯科如盛开的玫瑰一般的美人们还要年轻。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原文为法文。

如今，在沉静的莫斯科，巨大的贵族宅邸凄凉兀立在宽阔的杂草丛生的院落和荒芜的园林之间。在镀金的族徽下面，钉着一块成衣匠的招牌，裁缝每月付给房主 30 卢布的租金；宽敞华丽的二楼则被一位夫人租去作为带膳食的寄宿宿舍——而这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在所有的大门上都钉有“此房出售或出租”的告示，但求购者、求租者寥寥。大街上死气沉沉，极少听到马车驶过的轰鸣声；当警察局长率领着自己的哥萨克马队驰过时，小姐们都会奔向窗前观望。莫斯科近郊的村落也十室九空，一片悲凉景象。斯维尔洛沃和奥斯坦丁诺园林中的号角音乐寂然无声；昔日香桃、酸橙树成行，如今野草遍地的英国式小道上，油灯和多彩路灯不再发出光华；家庭剧院仍然是最后一次上演法国喜剧的景象，只是布满尘埃的布景已开始朽烂。老爷居住的上房破败冷清，厢房里住着一位德国管事，他正为着建立一个铁丝厂而奔忙。举办命名宴会（或称为满足快乐的好食者口腹之欲的宴会），为欢迎某位被宫廷贬谪的权臣的宴会的主人，已不再是旧派的好客人士，而是一伙赌徒，他们一心想要把刚脱离父母监护的青年，或是萨拉托夫来的包税人的钱财骗个精光。莫斯科的舞会……啊！您只要看看那些家常的发式，看看那精心用白粉涂抹的舞鞋……男舞伴也从一些地方勉强凑齐了——可这算是什么样的舞伴啊！《聪明误》呈现出的已经是一幅陈腐的图画，可悲地落后于时代的现象。在莫斯科，你既找不到使彼得·伊利奇公爵、波尔多来的法国佬、扎戈列茨基、斯卡洛茹布以及恰茨基，都很高兴的法穆索夫；也找不到塔吉雅娜·尤里耶夫娜，虽说她曾经：

从圣诞到斋戒期
举行无比豪华的舞会，
而夏季别墅的生活如同节日。

赫列斯托娃——已经躺在坟墓里，而列别季洛夫——则到乡下去了。可怜的莫斯科！……

彼得一世不喜欢莫斯科，这里每一步都会引起暴乱和死刑的回忆，都会见到根深蒂固的守旧的陋习，都会遇到迷信、偏见的顽强抵抗。他离开了虽不使他感到窒息，但却受到束缚的克里姆林宫，而到遥远的波罗的海岸边去寻求空间，为自己强烈而不安定的活动寻求空间和自由。彼得一世逝世之后，古老的贵族重新获得了权力和影响，多尔戈鲁基家族几乎使皇帝回到莫斯科。但是，彼得二世之死确定了彼得堡不久前获得的作为首都的权利。

莫斯科的衰落乃是彼得堡地位上升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同一个国家里，新旧两个都城不可能得到同等的繁荣兴盛，就如同人体内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心脏一样。但莫斯科的衰落还表明了另一点，即俄国贵族的没落，这**部分**是由于领地以惊人的速度分散，乃至消失，**部分**则是由于其他原因，对此我们以后将进行探讨。

莫斯科虽然失去了贵族的光彩，但在其他方面却是欣欣向荣：莫斯科的工业由于得到大力庇护而充满活力，并急速发展；商贾日益富有，开始进入贵族已纷纷离去的议会。另一方面，文化教育对这个舒瓦洛夫根据罗蒙诺索夫制定的蓝图创建了大学的城市也情有独钟。

彼得堡从事文学的人大部分算不上文学家，而只是一些精明的有头脑的文学包税人。在学术性、艺术氛围和作家才能方面，莫斯科无可争辩地占有优势。莫斯科的刊物更使彼得堡的刊物相形见绌。

莫斯科的批评界也领先于彼得堡的批评界。舍维列夫、基列耶夫斯基、包戈廷以及其他一些评论家写出了一些堪与英国的

《评论》中最好的文章相媲美的作品，而彼得堡的刊物在评论文学时，如同评论音乐，在评论音乐时，又如同评论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不假思索，马马虎虎，偶尔也能切题，显得机敏，但大部分却是缺乏论据和肤浅。

德国哲学在莫斯科拥有也许是过多的年轻的追随者，看来，它开始让位于更为实际的精神。虽然如此，它仍然发挥了良好的影响：它使我们的青年免受法国哲学冷漠的怀疑主义的毒害，使他们摆脱曾对上一世纪我国的精英产生严重影响的，令人陶醉但十分有害的幻想。

凑巧，我在我的文件堆中发现了一篇对两个首都进行比较的文章。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写的，他是一个性格极忧郁的人，但生活中也偶尔有灿烂的欢乐时刻。

罗蒙诺索夫

拉季舍夫在书的末尾写了一段关于罗蒙诺索夫的文字。这段话文笔夸张、沉闷。拉季舍夫怀有对我们俄罗斯的品达毋庸非议的声望进行抨击的隐秘意图。还有一点也应当指出：拉季舍夫用尊敬的手法巧妙地把自己的意图掩盖起来，而且，他对待罗蒙诺索夫的荣誉，比对最高政权要谨慎得多，他对后者猛烈的进攻达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他用了 30 多页对这位诗人、修辞学家、语法学家进行陈腐的赞誉，只是为了写最后一段话：

> 我们想要指出：在俄罗斯文学领域里，那位为通向荣誉的圣殿开辟道路的人，虽然未能进入圣殿，但却第一个获取到荣誉。难道培根因为只会说如何才能发展科学就不值一提？难道那些勇敢的挺身反对暴虐和专横的作家，因为不能使人

类摆脱镣铐和奴役，就不配受到感激？而我们仅仅因为罗蒙诺索夫没有弄懂舞台诗歌创作的规则，就勉为其难地写史诗，因为他的诗歌缺乏激情，因为他的颂歌里词藻多于思想，就对他表示不敬？

罗蒙诺索夫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在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之间，他是唯一的一位为教育而奋斗的独特的战士。他创立了第一所大学。确切地说，他本人就是我们的第一所大学。但是在这所大学里，诗学和雄辩学教授却是一些勤勉的官吏，而不是充满灵感的诗人，也不是富于鼓动性的演说家。罗蒙诺索夫抒发自己思想的形式单调、拘谨，这使得他的散文读起来沉闷、乏味。这种半斯拉夫式、半拉丁式的、经院式的庄严，几乎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幸而，卡拉姆津使俄罗斯语言摆脱了外来的束缚，还给它自由，使它面向民间语言生动的泉源。罗蒙诺索夫的作品缺乏情感，缺乏想像。他的颂歌是模仿即使在德国也早已被遗忘的诗人们的样本写成的，文笔铺张而乏味。他对文学产生的影响是不利的，而且至今仍有所反映。词藻华丽，矫揉造作，脱离朴实、准确，缺乏人民性和独创性——这就是罗蒙诺索夫留下的印迹。不过，罗蒙诺索夫并不看重自己在文学方面的成果，他对他的化学实验的关心，远远超过为皇室命名日等而奉命创作的颂歌。他是多么鄙视地谈到苏马罗科夫：此人除了他那蹩脚的凑韵诗，就再也不想别的事情了！然而，罗蒙诺索夫说起科学、教育来是何等神采飞扬！请读一读他写给舒瓦洛夫、沃隆佐夫等人的信吧。

下面是罗蒙诺索夫送呈舒瓦洛夫的关于他 1751 年至 1757 年的科学活动的报告。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报告更能真实地使我们认识罗蒙诺索夫的一生了。

遵阁下谕示，要求科学院全体教授、副教授将其自1751年至今的科学研究工作及著作向阁下作一汇报。因此，谨将1751年至今，我在本专业及其他科学领域的工作逐年报告如下：

1751年

化学方面：

1）为研究色的性质，主要以火焰为对象多次进行实验，结果均载入当年篇幅为12页的实验室记录及其他笔记中。2）讲授我对化学之用途所作的论述。3）为物理化学实验设计数种新仪器。

物理学方面：

1）在严寒条件下实验以求得空气在温度计各刻度时的收缩或膨胀率。2）夏季以聚光镜和温度计实验，观察水银柱在离阳光焦点不同距离时上升的情况。3）完成仅用熔炼法，不添加其他物质的简单方式使锡同铅分离，此法已获得相当成功，并使成本大为降低。

历史学方面：

1）为撰写俄罗斯历史收集资料，阅读了涅斯托尔《雅罗斯拉夫尔法》、《大编年史》，塔季谢夫著作第一卷，以及克罗梅尔、维塞尔、赫尔摩德、阿诺德等人的著作，并摘抄所需资料、精萃及作注释共15页，计653条。

语言文学方面：

1）著悲剧一部：《德蒙方特》。2）为一些插图配诗。3）开始整理以前为撰写俄语语法所收集的资料。为一些学生，特别是为波波夫斯基，个别讲授俄罗斯诗歌创作，后者已成为教授。4）向学生口授我所著修辞学第三卷的开始部分——诗

歌创作通论。

1752年

化学方面：

1）为色的理论进行多次化学实验，结果载入本年度实验记录，共25页。2）以我从亨克尔学习到的方式向学生演示化学实验。3）向学生口述并解释我用拉丁文撰写的物理化学导论（共13页，150段，并附有6个半张的图片），以使他们对整个化学有清晰的概念和扼要的认识。4）研究并以实践证明制彩色玻璃的方法。5）据建筑办公厅指示，为其派送的学员德鲁日宁（为本地玻璃厂培训）讲授不同色彩玻璃的构成。

物理学方面：

1）对颇具危险性的空气带电现象进行观察。

2）冬季重复空气在温度计各刻度时的缩胀程度实验。

历史学方面：

为俄罗斯历史的编写收集资料，阅读了克兰茨、普列托里、穆拉托里、约尔南德、普罗科皮、辅祭巴维尔、佐纳尔、忏悔者费奥凡、语法学家列昂等的著作以及其他精萃，摘录5页共161款。

语言文学方面：

1）为女皇陛下登基典礼创作颂歌。2）关于玻璃的益处的一封信。3）发明彩灯并为此写诗三首：4月25日，9月5日，11月25日。4）为雄辩学第二部分演说术撰稿，完稿10页。

1753年

化学方面：

1）继续研究色的性质的实验，结果载当年实验记录，共56页。2）课程结束后，作新的化学物理实验，其目的为尽可

能将化学引向哲学认识范畴，并使其成为物理学的基本组成部分。大量的实验显示出度、重量和它们的比率，根据实验结果制成24幅页面为半开的，含有大量数字的图表，其中每一行都包含一个完整的实验。

物理学方面：

1）同里赫曼教授（已故）在实验室作化学——物理实验，以研究水在吸收炽热的矿物的热量时的温度变化。2）对颇具危险性的空气带电现象进行观察。3）在公众会议上就空气在电的作用下产生的现象作演说，同时讲解自然界其他一些特性。4）所作的一些实验表明，色，特别是红色，在严寒中比温暖的条件下更鲜艳。

历史学方面：

1）对阅读前面已提及的作者的著作时所作摘录进行整理、归类、编号。2）阅读俄国科学院年鉴，为了对俄罗斯人的业绩获得广泛的了解，故未作笔记。

语言文学方面：

1）为编写俄语语法完成动词部分的整理工作。2）为1月1日、4月25日、9月5日、11月25日及12月18日设计彩灯和焰火五种，并写赞诗稿5篇。

1754年

化学方面：

1）完成多种化学实验，内容见当年实验记录，共46页。2）对上一年编制的物理——化学图进行重复验证。

物理学方面：

1）发明数种于阴霾天在海上确定经纬度的方法。其实际应用尚需得到海军部的协助。2）对从北冰洋取回的海水进行气象实验，观察其结冰时的温度。同时将不同的化学溶液进

行冷冻，以作比较。3）在农村水锯房作实验，观察水流速度与斜面的关系以及其冲击力度。4）试制一座能携带小型温度计自行攀升，以测量高处温度的机械装置，该装置重量虽已减轻2佐洛特尼克[①]以上，但尚未达到预期的程度。

历史学方面：

1）完成留利克以前的斯拉夫民族史的初稿：献辞，序言；第一章：俄罗斯土地上的原住民；第二章：伟大的斯拉夫民族及其世代；第三章：古代斯拉夫民族。共8页。

语言文学方面：

1）为保罗·彼得罗维奇大公殿下诞生作颂歌。2）发明焰火，并于1754新年燃放，为此作诗。为4月5日、9月5日、11月25日设计彩灯及焰火。

1755年

化学方面：

1）作多种物理——化学实验，结果载当年实验记录，共14页。

物理学方面：

1）撰写关于评论撰稿人的责任的论文一篇，文中对于我的一些论文（以评述形式刊出），特别是关于冷热现象，关于化学溶液以及空气弹性的新理论在德国受到的批评，进行了驳斥。这篇论文由弗梅依先生译为法语，并刊载于名为《德国图书》(Bibliotheque germanique）的刊物上。2）写信建议开辟经西伯利亚海通向东印度的北方线路。

历史学方面：

1）完成俄罗斯最早的几位大公——留利克、奥列格、伊

① 佐洛特尼克，俄重量单位，1佐洛特尼克约合4.26克。

戈尔统治时期研究的初稿。

语言文学方面：

1）作已故的彼得大帝丰功伟绩颂，并于公众会议宣讲。2）编写俄语语法的大部分内容，从而完成全书，语法于本年末出版。3）写关于语言的相似与变化的一封信。

1756年

化学方面：

1）进行多种化学实验（实验报告共13页）。其中一项在密闭的玻璃容器中进行，以观察金属在纯加热时，其重量是否增加。该实验结果表明，著名的罗伯特·波义耳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如不使外部空气进入瓶内，灼热金属的重量仍保持不变。2）借助抽气机进行化学实验：在一真空的化学容器内，矿物在火焰上烧灼时显露出化学家们尚不知道的稀有现象。3）实验员克列门蒂耶夫在我的指导下，研究制造绿色满天星焰火的方法。

物理学方面：

1）发明一种新的光学工具，并取名为夜视镜（tubus nyctoticus），该镜可使人在夜间进行观察。初步试验表明，使用夜视镜可在昏暗光线下清楚看到肉眼所看不见的东西，可以指望，经过能工巧匠的努力，夜视镜可能达到目前望远镜和显微镜的水平。2）制出我发明的四种摆：其中一种为铜质，长度为1沙绳（约合2.134米），它通过指向位于0.25俄里（约合1.06公里）的另一个摆的金属指针显示的。这套装置用于研究：吸引重物的地心总是处于同一地方不动，或是位置会发生变化。3）在公众会议上作关于色的演讲。

历史学方面：

1）对今年为我的藏书所收集的共15卷俄罗斯古代文献

手稿进行鉴别，以观察俄罗斯民族活动的共同点。

语言文学方面：

1）正在创作史诗《彼得大帝》。2）为本年9月18日设计礼花，并作诗。

此外，在不同年份，还着手撰写以下论文：

1）论完善的学术性航海。2）关于固体温度计。3）关于地震。4）关于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5）冷热的刻度，如何根据关于其他星球大气稀薄的可能性较小的见解来合理确定温度刻度。但部分由于其他事务，影响了以上论文的完成，部分则是由于注释排印拖沓，而失去兴致。

苏马罗科夫是当时供所有权臣取笑的丑角：在舒瓦洛夫和帕宁府上，人们戏弄他，挑唆他，以他的一举一动取乐。冯维辛的性格有一种自我表白的倾向，为了取悦显贵们，他对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动作的模仿，简直是维妙维肖。杰尔查文也暗地编了一首讽刺苏马罗科夫的诗，然而又若无其事地来观赏苏马罗科夫暴跳如雷的样子。罗蒙诺索夫是另一种类型。同他开玩笑可没有好处。无论在哪里，他都是那个样子：在家里，家人一见他都吓得发抖；在宫里，他揪那些青年侍从的耳朵；在科学院，据什列采耳亲眼所见，人们在他面前都噤若寒蝉。很少人知道他同德米特里·谢切诺夫之间因为他那首从未在文集中出现过的《胡须赞歌》而引发的一场诗歌论战。这场论战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作为诗人，他太高傲，作为说教者，他又缺乏耐性。然而，罗蒙诺索夫又是一位仁厚善良的人。他那封关于不幸的里赫曼家庭的信写得有多么好！对待自己，他却是显得十分漫不经心，他的夫人虽然是一位德国人，但却不谙家务。有一位老教授的遗孀听到人们正在谈论罗蒙诺索夫，插嘴问道：“你们这说的是哪一个罗蒙诺

索夫？是米哈依尔·瓦西里耶维奇吗？这可真是个没头脑的人！早先，他家老是打发人到我这儿来借咖啡壶。再看看特列佳科夫斯基，就是瓦西里·基里洛维奇——这才是一位可敬的正派人呢！”特列佳科夫斯基当然是一位可敬的正派的人。他在语文学和语法学方面的探索十分出色。他对俄罗斯诗歌比罗蒙诺索夫和苏马罗科夫有更深广的了解。他对费内隆叙事歌谣有特殊的喜爱，为他增光不少，他以诗体翻译费内隆歌谣集的想法以及诗句推敲本身，都表明他有非凡的审美感。《蒂列马希达》里有许多上佳的诗句和成功的用语。关于这些，拉季舍夫写了整整一篇文章（见A·拉季舍夫文集）。杰尔维格经常引用下面的一行诗来作为六音步扬抑抑格的范例：

> 奥德修斯的大船劈波斩浪，
> 从眼前飞驰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般说来，研究特列佳科夫斯基，比研究其他老作家更多裨益。苏马罗科夫和赫拉斯科夫大约也不能同特列佳科夫斯基相比——书籍的遭遇各有不同。[①]

拉季舍夫责备罗蒙诺索夫阿谀逢迎，但又立刻表示谅解。罗蒙诺索夫的颂歌中，充溢着词藻华丽的赞美；他不加掩饰地把舒瓦洛夫伯爵称为恩公；他在一篇宫廷田园诗中借波利多卢斯之名歌颂K·拉祖莫夫斯基伯爵；他对奥尔洛夫伯爵从芬兰返国作诗祝贺；他还写道：M·Л·沃隆佐夫伯爵阁下屈尊接受了我试作的镶嵌画，以请女皇陛下过目。如今，这一套已经不时兴了。问题在于：当时一个阶层到另一阶层，还存在一定距离。罗蒙诺索夫

① 原文为拉丁文。

出身寒微，但他不想用放肆和同上层人士狎昵的态度来抬高自己（虽然在爵位上，他同他们不相上下）。但是，他却善于保护自己，一当事情涉及他的荣誉或是他至爱的思想的尊严的时候，他对自己保护人的庇护和自己的优越地位并不看重。请看一下，当舒瓦洛夫，**他的高贵的庇护者，诗神的代表**，突然想要拿他取乐时，他是怎样给舒瓦洛夫本人写信的："阁下，我不仅不想在权臣面前，甚至不想在上帝面前受到愚弄。"[①]

另一次，也是同舒瓦洛夫发生争论时，罗蒙诺索夫让这位权臣大发雷霆，叫嚷起来："我要叫你离开科学院！""不，"罗蒙诺索夫骄傲地回答道，"难道科学院能离开我吗？"这就是赞美的颂歌和宫廷田园诗的卑躬屈膝的作者的性格！

Patronage（庇护）在英国文学界至今仍习以为常。去年故世的可敬的克雷布把自己最好的长诗都呈献给公爵大人等等。[②] 在自己谦恭的献词里，他恭敬地说到他受到的恩宠和庇护。在俄国你就看不到类似的东西。在俄国，正如斯塔尔夫人说的那样，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大部分出身贵族（En Russie quelques gentilshommes se sont occupes de litérature）。[③]这使我国文学具有特殊的一面：我们的作家不可能向被他们认为同自己平等的人去寻求恩赐和庇护，或是把自己的作品献给某位权贵或富豪，以期获得500卢布或一只嵌有名贵宝石的戒指作为赏赐。那么，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得出当今作家的思想和情操都要比罗蒙诺索夫和科斯特罗夫高尚的结论？这种见解颇值得怀疑。

当今，有的作家一想到要把自己的作品献给一个官阶比他高

① 见致舒瓦洛夫伯爵信。——普希金原注

② 原文为英文。

③ 这是普希金根据记忆摘引《十年放逐》中的文字，不准确。

两三级的人，就不禁满面通红，但却可以毫不在乎地当众去握一个声名狼藉的评论家的手，因为后者有可能危及他的作品的销路，或者是用几句捧场的告白为他吸引顾客。如今，作家中也有这样的败类，他随时准备去干任何业余的卑劣勾当，他们写匿名信诬告他人，而在办公室当着此人的面却又是一副奴颜婢膝的面孔。

此外，从某时起，文学也成了一门有利可图的行当，而公众也能够比某位阁下、某位大人出更多的钱了。不管怎么说，我要重说一遍，形式并不说明问题，罗蒙诺索夫和克雷布尽管写过一些谦恭的献词，但他们仍然值得尊敬。可是某几位先生，虽然在自己的书里宣扬独立、自由，而且不把自己的作品献给某位聪明、和善的权臣，而是献给同他们自己一样的某个骗子或说谎的人，但他们仍然是可鄙的。

婚嫁

拉季舍夫在《黑泥》一章中谈到不自由的婚姻，并痛心疾首地指责老爷们的专横和掌管城市的人们（市长?）的放任纵容。一般说来，家庭生活的不幸福，乃是俄罗斯人民习俗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我以俄罗斯民歌为证：这些歌曲通常的内容，要么是一位被强迫出嫁的美女的哭诉，要么是一位年轻丈夫对已经失去他的爱的妻子的责备。我们的婚礼歌曲像挽歌一样忧郁凄凉。有人曾问过一位年迈的农妇，她是否出于情感而嫁人的?“是情感，”老太婆回答说，“我本来要犟着不去的，可乡长威胁着要用鞭子抽我。”——这样的情感是常见的。不自由的婚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罪恶。不久前，政府已对结婚年龄加以注意，这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迈出的一步。容我斗胆进一言：法定结婚年龄对于女性还可降低一些。在我国气候条件下，姑娘到 15 岁已是待字闺中了，再说，

农民家庭也需要女劳动力。

俄罗斯茅屋

在佩什基（如今已经取消的驿站），拉季舍夫吃了一块牛肉，喝了一杯咖啡。此时，他想起了苦难深重的非洲奴隶，并为喝茶没有糖的俄国农民的命运忧心忡忡。这些在当时都是时髦的辞令。但他对俄罗斯茅屋的描述却极为出色：

> 四堵墙壁的一半，同天花板一样被锅烟熏得漆黑。地板布满裂缝，上面敷着的污垢少说也有一寸厚。炉子没有烟囱，但却是抵御严寒最好的东西，无论冬天或夏天早晨，整个茅屋都烟雾弥漫。小窗上绷一块猪尿泡，只是在中午时分才微微透进一点光亮。三两只陶罐（如果有一只陶罐每天都盛得有菜汤，那么，这就是一个幸福的农家），木制的杯子和被叫做盘子的碗，一张用斧头粗略砍成的桌子，只是在过节时才用刮刀刮到干净。一只喂猪或者牛犊的食槽，吃、睡都得和它们在一起，吞吸着散发出似乎是在迷雾或帐幔中燃着的蜡烛气味的空气。所幸，还有一桶像酸醋一般的克瓦斯。院子里有一间澡房，人不洗澡的时候，牲口就睡在里边。粗麻布内衣，赤脚，外出时才用的包脚布和树皮鞋。

俄罗斯茅屋的外貌自梅耶尔贝尔格时代以来变化甚少。请看一看《旅行记》中的插图，1833 年的俄国农村同 1662 年的俄国农村毫无差别。茅屋，磨房，篱笆，甚至那棵云杉，那北方大自然的凄凉痕迹——好像什么都没有变化。然而却有了一些改善，至少在大道附近是这样的：每座茅屋都有了烟囱，玻璃取代了绷紧

的猪尿泡；一般说来，比以前要清洁、方便一些，还有，像英国人说的 comfort（舒适）一些。显然，拉季舍夫勾勒出了一幅漫画，但他还是提到了澡房，提到克瓦斯这样的俄罗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这已经是富足的象征了。有意思的是，拉季舍夫让茅屋的主妇诉苦，抱怨饥饿和歉收，但在描绘这幅贫困的图画收尾时，他却加上这样一笔：（主妇）**开始把面团放进炉子里去烘烤。**

冯维辛在此前 15 年曾去法国旅行，他说，凭良心而言，他觉得俄国农民的命运比法国农民要幸运一些。此言可信。我记起了拉布律耶尔的一段描写[1]，而塞维尼埃夫人的话则显得更强烈，因为她说的时候没有流露出愤怒和悲伤，而只是平铺直叙地讲述她见到的和习以为常的事情。法国农民的命运在路易十五世及其继任者在位时也没有多少改善。

请读一读英国工场里工人的诉说吧，你会顿时感到毛骨悚然。多少令人嫌恶的残酷折磨，多少难以理解的苦难！一方面是何等冷酷的野蛮行为，另一面则是何等惊人的贫困！你会认为，这是为埃及法老建造金字塔的情景，是犹太人在埃及人的皮鞭下服苦役的情景。完全不是的。这里说的是斯密特先生的呢绒工场，或是杰克逊先生的针织厂的情景。您还会看到，这一切都不是滥用权力和犯罪，而是在严格的法律范围内进行的。似乎世上再没有比英国工人更为不幸的人了，但是请看一下新的机器发明以后的

---

① （原文为法文）："田地里到处可以见到一些牲畜，公的，母的；它们的嘴脸被太阳炙烤成土灰色。它们都匍匐在土地上，顽强地挖着，掘着。他们的话语清晰可辨。直到他们直起身来，我们才发现，这是人类的面孔，的确，这是些人。夜晚到来，他们都回到自己的窝棚过夜，吃一点黑面包、植物根块和水。他们使一些人免除了为生存所必需的播种、耕耘、收割等劳动，而他们从自己种植的粮食中所得到的，仅够果腹。"——普希金原注

情况，新机器突然使五六千工人摆脱了苦役般的劳动，同时也使他们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手段……。我们这里则完全不同，赋役一般并不很重；人头税由公社交纳；徭役有法律规定；代役租也并非重得使人倾家荡产（莫斯科及彼得堡附近地区除外，那里工业形形色色的周转形式加强和刺激了业主们的贪婪）。地主们在收租之后，让农民随意自行处理。农民想作什么就作什么，有时甚至跋涉到2000俄里之外去挣钱……滥用职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刑事案件各地都十分严重。

再看看俄国的农民吧，在他们的举止言谈中难道有一丝奴隶般的卑躬屈膝的影子吗？关于他们的胆量和精明就用不着多说了。他们善于模仿的能力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机敏、麻利令人惊讶。一位旅行家在俄国各地周游，即使一句俄语也不会说，但这里的人都会弄懂他的意思，满足他的要求，并同他签订协议。在我们的人民中，你看不到法国人称之为un badaud（好看热闹）的人；你也不会看到对外人表现出粗鲁的惊奇或无礼的蔑视 。在俄罗斯，没有人不拥有自己的住房。一个一贫如洗的人去外地流浪，家乡仍留着一间自己的茅屋。这在其他国家是见不到的。拥有一头奶牛在欧洲到处都是奢侈的象征，而在我国，没有奶牛便象征着极端贫穷。我们的农民无论从习惯或规矩，都注重整洁：每逢星期六，他都要沐浴，每天要洗好几次脸……随着教育的推广，农民处境也日益改善……农民的富裕同地主的富裕紧密相关。当然，还需要有巨大的变化，但对于已经是颇有成效的进程不应再催促冒进。只有在人民风尚得到改善，没有使人们感到恐慌的暴力的

政治震荡条件产生的变化，才是最好的和最巩固持久的。[①]

盲人

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唱着一首赞颂圣人阿历克赛的歌谣。旁边的农民在哭泣，拉季舍夫也跟着驿站上的人群失声痛哭起来……啊，造物主啊，你的威力是何等巨大！农民们都向老人施舍。拉季舍夫用颤抖的手递给他一个卢布，老人拒绝了他的好意，因为他是贵族。老人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年轻的时候在战场上，由于残忍而受到上天的惩罚，失去了双眼。这时一个农妇送给他一块馅饼。老人高兴地接下了。“这才是真正的行善哩。”他赞叹道。拉季舍夫最后送给老人一条围巾，他还告诉我们，老人在几天后死去了，就是系着这条围巾被安葬的。在该章开头遇到的维特这个名字会解开这个谜。

如果拉季舍夫在谈那盲人所尽知的老“诗”时，也给我们讲一讲至今还没有印刷成书的，但却包含着如此多诗意的民间传统，而不去谈那些无意义的空话，那就最好了。H·M·雅济科夫和П·B·基列耶夫斯基收集到了一些这类传说。

① 这是由一个虚构的作者（格里涅夫）说的一段话，普希金曾把它写进《上尉的女儿》第6章里。应当指出的是：《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虚构的作者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但这位“作者”的观点同普希金本人观点在许多方面都明显不相吻合，其原因是，当时必须使文章应付书刊检查的要求。产生这种思想的部分原因，可说是普希金没有能在他生活的俄国看到能够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政治力量。——原编者注

征兵

拉季舍夫写道：

戈罗德尼亚。马车驶进这座村子的时候，涌进耳鼓的不是诗一般悦耳的歌声，而是女人、孩童、老人撕人心肺的号哭。我想要知道街头出现骚动的原因，便走下车来，打发它先到驿站去。

我走近一群人，了解到征集新兵是造成聚集在这里的许多人痛哭流泪的原因。应召的新兵从许多官村和地主村集中到这里进行交接。

在一群人中，一位50来岁的农妇拥抱着一个20岁青年的头，哭诉着："我亲爱的孩子，你走了，把我扔给谁呢？咱的家你托谁来照管呢？我们的田地会长满野草，咱家的草房会长满青苔。你可怜的老母亲只有到处去流浪了。有谁来管我这把老骨头的冷热？饿了，渴了，谁来管我？对这些我都不太伤心；我咽气的时候，谁来给我合上眼睛？谁来接受我这个母亲的祝福？我死了，谁来把我送进潮湿的坟墓？有谁会来到我的坟头祭扫？你的热泪不会在我的坟头滴洒；我命苦，不会有这些福气。"

老妇人身旁站着一个成年的姑娘。她也在悲伤地哭诉："再见了，我的心上人，再见了，我的红太阳。你苦命的未婚妻不再会有幸福和欢乐。我的女友们对我不再会羡慕、忌妒。你把我撇下，不像寡妇，不像妻子，让我一人去忍受痛苦。我们那些没有良心的村长，哪怕是让我们成了亲，哪怕是让你，我的心上人，把你的头枕在我雪白的胸脯上，过上一夜，这

也是好的。说不定上帝可怜我，会给我一个胖小子。”

小伙子对她俩说道：“不要哭了，不要再撕扯我的心了。皇上召我们去当兵，我抽中了签，这是上帝的旨意。命大的死不了。说不定我会带上一团人回来见你们。说不定我能混上一官半职。别悲伤，我的亲娘。替我照看好普拉斯科菲尤什卡。”他是从经济村应征的新兵。

在紧挨着的另一群人里，我听到的完全是另一番话。在这群人中，我看到一个年纪30上下、中等身材的男子，他神气地站在那儿，乐呵呵地望着周围的人们。

“主听见了我的祈祷。”他神情庄重地说，“我这个不幸的人的眼泪终于感动了宽慰众人痛苦的主。现在，我总算可以知道，我的命运是取决于我自己行为的好坏。在此之前，我的命运却是受一个任性的女人的摆布。一想到没有神的审判我是不会受到惩罚的，我就感到安慰。”

从这个人的谈话，我了解到，他原先是一个农奴。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他会非同一般地满意？对我的问题，他回答说：“老爷，如果说，一边是一副绞架，另一边是一条很深的河，你站在这两种死法中间，不向右钻进绞索，就向左跳进河里，您会选择哪一边呢？您的感觉和常理会让你怎么做呢？我想，随便谁也会这么想，都会挑选往水里跳，指望在游到对岸后，危险就过去了，没人愿意用自己的脖子去试一下绞索是不是结实。我如今的处境就是这样。当兵的生涯自然是难熬的，但要比绞索强。如果一下把你绞死，这倒也罢了，可是整天在棍棒皮鞭下，带着脚镣手铐，在地下室里，赤身裸体，光着脚，忍受着饥渴，在无尽的屈辱中，慢慢被折磨死去，这是难以忍受的。老爷，虽然你把农奴看成是自己的财产，常常是连牲口都不如，但是对他们来说，最不幸的

是他们还没有丧失掉人的情感。我看得出，从一个农民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感到吃惊，但是听了之后，您为什么不对自己那些贵族兄弟们的残忍感到惊讶呢？”

徭役中最为必要，也最艰苦的乃是兵役。征兵的方式各地不同，但在各地都引起极大的麻烦。英国的强制征兵制虽然每年都要受到反对派各种手法的极力反对，但仍然在大力推行。普鲁士的 Landwehr（德语：民团），一种强有力的适应国家需要的兵役制，但还没有被实践证明是合理的，因此已在甚至有耐性的普鲁士人中引起抱怨。拿破仑的征兵制则是在整个法兰西的嚎啕痛哭和诅咒声中施行的。

凶恶的怪物俯身在孩子摇篮上，
用他沾满鲜血的手指计算着年龄，
儿女们在父母家里只不过是
匆匆的过客……①

毋庸讳言，我国的征兵制也是十分残酷的。只消提一下那些针对因逃避兵役而自残的农民的法律就够了。为了使人民习惯兵役，彼得大帝付出了多少心血！但是，一个国家能够缺少常备的军队吗？不彻底的措施不会得出什么效果。短期兵役制可以在 15 年期间把所有老百姓都变成士兵。在发生民间叛乱时，市民们可以像士兵一样打仗，而士兵们哭泣和闲聊起来又像一群市民。两方面彼此紧密相连。俄国的士兵在 24 年服役期间，脱离自己的同胞，除了忠于自己的职守，他变得同一切都格格不入。当他退伍

① 引自茹可夫斯基的诗。

回到故乡时，已是垂暮老人了。他能荣归故里本身就是他良好品德的证明，因为只有没有污点的服役才准许退伍。他渴望得到的只是宁静的生活。在故乡他只能找到几个熟悉的老人为伍。年轻一代不理解他，不可能同他亲密如兄弟。

某些地主-慈善家所主张的轮换兵役制，在还存在我们的贵族法时，不应当存在。最好是利用贵族法为农民做一些好事，从他们中清除掉那些应当受到重惩的、对社会有危害的坏人，使其改变为对社会有益的人。仅仅出于尊重某个我们任意认可的法规，便去牺牲一位对社会有益的勤劳的农民，一个家庭的善良的户主，反而对鸡鸣狗盗之徒、一贫如洗的酒鬼表示宽容怜悯，这是十分不明智的。这对于我们的法律简直是无情的讽刺！

拉季舍夫激烈抨击买卖新兵和其他舞弊的现象。买卖新兵在当时就被禁止，但仍偶有发生。克尼亚日宁喜剧中的一个人物普罗斯塔杜姆说道：

> 十年中他在家就赚了三千，
> 不是靠种粮，不是靠牲畜饲养。
> 而是靠抓住机会，买卖壮丁。[①]

但禁止买卖新兵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富有的农民没有机会免服兵役，而被无情的地主买卖的贫苦农民的命运也并未因此得到改善。

---

① 引自克尼亚日宁《吹牛大王》第1幕第5场。

俄语诗歌格律

特维尔。我们的诗歌，饭桌上的一位朋友说道，从各种意义上来看，都远远称不上伟大。诗歌刚开始出现生机，立刻又沉寂下来。诗歌格律刚向前迈了一步，就停滞不动了。

罗蒙诺索夫明白，俄国的诗歌穿上波兰的装束显得荒谬可笑，便扯掉了它身上这件别扭的短上衣。他虽给我国诗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但却给自己的后继者们戴上了伟大榜样的笼头，至今还没有人敢于越雷池半步。不幸的是当时还有一位苏马罗科夫，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以罗蒙诺索夫为样板写诗，以至于如今他们的追随者们连想都不敢想一下，除了这两位大师作诗所用的格律外，还可能有别的写法。

虽然这两位诗人也讲解其他诗法的规则，苏马罗科夫还留下其他诗法的例子，但都不甚了了，不值得效法。如果说罗蒙诺索夫用扬抑抑格翻译耶和华或大卫，或者如果说苏马罗科夫用扬抑格来写作《塞米拉》或《季米特里》，那么，赫拉斯科夫也会想到，除去抑扬格外，还可以用其他格律写诗；如果他是用史诗特有的格律来描写攻克喀山之役的话，他8年的辛劳就会获得更多的荣誉。因此，对于在维吉尔的风帽上笼上了罗蒙诺索夫的外罩的现象，我并不感到惊奇，但我却希望，荷马的史诗不要用抑扬格，而是用与原作相同的格律来翻译。而科斯特罗夫虽然不是诗人，而只是一位翻译家，也会在我国诗法方面开创一个新的时期，使我国诗歌发展进程大为加快。

但是，使俄语诗法停滞不前的不仅是罗蒙诺索夫和苏马罗科夫。不知疲倦的车夫特列佳科夫斯基写的《蒂列马希

达》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要树立新的格律的榜样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优、劣诗法的样板都已根深蒂固。抑扬格独霸诗坛，韵脚处处设置障碍。如果有谁想用扬抑抑格来写诗，人们立刻会抬出特列佳科夫斯基来压他。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孩子，在他还没有成为弥尔顿、莎士比亚或者伏尔泰之前，也会被视为畸形。到那时有人连特列佳科夫斯基也会从长满青苔、被人遗忘的坟墓里挖掘出来，在他的《蒂列马希达》里发现一些好诗，并且树为样板。

长期以来，人们的听觉已习惯于听有韵的诗也阻碍了诗法的改进。人们长久听到的是带韵的诗，对无韵诗就会感到粗糙，不流畅，欠协调。只要在俄国法语的使用多于其他语言，这种情况就会保持下去。我们的感觉如同一棵柔韧的小树，可以人为地让它长得笔直或是扭曲。此外，诗歌创作中也像其他事物里一样，时髦也可能起到主导的作用，它只要是含有某些自然的成分，就会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但是，一切时髦的东西，特别是在诗歌中，都是昙花一现的现象。表面的光辉可能会长出锈迹，而真正的美却是永远——不会退色。荷马，维吉尔，弥尔顿，拉辛，伏尔泰，莎士比亚，塔索以及许多其他作家，只要人类不被毁灭，他们的作品将永远受到热爱。

我以为没有必要再同您谈论俄语所固有的诗体。只要稍稍明白一点诗法规则的人，都懂得，什么是抑扬格，扬抑格，扬抑抑格或是抑抑扬格。但如果我能就各种格律都举出足够的例子，那倒不是多余的了。然而我是力不从心。如果我的建议会有所裨益的话，那么，我要说，如果外国诗歌作品并不总是用抑扬格来翻译，那么俄语诗歌，以及俄语本身将因此而获益匪浅。如果《亨利亚德》不是用抑扬格来翻译，那

么就会更符合史诗的特点。不押韵的抑扬格甚至比不上散文。

拉季舍夫作为一位热烈的革新者，对于俄语诗法也力图加以改革。他对《蒂列马希达》的研究十分出色。他是第一个用古代抒情格律进行写作的人。他的诗歌优于他的散文，请读一读他的《十八世纪》、《莎菲之歌》，还有寓言，确切地说，哀歌《鹤》——这些都颇有价值。在我引用的那段文字的同一章中，还有一首著名的颂歌，里面不乏极有感染力的诗句。

再来看看俄语诗法。我想，我们会逐渐面临一种无韵诗歌。俄语中的韵太少了。前一个韵引出后一个韵。пламень（火焰）必然引出камень（石头）。чувство（感觉）后面一定跟着искусство（艺术）。有谁对于любовь（爱情）和кровь（鲜血）、трудный（困难的）和чудный（美妙的）、верный（忠实的）和лицемерный（伪善的）会不感到厌烦呢？

关于真正的俄语诗歌，人们谈论得太多了，A·X·沃斯托科夫以其渊博的知识和悟性，为此下了一个定义。说不定我们未来的史诗作家会选中他，并把他树为人民的诗人。

铜村

铜村。——“田野上有一棵白桦，枝叶茂密的白桦，啊，流里，流里，流里，流里……”走过去看看，我自言自语地说，一边打开我找到的一位朋友的文件。但是我读到的是下面的内容。我再也无心向跳环舞的人群走去了。我的双耳已被悲戚所笼罩，这平常娱乐中迸发出的欢快笑声没有能深入到我的心底。啊，我的朋友！无论你在哪里，都请你听一听，评一评。

> 全俄罗斯帝国每周两次从公告获悉，某人或某人无力或拒绝偿付其借贷的或他应缴纳的款项。借来的钱或者被用来赌博，旅行，花天酒地，挥霍一空……或者用来分赠他人，或者白白糟蹋掉，要不就是某人或某人因其他原因负债或被强制索取欠款。两种情况都同样见诸公告——公告中写道："根据县法院或市政府裁定，本日午夜10时将对退伍上尉Г.的不动产、房屋进行公开拍卖，其房屋共……间，编号为……，并随附男女农奴6名。拍卖在其住宅进行，有意购买者可预先前往查看。"

接下来的一幅画面使人怵目惊心，因为它是真实的写照。我不打算再跟着拉季舍夫沉浸在他自负、但却是真诚的冥思苦想之中……但是这一次，我不由地赞同他的看法……。

关于书刊检查

在极好的波扎尔斯基饭店准备午餐的时候，我读完了那篇题为《托尔若克》的文章，文章内容谈的是书刊出版自由问题。听一听一个认为自己完全有出版的自由，并且在自己印刷工场里印制了一本无论思想和用语的大胆都越出限度的书的人谈论这个问题，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有一位法国政论家想要用俏皮的诡辩来证明书刊检查有欠明智。[①] 他说，如果说话的能力是一种新的发明，那么，毫无疑问，各国政府会毫不迟疑地对语言也决定进行检查，颁布相应的法规。这样一来，如果两个人想要谈一谈天气问题，就必须预先获得准

① 指本杰明·贡斯当在其《关于宪法与保障的思考》(1814) 中的见解。

许。

当然，如果语言不是属于整个人类，而只是属于只占人类百万分之一的人，那么所有政府都有必要以法律来限制这个能说话的强大阶层的权利了。然而，识字写字并不像舌头和视力一样是上帝赋予全人类的天然的能力，不会识字写字的人并不是残疾，而被排斥于永恒的自然法则之外。而在能够识字写字的人之中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撰写书本和评论文章的机会和能力。印制一个印张大约需要35卢布，纸张也需一定花费。因而印刷出版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力所能及的。作家（这里且不说天才）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居民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阶层。显而易见，最强大最危险的贵族——乃是能以其思想方式、情绪和偏见，对数代人，对几个世纪施加影响的贵族。同那些写作天才组成的贵族相比，拥有纯正血统和财富的贵族又算得什么呢？没有什么财富能够收买家喻户晓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没有一个政权，没有一个政体，能够经受住印刷的炮弹的毁灭性的轰击。请尊重作家阶级吧，但不要让他们把您玩弄于股掌之间。

思想！这是个伟大的字眼？构成人的伟大的除了思想，又是什么呢？思想应当自由，就像人应当自由一样：在法律的范围内，完全遵守社会规定的准则。

“关于这一点我们并不想争论，”反对书刊检查的人说道，“但是书籍和公民一样，要为自己承担责任。法律也有为这一些和为另一些人而制定的。为什么要预先进行书刊检查呢？就让书籍先从印刷厂出来，然后，如果您发现它有违法犯罪的事实，可以对它进行收缴和焚毁，作者和出版人则可处以监禁和罚款。”

但是，思想已经具有公民的地位，从它产生和表达出来起，它就应当为自己承担责任。难道言语和手稿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吗？任何一个政府都有权禁止人们在广场上任意宣传，并且可以禁止散

发手稿，尽管它是用笔书写的，而不是在印刷机上印制的。法律的作用不仅是惩处犯罪，而且可以预防。这甚至是它有益的一面。

个人的行为的影响是短暂和孤立（isolé）的，书籍的影响则是众多和无处不在的。反对滥用出版自由的法律难以达到其自身的目的——它不能预防恶的产生，极少能将其铲除。唯有书刊检查能完成预防和杜绝的任务。

宫廷礼仪

权力和自由应当在对双方都有利的基础上结合起来。

拉季舍夫关于取消宫廷礼仪的蓝图充满了大部分是陈腐的不正确的思想，但他的结束语却是无可辩驳的真理。

认为按宫廷礼仪规定的仪式要求以卑躬屈膝为前提的看法实在是愚蠢不过的。英国的爵士在晋见国王时行跪礼，并亲吻国王的手，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持反对派的立场，如果他想要这样做的话。我们每天都在信函公文后面签写上**“您最恭顺的奴仆”**，但是，好像我们之中谁也不想去请求当宫廷侍从。

历代沙皇皇宫所遵守的礼仪，在大变革中被彼得大帝取消，叶卡捷琳娜重新制定礼仪规范，并建立了新的礼仪。新礼仪优于其他大国所遵循的礼仪，因为它是建立在健康思想和公认的礼貌准则的基础上，而没有墨守被遗忘的传统和早已发生变化的习俗的成规。先皇性喜朴素，无拘无束，再次放宽了礼仪规则。但这些礼仪仍以恢复为上。当然，国王不需要那些经常使他们感到厌烦的仪式，但是，礼仪也同样是法律，它在宫廷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任何一个有幸接近皇上的人，都必须了解自己的义务，职责，界限。如果缺乏礼仪规则，那么，宫廷人员随时都有可能做出无礼的行为。以不懂礼貌而出名并不是件好事，当然，巴结逢迎同样

也让人恶心。

水闸

在上沃洛乔克，拉季舍夫观赏那里的水闸，怀念那位模仿大自然给人类带来的恩惠，开凿了一条人工河，从而使全区各地均可通航的人。他无限喜悦地望着运河里满载的木驳船往来如梭；他在这里看到了土地的真正富庶，农民的富裕；而且在这缤纷的现象之中，看到了人类活动强大的原动力——私利。但很快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他惯常的轨迹上。他用阴沉的笔调描绘俄国农民的现状，讲述了下面一段话：

有一个人，如俗话所说，在官场没有混出名堂，或者是他不打算去混，于是他离开了京城，为自己买下一座带有一二百农奴的村庄。他决定以务农来谋利。当然，他不是要让自己去扶犁耙，而是盘算以最有效的办法，尽可能地将自己农民的天然劳动力用来耕作土地。为此，他认为最可靠有效的方法是把农民变成既没有意志，又没有情感的工具，他也的确在某些方面把他们变成了成群的被管理者，成群的冲锋陷阵的现代兵士，而分散开来则没有丝毫价值。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没收了农民手中维持起码生活的小块耕地和草场。通常，贵族们都会给农民一点土地，以作为对强迫他们劳动的报偿。一句话，这位贵族先生强使所有的农民，他们妻子，儿女，全年不歇地为他干活。为了这些农民不致饿死，他定量发给他们一些面包，这就是常说的“月粮”。而那些没有家小的农奴，连月粮也得不到，而是像斯巴达人那样集中在老爷的院子里“饮宴”，不过，为了不弄坏肠胃，所以开斋

期中他们只喝菜汤，而在斋节和斋期则吃面包和克瓦斯。只是在复活节后的一个礼拜才有一点真正的肉食。

这支队伍的装束也与他们的地位相称。冬天穿的鞋，也就是树皮鞋，是他们自己做的，包脚布是老爷发的，夏天都光着脚，用不着鞋袜。自然，这些囚徒般的农民也不会有奶牛、马匹、绵羊和山羊。老爷并没有收回准许饲养牲畜的成命，而是弄得你没法去饲养。境况稍好一点的，或是吃饭更省的农奴家庭也有喂养几只家禽的，但是有时被老爷随便给几个钱就拿了去。

使用这样的经营办法，这位先生的农业蒸蒸日上就不足为怪了。别人的庄稼歉收时，他收的粮食是种子的4倍，别人收成好时，他收的粮食是种子的10倍，甚至更多。在不长的时间里，除了原先的200个农奴，他又为自己的私利添购了200个牺牲品，而且用相同的办法来对待他们。年复一年，他的财产不断增加，同时他的田地上发出呻吟的农奴数量也不断增加。如今，他的农奴已经是以千为单位来计算，而他本人则获得了卓越农业家的名声。

拉季舍夫笔下的地主使我回想起另一个，我15年前的一位熟人。我欠成熟的思想方式和当时激烈的情绪使我不愿与之交往，并且妨碍了我去研究我所遇到过的一个特别的人物。这位地主系出小路易十一世家族。他是一个暴君似的人物，即在思想体系、信念方面是一位暴君，他目标明确，而且是以其不平常的全身心的力量，和从不掩饰的对人类的轻蔑，向着这个目标前进。成为拥有2000农奴的地主之后，他发现这些农奴，如常言所说，都被自己的优柔寡断、粗枝大叶的前任娇惯坏了。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使全部农民彻底破产。接着他又着手完全实行自己的计划，并且

在3年之中把农民们弄得一贫如洗。农民自己没有任何财产，他耕地的犁是老爷的，套的马也是老爷的，他自己的牲口全部卖掉了，吃饭也是在老爷院子里为农奴设置的斯巴达式的公共食堂，他自己家里连一碗汤、一块面包也没有，衣服、鞋子都由老爷发给——总之，拉季舍夫的文章好像就是我认识的那位地主家业的真实写照。您会怎么想呢？这个折磨别人的人反倒有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在迫使自己的农奴习惯于贫困、非人的劳动和逆来顺受之后，他又想让他们富裕起来，把财产还给他们，并且让他们享有权利！但是命运没有让他去完成自己的蓝图。在一次火灾中，他被自己的农奴打死了。

论俄罗斯文学之贫困[①]

如果说俄罗斯文学没有提供多少值得文学批评界瞩目的作品，那么它自己（就像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现象一样）就应当去吸引那些严谨的探索真理的人的注意。

俄罗斯长期置身于欧洲大局之外。它从拜占庭接受了基督教之光，却从未参与罗马天主教世界的政治变革和思想意识领域的活动。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没有对俄罗斯产生任何影响；骑士精神高尚的狂热没有使我们的先辈们振奋；十字军东征引起的有良好作用的震动在北方这块麻木的土地上没有得到任何反响……俄罗斯被赋予了另一个崇高的使命……它一望无垠的山川吞吸了蒙古人的力量，在欧洲的门槛边遏制住了他们的入侵。野蛮的蒙古人不敢把被奴役的罗斯（俄罗斯古称）留在自己的后方，便回到了东方的草原。是备受蹂躏、气息奄奄的俄罗斯拯救了正在形成的文明[②]……

由于鞑靼人惊人的疏忽而得以保全的僧侣是唯一能在暗无天

① 本文作于1834年，1855年部分发表。本文是早期一篇提纲《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现存的仅是普希金构思的一篇文章的一部分。关于这篇文章内容的全貌，可以参考保存下来的提纲（见篇末）。

② 并不像前不久某些欧洲杂志断言的那样，是波兰拯救了文明。欧洲对待俄罗斯的态度总是如此无知和忘恩负义。——普希金原注

日的两百年间，以拜占庭文化微弱的火花为精神食粮，在静寂的修道院中修士们孜孜不倦地书写编年史。大主教们以书信同大公们、大贵族恳谈，在这痛苦、绝望、考验的时刻抚慰他们的心。但是，我们被奴役的人民的精神生活没有得到发展。鞑靼人不像摩尔人，他们征服俄罗斯之后，并没有给它带来代数和亚里斯多德。推翻桎梏的斗争，大公国和封地之间，集权同城市特权之间，专制制度同大贵族权利之间，以及占领和民族自主之间的斗争，对于文化的自由发展都起着不利的作用。当欧洲文学中，史诗、传说、讽刺作品、抒情诗、神秘剧等等已经泛滥时，我们古代文献档案馆和藏书室里，除了几部编年史，再也不能为好奇的探索者们提供别的精神食粮。一些不断以口头传说新编的童话、歌谣保存了一些模糊的民族特性，《伊戈尔远征记》便成了唯一的纪念碑，兀立在我国古代文学的荒漠之上。

但即使是在暴风骤雨和变革的时代，历代沙皇和大贵族们在一个问题上也是一致的：即必须使俄国同欧洲接近。因而便有了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同英国的联系，戈都诺夫同丹麦的信函来往，17世纪贵族向波兰国王呈递议和条件，阿历克赛·米哈依洛维奇派遣驻外使团……最后，又出现了彼得大帝。

俄罗斯像一艘在斧头声和大炮轰鸣声中下水的战舰进入欧洲。但彼得大帝从事的战争却是有益和富于成果的。国家变革的成就就是波尔塔瓦战役的结果，而欧洲文化也在已开发的涅瓦河靠岸了。

彼得未能完成他所开创的伟业，就在创造力鼎盛的壮年与世长辞了。他对文学的态度似乎漫不经心，但目光十分犀利。他推崇费奥凡，赞扬科皮耶维奇，不喜欢塔季谢夫的轻狂和自由思想，而当特列佳科夫斯基还是一个学童时，就看出他会成为一个毕生勤奋的人。种子已经播撒到土壤里。摩尔达维亚国王让自己的儿

子在彼得大帝的征战中接受教育，霍尔莫戈雷一个渔夫的儿子[①]离开了白海岸，敲响了查依科诺斯巴斯学校的大门。新的文学——作为新创立的社会的果实，很快就要诞生了。

18世纪初叶，法国文学占据了整个欧洲。它注定要对俄罗斯产生长时期的决定性的影响。因而首先应当对法国文学作一些探讨。

在研究17世纪初充斥法国文坛的小诗、抒情叙事诗、回环体诗、一节二韵诗、十四行诗、讽喻体长诗、讽刺长诗、骑士抒情诗、韵文故事、神秘剧等等时，不能不意识到这种虚假繁荣掩盖下的贫乏。困难的巧妙克服，修辞重叠的成功挑选，轻快的用语，天真的戏谑，真诚的格言——这些都极少给疲惫的探索者带来多少补偿。

浪漫主义的诗歌在全欧洲的发展已经繁荣鼎盛。德国早就有了自己的《尼伯龙根之歌》，意大利有《三史诗》[②]，葡萄牙有《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西班牙则有德·维加、卡尔德隆和塞万提斯，英国有莎士比亚，而法国人的维利昂还在粗俗讽刺歌中颂扬酒店和绞架，并且被视为第一位人民的诗人！他的后继者是与阿里奥斯托和卡蒙斯同时代的马罗。

> 他创作了一些八行两韵诗，促进了抒情叙事诗的繁荣。[③]

散文已经占有绝对的优势。怀疑论者蒙田、犬儒主义者拉伯

① 指罗蒙诺索夫。

② 《三史诗》，指由地狱、炼狱、天堂三部组成的《神曲》。

③ 引自布瓦洛的《诗艺》。

雷都是塔索的同时代人。

一些颇有天赋的人为法国诗歌的贫乏，应当说是低下，感到震惊，他们居然认为，语言的贫乏乃是诗歌贫乏的主要原因，因此极力按照古希腊的样板来革新语言。于是形成了新的学派，其观点、宗旨和所作的努力，都使人想到我国也拥有一些颇具天分的人物的斯拉夫-俄罗斯人学派。然而，隆萨、若代尔、迪贝莱所作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语言拒绝朝与它格格不入的方向发展，而仍然是走自己的路。

终于出现了马莱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1]对他作了如下的极为准确和公允的评价：

终于出现了马莱伯，在法国他是第一人，
使人们感受到诗歌准确的和谐，
指出词只有放在恰当的地方才能有生命，
他使诗神服从人类义务的法则。
语言经过这位明哲作家的加工，
有鉴赏力的人听起来不再粗俗，
诗歌也学会同美融为一体，
诗行之间也不再纠缠不清。[2]

但是，今天马莱伯同隆萨一样被人们遗忘了。这两位天才为诗歌的结构和完美所作的斗争耗尽了他们的毕生精力……那些过分为了词的外部形式，而不是为了词的真正生命所在的作家，那些为了同其使用无干的真正生命所在而殚精竭虑的作家，命运就

① 指布瓦洛，以下引文引自《诗艺》。

② 原文为法文。

是如此！

然而，在这可悲的贫乏之中，在缺少真正的批评，观点摇摆不定，欣赏品位普遍降低的情况下，又是什么奇迹使得法国在17世纪末突然涌现一批光芒四射的真正伟大的作家呢？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大主教黎世留政治上的宽宏？是爱慕虚荣的路易十五的庇护？还是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注定有一个时期，突然天才荟萃，如巨星闪耀，接着又销声匿迹？……但不管怎样？在法国古代诗歌终结时期的一批平庸或可悲的诗人之后，立刻出现了高乃依、布瓦洛、拉辛、莫里哀、拉封丹、帕斯卡尔、博絮特和费奈隆。这些作家在文明世界精神生活中所居的主宰地位，比他们突然出现的原因更容易解释。

欧洲其他民族的诗歌的存在，先于那些以自己伟大作品馈赠人类的不朽天才的出现。这些天才是在已经铺设好的道路上发展的。但是法国17世纪一些出类拔萃的天才遇到的却是：本民族的文学尚处于襁褓阶段。他们蔑视其幼稚无力，于是转而以古希腊罗马为楷模。布瓦洛是一位天赋极高、思想敏锐的诗人，他的《诗艺》成了当时法国文学必须遵循的法典。浪漫主义悲剧的代表，仍然是将它推上法国舞台的老高乃依。

尽管当时法国文学明显地微不足道，黎塞留仍然感觉到了文学的重要性。这位曾经贬低法国封建主义的伟大人物也想要束缚住文学的手脚。作家们（在法国是一个贫穷、狂妄、喜好嘲讽的阶层）的天职是为宫廷效力，并且同贵族一样接受养老金。路易十四仍然奉行红衣主教的制度。不久，文学界人士都汇集于他的王座周围。所有的作家都被授予职位。高乃依和拉辛以奉命写作的悲剧娱乐国王，历史学家布瓦洛则讴歌国王的战功，并圈定值得国王注意的作家名单，近侍莫里哀在宫中嘲笑廷臣。科学院章

程的第一条规定为：颂扬伟大的国王。也有一些例外：一位贫穷的贵族（虽然当时社会里，对上帝和国王的虔敬占主导地位）在荷兰发表了许多关于君主的风趣故事；还有一位能言善辩的主教，在一本充满大胆的哲学思想的书中对王权的光荣作了辛辣的讽刺……不过拉封丹到死也没有得到过养老金，费奈隆则因神秘异端罪被放逐至遥远的教区，并死于该地。

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温文尔雅、精致的文学，它华丽，富于贵族气，有些装腔作势，但正因为如此，才能为欧洲所有宫廷所接受。正如一位现代作家公正地指出的，全欧洲的上流社会都是一家人。

然而，伟大的世纪已经过去。路易十四已失去昔日的荣耀，他虽然比同一代人活得久一些，但还是死了。新思想、新思潮在渴望新鲜事物的人们的头脑中回荡。探索和否定的精神开始出现在法兰西大地。人们对华丽的文风、高尚的想像游戏不屑一顾，开始为迎接18世纪的重大使命而进行准备……。

没有什么比冠以18世纪名称的哲学同诗歌更为对立的了。18世纪哲学矛头所指的是作为一切民族诗歌泉源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而它最喜用的武器则是冷峻、谨慎的讽刺和猛烈、粗俗的嘲笑。伏尔泰，这位时代的巨人，也娴熟地掌握了作为人类精神活动重要领域的诗歌。他创作了一部旨在揭露天主教黑暗的史诗[①]。他写的悲剧在60年中主宰法国舞台。在这些悲剧里，他既不关注人物的真实与否，也不关注环境是否合理，他让自己的主人公合适地或不合适地来表达他的哲学准则。他的短小精炼的作品在巴黎广为传诵。这些小作品用通俗易懂、诙谐的语言讨论哲学问题，只是在韵律、音步上有别于散文，而这种轻快简易的方式看来要

① 指《亨利亚特》(1728)。

优于诗歌。然而后来，伏尔泰在自己生命的某一天，也变成了一位诗人，此时，他全部具有摧毁力的才能都毫无拘束地表露在一部充满犬儒主义思想的长诗[①]里。在这部长诗中，人类至为珍贵的崇高的情感，成了讪笑和讽刺魔鬼的牺牲品，古希腊受到嘲讽，旧约、新约中的神圣的东西受到谩骂……

伏尔泰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伟大的世纪（法国人如此称路易十四时期）的痕迹消失殆尽。贫乏已极的诗歌变成了显示机智俏皮的小玩艺儿；小说变成了枯燥乏味的说教，或是犯罪、色情的画廊。

所有才华出众的人都追随伏尔泰。善于沉思的卢梭宣称自己是伏尔泰的门生；热情的狄德罗是他最勤奋的门徒之一；以休谟、吉朋、沃波儿为代表的英国人热烈欢迎他的《百科全书》；全欧洲的人士都到费尔内[②]向他致意。叶卡捷琳娜同他保持友好的书信来往。费里德里希同他争论不休，又归于和解。整个社会都拜倒在他脚下。伏尔泰终于在巴黎去世了，临终时他向富兰克林的孙子祝福，并且用前所未闻的话语欢迎新大陆！[③]……

伏尔泰的逝世并未使前进的洪流中断。路易十六世的部长们屈尊俯就，同作家们一道出现在演技场。博马舍把一切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引上舞台，使其原形毕露，并加以丑化。年迈的皇后开怀鼓掌，哈哈大笑。

旧的社会接受一次巨大破坏的条件已经成熟。一切表面看似平静，但青年米拉波的声音，犹如远处的风暴，从他被囚禁的监牢的深处，发出低沉的轰鸣……

① 指《奥尔良少女》。

② 费尔内，伏尔泰自1760年起即居住在此领地。

③ 1778年，富兰克林任美利坚合众国驻法国大使。在巴黎期间，他带着孙子拜见伏尔泰，后者正是在这次会见时说了以后成为名言的话：“上帝和自由。”

欧洲为法兰西作家的荣誉倾倒、震惊，对它表现出一种奴颜婢膝的崇敬。德国的教授在高高的讲台上宣讲法兰西批评的规则。英国在哲学领域紧跟法国。理查逊、菲尔丁和斯特恩支撑着散文小说的名声。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祖国的诗歌，像法国诗歌一样，变得枯燥、贫乏。意大利摒弃了天才但丁。梅塔斯塔齐奥开始模仿拉辛。

让我们来看看俄国的情况吧。

……

附：《论俄罗斯文学之贫困》提纲：

1. 17 世纪法国文学简介。

2. 18 世纪。

3. 俄罗斯文学之发端。康捷米尔在巴黎思考其讽刺诗，翻译贺拉斯著作。28 岁时逝世。罗蒙诺索夫热衷于韵律的和谐。年轻时创作充满生动性的颂歌，等等。然后转而研究被苏马罗科夫的荣誉所阻碍(dégouté)发展的精密科学。苏马罗科夫。当时唯有特列佳科夫斯基深刻了解自己的事业。同时，18 世纪 allait son train（法语：照常前进）。

4. 叶卡捷琳娜——18 世纪的学生。她给自己时代的发展以推动。她对哲学的青睐。文学，也像人民一样，拒绝由她摆布。委员，代表，杰尔查文，鲍格丹诺维奇，德米特里耶夫，卡拉姆津，叶卡捷琳娜，冯维辛和拉季舍夫。

亚历山大时代。卡拉姆津为写作《俄国史》而与世隔绝。德米特里耶夫——大臣。普遍的贫乏。与此同时，法国的庸俗文学却 envahit tout（法语：泛滥成灾）。

伏尔泰及文坛巨人们在俄国没有继承者，但一些毫无才气的小人物，寄生于橡树根部的蘑菇，多洛特、弗洛里昂、马蒙特尔、希萨尔、让利斯夫人却主宰了俄国文学。斯特恩的伤感主义对我们格格不人，卡

拉姆津却不同。帕尔尼以及色情诗歌对巴丘什科夫、维亚泽姆斯基、达维多夫、普希金和巴拉丁斯基的影响。茹科夫斯基和1812年，德国的影响日益增加。

当前，法国批评界和年轻的文学的影响。——属于例外。

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康捷米尔的影响被罗蒙诺索夫所摧毁。特列佳科夫斯基的影响则由于他自己缺乏天分而毁掉。特列佳科夫斯基不懈地拼搏。他的失败。苏马罗科夫……叶卡捷琳娜（伏尔泰），冯维辛，杰尔查文。

杰尔维格[①]

杰尔维格出生于莫斯科(1798年8月6日)。他的父亲娶拉赫曼诺娃小姐为妻，于1828年去世，时任陆军少将。

杰尔维格曾在一所私立寄宿学校接受初等教育。1811年末，他进入皇村学校。他的才智发展缓慢。他的记忆力极差，理解力迟钝，14岁时还不懂得任何一种外国语，也没有显露出对某一门学科的天赋。他身上唯一引人注意的是他生动的想像力。有一天，他忽然产生一个念头，对几个同学讲述了1807年一次探险的故事，而且自称是这次事件的目击者。他的叙述极为生动逼真，深深地打动了他年轻的听众。一连数日，他身旁都围着一群好奇的同学，要求他再讲一些有关探险的新的细节。这件事传到我们的校长马利诺夫斯基耳里，他也想亲自听一听杰尔维格讲述他历险的故事。杰尔维格对于自己这种天真无邪、但又别出心裁的编造，羞于说出真情，于是拿定主意继续讲下去，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如果不是他自己承认这都是虚构的，我们当中谁也不会怀疑他的故事的真实性。当他还只有五岁的时候，他就突发奇想去讲

① 一篇评论杰尔维格文章的草稿，未完成。普希金在世时未发表。写作时间应晚于1834年。杰尔维格去世(1831年)不久，普希金致信普列特尼约夫，表示希望参加诗人传记的编写工作，但未能如愿。

述一个奇妙的梦境，并使得全家大为困惑。对于一些生来思想奔放的孩子，说谎的倾向并不妨碍他是真诚和率直的。杰尔维格讲述自己神秘的梦境，以及似乎在同父亲乘马车旅行时所经历的危险，但却从未扯谎为自己的过失辩解，以逃脱申斥和惩罚。

杰尔维格很早就表现出对诗歌的爱好。他几乎能背诵茹科夫斯基出版的俄罗斯诗歌集。杰尔查文的诗歌，他更是手不释卷。克洛卜施托克、席勒和赫尔德等几位德国诗人的作品，他是同一位有"活词典和才情横溢的注释者"美称的同学一道读完的。在班级里，在科尚斯基教授的指导下，他悉心研究贺拉斯。杰尔维格从不参加需要体力的和灵敏的游戏，他更喜爱在皇村林阴道上散步，或和志趣相同的同学谈话。他在诗歌方面最初的习作就是模仿贺拉斯。他在 15 岁时写作的颂诗《致狄翁》、《致丽莱塔》、《致多里达》，都只字不动地收入他的文集里。这些诗歌已明显表现出不平常的和谐感和他永远保持的古典的严整性。当时（1814 年），《欧罗巴通报》的出版人是已故的弗拉基米尔·伊斯马依洛夫。杰尔维格把自己的习作寄给他。这些诗作发表时未注有作者姓名，但却引起了一位行家的注意，他看出这个不知名的新人的诗作已带有经验和成熟的印迹，并且绞尽脑汁，想要猜破这位匿名作者的秘密。然而，这样一位天才早期的纯朴的作品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没有人对这个才气横溢的少年表示欢迎。而与此同时，他的一位同学的诗[1]，一些平庸的，只是以节奏轻快、修饰精致稍稍见长的诗，却大受赞誉，被作为一朵奇葩来推崇！但是，杰尔维格的命运注定如此：在他早年出现在诗坛时，他没有受到重视，甚至现在，当他不幸早逝，安卧在坟墓里的时候，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

① 指杰尔维格和普希金皇村中学的同学 A·Д·伊利切夫斯基的具有古典抒情诗风格的诗歌和讽刺诗。

拜　　伦[①]

拜伦家族是英国贵族（欧洲贵族中最年轻的）中最古老的一支，它发源于征服者威廉的一位亲密战友，诺曼底人拉尔夫·德·布伦（或比伦的拉尔夫）。拜伦家族许多名字在英国编年史中被尊敬地提到。1643年，拜伦姓氏被封赐爵位。据说，诗人拜伦对于自己家谱的珍视，甚于自己的作品。这种情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诗人从他先祖们承继到的荣耀和辉煌，使他更添光彩；相反，他自己挣得的荣耀给他带来的，常常是有损这位高贵男爵尊严的低俗的屈辱，使他的名字成为流言肆意诋毁的对象。

拜伦船长，一位著名的海军上将的儿子和伟大诗人的父亲，因勾引妇女而声名狼藉。他诱拐了卡马申爵士的夫人，并在她离异之后立即与她结婚。婚后不久，她于1784年死去，给他留下一个女儿。翌年，这位工于算计的鳏夫为了挽救自己濒于破产的家业，又与海法的一位领主乔治·戈登爵士唯一的女儿和继承人，戈登小姐结婚。这是一次不幸的婚姻。23500英镑（合587500卢布）在两年中即被挥霍一空，拜伦夫人的年收入降为150英镑。1786年，

① 此文普希金生前未发表。约作于1835年。为拜伦传记性文章开头部分的草稿。在文章手稿上标注有"论拜伦，论重大现象。1835年。黑溪。米列拉别墅。7月25日"等字样。法语摘引自T·穆尔的《拜伦爵士回忆录》，1830年巴黎出版，第1卷，第31—33页。

夫妇二人东渡法国，1787年底又回到伦敦。

次年1月22日，拜伦夫人产下唯一的儿子乔治·戈登·拜伦。(由于家族的规定，海法领地的女继承人必须给自己的儿子加上戈登的名字。)拜伦出生时，他的脚被弄伤。后来的拜伦爵士认为他致残的原因，是他母亲的羞怯或倔犟。戈登公爵和多夫上校为新生儿举行了洗礼。

1790年拜伦夫人去了阿伯丁，她的丈夫亦跟踪而至。他们在此地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他们性格如水火不能相容——此后不久，他们就离婚了。丈夫去了法国，但他早就把路上所需的钱从可怜的妻子那里骗到手中。他于次年，即1791年，死于瓦伦西安。

在阿伯丁短暂居留期间，他有一次把年幼的儿子带到自己家里，儿子在他那里过夜。但第二天他就把这个不安静的孩子打发回他母亲那里去了，从此再也没有接他到自己住处来。

拜伦夫人是一位单纯、性格急躁的女人，在许多问题上显得冒失轻率。但是，她在过穷日子中所表现出的坚强性格，却使她为人的准则受到敬重。她只雇用一个女仆，当她于1798年带着年幼的拜伦来到纽斯台德领地时，她的债务还没有超过60英镑。

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拜伦从来也没有提起过自己童年的家事，因为那些往事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幼年的拜伦在阿伯丁的一所学校学会了读书写字。在班上，他是最差的学生中的一个，但在游戏玩耍方面却算得上数一数二的。根据他当时同学的回忆，拜伦是一个好动、性情急躁、爱记仇的孩子，他随时都准备同别人打架，并且为一些陈年老账进行报复。

有一位帕特逊先生，是一位严肃的长老会教徒，但又是一位稳重、学识丰富的思想家，他后来成了拜伦的导师，拜伦总是带着感激之情回忆这位恩师。

1796年，拜伦夫人为了让小拜伦在患猩红热病后健康得到恢复，把他带到山区疗养。他们在巴拉特尔附近住下。

苏格兰大自然严峻粗犷的美对这位少年的想像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8岁的拜伦恋爱上了玛丽·多夫。17年之后，他在一篇札记中叙述了自己童稚时的爱情：

近来我常常想到玛丽·多夫。多么奇怪的事，在我当时不仅不可能体会爱的感情，甚至连这个词的意义也弄不懂的年龄，我竟然会对这个小姑娘产生如此无限的忠诚和如此深深的依恋。然而，这的确是真正的爱情！我的母亲对我这种孩子式的爱情通常总是加以取笑，甚至在过了许多年之后，——我大约已经16岁了——有一天，她对我说道："啊，拜伦，我收到一封从爱丁堡发来的信，是阿倍克罗姆比小姐写的，你从前的心上人，玛丽·多夫已经嫁给S先生为妻了。"我当时是怎样回答的？我现在也无法弄清和解释那一时刻我所迸发的感情。我的全身几乎抽搐起来，母亲见了十分惊惶不安。在我恢复常态后，她坚持不再同我谈起这件事，而只是和自己的几位女友聊聊。时至今日，我还常问自己，这能意味着什么呢？自从由于她母亲在阿伯丁的一次过失，他们搬到住在邦夫的祖母家之后，我再也没有同她见过面。我们那时候都完全是孩子。但自那以后，我对她的爱情比以前浓烈了50倍。而且我还记得我们说过的话，记得我们的抚爱，她的面容，我的激动和不眠之夜。还有我折磨着我母亲的一个使女，让她以我的名义给玛丽写信。为了使我平静下来，她最终还是让步了。这可怜的姑娘认为我是发疯了。因为那时我的字还写得不好，于是，这位使女就成了我的秘书。我还

记得我们在一起散步，记得在阿伯丁的普兰斯通附近她家的育儿室里，她的小妹妹玩着玩偶，而我们并肩坐在一起，认真地以自己的方式彼此献着殷勤时，我感到自己是多么幸福。

但是，这样的情感怎么会如此之早地在我身上出现？它的原因和根源何在？当时，以及数年之后，我连对性别的差异一点概念也没有。然而我的痛苦，我对这个小女孩爱情是如此强烈，有时我甚至产生疑问，那以后我是否还真正的爱过什么人？不管怎样，她出嫁的消息对我有如五雷轰顶，我差点没昏厥过去。这使我的母亲惊恐不安，但对其他人却是难以置信的。我生命中这一不平常的现象（要知道我当时还不到 8 周岁），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会痛苦地寻求它的答案。从某个时候起，我自己也说不出是为什么，对玛丽的**怀念**（而不是对她的感情），比以前更加强烈地重新在我心中燃起。我很想知道，她是否还记得这一切。是否还记得我这个人？她是否还记得，她为了她的妹妹爱伦没有人为之倾倒而对她表示怜恤？我的心里保存着她多么妩媚动人的形象！她栗色的头发，淡褐色的洋溢着爱抚的眼睛——一切，直到她的衣着！如果我**现在再见到她**，那我倒会是真正的不幸了。无论她是多么娇美，但现实会毁掉在 16 年之后（因为我现在已是 25 岁零几个月了）仍然保持在我心中的她那救难仙女佩里的迷人形象，或者至少会使这个形象变得黯然失色。[①]

1798 年，老威廉·拜伦爵士于纽斯台德去世。此前四年，他的嫡孙在科西克死去。因此，乔治·拜伦成为自己家族产业和爵

① 原文为法文。

位的唯一继承人。但由于他尚未成年，故由他的一位远亲卡莱尔爵士对他行使监护权。于是，心满意足的拜伦夫人于当年秋天带着11岁的儿子和忠诚的使女玛丽·格莱，离开阿伯丁，来到了古老的纽斯台德。

威廉爵士，海军上将拜伦的胞弟和诗人的叔祖父，是一位古怪和不幸的人。他曾在一次决斗中刺死自己的亲戚和邻居恰沃特。他们是在点着蜡烛的小酒馆里，在没有见证的情况下决斗的。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贵族院判杀人者有罪。然而他却被免于刑罚，从此即定居纽斯台德。在这里，他的怪僻、吝啬、阴沉的性格，使他成为流言蜚语的牺牲品。关于他同他妻子离异的原因，当地流传着一些荒唐的说法，似乎是他想要把妻子淹死在池塘里。

他出于对自己继承人的厌恶，千方百计地去糟蹋自己的财产。唯一能同他谈话的是一个老仆人和一个兼做其他事情的女管家。此外，他满屋都喂着蟋蟀。虽然老威廉爵士生性吝啬，但他仍然经常缺钱，并且有时用一些对他的继承人来说十分不体面的手段来弄钱。像他这样一个人是不会去为自己的继承人着想的。于是他变卖了他毫无权利支配的一处祖传产业罗奇达尔。买主们对此十分清楚，但他们指望在其继承人制止这笔非法交易之前，就塞满自己的腰包。

威廉爵士从未同被他称为住在阿伯丁的孩子的年幼继承人有过接触。

年轻的拜伦爵士早年在与他的出身不相称的贫困环境中，在喜怒无常的脾气暴躁的母亲的管教下度过的岁月，对他此后的一生产生了强烈的持久的影响。自尊心受到伤害，感情受到震荡，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日后成为他性格主要特征的那种苦痛和易于激愤的印记。

拜伦爵士古怪的性格部分是与生俱来，部分则是后天得来的。

穆尔正确地指出，拜伦的性格鲜明地反映出他的先辈中许多人物的优点和缺点：一方面是富于胆识的进取心，坚毅、高尚的情操，另一方面是放荡不羁的激情，怪癖，以及对社会舆论狂傲的蔑视。毫无疑问，关于威廉爵士的种种传说，对于他的继承人的想像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拜伦从自己性格怪癖的叔祖父那里接受了许多东西；而且我们不能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曼弗雷德和莱拉极似那位纽斯台德离群索居的男爵。

一件看来无足轻重的事，对他的心灵却有着如此强烈的影响。在拜伦出生的那一刻，他的脚被弄伤了——这使得他终生成为跛足者，身体的缺陷刺伤了他的自尊心。有一次，他的母亲骂他是**小瘸子**，他的狂怒简直无法形容。他虽然容貌俊美，但总是想像自己是一个残废，总是力求避免同他不太熟悉的人交往，因为害怕遇到他们嘲笑的目光。这一身体缺陷也增强了他努力在所有要求体力和灵敏的活动中胜人一筹的愿望。

帕甫洛夫的《三部中篇小说集》[1]

帕甫洛夫先生的三部中篇小说非常出色，获得了理所当然的成功。三部中篇在叙述上的高超技巧和优美文笔，是我们那些沉迷于长篇小说的作家们所不曾赐教于我们的。

《命名日》虽引人入胜，但还是显出了某些败笔：**被理想化了的奴性**对于健康的审美趣味来说，总是显得不自然，不舒服。也许，在其原本的、异乎寻常的朴实之中，事情本身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色彩和更为明显的戏剧性，但这便要求更大胆的笔触，要求对人的心灵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拍卖》是一则机巧逗人的笑话，是一幅轻松活泼的漫画，画面上别致地描绘着三四个人物。“我到拍卖行去”、“我从拍卖行来”——其特征完全是喜剧性的。

我们对《土耳其弯刀》的评价与对《命名日》的评价相同。它的引人入胜并不能抵消它的缺陷。结局是不切实际的，至少是出现了时代的错位。然而，所有的人物都栩栩如生，每个人的言谈举止均符合各自的个性。在帕甫洛夫清新流畅的文笔中，**偶尔也**出现那么一点**矫揉造作**；在他的描写中存在着当代法国小说家们

① 此文是尚未发表的书评草稿。发表于1884年。帕甫洛夫的《三部中篇小说集》于1835年问世。书中对农奴制的批判引起了尼古拉一世的注意，他命令向书报检查官斯涅基列夫发出严厉警告。

那种注重鸡毛蒜皮的近视和小器。帕甫洛夫先生在《莫斯科观察家》杂志上倍受赞扬，因此，我们在这里便只想局限于对他进行批评了。不过，在文章的结尾还是应当指出：帕甫洛夫先生是我们中间第一位写出了真正能够吸引人的故事的作家。按照一位夫人的说法，有些书一读上，你便会废寝忘食。他的书就属于这一类。

帕甫洛夫先生的才华高于他的作品。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真理的直觉吸引并支配了作者，甚至违反了他的意志——在《命名日》中，尽管那位受到赏识的军官在作者的想像中是个可爱的英雄人物，但作者仍然赋予了他一些显露奴性的特征：

知道吗，不敢坐下，不知该往哪里坐，如何坐——这种感觉可太令人苦恼了！……不过，现在我可要把当时受的气发泄出去了，谁第一个被我撞上谁倒霉。您能明白这样一种快乐吗：粗鲁地回答人家礼貌的问话；当别人向你毕恭毕敬地脱帽行礼时，你却只是微微地一点头；面朝拘谨的少年，面朝彬彬有礼的富翁，你尽管伸开胳膊腿瘫坐在圈椅里，这滋味可有多么痛快啊。

丘欣札记

（法杰依·布尔加林作品）

在给自己一部长篇小说写的前言中，布尔加林先生告诉读者，说有人认为他没有什么才华。看上去，这使他深感惊诧。他甚至用了“！”来表达自己的惊诧。

从我们这方面来讲，我们明知有人认为布尔加林先生有才华，但我们对此却并不感到惊诧。

布尔加林先生的这部新长篇小说若是与他以往的作品相比，倒是丝毫也不显逊色。

扎戈斯金的喜剧《不满者》[①]

莫斯科的杂志对札戈斯金先生的新喜剧纷纷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它们认为这出戏低级下流，无聊乏味。《不满者》的确是以非常轻浮的诗句写成的一部乏味而糟糕的戏。搬上舞台的人物既不可笑也不自然，没有任何喜剧性可言。对话庸俗而冗长，却难以掩饰它的苍白与空洞。

扎戈斯金先生是以自己的长篇小说赢得公众赞誉的。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既有生动的想像，又有引人入胜的情节，甚至还有诙谐的乐趣。这便是可贵的品质，这未必不是所有天赋中最为难得的。我们在此草草提及《罗斯拉夫列夫》作者的失败，为的是再也不要回到这使人不愉快的话题上来。

① 写于1836年初。

白俄罗斯大主教格奥尔基·科尼斯基文集[①]

大司祭约翰·格里高罗维奇出版，圣彼得堡，1835年。

格奥尔基·科尼斯基在我们中间成为知名人物，除了他的其他作品外，乃是由于他的短文《留待天文学家去……》。这篇短文是他1787年在姆斯季斯拉夫利向巡游中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敬献的呈辞。这篇短文在我们所有的修辞班里倍受赞誉，可它只不过是一篇机巧的致辞而已，文中玩弄词藻似乎也过于别出心裁。在我们看来，至圣者菲拉列特1830年底在莫斯科恭迎皇帝时所作的祝词，在其感人的朴实中却蕴含着更多的雄辩力。不过，情境的不同可解释两位演说家所表达的感情的差异。女皇陛下巡游时，前呼后拥，好一个豪华奢侈的帝王排场。她所到之处，必有盛大庆典迎候，到处莺歌燕舞，一片欢乐喜庆的景象。而皇帝陛下巡访的，却是被瘟疫横扫一空，为灾难与恐怖威胁笼罩的莫斯科。

但格奥尔基毕竟是上个世纪最值得人们怀念的人物之一。他的生平应当载入史册。他上任管理自己教区的时候，白俄罗斯尚处在波兰人的统治下，东正教正受到天主教宗教狂的排斥和压制。我们的教堂要么门庭冷落，要么交给了宗教合并派。传教士们用

① 发表于《现代人》1836年第1期。

武力将人们赶进合并派的教堂。他们辱骂违命者，将他们斩首或关人黑牢，用饥饿来加以折磨。他们还抢走这些人的子女，为的是把孩子们教育成他们自己的信徒。他们拆散按照东正教婚俗仪式建立的家庭，亵渎东正教的墓地。在此情况下，格奥尔基便向俄国政府寻求庇护。他把发生的一切向圣主教公会进行了陈述，并向我国驻华沙公使作了控诉。他的热忱努力越发激起了压迫者的穷凶极恶。以仇视东正教而闻名的天主教布道兄弟会修士奥夫拉钦斯基，决意要把格奥尔基作为自己残暴行径的牺牲品。1759 年，格奥尔基不顾威胁着他的危险，前去视察他那片怨声四起的教区。奥夫拉钦斯基和传教士们在奥尔沙怂恿小贵族及士兵们闹事。他们驱散举着神幡前来迎接自己的大法师的人群，止住教堂的钟声，嚎叫着冲人格奥尔基主持宗教仪式的教堂。主教大人在库捷因修道院的高墙内才侥幸躲过了他们的刺刀，后来又被人们用一辆粪肥遮掩的四轮大车偷偷地运了出去。另一个凶残的暴徒泽诺维奇则率领耶稣会学生于当天夜里在莫吉廖夫袭击了大主教的住处。狂暴的年轻人破门而人，他们击坏了所有的窗户，打伤了一些修士、学员及仆从。所幸的是，他们未能找到藏在地下室里的格奥尔基。

迫害者的狂暴与日俱增。在波兰政府的放任和纵容下，传教士们为所欲为，他们亵渎东正教教堂，他们软硬兼施，不仅逼迫普通百姓，而且要求教会僧侣们也参加宗教合并。格奥尔基再次向俄国提起控诉。弥留之中的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及行将登基的彼得三世陛下，要求波兰朝廷停止对东正教教徒的迫害。但是，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东正教才得以免除灾难。

1762 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到莫斯科行加冕礼，格奥尔基觐见了女皇陛下。他尾随众僧，向女皇敬献了贺辞，同时一并呈上了百姓们哀怨的诉状。那些人自古曾是我们的同胞，而战争却将他

们与俄罗斯分隔开来。叶卡捷琳娜极为关注地倾听了格奥尔基代表她未来的臣民们所作的哀怨呈诉。过了一些时候，当圣主教公会决定召回格奥尔基并委派他去管辖普斯科夫教区时，女皇陛下未予恩准。她说："格奥尔基应该去波兰。"

1765年，格奥尔基来到华沙。他在斯坦尼斯拉夫的御座前慷慨陈辞，替那些当时还被称之为波兰臣民的人们鸣冤叫屈。国王听了他的呈辞大为震惊，许诺要向脱离国教者[1]提供庇护，并于次年"责成合并派高僧选派一名主教去华沙，以寻求并提出适当的措施，使敌对双方达成谅解。"但是，傲慢的波兰大封建主们对俄国和普鲁士的调解置若罔闻，他们拒绝了脱离国教者们正当的要求。这就导致了叶卡捷琳娜派兵进攻华沙。在华沙，在俄国刺刀的保护下，召开了国会，成立了相应的委员会，脱离国教者们终于重新获得了他们昔日的权利。

格奥尔基作为斯卢茨克同盟[2]的首批成员之一，被确定为上述委员会的成员。他再次前往华沙，积极从事古文字的诠释工作，因为脱离国教者的法典乃是用古文写成的。他善于赢得自己对手的尊敬甚至信任。一次，合并派主教舍普季茨基对他说："在您百年之后，我却仍然活着，一旦天主教徒把您除掉，他们就会来对付我了。"合并派教徒暗地里准备脱离罗马教皇，重新与希腊-俄罗斯教会联合。与此同时，受到舒瓦瑟尔政策支持的巴尔同盟[3]挑

① 脱离国教者，此处指居住在立陶宛境内的东正教教徒。他们不承认1596年布勒斯特宗教会议决定的教派合并（与天主教会合并）。在波兰，新教教徒亦属脱离国教者。

② 斯卢茨克同盟，东正教信徒同盟。其代表于1767年3月集会于斯卢茨克，要求维护东正教脱离国教者在波兰的公民权利。

③ 巴尔同盟，波兰小贵族代表同盟，旨在抵御俄国在波兰的影响。舒瓦瑟尔(1719—1785)，1758至1770年任法国外交大臣。

起了一场新的战争。其结果导致了波兰的第一次分裂。古代归我国所有的 7 个州被交还到他的手上。于是，当格奥尔基 1773 年去觐见叶卡捷琳娜的时候，他已经是以臣民的身份在兴高采烈地向白俄罗斯的救星和合法统治者致敬。

从此以后，格奥尔基便能潜心于自己教区的管理，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属下僧侣的培养上。他创立了教会学校，孜孜不倦地教导自己的教民，闲暇时间全用来从事学术研究。格奥尔基于 1795 年辞世，享年 77 岁。

目前，И・格里高罗维奇出版了格奥尔基・科尼斯基文集，并且为文集附上了有趣的、叙述生动的格奥尔基・科尼斯基传。

格奥尔基的布道词非常朴实，甚至有几分粗浅，就像原始时代长老们的训导。然而，这些布道词的真诚却是很有吸引力的。他的政治言论亦有很高的价值。其中最为优秀的一篇文章，曾在叶卡捷琳娜加冕礼上由他本人亲自向女皇陛下朗诵过。在此，我们选登他的部分言论和见解：

斋戒之于祈祷，就如羽翅之于飞鸟。

*

当不欲诚心悔过之罪人向圣母祈祷，向她大声喊道："恭喜啊！"的时候，此朝贺是如此地辱没了她，就如同犹太人的那声"恭喜啊"。当时，那些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的人一面打着她的儿子——上帝之子的脸，一面喊道："恭喜，犹太人的王

啊！”[1] 须知，不悔过的罪人乃是在把基督重新钉上十字架[2]。我们寻求着她的保佑和庇护，但我们首先要抛弃自己的罪孽，因为若是罪过在身，穿着法衣亦将被逐出。

*

灵魂不灭，它离开速朽之躯，犹如鸟儿欢快地冲出挣破的网，飞向上帝的天堂，那里生命之树总是开满鲜花，那里是基督和他的选民们的安居之所。

*

我们的躯体，于棺材中腐烂掉的，化作尘埃四处飘散的，将如同春天里的青草，从泥土里生长出来，在与灵魂结合之后，将重新复活，出现在整个天宇的面前，出现在天使和凡人的面前，面对祖先，面对后人，一些犹如麦苗，另一些则如莠草，等待着天使的镰刀，期待去到那专门为着小麦或专门为着莠草的地方。

*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3] 如此独自的祷告在会

①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7章。

② 参见《圣经·新约·希伯来书》第6章。

③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

堂里亦能进行，若祷告的人抛开一切尘世的烦恼和操劳，在四周的一片嘈杂中保持静默；若他忘却自己的七情六欲，独自与唯一的主对话。亚伯拉罕带自己的儿子以撒去作燔祭时，对随从的仆人们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①] 真诚的祷告者便是这样命自己的欲念离开自身，如同命自己的仆人，以待他将自己的祈祷带给主，就如同将以撒带给主作燔祭一样。噢！我们的祷告与这样的祷告相去多远哟。我们甚至在独处的时候亦在自己周围聚起整整的一个集市。我们一面祷告，一面作买卖营生，还惦记着高利盘剥，亦讨好朋友，亦对敌人舞刀弄枪，心里恋着甜食，还牵挂着自己的大木箱。这究竟是祷告呢，还是更似那充满嘈杂之声的集市？能明了自己嘴里所念之词的理性在哪里吗？必当皈依主的心又在哪里？唯有嘴皮子在鼓噪，舌头像铙钹一样，发出响亮的声音来；可是意念——像空中的鸟儿，四散飞出去了；心儿——冰冷的，犹如没了灵魂的僵尸，与我们的财宝合葬在同一处。

*

被自家弟兄卖到埃及的约瑟，在成为埃及主宰之后，把最好的一块地方赐给了弟兄们作为封邑，这块地方叫作歌珊。[②] 上帝之子，仁慈无边，兼备了我们凡人的自然禀性，以此方式成了我们的兄弟。他所给了我们的，不是天国的某一部分，而是自己的整个王国。天宇之于我们，乃是无边无涯

① 《圣经·旧约·创世纪》第22章。

②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纪》第47章。

的；供桌已经备好；我们在天上的兄弟正张开双臂等候着拥抱我们。让我们飞到他那儿去吧！可是，首先我们须得抛开一切引诱我们坠到地上来的凡尘的拖累。

*

我们可大胆地同圣奥古斯丁一道，对那不信奇迹的人们说："一切奇迹中最大的奇迹乃是这样的一件事：有12个人，他们既无书也没有武器；他们一路行乞，一路传教、宣扬十字架；他们不仅战胜了世界上的统治者与强人，而且战胜了多神教的众神，于是整个世界都臣服了基督。"你反驳我道，那12个世界的征服者皆已丧命，而且，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临死时不受到折磨，或死于十字架，或死于剑与火。但这便是我的简短的答复：这帮征服者被自己的主差遣而来，为的正是这个："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①] 显现在这个世界面前的最大的奇迹，福音真理留下的痕迹，便是这些无敌的征服者们痛苦的惨死。可我们瞧啊，他们的死换来了什么？众王都景仰他们的圣体，敬献上皇袍与花环，毕恭毕敬地跪拜在他们的灵柩前。

*

我们从未在任何史料中读到，多神教的信徒会为着自己的偶像，如同基督教苦行者为着基督的信仰那样，去受苦受

①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

难。在当今诸多反上帝的无神论者和自然主义者中间，在他们的主要巢穴法兰西和英吉利，哪怕能找到一个热忱的尽忠者，甘愿为着自己的无上帝论信仰和自然主义去受苦受难的？几年前，在我们俄罗斯，有位知名的贵族被告发为无神论者，可他一见到鞭子便立即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

许多人皆说：为何我们的祷告既没能创造出奇迹，亦没能使我们的生活得以改善。我们的祷告！唉，连提起它都叫人觉着羞惭！说起我们的祷告，便使人想起一位舵手对船上一罪犯讲的话：当可怕的暴风雨来临时，众人皆开始祈祷。那罪人也随众人一道喃喃念叨起来。舵手打断他说："你还是给我闭嘴吧：上帝不知你与我们一道，因此我们现在还能在绝望与希望之间挣扎；如若上帝听见你的祈祷，我们便必死无疑了。"只在嘴上念叨，心里却不明了，不记得舌头说的是些什么，这样的祷告可算得上祷告么？我们念着："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①] 然而我们自己却不知自己的言语，也不明白自己的呼声。如此祈祷能改变我们这些天地不容的罪人，能使我们成为善的，成为上帝希望的人么？走进教堂时，我们满身罪孽，走出教堂时，我们愈加罪孽深重。

① 《圣经·旧约·诗篇》第5章。

*

肉体的欢乐仅限于享受，随着欢乐的古多克琴声渐渐沉寂，欢乐便也渐渐消逝。但是，心灵的欢乐却是永恒的欢乐，它不会因了不幸而衰减，也不会因了死亡而结束，它将随你转世升天。

*

行善时拯救我们的灵魂是否至关重要？我可用一类似的事来向你解释这个疑问。你拿一个小铜块去赶集。在集市上，你用它什么也买不来。随便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会含了讥笑地对你说这样一句有名的谚语：“出一戈比，买一面包。”但如若你手中那铜块印有帝王头像或钱币的其他标识，你便可用它买你所需之物了。我们的行善亦是如此。如果你心中缺了对救世主基督的信仰和希望，你必定会认为行善是徒劳无益的。但是，你若把行善与对基督的信仰与希望联系起来，那么行善便会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你若要赎罪，或要换得那天上永恒的安慰，你所行的善必会使你如愿。

*

我们用心智认知；肉眼只不过如同一副眼镜，透过它，心灵之眼观看这世界。

*

他人之罪不由我承受。但是，如若他人之罪是因为我的怂恿、赞同，或是因为我于疏忽之中作出了坏榜样，那么，此罪不仅该由我来承受，它且会像磨盘一般地压着我的心。救世主说："绊倒人的有祸了！"[①] 实际上，诱惑的罪过在我出生之前，在我死之前，就已受到了上帝的审判；在我死后，还将随我一道去接受上帝的审判。换言之，所有被我的坏榜样诱惑的，且又先于我被召去接受上帝审判的人，他们已将我的罪孽带了去。因此，我将遭的罪早已为我先安排了。但并未就此了结。我死后，不再造孽；可所有受了我诱惑的人，还有那些受被我诱惑的人的诱惑而正在造孽的人，他们还留在人世，他们正步我后尘，把同是从我这里学到的，如出一辙的无数罪孽带给人世。因此，新的、加倍的灾祸又为我准备了！看啊，诱惑的罪孽是何等的可怕，比多头水蛇许德拉还要可怕！

科尼斯基还写了一些诗，有俄文的、波兰文的，还有拉丁文的。从艺术上讲，这些诗没有多大价值，尽管其中亦蕴含着深邃的思想。但下面这首挽诗，在我们看来却是可以奉为经典的。

成熟的穗儿静候着镰刀；
染霜的鬓发向我们预示死期已到。
噢！必死之人无所操劳，且把镜子照：

①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8章。

瞧你白发苍苍，恰似年过半百人已老。
你准备怎样踏上死亡之途？
你何以面对上帝公正的裁处？
死之旅程难卜卦，充满劫难与惊吓：
这尚要勇敢善战的卫队来解押。
谁来为你引路，谁来为你厮杀？
一旦把你送进坟墓，朋友亦将启程返家。
你精力耗尽，步履维艰，担着罪孽的重负！
嗽！你需得有人全力相助。
就像西克奥特[1]得到的扶助，
而那扶助只给予眼泪和带血的汗珠。
数数看，你可曾常为你的罪孽怆然泣下？
承认吧，你的人生岂非罪恶的链条一挂？
啊，我见你，赤条条如刚出母体：
你的灵与肉找不到丝毫遮蔽！
相信吧，天上的宫殿你休得进去：
你将被缚住手脚，推向地狱。
缺了善行的油，信仰的烛火颤颤欲熄；
愚昧女子的出阁之门亦将关闭。
也许，临死前你会说："将我惦记。"
说到此，你的嘴便永远地合闭。
因此，只要斧子还未将生命之树砍伐，
你便得行善积德，以善果飨天下。

① 西克奥特是圣徒。

可是，科尼斯基的主要作品至今还未出版，[①]《小俄罗斯史》仍以手抄本形式为人所知。格奥尔基写《小俄罗斯史》乃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当叶卡捷琳娜女皇成立新法典编纂委员会的时候，小俄罗斯贵族代表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波列季卡曾去找过格奥尔基，因为他熟悉该地区的古代法典及法规。科尼斯基正确地认为：唯有一个民族的历史才能解释这个民族的真正需求。他开始着手写他那本重要的著作，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将自己编年史中富于诗意的新颖与对历史的必要的批评结合在一起。这里，我不想提及那些关于民族学和词源学的注释说明。这些注释是他从大事记里搬到历史书上去的，并把它们放在了该书的卷首。我不提及这些注释，是因为我并未看出这些注释有多么重要，也不认为反驳当时人们公认的观点有什么必要。我对"批评"一词的理解是这样的：深刻地探究确凿的事实，清晰而机智地阐述它的真正原因和后果。

科尼斯基的记述大胆而严谨，但也不无某些下意识的倾向性。他曾经亲自积极反对过天主教徒的暴行和压迫。对于这些暴行和压迫的仇恨反映在他那生动流畅的记述中。对于故土的热爱时常导致他丧失严格意义上的公正。应该指出，时代距今越近，他的叙述就越炽烈，越激昂，越缺少斟酌。他喜欢讲述战争的细节，他对战争场面的描述也惊人地准确。看得出，在他那修士的长袍里还跳动着一颗贵族的心。(科尼斯基出身于古老的小贵族家庭，他绝不会忽视这一点，这一点甚至从刻在他棺材上、由他本人所写的墓志铭上亦可看出。)《小俄罗斯史》中的许多章节就像是一幅

---

① 普希金感兴趣的是《俄罗斯人历史或小俄罗斯史》的手稿。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它是格奥尔基·科尼斯基的作品。其实它的作者是乌克兰主义者Г·A·波列季卡。关于《俄罗斯人历史》一书的情况，是M·A·马克西莫维奇在1829年告诉普希金的。

幅出自大家手笔的绘画。为了让未曾读过他作品的人对他有所了解，我们在此选登他手抄本中的两个章节。

推行教会合并

在剿灭了盖特曼纳里瓦依科之后，国会，或者说受控于国会的达官显贵们，又以闻所未闻的野蛮对所有的俄罗斯人作出了同样野蛮的判决。在此判决中，俄国人被判为离经叛道、背弃信仰和暴乱谋反之徒。他们被判去做奴隶，被人监视迫害，受尽百般奴役。此尼禄般凶残判决的结果，便是将俄罗斯代表永远地排斥于国会之外，将整个骑士阶层排斥于选举、政府公职及司法官职之外；便是将所有俄国官吏及军士的大公庄园、村庄以及其他等级的领地予以没收，把这些官吏及军士本人予以消灭。俄罗斯的骑士被称作了农奴，反对宗教合并的俄国人被称作了分裂派教徒。波兰人及其扈从们被派往小俄罗斯各政府及司法部门就职；城市被波兰卫戍部队占领，其他定居点亦被其军队所占。他们被授权对俄国人为所欲为。而他们在执行该指令时则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有飞扬跋扈、目空一切的醉汉方能想得出。而他们在对不幸的俄国人干这一切的时候，却丝毫不受良心的责难。他们抢劫掠夺，用暴力对付妇女和儿童。他们殴打、折磨、杀戮俄国人，其手段之残忍，超过了最为野蛮的暴徒。他们把俄国人视为、亦称为奴隶或波兰的俘虏，将他们的田产据为己有。若几个俄国人于日常劳作中，或于节日里聚在一起，便会立即被殴打驱散。如若交谈则会遭到严刑拷问。因为他们被永远禁止聚会和交谈。俄罗斯各教堂在武力的威逼之下，在喧嚣的叫骂声中，被迫实行了合并。罗马僧侣们乘坐在长板

车上，每乘由铐在车上的12个乃至更多的人拉着，从一个教堂前往另一个教堂，凯旋一般地行驶在小俄罗斯的土地上，监督并强迫人们参加教会合并。波兰人还从年轻女子中挑选最漂亮的姑娘来侍奉这些僧侣。不答应实行教会合并的教堂被租给犹太人，无论教堂里举行何种仪式，犹太人每次都要索取1至5个塔勒。为婴儿受洗，为死者送葬，则索取1至4个塔勒。犹太人，这基督教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浪迹天涯的流浪汉和人类的灾星，欣喜若狂地操起了这既保险可靠，又罪恶肮脏的挣钱行当，并当即将教堂钥匙和敲钟的绳索抢走，藏入自家的小酒店。每当需要做基督教的各种仪式时，该教堂经管经费的长老便得去与犹太人交涉，他需得按所作礼仪之轻重付钱给犹太人，以求得教堂的钥匙。每逢这种时候，犹太人总要把基督教的祭祀大肆耻笑一番。凡为基督徒顶礼膜拜的，他们皆要加以亵渎，称之为异端，或按他们的说法，称作异教，并命长老在交还教堂钥匙时，要发誓说，什么也没被拒绝列入清单。

另一起新的事件更加增添了人民的疾苦与绝望，使这块疆土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阶段。曾担任过军队及地方要职的小俄罗斯贵族，由于忍受不了波兰人的迫害，忍受不了地位的丧失，更确切地说，忍受不了失去封号及挣得的领地田产之苦，于是背弃了自己的人民，以各种贿赂、送礼之手段，收买最有权势的罗马军士，巴结讨好他们。不知不觉地，先是答应了实行教会合并，遂后便完全成了罗马天主教的信徒。后来，这些贵族又以姻亲、血亲及其他义务与波兰贵族融为一体，舍弃了自己的俄国血统，想方设法糟践自己原来的姓氏，从中寻觅和想出些波兰的发音，自称为正统波兰人。这就是为何迄今他们中间仍能发现俄国姓氏的原因。

这些姓氏在波兰人中不曾有过，在他们的方言中亦不曾存在过。比如：普罗斯库拉、切尔涅茨基、基谢利、沃洛维奇、索基尔卡、科玛尔、茹潘等等等等。恰普林斯基源自从前的恰普林，霍德涅夫斯基源于霍敦，布尔科夫斯基源于布尔卡，等等。此改名换姓之举使得这些贵族重新获得了失去的田产及官衔，而且官衔还变成了世袭的。他们在各方面都可与波兰贵族平分秋色了。为了对此表示感谢，他们接受了波兰对俄国人施行的全套政策，效法波兰人，不遗余力地迫害不幸的俄国人民。他们最主要的政治企图便是要削弱小俄罗斯的武装力量，摧毁由注册哥萨克组成的军团。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哥萨克军团在最后一场战争中损失惨重，而且未能得到来自国库和哥萨克驻地的物资及人员补充。向这些军团提供的任何援助都遭到禁止。军中主要官员摇身一变，成了波兰人，使得这些军团大大减员。军纪松懈、混乱不堪，波兰雇佣的哥萨克群龙无首，成了无人统领的可怜虫。靠近波兰边境地区的哥萨克独立分队，迫于波兰人的软硬兼施，亦随其头领和权贵们一道，改宗作了波兰人，并信了他们的教，成了至今依然为人知晓的波兰贵族外围。未完全注册的哥萨克，确切地说，独身的、对其聚居地没什么牵挂的哥萨克，以及所有游离的、以狩猎为生的哥萨克，则一道投奔了查波罗什谢奇[①]，从而极大地发展和壮大了谢奇的队伍。可以说，从此便为所有在自己国土上受到外族迫害的哥萨克建立了一个据点。与之相反，那些最有地位的查波罗什哥萨克权贵却投靠了小俄罗斯军团，在军团中作了长官。但他们缺乏正规训练、组织纪律涣散，致使这些军团出现了明显的蜕变。

① 谢奇，查波罗什哥萨克营地。

奥斯特拉尼察之死

1638年，继惨遭杀害的帕夫柳加之位，涅任人斯捷凡·奥斯特拉尼察团长被推选为盖特曼。他的一位年高望重的战友列昂·古尼则被选为他的谋士。此人足智多谋，在军中极受尊重。波兰国王委任的盖特曼良茨科龙斯基不断率波军袭击小俄罗斯城镇村落及其驻防军。他们所到之处，抢劫勒索、滥杀无辜，胡作非为。英勇善战的盖特曼奥斯特拉尼察必须把散落各地，一直被波兰人及其密探监视迫害的部下召集拢来。部队终于于暗中聚齐，并在夜间向佩列亚斯拉夫利城进发。他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清除第聂伯河岸各城的波军，恢复两岸军民的安全往来和联系。此举大获成功。城郊及城内的波军丝毫未料到哥萨克会采取如此行动，满以为最近的一次叛变以及对帕夫柳加及其众将领所施加的暴行已将哥萨克吓倒，于是他们高枕无忧，尽情狂欢。因此他们四处挨打，一败涂地。负隅顽抗者被歼灭殆尽。他们的大炮及装备被哥萨克缴获。哥萨克汇聚于一处，配备了最精良的武装，出发去搜寻盖特曼良茨科龙斯基。此时，他正率其波军主力集聚固守在斯塔里察河附近的一个营地。盖特曼奥斯特拉尼察在那里与他相遇，遂命其军队向他发起攻击。进攻与反击进行得异常激烈残酷，超出了任何可能的想像。良茨科龙斯基知道，为着他对哥萨克盖特曼帕夫柳加及众将领的背叛和所施的暴行，他会遭到何等的报复，因此，他拼死顽抗。而哥萨克们不久前才在各个城市亲眼目睹了自己同胞兄弟被砍下来示众的头颅，其悲惨景象已永远铭记在了他们心中，他们对良茨科龙斯基和波兰人已是恨之入骨。因此他们进攻时，犹

如恶魔怪兽一般凶猛。最后，枪炮齐鸣，硝烟弥漫，哥萨克异常英勇地向波兰人的堡垒冲去。冲入敌阵者，刀砍枪刺，其势汹汹，令人瞠目。惨叫呻吟之声，刀枪撞击折裂之声，犹如横扫一切的雷霆风暴。波军处处败北，已至万劫不复之地。由于来不及给长短枪支上子弹，他们只得以刺刀自卫，一路后撤至斯塔里察河边。逃兵们昏头昏脑地投水自尽，一群群地沉入了河底。他们的盖特曼良茨科龙斯基率领着少数精锐骑兵，早已渡河仓皇而逃，慌乱之中也不看明马匹往何处奔去。哥萨克占领了尸横遍野的波军营地，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其中有大炮、各种兵器及辎重。在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之后，哥萨克们举起双臂，为自已的胜利而感谢上帝，感谢他庇护百姓，保佑无辜遭到迫害的受苦人。然后，他们为死者举行了葬礼，掩埋了尸体。共计波兰死者人数为 11317 人，自己人为 4727 人，其中有谋士古尼。丧葬及缴获财物料理完毕之后，他们又去追赶盖特曼良茨科龙斯基。哥萨克在波隆诺耶小镇追上了正在等候波方救援的良茨科龙斯基，立即向他发起了进攻，将他封锁在城堡之内。良茨科龙斯基为了不让哥萨克攻进城堡，支使一队宗教行列迎向前去。队伍中有十字架和神幡，还有俄国僧侣，他们以盖特曼和全波兰的名义求和，祈求盖特曼奥斯特拉尼察及其部下看在上帝的份上答应媾和。经过长久商议，在双方立下誓言之后，由双方盖特曼派出的特使会聚于教堂之内，当场写下了永久和平和全面大赦的协定，以示既往不咎。签署协定时，乃以福音书起誓：永远遵守所立各项条款，保证哥萨克和全体人民的一切权利和特权。遂后，军队解散，士兵们各自返回自己的家园。

盖特曼奥斯特拉尼察遣散了自己的部下，命他们各自回城驻防，并命其余的入都返回各自的居住地。他本人则率领

哥萨克众首领及许多团长、百夫长到了卡涅夫城，为的是到当地修道院去向上帝做感恩祈祷。一贯不信守协定誓言、一贯以背信弃义而臭名昭著的波兰人，对待在波隆诺耶宣誓缔结的协定，就如同对待他们过去与哥萨克签订的所有协定和条约一样，拒不遵守，置若罔闻。他们的僧侣虽然索取了掌管宗教及民间事务的权力，但却并不明白此权力当如何行使。他们认定，只需对他们自己的天主教徒信守誓言，而与其他人签署的协定和条约则一概可以免除，可以置之不理，只当他们是分裂派教徒，连上帝的审判庭都不配跻入此行了。正是遵循着这样一个怪诞的、潜伏着卑鄙阴谋的法则，当波兰人从犹太奸细口中得知盖特曼奥斯特拉尼察及其随从已到了卡涅夫城，且身边并无明显警卫的时候，他们便立即派重兵夜袭卡涅夫城，顺着沟壑包抄了坐落于城外的修道院，将奥斯特拉尼察团团围困于其中。盖特曼还未料到对方会如此背信弃义，修道院内已布满了波军，因此他只得不战而降。波军将盖特曼本人及其随从共 37 人五花大绑，押上了普通的平板车，然后将当地修道院及教堂洗劫一空，并四面放火将其焚毁，只带了囚徒仓猝离去，经秘密通道前往波兰，以避开沿途各城的追兵与拦击。临近华沙时，他们将囚徒们双双捆绑，于其中一人的脖子上套一活结，骑兵们牵着囚徒，凯旋一般地在城里击鼓游街，向人们说，这些囚徒是分裂派教徒，是在战场上打了败仗而被擒获的。随后，囚徒们被戴上镣铐，关进了地牢。许多被俘军官的妻子携幼子前往华沙，指望孩子们替父亲的求情能打动当地有权势的人，使他们产生慈悲怜悯之心。但此举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更加激起了嗜血成性的暴徒们的残忍。哥萨克将领们在监禁了数日之后，便未经任何审判，被带出去执行了死刑。

如此酷刑在世界上乃是史无前例的。其残忍阴险在人类历史上亦是闻所未闻。后人未必相信曾有这等事情发生，因为任何一个野蛮而凶残的日本人都想不出如此酷刑；而施行这酷刑的场面甚至会使妖魔鬼怪和野兽感到恐怖。

死刑是由罗马式宗教游行开场的。游行行列中有许多波兰天主教教士，他们劝说行将被押上刑场的小俄罗斯人，要他们接受天主教的信条，以免到炼狱里去受罪。但是，小俄罗斯人一点不答理他们，仍按自己的信仰向上帝作了祷告。刑场上挤满了百姓、士兵及手持刑具的刽子手们。被处以车裂的有盖特曼奥斯特拉尼察、军需官苏尔米拉，以及团长涅德里盖洛、勃云、林季奇。他们的胳膊双腿接二连三地被拉断，筋顺着车辕被抽出，就这样，直至咽气为止。团长盖达列夫斯基、布特里姆、扎帕列依，辎重兵基济姆、苏切夫斯基，则被用铁杵刺穿后，活生生地挑在木桩上。团副波斯特利奇、加伦、苏佳加、波多巴依、哈尔切维奇、丘丹、丘赖及百夫长丘普林纳、奥科洛维奇、索卡尔斯基、米罗维奇、沃罗日比特立着被钉在浇满松脂的木板上，被火慢慢地烧死了。旗手莫吉良斯基、扎格列巴、斯克列比洛、阿赫特尔卡、波图拉依、布尔列依、扎戈尼别达被熊掌一般的铁爪撕得稀烂。队长缅佳依、杜纳耶夫斯基、斯库布列依、戈良斯基、扎韦尊、科瑟尔、古尔托维、图玛尔、图盖被肢解。目睹最先处决的几个死者时，被害者的妻子儿女们嚎啕大哭，但很快便哑然无声了……[①] 母亲死后，在其尸首旁徘徊、爬行的小孩子被扔到铁架子上，刽子手们往铁架子下面

① 检查机关在杂志上删去了以下文字："当时的兽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刽子手割下这些女人的乳房，把她们一个个全砍死，然后用她们的乳头去击那些尚未断气的男人的脸。"

扔木炭，再用帽子、扫帚将火煽旺，就这样，当着父亲们的面，把孩子们全部烧死。

上述小俄罗斯将领们被砍下的肢体，如头颅、手臂、腿脚等，被分送至小俄罗斯各地，挂在各个城市的木桩上。与此同时，波兰军队开往各地，布满了整个小俄罗斯。他们对小俄罗斯人施加暴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凶狠残忍，唯他们想得到、做得出，实乃不可理喻，不堪描述。顺便说一下，对于不幸的小俄罗斯人，波兰军队曾多次重演了华沙暴行。他们曾多次在父母的眼前将孩子们放进锅里煮，扔到炭上烧，让为父者遭受最残忍的酷刑。最后，他们将所有神圣的俄国教堂洗劫一空，并租给犹太人，将教堂里的圣物，如祭杯、圣盘、圣像衣饰、法衣等等全部卖给那些犹太人，找他们换酒喝。犹太人则用教堂的银器制成餐具和装饰品。圣像衣饰和法衣被用来改制或装饰犹太女人的衣裙。她们在基督徒面前炫耀自己的衣饰，向人显示她们的胸巾，因为那上面装饰着她们从法衣上扯下来的、用金线绣制的十字架。就这样，小俄罗斯被波兰人推到了毁灭和崩溃的边缘。一切似乎都陷入了某种混乱，而这混乱则预示着覆灭。居民中无人知晓自己的身家性命掌握在谁的手中，无人能断定自己还能活多久。所有的人都以舍弃财产的方式来寻求保护，时而求救于天主教神父，时而求救于合并派神父，时而又求救于既与自己同病相怜，又是自己不共戴天之敌的犹太人，不知究竟该投靠谁人。

作为历史学家，格奥尔基·科尼斯基未曾得到应有的评价。因为，比起真正卓越高超，但却难于为那些热衷于对人类智慧作出估价的人所理解，难于为大多数读者所理解的作品来说，献给女

人的走运情诗往往能给人带来更大的荣耀。

大司祭И·格里高罗维奇出版了白俄罗斯大主教的文集，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期望，小俄罗斯伟大的史学家最终亦能为自己找到一个同样值得称道的出版人。

《阿日图加依山谷》后记[①]

在我们文学领域里，这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一位半蛮荒的高加索之子正在跨入我们的作家行列。一个切尔克斯人的俄语表述竟是如此流利、有力、生动。在我们刊出的这段文字中，我们从未想过要对某个词语加以改动。请看：一个于近处目睹了奢侈文明的卡济-格莱苏丹（他是克里米亚格莱王朝的后代），对世代相袭的老习惯、老规矩怎能依然信守不渝；一个俄国军官对激荡了自己少年之心的俄罗斯怎么会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最后，一个穆斯林如何怀着深沉的思索来看待十字架这欧罗巴与教化的大纛——这可是非常新奇有趣的。

出版者

① 发表于《现代人》1836年第1期。卡济—格莱这篇短篇小说的问世，使宾肯多夫提出了一项要求：未经军事当局允许，不得发表军官们的作品。看来，卡济—格莱在当时是获得了这一许可的，在下一期《现代人》杂志上，再次出现了他的《波斯笑话》。卡济—格莱曾参加过波斯战争，他逝世于1843年。

《沃斯托拉或愿望》[①]

诗体小说，维兰德作

A·普希金出版，圣彼得堡

外贸局印刷厂印刷，1836年，8开本，96页。

在我们的杂志当中，有一份使读者产生了一种感觉，认为《沃斯托拉》的出版者把自己的名字印在由他出版的书上，是想把他人的作品据为己有。这一指责是不公正的。因为，经过作者同意，或者按照作者本人的请求出版其作品，迄今为止，还无人因此而遭到过禁止。这就叫作出版。词义清楚明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无人想出别的词来。

这份杂志说道："《沃斯托拉》是由一个贫穷的作家翻译的，A.C.П.[②] 只是将自己的名字租给他用。其实，直接从口袋里掏1000卢布给他还更好呢。"

---

① 发表于《现代人》1836年第1期。维兰德诗体童话《佩尔丰特或愿望》(1778年)的译者是E·П·柳岑科(1776—1854)。他曾于1811—1813年期间在皇村学校任职。早在1807年，他便完成了该童话的翻译。普希金回击了H·纳杰日金和O·先科夫斯基对此译文的抨击。他们两人的文章分别发表在《大众论坛》1836年第1期和《读书文库》1836年第2期上。普希金在文中所指的是先科夫斯基的文章。

② 即普希金。

维兰德长诗的译者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公民和作家，是一个家庭中令人尊敬的父亲。他没有料到会遭受如此残酷的打击。他这个人不富有，但诚实、高尚。他会将出版他长诗译文的幸事交托于人，但绝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施舍。

在作了这番解释之后，我们已不便于在此说出译者的真实姓名。我们倒是希望，作出如此侮辱人的暗示，其理由真正是诚心想为译者效劳。

《狄康卡近乡夜话》[①]

中篇小说，帕希奇尼克·鲁多依·帕尼克出版。第2版，共分两卷，8开本，第1卷14章，203页；第2卷10章，233页。外贸局印刷厂印刷。

我们的读者当然还记得《近乡夜话》的出版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对能歌善舞的部族活泼而生动的描写，小俄罗斯大自然那一幅幅清新而鲜明的画卷，单纯质朴而又诙谐调皮的洋洋喜气——这一切使所有的人都为之而欢欣。这本俄国小说是何等地使我们感到震惊，它使我们笑了起来，我们自冯维辛时代以后就没有再笑过！我们如此感激年轻的作者，以至于心甘情愿地原谅了他技巧上的生涩与不规范，原谅了某些故事的杂乱与不切实际。这些缺点还是留给批评界去作口粮吧。对于我们的这种宽容，作者已作出了报偿。从那以后，他不断地在进步和完善。他出版了《故事集》，其中包括《涅瓦大街》，他作品当中最为丰满的一篇。继《故事集》之后，又出版了《密尔格拉得》。大家在这本书中又津津有味地读到了《旧式地主》，一首可笑而感人的田园诗。它使你在忍俊不禁的同时却含着伤感而悲戚的眼泪。我们还读到了《塔

① 发表于《现代人》1836年第1期。

拉斯·布尔巴》，其开头部分可与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媲美。果戈理先生仍在继续前进。我们期望经常有机会在我们的杂志上谈论他。[1]

① 近日内本地剧院将上演他的喜剧《钦差大臣》。——普希金原注

关于铁面人[1]

伏尔泰在其《路易十四时代》(1760)中最先讲了几句有关铁面人的话。“红衣主教马扎然去世后不久，”他写道，“发生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而更奇怪的是，这件事竟然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知道。一个身材高大，年轻，漂亮，高雅却不知名的囚犯，被极端秘密地押送到圣马格丽特岛上去监禁。这个囚犯一路上都戴着面罩。面罩的护颏装有弹簧，因而他吃饭时便不必摘下面罩。看押人员接到命令，如果他的面孔暴露，就杀掉他。他一直呆在岛上，直到1690年，一个叫圣马尔斯的人，即皮涅罗尔要塞司令，在被任命为巴士底狱典狱长后，到圣马格丽特岛上把他领出，然后把他带到巴士底狱。这个囚犯始终戴着面具。在他被递解之前，卢瓦侯爵曾到岛上看他，站在他面前，毕恭毕敬地和他讲话。这个无名氏被带到巴士底狱之后，人们在这个城堡里尽可能把他的住宿安排得非常舒适妥贴。他要什么从未遭到拒绝。他喜欢异常精美的衬衣和花边。他常常弹奏吉他。他的饭菜亦是最上等的。典狱长很少在他面前坐下。常为他看病的一位老医生说，他虽常常

① 约写于1836年初。于普希金逝世以后发表在《现代人》1837年第6期上。事实上，被人们称作铁面人的那个人是意大利的马弟奥利伯爵。他是曼图昂伯爵的秘书，在获取卡扎勒要塞的谈判中蒙骗了路易十四。

检查他的舌头和身体其他部位，但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脸。按医生的话说，他身材优美，皮肤黝黑。他的嗓音很动人。他对自己的处境从不发怨言，也从不作任何暗示。

“这个不知名的人于1703年死去，当晚就被埋在圣保罗教区。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他被解送到圣马格丽特岛时，欧洲并没有什么重要人物失踪。这个囚犯无疑是个重要人物，因为他到岛上的头几天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典狱长亲自把饭菜摆在他桌子上，然后关上门，退了出来。一天，这个囚犯用餐刀在一只银碟子上刻了几个字，然后把碟子从窗口扔了出去。一个渔夫在海边拾到了这只碟子，并把它交给了典狱长。典狱长十分惊讶，问渔夫道：‘你看过碟子上的字吗？有谁看见过你拾到的这只碟子没有？’渔夫回答说：‘我不识字。这碟子是我刚刚拾到的，谁也没有看见。’这个渔夫被扣留起来，直到弄清他的确没念过书，碟子也没有被别人看见之后，才把他放了。典狱长对他说：‘去吧！你不识字算你走运。’夏米亚尔先生是知道这个奇怪的秘密的最后一个大臣。他的女婿，即拉弗亚德元帅曾对我说，他岳父临死前，他曾跪在他岳父面前恳求，要他讲出那铁面人究竟是谁。夏米亚尔回答他说，这是国家机密，他曾经宣过誓永远不泄露。我的很多同时代人都能证实我所讲的。我不知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奇特，更加确凿的了。”①

这段文字给人造成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人们开始追根究底，作出各种猜测和假设。有人认为铁面人是韦芒杜瓦伯爵，他因打了太子（路易十四）一记耳光面被判终身监禁。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博福尔公爵，一个封建制的鼓吹者，巴黎平民宠爱的叛乱分子，于1669年康迪被围期间失踪。还

① 此处参考了吴模信等人译文（《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有一些人断定，他不是别人，而是蒙姆福公爵，等等。伏尔泰本人则用他那批评家所特有的严密逻辑驳斥了这所有的推断，浪漫地想到，或者臆想到：这个著名的囚犯是路易十四的哥哥，一个功名心与残酷政治的牺牲品。伏尔泰的证据是不充分的。这个谜仍未解开。1789 年，巴士底狱被攻占，其档案也被公开，但这丝毫未能揭开此神秘隐士之谜。

亚历山大·拉季舍夫[1]

不应该让诚实的人上绞架。[2]

卡拉姆津 1819 年语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头十年的后期，几个刚刚成年的年轻人奉女皇陛下之命，在一位教员的监督及一位神甫的陪同下，前往莱比锡大学学习。他们所学的课程对他们毫无用处。督学的人只顾他自己捞好处。神甫倒是有副好心肠，可又没什么文化，对他们智力和品德的发展施加不了任何影响。这些年轻人顽皮胡闹，思想开放，无所禁忌。后来，他们回到了俄国，公务与家事取代了盖勒特的课程与学生的顽皮。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消声匿迹了，只有两个人成了知名人物：一个显露出十足的无能和无可救药的平

① 这篇文章普希金原本打算发表在《现代人》第 3 期上，但却于 1836 年 8 月 26 日遭到教育大臣 C·C·乌瓦罗夫的明令禁止，直到 1857 年才得以问世。鉴于异常严厉的书报检查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普希金在文章中加重了批评的成分，夸大了自己与拉季舍夫的分歧，在许多地方干脆就是在引述官方对拉季舍夫的看法。对于普希金来说，主要的目的乃是要揭下贴在拉季舍夫名字上的封条，争取评论拉季舍夫的权利。早在 1823 年，他就曾写信给别斯土舍夫："在谈论俄国文学的文章中，怎么可以不提拉季舍夫呢？那我们还能记住谁呢？这样的沉默是不可原谅的……。"即使这样，普希金的文章仍然遭到了查禁。

② 原文为法文。

庸[1]，另一个则以另一种方式赢得了名声。

亚力山大·拉季舍夫大约出生于1750年，最初，他就读于贵族子弟军官学校。由于抱负远大，这个年轻人引起了校长的注意。大学生活没给他带来多少益处。为了有精力至少把教授们的功课弄明白，他甚至没有花功夫去规规矩矩地学习拉丁文与德文。从不安宁的好奇心和极为强烈的求知欲是他智慧的最大特征。他性情温和，喜欢沉思。他与年轻的乌沙可夫交往甚密，这对他的一生起了深刻的、决定性的影响。乌沙可夫略微年长于拉季舍夫，但却懂得许多人情世故。他当时已担任三等文官捷普洛夫的秘书，功名生涯前程似锦。可就在这时，他却因对知识的渴望而放弃了职位，与年轻的大学生们一道去了莱比锡。共同的学习与相似的智慧使他与拉季舍夫成了朋友。他们正碰上爱尔维修在执教。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他那庸俗而贫瘠的形而上学原理。格林，这个四处游荡的法国哲学的推销人，在莱比锡正巧撞见俄国大学生读《论理智》，于是便把这消息带给了爱尔维修，既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又使所有的弟兄同伙们开心。假若我们不幸，不知道反法规和反传统的新思想、新准则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头脑具有多么强大的诱惑力，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明白，冷冰冰、干巴巴的爱尔维修怎么会在热情敏感的青年人当中受宠。我们太了解18世纪的法国哲学了。它已被全面审视和评价过了。曾经像祭司的秘义一样暗中流传的东西，后来被弄到广场上公开宣扬和贩卖，于是便永恒地失去了神秘而新鲜的魅力。另一些同样幼稚的观点，另一些同样虚幻的理想，取代了狄德罗和卢梭弟子们的观点和理想。于是，轻信传言、热衷于人云亦云的人便再一次从这些观点和理想中看到了人类的目标，看到了永远之谜的谜底。但是他们却没

[1] 指O·П·科佐达夫列夫（1754—1819），1810至1819年任内务大臣。

有想到，这些观点和理想到时候也是会被另外的观点和理想所取代的。

拉季舍夫写了一篇《ф·В·乌沙可夫传》。从这篇传记中可以看到，乌沙可夫天资聪颖，能言善辩，且有摄人魂魄的才能。他于 21 岁去世，死于生活放荡、毫无节制。就在临死之前，他还在病榻上给拉季舍夫上了可怕的一课：行将就木的乌沙可夫，极其漠然地听了医生对他的最后判决。不久，他的痛苦变得不堪忍受，于是他便向自己的一位同学要毒药[①]，拉季舍夫当时曾反对这么做。但从那以后，自杀之念便时常地萦绕在他的心头。

回到彼得堡后，拉季舍夫担任了公职，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停止从事文学活动。他结了婚，其景况对他说来也还颇为宽裕。在社会上，他作为一个作家受到人们的尊敬。沃隆佐夫伯爵作了他的保护人。女皇陛下知道他，并把他安排在自己的私人办公厅任职。按照常规，拉季舍夫本应谋到头几等文官的职务，可是命运却为他作了别样的安排。

在当时的俄罗斯，有一批人被人们称之为“马丁派神秘教徒”。我们还见过几个老头子，他们曾经是这个半政治、半宗教团体的成员。神秘主义的虔诚信仰与自由大胆的哲学思想奇怪的混合，对教育事业无私的热爱，实践中的慈善行动——这一切使得他们明显地有别于自己的同代人。那些靠造谣中伤来谋取好处的人，极力把马丁派神秘教徒说成阴谋家，并把罪恶的政治企图栽到在他们头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皇陛下一直把法国哲学家们所作的努力看作是玩具兵的战争游戏，并亲自用她那帝王的掌声来加以鼓励。可如今她却不安地看见了它的辉煌。她用怀疑的

① 这位同学是 A·M·库图佐夫。拉季舍夫写的《Φ·В·乌沙科夫传》就是献给他的。——普希金原注

目光注视着马丁派神秘教徒，认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的鼓吹者，是百科全书派的信徒。不容否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确实不满现状。但他们的不满，至多不过是对现状喋喋不休的指责，对未来天真无邪的希望，以及在法国共济会晚宴上模棱两可的祝酒词而已。拉季舍夫当时也加入了他们的协会。他们谈话的玄妙和神秘激发了拉季舍夫的想像力，他写下了他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篇能激起人们义愤的讽刺檄文。在拿到一家家庭印刷作坊付印后，他便安然自若地让这本书上市出售了。

如果我们想像自己还处在1791年，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政治局势，想一想我们政府的威力，想一想自彼得一世以来就未曾修改过的法律，想一想这法律的严厉，这严厉在当时还未被亚力山大这个尚能尊重人权的独裁者25年的执政所削弱；如果我们想一想，当时簇拥在叶卡捷琳娜御座周围的，都是些多么冷酷无情的人，那么，我们就会觉得，拉季舍夫的谋反简直就是一个疯子的举动。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吏，一个没有任何权力，没有任何靠山的人，居然敢于起来明火执仗地反对社会秩序，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叶卡捷琳娜！要知道，一个阴谋家可以指望自己同伙们联合起来的力量，一个秘密团休的成员在遭到失败的情况下，要么打算以告密来求得赦免，要么可以指望因同谋者人数众多而免于受罚。但是，拉季舍夫却孤身一人，既无同伙，也无同谋。在遭到失败之后——他又哪能指望什么成功呢？——他只得独自承担一切罪责，他只能独自去作法律的牺牲品。我们从未把拉季舍夫当做伟人，他的所作所为一直被我们看作不可饶恕的犯罪，《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则被看作是一本非常平庸的书。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他这个罪人具有一种非凡的精神。这个政治空想家虽然已误入歧途，但他却在自己的行动中表现出惊人的献身精神以及某种骑士的诚挚。

但是，也许拉季舍夫自己并未意识到他的疯狂与迷误的全部严重性，否则怎么解释他的坦然自若和漫不经心，怎么解释他头脑中会产生奇怪的念头，要将自己的书寄给所有的熟人，其中包括寄给杰尔查文，以至于使后者陷入了尴尬的困境？不管怎么说，尽管他的书在最初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也许是因为开头部分实在太乏味，太令人厌倦，但这本书很快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传到了女皇陛下的手中。叶卡捷琳娜惊愕不已，一连好几天，她读着这本辛辣的、令人恼怒的讽刺作品。"他是个马丁派神秘教徒，"她这样对赫拉波维茨基说道（参见赫拉波维茨基札记），"他比普加乔夫还坏。他是在赞美富兰克林。"此话讲得非常精彩。因为女皇正处心积虑地要将不同的民族区域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此时看到英国统治的殖民地被别人夺去，她是绝不会无动于衷的。拉季舍夫被送上了法庭。参政院将他判处死刑（参见《法律全集》）。女皇减轻了该判决。罪犯被褫夺了官职和贵族头衔，戴着脚镣手铐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在伊利姆斯克，拉季舍夫潜心于宁静的著述与创作。他的大部分作品便是在这里写成的，其中包括许多关于西伯利亚统计学、对华贸易及其他方面的著述。拉季舍夫同当时的一位达官贵人还保持着通信往来[①]，这位显贵看来并不完全反对出版《旅行记》。拉季舍夫当时已经丧偶。他的小姨妹去到他身边，要与被放逐的人一道，共同分担与世隔绝的凄苦。他在一首诗中提到了这一感人的情形。

我在那恐怖与寒冷之地叹息，

---

① 指同A·P·沃隆佐夫伯爵（1741—1805）通信。沃隆佐夫是拉季舍夫在商贸部的顶头上司，曾给予他保护。

叶尔马克曾率领自己的军队，
驾着小船朝那里急驶而去，
在我落难遭殃的地方，
我却于炽热友情的怀抱中，
感到幸福无比，
我在那儿留下的，
是我心中的那一半柔情与甜蜜。

——《波瓦》序

保罗一世皇帝登基之后，将拉季舍夫从流放地召回，恢复了他的官职和贵族头衔。皇帝待拉季舍夫仁慈宽厚，使他作出了不再写任何使官方反感的文字的承诺。拉季舍夫信守诺言，在保罗一世执政期间，他一字未写。他住在彼得堡，疏于公务，潜心于对子女的训导和教育。他被经验世故磨掉了锐气，甚至完全改变了自己原先的思维方式，而那种思维方式曾是他那动荡不安、傲慢清高的青春的标志。他没有在心中培植任何对于过去的愤懑之情，完全心悦诚服于女皇陛下的伟大与光荣。

我们无意责备拉季舍夫性格上的软弱与无常。时间既能从肉体上，亦能从心灵上改变一个人。一个堂堂男子，或是叹息，或是微笑，终将抛弃那曾经激荡了自己青春年华的理想。显得年轻的思想就像显得年轻的脸蛋一样，总是令人觉得别扭可笑。只有白痴才会一成不变，因为时间既不能使他发展，也不能使他拥有经验。当看到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所发生的一切时，敏感而热情的拉季舍夫能不为之震颤吗？当听到自己曾几何时还为之而沉迷的思想，在高高的断头台上，在庶民们令人憎恶的掌声中，被人鼓吹宣扬的时候，他能不感到深深的厌恶吗？曾经一度被巨人米拉波狮子般的吼声所吸引的他，已无意再去崇拜罗伯斯庇尔这只

感情脆弱、易于冲动的老虎了。

亚历山大皇帝登基后，想起了拉季舍夫，原谅了他那些因年轻气盛以及时代的迷误而铸成的过错，看出了《旅行记》作者对罪恶的憎恶以及他心中的某些善良愿望。他指派拉季舍夫加入法律编纂委员会，命他对几项民事法提出自己的看法。可怜的拉季舍夫，又迷上了与自己过去探讨思索过的问题相似的东西。他旧梦重温，面对要递交给上司的法律草案，再次陷入了自己早年的幻想。扎瓦多夫斯基伯爵[①]对他的返老还童感到惊讶，便善意地责怪他道："喂，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你还想跟过去一样瞎胡扯！要不，你在西伯利亚还没呆够？"从这几句话中，拉季舍夫看到了威胁。他的心凉了，他感到害怕了。他回到家中，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朋友，想起了那个莱比锡大学的学生，那个曾经首次将自杀的念头植入他脑海的人，……于是，他服毒了。这是一个他早就预见到，并对自己预言过的结局！

拉季舍夫的许多诗歌及散文（《旅行记》除外）发表于1807年。在他的著述中，最为冗长的，当数哲学论文《论人、人的死亡和不朽》。该文议论空泛，思想平庸，且无精妙用笔使其略显生动。拉季舍夫虽然反对唯物主义，但在他身上仍能看到爱尔维修门徒的影子。较之反驳纯无神论的论据，他倒更愿意叙述纯无神论的论据。在他的文学评论文章中，他对《蒂列玛希达》和特列佳科夫斯基的评论十分出色。他钟爱特列佳科夫斯基与他咒骂罗蒙诺索夫乃是出于同样的情感：对社会公论的反感。在他的诗歌中，最优秀的作品是《18世纪》。这是一首抒情诗，是按古哀歌格律写成的。在他的笔下，这几句诗行是多么美妙啊。

---

① 扎瓦多夫斯基伯爵（1738—1812），教育大臣，法律编纂委员会主席。

时间之瓮流淌着光阴的点滴，
点点滴滴汇成溪流；涓涓溪水汇成江河远去，
在那遥远的海岸，时间的永恒向着海洋
涌出飞沫四溅的巨浪，海洋浩瀚无垠，辽阔无疆。
那里没有岛屿耸立，那里测深锤寻不着海底；
多少个世纪流入大海，在那里消逝了自己的痕迹。
但我们的世纪却响彻雷电的轰鸣，涌入海洋，
用它的殷殷红血惊世骇俗，万古显扬，
希望之舟终于被海浪击破，
港湾已近，它却被漩涡吞没。
盛怒的漩涡吞食了美德、自由与幸福。
看啊，沉船那可怕的残片还在海面漂浮。
不，你不会被人忘记，你这充满睿智与疯狂的世纪。
你将万世遭诅咒，永远令人惊愕不已，
你的摇篮里装着鲜血，厮杀的怒吼就是你的催眠曲。
啊，浸透了鲜血的世纪，你正朝坟墓走去。
可是看啊，在那血海中央，耸起了两座尖峰峭壁，
那就是叶卡捷琳娜和彼得大帝，浮尘中的永恒！那就是
　罗斯人。

《波瓦》中的第一首歌也非常出色。波瓦的性格刻画十分独特，他与卡尔加的对话也很风趣。遗憾的是，在《波瓦》中，就像在他的另一首不知何故未收入其文集的长诗《阿廖沙·波波维奇》[①]中一样，见不到这类作品应有的人民性。不过，拉季舍夫是想摹仿伏尔泰，因为他永远都在摹仿别人。总的说来，拉季舍夫的诗

① 此处有误。《阿廖沙·波波维奇》是拉季舍夫儿子的长诗。

歌写得比散文好。因为在散文中还没有可供他摹仿的范本，而罗蒙诺索夫、赫拉斯科夫、杰尔查文和科斯特罗夫却早已推敲琢磨出了我们的诗体语言。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这本给他带来不幸与荣耀的书，正如我们讲过的那样，是一部极为平庸的作品，姑且不提它那粗劣的文笔。对人民大众不幸境遇的抱怨，对达官权贵们强权暴虐的牢骚等等，显得既夸张又粗俗。那多愁善感的激情，矫揉过分的冲动，有时显得非常可笑。我们可以引用许多地方来证实我们的论断，但读者们却值得亲自去试一试，翻开他的书来读一读，以便确证我们说的话是否公正。

在拉季舍夫身上，反映出了他那个世纪的全部法国哲学：伏尔泰的怀疑主义，卢梭的慈善仁爱，狄德罗及勒纳尔的政治犬儒主义。可是，一切都变了味，走了样，就像所有的东西在一面哈哈镜里都会被照变形一样。他是一个不彻底的启蒙主义的真正代表。对过去的无知的轻蔑，对自己时代的愚钝的大惊小怪，对新鲜事物盲目的青睐，有了一点片面而肤浅的知识，就不假思索地拿去套用于一切事物——这就是我们从拉季舍夫身上所看到的一切。[①] 他似乎在竭力以自己的尖酸刻薄来激怒最高统治当局。而向统治当局指明什么是它力所能及的善举，岂不是更好？他辱骂君主政权是明目张胆的无法无天，可若是向政府及开明地主们提出逐步改善农民状况的方案和手段，这岂不更好？他对书报检查机关发泄自己的愤怒，若商讨一下立法者应该遵循的规则，以便一方面使作家们不至于受压制，使他们的思想，这上帝的赐予，不至于成为不明智和随心所欲的管制的奴隶和牺牲品，另一方面，使

① 此处手稿中这样一段文字被删掉了："如果去掉他的真诚，那么剩下的将是一个波列沃依。"

作家亦不至于利用上帝赐予的武器去达到卑劣与犯罪的目的，如若这样，岂不更好吗？这样做既非常有益，又不会引起轩然大波和堕落，因为政府本身不仅不怠慢作家，压制作家，而且还要求他们参与，号召他们行动，它会听取他们的意见，采纳他们的建议。总之，政府感到需要那些有教养、有头脑的人们的协助，它并不想吓跑他们的勇气，辱没他们的真诚。拉季舍夫的目的是什么？他到底希望什么？他本人未必能够对这些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拉季舍夫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大家在读过他的书之后便把它遗忘了，尽管书中有一些智慧的思想，有一些善意的建议，而这些思想和建议完全没有必要以诅咒式的傲慢言辞来表述，没必要掺和着下流罪恶的胡言乱语，在秘密印刷作坊的机器上非法印制出来。假如这些思想和建议是怀着更加真诚的善意提出的，那么它们便会带来真正的益处。要知道，谩骂没有说服力，哪里没有爱，哪里就没有真理。

1836 年 4 月 3 日，圣彼得堡

补充材料

一

女皇陛下致圣彼得堡总司令布鲁斯上将的一封信：

雅可夫·亚历山德罗维奇伯爵！

前不久出版了一本名为《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书。书中充满了极为有害的思想言论。这些思想将搅乱社会的安宁，减弱人们对现政权应有的尊敬，竭力挑起民众对上司及上级的愤懑。最后，书中还充满了对沙皇尊位及其权威

的侮辱性言辞。此书作者乃六品文官亚历山大·拉季舍夫。他本人对此亦供认不讳，并附言说，在市警察局进行了书刊检查之后，他在该书中又加进了许多篇幅，并交到自己的私人印刷所付印。因此他遭到了逮捕。现命你们将该案件按指定程序交圣彼得堡省刑事法庭审理裁决，在作出判决后，将此案上交参政院。

顺致敬意

叶卡捷琳娜

二

6月26日。（女皇陛下）在谈到《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时说："这是在散播法国的坏影响。作者是一个马丁派神秘教徒。我读了30页。"女皇陛下已派人去找雷列耶夫（警察总监）。正在开展对拉季舍夫的调查。

7月2日。陛下仍在写对拉季舍夫一书的评语。据说，拉季舍夫现已交由舍什科夫斯基看管，并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

7月7日。"把对拉季舍夫一书的评语交给舍什科夫斯基，"女皇陛下说，"他是个谋反分子，比普加乔夫还坏。"她指给我看，说他在书的结尾赞美富兰克林，而且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人。陛下措词严厉、情绪激动。

8月11日。陛下异常激动地命令，将有关拉季舍夫的报告交枢密院审查，"为了做到公正，我宣布，你们不要顾忌我的意见，因为我鄙视这样做"。

（赫拉波维茨基札记）

三

克林

“从前有座罗马城，城里有位大公，名叫叶夫菲米恩……”这首民歌叫做《圣徒阿列克赛》。唱歌的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他坐在驿站的大门口，身边围了一大群人，其中多数是孩子和年轻人。他那苍白的头发，紧闭的双眼，脸上安详的神情，使围观的人们对这个歌手肃然起敬。他的曲调虽然简朴，但唱出的道理却娓娓动听，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他们比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居民更能领略自然的声音。首都的居民习惯于听华丽的曲调，常常听加勃丽耶莉、玛尔克齐和托季的花腔。当克林的这位歌手以欲断还续的声音唱到主人公的离别时，听众无不为之动情。由衷的悲哀使歌手的眼窝里充满了泪水，泪珠从他的脸颊上滚滚流下。大自然啊，你的威力是多么巨大！看见老人流泪，女人们也痛哭失声；年轻人嘴边常有的微笑消失了；少年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这是他们所不熟悉的痛苦感情的真实流露；甚至连壮年男子汉的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尽管他们对于残酷的现实早已司空见惯。啊，大自然！我又大声呼唤……

这种并不伤人的悲痛感情是多么甜蜜！它能使心灵及其感情复苏。我随着驿站的人群一起痛哭，我的眼泪对于我是那样的甜蜜，就像是维特从心里迸发出的泪水一样，……噢，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为什么你没有看到此情此景？如果你看到的话，你也会跟我一样潸然泪下，这种甜蜜的感情交融将更加令人快慰。

一曲唱完，围观的人纷纷向老人施舍，就像是在奖励他的劳动。他十分平静地收下了所有的小铜币和一块块的面包。他对每个布施的人都鞠躬致谢，画着十字说："上帝保佑你健康。"在没有得到这位上天喜爱的老人的祝福之前，我不想离去。我希望他祝福我旅途平安，吉祥如意。我一直希望，也觉得，好像富有同情心的人的祝福可以减轻旅途中的困难，去掉心头的疑虑。我走到他跟前，把1卢布放在了发抖的手中。我的心也在发抖，那是因为我担心自己这样做是为了虚荣。他画着十字，没来得及说出他向施舍者们常说的那句祝福的话，便因手掌上的异样感觉而缩回身去。这可刺痛了我的心。给他一个小铜币他倒更开心！我对自己说，从一个小铜币上，他能感觉到人类对贫困的通常的同情，而从我的卢布上，也许他却觉出了我的傲慢。他不会为这个卢布而向我祝福的。噢，我当时觉得自己是多么渺小！我多么羡慕那些给了老歌手一枚铜币和一块面包的人！

"不是5戈比吧？"他问道，问话时，不明确他究竟是向着谁，就像他平时说话时一样。

"不是，老爷爷，是1卢布。"站在他身边的一个男孩说。

"为什么施舍这么多？"瞎子说道，垂下了眼睑，仿佛在琢磨，他手里放着的是什么东西。"不能享用它的人要它干吗？假如我没有双目失明的话，我就会为这个卢布而感激不尽了。即使我用不着它，也可把它送给穷人。唉！要是上次这里遭火灾后我有这么1卢布就好了，邻居饥饿的孩子们至少可以少号哭一天一夜。可现在我要它干吗？我甚至不知把它放在哪里。它说不定会诱使人们犯罪。偷一个铜钱没多大油水，但为了1卢布就会有很多人愿意伸手。收回这个卢布吧，好心的老爷，你，我，还有你的这个卢布，可能引人做贼。"噢，

真理啊！当你责备人的时候，你对一颗敏感的心来说是多么沉重！

“把它收回去吧，真的，我不需要它，而且我也已经不配得到它了，因为我没有为印在卢布上的君主效劳。是造物主的意志，使我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就失去了双眼。我耐心地忍受着它的惩罚。因为我有罪，他惩罚了我。……我当过兵，参加过许多战役，同祖国的敌人打过仗。我作战从不畏缩。但是战士只应该在需要的时候才是战士，而我却总是战斗一打响心里就充满了狂怒。我从不饶恕躺在我脚下的敌人，也从不放过已放下武器、乞求饶命的敌人。有一次，我为我军取得的胜利所鼓舞，正冲向前去斩杀敌人，缴获武器时，我突然倒下了，一颗炮弹从我眼角上划过，使我失去了视力和知觉。噢！后来的人们，你们要勇敢，但却别忘了讲人道。”他把我的卢布还给我，又安详地坐回了原地。

“老爷爷，拿去吧，这是给你过节的馅饼。”一个50岁上下的妇女走过来对盲人说。他非常高兴地用双手接过了馅饼。

“这才是真正的慈悲，这才是真正的施舍。30年来，每逢节日和星期天，我都能吃到这种馅饼。你没有忘记你年轻时许下的诺言。我为你已故父亲做的那点事，就值得你一直到我死都不忘记我吗？我的朋友们，我搭救过她的父亲，使他免遭过路士兵的殴打。过路士兵是经常殴打农民的。士兵们想抢走他什么东西，他和他们吵起来。事情发生在谷仓后面。士兵们开始打他。我当时是这些士兵所在连队的中士。我正走到这里，听到农民的喊声就跑了过去，把他救下，使他免于挨打。也许还不只是挨打，但还没发生的事情就用不着瞎猜了。后来这位女善人看见我在这里行乞，便想起了这件事。这就是她每一天和每个节日都放在心上的事。我做的是小事，

但是好事。好事总是使上帝高兴的。上帝对任何事情都会有报应。”

“老人家，难道你就这样当众伤我的面子吗，”我对他说，“独独拒绝我的施舍？难道我的施舍是罪人的施舍？就算是罪人的施舍，倘若这施舍能使他残忍的心变软，对他也是有好处的。”

“你是在伤我的心，伤我这颗早就因上帝的惩罚而伤透了的心。”老人说，“我没有想到，我不接受这可能带来灾祸的施舍竟会使你见怪，请原谅我的过错。如果你愿意给我东西，那就给吧，但要给用得着的东西。……我们这里春天寒冷，我常常嗓子痛，没有围脖子的围巾。只有上帝开恩，病才会好。……你有没有旧围巾？当我嗓子痛时，我就围上它，它会使我的脖子暖和，嗓子就不会痛了。我会记住你的，如果你需要一个叫花子的怀念的话。”我从自己脖子上解下围巾，系在了瞎子的脖子上。……我和他分别了。

当我回来再经过克林时，已经找不到这位盲歌手了。他在我来到此地的三天以前死去了。据那位每逢节日给他馅饼的妇人对我说，他得了病，临死前还系着我的围巾，人们把这条围巾和他一起葬进了棺材里。噢！谁能感受到这条围巾的价值，谁就能够感受我听到这些话时心里的感受。[1]

整部书就是用这样的笔调写成的！

① 此处参考了汤毓强等人的译文。

俄罗斯科学院[1]

今年1月18日，俄罗斯科学院荣幸地恭迎奥尔登堡王子彼得殿下的光临。他被科学院选为名誉院士。科学院常任秘书Д·И·雅济科夫在会议一开始便宣读了科学院简史。

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83年创立俄罗斯科学院，任命达什科娃公爵夫人为科学院主席。

叶卡捷琳娜竭力在各个领域建立法规和稳固的秩序，亦欲为俄罗斯语言确立规范。科学院遵从她的谕旨，立即动手编纂词典。女皇亲自过问，不仅宣旨下令，而且处理具体事宜。她经常询问已经开展的工作进展情况如何。有一段时间，她每每听到的汇报总是：我们的词典已编到字母Н了。于是，有一天，她终于显得有些不耐烦了，她说："老是'我们的词典'、'我们的词典'[2]！你们何时能对我说'这就是您要的词典?'"于是科学院加紧了工作。过了一些时候，当女皇再次问及词典进展情况时，她得到的答复是：科学院已编到了字母П。女皇脸上露出了微笑，她说："现在

① 此文发表于《现代人》1836年第2期。

② "我们的"在俄语中为"наш"，是以字母Н开头的词。因此亦可把叶卡捷琳娜的这句话理解为"老是Н、Н"。Н在俄语字母表中排在第十四位，即词典编纂工作离完成尚早。

可以让科学院稍得安宁了。”①

虽然女皇说了这样一句笑话，但为了使女皇感到惊喜，科学院仍需加紧执行女皇的最高旨意。词典在6年内编纂完成。②卡拉姆津为这一成就感到惊叹是有理由的。他写道：

> 由科学院出版的这部完整的词典真是一个奇迹，它使那些留心的外国人对俄罗斯惊叹不已。毫无疑问，我们能如此幸运，从各方面讲，都应归功于我们那超凡的高速度。我们的成熟不是在几百年内，而是在几十年内完成的。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早就以拥有众多的大作家而著称，可他们却还没有一本词典。我们已经拥有许多宗教书籍；我们还拥有诗人和作家，但真正的经典诗人和作家只有一个（罗蒙诺索夫）。我们制定了语言体系，它可以和佛罗伦萨科学院及巴黎科学院的著名语言理论相媲美。

科学院的许多院士都参加了《俄语词汇爱好者对话录》的出版工作。雅济科夫先生说，下面这件事是值得记住的：冯维辛为《对话录》提交了一篇文章，标题为《能引起诚实的聪明人特别关

---

① “安宁”在俄语中为“Покой”，以字母П开头。（П在字母表中排在第16位。）

② 法兰西学院创建于1634年，自成立以来，学院便从不间断地进行词典的编纂工作，但词典的出版却不早于1694年。维尔曼说：“当词典的编写工作还在进行的时候，词典本身却已经陈旧。于是便开始对它进行修改。几年过去了，学院仍在复审字母A。一向精明干练的科尔贝尔对如此缓慢的进度感到惊讶不解。一次，他赶去出席了学院的会议。学者们正在讨论Ami（朋友）一词。大家对该词的准确含义争论不休，极为周密细致地斟酌，ami一词是否含有世俗的义务，或者只是一种感情上的亲密关系；是一种共同的内心感受，还是一种外在的情感表露，或是无需报偿的好意与忠诚。见到如此情景，科尔贝尔，这个在宫廷内有许多朋友的大臣也承认说，他以后再也不会对学院的进度缓慢与吃力费劲感到惊奇了。”——普希金原注

注的几个问题》。所有这些问题连同对它们的极为机智的答复，都刊登在《对话录》上。这里，我们列举几例。

问：为什么大家都债台高筑？

答：因为开销比收入大。

问：为什么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莫斯科，上等人中的各种协会、团体都已消声匿迹？

答：因为俱乐部的数量在成倍增加。

问：为什么大多数贵族的主要努力不在于尽快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人，而在于尽快把他们培养成近卫军士官？

答：因为这比把他们培养成人更容易。

问：为什么在立法的年代里，没有一个人打算在这一领域出人头地？

答：因为这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事。

问：为什么我们不为无所事事而感到羞愧？

答：这话不太明确。干坏事才会觉得羞愧，而在社会上生存就不意味着无所事事。

问：为什么我们在开始干一件事的时候，总是热火朝天，激情满怀，可后来就将它置之脑后，甚至还经常忘得一干二净？

答：这与人之所以要衰老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问：我们的民族性格是什么？

答：能敏捷地领悟一切事物，极为驯服顺从，骨子里具有造物主赐给人的所有美德。

问：为什么从前滑稽小丑和插科打诨的人没有官衔，而现在不仅有了，而且官衔还挺高？

答：因为我们的祖先并不全都开窍。

注意，这个问题是由思想自由而引起的，而我们的祖先是没有思想自由的。

以上答案是女皇陛下亲自写的。

在A·A·纳尔托夫(1802—1813)的主持下，科学院出版了：

1）俄语语法；

2）科学院文集及译文集；

3）按字母顺序编写的词典；

4）塔西佗编年史俄译本；

5）阿纳卡西斯王子旅行记俄译本。

1813年，纳尔托夫去世。当时正随皇帝陛下在国外征战的A·C·希什科夫被任命为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在他的主持下，科学院出版了以下书籍：

1）科学院通报，11卷（1815—1823）；

2）期刊年鉴，4部（1829—1832）；

3）简要札记，3卷（1834—1836）；

4）昆提利安的《雄辩家的培训》（1834）；

5）A·C·希什科夫文集及译文集，16部。

目前，科学院正准备出科学院词典第3版。普及该词典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我们优美的语言，在拙劣不才的作家们笔下，正在迅速地走向衰落。词汇改变了原义，语法失去了规范，拼写法，这语言的徽记，也随每个人的意愿变得面目全非。而在我们的杂志中，正确的拼写法比正确的看法还要少。

在常任秘书发言之后，至圣者菲拉列特介绍了一段古代手写文献。该文献是于1073年为斯维雅托斯拉夫大公撰写的，现收藏于莫斯科主教公会图书馆。

该手写文献名为《古罗斯文学手抄文选》，即各个作家的文选摘录。

文选中的大部分作品是与基督教教义有关的文章。不过，还有一部分，按照当时的理解，属于形而上学的文章。如：《论自然》、《论本性》、《论人》、《论差异》、《论偶然》、《论敌人》、《论话语》。

从237页的背面开始，为该书的第175篇文章。此文论述的是隐喻与修辞格的问题。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

“乔治·霍乌罗夫斯克论艺术手法。创作手法有27种[①]：

1. 外来语。
2. 隐喻（metaphora）。
3. 应用。
4. 假定。
5. 引伸。
6. 逆生。
7. 领悟。
8. 摘录。
9. 拟声（onomatopeia）。
10. 创新。
11. 替代。
12. 转喻（metonymia）。
13. 悖论。
14. 兜圈子。
15. 非静态。
16. 鄙俗。

① 以下只列举了25种。

17. 恶言。

18. 寓言。

19. 例证。

20. 献辞。

21. 拟人。

22. 文体。

23. 讽刺 (ironia)。

24. 形式。

25. 后置词

外来语不过是另一种格拉果尔化的东西，其意义在于使神的语言堕向蛇的语言，在一切野生动物中你最讨厌蛇，因而外来语的蛇也就意指恶魔。”

接下去是诸如此类的其他概念的定义，但这些定义对于读者来说却不太容易理解。这可能是因为11世纪俄国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或诠释者、出版者对该书的内容亦不甚了了。”

常任秘书宣读了科学院章程第二章《关于科学院的义务与责任》。他还宣读了一段奏折，该奏折由科学院院长草拟，旨在请皇帝陛下对科学院章程草案作出裁决：

科学院乃是语言的捍卫者。因此，为了公众的利益，科学院务必以最大的热忱同语言中非本质的、异化的、令人费解的、含混不清的、**不合乎道德规范的现象**作斗争。但这种斗争必须以有利于语文科学为前提。它应该是温和的、公正的、不讲情面的，既不要恶语中伤，也不要姑息纵容，绝不能像某些不道德的文章那样，由于主观的臆断，极端的无知或恶意，导致了过分的吹嘘或恶毒的诽谤，全无任何真理和

证据可言。而在缺乏证据和真理的情况下，此类文章便失去了任何价值与作用。

随后，正式院士 M·E·洛巴诺夫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论外国及本国语文科学的本质特性》。按其实质及其在这次会议上的重要性，该文值得进行专门的分析研究。

B·A·波列诺夫亦在会上宣读了《И·И·列佩欣生平简介》。列佩欣是俄罗斯科学院第一任常任秘书。该文条理清晰，全面完整，叙述流畅，总之，是一篇纯学院式的文章。

接下来，正式院士 M·E·洛巴诺夫、Л·A·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公爵、Б·M·费多罗夫相继朗诵了自己诗作。

最后，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公爵朗读了院长先生的一篇短文，标题叫作《有关卡拉姆津的一件小事》。

当听到德高望重的长者对这位伟大的作家作出真诚而朴实的赞扬时，人们不会不产生一种特殊的感受。因为卡拉姆津曾经是院长先生尖刻批评的对象，即使这批评不完全是公正的，但它却一直是善意的。A·C·希什科夫也借此机会回忆起 1811 年卡拉姆津在特维尔的一段情形。当时，卡拉姆津住在现在已经故去的大公夫人、即奥尔登堡王子殿下的母亲叶卡捷琳娜·巴甫洛夫娜的宫中。大家都知道，那时，卡拉姆津为奥尔登堡大公殿下及他尊贵的姐姐朗读了《俄国史》中的几个章节。"您听我朗读时是如此的专注，"历史学家在给大公殿下的献词中这样写道："实在令我欣慰陶醉。在将早已逝去的过去与今天进行一番比较之后，您并不艳羡德米特里那充满危险的荣耀，因为您已预见到自己那更为辉煌的荣耀。"

卡拉姆津在特维尔的那段时间里，还做了一件值得称道的事。这件事在他已故朋友们的眼里十分了不起，但却不为今天的人们

知晓。大公夫人是一位具有绝顶智慧的女人。由于她的提议，卡拉姆津写了他的《关于古代与近代俄罗斯的思考》。书稿中注人了一颗美好心灵的全部真诚和深刻有力的大胆论断。大公阅读了书稿中那一篇篇雄辩的文字。……读完之后，他仍像过去一样恩宠赏识自己这位直爽的臣民。总有一天，后人将赞扬当今君王的伟大与我们这位爱国者的高尚。

1836 年 1 月 18 日的这次会议，将成为俄罗斯科学院编年史上令人难忘的一页。

法兰西学院[1]

斯克里布跻身法兰西学院，坐上了于去年逝世的阿尔诺的席位。

阿尔诺曾写过一些悲剧，这些悲剧在当时极为走红，可现在却完全被人们遗忘了。为着公众而写作，迁就他们的意见，迎合他们的口味，而不是为着自己写作，不是出于独立不羁、不可左右的灵感，不是出于对自己艺术的无私的爱，这种诗人的命运便只能如此！阿尔诺还写过两三篇寓言。这些寓言既机智又优美，较之他的全部戏剧作品，赋予了这位已故诗人更多的权利来享有诗人的尊名。人们都熟悉他的《叶片》：

> 可怜而干枯的叶片，
> 离开了自己的树枝，
> 你将飘向何方？——我也不知。[2]

① 发表于《现代人》1836年第2期。未署名。斯克里布与维尔曼的讲演译自А・И・屠格涅夫于1836年2月底从巴黎寄给普希金的一本小册子。包括这两个讲演在内的会议召开于1月28日，译文中删去了斯克里布讲演的结尾，此结尾论及"歌谣的随意性"。

② 原文为法文。

这首小诗的命运极为不凡。柯斯丘什科临终前曾在日内瓦湖边吟诵过它。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将它译成了希腊文。在我国，翻译这首诗的亦有茹科夫斯基和“我们那鬈发乌黑，额前垂挂着一缕银丝的战士”[①] 达维多夫。

也许，连达维多夫本人也不知道，当阿尔诺在听到有关达维多夫翻译《叶片》的消息之后，还特地为他写了一首诗，并将这首诗附在自己文集的注释里。[②]

斯克里布到学院上任时，作了一番异常精彩的演讲。维尔曼亦以同样精彩的发言回敬了他。而J·雅南则在自己的小品文中既讥讽了斯克里布，又嘲笑了维尔曼。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兰西智慧的三位代表人物便全部登场了。

斯克里布先生的演讲词

各位先生：

你们都知道，就在热那亚共和国英勇抗击路易十四的时候，该共和国的执政官被迫前往凡尔赛，以期求得伟大国王

① 雅济科夫描写达维多夫的诗句。

② 《叶片》有幸被译成了几种文字。由达维多夫将军翻译的俄语译文，据说极为出色，既准确，又优美。达维多夫先生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人，即生来具有作诗的天赋，因此，他若是沉迷于写诗，那也只是一时兴起，只是为了在战后和享乐之余得到一种休息。当这些寓言诗的作者得知达维多夫先生给他带来了声誉的时候，他将这些寓言诗送了一份给达维多夫，并附上了献词：

献给您，诗人，献给您，战士，
您在希波克列纳的岸边狂饮着香槟，
用一片橡树叶
变出了桂树叶片。
——普希金原注（原文为法文）

的宽赦。当时，那处处都能见到人工艺术战胜了大自然的凡尔赛花园，那哗哗着响的瀑布，那橙子林和悬垂式的露台，完全惊倒了这位执政官。有人问他，你觉得凡尔赛什么最不寻常？执政官回答说："我的出现！"

先生们，我也是如此。看见自己的周围全是法兰西的名流，置身于回忆文学之光荣与伟大的庄严气氛中，我本该对我在这里的出现深感惊讶，倘若不是有个念头在宽慰和激励着我的话。

法兰西学院乃是文学的众议院。它希望所有因遵循布瓦洛文艺理论及审美规律而得到公认的作品，都能在这个议院里拥有自己全权的、得到议院确认的代表。这就类似于我们的立法会议，在会议上，一个小村子选派的代表可以与一个大城市的议员坐在一起。学院给了我参加这个会议的入场券，以此抬举了我所代表的那种极不起眼的文学体裁。我可真要为我得到这样的恩准感到自豪，假若轻松喜剧的作者有资格自豪的话。

诸位先生，我并没有错误地估计我被选派到这里来的真正原因！如果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二流剧院的舞台上试验自己的能力，力图在微型戏剧作品中塑造塔利亚；如果说，有时候，我也曾在较为高级的剧院竭力炮制几场较为大型的戏剧，那么，这样一些努力还并不能给予我这样一种权力，即把自己看作是这儿的喜剧代表之一。各位先生，你们并不需要新的人选，因为你们拥有卓越的剧作家，他们是《家庭暴君》、《辩护人》、《两女婿》和《老人学校》的作者。你们只希望这里的椅子别老空着！

因此，你们向**歌谣颁发了荣登大雅之堂的**资格证书。你们想到可把这证书转发给我。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有幸

在你们当中占据一席之地。

或许，这种看起来如此微不足道，在这大厅的古典式穹窿下，其名称听起来显得不伦不类的文学体裁，还值得你们注意。因此，我亦应当公正地，或至少应出于对自己保护人的感恩，出来为这种文学体裁进行辩护。我应当把轻松喜剧(Val de Vire)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向你们作一番陈述。但是，一桩更为重要、更为庄严的责任此刻正占据着我的思绪，于是便把这欢快的小调堵在了口中。

我初次进入这个大厅已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当时，我还在拿破仑中学念书。就在这一切都仍旧保持着原样的大厅里，有人在给我们颁发奖状。我的同学们、对手们、朋友们坐在这一边，就像现在这样！那边坐着父母、姐妹和其他亲人！……谁的母亲能在这里亲眼目睹他的重大庆典，谁就是幸福的人！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幸福的人！这边坐着我们的老师、校长、著名文学家和官员们。用以奖励优秀学生的棕榈冠，在当时就像现在一样，由才华卓著的人来颁发。我问坐在我旁边的人："校长大人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这是丰塔纳先生。""校长身边那位极为高贵体面的人是谁？""大学秘书长阿尔诺先生，《马里在明土尔纳》的作者，这部悲剧中的优美诗句我们都能背得……，""《马里在明土尔纳》的作者！"我欠起身来，想要看看他。我那时何曾想到，学生将登上自己老师的席位，而进入这圣殿的就是我，我将把一根柏树枝放在那颁发过棕榈冠的人的灵柩上！

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亦是一位品德高尚的诗人，你们为他深感惋惜。可为什么，那至少比我的嗓子更为洪亮，更为动听的声音，没有被召唤来讲出那对他的赞美之词呢？他为何如此不走运：为什么评价他的悲剧作品，这并不轻松的

荣耀，竟成了一个歌谣作家的造化？

从少年时代起，阿尔诺先生就迷上了诗歌，他对诗歌有一种不可遏止的爱好和向往。当他发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马里在明土尔纳》的时候，他还非常年轻。要激起人们对声名狼藉的马里的同情，这对于一个24岁的年轻人来说，不啻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这个人曾在意大利玩弄阴谋诡计，进行血腥屠杀，他强占掠夺，臭名昭著。他不同于希拉，既无即时住手的宽宏，又无放弃自己罪恶勾当的勇气。但是，阿尔诺先生明白，在人们的心目中，罪过是可以用不幸来抵偿的。他选做主角的，不是压迫者马里，而是流放犯马里，一个战胜了基姆布利人的英雄，一个四处漂泊的流亡者。阿尔诺感觉到，世界上常有这样一种伟大而崇高的情形：战斗的光荣伴随着不幸，惨遭的失败伴随着英勇——他的感悟是正确的！他没有摹仿那些于他之前塑造了这个形象的作家，他没有借助不相干的复杂情节，没有借助女人与悲剧式的爱情，他以庄严朴实的古风来处理自己的作品。于是他创作出一幅历史画卷，那里随处可见马里的伟大形象。先生们，你们还记得吗，那个奴隶，那个基姆布利人，给人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印象：一看见有40年荣耀的执政官，他便吓得魂飞魄散，扔下短剑，一面逃，一面不停地在口中念道："我可永远没有胆量去杀死马里！"

这部悲剧是献给普罗旺斯伯爵殿下的，他便是后来的路易十八。阿尔诺与他关系密切，常在他家出入，这是因为亲王喜爱文学，而亲王的庇护则可能会有利于年轻的诗人。在那些年代里，要想在文学上取得成就，这种庇护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谢天谢地，时代变了，现在的作家已无需求得权贵们的庇护了！阿尔诺在自己的努力中寻求着荣耀，如果可能，

还有自己的独立。

大革命开始后，普罗旺斯伯爵逃往国外，阿尔诺因此而遭遇到无数危险，于是，他急忙移居英国。阿尔诺的命运真是奇怪！他选中的保护人，当时的亲王，后来的国王，成了致使他两次离开法国的祸根。第一次是1792年，因为亲王逃亡出国；第二次是1815年，因为亲王回到法国。

阿尔诺竭尽全力，想要重返故乡。在敦刻尔克他被当作移民抓了起来，并被投进了监狱，后来因了公安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的一道命令才获释。这一次，委员会总算作出了一项公正的决议，主张移民法不该涉及作家，从而也就不该涉及《马里在明土尔纳》的作者。决议中的一个观点十分理想浪漫：宇宙属于诗人，因此全世界都是诗人的祖国。

法国较好的时期到来了：共和国依然存在，但却没有了执政官们那沾满了鲜血的斧子，甚至也没有了罗马和斯巴达的严厉。说到穷奢极侈、荒淫无度，说到忘却过去与轻慢未来，共和国简直可被称作雅典共和国，假如谁有足够的胆量将巴拉斯与伯里克利做比较的话！当时，我们正处在督政府的统治下。这个统治软弱无力，奢靡腐化，追欢逐乐，可以说，它是革命的摄政统治。

投身文学创作以后，阿尔诺首先发表了悲剧《奥斯卡》。这部悲剧极为感人地表现了恬淡而含蓄的友谊与爱情。随后是悲剧《威尼斯人》，其中的第五幕堪称现代戏剧的佳作。当然，出于对历史的忠实，我们应该说，这第五幕并非由阿尔诺独自写成。最初，他给自己的这出戏安排了一个幸福的结局，剧中主角蒙特卡辛（Montcassin）并没有死，而是被自己的情敌解救，逃脱了死刑。一位科学院院士很不喜欢这个结

局。他与阿尔诺是在意大利相识的，阿尔诺曾把自己的悲剧念给他听过。这个院士就是波拿巴将军。在文学上，他的意见是如此坚定果断，就如同在政治上一样。他忍受不了伏尔泰，不幸的是，他亦不喜欢拉辛，但他却准备将高乃依提升为第一部长①。波拿巴喜欢出人意料的结局，甚至想用刺刀去消除戏剧舞台上的一切障碍。

在拿破仑看来，《威尼斯人》第五幕的结尾很不自然。他认为，恋人们的幸福破坏了结尾。他对阿尔诺先生说："假如不幸成为无法挽回的定局，那么它给我留下的瞬间印象便会在我心中一直持续到晚上，持续到明天！……应该让男主角去死，一定要把他干掉！干掉他！"于是，蒙特卡辛便按照拿破仑的命令给处死了。观众们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满足，他们用掌声肯定了这一判决。用不着再去提什么《威尼斯人》是献给波拿巴将军的：这是无可非议的。

波拿巴喜欢阿尔诺，他们的友谊从未改变。波拿巴把阿尔诺当作可靠的人，曾将伊奥尼亚群岛掌管教育的权利委托给他。波拿巴常在桑特莲大街的家中接待阿尔诺，让他参加他们家里的谈话，那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事。后来，在将"恺撒"与他的好运送往埃及的军舰上，波拿巴与阿尔诺谈起了莪相和荷马。再后来，波拿巴把大学的头等职位给予了阿尔诺。拿破仑始终敬重阿尔诺，虽然不止一次地抱怨他那恶毒的讽刺和尖刻的直率。这个只凭第一眼就能看出和评估一个人的价值的将军，在踏上意大利的第一天，便用他那胜利者的手，在自己的记事簿上写下了阿尔诺的名字。23年过去后，在圣赫勒纳岛上，一个垂死者的手在遗嘱中又再次写下

① 参见拉斯—卡斯回忆录。——普希金原注

了这个名字。

对于这一点，我还能补充些什么以资证明呢？

百日政变之后，阿尔诺遭到放逐。但更令人吃惊的是，他被你们推选而在你们中间占据的那个席位亦被剥夺。在谈到莫里哀的诗歌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只要国王不下达特别命令……①

可命令下达了，科学院开除了阿尔诺。

阿尔诺高尚而坚忍地经受了自己的被逐。在这期间，他写了《寓言集》的最后一部分。在我看来，这是他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因为在这里，他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一种将会成为典范的风格。并且，作者既没有刻意摹仿拉封丹，也没有竭力效法弗洛里昂。这里既没有前者的那种悦人的直率，也没有后者那动人的优美与雅致。这里有讽刺挖苦，这里有嘲弄讥笑，在这里，人们看到了尤维纳利斯——他之所以成为寓言作家，可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阿尔诺是否已经为自己的夸张法所陶醉？在他眼里，社会是不是过于不道德，人们是不是过于凶恶呢？人们指责弗洛里昂，说他作品里的温顺羔羊太多了些。这指责是公正的。那么，在阿尔诺的寓言中，狼是不是又太多了些呢？

当阿尔诺不在法国的时候，他的悲剧《日尔曼人》在巴黎上演了。该剧在上演的第一天很受欢迎，可第二天就被逐出了剧院，就像它的作者被逐出法国一样。经过5年的放逐，当公正判决的那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阿尔诺回到了祖国，重

① 原文为法文。

新在你们中间登上了自己的位置……。这时，一件意外的事再一次，同时也是永远地将他从你们友谊的怀抱中夺走了！他的小儿子遭到了一次惨重的打击。父亲赶着去安慰儿子，作了一次旅行，由此便给自己招来了厄运。阿尔诺有长时间散步的习惯，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散步的过程中间创作出来的。一天早上，天气酷热，他一面散步，一面构思作品，时间比平时拉得长了些。他回到家时已经非常疲惫。他躺到床上，对女儿说道："你弹弹钢琴吧。"女儿遵命弹了起来。父亲仿佛是在休息，把头垂得越来越低。他已经咽气，女儿却仍在继续弹奏着。

他与世长辞了，没有痛苦，没有临死前的煎熬。他嘴上挂着微笑，心里想着早晨写下的字句，想着孩子，想着朋友，也许，先生们，还想着你们！

他死了，留下了三个儿子，留下了自己的、同时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在文学界，一个在军队里，一个在法院。他们都无愧于父亲的姓氏和荣誉。他们当中的一个就是《狮子星座 α》的作者。他向人们证实，他的姓氏是高贵的，这个姓氏的荣耀是能够世代相传的。他向人们证明，用笔挣得的贵族头衔，就像用剑挣得的贵族头衔一样，是可以世袭的。

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促使人们去思索探究阿尔诺猝然去世的原因，但一个时期以来，他的健康确是在明显地衰退。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他承受了一次次无情的打击。这些打击撼动了他那强健，但却敏感、易于受刺激的机体。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有一种恶毒的批评，它可以直戳人心。有人毫不吝啬地用这种批评来对付阿尔诺。尽管阿尔诺

已饱经沧桑，尽管他过去曾有过辉煌的业绩，但他却不能像马里在明土尔纳那样，去解除基姆布利人的武装。

应该指出，人们常常把阿尔诺的性格弄错。在这个人的心里，深深地铭记着所有的善与恶。如果说他从未忘记他遭受的恶，那么他却因此永远心怀仁善。我们也要承认，凭着阿尔诺活泼机智的本性，他是忍不住要说些尖刻的言词的。如果在这个弱点上再加上他那非同一般的直率，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阿尔诺会有如此之多的敌人。不过，还不曾有过比他更善良的人。他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当他还在大学里担任要职的时候，他就不止一次地帮助过那些遭到冷遇的大天才和无声无臭的小才子。阿尔诺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过贝朗瑞，当时，只有他一个人看出了贝朗瑞的才华。阿尔诺的言谈中充满了大胆而生动的词句，含有一股嘲讽的意味。这种嘲讽常见于他的寓言、各类诗歌，甚至他那特别风趣的歌谣……。是的，先生们，常见于阿尔诺的歌谣，常见于一个悲剧作家的歌谣！我对这一点感到如此的自豪，以至于迫不及待地提到了这个话题。因为，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把重要的尚方宝剑，这对于我不揣冒昧地要在你们中间为其争得广泛承认的那种文学体裁，乃是又一个有力的证明。

先生们，为此，我必须把那段被我称之为歌谣的英雄时代的历史展示在你们眼前。在这一时期，歌谣曾伴随着罗兰和勇敢的骑士查理大帝去作战，它曾随着手拿竖琴的北部方言诗人和行吟诗人去到宫殿的大门口，与城堡的主人同坐在餐桌前。然后我要告诉你们，它怎样伴随十字军远征，又怎样随着第一批基督教男爵返还，它怎样坐在哥特式的炉灶旁，以歌颂苏丹萨拉丁那愉快的曲调，为那些闲得无聊的贵妇们解闷逗乐。再后，我还得向你们介绍，那既温柔又雄壮的歌

谣，曾与阿格妮丝·索雷尔一道指点查理七世，人们是以何种方式夺回王位。它既神气十足，又好热讽冷嘲，曾伴随着弗兰西斯一世，在桑勃尔的玻璃上写下诙谐的讽刺歌。再往后，它蓦然间变得充满宗教狂热，它煽风点火，或举着同盟的十字架，或打着投石党人的旗号，进攻国王，推翻大臣，改换议会。也许，为了描述歌谣的历史，我得出人意料地向你们讲述法兰西的全部历史。

一位杰出的剧作家曾在这里用他那充满精明见解的著名讲演证明说：假如来那么一次可怕的政变，把所有的历史文献都从地球上销毁殆尽，只留下一本喜剧还完整无缺，那么，这本喜剧集便可以代替所有的编年史。学院的文学自由可允许我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吗？我并不认为喜剧作家就是历史学家，因为这并不是他的使命。我并不认为，在莫里哀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历史。关于路易十四时代的大事件，莫里哀的喜剧究竟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在他的喜剧里，哪怕能找到一句有关伟大国王的迷误、弱点以及过错的话语！他的喜剧谈到过南特敕令的撤消吗？不，先生们，正如路易十五时代的喜剧对鹿苑保持缄默一样，帝国时代的喜剧对征服者的贪婪野心也是只字不提的！如果我们再告诉大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人们对我这个毛病所进行的指责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这便使我获得了一种许可：为了阐明真理，干脆把第一千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说出来），如果我们也来作这样一种假设：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那么一个卡尔梅克或鞑靼的战胜者，他喜欢风趣，喜欢歌谣，就像欧玛尔喜欢《古兰经》；他将把所有的历史书籍全烧毁，只留下迄今已经出版的各种歌谣集和轻松喜剧剧本，就像那个穆罕默德的总督烧掉了整个亚历山大图书馆，只留下一本预言家的书一样，那么，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能否只凭这些文献提供的材料，重新写出我们历史的最主要的事实。也许是我陷入了谬误，也许这只是一派胡言，但在我看来，借助这些风趣诙谐的档案，借助这些可以吟唱的编年史，很容易找到那些或被喜剧遗忘了的姓名、日期、事件或被喜剧保留下来的历史人物。

如此忠实可信对于喜剧的缪斯来说是不可能的，我清楚这一点。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备喜剧，我只是在讲述事实。我相信，无论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还是拿破仑，都不能容忍舞台上出现重大的历史教训，都不能允许把牵涉到他们的历史事实搬上舞台。在这一方面，现在的喜剧作家并不比他们的先辈拥有更多的优越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政府的神经脆弱被各党派的神经脆弱所代替。在我们自由的时代里，我们并不能自由地在舞台上再现一切可笑的东西，因为所有的政党都护着自己人，只允许你向它的邻居获取笑料。图书出版业，这一自由管理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它想把真理告诉全世界，但却不喜欢别人对它说出真理。我再重复一遍，在这里，我并不是想指责喜剧，相反，我是要为它辩护，我是要证明：人们在向它要求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人们在要求它取代历史。

至少，喜剧能向我们描述时尚。……说得对！我同意，比起历史的准确和真实来，喜剧倒是更接近时尚描写的准确和真实。可是尽管如此，我们却发现，除了个别极为罕见的例子以外（比如《图尔卡列特》，这便是一部“准确”的作品），由于某种非常奇怪的命运，戏剧差不多总是与社会生活的真实完全相悖。先生们，要举一个有关时尚方面的例子吗？那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摄政时代吧！如果说喜剧总是能反映社会，那么，摄政时期的喜剧就应该向我们展现自由散漫和纵

情狂欢。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一时期的喜剧冷静、精确、严谨、讲究。德图什的喜剧就是这样，它不笑，或者很少笑。而拉肖塞的喜剧甚至还流泪。在路易十五的统治下，或者，干脆说，在伏尔泰的统治下，那些改变了整个社会观念，把极其富有今天，又如此充满未来的18世纪卷入迅急潮流的重大问题正在获得解决，就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却是马里沃、多拉、德拉努，即摹仿拉丁语，卖弄机智和空洞无物。

在革命最为残酷的时期，当大街上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到处都蔓延着悲剧的时候，剧院的情况又怎样呢？舞台上全是宣扬博爱和温情的戏，比如：《女人》、《儿子的爱》。1793年1月，正当路易十六遭到审判的时候，上演了《郊外庄园里的美女》，一出浪漫多情的田园喜剧。在帝国时代，在光荣与胜利的时代，喜剧并不是威风凛凛的胜利女神！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在温和的统治下，桂冠和军服占领了舞台，塔利亚戴上带穗的肩章！那么，在我们的时代呢？就在我与你们讲话的此时此刻，试想有个外国人，又一个阿纳卡西斯，他从天上跌入了我们的文明，正赶往剧院，为的是去了解1835年巴黎时尚准确真实的状况。这个令人尊敬的外国人将被吓成什么样子！身上没带武器他就不敢走上巴黎的大街，他哪儿也不敢去，免得撞上刺客、通奸和乱伦。而这一切全是因为有人使他相信：戏剧就是社会的再现。

假如后来有人拉着这个外国人的手，把他带进了我们的客厅，带进了我们的家庭圈子，那么，他将会何等惊异地看到，我们的道德品质也许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过。除了人们偶尔谈起的某些例外，在一个家庭中，还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的美德。假如我们告诉他：从前，上层阶

级做了坏榜样，常常是宫廷自己毁坏了老百姓的德行；假如我们对他说：现在，美德自上而下降临到我们中间，从高层政权映射到整个社会，那么，这个外国人就会不再见怪于这个他由于不了解而怪罪过的社会，高兴地说：我受骗了，谢天谢地，戏剧并不总是能反映现代时尚！

先生们,怎样解释戏剧与社会的这种经常性的矛盾呢?这是出于一种偶然的原因吗？或者，这更有可能是由于那已被剧作家们分析揣摩透了的现代趣味与嗜好？你们去剧院，不是为了接受教训或者改造，而是为了寻求消遣和娱乐。虚构比真实更能使我们开心！让你们看每天都见惯不惊的事，这不可能使你们感到高兴。可是，那些你们在日常生活中见不到的东西，所有那些异乎寻常、充满浪漫色彩的东西，那才是对你们有吸引力的东西——现在，人家演给你们看的，也正好就是这样一些东西。

因此，在革命的恐怖时期，正是由于那些血淋淋的场面和抢劫掠夺已使你们感到刺眼，所以，当你们在剧院里看到博爱和慈善，看到那在当时纯属虚构的东西时，你们便感到心旷神怡……

同样的道理，在波旁王朝复辟的年代里，戏剧使你们回想起你们为欧洲立法的那些日子，于是，过去的岁月便使你们于现世中得到了慰藉。

由此可见，戏剧很少表现现实社会。起码，正如我们见到的那样，戏剧往往表现与现实相悖的一面。因此，须得在戏剧对之保持缄默的事件中去寻求真实。喜剧能表现每个时代的激情，如莫里哀、丹库尔和皮卡尔，喜剧诙谐风趣，如柯伦·达勒维尔，喜剧优美动人，如安德里厄。喜剧描写昔日的怪事和罕见的传奇。它微微撩起帷幕，只向我们显露社

会生活的一角。但是，整个民族的风尚，整个时代，不管它是典雅的还是粗俗的，是淫乱的还是虔诚的，是血腥的还是英勇的，谁会来向我们揭示呢？它到底是好是坏，先生们，你们只能到我刚才对你们讲到的那种编年史中去寻找答案：

在那简洁朴实的画面里，在那调皮滑头，但却永不衰朽的时代档案中。[①]

这就是歌谣！歌谣丝毫用不着掩盖真实，恰恰相反，它的出现正是为了讲出真实！那么，先生们，就让我们把已经讲过的那些时代再重新审视一遍吧，就让我们从摄政时期说起吧。当时的喜剧作家很少将这一时期记录下来。就让我们捧起歌谣集吧，看看它是不是一个更为忠实的社会生活的描绘者。我们以柯勒为例：

歌手们啦，我的兄弟，
真心、爱情皆是妄想。
在你们的歌谣里
且把这些美德
描述得如同那古老的弥天大谎，
因为它们已经消亡。[②]

别担心，先生们，我只给你们朗读一个诗段，而且还是选的其中一部分：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爱情已在法兰西绝迹，
它是
一具死尸
死于生活过于奢华富裕。
……
可所有的傻瓜，
那些仍在给女人写情诗的人们，
还指望着我们的女性
期待着她们的真心，
好品行，
美德和美好的心灵！
他们以火一般的热情
激励着我们那些几乎要泄气的情郎，
激励着那些好色的傀儡！①

先生们，从这些诗句中，难道你们没看到整个摄政时期吗？若是我把整首歌谣读完，那将会如何呢！

你们想了解18世纪的社会生活吗？这个社会是讲求时髦，还是崇尚机智？是明辨是非，还是怀疑多虑？这个社会是否不信上帝，只信享乐？你们想了解这个社会的风尚、哲学和它那略显做作的面貌和姿态吗？别去问喜剧——它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们！去读沃热隆、布夫勒尔和红衣主教贝尼的歌谣吧。

让我们再走远一点，回到那受到恐吓的歌谣不得不折断自己芦笛的时代去吧。就在这时，它也没有沉默不语，没有

① 原文为法文。

停止对自己的时代风尚进行描述。它亦步亦趋，就像准确无误的回声，无论在哪个喧闹的时代，它都吸收着音符，并把这音符传递给我们。就这样，在我们那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的革命中，恐怖时期被描述在1793年那渎神的歌谣里，而英雄与光荣的时期则映现在引导我们军队去征服欧洲的《马赛曲》中。

我并不是在向你们讲述帝国的光荣——从有史以来第一个歌谣作家德佐吉埃算起（他创造了歌谣，就如拉封丹创造了寓言），这个时代自有它的全部歌谣作家来作它的历史撰写人！

至于说到波旁王朝复辟时期，那么，别去向我们的戏剧询问情况，别到莫尼乔尔的剧本中去寻求答案，因为我们有贝朗瑞的歌谣。

在发言快结束的时候，睿智的演说家描述道：在长期的斗争中，歌谣一直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他回顾着，在同盟与投石党时期，歌谣如何战斗，它怎样围攻红衣主教黎塞留和马扎然的议会，怎样勇敢地起来反对不可一世的路易十四，怎样嘲笑他的老情妇，嘲笑他那些平庸的大臣和倒霉的将军。在精明而不道德的摄政时期，在软弱而无情的路易十五时期，歌谣从未停止过进攻。最后，在威严的拿破仑时代，在沉闷的缄默中，唯有歌谣大声疾呼。演讲者还以一首著名的歌谣《意弗托国王》为例：

有个国王住在意弗托，
他在历史上鲜为人知晓；
他起得晚，睡得早，
成天喝酒把时光来消耗，

他头戴让内托
这是一顶普通的睡帽……①

我以为，未必有人会想到这首歌谣是对拿破仑的嘲讽。这首歌谣悦耳动听（几乎是备受赞赏的贝朗瑞所有歌谣中最好的一首），事实上，在这首歌谣中连对立的影子都没有。

法兰西学院常任秘书 维尔曼先生的答词

尊敬的先生！

您的演讲非常成功，就像您的喜剧非常成功一样。在法兰西和几乎整个欧洲的剧院里，只要一提到您的大名，大厅里便会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此时此刻，在这里向您表示欢迎的，正是这样一种掌声。学院对此早已有所预见。它相信，推选您是正义的事业，是民族的事业。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任何一种经得起考验的荣耀，皆可赋予人们获得学院头衔的资格。谁也不会被允许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让观众们一个个地都笑死掉，而他却不遭报应。

先生，您用不着恪守一本正经的谦逊，一味念叨您的作品形式浅陋轻贱，您这样只会贬低您在我们面前一贯的声望。要引起人们的兴趣，关键不在题材，也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才华。有的歌谣确实比史诗好得多。那位著名的院士，即那个您正坐在他的席位上，并对他作了一番恰如其分的评价的

① 原文为法文。

人，在写了许多伟大的悲剧作品之后，又特别以其独到新颖的讽刺短诗而受到了人们的注目。他把这种讽刺短诗称之为寓言。如果阿尔诺还活着，那么，对于从您那种类繁多、不可胜数的喜剧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创作才能，这个充满智慧和博学多才的人是定会恰如其分地作出评价的。他不会因您有许多协作者而对你进行非议，也不会因您的许多优秀作品并不完全属于您个人而责备您。须知，那些作品如若没您，便永远不可能问世。阿尔诺知道，善于作出选择和促使作品趋于完善的审美鉴赏力，乃是发明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能够看出它的真正价值的人。他会高兴地接受您为他推荐的协作者——拿破仑。您非常成功地描述了这个协作人简明扼要、骇人听闻的诗学艺术。

他们共同创作的，只是《威尼斯人》的第五幕。如果这个合作不是更具效果的话，那可怪不得波拿巴将军。他那时正处在青春与荣耀的第一个高峰。既要战胜意大利，又要控制法兰西，还要征服埃及。他要同时做所有的事，考虑所有的问题。在对王位的期待中，他怀着自己的设想和创造发明，不知何所施何所用。在出征意大利的时候，阿尔诺将自己的悲剧《奥斯卡》献给了拿破仑这位莪相的英勇崇拜者。从此以后，阿尔诺便开始追随拿破仑。不久，他加入了埃及远征军，随"恺撒"去了亚历山大。"东方号"战舰上搭载着许许多多的著名学者和军事将领。旅途中，阿尔诺不停地与波拿巴将军交谈。他们谈战争，谈艺术，谈自由，他们谈征服全世界，谈文学，谈悲剧。波拿巴时常回到这最后一个话题上，他还为悲剧创造了自己的一整套理论。按照他的观点，政治和社会的利益——这才是悲剧唯一的题材。一旦牵涉到爱情，牵涉到内心的矛盾和斗争，那么，连《察依拉》在内，通通

会被他归作喜剧。阿尔诺不同意这一新奇的观点。一次，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将军对阿尔诺说："不管怎样，我还是想与您一同写一部悲剧。""好啊，"阿尔诺回答，"那就等我们一同制定出一个作战方案以后再说吧！"

虽然这短暂的交往也许会令许多人羡慕，虽然阿尔诺对这位征服者头顶上的幸运之星深信不疑，但阿尔诺毕竟没有完成这次旅行。出于对别人的友情，在这次征战的初期，他便留在了马耳他。但是，阿尔诺属于最先起来呼唤英雄从埃及返回，并为他大造舆论的人。

雾月 18 日，一场军事政变为建立帝国扫平了道路。作为这场政变的热忱参加者，阿尔诺紧随在波拿巴的左右。他追随波拿巴没有任何个人企图。作为一个纯粹的文学家，他总是有些漫不经心，清高自傲，既不怎么关心自己的前程，也不十分留意保护人对自己是否看重。开初，他留在了马耳他，后来，在那远离政治和帝国朝廷的地方，他承担了一个官位不高但却十分重要的职务，且一直公正而有效地行使着自己的职权。

他把闲暇时间全部用来从事文学创作。作为迪西派悲剧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为一些古老的形式增添了新的恐惧因素，有时也增加了一些直朴。他虽然是拿破仑的狂热崇拜者，但却并不为拿破仑的皇权统治唱赞歌。伟大的统治者们强烈地震撼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但总是要在自己死了很久之后才能激起诗人的想像力。阿尔诺天生具有讽刺挖苦的才能，较之作颂辞，他倒更善于运用寓言那诡诈的暗示。只是在拿破仑遭到失败之后，阿尔诺才出来为他歌功颂德，而且，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使用了庄重冷静的语言。他沉湎于对天才的景仰，对其不幸肃然起敬。受到这感情的激励，他写出了

许多优美动人的篇章。他以受放逐的代价换得了写这些文字的权利。这个向往和平的作家，这个所有社会政变的反对者，他迷上了那倾覆了一代王朝的风暴。

为着这个缘故，在一段时间里，他可能不再属于法兰西学院，尽管他有极大的权力在这个学院里拥有自己的席位，尽管学院的一切都在将他呼唤。但在那个极不公正地驱逐了他的政权还在执政的时候，他竟然回到了我们中间。在这里，他再一次听到了人们对他的著作与才华的赞誉。他的著作为他的一生增光添彩，任何革命也不能使他的才华黯然失色。人们为他朗诵了纪念他被逐之日的诗。从人们的掌声和公众对他的无限同情中，阿尔诺感到了大家对他那高尚人格的令人陶醉的褒奖。

在智慧的、令人敬重的**安德里厄**逝世之后，我们中间空出了一个席位。阿尔诺的人格与声望给了他登上这个席位的权利。在这个位置上，需要赢得人们的信任，需要怀着对文学事业的无私的爱，有时，还需要号召人们起来维护文学事业的尊严。这个位置必须与文学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崇高情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当感到何等的遗憾：突如其来的死亡终止了这个活力正旺的生命，将阿尔诺从尚未完成的著作旁夺走了。他那些充满机智与豪放之情的手稿，成了他晚年生活与工作的见证，成了一份吸引人的纪念品。它们经得起那忘恩负义和粗暴无礼的批评，那批评总是在窥伺着这位艺术家与诗人的每一篇新作。作为一个有智慧，但却没有功名野心的旁观者，阿尔诺被卷进了时代的潮流。他不善于利用这个潮流，但却见识了许多事物，并且总是善于凭着可以使人心明眼亮的良心，凭着良心的坦诚与率直去评判这些事物。无论是个人利益还

是政治关系，都不能影响他那些回忆的真实性，都不能改变他那高尚的天性。1815年被逐出法国的阿尔诺，在自己的书中谈到了前帝国的某些不幸。他对这些不幸的描写带有如此深切的同情，这可能是在任何一本书中都找不到的。

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天生具有正义感。在他的字里行间，有时虽然也留下了现代激情的痕迹，但总是充满了坦诚的精神，这种坦诚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您了解您的前任，您公正地评价了他的才能。可是，先生，您的人生旅程是幸运而轻松的，不可与他的经历相提并论。我知道，您尊重科学的神灵，学者的劳动，你尊重那些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那些在斗争中挣得的成就和荣誉。您知道这一切，全是从别人口中听来的，对于您来说，从您的青年时代开始，文学就意味着不断地享受荣耀与财富。这样的好运是极为少见的，这样的例子也许是危险有害的。不过，您的才华与人格为这样一个例子提供了依据和证明。

别担心，先生，我不会老是谈论你的好运。不过，请允许我在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中去找出这好运的原因。您刚才已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机智而巧妙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但也许却并不完全正确。在我看来，您总是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您幸运地揣摩出了我们的时代精神。您创造了一个喜剧体裁，它与我们的时代精神极为相近，它很适合这个时代精神。这是一种无拘无束、活泼轻快的喜剧，它不是一幅优美典雅的大型油画，我们没有时间来仔细欣赏这样的画。它是一系列生动的肖像画，先是昙花一现，然后便销声匿迹，但并不会被人们忘记。我不赞同您维护的那种观点，我并不像您那样，认为戏剧按其本质必定与时尚相悖，必定是与社会相矛盾的另一个极端。我并不像您这样，认为戏剧不应该去

适应群众，以便取悦于观众。坦白地说，我持后一种观点，并能用您自己的喜剧来推翻您的论据。

毫无疑问，一部喜剧不可能成为某个民族的一部完整的历史，但它却可以解释和补充这个历史。喜剧不会告诉我们任何政治事件，至少，从阿里斯托芬时代以来便是如此（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从《贝尔特朗和拉东》时代以来便是如此）。但喜剧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时尚的见证，而那些政治事件却正好是发生在这个民族之中。喜剧并未道出任何人的姓名，可它却为每个人写着编年史。没有莫里哀，您能完全了解路易十四时代吗？您能知道，当时的宫廷、城市，特别是答尔丢弗是什么样的吗？包括幻想剧《唐·璜》在内，莫里哀的每一部戏剧都向您展示了17世纪民族精神的某个有趣的方面，都让您了解了时尚的变迁，都向您揭示了在这个辉煌时代的虚假宁静中，思想观念的纷扰和动荡。

再往后，先生，还有那庸俗小气、装腔作势的多拉和德拉努的戏剧，甚至还有您将其与上述二人完全混为一谈的马里沃的戏剧。您能确信这些戏剧是与自己的时代绝对矛盾的吗？18世纪，这个用您的话来说，如此富有今天，又如此充满来来的世纪，在上层阶级的游手好闲方面，在滥用智慧方面，在时尚的奢华讲究、腐化堕落方面，难道不像是一出它正在为之拍手叫好的、生硬做作的戏剧吗？

那么，在当时的其他一些戏剧中，在更为差劲的戏剧中，难道我们就找不到对于时尚的真实可信的，也许，还是值得历史学家们观察分析的描写吗？至于说到那个时代的优秀喜剧，那么，它们会告诉我们许多、甚至是太多的史实。如《费加罗的婚礼》，对于历史来说，它不啻是一个极其珍贵的资料库。

先生，我担心，倘若跟你走得再远一些，我就会为喜剧一

头钻进革命的编年史。但就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那一组伤感的词语，那在政治恐怖时期被搬到舞台上，对“老人”、“美德”、“童年”的顶礼膜拜，难道不正是时尚的一个表征吗？就是这样一个无耻的谎言，不是在讲台上，在黎民百姓欢乐节日的剧目表上一再重复吗？在那里，人类的神圣词句与卑鄙的罪恶行径混淆在一起——这就是新“同盟”的说教与会歌。

先生，在我看来，戏剧，无论它是好是坏，是自然还是生硬，正如人们曾经说过和证明过的那样，它永远是时尚与观念的可贵的历史见证。

在一个民族的习俗中，包含着人们的偏见、回忆和遗憾。因此，人们有时去剧院寻找一种东西，它虽不表现人们的现状，但却能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所向往的，什么是他们所失去的。因此，先生，我要用您的例子来说明：如果在“复辟”的和平时期，您那些退役的上校，您那些英勇顽强、功勋卓著的士兵曾受到人们如此的宠爱，那么，这并不是因为这出戏与时代精神相矛盾，恰恰相反，这是因为这出戏抚慰了人们受到伤害的自尊心，使他们受到了奉承，得到了满足。眼光敏锐的政治家是定会从这出戏中，从人们看戏时的欣喜中发现一股激情，发现一股在15年的岁月里都没有被扑灭，而此时此刻竟又重新燃烧起来的激情。

是的，先生！虽然您真把真实性从喜剧那里夺走，而仅仅把它授予了歌谣，但是，就在您的喜剧作品中，便可以找到符合现实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甚至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史学家，尽管你并不愿意。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您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您将歌谣与喜剧联系起来，于是，在谈到您的文学理论时，无论您说什么，等待着您的，都将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掌声。

我承认，在你最后所举的那些例子里，这一理论看起来的确像是正确的。在我们看来，几乎就在我说话的此时此刻，这种相互关系，这种戏剧与观众的一致性，似乎已经消失，或者干脆说，看上去，就好像是其中的一方想要诱使另一方堕落。但是，从对社会变革所作出的这样一种反应中，从人们激愤的头脑毫无结果的折腾与纷乱中，难道就找不出什么东西，用以对人们渴望剧烈动荡——这如此违背我们家庭习俗的要求作出解释吗?这种要求很难在戏剧舞台上得到表现，它对于观众来说是如此讨厌，以至无须检查机关的协助便会自行收敛。对于这一点，先生，您本人可以比别人更好地作出评判。您没有染上夸大其辞的恶习，没染上喜欢掺假的嗜好，您善于驾轻就熟地把机智与健全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您不需要那些不成体统的戏剧场面来增强戏剧效果。

长期的成功使您学会了这一难以掌握的艺术技巧，您很少放弃使用这一技巧，别看您有大量剧本是匆匆写成的。贵族布瓦洛曾经说过：

甚至连歌谣也要求健全的思想和艺术技巧。[①]

这一建议在我们这个时代看起来也许是不必要和多余的，但尽管如此，它却可以被准确地应用到我们舞台上的各种歌谣中去。无论是内容轻松、形式自由，还是机智调皮，都不能使作者避开布瓦洛要求的这样两条古老的法则：**思想健全、优美典雅**。即便这两条已不再成其为大型作品必须具备的特征，但却仍然要求轻松喜剧和喜歌剧遵从这两条法则。

① 原文为法文。

正是如此，塞顿，这个上一世纪具有朴实才华的人，便凭借着健全的思想和艺术技巧，在我们的戏剧舞台上找到了新的位置，并给后世留下了难忘的杰作。先生，由于您很早就从事文学研究，因而您所需要作出的努力和您将遇到的困难便少得多。没有独创性，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能强烈地吸引读者，而您则把这种独创性与对优秀典范的研究结合起来。您的早期作品，看上去，就像是在少年时代，在无忧无虑的欢乐中所产生的即兴之作，它们总是具有艺术的特征，而且写得如此迅捷，正如写得如此认真一样。

您用一个狭窄而小巧的框框限制了自己的才华。独创性，在时尚描写上的那种不落俗套、纯朴自然——全被从前的大师们从您那儿掠取了去。您在对我们的社会投去一个观察家的目光的时候，您并没有从这个社会中发现突出的形象。您看不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斗争，看不到各阶级的特点，看不到这如此适合用来写出优秀喜剧的素材。尽管有许多好的范例，但您仍然不能下决心在这优雅艺术的领域里试一试自己的才能。更为轻易、更为快捷的成功迷住了您。您没有集中精力去写某部喜剧，因为那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进行思考。与之相反，您将大作品劈成了许许多多五光十色的小作品，使作品成果 数以百计的西班牙诗人的多产性重新得到了复活。置身于被您归入同一水平，但却积极活跃、动荡不宁的社会之中，您将这个社会的观念、时髦和怪癖，随着它们在您面前不断涌现，一一地搬上了舞台。

当难于直接捕捉瞬间的真实时，您往往巧妙地从侧面去接近它。为此，您不是去抓主要特征，而是去找细枝末节，甚至善于让观众为您对之闭口不提的东西拍手叫好。莫里哀有许多小型戏剧，行家们认为它们具有与他的大型作品相等的

价值。您则善于在摹仿这些小型戏剧的同时，保持您自己的特色。对这位伟大诗人的回忆，或者他的某个思想的反面，往往为您写一部新戏剧提供了条件。

不过，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巴黎的社交界，在它那喧闹的生活中，在它的事务与消闲之中，在交易所，在文学界，在您的周围，在昨日晚会的事件中，您特别善于捕捉素材，并用您的灵感使它成为神奇的杰作。您的戏剧近似于一种客厅里的**谚语**，在这种客厅里，大家自己描绘自己，使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不过，只要您仍然还按公众的授意而写作，他们给您什么，您就奉还他们什么，多少绝妙而机智的场面，多少机敏而生动的对话，皆表明您参与了这一共同的工作！

先生，为什么您的戏剧能使整个法兰西开心？为什么它们能越过国界，在国外按照每个民族的不同口味被翻译、改编、缩短、加长？为什么您的戏剧能成为从南到北所有剧院的压轴戏？这就是原因。到处都有哈哈的笑声，到处都在争先恐后地抓您的作品，这就是一个证明：在这些纯巴黎的戏剧中，最主要的东西并不是服装和瞬间的暗示，最主要的，是这些戏剧中有许多真实性，有许多全人类共通的乐趣。

我记得，有一个著名的德国批评家，他对我们的古典主义诗人过于吹毛求疵。也许是太聪明太懂行，他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极为荒唐的见解，他居然认为《求情者》比《厌世者》好。我相信，您本人是不会同意这种观点的。然而，您用机智的喜剧把这个批评家引入了迷途，这便恰好成了有利于您的新证据。假如在这些不仅到处上演，而且国外还有人为其写评论的轻松戏剧中，没有那么多的智慧和活力，那么，像这样的迷误也就不会发生了。虽然我不重复那个批评家的话，但我不能不

注意到您那特殊的艺术技巧，您的最重要的戏剧都采用了这种技巧。我不能不注意到您戏剧的轻快而流畅的节奏，注意到您的戏剧留给人们的印象的真实性（尽管有时候对话过于矫饰，或者过于琐碎）。我不能不注意您用各种可能的形式来描写对象的奥秘，注意您对话的文体，它时而优雅，时而朴实，时而感人，而任何时候它总是充满了机智。

在《外交家》与《瓦列里》之间，在《在同一个办公室里》与《米歇尔和克里斯蒂娜》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多么丰富多样，有时又是多么巧妙的说教。在大量的戏剧作品中，采用被古代戏剧庸俗化了的题材：婚姻！其中的一部叫做《金钱婚姻》，这是一部地道的五幕喜剧，剧中未加讽刺歌，剧本也没有**合写人**。这部戏具有戏剧的完整性，人物性格前后统一，对话真实，能给人留下十分强烈的印象。散文体的应用并未使这部作品减色，就如散文体的应用并不损伤勒萨日与皮卡尔喜剧的优美一样。

先生，没有必要向您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您没有更为经常地作出努力去复兴这高雅的喜剧。写喜剧对于您来说是如此地得心应手，您既不缺少才华，也不缺少引人发笑的题材。社会变革甚至更加拓宽了我们的喜剧舞台。您完全有可能在政治喜剧方面试试自己的能力，政治喜剧乃是戏剧艺术所拥有的极度自由。在您大量的成功之作里，《贝尔特朗和拉东》尤为出色。它的题材是如此新颖，它的细节亦是如此真实。这部戏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恰巧受到了观众们的赏识，因为在他们看来，需要秩序就是大众的情感。这部戏讥笑了动乱，它生动地向人们描绘：在某些时候，一些人为的骚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便可扰乱整个国家的安宁。

不过，先生，在政治喜剧这个舞台上您才刚刚跨了几步，

它的帷幕便很快地关上了。不过您并不对此感觉遗憾。您机智敏锐，多才多艺，您毋需到各党派的斗争中去寻找笑料。您不采用这样的方法也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取得成功。您还年轻，观众对您期望甚高。无论您的才华是用来获取更难得的成就，还是用来重新恢复过去的荣耀，法兰西学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为自己作出的选择而感到遗憾。因为文学若要获得荣誉和生命，就必须把受到社会认可的各种流派的名家都吸引拢来。这便是百花齐放的形式，通过这些形式便能反映和表现出一个民族的艺术状况。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立刻认识到这一点，每个人对此事的参与程度也不尽相同。除了大胆独创的才华，还应有严格的审美趣味和渊博的学识。除了为文学而献身的人，还应有这样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文学只是他们在讲台上，在法庭上，在剧院里活动的手段。各式各样的类型相互联系，相互融合，正是这样的混合便形成了学院的特征。我们的每一次损失，就如我们的每一次选择一样，都越来越使我们确信了这一点。曾几何时，我们当中的一位演说家被死神劫走了。他在议会上曾高声讲过的一句至理名言，在我们平静的交谈中悄然传扬。此人堂堂正正，能言善辩，一直受到大家的敬重，无论是在他离任期间，还是在他掌权的时候。谁能还我们勒涅！①

至少，让这四壁之间响起我们的感叹，愿人们原谅我们：如此迫不及待地利用这个机会，向他那简朴的新坟公开献上了我们的崇敬之情。

---

① 排除被提作候选人的巴兰什、维克多·雨果和莫莱，法兰西学院选中了迪帕蒂先生作为已故的勒涅的替补。学院这样做可能有它自己清楚的原因。我们倒是不知迪帕蒂先生为何人。——普希金原注

杜罗娃札记序言[①]

忽而是男，忽而是女。

——奥维德[②]

1808年，一个名叫亚历山德罗夫的少年加入波兰枪骑兵团，当上了一名普通士兵。他英勇顽强，战功卓著，获得了圣乔治十字勋章，并于同年被提升为马里乌波尔骠骑兵团军官。随后，他转入了立陶宛枪骑兵团，继续服役，热忱奋勉如初。

看起来，一切都平淡无奇，按部就班。然而，正是这件事情引出了许多议论和传闻，在社会上造成了强烈的影响。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人在无意之中泄露了这样一段隐情：原来，骑兵少尉亚历山德罗夫是个女人，名叫娜捷日达·杜罗娃。

一个年轻姑娘，出身有名望的贵族之家，是什么原因致使她离开故乡，女扮男装，承担起连男人都畏惧的责任与重负，驰骋在战场——那是什么样的战争啊？那可是在与拿破仑打仗！是隐秘的伤心家事？是狂热的异想天开？是天生的桀骜不驯？是爱情？……这些问题现在虽已被人们淡忘，而在当初却着实让社会着了

① 发表在《现代人》1836年第2期。

②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奥维德《变形记》第4卷。

迷。

现在，H·A·杜罗娃要亲自来公开她的秘密了。承蒙她的信任，我们将成为她这本有趣的札记的出版人。怀着不可言喻的兴奋与关注，我们读完了这位超凡脱俗的女子的自白。我们惊讶地发现，那只柔嫩的小手，那曾经握过沾满鲜血的枪骑兵刺刀的手，还善于舞文弄墨，而且文笔流畅，优美生动，字里行间充满了火一般的热情。娜捷日达·安德烈耶夫娜答应让我们从她1812年至1813年间所记日志上摘录一些片段，用以为《现代人》杂志增添光彩。于是，我们便怀着最深切的感激之情，迫不及待地享用了她的允准。

出版者

舍维列夫《诗歌史》[1]

《诗歌史》的问世令人欣慰，这本书非常重要！

就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等等而言，俄罗斯乃是欧洲的法庭和衙门。我们是伟大的批评家。[2]对于那些并非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我们的评判总是惊人地合乎常理和恰当公正——这便是一个例证。

我们的文学批评没有分量。为什么？因为文学批评不仅需要合乎常理，而且需要热情和学术性。对我们文学批评的看法——梅尔兹利亚科夫——希什科夫——达什科夫等等。

舍维列夫在自己的引言中许诺：他既不因循法国批评的经验主义体系，也不奉行德国人的抽象哲学（参见 6～11 页）。他将选择历史的表述法——这也合情合理：采用这样的方法，他可以给自己的学说增加叙述的吸引力。

这位批评家从西方文学史入手。

在意大利，他看到了罗马式的肉欲。这欲念被基督教所战胜，获得了宗教的庇护。它在艺术中复活，使严厉的宗教世界主义折服于自己的奢侈，于是又重新占领了自己的发祥地。

---

① 写于 1836 年初。

② 原文为法文。

在西班牙，他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不过他遇到了摩尔人，并发现西班牙存在伊斯兰教倾向（?）。

抛开奢侈的南方，舍维列夫转向北方的民族，转向贫困的奴隶，转向被大自然抛弃的人。

在雾沉沉的英国，他看到一种需求，这便是要积累财富，发展工业，发展描述现实的文学，开展劳动和研究，发展实业。

在德国那近乎神秘的森林里，他发现了对远离现实、离群索居的向往，对封建割据的追求。这种影响至今还随处可见，在德国政治的构成中，在思想家的体系中，在诸侯的宫廷里，在教授的讲台上。

法兰西，“欧洲的中心”，社会生活的代表，个人与民众相混同的生活的代表。在法兰西学术与诗歌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民大众（人人作主①）用令人憎恶的民主权力在统治着国家。他们具有愚昧无知的全部特征——对异己的蔑视，肆无忌惮，明目张胆的傲慢无礼等等。② 俄国的箴言则是：各有所长③。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原文为拉丁文。

洛巴诺夫论外国文学与俄国文学的精神本质[①]

(1836 年 1 月 18 日由他本人
在俄罗斯帝国科学院宣读)

洛巴诺夫先生认为：自己的论文只适于采用一种模糊的、非学术性的形式。因为这是一篇短文章，只相当于那些刊登在《〈俄罗斯残疾人报〉文学增刊》上的述评。也许，在杂志上还像模像样的文章，一旦当着全科学院人士的面宣读，然后再慎重其事地公之于众，便会显得十分肤浅，毫无分量。但无论如何，洛巴诺夫先生的论文值得，甚至需要我们来对它进行最为细致的分析研究。洛巴诺夫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 近几年来，阅读的热情和受教育的愿望在我国有了极大的增长。印刷厂增多了，图书的数量也增多了，杂志的发行量在增加，图书贸易也在扩大。

洛巴诺夫先生认为这一事态值得注意我国成就的观察家们高兴。但与此同时，洛巴诺夫先生却又提出了出人意料的指责。他

① 发表于《现代人》1836 年第 3 期。

说：

> 公正的观察家，心中对凡是有利于祖国繁荣昌盛的一切事物都怀着热爱的观察家，他们只要将自己近来读过的所有东西在脑海里重温一遍之后，便会急得颤抖地说：在我们的现代文学中，存在着因受外国作家影响而产生的荒谬现象和道德败坏。

洛巴诺夫先生没有解释他所说的“荒谬现象”与“道德败坏”究竟指什么，便继续说道：

> 一个民族总是要向另一个民族借鉴，而且，理性总是指使人们去借鉴好的东西，摹仿美的东西。可是目前该向外国的现代作家们借鉴些什么呢（我是说纯文学）？
>
> 他们经常暴露一些如此荒唐、丑陋和怪诞的现象，散播一些如此有害和起破坏作用的思想。对于这些现象和思想，读者迄今本不曾有丝毫了解，而这些现象和思想却强行将道德沦丧、不信上帝，从而将未来迷误或犯罪的萌芽植入到读者的心中。目前，在小说、诗歌和散文中，充斥着我们文学的，全是强盗、恶棍等鸡鸣狗盗之徒。他们只能激起人们的好奇。难道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血腥勾当可以被当作摹仿的典范来加以宣扬和介绍吗？难道最为令人憎恶的场面，不是使人们因恐惧而生警戒，而是令人作呕，搅乱人心，难道这样的场面能对人类有所裨益吗？难道那广袤无垠的领域已经萎缩空虚，高尚、有教益、完美、崇高已变得荒谬无稽，“令人讨厌”（？），令人反感，甚至令人憎恨了吗？

为了给这些责难找到根源，洛巴诺夫先生援用了爱丁堡文艺评论家们那个众所周知的、关于目前法国文学状况的观点。于是，科学院的大厅里响起了朱利·雅南、欧仁·休等人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前面还加上了一些奇怪的形容词。……如果（万一）洛巴诺夫先生的文章被翻译，如果上述先生们看见自己的名字上了俄罗斯帝国科学院的报告，那将会怎么样呢？我们这位演说家能言善辩的口才会不会白费？他们是否有资格为这突如其来的荣誉，为在欧洲科学院年鉴里尚不曾听说过的荣誉而感到自豪？在那些年鉴中，迄今所能听到的，还活着的人的名字，只能属于这样一些人：他们用自己的才华、功绩和著作已经为自己筑起了不朽的纪念碑（欧洲科学院对其他人是闭口不提的）。博学的英国文艺评论家将自己的评论文章登在杂志上，文章在杂志上占据了一个体面的位置，并发挥了自己的影响。我们的《文库》将该文译成了俄语，这的确干得很好。事情也就该到此为止了。有这样的高位，站在那里便不能随意对人进行讥讽的责备；有这样的头衔，它会使您具有自觉维护中立不偏和礼法的责任感，而毋需检查机关的监督，出于自愿，而不是出于守法。[①] 洛巴诺夫先生写道：

> 法兰西和法兰西人民已被对人类最为有害的现代哲学弄糊涂了。他们已经在革命的血雨腥风中变得粗暴冷酷，堕入了精神与理性蜕化的深渊。对于他们来说，最为令人厌恶的场面，比如那最为卑鄙下流的戏剧，那可恶的无耻与乱伦，最肮脏的乌七八糟：《卢克列茨·勃尔吉亚》，在他们眼里已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最有毁灭性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也并不那么有害，因为他们早就熟视无睹了。而且，这么说吧，在可

①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奥维德《变形记》第1卷。

怕的革命中，他们与这些丑恶的现象早已同流合污了。

我不禁要问：难道可以如此恶毒地诅咒整个人民吗？是人民造就了费讷隆、拉辛、博叙埃、帕斯卡尔和孟德斯鸠，——今天他们又以夏多布里昂与巴朗什为自豪；是人民把拉马丁奉为自己的第一诗人，把巴朗特、两个蒂耶里、基佐与尼布尔、加朗相对照；是人民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宗教热忱，如此欢欣鼓舞地摈弃了上一个世纪的可怜的怀疑主义的思考。——难道整个人民应该为几个作家，为几个多半是年轻的，滥用自己才华的，把私利建立在读者的好奇心与敏感的神经之上的作家而承担罪责吗？为了满足那些总是喜欢新鲜花样和强烈刺激的公众，许多作家便去描写那些低级下流的东西，忽略了美，忽略了真，忽略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可是，道义感就像才华一样，并不是人人都能具备的。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作家德追求一个目标。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可以说：你们只能写某某题材，不许写别的东西。思想就像行为一样，分为有罪的和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的。法律不干涉个人的习惯，不要求清理个人的饮食起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同样，法律也不干涉作家们选择的题材，它不要求作家去描写日内瓦牧师的德行，而不去描写强盗和恶棍的传奇故事。它不要求作家去赞颂夫妻生活的幸福，而不去嘲笑婚姻的苦涩。要求所有文学作品全都优美典雅，全都符合道德目的，这就如同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安分守己，有教养、懂文明一样。法律只制裁犯罪，而将人性的弱点和恶习留给每个人的良心去审判。与洛巴诺夫先生的观点相反，我们并不认为现在的作家写出强盗和恶棍是要将他们作为供人们仿效的榜样。勒萨日写了《吉尔·布拉斯》和《古斯曼·达尔法拉什》，他当然不曾打算教人偷盗和诈骗。席勒写了《强盗》，想必也不是要号召年轻人走出大学去做强盗。现在的作家们不过是想要吸引

读者，刺激他们的想像力。何必要设想他们有犯罪的企图呢？狡诈骗子的奇遇，强盗、幽灵等等的恐怖故事，总是令人好奇，不仅吸引着孩子们，而且也吸引着成年人。自古以来，讲故事的人和诗人便正是利用了我们心中的这种癖性。

我们并不认为当今过于敏感、“轻狂浮躁、纷乱无序的法国文学是政治动荡的结果”。[①]在法国文学中发生了自己的革命。它与推翻了路易十四古老帝国的政治变革毫不相同。在革命最为黑暗的时期，文学推出的却是些甜甜腻腻、多愁善感以及道德说教的书籍。文学中洪水猛兽的出现，已是近来温和虔诚的复辟时期(Restauration)的事情。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到文学自身当中去寻找。由于长期受制于刁钻的准则，由于长期被这些准则定下的过分拘泥的形式所限制，法国文学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漠视一切准则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由古代雄辩家们确立的，似乎有益就是美文学的条件和目的这一庸俗的谬论，已经自行消亡了。人们已经感觉到，艺术的目标是理想，而不是说教。但是，法国作家只懂得了这个毋庸争辩的真理的一半。他们认定，道德沦丧亦可成为诗歌的目标，即亦可成为理想！从前的小说家是在某种矫揉造作的庄严中来表现人的天性的；惩恶扬善是他们每一部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现在的作家却正好相反。他们喜欢把罪恶描绘得随时随地都是那么神气活现。他们在人们的心中只找到两根弦：自私与虚荣。这种肤浅的人性观自然暴露了思想的狭隘与肤浅，而且很快会变得可笑、腻味，就像阿尔诺与戈登夫人古板而庄重的长篇小说一样。目前这种人性观还很新鲜。公众，即大多数读者，由于对此还未习以为常，还把现代小说家们看成是深察人性的大师。然而，“绝望文学”（歌德是这样为它命名的）、“撒

① 《现代人》杂志第1期：《论期刊文学的动向》。——普希金原注

且文学”（骚塞语）、电流文学、苦役文学、潘趣酒文学、鲜血文学、小雪茄文学等等——这些早被高水平的批评评论过的文学，已开始在公众的心目中贬值了。

从康捷米尔时代开始，法国文学就直接或间接地对正在兴起的我国文学发生着影响。在我们时代，它的影响亦应有所反映。不过这影响已经变得微弱了。这种影响仅限于翻译作品和某些并不引人注目的摹仿之作。我们的杂志就像任何地方的杂志一样，或正确、或不正确地控制着社会舆论，一般来说，它总是新的浪漫主义流派的对立者。我们最受欢迎的、非摹仿性的长篇小说，都属于风俗性小说或历史小说。这种小说的样板是勒萨日和瓦尔特·司各特，而不是巴尔扎克和朱利·雅南。诗歌则仍然与法国的影响格格不入，它越来越接近于德国诗歌，并且高傲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不为公众的趣味及要求所左右。洛巴诺夫先生继继写道：

> 说到我们文学的精神本质与发展倾向，任何一个有文化素养的人，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俄国人都会看到：充斥着学术理论的是自相矛盾、愚昧无知、思维混乱；充斥着文学评论的则是信口开河、厚颜无耻、无礼放肆、专横霸道。体面、尊重、健全的理性被抛弃、被遗忘、被毁灭。浪漫主义，这个意义至今尚不确切，但却有魔力的字眼，成了许多人为所欲为以及在文学领域胡言乱语的保护伞。文学批评，这个文学的良师益友，现在却变成了广场上的献丑和文学上的打劫，变成了以野蛮粗暴从弱智者口袋里弄口粮的手段，有时甚至变成了攻击那些以其政绩和文学上的成就而著名的官方人士的手段。圣职、智慧、才华、高龄，没有任何一项能受到尊重。罗蒙诺索夫被视为墨守成规的学究。这个最伟大的天才

> 把不朽的杰作留作了俄罗斯的财富，无论在世间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找不到能与他的杰作相匹敌的作品。可是，对于我们的文学，这个天才却好像根本不存在，他就像一个бесталанный[①]（洛巴诺夫先生大概是想说“无能之辈”）一样不被人注意。卡拉姆津，这个最有智慧的人，这个心地纯洁的人，这个认真勤勉的作家，他的名字却遭到人们的嘲笑。……

当然啰，我们的批评还十分幼稚，它很少保持它应该具有的庄重与矜持。也许，它的决断常常是出于算计，而不是出于信念。不幸的是，不尊重高贵荣耀的名字（这乃是无知与愚昧的首要特征），在我们这里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还被当作值得夸耀的勇敢行为。即便是这样，洛巴诺夫先生所讲的话仍然不公正。人们对罗蒙诺索夫的诗人头衔的确提出过（毫无根据的）异议，不过，据我所知，倒是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称他是墨守陈规的学究；恰恰相反，现在人们已习惯于把他当作大学者来颂扬，尽管并不把他当作诗人放在眼里。人们在说到伟大的杰尔查文的名字时，心中总是充满了好感，甚至是迷信的好感。卡拉姆津的纯洁而高贵的荣耀属于俄罗斯，任何有才华的作家，任何有真才实学的人，甚至一些曾经与他敌对过的人，都不能不对他怀着深深的崇敬和感激之情。

我们对我们的时代并不屈膝崇拜。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科学事业的确向前迈进了一步。欧洲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对我们也产生了影响。科学理论已从经验主义中的樊篱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为普遍的形式，表现出更为明显的统一倾向。德国哲学，尤其是

① 俄语词 бесталанный 可能是 бесталантный（“没有才华的”）的笔误。

在莫斯科，找到了许多年轻、热忱、认真勤奋的追随者。虽然他们使用的语言难于被一般人所理解，但是他们的影响是良好的，并且越来越明显。

我不想谈论大多数人的审美趣味，也不论及美的定义和理论。多数人的审美趣味怎样，这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方面都显而易见的，也是众所周知的。而美的定义和理论在转瞬即逝的、后一个推翻前一个的现代体系中，是如此自相矛盾，变幻无常；在空洞无物的故弄玄虚中如此颠三倒四地乱了套，以至对健全的头脑来说，它们已是无法被弄明白的了。今天人们未必会相信，在其形式只是略有某些变化的情况下，美在过去、现在，对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都是相同的。他们未必相信，荷马们、但丁们、索福克勒斯们、莎士比亚们、席勒们、拉辛们、杰尔查文们，尽管他们的形式、体裁、信仰、习惯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创造了属于一切时代的美。他们未必相信：作家们，无论是浪漫主义的还是古典主义的，都应该顾及有知识、有教养的人们的思维能力和想像力，满足他们的情感，而不要只去满足那些愚昧的，对什么都拍手，甚至对秋千下的小丑也称道的群氓。不，现在有人宣扬一种论调，说人类的智慧已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它可以对古代的，甚至对现代的著名作家们置之不理了；它不需要引导者和楷模，现在任何一个正在写作的人都是别具一格的天才。——于是，在这个谬论的旗帜下，他们对古代的伟大作家们发起了攻击，把他们称作令人难受和甜得腻人的古典主义作家（然而，正是这些作家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征服了自己的同胞，并将永远给自己的读者带来许多高级享受）。在这个谬论的旗帜下，现代作家们无所顾忌地搅乱了阅世不深的青少年的头脑，

将道德与文学引向了彻底的毁灭。

虽然我可以撇开这义愤填膺的演说不加反驳，但却不能不提及洛巴诺夫先生从他的全部议论中所作出的结论：

> 由于现在正编写着的、道德败坏的书籍的数量很多，书报检查机关便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这就是要识破作者的所有诡计。要消除文学观念的变幻无常，制止语言的粗俗无礼，这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有人出于恶意要利用这语言来大肆宣扬荒谬有害的东西的话。谁来协助完成这一艰巨的伟业呢？这便是每一位认真负责的俄国作家，这便是每一位有文化的父亲，这尤其是科学院，因为它的建立恰恰是为着这个目的。出于对皇上和祖国的爱，科学院有权力、有义务毫不懈怠地揭露、打击、毁灭邪恶，无论它出现在文学领域的哪个角落。“科学院作为一个机构，其成立的宗旨乃在于监督语言的道德与纯洁。它应该把分析审查图书或者批评当作自己的一项主要责任”(见科学院章程第三章第二条及奏折第三条)。因此，先生们，让我们每一位尊敬的同人都按照科学院章程的精神，把对现代文学作品的分析和对现代文学书刊的评论提交科学院会议审议并发表，以此为社会利益效力，履行这一得到皇上批准的机构的真正使命。

可是，我们那数量很多的道德败坏的书籍在哪里呢？谁又是那粗俗无礼的、恶意的作家？谁又在施用诡计以图废除社会幸福安宁赖以依存的法律呢？可以指责我们的检查机关懈怠失职吗？我们知道的正好相反。与洛巴诺夫先生的见解不同，书报检查机关没有必要去“识破作者的所有诡计”。“书报检查应该注重被查书

籍的实质，注重作者的显然的目的和意图，**并在自己的判断中，永远以言语的明显涵义为根据，不允许随意将此涵义作坏的解释**”。（书报检查章程，第六条）这就是最高意志，它赐予了我们文学创作的正当权利和合法的思想自由！如果初看起来我们书报检查的这条基本规则似乎是一项特别优待的话，那么在经过极为仔细的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假若没有这条基本规则，恐怕连一行文字都出版不了，因为任何一个字眼都可以从坏的方面去加以歪曲。“荒谬的东西”，如果它只是荒谬，而不含什么反信仰、反政府、反道德、反个人名誉的因素，那么，它就不属于书报检查查禁的对象。荒谬就如同愚蠢一样，属于社会嘲笑的对象，而不应该受法律的制裁。有许多通过了书报检查的书籍都是不会被有文化的父亲拿去给自己的孩子们读的，因为这些书并不是为所有年龄的读者们写的。一些道学先生们断言：不能让18岁的姑娘读小说。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说书报检查应该查禁所有的小说。书报检查机关是起良好作用的机关，而不是压制的机关。它是个人与国家幸福安宁的忠诚卫士，而不是跟在淘气的孩子们身后，令人心烦的奶娘。

最后，我们要衷心地祝愿：为使我们的语言更加优美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建立了许许多多卓越功勋的科学院，能促进和振兴祖国文学，以自己有效的庇护和鼓励来奖赏成就卓著的作家。对于那些不配当作家的人，则以它妥当的方式来加以处罚，这便是：不予理睬。

伏　尔　泰[1]

（伏尔泰与布罗斯未曾发表的通信等等。巴黎，1836年。）[2]

前不久，伏尔泰与布罗斯院长的书信集在巴黎出版。这些信件涉及伏尔泰在1758年所进行的一笔购地交易。

伟大作家的一字一句，在后人眼里都会成为无价之宝。哪怕这些手稿就是开支账簿的簿录，或是给裁缝的赊账单，我们仍要怀着好奇心来仔细地研究。一个念头不由得使我们感到惊异：正是那只草草写出这些简单数据，写出这些无关紧要的字句的手，以同样的字迹，也许还是用同一支笔，写出了伟大的杰作，写出了供我们学习研究，令我们赞叹不已的杰作。似乎只有伏尔泰一人有能耐，能用商谈购地交易的书信编出一本书，让它的每一页都叫您忍俊不禁，能够把抨击性文章的机智与吸引力注入交易合同和地契。而缘分则给如此诙谐风趣的买主配上了一位风趣诙谐不亚于他的卖主。布罗斯院长乃是上一世纪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以自己的许多学术著作赢得了声誉。[3]不过，我们认为，他最优秀

---

① 发表于《现代人》1836年第3期。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法语：《南半球大陆航行史》、《论语言的机械结构》、《七世纪罗马共和国史》、《论偶像崇拜》等等。——普希金原注

的作品乃是他于 1739 至 1740 年在意大利所写的一些信件，这些信件前不久得以重新出版，标名为《一百年前的意大利》。在这些充满友情的书信中，布罗斯显示出他那非凡的才华。具有真才实学，却从不带学究气，思想深邃，诙谐风趣，情景描写就好像漫不经心地信手涂抹，但却活泼生动，大胆新颖。这些使得他的书在同类著述中出类拔萃。

伏尔泰被逐出巴黎之后，又被迫逃离柏林，他来到日内瓦湖畔寻求栖身之地。荣耀并不能使他免遭担惊受怕之苦。他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他总是在为自己分散在许多人手上的资产而担忧，一个小小的市民共和国的庇护并不能使他完全振作起来。他打算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与自己的祖国妥协，并希望（他自己写道）一只脚站在王国，另一只脚站在共和国——以便见风使舵，随机应变。属于布罗斯院长名下的一块土地图尔勒（Tournoy）引起了伏尔泰的兴趣。他知道院长先生是个大而化之，随意挥霍的人，手里总是缺钱花，于是便写了下面这封信，开始了与布罗斯的谈判。

> 我不胜荣幸地拜读了您介绍澳大利亚的大作。不过，请允许我向您提一项关于土地的建议。您并不属于那种能使图尔勒给您带来收益的人。絮——您的承租人，他想撕毁自己的合同。您是否愿意让我以终身使用的形式购买您这块土地？我年老有病。我知道这笔交易对我不划算。但这笔交易能使您获益，能使我高兴——下面就是我考虑提请您裁夺的条件。
>
> 我承担用您那破烂不堪的城堡的材料修建一幢漂亮房子的义务。我想，这将花费 25000 利弗。另一半利弗我将用现金向您支付。
>
> 我用来装饰这块土地的一切：所有的牲畜，所有我用于

经营的农具，将来都属于您。如果我在房子还未建成之前死去，那么您手中将留下25000利弗。如果您愿意，您还可以把房子继续修完。不过，我要尽力再活上两年，那时，您将白白拥有一幢很像样的房子。

我保证最多不活过4年或5年。

作为这诚挚建议的补偿，我要求完全拥有您的动产和不动产，拥有各种权利，拥有森林、牲畜，甚至教堂神父，直到他将我埋葬的时候为止。如果这桩滑稽的买卖在您看来是合算的，那么只需您的一句话，它便可以正而八经地定下来。生命太短暂了，也就是说，事不宜迟。

又及，我把我那幢叫做“乐园”的陋舍装修了一下。我还装修了在洛桑的住宅。两处房产的价格都比先前翻了一番。对于您的这块土地，我亦将如法炮制。就它目前的状况，您永远也别想把它从手上卖出去。

无论成与不成，请您对此保密。谨此……

布罗斯很快就回了信。他的信就像伏尔泰的一样，充满了机智与风趣。他写道：

假如当初，当您在离城如此近的地方刚住下来的时候，我便成了您的邻居，[①]在与您一同欣赏您湖边自然美景的时候，我便能有幸在您耳边悄悄地说，居民们的伦理习惯要求您住在法国，这出于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应该住在自己家里，第二，不应该住在别人家里。您想像不到，这个共和国使我热爱君主政体已到了何等地步。……我会在当时就向您推荐我

① 伏尔泰于1755年买下了日内瓦郊区的“圣让乐园”。——普希金原注

的城堡，假如它配得上您的话。可是我的城堡甚至没有成为古迹名胜的荣幸。它不过是一堆破烂。您想要让它像门农一样地恢复青春，那我可是非常地赞赏您的这一建议。也许，您不知道，达尔让塔尔先生也有与您同样的打算。——我们还是来谈正事吧。

于是布罗斯把伏尔泰提出的条件一一作了分析，答应了一些条件，也拒绝了一些条件，显示出了他的机灵和精明，这大概是伏尔泰所不曾料到的。这件事刺激了伏尔泰的自尊心，他开始玩弄心计。通信变得更频繁了。12 月 15 日，这笔交易终于做成了。

这几封内容为双方讨价还价的谈判的信件，以及成交以后的几封书信，乃是伏尔泰与布罗斯书信集中最精彩的部分。两个人都互相卖弄，两个人都不时把生意上的事撂在一边，开些出人意料的玩笑，发表些对于当时的人和事的坦诚见解。在这些书信中，伏尔泰就是伏尔泰，即一个非常盛情的交谈者。而布罗斯则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作家，即那个用如此独特的手法描述了意大利的政体形式和风俗习惯，描述了它的艺术生活与淫荡色情的作家。

但是，这块土地的新主人与它的原主之间的和睦关系很快便终止了。就像许多别的纠纷一样，他们两人的敌对是由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造成的。由于一些树木被砍倒，暴躁的伏尔泰发了怒，他与院长先生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因为布罗斯在发火动怒方面丝毫不比伏尔泰逊色。应该看一看，伏尔泰的愤怒是什么样的！他把布罗斯看作了敌人，看作了弗雷隆[①]，看作了凶神恶煞。他打定

① 弗雷隆（1719—1776），法国反动批评家，伏尔泰的死敌。伏尔泰也常以恶毒的讽刺攻击他。

主意要叫他倒霉。“让他发抖去吧！”[1] 他狂怒地叫道：“现在不是要嘲笑他，而是要毁了他的名誉！”[2] 他抱怨，他哭泣，他唠唠叨叨……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200法郎。布罗斯从自己这方面来讲，也不愿向火爆的哲学家让步。他给这位著名的老人写了一封口气傲慢的信，以回答他的抱怨。他指责伏尔泰天生蛮横无礼，劝他在发狂的时候别动笔，以免冷静下来之后会感到脸红。他用尤维纳利斯的愿望作为了此信的结束语：

愿健全的身体内有健全的精神。[3]

有人出来干预了两邻里之间的纠纷。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普弗耶先生竭力要让伏尔泰感到愧疚，给他写了一封尖刻挖苦的信（这封信大概是由布罗斯本人口授的）。普弗耶先生写道：

> 您害怕成为一个被欺骗的人，可在两个角色当中，这还算是较好的一个呢……您从来没打过官司：打官司的花销可大了，哪怕我们就是打赢了也一样……您想一想拉封丹的牡蛎和《司卡潘的诡计》[4] 的第二场第五幕[5]吧。除了律师，您还得提防那些文学小人，这些人是会十分乐意地向您发起进攻的……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尤维纳利斯第10首讽刺诗中后来成为谚语的一句诗行：“须得祈祷，愿健全的身体内有健全的精神，愿有一颗坚强的心，它不知什么是死亡的恐惧。”

④ 《司卡潘的诡计》，莫里哀的喜剧。

⑤ 在这一幕中，皇德尔强迫司卡潘跪在地上承认自己的所有诡计。——普希金原注

伏尔泰第一个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作出了让步。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对固执的院长感到耿耿于怀，并成为了布罗斯未能进入法兰西学院（这在当时意义十分重大）的原因。另外，伏尔泰对自己比布罗斯活得长久而感到得意。布罗斯比伏尔泰小 15 岁，死于 1777 年，比伏尔泰早死一年。

尽管有关伏尔泰的资料很多（有整整一藏书室），但作为一个生意人，作为一个有产者和领主，他还是鲜为人知的。目前出版的这本书信集将透露许多人们不曾知道的事情。出版人在出版前言中写道：

应该看一看，这个欧洲的宠儿，这个可以直接与叶卡捷琳娜女皇和腓特烈二世交谈的人，为了在当地显示威风和排场，干了些多么没有意义的事情；应该看一看，他怎样身穿节日的盛装，在自己两个侄女（她们全身珠光宝气）的陪同下开进自己的领地；应该看一看，他怎样聆听神父的致辞，他的新臣民们又是如何从日内瓦共和国租来大炮，如何用大炮齐发来迎接他的大驾光临。他与当地神父总是不和。"加别尔"（盐税部门）则发现他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劲敌。他想当本省的银行家，于是便做起了盐投机生意。他有自己的臣属，他不断地把他们作为使者派往瑞士。这一切使他不得安宁，他怀着暴躁的激情为所有的事情费神操心。他不断地在各个领域滥用自己的才华：一会儿是律师的能言善辩，一会儿是检察长的吹毛求疵，一会儿是商人的狡诈，一会儿是诗人的夸张，一会儿又是热诚赞美的激情。他写给院长先生，谈及小酒馆里的斗殴的那封信，的确像在为卡拉斯家族辩护。

在这些信件中，我们发现了伏尔泰一首未曾公开过的诗。从这首诗里，亦能找到他那卓越才华的痕迹。这首诗是写给他的邻居的，因为他给伏尔泰送去了蔷薇。

> 您的蔷薇生长在我的花园，
> 它们很快就要开花吐艳。
> 舒适的幽居，我在此自在安闲！
> 我拒绝那些无谓的桂冠，
> 也许在巴黎我把它们过于爱恋。
> 长在它们身上的荆棘
> 已把我的双手刺得太惨。[①]

我们承认我们的审美趣味已经陈旧过时：在我们看来，较之许多法国现代长诗，这7行诗句中含有更多的文采，活力和思想。虽然那些法国长诗是按现代趣味写成的，但在这些诗中，蹩脚的表述取代了思想，隆萨的华丽词藻取代了伏尔泰语言的严明清晰，令人难受的单调取代了勃勃的生气，粗俗的厚颜无耻或萎靡的忧郁取代了机智俏皮。

总的说来，伏尔泰与布罗斯的书信集使我们从可爱的一面了解了《墨洛珀》和《老实人》的作者。而他的贪求，他的软弱，他那孩子般的暴躁——这一切都还不至于破坏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我们乐意去原谅他，并准备去探索研究他那颗炽烈、敏感和永不安宁的心。但是，当我们读到出版人在书信集的最后附加的几封信件时，心里却产生了另外一种感觉。这些新的信件是从拉图什的文件中找到的。此人（1752年）曾经是驻腓特烈二世宫廷

① 原文为法文。

的法国使臣。

这一时期，在伏尔泰与“北方的所罗门”[①]，即他从前的学生之间出现了不和。柏林科学院院长莫佩尔蒂与柯尼希教授发生了争执。国王站在院长一边，伏尔泰却袒护教授。这时，出现了一篇匿名文章，标题叫作《致公众的一封信》。文章指责了柯尼希，伤及伏尔泰。伏尔泰进行了反驳，将自己讽刺性的文章发表在德国各种刊物上。没过多久，《致公众的一封信》在柏林被翻印，扉页上印有皇冠、权杖和普鲁士双头鹰的图案。伏尔泰此时才恍然大悟，不慎之中他是与何人展开了辩论。因此，他开始打算明智地撤退。伏尔泰从国王的行为中看出了国王对他的冷漠，并预感到自己就要失宠。“我尽力不去相信这一点，”他在给巴黎的达尔让塔尔的信中写道：“但我害怕成为像那些不幸的丈夫一样的人，他们总是戴了绿帽子还竭力让自己相信妻子的忠贞。可怜的人们只能暗地里感受自己的不幸！”虽然他已经垂头丧气，但仍然没能控制住自己，再次刺伤了自己的对手们。他写了一篇最最恶毒的讽刺文章（阿卡吉阿博士的讽刺文章），并且用谎言骗取了国王本人的同意，使它得以出版。

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遵照腓特烈的命令，这篇讽刺文章被刑吏焚毁了。伏尔泰逃离了柏林，但却在法兰克福被普鲁士边防军扣押。被拘留了几天之后，他不得不供出了腓特烈所写的，印出只供少数人阅读的那些诗歌，其中就有反路易十五及其宫廷的讽刺长诗。

这段可悲的历史有损于哲学家的声誉。在极其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伏尔泰从不善于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虽然他年轻时期曾蹲过巴士底狱，遭到过放逐和迫害，但这些都未能引起人们对他

① 伏尔泰在自己的颂扬信中这样称腓特烈二世。——普希金原注

这位著名人物的同情和怜悯，而这样的同情和怜悯人们几乎从不拒绝给予那些受苦受难的天才。身为国王们的宠儿，欧洲的宠儿，自己时代的第一作家，现代观念与精神的领袖，伏尔泰到老也没能引起人们对他的尊敬。这是因为，盖在他白发上的桂冠已溅满了污水。迫害名人的诬陷之词在真理面前总会不攻自破，但违反常规的是，这样的诬陷之词从未在他口中消失过，因为它们总是被说得像真理一样。他不尊重自己，也不觉得有尊重别人的必要。是什么吸引他去柏林的？他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独立去换取国王那刚愎的宠幸，何况那国王并不是他的君主，没有任何权力迫使他就范。

值得我们赞赏的是，腓特烈虽然身为国王，却一反自己好嘲弄人的天性，并不对他那年事已高的老师进行贬损。他没有给这位法国第一诗人套上小丑的长袍，让他去受世人的讥笑，假若伏尔泰自己不招来这丢人的耻辱的话。

人们至今还以为：一种高尚的痛苦激发了伏尔泰，使他主动将高级御前侍从的钥匙和普鲁士双头鹰徽章还给了腓特烈。这些东西是他得宠的标记，尽管这宠幸并不长久。可是，现在我们才弄明白，这些东西原来是国王亲自要回去的。角色正好颠倒过来：腓特烈大发雷霆，伏尔泰则哭哭啼啼，苦苦哀求……

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天才也有自己的弱点，这些弱点使庸才感到宽慰，却使高尚的心灵感到悲哀，因为它看到了人性的不完美。作家的真正位置就在他的书斋里，最终，只有独立和自尊能够使我们超然于生活琐事之上，泰然面对命运的急风暴雨。

色雷斯哀歌[①]

维克多·捷普利亚科夫诗选，1836年。

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一个准备出访绚丽东方的年轻人登上了海船，但却并没有想到拜伦勋爵，也没有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命运和恰尔德·哈罗尔德的命运联想一番，那可就太奇怪了。如果这年轻人恰巧又是个诗人，而且他想要抒发自己的感情，他怎能避免不去摹仿别人呢？可以为此去责怪他吗？天才的出现并不取决于天才本人的意愿，因此，摹仿天才也就不是什么可耻的窃取——这只不过是智慧贫乏的表征罢了。但这是一种高尚的期望，期望凭着自己的力量，追随着天才的足迹，去发现新的世界。或者，这是一种在谦逊之中而更显高尚的情感，因为，这是想要学习和研究自己选择的典范，并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毫无疑问，在那条驶向色雷斯海岸的船上，恰尔德·哈罗尔德的影子一直伴随着捷普利亚科夫先生。

别了，别了，亲爱的故乡！[②]

---

① 发表于《现代人》1836年第3期。

② 原文为英文，引自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1章。

这句诗行的话别之声在捷普利亚科夫哀歌开篇的头几句诗行中回响：

> 我们去远航！……天色苍苍，故乡的海岸正退向远方，
> 在这蓝色的路途上翻腾流逝着一道金光灿灿的海浪；
> 别了，故土！别了，俄罗斯；
> 噢，别了，别了，我的故乡！

仅仅在这头几节诗句中，诗人便显示出了他独特的才华：

> 失去理智的狂人！你为何悲伤？在那分离的时刻
> 你在故乡的岸边吻了谁人的眼泪？
> 你听到谁人的祝福之言？
> 唯有往事像一个费解而晦涩的梦
> 在那一瞬间向你的心灵闪现，
> 它预示着你那被风暴劈成碎片的青春小船，
> 它预示着向风暴敞开怀抱的深渊！——
> 随它去吧！可我感到忧伤！就像悲哀的海浪
> 在郁闷的心中汩汩作响！
> 我的船何其疾速地奔向那遥远的异国他乡！
> 噢，漂泊者的诗琴，抵挡忧伤的神盾，
> 来吧，我朝思暮想的朋友！
> 让我的心儿随着琴弦的问候
> 随着每一个音符飞向你，我的故乡！

一

但愿你为我的青春
放上一顶荆冠——
噢，母亲！我心中并未忘记
你那始终如一的爱！
现在——心中的梦，请你们飞开！
别引诱我的心去思念家乡！
那里谁也不为我感到惋惜！
出现在天边吧，遥远的异国他乡！
灰白的海浪，别停息你的动荡！

二

我多么贪婪地敞开胸怀
畅快地呼吸这无垠的空旷！
蔚蓝的世界！在你的光华里
我的思想正在隐没，正在成为灰烬！
风帆，你呼啸吧，你喧哗吧！
默然消失吧，对故乡的幻想：
那里谁也不为我感到惋惜！
出现在天边吧，遥远的异国他乡！
灰白的海浪，别停息你的动荡！

三

我定能看见众神的国度；
我定能发现可以说明一切的尘土，
那一连串久远的年代
就会在我的面前发出喧嚣！
风儿，你吹呀，别停息！
别了，故乡的山崖！
那里谁也不为我感到惋惜！
出现在天边吧，遥远的异国他乡！
灰白的海浪，别停息你的动荡！

在这些诗里有和谐，有抒情，有真挚的情感！

不久，诗人驶近了那因奥维德被逐到此而得以闻名的海岸，海岸在他的前面，在碧浪的尽头隐约可见，

就像黄色的腰带曲折蜿蜒。

诗人用未经斟酌的诗句，凭吊奥维德那已经看不见形迹的陵墓：

纳佐的陵墓肃穆寂静
它名声高扬，如同胜利战车在远处的轰鸣！
噢，在这死寂的砂原之上
谁能向我指示他那光荣的坟茔？
谁能讲述他所经历的痛苦——

是草原的清风？是滔滔的海浪，
还是那暴风骤雨中时代的喧响？……
可是，请肃静……肃静……这是什么声音？
是谁的身影在那苍茫的深渊之上
举起双手将我召唤，
默默地晃动着他的头？
他的脚边摆放着荆冠（！）
他的头在阳光下光辉耀眼，
珍珠做的长衫比浪花更白，
话语比浪花的絮语更神秘。
在那虚无飘渺的手指的弹拨下，
金色的竖琴讲述着
古人和他们的灾难。
琴弦幽幽诉悲戚：
在琴声中心儿听到的是流亡；
琴声中响起了思乡的叹息，
好像失去希望的心灵在哭泣。

“陵墓的寂静，名声高扬，如同战车在远处的轰鸣；叹息就像心灵的哭泣；话语比浪花的絮语更神秘……”所有这些都写得不准确，不自然，或者说，简直没有任何意义。

格雷塞在自己的一篇书信体作品中写道：

当奥维德用他那消沉的诗歌
悲悲戚戚、索然无味地向我吟唱，
发了长声悠悠的诉怨，

我便不再把他欣赏。[1]

《哀歌》一书不应该受到如此严厉的指责。在我们看来，它高于奥维德的所有其他作品（除《变形记》以外）。《烈女志》，一些爱情哀歌，甚至长诗《爱的艺术》——在人们的臆想中，这部作品乃是他之所以被放逐的原因——都逊色于《本都哀歌》。在这后一首哀歌中，有着更多的真情，更多的质朴，更多的特色和更少的冷冰冰的机智。对异国他乡气候和土地的描写是多么清新明快！细节的描写中充满了多少勃勃的生机！谈到罗马的时候是何等的伤感！多么动人恻隐的诉怨！我们要感谢捷普利亚科夫先生，因为他并没有借一个可怜的被逐者来显示自己心胸的刚毅，以求得荣誉和名声，而是积极地为这个被逐者诉说他的不幸。

噢，漂泊者，你也把狱中的号哭
　　称作对受到贬抑的灵魂的慰抚？——
不，你毁于盲目命运的恶毒诅咒，
　　正独自走着一条长满荆棘的人生之路……

心灵的火焰不发出温暖，笑声中亦没有欢欣，
像我（奥维德）一样，你在人群中零丁孤苦，
　　只有你自己知道毫无乐趣的人生多么冷酷；
　　欲哭无泪，即使流泪也不能使人得到安慰！

假如捷普利亚科夫先生能更好地把握奥维德在哭泣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如此真实的性格，那么，诗人借纳佐阴影之口吟出的诗

① 原文为法文。

句将更为出色。他便不会说，在盖塔人和贝塞人前来奔袭的时候，诗人

欢欣地赶去参加决死的战斗。

奥维德坦白地承认，他从小就不喜欢战争，在迟暮之年，当一听到奔袭的消息就得把头盔戴在鬓发花白的头上，用颤抖的手去握剑拼杀，这对于他来说不啻是沉重而艰难的（见哀歌第 4 辑，第 1 首）。《托弥斯》这首哀歌是以绝妙的诗行结束的：

“这不是风暴吗，我的舵手？
汹涌的海浪已扑打着桅杆，
面对这狂暴而可怕的巨浪，
你的航船已俯首颤抖，
犹如不敢吱声的奴隶面对暴君的怒颜！”
……………………………………
……………………………………
……………………………………
“下令开枪吧！也许在这可怕的时刻
某艘远处的船只
会听到我们的呼救声！”——
一声枪响……四周依然渺无回应
只有大海在汹涌澎湃，
就像狂暴的老虎在扑腾；
只有风在呼啸，只有暴雨在怒号，
只有天上的雷鸣
在回答着惊惶不安的人群。

"我的舵手，你的脸多么苍白！"
——噢，漂泊者，不是只有你
才敢于在此时笑对这风暴？——
"你猜对了！……"我衷心希望
时时刻刻与这风暴融为一体；
参与大自然的斗争！……
噢，不，——再响亮一些，再有力一些！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圣召唤，
已故诗人的话语
此刻正回荡在我的心间！

不久，那绵延的海岸，那由七条支流汇成的多瑙河的入海口，从诗人的眼界中渐渐消失了。

这喧腾的伊斯特尔河[①] 多么衰老！他额头上的皱纹，
掩盖着无数苍老的世纪；
在那远古的烟雾中，大流士的小船隐约可见，悄无声息，
隐约闪现的，还有特罗扬军队的雄鹰徽记。
请告诉我，青玉之神，在你领地的上空，
越过高山和僻静之地，穿过天边的森林，
笼罩于蛮夷的浓云之中，向这永恒的罗马
可曾飞来无敌的萨图恩？——
莫非你将自己迅疾的奔跑
汇入了民众急风暴雨般的狂潮，
莫非你的领地已溶化在他们的鲜血里，

① 伊斯特尔河，多瑙河的古称。

无数部族在那里尸陈遍地？

　　你们可想知道，为着什么，向着何方，

　　从哪一个偏远的地方

　　奔出了他们暴风潮一般的队伍，

　　就如同冒着火焰的滚滚岩浆？

　　——你们去问吧，为什么向着花园，

　　向着茂密的柳林与草地

　　饥饿的蝗虫像乌云一般

　　顺风飞去白压压的一片：——

去问闪电吧，它向哪里飞奔，

旋转的飓风从何处发源，

　　咆哮的海浪为什么起伏动荡！

下面是对漂泊者们田园诗一般的描写，不过略微显得有些苍白。见到威尼斯式古堡废墟时的那段思考，具有这样一个缺陷，即很像《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 4 章的某些诗段，而这些诗段早就铭记在我们的脑海里了。不过，诗人的灵感很快又恢复了。

　　风儿平息了；比蓝天还明净的海面

　　犹如玻璃一般亮光闪闪；

我们的风帆悬在空中，就像天鹅的翅膀，

被猎人用子弹射穿，正瑟瑟发颤。

　　是什么在轰鸣？……就像震耳欲聋的雷声，

　　响彻在寂静的海上：

　　那是从俄罗斯的瓦尔纳

　　传来了黎明的炮声！

　　噢，多么欢欣！明天我们就要看到

预言家的崇拜者们的国度；
奢华富饶的东方大地，
在你永远蔚蓝的苍穹下
我们将敞开胸怀呼吸你的气息！
在黑森森的香桃木花园里，
听着大理石喷泉那徐缓的潺潺水声
在你那月亮的迷人的银光下，
噢，年轻的女奴，
在你对家乡的鲜花的亲吻中，
我们闻到了东方玫瑰鲜活的气息
还感到了它们春天的热情与清新！……

在我们看来，《格别金的废墟》乃是这些哀歌中最为优秀的一首。在这首哀歌中，显露出卓越的描写技巧、清晰的表述能力和深刻有力的思想。利用得到的允许，我们将从这首哀歌中多抄录一些片断。

圆柱，低垂着苍白的头，
在那凄凉的死亡身边他们仍在坚守，
它们颓然立在坍塌的圆柱间——
处处有忧郁的代达洛斯在我眼前闪现！
……………………………………………
……………………………………………
……………………………………………
死寂的花岗石大军！
你们可就是那些圆柱的卫兵？
在那些圆柱上面

希佛的儿子们用巧手创造了
　　原始时期艺术与知识的奇景……
　　怎能知道，就是在这里，
　　在古代，也许，那正是创造的春天，
人类熙攘嘈杂忙个不停——
　　在那个时代，少年的头
　　能触到我们的塔顶，
　　凶猛强壮的猎人敢于向猛犸象挑战，
同它进行势均力敌的搏击！
也许，曾几何时，就在这片荒漠上
令人迷醉的奢侈豪华如魔水浩浩荡荡，
松木宫殿门前耸立着高高的柱廊，
四周空中花园发出沁人的芬芳，
大门口簇拥着各种怪兽的青铜塑像，
花岗石大象的背脊
撑顶着绘有金色壁画的大理石拱廊！
　　就在这里，如林的高塔，
　　在沧桑巨变来临之前，
　　也许曾刺破青天，
山间小溪的浪花，在棕榈树丛中穿流蜿蜒，
从青铜河马的口中向外珠光闪闪地喷溅！
　　也许，就在这里，巨大的碧玉神像
被和平的鲜花装饰了它们的头顶，
　　它们用钻石的眼睛，
愉快地望着血淋淋的牺牲供品……
是的，是的！就连卑微人类的残羹
也被浩渺天穹上的星辰照亮，——

高傲的智慧在成群地翱翔，
爱情的花朵在尽情地开放……可到终了——
在漂泊者忧郁的眼里
处处是尘埃，处处是死亡！

只有你，阿尔米塔，
在这片古老的坟茔上，
自然之母，唯有你
充满魔力的精灵！
你用多么神奇的美与奢华
把这座无名的废墟之城
到处装点得美丽如画！

看啊，这根圆柱，这冷漠的庞然大物，
就像田野上熟透的穗儿
向大地垂下了它苍老的头颅；
但是，它那未被岁月撼动的邻居，
头顶上已开满了鲜花
正通过一根娇嫩的藤蔓与它连在一起；
它那苍老的头上
蜿蜒垂挂着一绺青翠的卷须，
丝绸般光亮柔嫩的藤叶交织成披风
林中的风儿在上面轻轻拂动！
这是另一根圆柱：像一具无头僵尸
它坍倒在茂密而杂乱的草坪上；
沿着废墟黑魆魆的裂痕
蜿蜒着香桃木的枝蔓，嬉戏着新发出的常春藤，

那庞然大物布满青苔的根部

成了春天里的花篮!

在那庞然大物倒下的地方

一棵年轻的白杨赏心悦目,

万籁俱寂……只有夜莺在鸣啭,

它站在茂密的树枝上吟唱出热情的絮语,

就像我的心——一会儿充满绝望的痛苦,

一会儿充满美妙的欣喜……

在晚霞的金辉映照下,

在古老的圆柱之间,野草、鲜花

和断壁残垣一片杂乱,

蜥蜴家族的成员躲开漂泊者仓惶逃窜,

在爬满绿色藤蔓的石头间窸窸窣窣,

就像是远处的灌木丛在絮叨寒暄!……

久远年代的坟茔,

古老的象形文字!

请问,你们与我的心

为什么会产生共鸣?——

不!你们并不是毫无价值的死文字:

你们的残骸——是后人视功名如性命的教训;

令人骄傲的桂冠岂比这散落的花瓣更有生命?

噢,给我吧,给我

我要用这断壁残垣上的枝叶做花冠!

神圣远古的遗迹,

当我默默地高临于你的身躯

展开幻想的翅膀——

世纪更替着世纪，
就像一波波的海浪展现在我的眼界里！
与这些远古的庞然大物在一起
我好像来到亲人的怀抱里，
我听见飘渺彼岸的召唤，
我听见幸福安乐的召唤！……

夜幕降临，我的心
如同在这些石头上钉紧，
永恒的天宇已笼罩上
蓝宝石一般的幽暗，
在蓝色太空的大海上，
夜之女神巡游而过，
犹如神秘世界里的一只小船，
透过树木的阴影，
她将自己乳白色的目光
投向那些奇异的庞然大物。
夜女神上空的星星像一颗颗红宝石
在古老的圆柱之间时隐时现；
仿佛有一群古代的孩子，
移动着圆柱，从地底下钻出，
他们翱翔在数千年的黑暗中
认出了自己荒凉死寂的城池。

飞禽走兽夜间的栖身之所，
悠远往昔的镜子。
你那毫无意义的残块碎片

足够用来建造我们所有的城池！
噢，阿尔纳斯卡尔们！
走近这些高傲建筑的废墟，
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梦想吧，
向他们坦白：地上众神的功名心
对什么关切、对什么操心？
烦人的芸芸众生，
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
你说得对，神妙的歌手：
沧桑变迁只不过是轮回往返！
最初——是自由的诱惑，
最终——却套上了荣耀这带铃的辔鞍
获得荣耀之后——穷奢极侈
富裕总是套着黄金的桎梏。
而后——是美丽的罪恶，
最后是暗中的野蛮行径！……

这简直太妙了！最后几行诗的表现力是惊人的！

其他几首哀歌（其中以第六首最为出色）既有缺点，也有其美妙之处，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了：表现力常常转化为过分的铺张，清晰的描写时而被一些不准确的用词弄得含混费解。——总的来说，《色雷斯哀歌》的主要优点在于辉煌华丽，富于表现力；主要缺点则是浮华、单调。

《色雷斯哀歌》后面还附加了一些小诗。这些小诗亦有无可争议的价值：充满和谐，富有思想，有些地方亦有真挚的情感。即使捷普利亚科夫先生除了哀歌《孤独》和四行诗《爱与恨》以外什么也没有写，那么，仅此他也能在我们的诗人当中占据那荣耀

的位置。我们在此抄录一首诗歌作为这篇评论的结束，该诗在捷普利亚科夫先生《色雷斯哀歌》一书中乃是最后一首。

孤独

一

林中的秋风呻吟颤动；
咆哮的巨浪在阴暗的大海上澎湃汹涌；
巨大的雨点在我的窗上凄凉地敲击；——
沉重的凝思将我的幻想激起。

二

我多么忧伤！我的壁炉已燃尽不再啪啪作响；
只剩最后一丝红色的闪光在木炭上摇晃；
我多么忧伤！朦胧的白昼已在我上空昏暗；
雾蒙蒙的夜色正从黑暗的天穹向下溢淌。

三

夜色的降临对于人圈里的一对恋人是多么甜蜜，
在那里，老奶奶正把小孙子们抚摸爱昵；
美丽的姑娘坐在爷爷的圈椅旁——
一面听着古老的故事，一面做着手中的活计！

四

多么恼人的幻想！为什么在你眼前
恋人们长久的亲吻燃得正旺？
就算他们的心儿在夜幕下贪婪的爱抚中
在灼人的温存里燃成了灰烬，那又怎样！

五

此时此刻我孤寂的头脑中翻江倒海！
凄苦的心儿涨满了鲜血就要裂开，
我的灵魂乘着痛苦思索的旋风，
在他们令人嫉羡得发狂的命运之上盘旋徘徊！

六

纵使上帝没有为我创造一个僻静的角落，
由黑森森的橡树林遮蔽隐没，
可爱的女友，红光闪闪的小火炉，
在刮起深秋的暴风雪时有朋友们围坐，——

七

噢，在我心中燃起吧，对神祈祷的激情！
火焰般的信仰之光，请照亮我荒漠般的心灵；
拯救灵魂的橄榄圣油，快流入我的胸膛；

让昨日的梦别再折磨今日的心！

八

让我那充满超凡脱俗希望的心灵，
同整个天宇的魂灵融为一体；
让这幽暗的山谷从我眼前消失；
让秋风去狂呼怒号，却不把我的窗户敲击。

九

噢，让我的灵魂飞到繁星之上，
飞向那造物主的目光将星辰点燃的地方！
让我用贪婪的耳朵，在高于太阳的天穹上，
振奋地聆听天使们管风琴的歌唱……

十

让我看见他们，在神圣的缄默中，
在永恒的宝座前，那屈膝下跪的一对；
我要读出那宝座上燃烧着的神秘字符，
它们早已被造物主那对头生子解开……

十一

让所罗门的智慧之星
在万里无云的天空把我的心儿照亮；

那时，也许我就会消除凡尘的忧伤，
不再把尘世的朋友思念怀想！……

波查尔斯基公爵及米宁公民纪念碑注[①]

“米宁公民”这一题词当然不尽如人意：他在我们眼里，要么是绰号为苏霍鲁基的市民科斯玛·米宁；要么是杜马贵族科斯玛·米宁·苏霍鲁基；再不然，还有最后一个称谓，那就是“库兹玛·米宁，由全莫斯科国家推选的人”，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在有关选举的手谕中就是这么称呼他的。了解这些就如同了解波查尔斯基公爵的名及父名一样，是理所当然的。顺便说说，前不久，有一篇历史论文讲到：米宁获得了贵族和大贵族头衔，但傲慢的达官显贵们并未允许他进入杜马，而且强迫他于1617年去了下诺夫哥罗德——多么荒唐！米宁从未成为大贵族，他是作为杜马贵族参加杜马会议的，这样的杜马贵族在1616年只有两个，即他与加弗里罗·普希金。他们每人的俸禄为300卢布。关于米宁的去世年代，在任何地方都未找到记载。有人推断，说米宁死于下诺夫哥罗德，因为他葬在那里。最后提到他的名字的，是1616年宫廷官吏名册。

出版者

① 写于1836年8月至9月，原定作为M·波戈金《莫斯科游览》一文的注释，该文本应在《现代人》杂志1836年第3期上发表，但它却显然未能通过书报检查。该文最终于1922年问世。马尔托斯（1818年）设计的纪念碑上刻有题词：“献给米宁公民和波查尔斯基公爵”（纪念碑位于红场）。

В. Л. П. 旅行记[1]

И. И. 巴黎、伦敦旅行记，于旅行前三天起开始记录。共分三部分。莫斯科，普拉东·别克托夫印刷厂印刷。1808 年。16 开本。图片上为 В·Л·普希金和塔利娜。

这本书从未出售过。作者曾将其中的若干本分别赠送给自己的友人，我也有幸得到了一本（几乎是最后的一本）。我把它作为纪念品保存着，因为它意味着作者对我的青睐与赏识，而这对于我是非常珍贵的……

《旅行记》乃是作者为了取笑自己的朋友而创作的一部不含恶意的幽默作品。已故的 В·Л·普希金曾经去过巴黎，他那孩子般天真烂漫的狂喜与兴奋为创作这篇小型长诗提供了素材。这篇长诗非常准确地塑造了瓦西里·利沃维奇的完整形象，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幽默作品：轻松戏谑，生动活泼，并且没有恶意。

在那些喜欢卡图卢斯、格雷塞和伏尔泰的人看来，在那些不仅喜欢诗歌的抒情和哀歌的伤感，不仅喜欢它的气势恢宏的戏剧性和史诗性，而且喜欢它的轻松活泼、戏谑诙谐和俏皮机智的人看来，诗人的真诚乃是最为可贵的。我们乐于看到诗人那富于生

① 该文写于 1836 年。《В. Л. П. 旅行记》是 И·И·德米特里耶夫的幽默诗。

气、富于创造性的心灵的各种状态与变化：或忧伤，或喜悦；既有激情的宣泄和张扬，也有情感的平静与和悦；既有尤维纳利斯的愤怒，也有对乏味邻居的小小的懊恼。

我崇仰《浮士德》这样的作品，但也喜欢讽刺短诗。

实在抱歉，假如可能的话，我会把我们对拜伦勋爵的所有摹仿之作奉献给大家，而不是以下这首既不深沉，又无激情的诗。在这首诗中，作者让自己的主人翁向朋友们喊道：

> 朋友们，姐妹们，我到了巴黎！
> 我开始生活了，而不仅仅是呼吸！……

有些人除了承认充满激情和词藻华丽的诗以外，概不承认别的诗；有些人甚至认为贺拉斯的作品也无诗意可寻（平静，沉稳，理智？是这样吧？）。就算是这样吧，但假若连我们杰尔查文也要摹仿的优美颂诗都没有了的话，岂不是令人遗憾么？

约翰·坦纳[1]

一个时期以来，北美合众国引起了欧洲一些大思想家的注意。原因并不是什么政治事件，美国正泰然自若地干着自己的事，至今太平繁荣。它强大，因为它依靠地理位置巩固了和平；它骄傲，因为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是，前不久，几位大思想家开始研究起美国的习俗和制度，他们的观察把那些人们认为早已解决了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人们对这个新民族及其准则法规的尊敬大大地动摇了，人们对于它现代教育的成就的尊敬大大地动摇了。人们在它的民主中惊异地看到了它那令人憎恶的厚颜无耻，看到了它的极端的偏见和它那令人不堪忍受的残酷暴虐。一切高尚的、无私的，一切净化人类灵魂的东西，都被无情的自私自利和对享乐(comfort)的追求所压抑；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无耻的压榨者；文明自由中混杂着黑奴制度；对无贵族血统的人进行排挤；选民们贪婪妒忌，掌权者们则畏葸胆怯、奴颜婢膝。为了对平等表示尊重，天才不得不自愿受放逐；富豪穿着破衣烂衫，以免在大街上辱没了他们暗中鄙视的傲慢贫民。这便是不久前展现在我们眼

① 发表于《现代人》1836 年第 3 期，写于 1836 年夏。普希金的这篇文章乃是对约翰·坦纳 1830 年在纽约发表的《札记》的简述。文章中的译文是普希金根据 1835 年巴黎出版的法文版《札记》翻译的。

前的美利坚合众国。

印地安人在很早以前曾是这块现在被欧洲移民占领的土地的主人。合众国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受到新观察家们的审视。美国国会明显的不公正，他们的诽谤和不人道，遭到了人们愤怒的抨击。无论怎样，无论是用剑与火还是用罗姆酒与诽谤，或者用更为人道一些的方式，野蛮终应随着文明的临近而消失，这是不可逃避的规律。美国残存的原始居民将很快绝迹；广袤的草原和望不到尽头的河川，这印第安人赖以用箭与网为自己谋取生路的地方，将变作村庄星罗棋布的耕地，将变作轮船冒烟、美国国旗迎风招展的商港。

根据著名小说家们的描述，我们了解了北美野蛮人的习俗。而夏多布里昂和库柏却是从诗人的角度向我们介绍印第安人的，他们用自己的想像粉饰了现实。欧文·华盛顿写道："小说中描绘的野蛮人相似于真实的野蛮人，就如同田园诗中的牧人相似于日常生活中的牧人。"对于这一点，读者也产生了怀疑。由于人们对作者们令人着迷的叙述产生了不信任，那些艳丽的作品所能带来的乐趣亦随之减弱。

前不久，纽约出版了《约翰·坦纳札记》。约翰·坦纳在北美的荒原上与野蛮的土著居民们共同生活了 30 年。这本《札记》无论从哪个方面去看，都是极为珍贵的。它是最完整的，也许是最新的关于那行将绝迹的民族的文献。作为一部没有自己文字的部族的编年史，它放射出真理的光芒，照亮了被某些哲学家称之为人类自然状态的历史。这些朴实而客观的描述最终会让全世界看到：19 世纪，美利坚合众国在扩张自己的统治与基督教文明时，都采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手段。这本《札记》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约翰·坦纳还活着，许多名人（其中包括托克维尔，名著《美国的民主》的作者）都见过他，并从他本人手上购买过他的书。据

他们看来，书中不可能存在虚假和伪造。为了确信这一点，我们值得将此书读上几段。没有任何艺术加工，叙述朴实无华，这些都保障了它的真实性。

约翰·坦纳的父亲是弗吉尼亚人，曾当过神甫。丧妻之后，他迁居到辛辛那提附近的一个叫做埃利克-合恩的地方。

埃利克-合恩经常受到印第安人的袭击。约翰·坦纳的叔父与邻居们商量了一个对策，于一天夜里摸到印第安人的驻地，开枪打死了一个印第安人。其余的印第安人跳进河里，游水而逃……

一天早上，坦纳的父亲要到很远的一个村落去，临走时，他吩咐两个女儿，让她们打发小约翰去上学。可当她俩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午饭过后了。当时，天正下着雨，约翰便呆在家里没去学校。晚上父亲回到家中，得知儿子没去上学，便命他自己去采来芦苇，然后把他狠狠地抽了一顿。从此以后，小坦纳便对这个家产生了厌恶之情，他经常想的和经常说的便是："我可真想去投奔野蛮人！"约翰·坦纳写道：

我的父亲离开埃利克-合恩到大迈阿密河口去，要在那里安置新居。我们在当地的河岸上找到了一块耕地和几间破茅屋，这是过去的住户逃离时扔下的，因为他们害怕野蛮人的袭击。我父亲把那几间茅屋修理好，用栅栏把它们围了起来。当时正是春天。他开始耕种庄稼。大概在我们迁到此地的第十天上，父亲对我们说，他的马很不安静，大概它们感觉到印第安人正在丛林里四处搜寻，已经越走越近。"约翰，"他又对我说了一句："你今天就呆在家里吧。"然后，他就同自己的黑奴和我哥哥一道到地里播种去了。

我们四个小孩子都留在家里。为了更加稳当地将我留住，后娘让我照看未满周岁的小弟弟。我很快就厌倦了，为了让

他哭叫，我开始掐他。后娘叫我抱着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照吩咐去做了，但却仍然不停地掐他。终于，她开始给他喂奶了。我一溜烟跑到院子里，悄悄溜出篱笆门，径直往地里跑去。离我家不远的地头上生长着一棵胡桃树，我常在树下跑来跑去地捡去年掉下的胡桃。我小心翼翼地摸到树下，为的是不让父亲和他的伙计们看见……这时，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父亲手持短枪，站在地里警戒。我藏在树后，心想："我倒是真想看见印第安人哩！"

就在我的草帽快要被胡桃装满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一阵沙沙声。我回头一看：是印第安人！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人抓住我，拖起我就走。其中一人把胡桃从帽子里倒掉，把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这以后的事情我便什么也记不得了。我大概是昏了过去，因为我没有喊叫。终于，我在一棵高大的树下醒了过来。老头不见了。我被那个年轻人和另一个宽肩矮个儿的印第安人夹在中间。大概我有什么地方使他生了气，因为他把我抱到一边，抓起自己的"战斧"（一根粗棍棒），示意我朝上看。我明白了，他是叫我最后一次再看看天，因为他已打算把我杀掉。我从命了，但那个绑架我的年轻人却拦住了朝我头上飞来的一击。两人激动地争吵起来。我的保护人喊了一声。好几个声音回答了他。老头和另外四个印第安人匆匆地赶来了。老头看上去非常严厉地对那个用死来威胁着我的印第安人讲了些什么。然后，他与那个年轻人一人抓起我的一只手，又拖着我上了路。这时，那个可怕的印第安人走在我们身后。我耽误了他们的撤退，看得出来，他们害怕被人追上。

在离我家1英里的河岸边，他们在灌木丛中藏了一只用树皮做的独木舟。他们7个人再加上我，乘上独木舟，划到

了河对岸，在紧靠大迈阿密河口的地方停了下来。树林子里藏着毯子（皮子的）和食品。他们给了我一些野兽的肉和熊油。但我吃不来这些东西。从这里还能看见我的家。他们望着我家的房子，然后冲我笑起来。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吃完饭，他们沿岸上行，仍像先前一样拖着我。他们脱掉了我的矮靿皮鞋，认为它妨碍我奔跑。尽管他们看着我，可我仍没有失去逃离他们的信心。我用心地记住了所有标志，以便根据这些标志逃回去。我还用双脚蹚倒高草、踢陷松软的泥土，想要留下痕迹。我希望在他们睡觉的时候逃跑。夜晚来临了。老头和那个年轻的印第安人同我盖一条毯子，把我紧紧地夹在中间。我累极了，顿时就睡着了。第二天，我一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黎明时分，印第安人都起来了，并已作好了出发的准备。我们就这样走了4天。他们给我吃得很少；我仍然期望着逃跑，可一到晚上，我就完全被瞌睡控制了。我的腿肿了起来，到处扎满了刺头，伤痕累累。老头帮我随便弄了一下，又给了我一双“软皮鞋”（一种皮草鞋），这使我稍微好受了些。

我一直走在老头和年轻的印第安人中间。他们时常驱赶着我，让我跑得差不多要摔倒在地。有几天，我几乎什么也没吃。我们遇到了一条很宽的大河，它流入迈阿密河（我这么想）。这条河很深，我根本无法趟过去。老头把我举在肩上扛到了河对岸。水齐到了他的腋窝，我发现我一个人根本不可能趟过这条河，于是便完全失去了在短期内逃走的信心。我飞快地爬到岸上，在林子里乱窜起来，惊飞了巢里的野鸟。巢中装满了鸟蛋，我把蛋拾起来，用手巾包着，回到了河边。印第安人看见我和我手中的猎物都笑了起来。他们架起木柴，点着了火，用一口小锅煮起鸟蛋来。我饿坏了，眼巴巴地盯着

他们煮鸟蛋。突然，老头跑了过来，他一把抓起锅，连水带蛋全浇在了火上。他在年轻人耳边很快地嘀咕了几句。印第安人赶忙捡起鸟蛋，全都跑到林子里藏了起来，其中两人拽着我飞快地奔跑，我想这是有人在追赶我们。后来才知道，我果然没有猜错，大概，河对岸有人正在寻找我的踪迹……

这之后又过了两三天，我们遇到了一帮印第安人，他们大约有二三十人，正朝欧洲人居住的地方走去。老头同他们交谈了好一阵。得知白人正追赶我们（这是后来他们告诉我的），他们便去迎击白人。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双方都死了好些人。

穿越丛林的征途是艰难而烦闷的，10天后我们来到了迈阿密河边。印第安人在林子里散开，一面察看树木，一面互相呼喊着。他们选中了一棵胡桃树，将它砍倒，剥下树皮，用它们缝制了一只独木舟。我们全都坐上了这只独木舟，然后顺流而下，来到一个紧靠印第安人村落的岸边。这个村子很大，建在另一条河的河口处。居民们跑出来迎接我们。一个年轻女人叫着向我扑来，一个劲地打我的脑袋。看起来，居民中的许多人都想打死我，但老头和年轻的印第安人劝说他们把我留了下来。看得出，我常常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可我不懂他们的语言。老头知道几个英语单词。有时候，他叫我去打水，架柴生火，或者干些别的诸如此类的事情。就这样，他要我干起了各种各样的杂活。

我们出发到更远的地方去。在离印第安人村落一段距离的地方，有一个美国人的事务所。在事务所里，几个商人同我谈了很久。他们想把我赎出去，可老头不答应。他们向我解释说，我将充当老头不久前死去的儿子。我们在事务所停留的时候，他们对我很好，给我吃得也挺不错。当我们分手

的时候，我大哭大叫起来——这还是自我被从父母家中绑架以来的第一次。商人们安慰我，许诺说，过10天就将我赎出去。

独木舟终于载着可怜的小约翰，来到绑架者们的居住地，在岸边停了下来。一个老太婆从木棚子里跑出来迎接了他们。老头对她说了几句话，她叫了起来，张开双臂把小俘虏搂进怀中，然后把他拽进了窝棚。

绑架约翰·坦纳的人名叫马尼托-奥-盖季克。他的小儿子在本文所描述的事件发生的前不久死掉了。他妻子声称，若不给她找个儿子，她就不想活了。也就是说，她想要一个小俘虏，将他收为养子。只因为了满足老太婆的这个愿望，老马尼托-奥-盖季克和自己的儿子基什卡乌-科，伙同住在古隆湖边的两个同族人便立即上了路。老头的亲戚中有三个年轻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七个人来到坐落在俄伊俄河沿岸的居民区。在绑架的前一天夜里，印第安人渡过河，在坦纳家的附近隐蔽了起来。年轻人都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小孩子的出现，曾有好几次准备朝伙计们开枪，但老头强行制止了他们。

带着俘虏顺利地回到家里，老马尼托-奥-盖季克在第二天便把亲朋好友们召集在一起，约翰·坦纳便在那个小野蛮人的坟头上被庄严而郑重地收为别人的养子。

当时正是春天。所有的印第安人都离开自己的驻地，外出捕猎野兽。他们选中一块合适的地方，就用绿树枝和小树做成的栅栏把它围起来，以便能从这些栅栏的缝隙之间开枪射击。约翰的任务是要折断那些干树枝，并把猎人将要隐蔽的这一面的树叶揪掉。小俘虏被炎热和劳苦弄得疲惫不堪，加上肚子总是饿着，心里一直很悲哀，因此干起活来便懒洋洋的。一次老头撞见他在睡

觉，便用“战斧”朝小男孩的头部击去，然后将失去知觉的孩子扔在灌木丛里。回到营寨，老头对妻子说：“老太婆！我给你带回来的那个小子干什么都不中用，我把他打死了。你可以去那边找到他。”老太婆和女儿赶去找到了坦纳，发现他还活着，便把他唤醒过来。

小养子的生活非常凄惨。他被迫去干那些他承受不了的重活。老头和他的儿子们经常打这可怜的孩子。他们几乎什么吃的也不给他；夜里，他总是睡在房门与火炉之间，无论哪一个进进出出，总要用脚踢他。老头讨厌他，对他非常残暴。坦纳永远也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一次马尼托-奥-盖季克刚出家门，突然又折了回来。他一把抓起了小男孩的头发，把他拖到门后，像按猫似的把他的脸按在粪堆里。“就像所有的印第安人一样，”坦纳札记的美国出版人说道：“坦纳也有隐藏自己感情的习惯。但当他向我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眼睛里射出的光芒和他上唇痉挛的颤抖却说明：渴望复仇——这是那些他在他们当中度过了自己一生的人们的特性——亦成了他的禀性。30年过去了，他依旧盼着洗雪自己在12岁那年蒙受的耻辱！”

冬天，人们开始作征战前的准备。马尼托-奥-盖季克在出发的时候对坦纳说：“我要去杀你的父亲、兄弟和所有的亲人……”过了几天，他回来了，把一顶白色的旧草帽拿给约翰看。约翰立即认出这是他兄弟的草帽。老头使约翰相信：老头的确说到做到，亲人们全都不在人世了。

时光流逝，约翰开始习惯了自己的命运。虽然马尼托-奥-盖季克对他仍然很厉害，但老太婆却真心喜欢他，尽量减轻他的不幸。过了两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为了替代自己失去的儿子，涅特-诺-库阿买下了约翰·坦纳。涅特-诺-库阿是绑架约翰·坦纳

的印第安老头的亲戚，是奥塔瓦沃夫部落的女头领。她只用了一桶酒和几磅烟草就把约翰·坦纳给换去了。

第二次被收为养子后，坦纳发现自己的新母亲是一个温柔善良的保护人。于是他真心诚意地归顺了她，很快抛弃了自己儿时因受教育而养成的习惯，成了一个真正的印第安人——直到现在，当命运将约翰·坦纳再次带回他小时候脱离了的社会时，他依然保留了那些收养他的野蛮人的外貌、性格和偏见。

坦纳的《札记》向人们展现了一幅生动而悲惨的画面。这些札记有点千篇一律，有点像梦幻一样杂乱无章，缺少思想性，让人难于理解美国野蛮人的生活。这是一个冗长的故事，它讲述了被射中的野兽和暴风雪，它讲述了饥饿的远征和路上冻死的猎人，它讲述了牲口般的狂饮与争执、仇恨，它讲述了艰难困苦的生活和文明之子难以理解的贫困。

美国的野蛮人一般都以捕猎为生。欧洲文明将他们挤出世世代代赖以繁衍生息的蛮荒之地，赠给了他们火药与子弹，这个文明的良好作用也就仅限于此了。技巧高超的射手被他们视作了不起的人物。坦纳讲述了他狩猎的头一次经历，正是在这个领域里，他后来成了一名佼佼者。

> 我有生以来还没有打过枪。我母亲（涅特-诺-库阿）刚买了一小桶火药。由于她的迁就，我来了劲头，便向她要枪到林子里去打鸽子。我母亲答应了，说道："你也到了作猎人的时候了。"他们给了我一支填上了火药的短枪，并对我说，如果我能打到一只鸟，他们就发给我一支枪并教我打猎。
>
> 那时，我正处在发育阶段，曾有好几次陷入难堪的境地；但想取得成功的渴望在我心中还从未如此强烈过。我刚走出营寨，就看见近处有几只鸽子。我扳起扳机，几乎把枪举到

了鼻子底下。瞄准后我便开了一枪。这时我听到了飕飕的响声，就像扔石头的声音一样。短枪从我头上飞了过去，鸽子则落在了它刚才停过的那棵树下。

我也顾不上多处被擦伤的脸，拎起打下来的鸽子就跑回了营寨。他们为我察看了伤口，给了我一支枪，还给了我火药和霰弹，答应让我打鸟。从此以后，人们便敬重起我来。

此后不久，年轻的狩猎者因一次新的功绩而大出风头。

野兽越来越少，我们的人（一帮带着妻儿老小的猎人）都在挨饿。头领提议，让我们把营寨迁到别的地方去。在临行的前一天晚上，我母亲久久地讲述着我们的不幸，讲述着那降临在我们头上的可怕的贫困。我睡下了，可她的歌声和祈祷声惊醒了我。老太婆高声地祈祷了大半夜。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叫醒了我们，要我们穿上鞋，作好出发前的准备。然后，她把她的儿子瓦-梅-贡-耶-比尤叫到跟前，对他说："我的儿子，昨天夜里我祈求了大神。他向我现出了人形并对我说：涅特-诺-库啊！明天有一只熊将会成为你们的午餐。你们会在路上（在这个方向）遇到一个圆形的谷地，谷地里有一条小路，熊就在那条小路上。"

可这年轻人并不总是把母亲的话当回事儿，他走出茅屋，把她做的那个梦讲给其他的印第安人听。他笑着说："老太婆要我相信我们今天会吃到熊肉，可我不知道，到底谁会去把它打死。"涅托-诺-库阿为此将他责骂了一遍，但却没能说服他去打熊。

我们上路了。男人们走在前面，背着我们的家什。到达目的地后，他们便出去打猎了。

孩子们留下卸行李，等着女人们到来。我当时也在那里，随身带着自己的火枪。我一直想着老太婆说的话，决定去寻找她梦见的那个山谷。我往枪膛里装上子弹，没对任何人说一句话，就折了回去。

我来到一处大概在某个时候曾经是水塘的地方，看见林子中央有一块圆形的小空地。我想：这准是老太婆讲的那个谷地。我很快就找到了一条小路，它大概是一条干枯了的小溪。一切都被深深的积雪覆盖着。

母亲还说过，她在梦中看见，熊呆的地方正在冒烟。我肯定我找到的就是她说的那个谷地，便长时间地等待着烟雾的出现。可是烟雾却一直没有出现。我对这无指望地等待不耐烦了，便在大概是小路经过的地方走了几步。

突然，我陷进了齐腰深的积雪中。

我赶忙爬了出来，又走了几步，忽然想起了印第安人所讲的熊的故事，我头脑里闪出一个念头：说不定我陷下去的那个地方正好是个熊窝。我转身回去，在凹坑的深处看见了一个熊脑袋；我把枪口对准熊头，朝两眼中间的部位放了一枪。烟雾很快就散开了，我抓起一根棍子，用棍端向熊的眼睛和伤口连戳了好几下，随后，我断定熊已被打死，便将它从洞穴里往外拖。可我拖不动，便寻着自己的脚印返回了营寨。

我走进母亲的窝棚。老太婆对我说："我的儿子，到锅里拿块海狸肉吃吧，那是人家今天给我的。对了，给哥哥留半块，他出去打猎还没回来，他今天什么东西都还没吃呢……"我吃了自己的那一块，看见只有老太婆一个人，就走到她跟前，在她耳边说道："母亲！我打死了一只熊！""你说什么？""我打死了熊。""它真的死了吗？""真的死了。"她一

动不动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温存地将我搂在怀里，长时间地抚摸着我。大家都跑去抬那只被打死了的熊。由于这还是头一回，人们便按照印第安人的习俗，把熊整个地烤熟了。所有的猎人都被请来与我们一同吃熊肉。

在约翰·坦纳的《札记》中，追捕野兽的历险故事和对各种狩猎场面的描述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单是打熊的故事就可构成一部长篇小说。他对于“姆兹”——一种美洲鹿（cervus alces）——的描述，甚至值得自然科学家们去进行研究。

印第安人相信，姆兹有长时间呆在水下的本领。我有两个熟人，他们从不说谎。一天晚上，他们打猎回来，对我们讲道：一只小姆兹被他们赶进了一个小池塘，它潜入了水中。他们在岸边守候着，一面抽着烟，直等到天黑。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没发现水中有丝毫动静，也没发现可以证明姆兹还藏在那里的其他什么迹象，于是他们失去了捉住它的信心，终于回家去了。

他们到家才一会儿，又回来了一个猎人，他手里拎着刚打到的猎物。他说：野兽的脚印把他引到了池塘边，在那里，他又发现了两个人的足迹。看上去，那两个是与姆兹同时到达岸边的。他以为，姆兹已被他们打死了。他在池塘边坐下来，不一会儿就看见了一只姆兹，它正悄悄地从不大深的水里冒出半个身子来。于是，他对着池塘瞄准姆兹开了一枪。

印第安人认为，姆兹是一种最警觉的动物，要捕到它是非常困难的。它比野水牛（bison，bos americanus）和加拿大鹿（karibou）更警觉，更敏感。它比麋鹿跑得快，比野山羊（l'antilope）谨慎、狡猾。就是在最最可怕的暴风骤雨中，当

连续不断的狂风雷鸣与倾盆大雨响成一片的时候，如果有人手脚不轻，将林中的干树枝碰断，姆兹都能听得见。它并不总是逃走，但它会停止嚼食，仔细谛听各种声音。如果在整整一个小时里人都不出一点声响，姆兹才会重新开始嚼食，而且并不会忘记它刚才听到过的声音。一连几个钟头，它都非常警觉。

在追捕野兽时，印第安人的灵巧和不知疲倦几乎是叫人难以置信的。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坦纳是怎样描绘猎捕麋鹿的吧。

寒冷的天气刚刚开始。雪还不到1英尺深，可我们已经在忍受饥饿了。我们遇到了一群麋鹿，一天就打死了4只。

印第安人是这样追捕麋鹿的。他们把麋鹿先从一个地方惊跑，然后连续几小时一直迈着稳健均匀的步伐去追赶它们。受了惊吓的野兽在开始时由于害怕会猛冲一阵，在他们前面窜出好几英里。但是，印第安人却仍然迈着与开头一样的步伐追赶，最终总会追上它们。那群麋鹿一看见追过来的印第安人，便重新鼓足劲头奔跑起来，于是，在一两个钟头以内，它们又一次从猎人们的眼界里消失了。可是渐渐地，麋鹿群每一次从猎人们视线里消失的时间越来越短，而留在人们视线内的时间却越来越长。到最后，猎人终于能够一分钟也不放过地盯住麋鹿群了。累慌了的麋鹿迈着碎步小跑起来，再过一会儿，它们就只能行走了。这时，猎人们也差不多筋疲力尽了，但他们照样还能用火枪向麋群发出连射。不过，枪声会把野兽们的力量重新激发出来。如果积雪不深，猎人们便很难再有精神和机会了，向麋鹿开枪的次数也超不过一两次。在作持续的奔跑时，麋鹿难于抽出它们的蹄子，在积雪

很深的情况下，要追上它们就容易了。也有一些印第安人，他们甚至能在草原上和没有积雪的地方追捕麋鹿，但这样的人毕竟很少。

印第安人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所遇到的艰难困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像。他们总是在没完没了地跋涉迁移，经常整天整天没有东西吃。有时，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斋戒之后，他们只得用水煮皮鞋来充饥。当他们跌进白雪覆盖的深渊时，当他们乘着轻飘飘的树皮船渡过波涛汹涌的河流时，他们每分钟都处在危险之中，要么丢掉性命，要么失去维持性命的家什。一旦取火用的朽木受了潮，猎人便常常会冻死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坦纳本人就曾好几次在冰天雪地之中领略过死亡的降临。他写道：

有一天大清早，我追捕一只麋鹿，一直追到了晚上。就在我快要赶上它的时候，我却突然失去了力量和信心。虽然天气寒冷，可我的衣服却湿透了。衣服上很快结了冰。我的粗呢“米塔瑟”（裤子）在我从灌木丛中跑过的时候被划成了一块块的碎片。我觉得我快要冻僵了……快到半夜的时候，我回到了我家的驻地，可是，我家的茅屋已经不见了。原来，老太婆把它迁到别处去了……我寻着家人的足迹走去，很快便感觉不到寒冷了：我陷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这向来是死亡的前兆。我加倍努力地迈着步子，虽然我的神智完全清醒，而且我非常清楚我处境的危险，可仍然费了很大的劲才克制住了在地上躺一躺的愿望。终于，我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我好像是从梦中醒来，才发现自己一直在原地转悠。

我开始寻找我自已的足迹，突然我看见了远处的火光。可是，我又一次陷入了昏昏糊糊的状态。假如我当时摔倒的话，

我就永远也不会再站起来了。我又开始在原地转悠起来。最后，我终于走到了我们的茅屋跟前。一进茅屋我就倒在了地上，但并没有失去知觉。现在我是用怎样的眼光在注视着照亮了我家茅屋的火光，还有那覆盖着茅屋的冰雪；我是多么惊异地在听着老太婆的话语。她说，在夜晚来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在等我，没想到我打猎会去这么久……我整整一个月不能出门。我的脸、手和两条大腿都被严重地冻伤了……。

忍受如此的劳苦与危险，印第安人的目的无非是要积攒些海狸、水牛和其他野兽的兽皮，为的是卖给美国商人，或用它们与商人们换东西。可是，他们却很少在贸易往来中得到好处：商人们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憨厚和他们对烧酒的嗜好。用一些货物换得罗姆酒和烧酒后，可怜的印第安人便把剩下的货物也无偿地送给别人。持续的狂饮结束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是饥饿与贫困。于是，不幸的野蛮人不得不很快又重新操起那收益微薄，但却危险艰辛的狩猎行当。约翰·坦纳这样描写了一次狂饮场面。

我们的交易结束了。老太婆送给了商人10块上好的海狸皮。作为交换，她通常可以得到的东西是：一条长裙，标志她统治权的银制装饰品以及一桶罗姆酒。当商人派人找到她，要把礼品交给她的时候，她已经醉得站不稳了。我出面替她接受礼品，也有点醉醺醺的了。我穿上她的裙子，戴上银首饰；然后，我把酒桶扛到肩上，托进了茅屋。进屋后，我把木桶放在地上，用大木锤在桶底扎了个大窟窿。“我可不是那种从小洞里吸酒喝的头领，”我说：“谁想喝就来喝，想喝多少就喝多少！”老太婆拎着3只锅跑了过来——5分钟后，所

有的酒全被喝光了。有生以来，这是我第二次与印第安人一道开怀畅饮。我藏了一些罗姆酒，我悄悄跑去喝了，于是连续醉了两天。剩下的一点酒我又和老太婆的侄儿一道跑去喝光了……他倒是没醉，可他的妻子却躺在火堆边醉得不省人事……

我们坐下来喝酒。这时，一个来自奥日布阿伊部落的印第安人摇摇晃晃地走进屋子，倒在了火堆旁。天色已晚，可整个营寨仍在喧闹、狂饮。我与同伙出了门，要去同那些打算邀请我们的人再痛饮一番。我们醉得还不十分厉害，便把一锅没喝完的酒藏了起来。我们闲逛了一会就回来了。我同伴的妻子还躺在火堆边，可她身上的银首饰已经不见了。我们连忙跑去找那锅酒，可是锅已经没影了。那个躺在我们火堆旁的印第安人也不见了。根据各种迹象，我们怀疑是他偷的。我听到消息，说他对别人讲，似乎是我把他灌醉的。第二天，我到他家去要锅。他叫他妻子把锅拿了出来。就这样，贼被查出来了，我兄弟也找回了银首饰!! ……

还是让读者自己去评判吧：接触文明究竟能给野蛮人的生活习惯带来什么改善!

轻浮、放荡、狡诈、残忍——这就是美国野蛮人的主要恶习。在他们中间，凶杀不会被看作罪行，但被害者的亲友却总要为他的死而报仇。约翰·坦纳曾引起一个印第安人对他的仇恨，他多次遭到那印第安人的袭击。“你本来早就可以杀死我的，”一次，坦纳对那印第安人说：“可你并不是个男子汉，你甚至没有女人的心肠，也没有狗的胆量。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你对我挥刀子，但却没有勇气杀死我。”——在印第安人中间，勇敢被看成一个人的主要美德，胆小鬼就像懒汉或无能的猎手一样，势必遭到大家的鄙

视。有时候，如果凶杀发生在醉酒或无意的情况下，亲戚们便会郑重其事地宽恕凶手。坦纳讲述了这样--件有趣的事情：

有个年轻人来自奥托瓦乌部落，我生病期间，他就住在我家里。一次，他暂时离开我家，到新来的印第安人的营寨去了，他们当时正在酗酒狂饮。半夜里，有人把他送了回来，他已经喝醉了。其中一个护送他的人把他推进茅屋，说道："看住他吧，年轻人干了件淘气的事。"

我们点起火，看见年轻人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刀，全身都沾满了血迹。人们没能叫他躺下。我命他躺下，他听从了。我不许大家追问这件事，也不许大家向他提起那把血迹斑斑的刀子。

早晨，他从酣睡中醒来，什么也记不得了。年轻人对我们说，头天夜里他大概喝醉了，现在他很饿，想给自己弄点吃的。当我告诉他，说他杀了人的时候，他惊呆了。他只知道，他醉酒的时候喊叫过，因为他想起了他的父亲，他就是在那个地方被白人杀害的。年轻人很难过，立刻跑去看那个被他戳了一刀的人。不幸的人当时还没有断气。我们了解到，当他被戳一刀的时候，正躺在地上，醉得不省人事。凶手本人大概也不知自己究竟杀了谁。亲人们什么都没说。但（美国州长的）翻译却强烈地谴责了他。

很清楚，受伤的人活不成了，他最后的时刻已经临近。凶手回到了我们营寨。我们准备好了重礼：有人拿出一床毯子，有人拿出一块呢绒，有人给这，有人给那。年轻人立即把礼品带去，摆在受伤者的面前。然后他对他的亲人们说："我的朋友们，你们都看见了，我杀了你们的兄弟。但我自己也不知道干了什么，我事先并无恶意。前不久他还去过我们营寨，

我和他曾友好地会过面。可是在狂饮中我失去了理智。现在，我的生命归你们了。我是个穷光蛋，又住在别人家中。不过，他们打算把我送回我家，还给你们捎来了这些礼物。我的生命握在你们手中，礼物摆在你们面前：你们选择吧，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我的朋友们不会抱怨的。”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坐了下来，垂下头，用双手捂住眼睛，等待着致命的一击。但是，死者的老母亲走上前来对他说道：“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孩子们都不想要你死。我不是在替我丈夫回答，他不在这里。不过，我会收下你的礼物，尽量阻止我丈夫对你报复。发生这不幸的事并不是你故意的。为什么你母亲得像我一样流泪？”

第二天，那个年轻人死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去帮助凶手挖坟墓。当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州长赠送给死者许多毯子、衣服和其他东西（按照印第安人的风俗，这些东西要与尸体一起埋葬）。礼品在坟边摆成了一堆。但老太婆不但没让人们把它们埋起来，反而让年轻人拿这些东西去争抢逗乐。

各种游戏一个接着一个：瞄准射击，跳跃，打斗等等。不过，最好的一块呢绒作为奖品奖给了追逐赛跑中的胜利者。凶手本人赢得了这块呢绒。老太婆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年轻人，我的儿子对我非常宝贵，我担心我会一直经常为他流泪。如果你能顶替他，像他那样爱我，保护我，我是会觉得幸运的。我只担心我的丈夫。”年轻人很感激她的袒护，立即采纳了她的建议。他被收为养子。死者的亲人们一直待他亲近友好。

并非所有的争端与凶杀都会这样以和解而告终。约翰·坦纳描写了一场争端，它的可怕与可笑奇怪地交织在一起。

我兄弟瓦-梅-贡-耶-比尤走进窝棚，看见一个年轻人正在打一个老太婆。我兄弟抓住了他的手。刚巧这时一个名叫塔-布-希什的老头醉醺醺地走了进来。看来，他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一把抓住了我兄弟的头发，把他的鼻子咬了下来。人们都跑了过来，于是，一场骚乱发生了。许多人都受了伤。过去总是向着我们的一个老头领别格-瓦-伊兹也闻声赶来，他认为干预此事是他的责任。与此同时，我兄弟发现自己失去了鼻子，便动起手来。他眼也不抬，抓住他遇到的第一个脑袋，一口咬下了那上面的鼻子。那恰恰是我们的朋友老别格-瓦-伊兹的鼻子！等到疯狂略微平息下来后，瓦-梅-贡-耶-比尤认出了老头，他叫了起来："大叔！这是你么！"别格-瓦-伊兹是个善良温和的人，他知道我兄弟咬下他的鼻子完全是出于无意。他毫无怨气地说道："我老了，对我掉鼻子的事，人们嘲笑不了多久的。"

可我却非常仇视那个毁了我兄弟面容的老头。我走进茅屋，在瓦-梅-贡-耶-比尤的身边坐下。他全身沾满了鲜血，好长时间一直不说话。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神智完全是清醒的。他说："明天，我要与我的孩子们大哭一场；后天我就去找塔-布-希什（我的敌人），与他同归于尽：我不想活着永远让别人耻笑。"我起誓要帮他的忙，并开始作准备工作。可是，当一觉醒来，当他与自己的孩子们一道哭了整整一天之后，他放弃了自己的恶念，决心想法在没有鼻子的情况下活下去，就像别格-瓦-伊兹一样。

过了几天，塔-布-希什害上了非常危险的热病。他消瘦得十分厉害，好像快要死了。终于，他派人给瓦-梅-贡-耶-比尤捎来两只锅和其他一些贵重礼物。他让来人转告瓦-梅-贡-

耶-比尤说："我的朋友，我毁了你的面容，你则把瘟病赐给了我；我吃了许多苦头，要是我死了，我的孩子们还会吃更多的苦。我送给你一些礼物，想求你饶我一命……"瓦-梅-贡-耶-比尤派人回了他的话："赐给你瘟病的并不是我，我治不好你的病，也不想收你的礼物。"塔-布-希什受了近一个月的煎熬，头发也脱落了。后来，他开始慢慢地恢复了健康。于是，我们大家在草原上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走散，尽量互相离得远远的……。

一次，我们在塔-布-希什落脚的那个村子的附近驻扎下来。当我们正准备重新上路的时候，却突然看见了塔-布-希什。他赤条条地站在那里，身上纹着图案，装饰得就像是准备上战场一样，手里还拿着武器。他慢慢地朝我们走来，看上去气急败坏。可在他把枪口对准我兄弟的后背之前，谁也没有猜中他到底想干什么。"我的朋友，"他对我兄弟说："我们都活够了，我们互相也折磨够了。有人替我向你求情，要你因我遭受了苦难而就此罢休，可你就是不答应。就是因为你，我现在的日子仍然不好过。我已经活厌烦了，我们应该一同去死。"两个年轻印第安人一看他是这个意图，立刻张开了自己的弓，用箭瞄准了他。但塔-布-希什对他们一点也不在意。瓦-梅-贡-耶-比尤吓坏了，简直不敢抬起头来。塔-布-希什已准备同他拼个死活，可他却没有应战。从那以后，我一点也瞧不起他了：最差劲的印第安人也比他勇敢坚毅。

如果说印第安人的局部纠纷血腥而残暴，那么他们的战争则完全不具毁灭性，大多为令人疲惫的远征。头领没有任何权威，野蛮人也不知什么是军人的服从。一旦厌倦了远征，他们便一个接着一个地逃离部队，各自回家，到头来，连一个敌人都没见过。头

领们会坚持一些时候。但到了只剩下自己一人而士兵都跑光了的时候，他们也就随波逐流了。于是，战争便毫无结果地结束了。

约翰·坦纳显然十分得意地讲述了自己立下的一次战功。它有些像一次盗窃，但却证明了坦纳的精明强干和勇敢无畏。一帮印第安人偷走了他的马。他怀着要么找到它，要么另换一匹的打算出发了。他走访了许多印第安人村落，所到之处总是遭到冷遇。这使他感到屈辱。他看见一个头领有一匹好马，出于报复心理，他决定将它据为己有。他写道：

> 在我的毯子下面，藏了根套马索。我熟练地将它套在了那匹马的脖子上。我骑在马上，不是在跑，而是在飞。当马开始喘起粗气来的时候，为了回头望一望，我停了下来：那个不好客的村子里的茅屋，看上去就像遥远山谷中的小黑点，只是隐约可见了……
>
> 这时我才觉得自己做得不对，偷了别人喜欢的马。人家虽没给我应有的热情接待，但也并没做什么对不住我的事。我从马背上跳了下来，把马放掉了。可就在这时，我看见一群印第安人，他们正骑马从高地那边跑来。我连忙跑进近处的胡桃林。他们四处搜寻了我好一阵，而这时我却小心翼翼地躲了起来。好些人从我身边很近的地方走了过去，可我藏得十分隐蔽，可以毫无危险地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一个年轻人脱光了衣服，就像是要与人厮打。他唱起战歌，扔掉火枪，手里拿了根普通的木棒径直朝我隐藏的地方走来。他离我只有 20 来步了。我枪上的扳机竖了起来，我瞄准了他的心脏……。可他却转身走开了。他当然没有看见我。不过，他大概是想到自己正处在敌人的监视下，而敌人正手持武器隐藏在暗地里。于是，这个念头使他动摇了。他们一直搜寻我，直

到半夜才牵着马回去了。

我立刻踏上了归途，暗自庆幸自己躲过了这次危险。我日夜赶路，第三天，来到了毛兹河边。当地事务所的商人们都埋怨我，说我不该把到手的马放掉，要不他们会出好价钱来买这匹马的。

在离这个事务所20英里的地方，住着我的一个朋友，他名叫别-纳。我请他打听我那匹马的下落，弄清偷它的人是谁。别-纳把我引进一个窝棚，那儿住着两个老太太。透过墙缝，他指给我看一间茅屋，巴-基斯-昆-嫩格和他的四个儿子就住在那里。他们的马正在茅屋附近的草地上吃草。别-纳指着一匹漂亮的黑马让我看。那便是他们用我的马换来的……。我立刻去找巴-基斯-昆-嫩格，对他说道："我需要一匹马。""我没有多余的马。""我偏要牵一匹走。""那我就杀了你。"——我们就这样分手了。我准备凌晨上路。别-纳给了我一块水牛皮作坐垫；一个老太婆卖给我一根皮带作套马索，因为我的套马索已经留在印第安头领的马脖子上了。清晨，我走进别-纳的茅屋，他还在睡觉。我把我那条崭新的毛毯悄悄地盖在他身上，然后便离去了。

我走近巴-基斯-昆-嫩格的茅屋，看见他的大儿子正坐在门槛上……一看见我，他便拼命地喊叫起来，……全村一片慌乱……人们在我身边聚集拢来……看起来，没人想介入此事。只有对我无礼的这家人表现出明显的恶意……

我心里慌得已感觉不到脚下的大地，可我看上去并没有被吓倒。我扔出活套套住了黑马。可我并没有骑上去，因为在翻身上马的那一瞬间是不能自卫的——我有可能遭到来自背后的攻击。可我又一想：哪怕有丝毫犹豫的样子，都会对我极为不利。我想跳上马背，但我用力过猛，越过马背，直

挺挺地摔倒在马的另一侧，一只手里握着枪，另一只手里抓着弓和箭。我赶忙爬起来，环视了一下四周，好观察对手的动静。除了巴-基斯-昆-嫩格一家，所有的人都在哈哈大笑。这一情形鼓舞了我，于是我果断地骑上马去。我看到，如果他们真要袭击我，那他们早就利用我摔倒的那个时候动手了。况且，印第安人开心的哈哈声也证明，我做的事情并没有辱没他们。

约翰·坦纳摆脱了追赶，心安理得地作了那匹黑马的主人：那是他勇敢地抢来的马。

有时，他作出--副不信邪的样子，可却不时地暴露出他印第安人的迷信。坦纳迷信梦，还迷信老太太的预言，因为各式各样的梦和预言对于他来说总会应验。当他饿了的时候，他会梦见肥肥的熊肉和鲜美的鱼肉，而过一些时候，他还真能打到一只野山羊或者捕到鲟鱼。当陷入困境时，他的梦里便会出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会鼓励他，或给他出个好主意。坦纳讲述了他在小萨斯-卡乌河那荒无人烟的岸边所见到的幻象，他的描述很有诗意。

就在这条河的岸边，上天特意为印第安人创造了一块安营扎寨的地方：绝妙的港湾、小小的山谷，茂密的树林一直延伸到丘陵边上……。但这个地方总是使人想起一件可怕的事：这里发生过亲兄弟自相残杀的事件。这一暴行如此骇人听闻，以至这片土地也被看作是险恶可憎的了。没有一个印第安人在这“两个死人”的山谷边停靠自己的独木舟，谁也不敢在这里过夜。传说，这个地方过去曾驻扎过一个印第安

人营寨。营寨里的两兄弟（他们的图腾是雄鹰）[1]发生了矛盾，其中的一个便杀死了另一个。在场的人都被这可怕的暴行惊呆了，他们当场打死了那个杀害自己亲兄弟的人。两兄弟被埋在了一起。

当我走近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想到了许多关于那两兄弟的事情。他们的图腾与我的一样，我觉得他们就是我母亲（涅特-诺-库阿）的亲戚。我听说，当有人在他们的坟上停下来歇息时（说是这发生过好几次），他们就会从地底下钻出来，重新开始争吵，残杀。至少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他们总是让来访者不得安宁，总是叫他们睡不安生。我的好奇心被激了起来。我想对印第安人讲：我不仅在那可怕的地方停了下来，而且还在那里过了一夜。

当我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沉。我把独木舟拖到岸上，点起篝火，吃过晚饭，然后就躺下睡着了。

过了一会，我看见两个死人从坟墓里钻了出来。他们走过来，在火堆边坐下，直端端地面对着我。他们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我看，既不微笑，也不说一句话。我醒了过来。那是一个漆黑的、刮着大风的夜晚。我看不见一个人，除了树林哗哗的响声以外，听不见一点别的声音。大概，我又睡着了，因为死人又出现了。他们好像是站在下面，站在河岸边，因为他们的头与我生篝火的地面平齐。他们的眼睛仍然盯着我。不一会儿，他们又一个跟一个地站起来，再次坐到了我对面。不过，这时他们笑了起来，用芦苇茎来抽打我，做出各种模样来吓我。我想对他们说话，可嗓子里发不出声音；我试着逃跑，可我的腿却动不了。整整一夜我惊慌失措，恐惧

① 一种标志。雄鹰亦是约翰·坦纳的图腾。——普希金原注

万分。有一个死人对我说话了，他要我朝附近丘陵的山脚处看。我看见一匹被拴着的马正瞧着我。“老弟，这是给你的，”一个热比[①]对我说道：“这马是供你明天上路骑的。你回家的时候，还可以再来取这匹马，不过，还得再同我们过上一夜。”

终于，天亮了，我十分高兴地发现，两个可怕的鬼魂同黑夜一道消失了。但是，由于长期呆在印第安人中间，晓得许多梦往往应验的例子，我便一本正经地想到了死人送给我的那匹马。我来到丘陵边，看见了马蹄印子和其他标记，而且在不远的地方还找到了一匹马。我立刻认出，这是那个曾同我打过交道的商人的马。走陆路比走水路要近几英里。我扔下独木舟，骑上马，直奔事务所去了。第二天我就到了那里。后来，我总是尽量绕开那两兄弟的坟墓。我把我见到的幻象和夜间的恐惧告诉了印第安人，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怖和迷信。

约翰·坦纳结过两次婚。在《札记》中，他描写了自己的初恋，这描写具有着某种野性的魅力。他那美丽的心上人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不过，这名字很不适于写在挽诗里：她名叫蜜丝-库阿-本-奥-库阿，印第安语的意思是黎明。坦纳讲述道：

一天晚上，我坐在自家的茅屋前，看见一个年轻的姑娘。她一面散步，一面抽着烟，偶尔朝我瞧上两眼。终于，她走到我跟前，要我抽她的烟斗。我说我不抽烟。她说：“你拒绝我，是因为你不想碰我用过的烟斗。”我从她手上取过烟斗，抽了几口——这的确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抽烟。她同我聊天，

① 死人。——普希金原注

使我喜欢上了她。从那以后，我们经常幽会，于是，我迷上了她。

我要详细地讲讲这段经历，因为印第安人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相互认识的。通常，年轻人所娶的姑娘是他根本不认识的人。他们见过面，也许还互相瞧过一眼，可基本上从来没说过话。婚姻是由老人们来决定的，很少有年轻人违反父母的意愿。双方都知道，如果这结合使其中一方，或者使双方不愉快，那么要解除这婚姻是很容易的。

我与蜜丝-库阿-本-奥-库阿聊天的事很快在我们村落里引起了不少议论。老奥丘克-库-孔有许多孙女。一天，他牵着其中的一个走进了我家的茅屋。他听到传闻，以为我想娶亲了。“喏，交给你啦，”他对我母亲说：“这是我最好的，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孙女，我把她嫁给你的儿子。”说完这话他就走了，把孙女留在了我家……

凡是被人们看作美女的年轻姑娘，我母亲一向都是喜欢的。但是，老太婆却为难起来，她单独对我说道：“儿子，这姑娘漂亮、善良，但可别娶她：她有病，过一年就会死的。你需要一个强壮健康的妻子。这样吧，我们送她些好礼物，把她还给她父母。”姑娘拿着许多礼物回去了。过了一年，老太婆的预言果然应验了。

我们的爱情越来越强烈。看来，我母亲并不责怪我们的私情。我什么都没有告诉过她，可她却什么都知道，很快，我就证实了这一点。有一天，我第一次和我的恋人在一起一直呆到了后半夜。当我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我躺下就睡着了。黎明时分，老太婆用树枝打我光着的脚，把我叫醒了。

“起来，起来，”她说：“年轻的新郎，快去打猎吧。若你早早地扛着猎物回到你妻子身边，她会更加看重你的。这比

你背着猎人们同她闲逛，在她面前吹牛皮要强得多。”我默默地拿起枪，走出了家门。中午，我扛着一头被我射中的姆兹回来了。我把它扔在母亲脚边，粗声粗气地对她说：“拿去吧，老太婆，这是你今天早上要我去弄的。”她非常满意，夸了我一番。从这一点上我就看出，我与姑娘厮混并没有引起她的反感。对此我十分高兴。许多印第安人都嫌弃自己年老的父母；尽管涅特-诺-库阿已经年老体衰，我却仍像从前一样，对她怀着无条件的尊重。

我非常喜欢打猎，而且差不多总是回来得很早，或者至少是天还没黑我就扛着沉甸甸的猎物回来了。我细心地打扮自己，然后在村子里转悠，吹着一种被印第安人叫做皮-别-格文的芦笛。在一段时间里，蜜丝-库阿-本-奥-库阿一直假装拒绝我。我的心开始冷下去。于是，她再也顾不上装模作样了。……我要带一个妻子回家的愿望减弱了，我想与她断绝一切来往。看见我明显的冷淡，她便想来打动我的心，一会儿是眼泪，一会儿是责怪。但关于她的事我一点也没告诉老太太。我的冷淡一天比一天明显。

就在那段时间，我需要到红河去一趟。于是我就同一个印第安人上了路。他有一匹强壮而轻捷的马。我们得走 70 英里的路程。我们轮流骑马，没有骑马的那个人就拽着马尾巴，跟在后面跑。我们在路上走了一天一夜。回来时只有我一个人，而且是徒步走回来的。黑暗与疲劳迫使我在离家十英里的地方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回到家，我就看见了蜜丝-库阿-本-奥-库阿。她正坐在我的座位上。我莫明其妙地站在门口。她垂下了头。老太婆做出生气的样子对我说：“怎么？难道你要背对我们的家，让这可怜的，你根本配不上的姑娘丢脸吗？你们之间的

一切可都是由着你的意愿才发生的，不由我，也不由得她同意不同意。你自己为她到处奔波，可现在难道把她撵走，好像是她在缠你不成?”……母亲的责备在我看来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走进屋，坐在了姑娘的身旁。……就这样，我们成了夫妻。

约翰·坦纳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娶了另一个女人，同她生了三个孩子。尽管坦纳长期以来已经养成了另一种生活习惯，尽管他非常热爱狩猎生活，劳动生活，非常热爱充满冒险与不可理喻的欣喜的生活，然而，这个变野蛮了的美国人却一直想要回到他被迫而与之长期脱离的那个家庭中去。终于，他下定决心，要实现自己长期的宿愿。他来到大迈阿密河边，回到了自己老家的所在地。

他来到当地的一个村子里，遇到一个印第安老人，认出此人正是当年绑架他的那个年轻野蛮人。他们友好地拥抱在一起。坦纳从他那里得知，自己在惊恐万分之中认识的那个老头已经去世了。这个印第安人向坦纳讲述了绑架的详细经过。对于此事，坦纳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了。坦纳询问：老坦纳与他的全家是否真的成为了印第安人的牺牲品，就像马尼托-奥-盖季克当年要他的小俘虏相信的那样。印第安人回答说，那不过是老头撒的谎，接着他就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约翰·坦纳被绑架后又过去了一年，马尼托-奥-盖季克又来到他上次作案的地方。从早上到中午，他一直在暗中窥视着老坦纳和他的伙计们。他们全都回家去了，地里只剩下大儿子在用套着马的木犁耕地。印第安人向他扑了过去。马匹猛地一拉，约翰·坦纳的哥哥便被绳子绊住，摔倒在地。他

被擒住，马也全被乱箭射死了。印第安人把年轻的坦纳拖进树林，在夜晚来临之前，他们渡过了俄伊俄河。他们用绳子把俘虏捆在一棵树上，但他咬断了结头，抽出一只手，从衣袋里掏出小刀，割断了绑绳，立即跑到河边，跳进河里游走了。印第安人听见响动才醒过来。他们本打算去追他，但夜色太黑了。于是他便逃脱了，只是把自己的草帽留作了印第安人的纪念品。

坦纳的父亲在10年前就去世了，他将自己的地产留给了长子。但是，他并没有忘记那个命运未卜的孩子，没有忘记在遗嘱中提到他的名字。

终于，约翰·坦纳见到了自己的家人，他们万分欣喜地欢迎了他。哥哥兴奋地拥抱了他，为他剪去长发，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想让弟弟留下。可变野了的美国人却叫哥哥跟他走，去他的森林湖。他还通过翻译向哥哥炫耀野蛮人的生活，炫耀草原的辽阔。他的兄弟们都已成家，妹妹柳茜也有了10个孩子。亲人们的请求终于对他产生了作用：他决心离开印第安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回到他生来就归属于它的社会中去。

但是，坦纳的历险并未就此结束。他命中注定还要经历一次新的磨难。他回到他所熟悉的野蛮人当中，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他们。这下可激起了他们强烈的义愤。印第安人不答应把孩子交给他，妻子也拒绝跟他到陌生的、为她所憎恨的人们中间去。美国政府机关不得不出面干涉约翰·坦纳的家事。他们威胁利诱，劝说印第安人放了坦纳，让他携全家返回自己的故乡。坦纳还最后一次同亲人们一道去红河打野水牛，与野蛮人的生活，与这在他看来如此具有诱惑力的生活作永久的诀别。狩猎归来后，他便为上路作准备。

印第安人友善地同他告别。儿子不想跟随他去，留下来做了自由的野蛮人。坦纳带着两个女儿及她们的母亲上路了，因为母亲毕竟不愿离开自己的女儿们。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坦纳是如何描述自己最后一次旅程的。

在返回故乡的旅途中，我决定沿着不祥河航行，这样可以缩短几英里的路程。当时，在奥塞特尔河的河口处，有六七间茅草屋，这可能是个营寨，也可能是个村庄。这里有一个名叫奥姆-丘-格武特-翁的年轻人，不知是因为真正的罪名还是因为虚构的罪名，总之，按照美国长官的命令，他受了鞭刑。为此，他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怨恨。得知我就要到达此地，他划着自己的独木舟向我驶来。

他用非常古怪的方式寻求与我谈话的机会。他想方设法要我相信：我与他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他与我们一同过夜，早晨，他又与我们在同一个时间上了路。靠岸后，我发现他寻找机会与我的一个女儿在树林里会面。我女儿立即就回来了，样子有些惶惶不安。她母亲在一天中悄悄找她谈了好几次话，但小姑娘仍然很忧郁，而且还吼叫了好几次。

晚上，当我们安顿下来准备过夜的时候，年轻人突然走开了。我假装指手划脚地安排着，眼睛却一直盯着他。我突然走到他跟前，看见他正在摆弄他的打猎用具。他把一根约五寸长的鹿筋缠绕在铅球下沿的猎鞭柄上。我对他说："我的兄弟（他自己便是这么叫我的），如果你缺少火药、子弹或燧石的话，就到我这里来拿吧，需要多少就拿多少。"他回答说，他什么也不需要。于是，我便回去睡觉了。

有好一阵我没看见他。突然他又出现了，全身披挂，装束就像要去打仗的军人。上半夜，他非常警觉地监视着我的

一举一动。我本来就很强的疑心愈加重了。但他继续友好地同我东拉西扯地闲聊，还向我要了一把小刀去切烟草。可是，他并没有把刀还给我，而是把它插在了自己的腰后。我想他天亮会还我的。

我照平常的时间躺下睡觉，不想让他发现我在怀疑他。我没帐篷，躺在上了漆的粗麻布下面。我躺在地上，选择了可以观察他每一个举动的姿式。打雷了。他看上去更加焦躁不安。当最初的几滴雨点落下来的时候，我劝他到我的油布棚下面来。他同意了。雨下得很大，我们生的篝火被浇熄了。过了一会儿，姆斯季基（一种蚊子）向我们扑来。他又点燃了篝火，并用树枝为我赶蚊子。我觉得我不该睡着，但是瞌睡已开始向我袭来。突然，打了一个比刚才更响的雷。我仍旧像睡着了一样，闭着双眼，一动不动，但却始终让年轻人处于我的视线范围以内。一次，一个响雷大概吓了他一跳。我看见他把一些烟草当作贡物扔进了火里。又有一次，当睡意好像完全征服我的时候，我看见他在暗中注视着我，就像猫儿准备扑向自己的牺牲品一样。可我却老是在与瞌睡搏斗。

早上，他同我们一起吃了早饭，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在我收拾好之前，他已经出发，走到前面去了。我的女儿，就是与他在林子里谈过话的那一个，看上去更加胆怯，而且久久不肯上船。母亲安慰她，并且竭力在我面前掩饰她的惊惶不安。我们终于上路了。在上午 10 点钟以前，年轻人一直靠岸边行驶，与我们相距不远。在一个危险的急转弯处，当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能看见很远的地方时，他和他的船却消失不见了，这使我非常吃惊。

在这个地方，河面宽度达 80 维尔日。在离我提到的那个转弯处 10 英里的地方，有一个陡峭的小岛。我脱掉衣服，用

力划着独木舟，顶着湍急的河水逆流而上（这便迫使我得尽量靠近岸边）。突然，近处一声枪响，子弹从我头上呼啸而过。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侧面。我的右手耷拉了下来，橹也从手中跌落了。开枪时冒出的浓烟遮住了灌木丛，但当我看第二眼时，我便认出那正在逃跑的人就是奥姆-丘-格武特-翁。

我的两个女儿尖叫起来。我注意到我的独木舟：它已溅满了鲜血。我竭力用左手将船转向岸边，好去追赶那年轻人。但是，对我来说，水流太急，它把我们朝陡峭的小岛冲去。我跳上小岛，用左手把独水舟拖到一块石头上，试图给枪装上子弹。但还没来得及装好，我就昏了过去。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只剩我一个人在岛上。独木舟载着我的两个女儿顺流而下，向后退去，消失在远方。我再一次失去了知觉，但终于又醒了过来。

我觉得杀我的凶手正藏在某个隐蔽的地方监视着我。我查看了一下自己的伤口。右手情况很糟：子弹从我体侧靠近肺部的地方射入，留在了我的身体里。我对生还已感到绝望，便开始喊奥姆-丘-格武特-翁的名字，要他结束我的生命和痛苦："你打中我了，"我喊道："我受了致命伤，可我害怕多活几天，你过来呀，如果你是个男子汉，就再来给我一枪吧。"我喊了他好几次，但却没有听到回音。

我几乎赤裸着身子，在我被打伤的时候，身上除了汗水就只有一件衬衫。可就连这件衬衫在用力划船的时候也被挣破了。在夏日的酷热中，我躺在光秃秃的崖石上。地蝇和黑蝇叮咬着我，我的前途便是慢慢地死亡。但是，随着太阳的西落，力量和希望又重新回到了我身上。我游到了对岸。走到岸边，我还能站立住，于是便发出"萨萨库依"的叫骂，这

意味着欣喜和挑战。但是，由于游水时我失去了很多血和体力，我再次昏了过去。

醒来之后，我在岸边藏了起来，以便观察我的敌人。不久，我就看见了奥姆-丘-格武特-翁。他正从他埋伏的地方走出来。他把自己的独木舟放到河里，然后顺流而下，从我身边不远的地方划了过去。我很想向他扑去，抓住他，把他按在水中。但我不指望我有这力量。于是，我没有露面，就这样把他从我身边放了过去。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口渴得嗓子几乎要冒烟。河岸很陡，而且有很多石头。我的手受了伤，不能用它支撑身体爬下喝水，只得走入水中，让水淹到我嘴边。夜晚变得越来越凉爽，我的体力也在渐渐地恢复。血好像流得更多了，我开始收拾自己的伤口。我顾不得肿起的伤口，竭力要把打断的骨头接上。我先将破衬衫撕成布条，然后靠牙齿和左手将布条往手臂上缠。开始是轻轻地缠，然后越缠越紧，直到把手臂包扎好。我用小树枝捆绑成夹板，把绳子套在脖子上，将手吊了起来。

然后，我从一棵外形像樱桃树的树上撕下一块树皮，把它嚼碎，敷在伤口上，指望能用它止血。河边的灌木被鲜血染红了。夜幕降临，我选了一块苔藓丛生的地方过夜，树墩作了我的枕头。我不想离开岸边，以便观察动静；要是口渴了，还可以马上解渴。我知道，商人们的小船大约不久就会从这里划过，我等待着他们的救援。奥姆-丘-格武特-翁与我们一同出发的那个地方，以及那周围的地区，都没有印第安人的茅屋。我于是便根据这一点判定：除了他和我的妻子女儿以外，附近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人了。

我躺在地上，伸开双臂，开始向大神祈祷，求他怜悯我，

求他在我遇到不幸的时候帮帮我。当我做完祷告的时候，我发现那群叮在我赤裸的身体上，使我备感痛苦的蚂斯季基开始飞开，在我身上盘旋了一阵之后，终于消失了。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大神在显灵，因为晚上变得越来越冷，看来，这是空气的作用。但我相信，就像往常一样，每当我遇到灾难和危险的时候，我的主总是与我同在，并强有力地在保护着我。我平静地睡着了。但我不时地醒来，而每当我醒来时，总记得在梦中看见了载着白人的小船。

快到半夜的时候，我听见对岸有女人的叫声，我觉得那像是我女儿在喊叫。我想，是奥姆-丘-格武特-翁找到了她们藏身的地方，正在欺负她们。因为她们的叫声说明她们正在受苦。可是，我没有力量站起身来去救她们。

第二天早上，快到10点钟的时候，我听见河上有人在说话。这时我看见一条载着白人的小船，就像我在梦中见到的一样。这些人上了岸，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做起早饭来。我认出这是哈得逊商人斯图尔特先生的船，那会儿正有人在等着他。我想，我此刻出现会使他们不快，于是便等着他们把早饭吃完。

当他们快要离开的时候，为了让他们看到我，我走到了浅滩上。那些法国人一看见我便停止摇桨，全用怀疑和恐怖的目光盯着我。河水很快把他们冲远了，我用印第安语向他们喊话，可一点作用也没有。最后，我开始叫斯图尔特先生的名字。我想起几个英语单词，便求他们回来接我。所有的桨一齐插入水中，小船划到了我的跟前，我一迈腿就可以上去。

尽管斯图尔特和格兰特先生都很熟悉我，可谁也没把我认出来。我浑身是血，大概，痛苦已把我折磨得完全变了样。

他们向我问这问那，很快弄清了我是谁，出了什么事。他们在船上为我铺上了卧具。我求商人们救救我的孩子，把船划到传来她们叫声的那个地方去。但是，所有的搜寻都是徒劳的……。

得知杀我的凶手的名字后，商人们决定立刻赶到奥姆-丘-格武特-翁居住的那个村寨去。他们发誓：如能抓住他，就当场把他打死。商人们把我藏在船底。当我们在那几间茅屋旁边停泊下来时，一个老头朝我们走了过来。他问道："有什么消息吗？""一切正常，"斯图尔特先生回答说："没什么新消息。"老头反唇相讥地说："白人从来不对我们说真话。我知道，在河对岸、就是你们从那儿划过来的地方，已经出了事。我们的一个年轻人奥姆-丘-格武特-翁到那边去过。他说'雄鹰'（坦纳的印第安绰号），就是那个几天前带着妻子和孩子从这里路过的人，把妻子和孩子全杀掉了。不过，奥姆-丘-格武特-翁自己可能也干了什么坏事，不知为啥他总是坐立不安，一见到你们来就跑掉了。"

但斯图尔特和格兰特先生仍开始在所有的茅屋搜寻奥姆-丘-格武特-翁。当确信他的确已逃跑后，他们才对老头说："是的，他的确做了坏事。但他想杀死的那个人这会儿正与我们在一起，不知还活不活得成……。"于是，他们指着我，让聚在岸边的印第安人看。

我们在这个地方休息了一阵。他们为我瞧了伤，发现子弹射穿了我手臂的骨头，擦着肋骨进入了我的体侧。我请求格兰特先生把子弹拔出来，可他和斯图尔特先生都不同意。我不得不用左手自己给自己做手术。格兰特先生给我的小刀被折断了。于是我就用削笔刀，可削笔刀也折断了，因为伤口的肌肉已经变硬了。最后，他们给了我一把宽宽的刮胡刀，我

终于掏出了子弹。子弹已经变扁了。鹿筋和其他草药留在了伤口上。既然看见子弹并没穿入肋下，我便开始指望能够好起来。不过，我有根据认为我的伤口中了毒，因此我想我会恢复得很慢。

子弹取出来后，我们出发到一个村子去。那个村子里的村长是凶手的亲兄弟。为了以防万一，斯图尔特又把我藏了起来。居民们被一个个地叫了出来。他们都分得了一些烟草。但搜寻仍然毫无结果。最后，他们把我指给印第安人看，并告诉村长，说杀我的凶手就是他的亲兄弟。村长低下头，拒绝回答白人的盘问。但我们从另一些印第安人口中得知：我妻子带着女儿们往雨湖去了，途中曾在这个村子里停留过。

我们立即朝雨湖赶去。在事务处，我们找到了她们，她们正被拦在了那里。她们既慌张又恐惧，加上我又没和她们在一起，这便引起了当地商人们的怀疑。老太婆一看见我便朝林子里跑去。商人们派人去追她，把她抓住，带了回来。

斯图尔特和格兰特先生让我自己处治我妻子。显然，在这场谋害我的事件中，她是有罪的。他们说她的罪过与奥姆-丘-格武特-翁的罪行一样，应该让她去死，或者让她受其他的惩罚。但我却只要求将她从事务所赶走，不给她干粮，不准她再到事务所去。她是我孩子的母亲，我不希望她被绞死或被打死（就像商人们提议的那样），但她那副模样开始让我感到厌恶。依照我的请求，她被赶走了，没受任何惩罚。

女儿们告诉我，当我摔倒在石头上失去知觉的时候，她们以为我死了，于是服从了母亲的命令，踏上了返回的路途，一个劲地奔逃。在离我倒下的那个小岛不远的地方，老太婆把船停在灌木丛边，在那里把我的衣服藏了起来。走了很长一段路程以后，她在树林子里躲了起来。可后来她又改变了

主意，觉得把我的东西占为已有更好。于是她又折了回来。就在那时，我听到了两个女儿的叫声，她们跟随着老太婆来岸边捡我的衣服……。

现在，约翰·坦纳生活在文明的同胞们中间。他正在为几个本应归他继承的黑人而与后娘打着官司。他以高昂的价格出售了他这本有趣的《札记》。大概就在最近几天，他将成为“戒酒协会”的成员。[1]总之，坦纳有希望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扬基”[2]。为此，我们将真诚地向他表示祝贺。

评论者

① 此协会的宗旨乃是要消灭酗酒现象，协会成员不得饮用和购买任何酒精含量高的饮料。——原编者注

② 美国人的绰号。我们对其含意不甚明了。——原编者注

《论人的天职》[1]

西尔维奥·佩利科著。

《论人的天职》一书的新译本将于近日内出版。此书的作者即是著名的西尔维奥·佩利科。

有这样一本书，它的每一句话都在世界各地被人们阐释、讲解和传播，它的每一句话都被应用到世间各式各样的生活情形和事件当中；在这本书中，没有哪一句话不被人们熟记于心，没有哪一句话不为各国人民家喻户晓；这本书的内容已被人们熟悉。这本书便是福音书。当我们这些对现世感到厌倦而心灰意懒的人偶然翻开它的时候，便会无力抗拒它那安谧而温馨的吸引，迷上它那神圣而动人的叙述。

为了对这位温良恭顺的受难者所写的书作几句评论，我们不揣冒昧地提到了神圣的福音书，这可并非无缘无故：在上帝的选民中(甚至在首批教会牧师当中)，很少有人能够在自己的著述中，以精神的温良恭顺，言辞的娓娓动人，心灵的天真无邪，如此接近至上导师的教义。

当今，费奈隆、西尔维奥·佩利科以及《论对基督耶稣的效

① 发表于《现代人》1836年第3期。

法》一书的无名作者便在最高境界上属于这样的选民，天使亦将尊他们为上帝垂青之圣人。

西尔维奥·佩利科有10个春秋是在各个不同的监狱中度过的。[①]获得自由之后，他出版了自己的札记。这本书引起了全社会的震惊：人们预期着苦痛的抱怨，可读到的却是令人感动的思想。它充满了坦荡的平静，充满了爱和善良的愿望。

我们得承认我们无端生出的恶念。在这些札记中，不幸的囚徒从未用自己的笔写过不宽容的责怪或仇恨的话语。当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们便禁不住妄加揣测，在这对世间所有人和事的始终不渝的善意中，是否隐藏着什么不便公开的目的。这种中庸在我们眼里只不过是一种矫揉造作。于是，在赞叹作者的同时，我们却指责他的不诚挚。《天职》一书使我们羞愧。它为我们解开了一颗美好心灵的奥秘，解开了一个基督徒的奥秘。

说出西尔维奥·佩利科的著作像什么书之后，我们便再也没什么，也不该再有什么可以为我们的赞美之词画蛇添足的了。

在我们的一份杂志上，在一个真正具有才华的作家，一个值得有学识的读者信赖的批评家的文章中[②]，我们惊异地读到了这样一些关于西尔维奥·佩利科的文字：

“假若《天职》一书不是出版在《生活》（指《我的狱中生活》）一书之后的话，它在我们眼中便只会是些老生常谈和干巴巴的、主观专断的教条，我们对它便只会听而不闻，不加注意。”

难道西尔维奥·佩利科还需要抱歉吗？难道他那浸透了满腔热忱，具有不可言喻的魅力，充满了和谐动人的词句的书，尚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使什么人觉得是干巴巴、冷冰冰的教条吗？难道

① 佩利科因参加烧炭党运动于1820年被捕。1832年，出版了《我的狱中生活》。

② 指1836年第6期上舍维列夫的评论文章。

说，如果这本书是在费瓦依达的宁静中或是在哲学家的书斋中写的，而不是在监狱的孤寂中写的，那么它就不值得引起有心肠的人们的注意了吗？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诗歌史》的作者[①]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这已是陈词滥调了，这已经不新鲜了。”——这便是批评界惯用的一句指责之词。数百年来，所有的观点都表述过了，重复过了，一切皆已成为老生常谈。由此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难道人类精神再也不可能创造什么新东西了吗？不，我们可不想贬低它。人的智慧可以永无休止地**产生思想观念**，就如同用一种语言可以永无休止地**连词造句**一样。所有的词汇都列在词典里，但不断问世的书籍却并不是词典的再版。**单个的意念**永远不可能表示任何新思想，而**思想观念**却可以具有无限的多样性。

作为对舍维列夫先生的观点绝妙的反驳，我将在此援引他本人的一段话：

“当您怀着与写这本书一样的信念去读完它（佩利科的书）的时候，您将走出怀疑和困扰，走出心灵与头脑相矛盾的黑暗世界，进入秩序与和睦的光明世界。生活与幸福的目标在你看来会十分简单。您将振作起来，摆脱欲念、习惯、苛求等凡尘琐事的困扰——那时候，您心中只会有两种感觉，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非常难得的两种感觉：满足与希望。”

① 指舍维列夫。

圣徒词典[①]

俄国教会著名圣徒及部分在当地受到人们顶礼膜拜的
虔诚信徒之大全，1836年，圣彼得堡。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学术论著几乎都表现出一个主要的弱点，这便是功底的欠缺。批评界很少有机会能够向人们介绍几篇经过长期研究和耐心探索而得出的成果。于是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为了掩饰才疏学浅，我们的所谓学者们便不得不玩弄一些或较为成功，或较为拙劣的手腕，如鄙屑前辈，使用新奇怪诞的观点，给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东西套上一个摩登的概念等等。这些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招摇撞骗）绝不会将学术事业向前推进一步，而只会在幼稚与低能的脑袋瓜里引起卑微的“怀疑与否定的精神”[②]，只会使真正的学者和有健全思维能力的人感到痛心。

《圣徒词典》则不属于此类正充斥着我们所有书店的轻率仓猝之作。预先调查的准确，准备工作的充分，使得此书在内行们的眼目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出版人在该领域内是有前人可以借鉴

① 佚名发表在《现代人》1836年第3卷上。该词典于1836年出版，其编纂者为Д·А·厄里斯托夫和М·Л·雅科夫列夫。后者是普希金皇村学校的同学。

② 引自普希金本人的诗歌《天使》，略有改动。

的，这便是诺维科夫。他于1784年出版了《东正教圣徒史试用词典——毕生圣洁虔诚信奉东正教之著名圣徒大全》。从那以后又过去了50多年，史料又增加了许多，对于新的出版人来说，工作难度减轻了，但工作分量却加重了。诺维科夫的《试用词典》共列入了169位上帝侍从的名字。在这些名字下面，或附有生平简介，或无任何释文。《圣徒词典》则收录了363位圣徒的名字，即已多出两倍以上。诺维科夫偶尔在词条后面标出史料出处，而如今的《圣徒词典》则专门附有完整的史料出处：《索引》。《索引》采用左右两纵行形式，用小号铅字印刷，占了整整一个印张。前言中写道：

俄罗斯教会非常慎重地将其部分上帝侍从宣布为圣徒，必须确信发现了因其能够显灵而闻名的不朽法体，方可将其名字列入教会日历。俄罗斯之所以确信其东正教信仰，亦有赖于它在诸多地方看到了神赐圣恩于法体的明显征兆。这些法体乃属那些以毕生之崇高圣洁、以基督徒之献身精神及虔诚笃信之榜样而赢得世人崇仰的圣徒们。但是，这些上帝侍从的名字却未曾列入《俄罗斯教会总历》，其祭祀亦仅仅局限在他们的安寝之地举行。此种地方局限的原因，便在于诺夫哥罗德教会与俄罗斯总教会的教权分离，以及后来都主教辖区分裂为基辅辖区与莫斯科辖区。16世纪中期，莫斯科都主教马卡利在编纂《大宣教读物》时，收集了一些圣徒的生平传记。这些圣徒在当时还来被列入《圣徒传》。为了确定向他们举行朝拜之事，马卡利于1547年在莫斯科召开了宗教事务会议。会议确定，在全国各地为12位俄罗斯圣徒举行祭祀和朝拜，而另外九位圣徒的祭祀与朝拜只在其法体安寝地举行。那些未来得及向会议提交本地上帝侍从证明文件的教堂，后

来经由总主教审查，亦获得了祭祀本地圣徒的许可。尔后，在历届大牧首任职期间，上述圣徒中的一部分亦被陆续列入了《总历》。俄罗斯总主教德米特里按照祭祀次数的多寡，将基辅佩切斯卡亚隐修院部分圣徒列入了自己的《宣教读物》。但此后的许多圣徒却未被列入日历，虽然人们为其中一些圣徒举行了专门的朝拜仪式，诵唱了赞美歌和祭祷歌。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沃洛格达的上帝侍从便是如此。

本《词典》列有：俄罗斯教会著名圣徒传记；部分其他在其生活与长眠之地受人顶礼膜拜之虔诚苦行者传记；最后，还有那些毕生行善，其名字抄录自教堂追忆簿或修道院回忆录之教徒的事迹简介。在描述全俄教会著名圣徒之生平时，本《词典》还注明了为他们举行祭祀之月份与日期。至于其他一些教徒，亦标明了地点与日期，即按照规定或传统习惯，何时为他们举行朝拜诵唱或祭祷，以悼念其亡灵。

出版人的文笔当成为所有词典学家的典范：朴实、全面、简明扼要。我们曾在《百科词典》中（不过，该词典非常必要，且具有很高的价值）发现过这样的情形：在描述某个战役的时候，把一个军团譬喻成一艘船或一只鸟，究竟为何物我们已记不清了。如此修辞手段若放在别的什么作品中，尚可视作者才华之高低称为巧妙或者拙劣，但是，在词典中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圣徒词典》的出版人为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的书还具有广泛的吸引力。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从受洗之日起直到进入坟墓都使用着某个圣徒的名字，且每年都为这位圣徒举行祭祀，但他们对该圣徒的生平事迹却一无所知。虽然我们不允许自己对这些人进行任何责备，但起码不能不为这些人的毫无好奇之心面感到吃惊。

最后，图书鉴赏家们将对这本书的印刷之精美而深怀感激之情：词典为大 8 开本，用仿羊皮纸印刷，是皇帝陛下私人办公厅第二处印刷厂的杰作。

致出版人的一封信①

格奥尔基·科尼斯基，即《现代人》第一期上某篇文章所论及的那位先生，总是用这样几句妙语来开始他那牧师的布道：

"虔诚的听众们，基督的信徒们，我要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便是要谈谈我自己……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我的职责乃是传道。而好的、尽职的传道者，总是训导自己先于训导他人，对着自己的、即最近的耳朵说教先于对着别人的耳朵说教。"

先生，当您拿起杂志主办人的权杖，准备宣扬什么是真正的批评的时候，如果您面对您的订户预先阐明您对批评家及杂志主办人的职责的见解，预先对那些与一般人的天性分不开，而与杂志主办人的天性尤其分不开的弱点进行一番真诚的检讨，那么，您的这个举动将是非常值得称道的。至少，您可以为您的同行们作出这样一个好的表率：在您的杂志上刊登几点诚挚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在我读完《现代人》杂志第一期后，突然从我的头脑里冒

---

① 发表于《现代人》1836年第3期，署名为А.Б.。《论1834年至1835年期刊文学的动态》一文是果戈理写的，刊登在《现代人》1836年第1期上。发表时未加署名。该文被许多杂志主办人看作纲领性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论战，而这违背了普希金的意愿。这使他不得不假А.Б.之名给《现代人》杂志出版人写信，以此方式表明自己在有关出版杂志的某些问题上与果戈理的不同看法。普希金在А.Б.的信后附上了出版者注。

出来的。

《论期刊文学的动态》一文，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这篇文章中，您机智、尖锐、直率地阐明了许许多多正确的见解。不过，说实在的，这篇文章与我们的期望相去甚远，因为它并不符合我们以为您将要为您的批评所确定的那个方向。仔细地读完这篇略显自相矛盾的文章后，我无比清晰地看到，您对待先科夫斯基先生极端冷酷无情。按照您的观点，我们所有的文学都是在围着《读书文库》打转，其他定期出版物则要根据它对待《读书文库》的态度而定其高下。《北方蜜蜂》和《祖国之子》被看作《文库》的坚强后盾。而《莫斯科观察家》之所以创立，按照您的说法，其目的乃是要与《文库》抗衡。由于《观察家》的攻击只限于两篇小文章，它甚至还遭到了严厉的谴责。您是说：要么根本就别开口，既然开了口，就别落在别人后头。《文学增刊》、《望远镜》及《大众论坛》因反对《文库》而受到您的赞扬。说实话，这使那些曾急切地盼望着您的杂志问世的人们感到惊讶。他们说，难道《现代人》的目的就在于紧紧跟踪《文库》，以便出其不意地攻击它，强行赶走它的订户吗？我希望这种担忧是多余的，我希望《现代人》能为自己选拔一批更宽宏、更高尚的同仁。

您对先科夫斯基先生的责难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在以出版商斯米尔金的名义出版的杂志上，先科夫斯基先生只主持了批评栏目。

二、先科夫斯基先生对他用以刊登于《文库》的那些文章作了过多的修改。

三、在自己的批评文章中，先科夫斯基先生的腔调并不总是保持了庄重和不偏不倚。

四、先科夫斯基先生不使用指示代词“这”与“那”。

五、先科夫斯基先生拥有近5000订户。

前两项可以说是出版商斯米尔金自家的内部安排，与公众无关。至于说到批评的庄重腔调，我倒是不明白，在谈论国内的某些文学作品时，怎么可能做到一本正经。读者要求对所有的出版物进行分析评论。难道文学评论的撰稿人应该对他们研究和分析的所有书籍保持使用同一种腔调吗？对《俄国史》进行批评与对×××先生们及其他人的长篇小说进行批评——这是有区别的。如果一个批评家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彬彬有礼，一本正经，那么毫无疑问，他必然会失于不得体。在上流社会中，当您的胳膊肘碰到旁人时，您会向他道歉，这很好；但是当您在秋千旁边散步，撞着一个店铺伙计时，您却并不对他说“对不起”[1]。您会说：你干吗在秋千旁边挤来挤去？何必提到那些根本不值得人们注意的书呢？但是，如果读者一定要要求那样做，又为何不满足他们呢？你费力不大，却能使别人愉快。[2] ——请允许我问一句：您对丛刊《我的新居》的评论又将作何解释呢？此刊曾如此幸运地被您比作一只体弱毛稀，站在寂寥的屋顶上喵喵直叫的公猫。这个比喻滑稽可笑，但我却并未从中看出半点庄重。“正人必先正己！”说真的，刊登在《读书文库》上的某些风趣的评论实在是太令我开心了，假若批评家选择了沉默，我反而会觉得十分遗憾。

谈到那几个无辜的“这”、“那”等等代词，先科夫斯基所开的玩笑不过是玩笑而已。可读者，甚至某些作家，却偏偏要把它们看得如此认真。书面语能与口语完全相同吗？不，这就像口语永远不可能与书面语完全相同一样。不仅仅是代词сей（这）和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引用的是一则有关女演员戈仙（1711—1767）的笑话。戈仙以举止轻浮而闻名。当有人指责她轻佻时，她便以普希金所引用的这句话来作回答。

оный（那），[①]一般的形动词和许多必需的词汇通常都得避免在口语中使用。我们不说："карета，скачущая по мосту（沿桥而过之马车），слуга，метущий комнату（打扫房间之仆人）；我们说：карета，которая скачет（从桥上过的马车），слуга，который метет（正在打扫房间的仆人）等等，即我们不用言简意赅的形动词，而是用噜苏的短语。由此还并不能得出结论，说俄语中的形动词应该取消。语言的惯用语与短语越丰富，对于高明的作家来说就越便利。书面语不断地获得口头惯用语的充实，从面显 得生动活泼，但书面语并不应该否定自己若干世纪以来所获得的成就。单用口语写作意味着不懂语言。您把排斥сей（这）和оный（那）与将і和ѵ引入俄语拼写法作了一个不正确的比较，平白无故地惊扰了特列佳科夫斯基的亡灵。他还从未因了这两个字母跟什么人发生过争执。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教授，他希望改进我们的拼写法。他得独立地进行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先例可循。我要顺便说一下，卡切诺夫斯基先生的拼写法并不是什么新奇难懂的东西，它在我们的经书里早已存在。一切受到过学院式正规教育的文人，都应该知道它的规则，尽管用不着遵循这些规则。

至于最后一点，即5000订户的问题，那么，请允许我表示衷心的祝愿，希望您明年亦能挣得如此的责难。

您应该承认，您对先科夫斯基先生的攻击并不完全有根据。他有许多被您忽略了的文章是值得在欧洲最优秀的杂志上占一席之地的。作为外行，我们应该相信他对东方的有关记述。他在从事《文库》的出版工作时，非常机敏，非常认真，这一点乃是俄国的杂志主办人先生们未曾教会过我们的。我们这些谦卑的外省乡巴

① 不过口语中我们也讲：в сию минуту（这时）сей час（现在）по сию пору（到现在）等等。——普希金原注

佬感激他，因为他的文章形式多样，因为他的内容丰富全面，因为他那些欧洲的新鲜见闻，甚至还因为他对文学界奇闻佚事的报道。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许多为我们所尊敬和爱戴的文学家拒绝同我一道参与斯米尔金先生杂志社的工作。我们希望《现代人》杂志能补偿我们的这一缺憾。不过，我们希望两个杂志不要竭力相互诋毁，而是各干各的事，既为了双方的利益，也为了满足如饥似渴的读者。

谈到《北方蜜蜂》，您指责它不加区别地刊载投到它那儿去的一切新闻、声明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可是，它怎能不这样做呢?《北方蜜蜂》是份报纸，而报纸的收入正是靠那些不加任何区别便刊载使用的声明、新闻等等挣来的。英国那些订户不足15000的报纸，只能以刊登声明的方式补偿出版费用。《北方蜜蜂》应该受到指责，但不是为着它刊登了声明，而是为着它多次刊用了署名为ф.Б.的无聊文章，这些文章早就被我们（尽管您鄙视可怜的外省乡巴佬的鉴赏力）恰如其分地评价过了。请您相信，我们极为懊丧地看到：杂志评论家先生们想用道德说教的文章来吸引我们。这些文章里充满了最为幼稚的思想和非常下流的笑话，大概，这些东西都是《北方蜜蜂》从《勤劳的蜂》那里继承下来的。

总的说来，您对《残疾人增刊》的议论是公正的。出版人在论战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而且至今仍然具有不可争议的影响。我们对《见风使舵术》[①]及一系列在某种意义上可谓经典之作的文章仍然记忆犹新。但是，请允许我对您指出：您对沃叶伊科夫先生进行赞扬与您对先科夫斯基先生感到愤恨乃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便是因为他们没有一本正经地分析和评论那些不值得

① 《见风使舵术》，指沃叶依科夫发表在1828年《斯拉夫人》杂志上的几篇文艺短评。

一本正经地去分析和评论的东西。

我希望您在谈论《望远镜》时，不要提及别林斯基先生。他显露出了大有希望的才气。假如他能把自己的机智和独立见解与更加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假如他能够更加尊重传统，更加审慎周全，一句话，假如他能更加成熟的话，那么我们便会拥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批评家。

当您谈到杂志评论家们对待文学重大事件的漠不关心和麻木不仁时，您所指的乃是瓦尔特·司各特的逝世。可是，瓦尔特·司各特的逝世并不是文学事件。我们对于瓦尔特·司各特及其长篇小说的评论，无论是说到了点子上还是没有说到点子上，已经是够多的了。

您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明显地感觉到读者们对诗歌的冷漠及对中长篇小说之类的作品的热衷。可诗歌岂不向来只属于少数上等人的享用品，而中长篇小说则处处受青睐，人人喜欢读么？您又是从何看出这“冷漠”的呢？与其指责读者冷漠，倒不如指责我们的诗人无所建树。《杰尔查文文集》第3版已经问世，听说现在正准备出第4版。在《克雷洛夫寓言》（于去年出版）的卷首页上，印有3万册的字样。诗坛新秀库科利尼克和别涅季科托夫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科利佐夫在社会上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与好感……这哪里谈得上读者对诗歌的冷漠呢？

您指责我们的杂志评论家，说他们没有告诉我们，谁是瓦尔特·司各特？什么是现代法国文学？我们的读者如何？我们的作家又如何？

事实上，这些问题是十分有趣的！我们希望你能在今后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并且能够在您的批评中避免您曾在一篇文章中非常严厉、非常公正地批评过的那些缺点。您的那篇文章有理由

被我们称为您杂志的纲领。[①]

A. Б.

1836 年 4 月 23 日于特维尔

① 在愉快地登出 A. Б. 先生来信的同时，我认为有必要对我的读者作出某些解释。《论期刊文学的动态》一文发表在我的杂志上，但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其中所有观点，即那些用少年的激情与直率所表达的见解，与我本人的观点完全相符，无论如何，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现代人》杂志的纲领。——《现代人》编者注

我的说明[①]

我的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歌，它为我招来了责难。[②]我认为我有责任证明自己的无辜。这首诗中凝聚着诗人对一位功勋卓著的统帅的不无感伤的思考。在伟大的1812年，这位统帅作为战争前半期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承受了退却的全部苦楚，为无可避免的损失承担了全部责任，把反击、胜利、凯旋的光荣留给了自己那位千古流芳的继任者。我想不出这里有什么贬低人民自豪感和贬低库图佐夫神圣荣耀的企图。可是，却偏偏有人这样指责我。

库图佐夫的光荣与俄罗斯的光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与人们对现代史中最为伟大的历史事件的记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的尊号是俄罗斯的救星，他的纪念碑是圣赫勒拿岛的崖石！他的名字对于我们不仅仅是神圣的，我们俄罗斯人，难道不为这个名字的俄语发音而感到欢欣鼓舞吗？

巴克雷·德·托里能够圆满地结束这场由他打头阵的战争吗？他有可能停下来，建议在波罗金诺的坡地上打一仗吗？他有

① 发表于《现代人》1836年第4期。

② A·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在一本标题为《对普希金诗歌〈统帅〉的批评》的小册子中写道："诗人认为，是巴克雷·德·托里将军把桂冠让给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的……真遗憾，诗人竟允许自己使用如此不成体统的虚构。"

可能在一场“力量悬殊之争变得势均力敌”[1]的激战之后，把莫斯科留给拿破仑，自己却到塔鲁京平原上去静候坐等吗？不！（不用讲军事天才技高一筹的优势）只有库图佐夫才能够提出打波罗金诺战役的建议。只有库图佐夫才能够把莫斯科留给敌人。只有库图佐夫才能够如此英明地、积极地静候坐等，以便让拿破仑在莫斯科大火留下的废墟上麻痹松懈，而自己却伺机等待着那决定命运的时刻。须知，只有库图佐夫才命中注定要享有人民的信任，而他又是何等神奇地对这信任给予了报偿！

难道有了一个伟大的库图佐夫，我们就不该感激巴克雷·德·托里的功劳了吗？难道在经过25年的沉寂之后，还不能允许诗人怀着同情和怜悯提起他的名字吗？你们指责诗人的抱怨不公正，你们说巴克雷的功绩已经得到了承认、赞扬和奖赏，那么，是何人、何时承认、赞扬和奖赏的呢？……当然，既不是人民，也不是在1812年。巴克雷被迫将军队的指挥权拱手让出的那一时刻，对于俄罗斯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但对于他那颗坚贞不屈的心却是沉重难忍的。在今天看来，他的退却是明确和必要的举动，可在当初，在人们的心目中，却全然不是这样。唠叨抱怨的不仅仅是激愤的人民，甚至连经验丰富的军人也尖刻地指责他，而且几乎是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叛徒。巴克雷没有赢得自己部下的信任，反而受到大家的敌视，遭到恶言的中伤和诋毁。但是，他相信自己，他默默地朝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前进。他让出了权力，未来得及向俄罗斯当面证明自己的正确，但是，他却将作为一个富有诗意的高大人物形象被永远载入史册。

库图佐夫的荣耀不需要任何人的颂扬和夸奖。他打败了拿破仑，把俄罗斯提高到1813年的水平。诗人的意见既不能抬高他，

① 引自普希金自己的诗《波罗金诺周年纪念》(1831)。

也不会贬低他。但我却不能不感到痛心，因为我的同胞竟然怀疑我，认为我对那位被茹科夫斯基忘却的领袖[1]的拘谨赞扬是卑鄙、恶毒的讽刺——是对库图佐夫的讽刺。要知道，库图佐夫曾激发过我的灵感，使我写出了下列诗行，这些诗虽配不上伟大的亡灵，但它们却是真诚的，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

在这神圣的坟墓之前
我低头肃立，黯然神伤……
全都沉寂了，唯有神灯
在漆黑的殿堂放着微光，
把根根大理石柱和一排
垂悬的旌旗抹一层金黄。

在石柱和旗帜下躺着墓主，
这个北国卫队崇拜的偶像，
强国的年高望重的捍卫者，
曾经制服一切敌寇的猛将，
叶卡捷琳娜王朝一代英杰中
留存下来的最后一根栋梁。

在你的墓中洋溢着一片欢欣！
它向我们发出俄罗斯的声音，
它向我们反复提及那个年头：
一种充满着人民信念的声音，

① 茹科夫斯基在《俄军营地的歌手》一诗中，未将巴克雷列入英雄之中。

曾向你圣洁的苍苍白发呼吁：
“去拯救吧！”你挺身而起保国卫民。……①

① 引自1831年所作的诗。此处采用顾蕴璞的译文。全诗见本全集第2卷。

女　骑　兵[①]

俄罗斯传奇，两卷本。伊万·布托夫
斯基出版，圣彼得堡。订购时即交付
第一卷，第2卷待日后凭购书票领取。

H·A·杜罗娃札记第1卷已经问世。《现代人》的读者已见到过此书的节选。毫无疑问，对于它的叙述的魅力，人们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这叙述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它的真挚，在于它毫无刻意的雕琢，在于它并不企求作家的名声。还有它的朴实。热情的女主人公正是以这样的朴实在描述着最不平凡的故事。此第1卷所描述的，是娜捷日达·安德烈耶夫娜的童年、青春和她的首次出征。我们期待着后一卷的问世，以便能够对这部在各方面都十分出色的书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和评论。

① 发表于《现代人》1836年第4卷。

《卡拉姆津〈俄国史〉导读》①

两卷本，莫斯科。

斯特罗耶夫先生出版了两卷《导读》，他对俄国史学所作的贡献，比所有那些眼高手低的历史学家所作贡献的总和还要大。对于这一点，他们当中那些还不至于粗枝大叶、执迷不悟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斯特罗耶夫先生使研究俄罗斯历史变得难以置信地容易了。他写道："《导读》是根据《俄国史》第2版编写的，该版是经过修改的、最完整的版本。《俄国史》的出版人应该尽快取得《导读》的再版权，因为它是对卡拉姆津不朽之作的必不可少的补充。

① 发表于《现代人》1836年第4卷。古文献学家П·М·斯特罗耶夫为《俄国史》编写的《导读》出版于1835年。

谈谈弥尔顿及夏多布里昂对《失乐园》的翻译[1]

长期以来，法国人一直藐视邻国的文学。他们总以为自己高于全人类，因此，当他们在对著名的外国作家进行批评的时候，往往使用这样一个尺度，即看他们离开由法国批评家们所确定的法国规则与法国习惯到底有多远。

在上个世纪出版的译著中，任何一篇前言里总少不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想要满足读者，但与此同时亦要为我们的作者效劳，将那些有可能损伤法国读者高雅趣味的地方从他的书中删掉。你想想看，究竟是谁当着谁的面，在对谁如此这般地施舍这俯就的宽容？荒唐！这就是蒙昧的民族热情所导致的结果！……终于，批评界开始醒悟过来。他们开始怀疑勒图尔纳先生有可能错译莎士比亚。他随心所欲地修改《哈姆雷特》、《罗密欧和朱丽叶》、《李尔王》，如此举动恐怕也不完全明智。人们开始要求译者多一些准确性，少一些对公众的谄媚与讨好。他们希望看到但丁、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本来面目，看见他们穿的是自己的民族服装，带

① 该文发表于《现代人》1837年第1期。写于1836年底，其原因乃是由于夏多布里昂对弥尔顿《失乐园》的翻译（1836年于巴黎出版）在英国和法国的杂志上引起了争论。

有他们天生的缺点。甚至连这样一个许多世纪以来一直被大家公认的观点，即译者应该尽力传达原文的精神，而不是转述表面的词句，也遭到了反对者们强有力的驳斥。

如今（这真是闻所未闻的范例），法国第一作家[①]居然在**字对字**地直译弥尔顿。而且，他还宣称，如若可能的话，字对字的翻译将是他艺术的顶峰！一个法国作家，一个文学泰斗，居然有了如此的谦逊，这势必会使那些热衷于**修改式翻译**的人感到极大的震惊，想必亦将对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法国，弥尔顿是所有外国大作家中最为不幸的一个。且不谈那些粗陋拙劣的散文式译本，为此弥尔顿无辜地遭到了诽谤；也不论天主教神父德利尔的诗体译本，此人大刀阔斧地修改了他的明显缺点，而且毫不留情地将他修饰美化了一番。那么，现代浪漫派作家又是怎样从悲剧和长篇小说中将他的本来面目抹掉的呢？阿尔弗莱德·德·维尼，这位法国批评界毫不客气地将之与瓦·司各特相提并论的先生，他是怎样歪曲弥尔顿的呢？维克多·雨果，这巴黎公众的另一个宠儿，他又是怎样把弥尔顿展示给世人的呢？也许，读者们既忘记了《桑-马尔斯》[②]，也忘记了《克伦威尔》，因此，他们看不出维克多·雨果虚构的荒谬。现在，我们就把两部作品都列举出来，让每一个懂行的、头脑健全的人去对它们作出评判吧。

让我们先从那出悲剧谈起吧。它是那位具有天赋的人所创作的最为荒唐的作品之一。

我们将不去追寻剧情的发展，因为这出戏混乱、乏味、怪诞。我们只想让读者们看一看，弥尔顿，作为一个在当时还并不著名

① 指夏多布里昂。

② 《桑－马尔斯》，维尼的历史小说。

的诗人，但却已是一个以其辛辣大胆的雄辩而享誉欧洲的政论作家，他在这部悲剧中被塑造成了什么样子。

克伦威尔正在自己的宫中同装扮成卫斯理教徒的罗切斯特勋爵以及四个小丑们闲聊，在场的还有弥尔顿和他的向导（此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弥尔顿双目失明乃是后来的事情）。保护人[1]对罗切斯特说：

——现在就我们几个单独在一起，我想开开心：我让你们看看我的小丑。只要我们心情好，他们通常是很能逗人发笑的。我们都能写诗，甚至连我的老弥尔顿也能写诗。

弥尔顿：（懊丧地）老弥尔顿！对不起，阁下，我可比您年轻九岁呢。

克伦威尔：随便怎么都行啊。

弥尔顿：您出生在1599年，我则生于1608年。

克伦威尔：多好的记性！

弥尔顿：（激动地）　您是不是可以对我恭敬一点呢？我可是公证人兼市参议员的儿子哝。

克伦威尔：呵，你别生气——我知道你是位伟大的神学家，甚至还是个蛮不错的诗人，尽管比瓦伊韦尔斯和唐略低一筹。

弥尔顿：（自言自语）　略低一筹！多么冷酷的字眼！不过，等着瞧吧，人们会看到，上苍是否赋予我才华。后人会对我作出评价的。他们会理解我的夏娃，她堕入地狱之黑夜却犹如沉入甜蜜的梦乡；他们会理解亚当，他有罪，但却善良；他们还会理解那桀骜不驯的神灵，它主宰着洪荒，于绝

① 指克伦威尔。

望中显出崇高，在疯狂中显得深沉，他出自那熊熊燃烧的火湖，烈火用它巨大的翅膀扑打着它！我是一个富有激情的天才。我沉默不语，思考着一个奇异的想法。我活着就要思索，因为只有思索才能使弥尔顿得到慰藉：我也想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介于地狱、人间与天堂之间的世界。

罗切斯特勋爵：（自言自语） 他在胡扯些什么呀？

小丑之一：可笑的幻想家！

克伦威尔：（耸耸肩） 你的《偶像破坏者》是本好书，但你的魔鬼，就是那个利维坦……（笑）却非常糟糕……

弥尔顿：（咬牙切齿，愤怒地）连克伦威尔也在嘲笑我的撒旦！

罗切斯特：（走到他跟前） 弥尔顿先生！

弥尔顿：（没听见他的话，面向克伦威尔） 他说这话是出于嫉妒。

罗切斯特：（对着漫不经心听他讲话的弥尔顿） 坦白地说，您并不懂诗。您很聪明，但您却缺乏审美鉴赏力。告诉您吧，法国人在各方面都是我们的老师。去研究研究拉康，读读他的田园诗吧。让阿明达与梯尔西斯漫步在您的草地上；让她用浅蓝色的带子牵着一只小绵羊。可您却写夏娃、亚当、地狱、火湖！赤裸裸的撒旦，翅膀上的羽毛还被烧燎光了！若是您给他穿上精美的衣裳；若是您给他一个巨大的假发和一个缀有金球花的头盔，一件粉色的无袖上衣和一件佛罗伦萨的礼服，就像我前不久在一出法国歌剧中看到的那个身穿节日长衫的“太阳”一样，那倒是另一回事。

弥尔顿：（惊异地）你胡扯些什么？

罗切斯特：（咬咬嘴唇）我又忘乎所以了！我这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

弥尔顿：非常愚蠢的玩笑！

接下来，弥尔顿说道，治理国家不过是区区小事，用拉丁文写诗才叫了不起呢。过了一些时间之后，弥尔顿扑倒在克伦威尔的脚下，央求他不要追求王位。对于他的央求，保护人回答道，弥尔顿先生，政府秘书，你是诗人，在抒情的激奋中忘了我是谁人了。……

在这场既无历史真实，又无艺术真实的戏中，在模仿英国国王加冕仪式的愚蠢的劣作中，弥尔顿和一个宫廷小丑扮演了主要角色。弥尔顿在宣扬共和国，小丑在替“护国公”把手套拾起来……

瞧，弥尔顿被描述成了一个多么可怜的傻瓜和一个多么渺小的吹牛大王。可塑造此形象的那个人大概自己还没有看见，当他在贬低伟大亡灵的时候，究竟创造了什么！在这部悲剧的整个演出过程中，除了嘲笑和谩骂，弥尔顿别的什么也没听见。的确，在整场戏中，他从未说过一句有用的话。他扮演了一个老丑角，人人都鄙视他，谁也不注意他。

不，雨果先生！约翰·弥尔顿，克伦威尔的朋友和战友，极端的宗教狂热者，《偶像破坏者》与《为人民声辩》的严肃的作者，他绝不会是这副模样！他为克伦威尔写了具有预言意义的十四行诗：

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1]

这样一个人是不会用如此的语言对克伦威尔说话的。

[1] 原文为英文，引自《致克伦威尔将军》。

在严酷的日子里，一个流言蜚语的受害者，一个受到压制与迫害，在贫穷与失明的困境中却依然保持着灵魂的坚贞不屈，以口授的方式创作了《失乐园》的人，绝不可能成为淫荡的罗切斯特和宫廷小丑们的取笑对象。

如果雨果先生身为诗人（虽然他只是个二流诗人）竟会如此不理解诗人弥尔顿，那么，随便什么人都能轻易地想像，在他的笔下，克伦威尔会是一副什么样的面孔，须知他与克伦威尔简直毫无共同之处！不过，这与我们的话题无关。我们还是抛开粗陋的维克多·雨果和他那拙劣的戏剧，转而分析过于拘谨做作的维尼伯爵及其毫无特色的长篇小说。

阿尔弗莱德·德·维尼在他的《桑-马尔斯》中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弥尔顿的形象。这个形象是在以下情景中塑造的：

在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情妇，著名的玛莉娅·德洛尔姆家里，聚集着一帮廷臣和学者。斯居代里正在向他们解说他自己绘制的一张含有寓意的爱情地图。宾客们对耸立在“骄傲”河边的“美丽”要塞，对那“情书”的村庄和“冷淡”的港湾等等赞不绝口。大家都把词藻华丽的恭维话抛向斯居代里先生，只有莫里哀、高乃依和笛卡尔除外，因为他们当时不在场。突然，女主人把一位旅行途经此地，名叫约翰·弥尔顿的英国青年向大家作了介绍，并要他为客人们朗读几段《失乐园》。这很好啊；可法国人不懂英语，怎么能听懂弥尔顿的诗呢？很简单：把他要读的段落译成法语，抄写在一张张小纸片上，分发到每位客人的手中，弥尔顿朗诵，客人们跟随他读自己手中的纸条。可是，既然诗已经译成了法语，他又何需惴惴不安呢？也许，弥尔顿是一个伟大的朗诵家，要不然就是英语的发音太奇怪了？这些东拉西扯与德·维尼伯爵有何相干？维尼所需要的，是要弥尔顿在巴黎的上流社会中朗读自己的《失乐园》，好让法国的聪明人去嘲笑他，而不是去理解伟大诗人

的精神实质（自然，莫里哀、高乃依和笛卡尔除外），由此便出现了下面这样一个有趣的场面。

女主人拿起纸条，把它们分发给了所有的客人。

大家都坐好了，安静了。可他们并没有立刻说服这位外国青年开始他的朗读并从窗户边走开，因为他正站在那儿同高乃依谈话，而且似乎还谈得非常愉快。终于，他走到了桌边的圈椅跟前。他的身体好像很虚弱，可以说他是倒进圈椅，而不是坐进圈椅的。他把胳膊支在桌上，用一只手掩住了自己的双眼。这双眼睛大而富有表现力，但却半睁半闭着，不知是因为失眠还是因为流过泪，显得红红的。对他存着疑心的听众们高傲地，或者，至少是用一副保护者的神情望着他；另一些人则漫不经心地瞟着诗歌的译文。

他的嗓音开头有些嘶哑，但渐渐地变得清晰起来。很快，他诗兴大发。他那望着天空的目光显得愈加高远，犹如拉斐尔笔下的福音派教徒，因为灵光还映射在他的目光中。他用诗句叙述着人类的首次堕落，他呼唤着圣灵，呼唤着那认为所有的神殿和教堂还不及一颗纯洁诚实的心的圣灵，呼唤着那无所不知的，在时光诞生的那一刻就开始存在的圣灵。

人们在听这段诗的开头时还沉默不语，而当他读到最后一道思绪的时候，人群中已发出了轻微的抱怨声。他什么也没听见，他眼光迷离，犹如透过云层——他已陷入了他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他继续往下朗诵着。

弥尔顿讲到了地狱中的神灵，他被金刚石锁链铐在复仇的火焰上；他讲到了那神灵坠落的时间，这时间九倍于人间的昼夜；他讲到了永恒的牢狱中那可见的黑暗和火海，坠入火海的天使们正在扑腾翻滚；他那激昂的声音讲到了恶魔之

王的发言。魔王说：是你吗，在那福泽广被的极乐世界，你曾浑身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噢！你如何沉沦了！随我漂流吧……我们在天堂战场上的失利有什么关系？难道一切对于我们皆已丧失？我们保住了一切：不可折服的意志，复仇的决心，永不熄灭的仇恨，还有那绝不屈膝投降的勇气。难道这不是一种胜利？

这时，仆人大声禀报：蒙里夏尔先生与丹特尼格先生驾到。进来的二位向大家鞠躬，寒暄问候，惊动了在座的所有客人，最后他们终于坐下了。听众们借此机会开始了他们的窃窃私语。其中所能听到的，只有对这无聊把戏的埋怨和责难。一些聪明但却过于怀古的人叫道，他们听不懂，这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力（他们没想到他们说出了真情），于是他们以这虚伪的谦逊为自己引来了一片赞扬，为诗人则招来了一片指责——真是一举两得。另一些人则说这是在亵渎神圣。

被打断的诗人双手掩面，把胳膊支在桌上，以免听见这片杂乱的批评与赞扬之声。这时，有三个人走到他身边，他们是：某位军官、波科勒和高乃依。高乃依对弥尔顿耳语道：

——我劝您还是换一个题目。您给我们描述的那个场景对于您的听众们说来，真是太高深了。

弥尔顿不顾预定朗读的地方已译成了法语，也不管是否应该按顺序朗读，在记忆中搜寻着他认为更容易对听众产生作用的段落，也不考虑他们是否听得懂。可是，由于某种奇迹的作用（德·维尼无法解释的奇迹），所有的人居然全听明白了。

德巴罗认为他的诗过于甜腻肉麻。斯居代里认为他的作品干巴巴，冷冰冰。玛莉娅·德洛尔姆听了对亚当原始状态的描述大为动心，莫里哀、高乃依和笛卡尔一个劲地恭维他……

也许我们完全弄错了，也许弥尔顿在途经巴黎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得像个外乡来的卖艺人，在淫荡女人的家里用在场者谁也听不懂的语言朗诵诗歌，装腔作势，炫耀卖弄，一会儿“手掩双目”，一会儿“举目仰望天花板”，为的是让上流社会解闷开心。也许，他与德蒂、高乃依及笛卡尔的交谈并不是庸俗无聊、矫揉造作的废话。也许，他在上流社会中扮演了一个体面的角色，一个谦逊、高尚，有良好教养的青年的角色。

知道了维·雨果和德·维尼令人惊异的虚构之后，您还想看看另一位作家随意涂抹的画面吗？请读一读《伍德斯托克》[①] 中一个人物与弥尔顿在克伦威尔书房里会面的那段情形吧：……

法国小说家必定不会对这平淡无奇的描述感到满意。在他的笔下，正在从事公务的弥尔顿必定会沉溺于诗人的幻想中，在某份报告的页边上胡乱涂写了几行《失乐园》的诗句；克伦威尔发现后，把自己的秘书大骂一通，说他是个蹩脚诗人，说他瞎胡扯等等。于是，效果就出来了，这效果是可怜的瓦·司各特根本不可能想到的。

夏多布里昂出版的译本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法国青年作家们的罪过。他们是那样天真，但却又如此残酷地辱没了伟大的亡灵。我们已经说过，夏多布里昂几乎是字对字地直译弥尔顿。他翻译得如此贴近原文，且正好卡在法语句法允许的范围内。这工作吃力不讨好，它未能受到大多数读者的垂青，至多能得到两三个行家的赏识！但是，新译本是不是成功呢？夏多布里昂发现，尼扎尔是一个毫不留情的批评家，他在一篇细致机敏的文章中既猛烈地抨击了夏多布里昂所选择的翻译手法，也批评了译文本身。毫无疑问，夏多布里昂虽然竭力一字不差地传达弥尔顿的原意，但

① 《伍德斯托克》，英国作家司各特的作品。

他却没能在自己的译文中保证意思与表述的准确性。一字不差的直译从来不可能是正确的。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固定用语，有自己约定俗成的修辞手段，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其中一些是不可能用完全对等的词语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我们就以头一个句子来作例证吧：Comment vous portez vous?（你身体怎样?）；How do you do?（你好。）试试看，请把它一字不差地译成俄语。[①]

俄语是一种其固定用语和表达方式十分灵活多样，在与其他语言的关系上又非常善于兼收并蓄的语言。既然连这样的语言都不适于逐字生搬硬译，那么法语，这种如此拘泥于老习惯，如此喜欢老规矩，如此容不得异国语，甚至于自己同族语的语言，又怎能经得这样的试验？更何况这是在同弥尔顿的语言交锋。须知，弥尔顿乃是集诸多特点于一身的诗人：典雅考究，质朴浑厚，晦涩、费解、极富表现力，乖张怪僻，大胆出格以至不顾情理。

《失乐园》的翻译乃是一次商业投机。当代最优秀的法国作家、一代文人的导师、曾经一度的首席大臣、多次出使的外交使臣夏多布里昂，在晚年翻译弥尔顿不过是为了一块面包。无论他预期的工作完成得怎样，这份劳作及它的目的仍给这位老者带来了荣誉。一个只消对自己的人格稍微压压价就能心安理得地享受新政府的慷慨，享受权威、荣耀和财富的人，却选择了诚实的贫困。夏多布里昂离开他那娓娓动听的声音还在其间久久回荡的上院，朝小书店走去，手里拿着将要出售的书稿，胸中却怀着不可收买的

① 顺便说一句，前不久（好像是在《望远镜》上）有人在批评一篇译文的时候，大概是想炫耀一下自己的意大利语知识，对译者提出了责问，问他为何要在译文中漏译 battersi la guancia—“打自己的耳光”。Battersi la guancia 意为“懊悔”，别的译法则毫无意义。——普希金原注

良心。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批评界还能说什么呢？他们还能用苛刻的批评让高尚的劳动者感到难堪，像小气的买主那样对他的货物挑剔指责，说三道四吗？况且，夏多布里昂根本没有必要去迁就他们：他在他的译著后附上了两卷自己的著述，它们如此出色，就如同他以往的所有作品一样，批评界尽可以苛刻地寻找这些著作中的缺点，想多苛刻，就多苛刻。文笔优美毋庸置疑，篇篇锦绣、字字珠玑，堪称大作家鼎盛时期的杰作，这一切将抵消他译著中的所有缺陷，拯救它于读者的不屑。

英国的批评家们对《论英国文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它太肤浅，太粗糙。由于误信了标题，他们便要求夏多布里昂作出学术性的评论，要他完全熟悉只有他们自己才十分清楚的东西。但是，在这篇绝妙的述评中，我们需要寻找的完全不应该是这个。搞学术评论夏多布里昂是不自信的、胆怯的和不知所措的。他所谈论的，是那些他本人并未读过的作家。他只是在听了别人谈论这些作家之后，顺带作了一些评论，借此逃避图书编目学家的枯燥差事。但是，从他的笔下却不断地涌流出充满灵感的篇章字句。他总是要把批评分析忘在一边，任意发挥自己对伟大历史时代的思考与联想，把它同自己亲身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在那些与英国文学史毫不相干，但却属于《论英国文学》之精华的段落中，有许多恳切的精妙之语，坦诚真挚、朴实耿直。(有时甚至幼稚，但永远具有魅力。)

《英国文学史》的开篇对中世纪作了概括而笼统的描述，该描述成为了夏多布里昂这部著作的引言：

> 政治秩序以外的社会秩序乃是由宗教、社会意识及物质生产构成的。任何一个民族在发生严重灾难和重大事件的时候，僧侣在祈祷，诗人在吟诗，学者在思考，画家、雕塑家

在创作，建筑师在营造，工匠在做工。只看他们，你便看到了人类的基础，你便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静止的，但看上去却与政治社会毫不相干的世界。然而，僧侣在自己的祷词中，诗人、画家、学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工匠在自己的劳作中，却不时地揭示着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他们身上反映着历史事件的撞击，由于这些撞击，更加迅急、更加大量地涌现出他们的抱怨，他们的汗水，以及他们灵感的赠品……

中世纪是一幅奇怪的图画，它就像由一个想像力丰富而混乱的人创造出来的作品。在古代，可以说，各个民族都产生于各自的发祥地，某种原始精神渗透和反映在一切事物之中，习俗与民法乃是一回事。中世纪的社会则是由成百上千个不同社会的残片构成的。罗马文明和异教信仰都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留下了各自的痕迹；基督教亦给它带来了教义和辉煌；法兰克人，哥特人，勃艮第人，盎格鲁-萨克逊人，丹麦人及诺曼底人，都保留了本部族所特有的风俗和习惯。各种所有制、各种法规相互混杂……各种形式的自由与各种形式的奴役相互冲撞：国王的君主自由，豪门显第的贵族自由，僧侣的个人自由，乡间的普遍自由，城市、法庭、手工业阶层和商人阶层的特殊自由，人民推选代表的自由，罗马的奴隶制，野蛮民族的徭役，依附于土地的农奴制。由此便产生了与什么都不相适宜的风俗习惯。它们相互冲突，只能靠宗教这根纽带把它们拉扯在一起。从表面上看，似乎各个不同的、毫不相干的民族都和睦地生活在同一个政权下，靠近同一个祭坛。

《伊戈尔远征之歌》[1]

《伊戈尔远征记》发现于 A·И·穆辛-普希金伯爵的私人藏书之中，于1800年出版问世。1812年，原手抄本毁于火灾。据见过此手抄本的行家们说，手抄本所采用的字体为15世纪的简化多角体。最早的出版人为此书附上了现代俄语译文。该译文从总体上讲是令人满意的，尽管它的某些地方还晦涩难懂，甚至根本不可理解。此后，又有许多人竭力对它进行诠释。虽然在类似的研究中后来者往往居上（前辈的错误与发现总是在为后人开辟和扫清道路），但是第一种译文至今仍然是最佳版本，因为参加翻译的人员都是真正的大学者。其余的诠释者不过是用想当然的修正和毫无根据的猜测去替换那些意义不明的用语罢了。我们应该感谢卡拉姆津，在《俄国史》一书中，他只是顺带解释了几个疑难问题，结果却成了最为重要的诠释。

一些作家怀疑这部古代经典诗作的真实性，挑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赝品可以侥幸地蒙蔽无知的人们，但却逃不过行家的眼睛。查特顿给华尔浦尔寄去了几首“老修士罗利”的诗，可华尔

① 该评论写于1836年初。

浦尔并没有受骗上当。[①]约翰逊亦当即识破了麦克菲森。[②]然而，无论是卡拉姆津还是叶尔莫拉耶夫，无论是A·X·沃斯托科夫还是霍达科夫斯基，他们都从未怀疑过《伊戈尔远征之歌》的真实性。伟大的批评家施莱格尔在未曾亲眼目睹《伊戈尔远征之歌》的时候，还怀疑它是否真实。但当他读完这篇史诗以后，便断然宣称：他认为此书的确是古代原作。他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对此作出论证。在他看来，此书的真实性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原作者本人的文字以外，没有别的证据。史诗的古风证明了它的真实性，这种古风是无法伪造的。在我们18世纪的作家当中，谁人具有足以写出如此杰作的才华呢？卡拉姆津？可卡拉姆津并不是诗人。杰尔查文？可杰尔查文连俄语都不精通，何况《伊戈尔远征之歌》的语言。其他人的诗全部加在一起，还不及雅罗斯拉芙娜的哭诉以及对战争和逃亡的描写更富诗意。有谁会想到要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大公于很久以前进行的，而今已模糊不详的远征作为诗歌的题材呢？有谁能在自己诗歌的若干地方如此巧妙地运用人们后来才从古代编年史中发掘出来，或从其他斯拉夫语中查找出来的词汇呢（这些词汇在这些斯拉夫语中至今仍然常用）？这可要求通晓所有的斯拉夫语呀。即便此人懂得所有的斯拉夫语言，可如此的大杂烩难道合乎自然吗？如果真有荷马其人，他也被游吟诗人们歪曲得不成样子了。

罗蒙诺索夫并没有生活在12世纪。他的颂诗虽然是用俄语写成的，但其中已夹杂了一些《圣经》语言，因为《圣经》总是摆

① 查特顿（1752—1770），英国诗人，诺曼人占领时期的抒情叙事诗人。他将自己的叙事诗谎称为15世纪修士罗利的诗。英国一杂志评论家、历史学家华尔浦尔揭穿了查特顿的骗局。

② 麦克菲森于1762年出版了莪相的史诗。英国批评家约翰逊对史诗的真实性首先表示了怀疑。

在他的面前。但是，在罗蒙诺索夫的作品中，您却找不到波兰语、塞尔维亚语以及伊利里亚、保加利亚、波希米亚、摩尔达维亚等其他斯拉夫的语言。

《斯维雅托斯拉夫之子、奥列格之孙——伊戈尔远征记》

衮衮吾兄兮，
济济诸弟；
容我放歌以颂伊戈尔之苦战兮，
述彼斯维雅托斯拉维奇。
颂歌若倚先民之古韵兮，
吾恐格调之未得其体。
因背鲍扬之神思兮，
取法乎今日壮士歌之信实。

§1. 所有为《伊戈尔远征记》作诠释的人都将此段译作："朋友们、弟兄们、众兄弟，若我们唱起沉痛的悲歌，讴歌伊戈尔，伊戈尔·斯维雅托斯拉维奇的远征，用那古老的格式，用那古老的文体，用那古老的语言，这岂不得体、更好、适当、极好吗?"

但是，在古斯拉夫语中，语气词 ли（是否、吗、或）并不总是类同于拉丁语中的 ne，即并不总是表示疑问。有时 ли 可表示 только（唯），有时则表示 бы（若、则），有时又表示 же（可真是）。在塞尔维亚语中，它至今还保留着这些意义。在俄语中，如果支配 ли 的词为否定词 не（不），那么 ли 要么为区分连接词，要么为疑问词。在诗歌中，语气词 ли 有时则无任何意义，它的使用仅仅是为了押韵，就如同语气词 и、что、а、как、уж、уж как 一

样（特列佳科夫斯基观点）。[1]

在《远征记》的另一处，ли 的用法与此处完全相同，但所有的译注者都认为那是抄写者的笔误，于是将它译作了肯定词而不是疑问词。此处恐怕亦应作同样处理。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话的意义。按照译注者们的观点应该作这样的理解：诗人说，我们岂不该按古代的风格来歌颂伊戈尔王吗？让我们以当今壮士歌的体式（即按新的体式）——而不是按鲍扬的构想（即不按古代风格）来歌唱。多么明显的矛盾！[2]如果我们认为语气词 ли 在这里没有疑问意义，那么结果就会是这样：弟兄们，用古代文体吟唱颂扬伊戈尔·斯维雅托斯拉维奇的悲歌是不恰当的；要按今日壮士歌的体式来吟唱这首颂歌，而不是按照鲍扬的构想。诗人们向来不喜欢别人指责他们仿效他人。《伊戈尔远征记》那位不知名的作者在叙事长诗的开头亦没有忘记向大家声明，他的诗将会按照他自己的新体式，而不是沿袭古人鲍扬的体式。动词 бяшеть 证实了我的观点：它使用的是过去时形式（后接名词变格不规则，此例可在编年史中见到），要求假定语气词：Не причично было бы（若……则不得体）。假使是疑问，那么便要求用现在时或将来时了。

若先知鲍扬欲吟唱兮，

---

① 俄语里还保留了这样一个词，在该词中，ли 虽位于 не 后，却没有疑问意义，这就是 неже-ли（较之、比较）。неже 一词曾用于所有斯拉夫语中，亦见于《伊戈尔远征记》："луце же потяту быти，неже полонену быти"（与其做俘虏，不如战死疆场）。——普希金原注

② 我们十分理解，为什么 A·C·希什科夫一定要坚持这个观点。他，《论古代文体与近代文体》的作者，肯定不愿看到：在《伊戈尔远征记》作者的那个时代，人们认为自己时代的壮士歌优于古体诗文。——普希金原注

思驰八极以枝派。
忽若灰狼之奔大荒兮，
又若苍鹰之翔云霾。——

§2. 我不敢断定，诗人于此究竟是在指责鲍扬还是在赞扬鲍扬，但无论怎样，诗人引用此文的目的乃是要举例说明，古人是以何种形式作诗吟唱的。我认为，此处有笔误，甚至被人改动过，虽然这改动不大：思驰八极以枝派——这里漏掉了 славием 一词，因为只有使用这个词，此比喻的意思才能够完整。下文中便出现了该词。①

咏及往昔之纷争兮。

§3. 没有一个诠释者将此处释译得令人满意。这里所谈及的乃是鲍扬，整个句子乃是上一个思绪的继续：当讲起古代纷争战乱的故事（“纷争”意为“战乱”、“战争”，而不是如某些人所释译的“内讧”。“内讧”是一个合成词）时，他放出了……。“咏及往昔之纷争兮，乃纵鹞鹰以十数。鹞鹰切切以嘈嘈兮，纷纷击于素鹄。”也就是说，10只鹞鹰被放出去捕捉天鹅，这意味着10根手指头按在了琴弦上。诗人乃是在解释古代歌手那寓言一般的语言，而这解释又是如此精到，就如他举作例子的这个寓言一样绝

① 韦利特曼先生将此处译为：“吟颂往昔的真实，而非鲍扬之构想，他的思绪涌向高处，如同汁水缘木而上。”真是令人惊异！——普希金原注

妙。A·C·希什科夫将此处与叙事诗《阿贝尔之死》的开篇作了一番比较①。亚力山大·谢苗诺维奇的诠释是稀奇有趣的（第7卷，第43页）："因此，应该这样认为：在古代，鹰猎不仅是一种消遣，而且是英雄们用以争得荣誉的一种手段，抑或还可用于裁决英雄们当中谁应享有最高荣耀的争端。也许，在战场上出类拔萃的将帅及王公们，为了比较谁的荣耀更为显赫，便各自带上猎鹰出猎，将它们放出追捕天鹅。谁的猎鹰最凶猛，最先捕到天鹅，谁便首先受到大家的恭贺，被认作优胜者。"

波查尔斯基先生不同意这一观点。② 他认为以猎鹰来证明自己用鲜血换来的优先地位，这有失俄罗斯王公的尊严。他认为：放鹰的人不是王公，而是诗人。而这一古老礼仪的由来，据他认为，乃是出于诗人们的谦逊，因为他们不愿在同行面前显露自己的锋芒。A·C·希什科夫则从Я·波查尔斯基的这一见解中窥见了"极端的荒谬"和"可怜的自尊"（第11卷，第388页）。令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波查尔斯基先生并未对此进行反驳。③

衮衮吾兄兮，济济诸弟，
且听我歌咏，

---

① 可是，在格斯纳先生矫揉造作的散文诗与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呢。——普希金原注

② Я·О·波查尔斯基于1819年出版了附有诠释的译本《伊戈尔·斯维雅托斯拉维奇，北方诺夫哥罗德封邑公爵远征记》。该译本及其诠释引起了许多《远征记》研究者的非议，其中包括A·C·希什科夫。

③ 普希金有所不知，波查尔斯基曾在《祖国之子》杂志（1819年第33期）上发表文章，正是针对这个问题回敬了《俄罗斯残疾人》（1819年第157—161期）的批评。

吾将上溯古时之弗拉基米尔，
降而及于伊戈尔公之传闻。

（由此便能确定《伊戈尔远征记》的写作年代。）

伊戈尔公兮，伊戈尔公，
以其韧之弓而张其智之弦也。

（绷紧、拉直、张紧、经受、体验。波查尔斯基译作“束”，最初的诠释者则译为：以坚韧绷紧理智之弦）。紧张如弓，锋利如剑——这两个隐喻乃出自同一典故。

伊戈尔公兮，伊戈尔公兮，
奋其斗志而率其骁旅也。
彼身系罗斯之安危兮，
率师将袭波洛夫人之莽原。
彼举头望烨烨之赤日兮，
是时赤日晦暝以昏暗。
彼低头阅赳赳之将士兮，
将士皆咫尺不辨。
“众兄弟兮，诸将士兮，”
公乃对众开言——
“宁将热血洒荒郊兮，
岂束手就擒于万里腥膻”。

——与其做俘虏，不如战死疆场。

"吾兄弟兮，
策尔轻骑毋卸尔鞍；
且观碧波涟漪兮，
直捣静静顿河岸。"

把日食看作灾难的征兆，这种迷信曾经是人类共有的。

志拳拳冀饮马顿河兮，
睿智终蔽于热望。
心耿耿欲守土卫国兮，
竟忘乎日蚀之不祥。

——此处词语难以理解。最初的出版人译作："大公产生了一个念头，要蔑视（不祥的）征兆，要体验站在大顿河岸边（的快感）。""蔽之以 печаль（忧愁）"有好几个意思：使…忧愁，使…心烦意乱，使…压抑。大公感到，热望与不祥之兆使他悲哀、沮丧。欲望与愁绪在大公的心中已经沉寂。不祥之兆遏（止）住了他要饮马顿河的热望。"我想，"他说：

"吾宁折戟以沉沙兮，
弃尸毗邻波洛夫之草莽。
抑借吾之盔充吾之勺兮，
抚顿河之波以尽觞。"

"嗟尔太古之歌鸲兮，
罗斯之先知鲍扬。
吾祈汝放声颂诸征战兮，

腾跃于幻想之枝头干上。”
乘汝之思以极云霄兮。
以穷当今荣耀之始末。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透过词藻华丽的赞美，流露出了作者的嘲讽。）

纵汝之情循彼特罗扬之古道兮，
越莽原而临高岗。

最初的出版人说：“在《远征记》中，曾四次提到‘特罗扬’，即‘特罗扬之古道’，‘特罗扬时代’，‘特罗扬之疆土’与‘特罗扬之第七世纪’。但究竟谁是特罗扬则无从考证。”（希什科夫版，第5页。）其他诠释者则没有仿效这谦虚谨慎的榜样，他们不想把疑难之处空在那儿老是悬而不决，尽管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贯穿整个比萨拉比亚，蜿蜒排列着一座座土岗，这是罗马时期防御工事的遗迹，被人们称作“特罗扬壁垒”。于是，诠释者们找到了根据，硬说《伊戈尔远征记》四次提到的那个无人知晓的特罗扬不是别人，正是罗马皇帝。那么，特罗扬古道是否也可被看成特罗扬壁垒呢？须知，稍后我们便会读到（见希什科夫版第14页）：

踏上特罗扬之疆土兮，
缘顿河以临大海之碧波。

那里哪有什么比萨拉比亚？“在达吉亚，至今仍能见到特罗扬

的遗迹，多瑙河沿岸斯拉夫人的后代对此应该有所了解。”（韦利特曼）为什么？

> 汝若颂伊戈尔（奥列格之孙）之远征兮，
> 此曲实吾之所度：
> “非风暴之呼呼兮，
> 卷鹰隼以越平芜。
> 非寒鸦之喊喊兮，
> 趋顿河而抵江渚。”
> 汝维列斯之苗裔兮，
> 或将另制新曲！

诗人重复着鲍扬的思路，他转而向鲍扬问道：“或许，先知鲍扬，维列斯的子孙，你莫非这样歌唱？”

> “苏拉河兮彼岸，
> 彼岸战马兮嘶鸣。
> 基辅城兮捷报闻。
> 诺夫哥罗德兮城头，
> 城头频频兮号角声。
> 普季夫尔兮扬羽旌。
> 伊戈尔公兮勒马，
> 勒马以待兮待至亲。”

现在，诗人说的是自己的话，不再是按照鲍扬的体式，而是按当时壮士歌的体式了。应该说，较之古代歌手寓言般的叙述，这生动流畅的描写毫不逊色。

“猛犍兮猛犍，
彼猛犍兮符塞伏洛德，
乃言之于手足之亲：
伊戈尔兮，伊戈尔，
吾侪本即属同根，（皆斯维雅托斯拉维奇）
我仅有之兄弟，
吾唯一之光明。
速备汝千里骏马，
库尔斯克城下吾轻骑皆装备齐整。”

（备——在这里意指已知的，这个意义至今还保留在伊利里亚斯洛夫人的语言中。再往下，我们将会读到：波罗维茨人沿着“未备”的——未知的——路线奔跑。如果说“未备”意味着“未铺砌的”，那么，“已备”的马又意味着什么呢？）

库尔斯克子弟悉谙于征战，

（这里是在用另一种表达方式重复同一个概念。这证实了我前面的论述。这是史诗中最为古老的形式之一。请参看教会经书。）

众武士皆乃号角声里所诞生。

（韦利特曼先生写道：“‘武士’指‘一支部队的长官’、‘领班’。”百姓指一般的农民、农夫。倘若老爷们要纠正不公道，农民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①]

---

① 原文为斯洛文尼亚文，摘自穆罗柯编《斯洛文尼亚语——德语词典》。

贞德的最后一个亲属[①]

去年，即 1836 年，一位杜利斯先生（Jean-Francois-Philippe Dulys）在伦敦去世了。他乃是著名奥尔良少女贞德之胞兄的后代。杜利斯先生于法国大革命初期移居英国。他娶了一个英国女子，却未留下子嗣。在遗嘱中，他将妻子的一个亲戚定为了自己的继承人。此人乃是爱丁堡的书商，名叫詹姆斯·贝尔。人们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查理七世、亨利三世及路易十三的亲笔证书，这些证书证明了达克·杜利斯（d'Arc Dulys）[②]的世袭贵族身份。所有这些证书均被当众拍卖，且售价十分高昂。以同样高价拍卖的，还有一份非常有趣的手稿，这便是伏尔泰写给已故杜利斯先生父亲的一封信。

看起来，老杜利斯是位善良的贵族，很少对文学发生兴趣。可是，大约在 1767 年，他听到一个消息，说某位伏尔泰先生出版了

① 发表于普希金逝世以后出版的《现代人》杂志（1837 年第 5 期）。约写于 1837 年 1 月初。在 A·屠格涅夫的日记中，1837 年 1 月 9 日这一天有如下记载："我来到普希金家，他把他摹仿伏尔泰及贞德后人的 pastiche（赝品）读给我听。"因此屠格涅夫把这部作品称作"赝品"，并认为，事实上，文中提到的所有情况只不过是普希金的虚构。有可能他是想把这件事刊登在《现代人》上，但他的意图究竟是要故弄玄虚，还是想以此作为消遣，却无从考证。

② 达克为贞德的姓，按照发音，贞德又译作让娜·达克。

一部关于奥尔良少女的作品。此书售价十分高昂，可杜利斯先生还是下决心买了一本，因为他想从中看到他那位著名曾祖母的确凿真实的历史。可是，当他拿到这本出版于荷兰，仅有十八页，加了些令人惊讶的插图的小册子时，他对这极不体面的做法感到十分惊诧。一怒之下，他给伏尔泰写了一封信。此信的抄件亦是在已故杜利斯的文件中找到的。（此信及伏尔泰的回信均已在《晨报》上发表。）

先生：

前不久，我有机会以6路易的价格购得了一本由您撰写的1429年奥尔良围困史。这部作品中有许多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是任何一个对法国历史略知一二的人都不会原谅的。不仅如此，这本小册子还充满了对查理七世国王，对被人们称之为奥尔良少女的贞德，对阿丽丝·索雷尔，对拉特里米勒、拉吉尔、博德里居尔先生以及对其他高尚显要人物的毫无根据的诽谤。在我的城堡（图尔内比，都兰肖蒙领地）中保存着几份证书。从我附上的这些证书的抄件中，您将会清楚地看到：贞德是费隆领主吕卡·达克（Lucas d'Arc，seigneur du Feron）的胞妹。我乃是费隆领主吕卡·达克的嫡裔。因此，我认为，我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求您弥补您的过失，为着您放纵自己，出版了关于那位奥尔良少女的无礼的、恶毒的和具有欺骗性的记述。为此，先生，我要请您告知我，您将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尽快了结此事。

谨此……

虽然这件事情有些可笑，可伏尔泰却没敢把它当儿戏。他担心会由此引出一场风波，说不定，还会招来爱慕虚荣的贵族的长剑。因此，他立即发出了这样一封回信：

先生：

您惠赐于我的这封书信，我乃是躺在病榻上收到的。我已有近8个月的时间没下过床了。看来，您还不曾知悉，我是一个被疾病和痛苦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可怜老头。我不是一个慓悍勇猛的骑士，而您却是他们的后裔。我能够向您证明：我从未以任何方式参加编写您在信中向我提到的那本放肆无礼的诗体史书（l'impertinente chronique rimée）。欧洲到处都充斥着愚蠢的印刷品，而公众则慷慨地把它们强加在我的头上。大约在40年前，我曾出版过一本名为《亨利亚德》的史诗。在历数为法兰西带来过荣誉的英雄时，我不揣冒昧地对您那位著名的远亲（votre illustre cousine）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这勇敢的女骑手，
你使英国人蒙受耻辱，你是主权的支柱。①

这就是我所有作品中，唯一提到那位拯救了法兰西的不朽女英雄的地方。令我遗憾的是，我没有把自己的拙才用来赞美上帝创造的奇迹，而是为满足愚不可及、忘恩负义的公众耗费了自己的精力。

先生，我为自己能成为您恭顺的奴仆而深感荣幸。

Voltaire, gentilhomme de la chambre

① 原文为法文。

du roy

法国国王宫廷侍从**伏尔泰**

1767年5月22日

一位英国杂志主办人在发表这两封书信时，作了如下的评论：

贞德的祖国馈赠给贞德的命运可真是令人吃惊。当然，我们应该与法国人共同分摊审判和处死贞德的耻辱。不过英国人的野蛮行径尚可用时代的偏见来为其辩解，用受到侮辱的民族自豪感被激起而为之开脱，因为这自豪感硬把牧羊少女的功劳归咎为妖孽的作祟。那么，请问，法国人的怯懦和忘恩负义又该用什么来解释和开脱呢？当然，不能用害怕妖孽来开脱，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怕妖孽。我们至少还为纪念光荣的少女做了点什么吧。我们的桂冠诗人把初次萌发的，还未被收买的纯洁灵感献给了她。[1] 英国为她的最后一个亲眷提供了栖身之地。那么，法兰西又是如何去清除那玷污了它历史上最为令人忧伤的一页的血污的呢？不错，贵族头衔已颁发给了贞德的亲属，可他们的后代却在默默无闻之中活得像蝼蚁一般。从查理七世到查理十世，在法国国王的宫廷中见不到一个达克或是杜利斯。现代史上已经没有比奥尔良女英雄的生与死更为动人，更富有诗意的史实了。而伏尔泰，这位法兰西民族理所当然的代表，又借此题材搞出了什么名堂呢？既然他命定真该作诗人，他必然会把灵感用在这上面！他对着奄奄一息的篝火，用撒旦般的气息吹燃了余烬之中隐隐

① 桂冠诗人指骚塞，他作有史诗《贞德》(1796)。

欲燃的火花，像喝醉了的野人，[1] 围着篝火手舞足蹈。他就像罗马的刽子手，一面对那少女进行致命的折磨，一面大肆谩骂。桂冠诗人的叙事长诗在虚构臆造方面自然比不上伏尔泰的叙事长诗，但骚塞的作品乃是诚实人的劳动成果，乃是高尚灵感的成果。需要指出的是，在法国处处被敌对者和嫉妒者包围，每跨一步都会遭到恶毒攻击的伏尔泰，在他那罪恶的叙事长诗问世的时候却几乎没有遇到一个谴责者，连他最凶恶的敌人都被解除了武装。所有的人都怀着赞赏的心情接受了这本书。然而，在这本书中，对于一切被视作人和公民最神圣的东西的藐视，已发展到了极为恬不知耻的程度。谁也没有想到要站出来维护自己祖国的荣誉。善良诚实的杜利斯的呼吁即便在当时能够为人所知，亦只会引起不绝于耳的哈哈声，不仅在道利巴赫男爵和若弗林先生充满哲学气息的客厅里，亦在拉基尔和拉特利姆里耶[2]后代的古老大厅中。可悲的时代！可悲的民族！

① “像喝醉了的野人”这责骂正是当初伏尔泰在《塞米拉米达》的序言中给予莎士比亚的评价，他在谈到《哈姆雷特》的时候说：“可以认为，这部作品乃是一个醉酒野人的想像力的产物。”

② 拉基尔和拉特利姆里耶，《奥尔良少女》中的历史人物，法国贵族的代表。拉基尔曾与贞德一道围攻奥尔良，后来又力图营救被英军俘虏的贞德；拉特利姆里耶是查理七世的大臣，曾是贞德的反对者。

历年札记与箴言[①]

只有革命家，如米拉波和彼得，才会喜欢俄罗斯，这就如同只有作家才会喜欢俄罗斯语言。

对于俄罗斯和俄罗斯语言来说，一切都有待创立。

（1823年）

*

在雕塑某位名人的半身像时[②]，托尔瓦尔德森为主人的脸部感到惊异，因为那张脸虽然英俊，但五官的分布却有些奇怪——上半部阴郁严厉，下半部却总是露着微笑。这使托尔瓦尔德森感到高兴：

一张愚蠢的脸。[③]

（1828年）

① 大部分在普希金生前都未曾发表。这些札记写于各个不同的年代（主要是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普希金本人曾在1830年发表过其中的4篇，其余的则是在他身后不同时期陆续发表的。

② 指1820年雕塑的亚历山大一世的半身像。

③ 原文为意大利文。

*

我们有了文学，但还没有批评。我们的杂志评论家们互相指责谩骂，都把对方说成是“浪漫主义者”，就像老太太们把浪荡公子骂作共济会会员和伏尔泰主义者一样——其实她们既不知道谁是伏尔泰，也不知道什么是共济会。

（1829 年）

*

法国批评家对浪漫主义有自己的理解。他们把一切带有感伤或幻想印迹的作品都归作浪漫主义。某些人甚至把新造词语和语法错误也称为浪漫主义。于是，安德列·谢尼耶，这个灵魂中浸透了古代精神的诗人，这个连弱点亦是源于想要把古埃及诗歌的格律搬到法语里去的诗人，也被他们列入了浪漫主义诗人的行列。

（1830 年）

*

第一个倒霉的倾慕者尚能激起女人的幽怨，再后来的要么能勉强引起她的注意，要么只能为她效力……同样，在交战的初期，第一个受伤的人使人产生难过的感觉，消耗掉我们的怜悯心。

（1830 年）

*

在爱情消逝的那个时刻，我们的心仍然沉湎在对它的回忆之中。同样，拜伦笔下的角斗士既已决意去死，可他的思绪却仍在故乡的多瑙河两岸盘旋游荡。

（1830 年）

*

尖刻的笑话并不是最后的判决。×××说，我们拥有三部俄罗斯史[①]：一部是为**客厅**写的，另一部是为**旅店**写的，还有一部是为**劝业场**写的。

（1830 年）

*

在莎士比亚的一部喜剧中，一个名叫奥德莱的村姑曾问过这样一句话："诗是什么？是件**实在的**东西吗？"1830 年，莫斯科的某份杂志发表了一篇评论浪漫主义诗歌的文章。[②] 在这篇评论中，我们见到的不正好是这样一个问题吗？只不过这个问题是以另一

---

① 指卡拉姆津的《俄国史》、格林卡的《俄罗斯史》和波列沃依的《俄罗斯人民史》。

② "一个名叫奥德莱的村姑"引自莎剧《皆大欢喜》第 3 幕第 3 场。"一篇评论浪漫主义诗歌的文章"指 H·纳杰日金的《论对浪漫主义诗歌的滥用和歪曲》，《欧罗巴通报》从 1830 年第 1 期开始刊载该文。在这篇评论中，纳杰日金向普希金发起了不指名的攻击。

种形式提出来的，非常注重辞令罢了。

(1830年)

*

弥尔顿常说："读者数量不多，我亦能感到满足，只要他们都能真正理解我就行。"诗人这一高傲的愿望在我们时代也时常被一些人挂在嘴上，只不过略微有些改动罢了。我们的一些同时代人一个劲地或公开或私下里开导我们："读者数量不多，我们亦能感到满足，只要买主多就行。"

(1830年)

*

《白鼬》[1] 登载了一条来自北京的消息，说某位满大人下令用乱棍杖笞某报人。该报出版人指出：这事让满大人蒙受耻辱，对那个报人的身体则有好处。

(1830年)

*

翻译家乃是教育的驿马。

(1830年)

① 《白鼬》，彼得堡出版的法文报。

*

嫉羡乃是争强好胜的孪生姊妹，因此，它属于善的范畴。

（1830 年）

*

我们的批评多半是由杂志主办人在承担，即由承办人[1] 在承担。这些人精通自己的业务，但他们不仅不是**批评家**，甚至还不是文人。

在别的国家，作家写作要么是为着公众，要么是为着少数人[2]，在我们国家，为少数人写作是不可能的，应该为自己写作。

（1833 年）

*

Л先生常说：对于某些文学团体来说，若有一份标明何人有何作品的成员名单，那么这份名单便是绝妙的讽刺作品。

（1833 年）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这些少数人怀着极大的嗜好研究过新的作品之后，便对它宣布判决。于是那些不归公众评判的作品便这样在公众的心目中获得了应该属于该作品的价值和地位。——普希金原注

*

语法并不能规定语言的规律，但它却能解释和确定语言的常用规则。

（1833 年）

*

别把在午餐上就能吃完的东西留到晚餐上去吃。

准时是厨师的礼貌。[①]

文明人的胃具有一颗善良之心的优秀品质：敏感，知恩。

（1834 年）

*

组成斯拉夫字母表的那些字母没有任何含义。аз，буки，веди，глаголь，добро[②] 等等乃是这样一些单字，即选用它们只是为了取其头一个字母的发音。格拉玛京似乎是我国第一个想出用俄语字母表来拼凑格言的人。他写道："字母最初的意义大概是这样的：аз бук（或 буг）ведю——即：我看见上帝（!），就说：东西有的

① 原文为法文，是对路易十八一句名言"准时是国王的礼貌"的讽刺模仿。

② Аз，буки，веди，глаголь，добро 分别为俄语字母表中头五个字母 А、Б、В、Г、Д 的旧称。

是；人们各按各的方式活在世上，人人都在想各自的心思。他是我们的安宁。我时常念叨（λογος）一词……”（再往下，格拉玛京说，在其余的字母里大概再也找不出任何含义了）。这一切多么牵强附会！我倒更喜欢一部用法文字母表拼成的悲剧。它是这样的：

厄诺与伊卡埃尔

悲剧

剧中人

厄诺王子

伊卡埃尔公主，爱恋着厄诺王子。

阿巴特·珀居，厄诺王子的情敌。

爱克司、爱格列克、泽德——厄诺王子的侍卫

独幕剧

（厄诺王子，伊卡埃尔公主，阿巴特·珀居，众侍卫）

厄诺：阿巴特，请让开……

阿巴特：见鬼！

厄诺（伸手去取斧子）：我可有斧子！

伊卡埃尔（投入厄诺的怀抱）：伊卡埃尔爱的是厄诺。（两人亲热地拥抱在一起）

厄诺（猛然转过身去）：珀居还在这儿？爱克司、爱格列克、泽德！抓住阿巴特，把他从窗户上扔出去。①

① 原文为法文。

*

许多被强行引入俄语的词汇和用语，已留在了我们的语言当中，并且已经根深蒂固。比如："感人的"源于 touchant（请参看希什科夫先生对此作出的正确推论）。хладнокровие[1] 这个词不仅是直译，而且是错译。该词在现代法语中为 sens froid，即"冷静"，而不是 sang froid[2]。但是，在 18 世纪以前，人们却一直把该词写成"冷血"。在 Dans son assiette ordinaire.[3]这句话中，assiette[4]意为"状态"，源于 asseoir[5] 一词，可是我们却将此用语译成了双关语"в своей тарелке"[6]：

Любезнейший，ты не в своей тарелке。

（心爱的，你心绪不佳。）

——《聪明误》

① 俄语：冷静，但却是由"冷"、"血"二词的词根构成。
② 法语：冷的血。
③ 法语：处于自己通常的状态、心绪正常。
④ 法语（多义词）：状态、一碟、一盘、日常伙食……
⑤ 法语：使……坐，安放。
⑥ 本义为：在自己的盘子上；转义为：心绪正常。

有关《现代人》杂志出版问题的编辑说明①

刊名为《现代人》的杂志是一份季刊。

该杂志将要刊登的内容有：各种诗歌，中篇小说，有关时尚习俗的文章以及诸如此类的作品；对国内外名著的评论，原作及译文均可；最后，凡涉及艺术和学术的文章。

全年订费25卢布（纸币），如需邮寄，则为30卢布（纸币）。

从特维尔寄来的，署名为A. Б. 的文章，由于时间仓促的缘故，不能在本期刊出。

我们还收到了科西奇金先生的文章。但遗憾的是，这篇文章也来迟了。由于担心延误本期的出版，我们亦将此文推至下期刊出。

对богодельня一词的诠注

① 这是递交给评审委员会的报告。

该词由бога деля（для）二词组成，其构成极不规则，因此应当写作богодельня[1]。

一部新长篇小说

前不久，一本题名为《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手抄本在社会上不胫而走，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部由女士撰写的长篇小说。据说，小说颇具创意，富于情感，有许多生动精彩的描写。因此，我们急切地期待着它的问世。

中篇小说《鼻子》附注[2]

果戈理一直不同意出版这部滑稽作品。但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出人意料、富于幻想、快活诙谐和新奇独创的东西。于是我们便说服他并取得了他的应允——现在，我们可以与读者们共同分享这份手稿带来的快乐了。

《现代人》杂志在明年，即1837年，仍将继续出版。

该杂志每3个月出版1期。

全年，即4期杂志的定价为25卢布（纸币），加寄费为30卢布

① богодельня 即богадельня，意为“养老院”。бога 为бог（上帝）一词的第二格形式；деля 相当于现代俄语中前置词для（为了），它要求第二格。故普希金认为“养老院”（直译为“为了上帝”）一词应写作богадельня 而不是богодельня。

② 此节作为果戈理中篇小说的编辑说明，刊于《现代人》杂志（1836年）。

（纸币）。

订阅地点：圣彼得堡各书店。外地读者可通过当地邮局报刊发行科订阅。

《现代人》杂志出版人从未就自己的杂志发表过任何纲领，因为他认为："文学期刊"一词已经包含了足够的解释。

某些杂志主办人认为，有必要为这份新杂志制定出版纲领。其中一位还宣称：《现代人》将会把诋毁斯米尔金先生出版的《读书文库》作为自己的宗旨；《北方蜜蜂》则说：《现代人》将成为已故杰尔维格男爵出版的《文学报》的续刊。

《现代人》杂志出版人不得不声明，他并未享有与杂志同仁先生们打交道的荣幸。这些先生们自愿承担了为他制定出版纲领的辛劳，可他却从未将此事委托他们。不过，他在反对《读书文库》不公正地强加给他的、有损文学尊严的"宗旨"的同时，却完全承认刊登于《北方蜜蜂》的声明是正确的，根据其批评的精神，根据许多撰稿人的姓氏，根据杂志对属于它批评范围的作品的那种通常的看问题的方式，《现代人》的确将成为《文学报》的续刊。

具体情况不允许出版人亲自参加头两期杂志的出版工作，于是便出了一些差错。其中一个还相当严重，它是因误会而引起的：读者们得到一个允诺，可这允诺是出版人无论如何不可能履行，也不打算履行的——《新书介绍》一文的附注中写道：对于标有星号（*）的书籍，都将进行分析评论。但是，在刚出版的图书的清单上，标上了星号的书籍对于出版人来说，只是他认为很优秀，或

者他打算通读的书籍。他并没有打算要向读者分析评论所有这些书籍，因为许多书并不属于文学作品。评论另一些书籍则需要了解有关情况，可他并未获得有关资料。

登于《现代人》第1期的《新书介绍》一文，在谈到A·普希金出版的维兰德长诗《沃斯托拉》的章节时，误将出版人的姓名遗漏。

《现代人》杂志编辑部不承担退稿义务。

《论古代与近代俄罗斯》笔记注解

《现代人》第2期（1836年）已经提到了已故卡拉姆津这部未曾出版的著作。我们深感荣幸，因为我们有机会向我们的读者介绍这本珍贵的手稿，尽管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即使他们将要听到的并不是我们那位伟大同胞的全部话语，但至少是从他嘴里发出的声音，虽然这张嘴如今已经缄默。

草稿　笔记　提纲　计划

读《俄国史》第7卷第4章札记[①]

哪里有责任，哪里就有法律。

卡拉姆津先生错了。法律是以人们对受惩罚的恐惧心理来加以维护的。道德法在实行时每个人都可随心所欲，而违反它又不被认为是民事罪行，因而它不是民法。

但是，舍列梅捷夫伯爵……

(1818—1819)

① 这是一篇不易辨认的草稿，作于1818—1819年，1884年首次发表。卡拉姆津的《俄国史》第7卷第4章“1462—1533年俄罗斯的状况”的内容，包含对俄罗斯国家统一时期的法律和社会规章的特点的概述。卡拉姆津企图证明，俄罗斯的专制制度有其合理性，并认为它有别于僭主制：“专制制度并不意味着缺少法律，因为哪里有义务，哪里就有法律；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怀疑君主有保持人民幸福的义务。”

论持久和平[①]

1. 战争荒谬的残酷对人们会因岁月流逝而变得模糊不清，这正如人们会看清奴役、王权等等的本质一样是不可能的。人们最终会树立这样的信念：我们的使命就是——吃，喝，和成为自由的人。

2. 因为宪法——它是人类思想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但不是唯一的一步——必需致力于削减军队的数量（因为武装力量奉行的原则是直接同任何宪法的思想相对立的），于是有可能再过不到100年的时间，就不再有常规军的存在。

3. 至于那些伟大的激情和伟大的军事天才，为其留下的只有一个断头台，因为社会根本无意去欣赏一位凯旋而归的将军的伟大谋略。人们要担心的事已经够多了，正是为此，他们才把自己置于法律保护之下。

4. 卢梭的议论对于一个虔诚的新教徒来说已经很不错了，他直率地说："对于人民有益的事，只有用强制的方法才能推行，因

① 作于1821年。原文为法文。1924年发表俄译文，1930年发表原文。笔记是在米哈依尔·奥尔洛夫在基什略夫家中所进行的辩论的提纲。辩论的中心是圣·皮埃尔神父发表于1716年的《持久和平的蓝图》。看来参与争论的人并没有读过圣·皮埃尔的原著，而是通过卢梭（1760年）写的一篇概要了解到这篇"蓝图"的。引文（普希金没有抄录下来）摘自让·雅·卢梭在概要中所作的评论。

为私人的利益几乎总是与此相抵触。毫无疑问，持久和平的思想在目前是十分荒谬的计划。但如果让亨利四世和苏拉回来，持久和平又会成为明智的追求，或者，说得确切一些，我们会对这一美好的计划给予应有的评价，但我们也会因其不能实现而感到一些慰藉，因为它只有通过对人类而言是十分残酷和可怕的手段才能达到。”很清楚，卢梭这里说的可怕的手段是——革命。然而它终于来临了。我知道，这些论据都极无说服力，而像卢梭这样从未取得任何胜利的幼稚的人的证据也不可能有任何分量。但争论总是有益的，因为它能促进消化，再说，他还从来没有使任何人信服，而只有愚妄的人想的才会相反。

（1812 年）

论法国文学[1]

各国文学中，法国文学对我国文学的影响最大。罗蒙诺索夫虽然以德国人为榜样，同样也仿效法国文学。苏马罗科夫——(特列佳科夫斯基在诗法方面不自觉地有别于法国人)——德米特里耶夫，卡拉姆津，鲍格丹诺维奇。有害的后果——矫揉造作，畏缩，缺乏表现力。茹科夫斯基模仿德国人，巴丘什科夫和巴拉丁斯基则效法帕尔尼。有些人试图创作俄罗斯风格的作品，但他们之中只有克雷洛夫的笔法才是俄罗斯的。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具有独特的文笔。卡杰宁——戏剧风格是德国式的——但文笔是他特有的。

什么是法国文学？游吟抒情诗人。马莱伯遵循赞美杜佩里埃的四行颂歌及布瓦洛的诗。梅纳尔，清纯，但缺乏功力。拉坎，伏阿蒂尔——不值一提。布瓦洛，拉辛，莫里哀，拉封丹，卢梭，伏尔泰。布瓦洛扼杀了法国文学，他的奇谈怪论，伏尔泰的嫉羡——法国文学成为畸形——俄国人开始仿效法国文学——德米特里耶夫，卡拉姆津，鲍格丹诺维奇——怎么能去模仿法国文学呢？它不高明的诗歌创作方法——畏缩，缺乏表现力的语言——总是受

① 这是一篇文章提纲的草稿，约写于1822年。其中部分思想在《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诗歌》一文中（见本书第28页）得到发挥。发表于1928年。

到牵制。卢梭[①] 不以颂歌见长。杰尔查文。

我拿不准更偏向于哪一种文学，但我们有自己的语言。壮起胆来！——风俗，历史，歌谣，故事——等等。

（1822 年）

① 卢梭（1671—1741），指让·巴蒂斯特·卢梭，寓言作家。

对卡杰宁的简短评论[①]

П·А·卡杰宁译有多部悲剧，还有喜剧《诽谤者》等等。这里暂且不谈他的悲剧《安德罗玛克》，因为它还处于初稿阶段，尚未上演。但无疑它是他的作品中最好的。

（1825年）

① 作于1825年。卡杰宁于1825年创作悲剧《安德罗玛克》，1825年上演，1827年出版。

古代谚语及俗语数则[①]

Не суйся середа прежде четверга. （礼拜三别往礼拜四前面窜。）意在讽刺有些人想要辩驳明显的、法定的尊卑和先后秩序。可能起源于门阀时期。

В прадзник жена мужа дразнит.（过节的时候妻子挑逗丈夫。）

Горе лыком подпоясано.（一贫如洗。）这是对贫穷的惊人表述。见古诗。

Иже не ври же，его же не пригоже.（非胡扯者非妙也。）这是对书卷语的嘲讽，显然，在古时教会斯拉夫语即受到人们挖苦。

Кнут не архангел，души не вынет，а правду скажет.（皮鞭不是大天使，它不会折磨你的精神，但会弄清真情。）这是为逼供的诡辩，是一个狡狯的刽子手想出来的刽子手的谚语。

На посуле как на стуле.（别人送来的东西可以安然享用。）此处посул一词指教堂供品，而不是有人认为的“诺言”，因而这条谚语的意思是：礼物可以像供品一样安然享用。

---

① 这是普希金大约在1825年期间所作的笔记，1855年发表。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时期，普希金曾收集民间创作，记录了许多童话、歌谣。同时，他还研究俄罗斯谚语。除了口头记录，他也利用早已出版的谚语集。他的藏书中还保存有他注满记号的1770年及1822年出版的谚语集。在第一本集子里记有这样一条谚语：“酒馆虽远，容易去；教堂虽近，路难行。”

Беспечальным сон сладок. （无忧无虑的人睡觉都是香甜的。）

Не твоя печаль чужих детей качать. （哄别人的孩子不关你的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печаль——源自动词пекусь（我操心）。

Бодливой корове бог рог не даст.（顶人的母牛上帝是不会让它长犄角的。）——拉丁谚语。

Бог даст день，бог даст и пищи.（上帝让你活一天，就会给你吃的。）（天无绝人之路。）有一次一个穷汉用这条谚语安抚挨饿的妻子。女人回答道："是啊，吃的，吃的，可你都饿得要死了。"

Нужда научит калачи есть.（贫穷能教会你吃白面包。）（穷则思变。）意思是"贫穷是发明和丰盛之母"。

Кто в деле（в должности），тот и в ответе（в посольстве）.（谁掌权，谁负责。）（在其位，谋其政。）

我推测，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

我推测，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存在着奴隶和自由人，即一种是其财产和意志都取决于君主法律的人，另一种则是属于某些人的财产的人。

这种制度与宗法制接近，它使政府免去了无数的困难和动荡，简化了管理，给予政府以极大的帮助。

因此，在取消奴隶制问题上，特别是在君主制国家里，应当谨慎从事。

农民的自由。[①]

（1825—1826 年）

① 原文为法文。

几乎一切宗教信仰……

几乎一切宗教信仰都给予人两种……有一种像被人们所摒弃的无神论一样使人嫌恶的东西。①

（1830 年）

① 原文为法文。

否定……

否定神的存在就意味着比那些至少认为世界是坐落在犀牛身上的民族还要荒谬。①

(1830年)

① 原文为法文。

论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

司各特小说的主要魅力在于，我们不是通过法国悲剧的高傲（enflure），不是通过抒情小说的拘泥古板，也不是通过历史的尊严（dignité）去认识既往的时代，而是现实地，以日常生活的方式去认识。使我感到厌恶的是：[①] 在司各特的小说里，恰恰相反，历史小说中吸引着我们的——是小说中历史的事物就是我们真正看到的东西。[②]

莎士比亚、歌德、司各特没有对皇帝、英雄的奴颜婢膝。他们（和法国的英雄不同）不像一些滑稽地模仿尊严与高尚的奴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朴素平易，他们的言谈，甚至在庄严隆重的场合，也没有高亢昂扬和戏剧色彩，因为庄严隆重对他们来说，只是极普通的事。显然，司各特属于同英国国王关系密切的阶层。[③]

（1830年）

①②③ 原文为法文。

俄国贵族的无知

俄国贵族的无知。与此同时，回忆录，政治著作，小说——拿破仑是报人，坎宁是诗人，布鲁姆，代表，贵族，妇女。而我们的贵族还不会写字。第三等级。贵族。[1]

（1830 年）

[1] 原文为法文。

稳定……

稳定——社会福祉的首要条件。但它如何同社会不断完善的进程相适应呢？[1]

(1813年)

① 原文为法文。

论现代小说

巴纳夫，《忏悔录》，《断头台上的女人》，欧仁·苏。
德·维尼，雨果。
巴尔扎克。私人生活场景，搓纹革，晦涩的故事，顽童。
缪塞。夜餐。①
法国诗歌——拜伦。
波列沃依（半部小说）。
斯维尼因。
卡拉姆津。

（1831年）

① 原文为法文。

奥尔洛夫《论国家信贷》一书的阅读笔记[①]

当然，信贷（信任）不是谁发明的，它是作为一种条件，一种关系自然而然产生的。最初的商品周转中就出现了信贷。

私人信贷的主要思想，当然不是回收资本，而是通过利息的手段去扩大资本。——人们拥有的私人资本常都是零星分散的。

赋税本身是盲目的，它一视同仁地落到所有阶层身上，——不是这样的，赋税可能在各个阶层都起反应，但通常只由一个阶层来负担。（重农主义者，或者说“土地税只是指农业税，而不为大多数其他阶层所感觉到”的错误便是由此产生的。）

（1833—1834年）

---

① 这是一篇1833－1834年期间写的草稿，1930年发表。《论国家信贷》一书于1833年出版时未署作者姓名。普希金收藏的一册中夹有被书刊检查部门删除部分的手抄件，这表明普希金对奥尔洛夫涉及的问题的关注。

欧洲的解放……

欧洲的解放将来自俄罗斯，因为只有那里才完全没有贵族的偏见。在其他的国家，人们都相信贵族，有些人鄙视它，另一些人憎恨它，还有一些人则出于利益、虚荣等等。在俄国则完全不是这样。这里人们不相信贵族。[1]

（1835 年）

① 原文为法文，是作者阅读海涅作品时所写。

俄国文学史提纲[①]

一

编年史，故事，歌谣，谚语。

沙皇书简，远征记，大胜马迈之战。

彼得大帝当政时期，伊丽莎白，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当政时期。法国诗学的影响。

（1829年）

二

语言。希腊的影响。

语言文献。

文学本身。

原因：1）文学的贫乏。

2）与欧洲疏远。

① 这是一篇草稿。第一部分作于1829年，1884年发表。第二部分注明日期为1834年，1903年发表。第三部分同另一篇文章《论作家权利》的提纲一起写在1835年5月普希金收到的布图尔林的一封信的背面。

3)斯堪的纳维亚影响的消除,或这种影响的微不足道。

故事,谚语:同欧洲接近的证据。

伊戈尔王远征记。

大胜马迈之歌。

故事,神秘剧。

歌谣。

谚语(怪诞的)。

故事的民族性(以自己的方式转述——卡尔德隆)。

主教和沙皇书简不属于纯文学范畴,因为其另有使命。[①]

(1834年)

三

为什么最初的诗歌是讽刺诗?

讽刺诗的成就等等。

为什么在叶卡捷琳娜时期还有讽刺诗存在,如今则完全没有了?

康捷米尔。

彼得创建了军队,舰队,科学,法律,但他却未能创建文学,因为文学是从其自身的源头自然而然地诞生的。具有良好教育的一代人蔑视没有文字的口传民间文学,受彼得培养的康捷米尔选择了布瓦洛为自己的引路人。 (1835年)

① 原文为法文。

一篇论述俄罗斯歌谣的文章的提纲[1]

前言。

但有一根本点。

否定对比的独特性。[2]

历史歌谣。

有关伊凡雷帝、马斯特留克、斯杰潘·拉辛、茨克列尔、彼得大帝、舍列梅捷夫、缅希科夫的歌谣。

哥萨克歌谣。

关于费尔莫尔、苏沃罗夫的歌谣。

新的影响。韵律。苏马罗科夫。

婚礼歌谣。

构成歌谣忧郁风格的家庭因素。

情感的阶梯。

（1830年）

---

① 看来，这篇草稿是为1832年普希金计划出版的俄罗斯歌谣的序言所写的提纲。

② 普希金这里可能是指斯拉夫歌谣的特点：以否定对比开头（如“不是雄鹰在云端翱翔”等等）。普希金最早是在阅读格涅季奇的《现代希腊民间歌谣》的序言时对这一特征产生兴趣的。

一篇论述文明的文章的提纲

一

文明。

阶级的划分。

关于奴隶制。

二

宗教。

关于军人和公民的职责。

间谍。

关于（作为对立面的）奴役与自由。

关于书刊检查。

关于戏剧。

关于作家。

关于放逐。

关于倒退。[①]　　　　（1833—1834年）

① 原文为法文。

一篇论述作家权利的文章的提纲

关于文学作品的所有权。

关于出版人、未署名作者、继承人的权益。

关于书刊检查。

关于分类。

关于普及——廉价的——书籍。

关于历史——昂贵的——书籍。

关于纯学术书籍。

关于巨著。

关于一般性和学术性杂志。

关于经典著作（包括属于全人类财富的作品）。

关于教会和地方书刊检查。

关于亵渎神明与容许不同宗教信仰。

关于道德。

关于不受审查的文集。

关于人身攻击。

（1835 年）

苏格兰谚语一则[①]

乌鸦不会啄乌鸦的眼睛（官官相护）——苏格兰谚语，司各特曾用于《伍德斯托克》一书中。

（1836 年）

① 这是1836年普希金在构思一篇论述谚语的文章时所写的一段草稿。1884年发表。在司各特的《伍德斯托克》中说的是鹰。普希金在他收藏的一本谚语集（1770年版）中，对下面一条谚语划有记号："乌鸦不会啄乌鸦的眼睛，即使会啄，也不会把它挖出来。"

拟定为《同时代人》撰写的文章目录[1]

《1711年远征》

St. Raz[2]

В·Л·普希金（德米特里耶夫）旅行记

1721年历

拉季舍夫旅行记

俄罗斯歌谣集

特列佳科夫斯基

论普加乔夫

故事集

俄罗斯笑话集

夏普神甫

解毒剂

论反驳达什科夫批评的最简便的方法

论谚语

论悲剧小说

① 这份目录作于1836年。其中包含已发表的文章，留传至今的草稿，以及仅仅是打算写的或已经散失的文章。

② 可能是指斯杰潘·拉辛。

冒险家及其他

关于诺维科夫的《文库》[1]

论Apt.Ap的旅行记[2]

论M.S.

书刊简介。

(1836年)

---

① 《文库》，是指诺维科夫的《古俄罗斯文库》(共20卷)。

② 可能是指《1812—1816年任炮兵中校的И…P…的行军札记》(1835年)。作者为И·T·拉多乔茨基(1788—1861)。果戈理曾撰文评论此书(载《现代人》杂志第1卷)。

边　　注



对维亚泽姆斯基《奥泽罗夫的生平及著作》一文所作边注[①]

维亚泽姆斯基文	普希金批注
第6页（以上的引言中谈到奥泽罗夫去世时的状况以及他所遭受到的敌视）。 奥泽罗夫对于内心的愤懑一直保持缄默，他虽生来对侮辱十分敏感，但却不善去蔑视对他的敌意，并与之斗争，最后，他终于离开了首都和他事业的舞台。*	* 此6页现在看来是多余的。可从中选择某些思想，加入后文中。
第6页 奥泽罗夫作为俄国悲剧改革者的功绩，可以同作为散文语言改革者的卡拉姆津的功绩相提并论**（如果不去确定这两位作家的价值的话），他的贡献受到	** 差别极大。卡拉姆津是一位真正

① 边注所作时间应不早于1825年。1897年发表。评注写于维亚泽姆斯基文章（作为奥泽罗夫文集的序言）的一份校样空白处及贴在校样的纸上。奥泽罗夫文集于1817年出版，1824年再版。看来，普希金是应维亚泽姆斯基的请求，在1828年再版时对他的文章作一次修订。这从普希金的一些意见中可以看出来，如："此处可发挥你自己的观点，如果你愿意的话。"

文坛有识之士的感激和关注。这两位作家都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前人之间留下一大段距离。研究一下他们以前的作品，不能不承认，是他们使艺术突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如果这一重大变化不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话，那么很难相信，这变化并非是由前人已经湮灭的著作而产生的。但是，对于这种赫拉克勒斯式的功绩，有些人却视而不见。他们因循守旧，抱着上个世纪过时的见解不放。

伟大的作家；而奥泽罗夫则十分平庸。奥泽罗夫在表达技巧方面有所改进，但艺术方面几乎是退步了。对他而言谈不上什么赫拉克勒斯式的功绩。

第7—8页　让他们在无知和偏见的催眠下，躺在古老的巨石上继续自己沉重的梦境吧；而我们再接着谈奥泽罗夫，他并不是为他们的时代而写作。*

*　转折不好，也无此必要。

遗憾的是，在讨论奥泽罗夫的贡献时，我却不能让读者去注意他的为人：我对他本人过去并不了解。

第9—10页　生来具有炽热的激情和浪漫的想像力，他自然无法抗拒爱情的魔力。对一位完全配得上占领他心田的女人的眷恋，几乎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为了她，他奉献了几乎全部青春年华。他同她一道吸吮着柏拉图式爱情的欢乐；他经常预感到幸福的临近，但从来没真正地幸福过，因他所挚爱的女人是一位有夫之妇。

“他自然无法抗拒爱情的魔力”加有括号。

“同她一道吸吮着柏拉图式爱情的欢乐”加有括号。

第10—11页 对朋友的爱是他心灵的一个主要特征*；他时常成为友情的奴隶，他以朋友们的目光审视，以他们的方式感受；但他会因些微的冒犯而生气，也会因些微的友爱流露而动情。他所挚爱的女人的死，使他在一段时间脱离了因为有她才美好的社会，脱离了起初对他而言只不过是娱乐的文学。他天赋极高，却长久无法在智力活动中去追寻欢乐和幸福，因为他总是在心灵的梦幻中苦苦求索。从甜美的梦境觉醒乃是他身上早就潜藏的才能的发展。下面的例子会使我们清楚地了解这位性格温和，而自尊心又极强的高尚心灵：——他曾于一民事部门供职，工作颇有成绩，但他对此并不沾沾自喜。有一次，他的上司问他，他的任内是否需作一些人事调整？奥泽罗夫却把这个问题看作是让他退休的暗示，于是立刻就离任了。

“对朋友的爱是他心灵的一个主要特征”加有括号。

* 对朋友的爱——用俄语说是友谊，不是特征——是热情吧！

此段杂乱无章——你先谈到他的爱情，然后是他悲剧中的浪漫主义，然后是友谊，然后又是爱情，又是自尊心，又是爱情。注意写作方法，力求清楚明晰。

第11—13页 我国的戏剧艺术尚处于摇篮阶段。*在为数不多，而且都或多或少带有塔利亚和墨尔波墨涅女神**打在我国戏剧身上的否定的印记的戏剧作品中，虽也闪现过一些悲剧和喜剧的场景，**看来，我们只能断然地说，至今我们

* 奥泽罗夫赫拉克勒斯式的功绩又在哪里呢？

** “带有……墨尔波墨涅女神……印记”加有括号。

还没一部具有独创性的诗体喜剧[1]，而在奥泽罗夫之前，我们也没有看到真正的悲剧作品。

苏马罗科夫，这位雄心勃勃，想要在所有学术领域一展身手的作家，虽然其聪明才智不容否认，但命运却决定他为各类文学作品垫石铺路，自己却未能达到目的。如同摩西一样，他把他人引上了乐土，自己却留在界外。眼花缭乱的同时代人对这位孜孜不倦的作家赞誉交加，温厚的后代人则满足于作前人意见的回声，而不愿负起苏马罗科夫荣誉的现代裁判的重担。于是，这位俄国戏剧的创始人虽然还没有失去这个称号的荣誉，但他在戏剧领域的地位已无足轻重。如果不是一些总是认为逝者的光荣胜于生者光荣的虔诚，迷信的崇古者们突发奇想，不知羞耻地*把苏马罗科夫的寓言树为俄语寓言的典范，把自立为王者德米特里佯装狂暴时的傲慢和冷漠，树为悲剧笔法的样板，可能他早就被遗忘的深渊吞噬掉了。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苏马罗科夫的悲剧高于他的喜剧，正如克尼亚

你应该说得简明扼要——对此你有足够的才智。

原因并不在于此。关于冯维辛我们以后再谈。

* “不知羞耻地”加括号。相反，是非常。“佯装”加括号并有批注：即forcé（法语：生硬的）。“早就被遗忘的深渊吞噬掉了”加有括号并有批注：他完全被遗忘掉了（更加简明，更

[1] 第12页。冯维辛独具一格，成为具有独创性的优秀诗人，他的喜剧虽是用散文写成，但却是当前舞台上最好的，甚至无论是在其所表现的风习、性格的真实性方面，或是闪耀着自然的幽默的对话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原编者注

日宁的喜剧高于苏马罗科夫以及他本人的悲剧一样。**

克尼亚日宁第一个为悲剧以及喜剧体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舞台上最好的诗体喜剧，无可争辩，应当是《吹牛大王》，尽管批评界会从中找出许多不足，而且不是所有诗句都因他的审美力而生辉。然而，有多少真正喜剧场景展示出了作者杰出的才能！多少推敲完美的诗句不知不觉成为谚语！多少篇章证明了克尼亚日宁风格的成熟！作为证明，还应当指出，《吹牛大王》中一些拙劣的诗句、粗俗猥亵的用语使人吃惊、厌恶，就好像他另一部喜剧里的成功的诗句使你振奋一样。《风流寡妇》在散文和喜剧笔法、含蓄的讽刺和调笑方面，都可称得上典范。《怪人》也闪耀着天才和更多的喜剧欢快气氛。

第14页 在《狄多》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情妇，《罗斯拉夫》不是一个热血沸腾的祖国之友。关于《罗斯拉夫》可以这样说，吹牛大王的名称对他来说，比对真正的《吹牛大王》更为贴切。维尔赫廖特更是一个扯谎者和骗子手，罗斯拉夫是一个悲剧性的吹牛大王。有人说，克尼亚日宁自己承认，他写《罗斯拉夫》是出于将散列于法国悲剧中的崇高的特征集于

好一些）。

** 这一点我也看不出来，他的东西都极蹩脚，某些颂歌除外。注意：苏马罗科夫精通俄语（优于罗蒙诺索夫）。

《吹牛大王》是从L'Important 翻译而来的，原文我没有读过，你再核实一下。

得了，是这样吗？

非常好。

一体的愿望。仅仅是这一点愿望，无论是坦然道出，或是缄默其词，他的悲剧中的这一重要方面，都可能成为对他发难的口实。*

* 为什么？解释清楚。

第15—16页 克尼亚日宁的主要不足源自他性格的特点。他不是一位天生的悲剧作家。*

* 就说是，他根本不是诗人。

关于他在俄国剧坛一些昙花一现的继承者们所写的悲剧就不值一提了。我也不准备去谈论当代一些热心的翻译家们从外国剧坛引进的一些悲剧，这些不走运的舶来品（当然不无例外），人类命运改变的不幸的、令人惊讶的见证，到了我们这里，只是保留了原先的名称，而把它们丰富的内容和父辈的光荣全都留在了故国！

好。

看来，可以断然地说，我国还没有真正的悲剧，墨尔波墨涅女神还没有君临我们的悲剧舞台。演员们扮成有着华丽名字的角色走上舞台，朗诵着诗句。这些诗有些是佳作，但更多的却是十分蹩脚；观众们鼓着掌，便更多是打着呵欠；他们的掌声也是对铿锵的诗句、出色表现的真实、强有力的格言、某些艺术条件的遵守的赞赏，但是人们还没有洞悉悲剧的奥秘。奥泽罗夫出现了，于是墨尔波墨涅女神开始主宰人们的心灵。我们听到了她的声音，这声

“奥泽罗夫出现了……声音”，普希金改为：“奥泽罗夫出现了，于是，我们听到了……的声音。”

音支配着我们的情感，对我们的心是无法抗拒的命令，这声音在拉辛和伏尔泰的作品中是如此令人信服。我们第一次看到，演员在舞台上不是被作家任意拔高为希腊、罗马或俄罗斯的英雄人物*，他们呈献在我们面前的画廊中，也不是一些需要从题词说明才能辨认出的千人一面的肖像。

* 希腊、罗马……人物，原文为同生物名词的复数四格形式，普希金改为同非生物名词的复数四格形式。

“呈现在我们面前”加有括号。“呈现在我们面前……”普希金改为：“不是千人一面的……肖像画廊。”

第16—17页 奥泽罗夫在诗歌领域走出的第一步是翻译科拉尔多的英雄赞歌《爱洛绮丝致阿伯拉德的信》。在附于译文的简短前言中，他告诉读者，他呈献给他们的是他在诗歌领域的首次尝试，并且为自己斗胆同一位成功的诗人较量而表示歉意。这位诗人以翻译为文学爱好者所熟知，并以已成为爱情祷文的教皇书简奠定了自己在法国的声誉。他坦言，阅读科拉尔多的诗歌，在他心中激发出一种阿波罗式的灵感，而且燃起了他心中诗的魔杖尚未触动的想像。“阅读科拉尔多的诗，”奥泽罗夫说道，“使我如醉如痴，我面前展现出通往帕尔纳索斯山之路，我感受以前想也没想过的阿波罗式的灵感。”*心地宽厚的拉封丹也是这样的，他的才能的开发应归功于阅读马莱伯的颂歌，但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也没有明白，只有他一个人才没有看出来的他成功的秘密所在。译文是无法同原

* 这给了我衡量奥泽罗夫才气的标准。

著相比的，但否认翻译家科拉尔多具有未来诗人的气质也是欠公正的。奥泽罗夫的许多首诗歌，尽管当时我国诗歌语言尚十分稚拙，现在看来仍可与一些上佳的诗作媲美。一般说来，这位暂时还是外行，但注定要受到墨尔波墨涅女神垂青的翻译家较成功地保持了原著的叙述风格和激情。他的其他一些小诗则不能表明，这位有才能的悲剧作家同样具有诗人的才华，而抒情诗歌则说明了奥泽罗夫从不是一位抒情歌手。

你在这里横添枝叶，不感到害臊吗？这些都是多余的。

第17—18页 1789年在彼得堡舞台上演的《奥列格（德列夫良斯基）之死》是奥泽罗夫的第一部悲剧，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苏马罗科夫和克尼亚日宁的时代所表示的敬意。试想一下，拉辛在《菲德拉》之前还写过《亚历山大大帝》和《兄弟阋墙》（这是他对罗特鲁和高乃依时代表示的敬意），那么，对于《奥列格之死》没有预示奥泽罗夫以后的悲剧《俄狄浦斯》和《波利克谢娜》的出现，我们还会感到惊奇吗？

???

第18页 悲剧《奥列格之死》的结构、诗句的组合，都显露出克尼亚日宁的缺点，这些缺点并没有被他特有的美所抵消。美

他是指克尼亚日宁吗？

是无法模仿的，美也无法窃为己有。相反，作家的缺陷却可以接力一般传下去，并为那些盲从的模仿者们所掌握。当拉辛不再以高乃依为榜样的时候，他就胜于后者，而当他想要同高乃依并驾齐驱时，他就低于后者。

我不以为是这样。

第19—20页 索福克勒斯受到他儿子的指责，说他因年迈、智衰而不能驾驭名词，为了替自己辩护，他在裁判官面前朗诵了他刚刚完成的悲剧《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惊讶不已的裁判官斥退了无理的责难者，并隆重地陪送索福克勒斯回到家里。这部悲剧使这位希腊歌手荣誉的黄昏再现光彩，使我们一位悲剧作家荣誉的晨曦生辉，它也是俄罗斯戏剧新时期的曙光。

多余的。

"俄罗斯戏剧新时期的曙光"被删去。

第20页 不应当将原作同摹仿翻译进行比较。

?

第20页 我们无法领会他们艺术的美。即使能够领会，我们也只能成为戏剧情节冷漠的观众，而不能成为它的参与者。

"它的参与者"普希金改为"其中的参与者"。

第20—21页 如果这里允许比较的话，就对我们的关系而言，是否可将希腊悲剧同拉斐尔笔下美丽的肖像画相比呢?

我们往往是根据艺术性来评价他的肖像画，而它原先的拥有者却更多是由于它真实、生动地描绘出了他心中亲近的人而对其特别珍视。

很好——

第21—22页 史诗属于叙事性体裁，它可以把我们带进一个异国的天地，为我们的想像力描绘出生动的画面，这些画面越是新奇，对我们越是陌生，便越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然而，悲剧却不是使我们成为一个遥远故事的冷漠听众，而是使我们产生幻觉，成为事件的观察者和参与者，它不是应当完全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向我呈献出能在我们心中激起崇高神圣回忆的熟悉的人物吗？依照前一个绘画的比喻，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的思想，我把史诗再比作一幅描绘大自然的风景画，画中的大自然虽然是异国情调，但却永远是宏伟的，人类永远共同感到亲近的；而悲剧则可比作一幅家庭肖像画，它对我们心灵的强烈作用是建立在个人间关系的基础上的。我们来谈奥泽罗夫。

“我们来谈奥泽罗夫”被删除。

他作为一位明智的艺术家，不断地培育自己的才华……

“他”，普希金改为“奥泽罗夫”。

第22页 此外，除去俄狄浦斯身上那些我们无法认识的东西，他的不幸，高尚

这段评论极不成熟。

的坚毅，他对女儿的挚爱，已足以引起人们的同情，因此，俄狄浦斯的故事将永远是现代悲剧作家可以成功利用丰富绝佳的古代遗产。奥泽罗夫在创作悲剧时，没有完全遵从索福克勒斯和他的模仿者们的方法，他有时是成功的，有时又并非如此。

在哪些地方？是如何成功的？

第22—23页 忒修斯的性格得到清楚的展示：对克瑞翁的接待，对结盟要求的回答，都表现出作为自己臣民的君王、朋友和造福者的高尚和正义感。

"君王"、"公正"加有括号。

第23页 索福克勒斯一开始就激起观众对那位不幸的流亡君王的同情和对与他共患难的女儿的尊敬。

"尊敬"一词被划掉。

第24页 以自己的罪行自豪，然后又带着令人作呕的清白，像一个清正的法官一样公正地审判自己的恶棍，在现实生活中，以及模仿现实的天才们的作品中，是不存在的。这种人物的出现是由于一些悲剧作家的轻率和无能，他们不愿为刻画人物性格付出艰辛的劳动，而只是给人物取上一个剧情需要的名字，然后让观众们去猜度。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乃是俄国悲剧的最主要的缺点，它在《自立为王者德米特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时至今日，在

"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普希金改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

"时至今日……使悲剧本身生

我国戏剧舞台上仍然有着影响。在《俄狄浦斯》第1幕第3场里，克瑞翁过分真诚地向纳尔西斯倾诉自己的心声，这段忏悔虽然极富诗意，但却不能使悲剧本身生色。

色。"被删去。此处普希金批注有：重复已讲过的内容。

第25页 奥泽罗夫的安提戈涅是完美的安提戈涅。这就是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安提戈涅。

?

第25页 安提戈涅的行为不是受作者的提示，而是受她内心的支配。这里我们要指出，奥泽罗夫极其成功地捕捉到了女性人物的共同之处*；他刻画女性形象的笔触色彩更鲜明，细节更准确，艺术加工更慎重。请看一看安提戈涅、摩伊娜、克谢尼亚、赫库巴和波利克谢娜这些人物吧！

* 你知道原因何在吗？

第25页 可能，他这种真实塑造女性形象的才能的泉源，是他温柔的，善于生动、清晰反映女性美德的心灵，也可能来自经常同一些既能净化我们的审美力、也能净化我们情感的女性的交往。**

** 不对。

第26页 但是，悲剧作家不是刑事法官*。悲剧作家以及任何作家的责任在于燃起对美德的爱，对罪恶的恨，而不是去关心命运和天意的判决。现代的伟大悲剧

*好极了。完全不是。诗高于道德——或者说，至少完全是两码事。

作家们也感觉到这一真理，因而，在伏尔泰笔下，即使让卓皮尔死去或对穆罕默德宽恕，他也不是在压制美德和讨好恶行。

天哪！诗人同美德和罪恶有什么关系？除非它们有诗意的一面。

第27页 因此，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它们在社会中的全权代表对一位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勇敢蔑视自己翱翔中遇到的偏见的天才，肆意设置障碍，阻挠他的发展。

这里并没有天才，也没有勇敢的翱翔——

第27页 《俄狄浦斯在雅典》在当代异国民族文学的戏剧舞台上将永远占有一席荣誉的位置，而在我国文学方面，这部悲剧则使奥泽罗夫跻身于我国伟大诗人之列，使他成为第一流*的悲剧作家。1804年，悲剧首次在彼得堡舞台公演，之后不久正式出版，卷首附有以散文写成的致杰尔查文的献辞。杰尔查文以诗答谢，但他的诗已显出老迈龙钟之态，难同奥泽罗夫的散文匹配**。

* 在莫斯科他有些名声，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写悲剧——

** 亲爱的，请尊重杰尔查文老爹吧！不要把他的诗歌和奥泽罗夫的散文等同起来！——

第28页 谨慎不会因成就而眼花缭乱，它会以犀利的目光区别赞扬的性质以及赞美者的真诚程度；但炽烈朴实的心灵却容易受到欺骗，而且对于荣誉常常把荆棘编进桂冠，戴在它所垂青的人的头上这一点，总是后知后觉*。

* 此处可发挥你自己的观点，如果你愿意的话。

第29—30页 一位北方诗人来到与他故土相同的蓝天下，看到同他故土一样的大自然，在这块大地的子孙的习俗中看到纯朴，在他们的伟业中看到勇毅。这一切在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模糊但却十分强烈的信念：他的祖辈也曾是同样的勇毅，有着同样纯朴的风习；而且这两支北方蛮族子孙的特征是在同一个冰雪覆盖的*模子里铸就的。奥辛诗歌的色彩较之荷马诗歌色调丰富的色彩可能更加适合我们的语言。这位北方弹唱诗人歌谣的一些俄译文更加肯定了这一观点。但是，产生他史诗的那平坦或单调的土壤，是否能结出要求强烈的激情、感情冲突和巨大效果的悲剧的硕果呢？我不以为能够。正因为如此，奥泽罗夫的《芬加尔》与其说是一部完美的悲剧，不如说是一个宏伟的悲剧概念。

好！有胆识！

* “冰雪覆盖的”似应改为“冰雪的”。

奥辛史诗的单调同只是向他借用了一点手法的悲剧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第30页 现代人盲目师法古人，采用前人的尺度，却不管他们的式样*，而且忘记了，在希腊悲剧中，合唱总是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同剧情一样吸引着观众。另一方面，古希腊人也不像我们这样贪婪，他们五幕悲剧的内容如今勉强够两幕使用。悲剧《芬加尔》中只有一个悲剧人物：斯塔恩。

* 得了，别胡扯了。

为什么？

第31页 这就是奥泽罗夫长诗悲剧性的一面！他巧妙地将可悲的心灵深处暗藏罪恶念头的斯塔恩同两个自然之子相互淳朴的爱、摩伊娜的真诚、芬加尔的高尚和信任进行对比，将以无限魅力支配着天真无邪心灵的高尚激情的鲜艳色彩，同阴森可怖、血腥复仇的阴暗色彩结合在一幅画面里，将老朽凶恶的狡诈同善良的青年相互信任的勇气结合在一幅画面里。

?

将不同性格对立根本不是艺术，而是法国悲剧常用的动力。

第31页 悲剧《芬加尔》是北方诗歌的胜利，是富于表现力、独创性，音韵铿锵的俄罗斯语的胜利。

?

第32页 斯塔恩，悲剧中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以完全悲剧性的笔触，重彩描绘出来的。

完全不是悲剧性的笔触。

第33页 ……俄罗斯自由傲慢的敌人，马依的统治在扎顿战场遭到致命打击。

“俄罗斯自由傲慢的敌人”加有着重号和括号。

第38页 对这部悲剧的回忆不由使我们想到另一部悲剧，它的作者才华横溢，却在生平宏愿顺利实现之际英年早逝，他同奥泽罗夫一样值得我们同情和尊敬。悲剧《波扎尔斯科依》如果说不像《德米特

列入注释。

里》那样富于悲剧的美，但从诗歌方面的价值来看，至少可在它之后占据首位。

奥泽罗夫的新作虽受到热烈的欢迎， * 很好

但这已是他幸福和成功的最后阶段*。

第42—43页 奥泽罗夫的悲剧在它们当中居于中间地位。他的悲剧充满生活气息，具有自己独特风貌，即使它们的不足，也表现出离经叛道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已属于现代戏剧范畴，即德国人从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那里接过来的所谓浪漫主义戏剧。

本文最后普希金写有一段总结性文字：

评论部分总的说来较弱，太弱了。写法上带有你的缺点，却不见你的长处。与其把这篇前后矛盾、不中肯的评论送去发表，不如另写一篇新的文章。

我不喜欢奥泽罗夫，这并非出于忌妒（这种如人们常说的卑劣的情感），而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你自己也承认，他的文笔不是很好，而我则在他身上连一点戏剧艺术的影子也看不到。奥泽罗夫荣誉的花冠已开始凋谢，而再过十年，一旦出现真正的批评时，就会完全销声匿迹。奥泽罗夫的作品被译为其他文字。翻译乃是剧作家的试金石。他的悲剧的法语散文译本会取得多大成功，我们将拭目以待。

对包戈廷《戈都诺夫参与谋杀皇太子季米特里考》一文所作边注[①]

包戈廷文	普希金批注
第90页 声名显赫的戈都诺夫的一生中还留下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他是否参与谋杀了皇太子季米特里的行动？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皇太子之死对他是否必需，以及从他以往的言行中是否可看到他有谋害这个不幸孤儿的意图……	
季米特里为伊凡第七个妻子所生，按照当时的看法，他几乎没有权利，至少是没有无可争议的权利*继承王位。	* 你去看看编年史，里面都没有提到季米特里的非法性。而是相反。

① 边注写在《莫斯科信使》1829年第3卷第90—126页上，所注时间为1829年，但应不早于该年秋天。

第91页 历史学家说（第12页），戈都诺夫“可能，佯装同别利斯基交好，内心则担心他是自己潜在的对手”。但是，别利斯基不久又在京城露面。且不说暴乱分子大都被立即处决，就是别利斯基在没有任何关系网的情况下，能对这位国舅构成威胁吗？

第92—93页 因此他们就不认为季米特里是皇位继承人？至少，由此可见，任何一方在议论王位问题时，都很容易把他排斥在一边。

接下来，在举行弥撒时，鲍里斯没有下令为季米特里祈祷，也没有提及他的名字，想以此（历史学家说）来宣布，伊凡第六位或第七位妻子所生的这个命乖运蹇的皇太子是不合法的。（卡拉姆津，第10卷，第128页）我们要问，如果是鲍里斯蓄意谋杀，他又何必出此多余之举，此举会清楚地暴露出他对季米特里的恶感……

!

第93页 恰恰相反，如果是他策划了谋杀，他对于他的牺牲品、皇后以及她的亲眷一定会恩礼交加——现在，是否可得出这样一个更合情理的结论：鲍里斯想要在政治上不甚张扬，较少风险、更为有效地在民间舆论中置季米特里于死地。与此

改为：“鲍里斯也想要在政治上”。

相关的是戈都诺夫的亲信在民间散布流言，说季米特里生性残暴、冷酷（在这位历史学家看来，统治者正是用冷酷来调教那些似乎是容易轻信的人，使他们在听到暴行时无动于衷!!)。(卡拉姆津，第10卷，第130页)。

由此可见，的确存在反对年幼王子的意图，因而季米特里对鲍里斯是有威胁的。

第94页 他为什么没有除掉似乎是忠于皇后的奶娘呢?(这完全不像鲍里斯的所作所为。)

!!

1591年，当时费多尔才34岁，他还可能有子嗣，而且的确有了……鲍里斯在此时考虑王位问题不是太早了吗?

但是，他却考虑了。

第94—96页 ……我要说的是，难道鲍里斯会害怕同一个没有教会、贵族、市民支持，没有明确权利的7岁或14岁幼童对抗吗？难道鲍里斯会预见不到，这个不幸的孤儿也一定会随着统治者的亲信们之后被民众所排斥，只要他鲍里斯的奴仆，大主教约甫，根据教庭和亚历山大、安条克、君士坦丁堡以及耶路撒大主教的决议，在宣谕台上庄严宣布这个第七次婚姻所生孩子无权继承王位就行了？看来，这就是费多尔在位时即已进行筹划的措施。与此相关的是鲍里斯在致西吉斯蒙德和奥加廖夫信中的一些话，正如（1680年）立陶宛大

“会害怕同……对抗吗?”被划掉。

是皇太子！伊凡唯一的子嗣！

此话没有对俄国人民说过。这一点卡拉姆津已有说

使对莫斯科大贵族的答复中所说的那样，即使这个被免去教职的教士就是伊万的儿子季米特里，但由于他是第六次或第七次婚姻所生的不合法的子女，因而还是无权继承王位。（卡拉姆津，第11卷，第237页注释）

明。

如果对以上观点加以考虑，还可以断言，季米特里的死对鲍里斯是必需的吗？相反，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设想，鲍里斯策划了在政治上置季米特里于死地，而不是从肉体上除掉他？

自相矛盾。

第96页 ……（退一万步说）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鲍里斯以各种手段向百姓显示，似乎活着的季米特里对他也不构成威胁，因而他的死对他没有用处。——我们也同意，他把纳戈依一家和奶娘*留在乌格利奇是为了摆脱一切嫌疑。

自相矛盾。

* 他怎会知道奶娘的。

第101—102页 议会关于季米特里的死对于执政者安全、对于国家福祉都是必要的（令人难以想像的）冷冰冰的政治决议对鲍里斯有什么用!!

mauvaise foi（法语：不诚实。）

鲍里斯新的（!）同伙开始在食物和饮料中投毒，但这也未能伤害幼年的王子

编年史。

……可能，这是因为投毒者手指颤抖而使毒药剂量不足!!这种诗人似的猜测不值一驳：难道世间有这样的坏蛋，他只同意投放一斯克鲁普尔（1.22克）砒霜，而不是一达兰（3.75克）?（这里要指出，据说，正是这个在投毒时手发抖的达尼洛·沃洛霍夫，也是用颤抖的手第一个刃杀年幼的王子。）

这些是玩笑。

就连鲍里斯也寻找不到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似乎从一开始他就需要这样一个人以取代所有的会议和选举）。他就不会从走村串巷残害人命的老女人中找出一个在行的人!

"连鲍里斯……在行的人"被划掉。

不，——鲍里斯只是感到不满，由于缺乏执行他计划的得力人手，他决定改变初衷，以叮当的兵刃取代无声的毒药。

不是这样。看看卡拉姆津怎样说的。

后来呢？这位知人善任、老谋深算的人又向两个人（第20个了吧?）袒露了自己意图，但他们拒绝执行他给予的任务，于是受到迫害!（甚至不是受到死亡的威胁?）难道鲍里斯能撵走这些人，并且引起他们对他怎么说也是危险的敌意?他更可能是，要么把他们杀掉，要么大加封赏。

拿破仑是杀害当甘公爵的元凶，而且是在什么时候？在鲍里斯之后整整两百年。

!!

第103页 一个可疑的保姆怎会强力把季米特里从内室带到门廊里？她预见到

会发生谋杀，又怎会让忠实的奶娘跟在自己身后？她怎会当着奶娘的面同意这场谋杀？须知，因为留在死者身旁，作为谋杀的见证人，她也是必死无疑的！等等，等等。

为什么不能呢？

她受到鲍里斯，也就是沙皇的庇护！

第105页 另一方面——舒依斯基同神秘莫测的切普丘戈夫和扎格里亚什斯基一样，没有以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拒绝这项除了可怕的痛苦，还要使他们遭受到不仅是族人的鄙视，还有俄罗斯人憎恨的任务，如果在执行时必须在千万民众之前扭曲灵魂的话。

为什么呢？如果现代编年史也提到他们的话？

第106—107页 “……米哈依洛·纳戈依吩咐弄来一些火绳枪、刀剑和铁锤，在上面涂上血污，然后放在死者身上，以作为加在他们身上臆造的暴行的见证。对这一极其荒唐的事，沃斯克列先斯克的大祭司费奥多里特、两位修士以及纳戈依家的一位管乐师由于怯懦和意志薄弱，竟签字画押加以证实；而米尔（公社）大会众口一词，有关事实真相的证明却被隐藏起来，只是记录下米哈伊洛·纳戈依这个顽固坚持季米特里死于暴徒之手的公然的诽谤者的证词。

的确极其荒唐。

人证！

在所有证人的证词中没有一条涉及鲍

里斯；没一点根据可以认为，谋杀是按照他的命令进行的。

“但这些审讯，”历史学家说道（卡拉姆津，第10卷，第138页），“乃是舒依斯基无耻欺骗的标志……他不通过米尔大会，进行秘密审讯，对被审问者威逼利诱，随意传讯人员，编织口供。”

正是如此。

“仅是这些以恫吓、威胁、逼供和丧尽天良而臭名昭著的审讯（卡拉姆津，第10卷，第238页注释）就足以证明鲍里斯·戈都诺夫的阴谋手段。”

第108页 皇后也应为自己洗刷罪名，如果季米特里之死是由于她的疏忽……

胡扯。

第109页 现在谈谈民众的情况。民众了解到鲍里斯对季米特里心怀敌意，对于杜撰得逼真的故事很容易便信以为真，很自然地对戈都诺夫产生怀疑……

第110页 皇后、纳戈依一家及一些市民，在滥杀一些人之后，就不必证明这些死者的罪名，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荒唐。

第110—112页 有人会说——侦讯工作本可更有成效，并且彻底弄清真相。但

那么您会怎样做呢？

如果这点没有做到，那么我们现在也无权妄加猜测进行补充，甚至也无权武断地说，侦讯人员不应满足于已了解的情况。

现在我们提出几点补充意见。

如果季米特里是刚从正房出来，就在门廊里被害，那么孩子们是怎样来到院子里的？

我不明白，批评家想说些什么？

难道凶手就预见不到城内会发生骚乱，并且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求自保？（当有历史学者说，凶手曾逃跑12俄里，然后又返回原处。）

他们逃跑了。

没有。

鲍里斯至少不清楚这场荒唐的谋杀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他怎会突然想出（历史学家所说的））那些手段，截获信使，改写文书，并如此细致地安排审讯？等等。

难道舒依斯基公然强迫市民在预先炮制的供词上签字？

费解！

鲍里斯怎么出此下策，在自己千万臣民面前暴露自己的意图？

非常费解！

皇后被削发，禁于修道院。纳戈依一家，这些对鲍里斯进行公正或不公正指控的人，都幸存下来（这是鲍里斯的仁厚），并且在伪季米特里当政期间红极一时。

皇后的亲兄弟！

再则——是否可顺理成章地认为，舒依斯基在为鲍里斯效力之后，一定会成为他的亲信？完全不是。费多尔在位的最后7年及鲍里斯当政的7年中，鲍里斯并没有

他曾任军事长官。

对他表示出特别的亲密关系和好感。

这样说来，至今也还没有不利于鲍里斯的罪证吗？

（此句被划掉）

第112页　英诺基尼娅·马尔法……说，她真正的儿子是在乌格利奇被“鲍里斯·戈都诺夫派来的人”所杀害（《国家文件汇编》，第2卷，第307页）。

但是历史能够认真对待这个反复无常的女人的话吗？……

“反复无常”加有着重号和括号。

第115—116页　（关于舒依斯基）……他不会明白，小王子从出生起就备受迫害、凌辱，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最后无辜死于……他也是同样的神圣……

第116页　大主教约甫……关于季米特里这样说道：“上帝从背叛他的人手中接过无辜的牺牲品。”

第117页　如果作为鲍里斯的亲信和奴仆的约甫，像编年史和历史学家杜撰的那样参与了谋杀季米特里（他的尸体刚运到莫斯科），那他还能说这样的话吗？

什么时候？

第120页　历史学家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如果相信编年史家的话，那么鲍里

卡拉姆津也是这样说的。这使人

斯下令……等等，但官方文件表明……等等。”为什么要去相信编年史家呢？

想起波列沃依经常使用的批评方法。

第124—125页 综合我所收集到的，有利和不利于鲍里斯的证据，我将此案送呈刑事法院按现行法律进行审判。

胡扯。刑事法院是不会根据现行法律来审判已故的沙皇的。只有历史才会审判他们，因为对于沙皇和已故者，除了历史，再没有其他法庭的审判。

刑事法院是否应当判定，鲍里斯仅仅是带有嫌疑，而且是轻微的嫌疑？

怎么！当今的刑事法庭判定鲍里斯仅仅带有嫌疑，而历史却对鲍里斯作出了最后的判决！虽然他在25年中为俄国作了许多善事。不！不！让我们公正地对待这位伟大的人物，他如果不是用自己的心，至少也是以他富于成果的头脑对崇高的品德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他在自己辉煌的当政期间，使俄罗斯的强大和荣耀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即使在自己登基的庄严时刻，也答应把身上最后一件衬衫脱下来，送给一个一贫如洗的臣民，他从未违背自己于1600年，而不是1755年在莫斯科创建大学的神圣诺言……

“怎么！……最后的判决”一句被划掉。

什么话！

巴丘什科夫《诗歌与散文习作》第二部分的边注[1]

《习作》	普希金批注
致朋友 （第3—5页） 这便是我的诗， 朋友也许会珍视 我对我的保护神充满信心，	非常糟糕的诗
希望* （第9—10页） 仍是他的天赐，而比一切	*“信念”似乎更为准确。

① 边注时间据观察不早于1830年。发表于1899年，写在《习作》第二部分页边上。其中有5个边注是用墨水笔写的，其余则是用铅笔写的。边注中所收录的巴丘什科夫作品，仅限于附有普希金文字边注和标有意义明显或意义不明显的评价符号的诗歌及某些诗歌的标题。普希金亦为《习作》第二部分的另一些诗作标上了意义不甚明确的评价符号（如在页边上划出强调某些诗行或某个词语的线条等等），这一类符号以及这些符号所标注的诗行，在本文中未予列出。

天赐更美好的“　　　　“ 不恰当的
天赐则是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移行。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优美

在瑞士城堡的废墟上

（第11--18页）

噢，年轻人！快返回故乡， 满载战果凯旋而归； 微风徐徐尾随着你的船队， 你这胜利挑选的英雄豪杰！	无灵气。
美人儿亭亭玉立默默含泪， 羞羞怯怯暗把新郎窥探， 垂下明眸，脸儿绯红转苍白， 犹如当空一轮皎洁的明月……	这便是蕴含着巴丘什科夫特有魅力的诗——整个诗节都很美。
老人们热切地把这首歌儿倾听， 斟满的酒杯在他们的手中抖个不停，	好。
骄傲的心儿满怀着激情 回想起那光荣的青春年华。 你们在哪里，大无畏的勇士， 你们，只崇尚战斗与自由 的野性之子……	生动、好。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总的来说，思想平庸，诗句也并非十分生动。

译自提布卢斯的哀歌（意译）

（第19—26页）

噢，你们，善于爱的人们，	没灵气
要提防别离会给这爱带来毁损！	
那时云杉不会挂上轻帆	
乘风奔驰在蔚蓝色的海面；	多余的诗行
我拖着你柔情的桎梏直到坟墓	枷锁
众神使这些桎梏坠入了无底的深谷，	和那巨大的堤芬
可怕的恩克拉德和巨大的堤芬	神话和语法均有
用自己的内脏喂养着贪婪的鹫鹰。[①]	错误。
寒冬的暴风雨在呼啸，可	
在安宁的室内，	美妙。
女友在黑夜里将明亮的烛	
火点燃	
她轻轻地转动着手中的纺锤，	
讲起那古老的传说与故事。	
你聚精会神地聆听着甜美的神话，	
我的朋友，你陷入沉思；	
迷茫的双眼	
被悄然袭来的梦幻遮掩；	
纺锤从手中	
滑落……这时门口出现了	
你的心上人，	
就像是上天蓦然间派来的保护神。	

① 原文为питает，此乃语法错误，应为питают。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译文优美

回忆

（第27—29页）

当拚死向敌人冲去的时候	差劲。
我在记忆中唤起	糟糕的短语，
那可怕的瞬间	糟糕的诗。
那时，我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病情	
看见了无数的死亡，	
我害怕我不能死在故乡！	
但苍天听见了我真诚的祈祷，	
便用它仁慈的眼睛盯着我瞧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幼稚之作。

回忆

片断（第30—32页）

没有友谊，没有爱情，没有动人心弦的诗篇，	没灵气
而这一切总能像荷花一般	
用魔力治愈我心中的忧烦。	
在生活的风雨和疾苦之中	
修身养性的古寺院！	风雨，疾苦

你时常激起朝圣者的沉思，
当那彤红的朝霞
透过薄薄的晨雾
将遥远的花岗岩海岸
将牧人的村落和渔民的茅舍，
映照在空旷的特罗利坦那明
镜般的水面。

*法语腔

最后几行诗非常和谐。

康复

（第33—34页）

犹如刈禾人致命镰刀下的铃兰
垂下头颅，枯槁萎蔫

不是“镰刀”下，而是“大钐刀”下。铃兰生长在草地和树丛里，而不是生长在播过种的耕地里。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巴丘什科夫最优秀的哀歌之一。

复仇

译自帕尔尼（第35—38页）

但这里的一切皆浸透了我的爱，
它们总使我想起你那可怕的誓言。
森林和小溪都记得那誓言，
那令人陶醉的回声还时常出现。
你在这里，犹如雪白的百合花，
阿芙乐尔和春天将你培植在花园，
在安宁的暖房里，

多余的，无灵气。

帕尔尼的这一段本来就很糟糕，巴丘什科夫写出来

　你在你母亲的身旁盛开得
　洁白无瑕。
他带来了牺牲供品在这宁
　静的祭坛旁，
你第一次红着脸说出了“我爱”
(这片原始森林便是无声的见证)。
从你那低垂的眸子里
他颤抖地阅读着命运之签；
在因你而充满欢乐的盛宴上，
炽烈的青春也在数着你的目光。
当从那浴血的战场上传来命运之声，
它过早地将我召唤到科茨特，
我要说：愿你在生命的最
　　后一刻亦能幸福；

可惜郎所有的祝福皆是枉然！

就更差劲。爱情不
能用平庸而噜苏的
比喻来表白。
　自己

　这怎么理解？

什么话！

应该是：
自己的命运之签。
费解

我要说：愿她幸福！
可这祝愿并不能给
你带来幸福！[1]
　有什么区别！

幽灵

译自帕尔尼（第37—42页）

美

如果深藏于内心的火

① 原文为法文。

在脸颊上燎过；
如果内心隐秘的箍
松散滑落——

提布卢斯哀歌之三

（第43-45页）

面对宠信永不屈膝	恩典。不对
当命运女神的判断，	判决
当严酷女神的纺锤令人生厌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由于成功的截断，诗歌很出色——截断可以增强诗歌的生动感，但在截断的使用上，我们过去谨小慎微。

我的神明

（第46页）

噢，心灵的记忆！你强于
可怜的理性记忆，
你常以自己的甜美，
将我征服在那遥远的地域。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除了前四行都很优美。

朋友的身影

（第48—51页）

我离开了阿利比翁迷雾茫茫的海岸：
它似乎被铅灰色的海浪淹没。

德米特里耶夫批评了这两行诗句间的停顿，这似乎不公平。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优雅完美——多么和谐！

提布卢斯的哀歌（意译）

（第52 -58 页）

我们面对他们进行畅饮，
在他的额头，作为和美婚
礼的标志，
我们放上一只用香桃木和
百合花编成的花冠。

散文。

我们为……戴上婚礼花冠来标志婚礼！！！

浑身溅满血，赢得那场鏖战……

散文。

年迈的战士，年轻时的同伴，
他坐在桌边讲述着自己的功绩，
用欢乐杯中酒*为我勾画着
营盘。

* 原先为：用满盈杯中酒——这样更准确些。

写在N 生日的那一天

（第64 页）

诗下批语：

有感情

醒悟

（第65 页）

是烈马的飞奔

骄傲的理智亦不能战胜

爱情，用那冷静的语言。

截断很和谐
结果意思成了
——用爱情那冷静
的语言——
逗号不起作用。

别离

（第66--67 页）

诗下批语：
优美

塔夫里达

（第68 70 页）

或是火红的春天在原野上
　辉煌灿烂，
或是炎热的夏天炙烤着
　枯焦的草原，
或是天上的宝瓶转动了冰
　凉的瓮罐，
倾倒出哗哗的暴雨，灰色
　的雾气和黑暗

巴丘什科夫本人
所喜爱的诗。

诗下批语：

按其情感、和谐和作诗的技巧，按其华丽和豪放——此乃巴丘什科夫最优秀的哀歌。

最后一个春天

（第72—74页）

为什么这样早就凋零？
请关上那令人颓丧的纪念馆，
我的遗骸将在那里腐烂；
请独自关闭通往那里的道路
避开友谊的目光直到永远。
但若忧伤的德里亚
走近那纪念馆，那么
请用沁人的芬芳
把空旷的天宇填满

鬼知道这里写的是什么！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对米尔瓦耶的不成功的摹仿

致格＊＊＊奇

（第75—76页）

唯有友谊对我许下
一只永不枯朽的花冠；
它明显地枯萎着，
如烈日下的矢车菊一般。

多么幼稚的诗句！

啊！难道幸福的荣耀
将弥补我的损失，
却故意要在我生命的黄昏
才飞抵我的身边。

最后这四行诗句非常生动

致Ц***夫

（第77—80页）

我看见面容苍白的母亲，
她们被逐出了亲爱的故园！
我在十字路口看见她们的身影*
在那儿——圣徒的遗体
在静谧中安寝，
时光从旁边流过，
并不触碰他们的圣地。

*绝妙的重复。

妙

泉

（第81—83页）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既不如帕尔尼优美的散文，甚至也比不上对米尔瓦耶的蹩脚的摹仿。

俘虏

（第86—90页）

在胜利的战场上被俘，
独自陷入群敌的魔掌*。

我那故乡的小房，
在冬天被耀眼的积雪覆盖！*

“回故乡，回到那古旧的
阁楼上，
那里有美人儿*在把我等待，
夜幕降临，她便坐在窗户
旁”

“喧啸吧，罗讷河，拍响
你的浪，
去灌溉庄稼农田；
用你浪花的拍打声
让我幻想家乡顿河的喧响！
噢，风儿啊，从半夜刮起
来自我亲爱的故乡；
你们，北方的星辰啊，
请向漂泊者闪耀得更加明
亮！

* 这是彼得·维雅泽姆斯基公爵喜欢的诗句。

* 原先为：被洁白的积雪。

* 取代了：美女。不好。

好极了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列夫·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被法国人俘虏的时候，曾对一位女子讲过："还我严寒。"[1] 这使巴丘什科夫产生了写《俘虏》的念头。但他并未获得成功，尽管这首诗里充满了美妙的诗句——一个俄国哥萨克竟像法国游吟抒情诗人那样，用帕尔尼和法国抒情情诗的格律吟诗。

盖兹奥德与奥米尔

——对勃敌

（第93—100页）

人群，犹如浪潮，向科尔基 　达*涌流。 请为马儿解下沉重的笼头 将它们牵进凉爽的马厩； 你们，浑身尘土与汗水的战士， 面对明亮的篝火缓一口气。 听吧，人们，希腊人的子孙， 请听这高亢的歌声！	* 不可原谅的无知！ 好极了
在这好客的世界上到处漫游*	* 结尾处说道："生在萨摩斯"等等。矛盾。

　　　　奥米尔

我年轻时曾经梦见：

① 原文为法文。

雷公轻易地将我从麦列斯带走。
飞向地角，飞向天边，
你将成为这天与地的主宰
——他对我如此预言。

好极了

盖兹奥德

噢，冷峻的谟涅摩辛涅的
女儿们多么温柔！
你的神明深入了奥林匹斯
山：永恒的众神*
为你打开了云外的宫殿。
可又怎样？这受难者素来
习惯了尘世的苦难**……

为什么“冷峻的”

* 此乃成功转换诗间停顿的例子。

** 不恰当的圣经主义。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整首哀歌写得非常美——可惜是译文。

致友人

（第101—105页）

漂泊者生命短暂，我们行
走在坟墓间；
所有的时日都被我们看作
流逝；
插上欢乐的翅膀我们飞向
自己的友人，

妙！——整个的都很妙！

那又怎样？我们抱住的是
　他们的骨灰罐。
天使般沉静的性情，语言
　的天赋，细腻的鉴赏力，
爱情、眼睛与面颊*；
一个高傲缪斯的开阔的前
　额
还有那贞洁的卡里忒斯的魅
　力。

*意大利的音韵！这位巴丘什科夫是怎样一个创造奇迹的人

她在痛苦中长眠安息
我徒劳地向时代的经验询
　问，
还有克利俄那费解的碑刻
　经文。

好极了！
"克利俄"一词就像"仓库"一词一样不变格。但这个规则似乎难于接受。

犹如室中的羽毛飘忽不定，
犹如细小的尘埃随旋风升
　腾，
犹如无能的航船在浪中
　驰骋
永远不知岸在何方：
我的理智就这样在怀疑中
　丧失。
生的所有乐趣全都消逝；

摹仿罗蒙诺索夫和托里斯蒙多。[①]

① 普希金指的是罗蒙诺索夫颂诗《夜思上天之伟大》的第2诗节及塔斯悲剧结尾处合唱的唱词《托里斯蒙多》。巴丘什科夫将此唱词作为卷首题词写进了自己的哀歌《垂死的塔斯》。

我的神明在哀伤中熄灭了
　烛火
光辉的缪斯们也隐没不见

最后九行诗句用线条划出，诗下批语为：

有感染力的，丰满的，出色的诗。

幻想

（第106—118页）

或是在穆罗姆森林里徘徊
　着苦思冥想，
当那西天的晚霞闪烁出红
　光
冰冷的月亮从云层后露出
　脸庞？
或是受了神奇力量的诱惑

一心向往那万物皆勃发出
　爱之魅力的地方，
在桐叶槭的树荫下你徘徊
　游荡
在那被沃克吕兹涌泉冰凉
　的泡沫浸润的坡地上？
忽而它被移到了谢里姆森
　林，
那里风在呼啸，雷在轰鸣，

和谐。

那里奥斯卡的影子披着云
　雾
在泡沫翻滚的海洋上空飞
　翔
嘹亮的歌声在崇山峻岭之
　间久久回荡。
或是在半夜时分
他听见说唱诗人的歌声
若断若续，如诉如泣。
他看见：小伙子们默默不
　语，
斜靠着盾牌，在篝火边围
　聚，
一堆堆篝火正燃烧在战场
　的旷野里；
昔日的歌王
伸出双手把竖琴弹拨。
英雄啊，愿你安息！
你用你的钢钺
击溃了骄傲的入侵之敌！
可你自己却倒在了一大堆
　尸体上，
著名的勇士倒下了，
你死于敌人乌云般的乱
　箭！……
你倒下了！在你的天空，
　上帝的使者，

好极了。

说唱诗人和弹唱诗人是一回事，至少在我们的想像中是如此。

幼稚的诗

从“英雄啊，愿你安息！”到“众神为一群勇士准备好”等诗行被普希

迷人的瓦尔基利亚女神在 飞舞盘旋。	全划掉了。
斜依着肥沃的草坪 与年轻的战士们在一起， 说唱诗人又一次拿起金色 的竖琴。 他情绪激昂地把歌儿唱* 赞颂往昔的光荣岁月 他诵唱着，勇敢的眼睛 就像那静夜的星星， 闪烁着令人欣慰的光芒。	*又是老一套。
这时我乘着幻想的翅膀 在普天下盘旋翱翔； 抑或是我陶醉在美的怀抱， 正享受着迷人的美梦， 我的幸福不是梦，可我也 曾幸福在幻想中！	粗劣 粗劣
我的女巫！你的礼物一钱 不值。 你把冷漠赐给老人， 把讨饭袋赐给乞丐，把锁 链赐给囚犯。 可怕的人们被钉在带锁的 门上，	什么乱七八糟

一小捆干硬的稻草，祖宅
　里一束惨白的光，
被啃过的面包干，监狱
　老鼠的口粮，
盛了水的陶器，
一切，一切皆是由你装点
　！……
谁的心儿无辜，你便永不
　遗弃他：
你会飞向四面八方去寻找
　他，
把幸福赐给你所钟爱的人。
让世界将他遗忘吧！这对
　他有什么了不起？
可沉思将伴随他，在那阴
　郁的秋日，
在安静的睡榻上，
在幽静的小屋里，
她独自说着话。
噢，暗自流泪有说不出的
　甜蜜！
为何在你面前，冰凉的心中
　充满了欣喜，
令人欢欣的名声和光耀的
　荣誉
属于那在世界上什么也不
　期求的人；

!!

什么乱七八糟

属于那将自己的灵魂
与早已逝去的朋友的坟墓
　联在一起的人！

＊ ＊ ＊

谁在一生中不曾爱过？
谁人一次也没有心醉神迷
沉迷于爱，不再醉心于幻想，
不再从幻想中寻求幸福？
有谁在深更半夜时分，
当睡梦不知不觉地迷住了
　困倦的眼睛，
没有享受到虚空幻想的全
　部甜蜜？
此刻，热恋中的情郎，你
同羞怯的姑娘躺在豪华的
　卧榻上，
你向她悄声诉说着爱情，
　用热情的手
从她的胸前摘下遮羞的薄
　襟，
现在你享受着欢乐，你幸
　福在——幻想中！
合欢之夜给你带来幻觉，
爱情那甘美的玉液滋润着
　蔫萎的罂粟！*

什么乱七八糟

又有些像巴丘什科夫了

*卡杰宁认为这两行诗句可以与巴尔科夫的诗媲美

* * *

幻想是诗人与诗歌的灵魂。
时世的艰辛
亦不能磨灭阿那克里翁的
　魅力；
爱情还依然燃烧
在法翁的恋人的幻想之中；
你躺在花丛中，
置身于自然女神和乡间美
　女中间
欢乐的歌手，贺拉斯！
你正沉溺于甜蜜的幻想。
你在狂欢喧闹的盛宴上陷
　入梦幻，
为阴郁的死亡戴上了花冠！
就像常常在蒂布拉，在那
　些老林子里，
在铺满天鹅绒一般青草的
　斜坡上，
在幸福的蒂布拉，在你的
　幽居里，
你等待着格莉采丽娅，陷
　入了甜蜜的朦胧。
在鲜花做成的床上陶醉于
　温存与爱抚，

粗劣，无灵气

粗劣

索然无味

旁边熏着芬芳的乳香，
还有头戴花环的自然女神
手牵手地跳着圆圈舞，
在远处的草地上，
流水正发出淙淙的声响，
你默默地陷入甜蜜的沉思
幻想着……突然间
陶醉于纵欲寻欢的幻想，
在羞怯而美妙的格莉采
　丽娅脚旁

粗劣

歌唱着爱情的胜利
它战胜了无忧无虑的青春，
还歌唱血液中的首次激情
还歌唱首次由衷的叹息，

平庸

幸福的人儿，歌唱着
茨捷拉式的欢愉，
所有的功名忧虑
全被你抛在了风里！

这四行诗句写得很好。

* * *

愁苦的禁欲者和无聊的哲
　人
身穿出殡的丧服
坐在废墟和坟墓中间，
难道在他们令人窒息的学
　说里

从“愁苦的禁欲者和无聊的哲人”，到“飞去，就像蝴蝶逃避着荆棘”几行诗句被普希金划掉了。

我们能找到生活的甜蜜?
我看见，欢乐远离他们
飞去，就像蝴蝶逃避着荆
　棘；
在他们眼里，大自然的美景
　没有魅力；
姑娘们也不会跳起圆圈舞，
　对他们把歌儿唱；
对于他们，就像对于盲人，
春天没有欢乐，夏天没有
　花朵……　　　　好极了
唉！可幻想将与青春一同
　逝去，
不再有美女的亲吻，　　　　乱七八糟
希望会改变，还有一连串
　长着翅膀的梦幻。
唉！那里的花儿已经凋谢，
就在那经验将昏暗的烛火
　点燃的地方，
时间也为老年把墓穴启开。

* * *

可你——始终不渝，要与　　　　乱七八糟
　我共度人生！
无论是光明，无论是功名
　虚无的荣光，

无论什么都不能取代你给
　我心灵的赐予！

线条一直划到诗的结尾。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诗人的幼稚之作。是巴丘什科夫所有诗歌中最差的一首。

我的老家

寄语茹科夫斯基和维亚泽姆斯基（第121—137页）。

在这篇优美的寄语中，最主要的毛病便是过于明显地将古代神话中的习俗与莫斯科近郊居民的习俗混为一谈。

缪斯乃是一种理想中的存在。我们基督徒的头脑已习惯于想像缪斯，但那种摆放着拉瑞斯神像的“洞穴”和“修道小室”却使我们想到了希腊人的茅屋，在那里我们极不舒服地看见了蒙着破呢子的桌子，看见壁炉前坐着一个苏沃洛夫的士兵，手里还抱着一把二弦琴。这一切未免太自相矛盾了。

那里有硬邦邦的床铺——
仍然是那简朴的家什，
仍然是那破烂的陶器！

最后两行诗句被普希金划掉了。

财富伴着尘世无谓的忙碌；
腐化淫荡的幸运儿，
宫廷里的朋友
面色苍白的傲慢者，
妄自尊大的公爵

这几行诗句被普希金划掉，旁边批注：

有分量的诗。

都只有一颗被出卖的灵魂！

我的一生宁静安然；
与你在一起即使贫困
即使住陋室我也喜欢；
没有金钱也幸福美满
只要有你那迷人的魅力在
　我心间！

这几行诗句被普希金划掉了。

为什么有这缭绕的香烟
还有这铜钟的鸣响，
还有那动人心弦的赞美歌
在冰凉的棺材板上回旋？

诗写得很美，但又出现了同样的矛盾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这首诗里洋溢着对兴盛、青春、享受的欣喜和陶醉——音韵抑扬顿挫，文笔清新流畅——具有动人的和谐。

寄语Г·B——姆

（第138—141页）

当我在柏洛涅的旗帜下把
　仗打完，
我又在爱情的旗帜下重新
　开战
要从那迷人女子*的眼睛里
　读懂

*低级趣味——这在巴丘什科夫的作

新的法则，新的规矩！
痴心向往的领域！在那里
　轻佻的爱神
赐给亲爱的人儿迷人的脸
　蛋，

隔着薄雾在胸前构成两朵
　百合，
（我们的美人正以此得意！）
噢，我亲爱的朋友！归还
　吧，归还
那昔日的黎明和昔日的痛
　苦，
昔日的爱情和昔日的纷争！
或者，我的魔法师*
用乐声使我的赞美诗充满
　生气，
再归还诗歌失去的权利，
让石头移动
让山岭移动，让森林移动！
那时我将与气精一道飞上
　天空*
触到……山神在月光的照
　耀下，
犹如轻盈的影子，穿着透
　明的衣裳，

品里是少见的。

多么拙劣！

*我不明白这里为何转折。

平淡单调

*扯到哪儿去了！
　林神，自然女神和那伊阿得斯——混在奶酪订单、汉堡日记账中间！！！

与林神一道下来聆听我的
　歌唱。
胆怯的那伊阿得斯浮到水
　面上，
用她们那苍白的手儿鼓着
　掌。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愚蠢透顶的诗。

寄语T——夫
（第142—145页）

“赐给他们吧！”话一出
　口——转瞬间　　　　多么平庸！
他们就变成了有钱人。
“他们”是谁？——我
　来细细地
对你讲述他们的故事

一个穷光蛋。他死了。
　由于债台高筑
他反倒死得安然。*　　　　*多么冷酷的笑话！

可他忘记了留在世上的妻子
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
只给他们留下了一条讨饭袋……　　　　什么笔法！

可对于穷人这还并非全部灾难！

妙啊！好啊！——无可非议！
但是……这个世界
不是天堂——我的祖父常
　对我说起
于是格蕾沙开始细细地……

可以与瓦西里·利沃维奇的作品媲美的诗。

又来了！

他们在圣像面前，当然，
将点起洁白的蜡烛，——
为谁人的健康——我避而
　不谈；
亲爱的朋友，你猜猜看*！

*我可猜不出来：如果说这是为了屠尔盖涅夫的健康，那么这就太庸俗了——如果不是，那么就只能解释为——这是一种要把各种胡说八道登出来的嗜好！巴丘什科夫则是没有过错的。

答格——奇

（第146页）

你的朋友从现在直到永远
把心与手都向你奉献

如果爱情之光照亮我们栖身之所，

*巴丘什科夫将娶格涅季奇为妻！

照亮这友谊的圣殿…… 唉！你的朋友绝不停息 再向爱情把自己奉献！—— 就像宾客，因欢娱而心满意足， 离开那丰盛的酒宴， 被爱情灌醉的我，亦会如此， 宁静安详地离开人间！	太好了。

致ИС——姆

（第148—152页）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很好，可以与法国的那些光彩夺目而又挥洒自如的幽默小作品媲美，——且语言处处都表现出诗意。

答T——夫

（第153—156页）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巴丘什科夫几乎总是在说着拙劣的笑话！不过他的《幽灵》倒是既机智又令人发笑。

寄语И. M. M. A

（第160—166页）

那里的大自然华美壮丽 彤红赤热的福玻斯从无云 的天穹	这无关紧要：问题不在这里；参见第一行词。

赐予幸福的田野丰饶富裕， 难道那里就是天才的摇篮 　和彼耶里德的领地？	
还有白昼，美妙的白昼， 　没有黑夜，没有霞光！	霞光
挣脱世俗的锁链，德米特 　里耶夫经常 引导我们把自己那成功的 　灵感追随， 它是如此纯净，就像那女 　王的清泉水， 在这水面上，第一次看见 　日出的 是那西伯利亚皮扎尔富有 　灵感的歌手！……	无灵气
享受一切，福玻斯未来的 　祭司 终于处处为他预备着礼品。	费解！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寄语的目的不十分明显；写得好的地方亦有缺陷。

哈罗尔德勇士之歌

（第172—174页）

当我们汇集起船只形成一
　道障壁
盖拉出现在含盐的海浪里。
可海浪徒劳地狂涌翻腾：　　　　妙。
我用头盔舀海水，划着桨
　儿干我的活计

淫妇

（第175—176页）

肆无忌惮地撩起衣衫*　　　　*大胆、绝妙。
并把它们揉作一团。
林子里面响起了　　　　也许，用词大夸张。
噢呀呀！还有那欢悦的叫
　喊！——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摹仿帕尔尼，但比原作更好，更生动。

别离

（第180—182页）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矫揉造作。与C·Д·达维多夫争论不值得。

虚惊

仿帕尔尼（第183—185页）

“许墨奈俄斯为一切担保，
还有小爱神在站岗。”*

*穆拉维约夫的诗

清晨的玫瑰红
已熊熊燃烧在天空……
而珍贵的爱之泪，
唇边的微笑，
透明的绢纱下，
胸脯陶醉地起伏
都默默地许诺着
晚上的再一次相会。
如若宙斯转手
交由我掌管夜与昼，
清晨的朝霞将很晚
才会把黑夜赶走！
太阳将很晚才会升起
在那东门廊的台阶上；
刚一露面就消失
在森林后面把彤红的脸儿隐藏；
湿润之夜的阴影
将久久地笼罩在原野上；
人们将尽情地享受
幻想中甜蜜的欲望。
我将把一个时辰给予友谊，

非常动人。

好极了

好极了

一个时辰给巴克科斯，一 个时辰给睡梦；	
剩下的半个时辰，	
我的朋友，我将与你共同	修改为：
分享！	分享。

莫卧儿大帝的梦

（第186—188页）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蒙古寓言，巴丘什科夫本人就是这么说的。

独木舟上的爱情

（第189—191页）

在这首诗的页边上，普希金画了一道线条，可当线条画至结尾处时，却转而将整首诗全部划掉了。

幸运儿

仿卡斯季（第192—195页）

头十一节四行诗被划掉了；其中最后一节就像诗的结尾处最后两节四行诗一样，其页边上画着一道线条。

欢乐

仿卡斯季（第196—198页）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这就是巴丘什科夫特有的和谐

K. H. *

（第199—201页）

伴着胜利的雷鸣
我们唱起《赞美上帝》！……

安息吧；随着第一阵雷鸣
你将飞向光荣的旗帜

*仿法国古代游吟抒情诗人

上帝，我赞美你。按照我们的说法应该是“天上的主宰”。

好！

题诗、题词及其他

（第202—207页）

题诗、题词之二（毕布里斯多么艰难……），之三（潘菲尔真滑稽……），之四（全身心地……），之七（没有暴风雪，没有严寒……）及之十二（坦白说，这是大杂烩……）都被划掉了。

之一

我的常客，我的折磨者
噢，鲍杜斯！我还得长期
　伴你打瞌睡打哈欠？
你还是聪明一丁点，或者
　让我得安身！
当残酷的命运使我们相遇
——我不再是独自一人，

这不是巴丘什科夫的诗，而是布鲁多夫的诗，而且还是译作。

可我们亦不是两人。

之五

献给新萨福

你是萨福，我是法翁：对
此我无意争辩；
可令我痛苦的是
你不知道通向大海的路途。

翻译的俏皮话——
索然无味

之十一

献给自称为自然
女神的梅莉娜

你是自然女神，哟，毫无
疑问！
只不过……要在嬗变之后！

多么索然无味！

浪人与居士

（第208—229页）

我静坐思忖，
实难成为驾驭自己习惯的
人……
让自己的目光充满承袭的
善，
互相开始了如此的交谈……

这句诗并不神奇，
很生硬。

多余的

在此处“他们”必
须写出。“互相”是
副词，而不是名词。

他望着大海，
由于寂寞自言自语低声发
　问。
特里同在哪里？涅瑞伊得
　斯在哪里？
他们同那群海洋女神在何处
　藏身？
为何我在海上一个也没看见？

他已到了孟菲斯，到了神
　奇之境
快把手杖、礼帽拿在手中，
快从孟菲斯逃遁
逃离那勃然大怒的老人，
逃离鳄鱼、家犬和教堂的
　球形结顶，
在有涵养的希腊人中间
把期望的智慧求寻……
我的孩子，你可是来我这
　里把智慧学？
老者询问希腊人
嘴上带着狡猾的微笑；那
么，请坐下来
聆听这大地的歌声：你听
见吗？没听见！
那么在第九层世界里

多余的

“В полголос”（低声）改作“В полголоса”（低声）

粗劣

冷冰冰

冷冰冰

你可看见那些在太空中飞
　翔的神灵？……

从"由于寂寞自言自语低声发问"到"他宁愿去希腊"被普希金划掉并附上了批语：

　　这全是多余的。

你想投水自尽？我答应；
　但首先
你得告诉我，你的头脑是
　否清醒？
控制你的是理智还是激情？
是理智：那么它的声音告
　诉我们什么？
它告诉我们生与死对于我
　们都一样。
都一样：那就用不着投水
　自尽。
把手伸给我，孩子，别羞
　于向老人讨教
智者何以在今生得幸运。

妙

——

人们劝导生存，总是能说
　会道娓娓动听，
于是我们的主人翁便留住了性命。

从"忘却了人们和世界"到"动身去雅典娜"被普希金划掉并附注：

多余的

从"该同哲人告别了"到"如何生活并在生活中怀疑"亦被删去。

从"我的朋友，我自己奉献出我的心灵"到"期待着再次出现晨星"被删去。

被删去的还有："你可记得巴黎的街道是如此热闹"到"抑或是北方的爱神背着箭袋拿着箭。"

他屈指数说，证明人生在
　世……危险，——
那可怎么办？——人们懊
　丧地叫喊。
——怎么办？怀疑犹豫。
智慧的怀疑乃是最成熟的
　果实。
公民们，我给你们的忠告，
　便是徘徊动摇，
既不妥协，也不斗争！……
人民总是缺乏耐心。
我们的说客先是听到一阵
　低声的牢骚，
窃窃私议，然后便变成了

妙——但问题不在这儿。

哈哈大笑。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结尾写得很好，但没有任何章法，意图不明确——总体说来很冷漠，不自然，什么也不能说明……

渡莱茵河

（第233—241页）

突然袭来，潮涌而至，为 　你公民的荣誉， 为要塞、村庄和那被毁庄 　稼地的荣誉， 还有那福泽广被的疆域， 在那里俄罗斯人曾在宁静 　中享受繁荣欢愉； 在那里和平天使明亮辉煌， 为着陷人黑暗的国土而生， 天命注定他必然要为 沙皇和应予报效的祖国献 　身……	费解，这里所指的应该是伊丽莎白·阿列克塞耶夫娜。
在那里，骑士手扶亮闪闪 　的钢矛， 若有所思，独自在高高的 　岸边 肃立，用他那热烈的目光 凝望着蜿蜒的河流那最后	优美！

一段流域。
也许，他回想起
他诞生地的那条河流——
于是禁不住将胸前的青铜
十字章
紧紧地按在心口上。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这是诗人最好的一首诗——最有才气，经过了最为周密的斟酌。

哀歌，垂死的塔斯

（第245—253页）

普希金对全诗的评语：

这首哀歌其实配不上它所享有的声誉。——我还不曾见过有什么哀歌能够激发巴丘什科夫，使他创作自己的诗歌，不过，还是请把诗人拜伦的《塔斯的悲哀》与这首干瘪的作品比较一下吧。塔斯表现出爱和满腔热忱，可这里除了追求功名和温厚善良以外（参见评语），什么也看不出。这是垂死的瓦西里·利沃维奇，而不是托克瓦托。

无论是在普通农夫的茅屋
里，
还是在阿方索宫廷的庇荫
下*，
无论是在穷乡僻壤的静谧

*这是历史性的温厚善良，绝不是诗意性的温厚善良。

中，
还是在密林山冈，都不能
拯救我的头颅
"在那里，那里……噢，
幸福啊！在贞洁女子当中，
在天使们当中，将会遇到
耶列奥诺尔！"
为着爱、那神明终于熄灭。

是机智而不是情感。这便是油画上阿伽门农那颗沾满血污的头颅。

缪斯们的交谈

（第254—256页）

普希金在诗下批语：

美

维亚泽姆斯基信函边注①

维亚泽姆斯基就乌斯特里亚洛夫论著《论实用俄国史体系》写给C·C·乌瓦罗夫的一封信	普希金批注
……正是在第9卷当中，卡拉姆津以他崇高心灵的公然愤慨，色彩鲜明地描绘了“昏君”的暴政。因此，这一卷势必激化他的反对者们对他的敌视。	迫害者
……在这一点上，比那些肤浅片面的评论家，比那些从卡拉姆津的第9卷当中看到他在公然诱使人们堕落的评论家更有远见的，是那些专制制度的反叛者。在这一卷当中，他们看到了作者信仰的胜利，因为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观点。随着时	

① 普希金作此边注的时间不会早于1836年底。此边注发表于1879年。维亚泽姆斯基之所以给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写这封信，乃是因为Н·Г·乌斯特里亚洛夫写了一部批判卡拉姆津《俄国史》基本思想的学位论文。鉴于普希金未在《现代人》上刊登维亚泽姆斯基寄给他的乌斯特里亚洛夫论著评析，可以断定他并不完全赞同这位批评家的意见。普希金写在该信页边上的简短评注亦能证明这一点。

间的推移，12月14日事件[1]本身岂不可以被说成是对卡拉姆津也即对《俄国史》所宣扬之观点的武力的批判，尽管这一事件的参加者在当时既没有想到卡拉姆津，也没有想到《俄国史》……

这岂不多余？

当政府的行为中也出现了如此不可理喻的疏失之后，他们便在凡属能够臆想或猜测到的范围内，或是到异端团体的密室里去寻找煽动性思想的萌芽，寻找人们对政府及现存秩序的尊敬之所以降低的原因，既然这些现象偶尔已从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表现了出来，哪里用得着上那十万八千里远的地方去寻找什么萌芽和原因呢，要知道，它们就在我们身边，正在我们大学的讲台上被人公开地、激昂地向那些对一切带有异端印记的东西都贪婪吸收的青年们宣讲！在您教育部那面展开的旗帜上，印着防务条例，这很好！但在这面旗帜的荫庇下可有人正在干着反对这面大旗的勾当？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将导致无政府主义的行为……

这岂不多余，也就是说，这岂不是重复吗？

乌斯特里亚洛夫不假思索地把卡拉姆津和波列沃依相提并论：把前者严谨的学说与后者混乱而幼稚的理论等量齐观，这

说到波列沃依，我们不妨来更加仔细地回忆一下。不要忘记，他是因了那本招摇撞骗，毫

[1] 12月14日事件，指遭到镇压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简直是在给经典学说，给高等学府应当加以捍卫的学说抹黑！更何况他用那些错误的表述法、仿古语句及代用语把他自己的观点弄得模棱两可、混乱不堪，以至你根本无法确认，他更赏识两人中间的哪一个！

无意义、毫无学术价值，昧着良心写出来的著作而当上科学院通讯院士的——且不论他在订购单上做的手脚，这件事情牵涉到的已经不是科学院，而是市警察局了。

纳肖金的回忆录和普希金对它的修改①

纳肖金文

亲爱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遵照你的意愿，我已经开始从出生之时起来写我的回忆录。一个人要记住出生时的情景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我想用以下的经历来为自己辩解：

一个孩子在屋角玩弄着玩具，或者用盛香膏的罐子把沙子倒成一堆，然后又把它装进罐子里，别看他表面上对身旁的事漫不经心，但周围的人所

普希金文

亲爱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依照你的意愿，我已经开始从出生之时起写我的回忆录。一个人要记住出生时的情景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孩提时所听到的故事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之后，我们就会觉得，似乎亲历了仅仅是听到的事情。

---

① 修改于1836年。发表于1936年。此乃普希金修改手稿的编辑样本。用书信体形式写回忆录的主意乃是普希金提示给纳肖金的（参见普希金1832年12月2日的书信）。关于纳肖金及其回忆请参见《П·В·纳肖金口述笔录，莫斯科，1830年》（第227页）。

说的话他全听到了，他的注意力丝毫没有受到他活跃的想像的影响。于是，童年时听到的故事便深深留在他的记忆里，之后，我们就会觉得，似乎亲自经历了所听到的一切。

我说得有道理吧？

我并非是我父母唯一的孩子，因此，除了服侍我的奶娘，还有其他兄弟姊妹的保姆。正是这些奶娘、保姆的絮絮闲谈，使幼小的我大开眼界。他们谈话的内容无非是：有关东家长、西家短的流言蜚语，恐怖怪异的传说，以及关于孩子们的事情。前一类谈话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而那些恐怖怪异的故事对我产生的影响则是十分强烈。家里的奶娘、嬷嬷和其他佣人都被严禁用妖魔鬼怪来吓唬孩子们，但有时他们之间还是会谈论这类事情。而这些故事对我的影响也极大。我想我对于神秘怪异的现象颇为迷信的根源就在于此。下面是我在迷信恐惧的作用下的第一回经历：

最先使我大开眼界的是那些嬷嬷和奶娘们的絮絮闲谈。闲谈的内容无非是：有关东家长西家短的流言蜚语，恐怖怪异的传说，以及关于孩子们的事情。流言蜚语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虽然家里所有的佣人都被严厉禁止用妖魔鬼怪来吓唬孩子们，但在她们之间，有时还是会谈论这类事情，因而这些怪异的故事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我想，我对于神秘怪异的现象颇为迷信的根源就在于此。

此事我记忆犹新，我的奶娘想要让我快些入睡的时候，总是用一个叫阿里娜的怪物来吓唬我，直到如今，它那张怪异的面孔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一个闷热的月夜，我久久不能入睡，我好像透过帐幔看见这个阿里娜就坐在我的床边，莫名的恐惧使我不由自主地阖上了眼睛，一下子就像奶娘希望的那样睡着了。

奶娘们闲谈的第三个内容，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里面讲的是我们出生的情形，还加上许多她们听来的细节，再就是关于我们兄弟姊妹中谁最得父母喜欢或钟爱的相当含混的看法。看来，父亲最喜爱的就是我。至于母亲对我的宠爱，现在不必多说，从我的回忆中自然会清楚看到的。

我出生于1800年，1801年，或是1802年，这我自己也已记不准确了，其原因以后将作交待。但我准确地记得这是12月14日至15日的午夜之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奶娘想要我快些入睡的时候，总是用一个叫阿里娜的怪物来吓唬我，直到如今，它那张怪脸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一个闷热的月夜，我久久不能入睡，我好像透过帐幔看见这个阿里娜就坐在我的床边，我害怕得闭上了眼睛，就不由自主地睡着了，这使我的奶娘十分满意。

我出生于1800年，或是1801年，还是1802年，这我自己也记不准确了，其原因以后再作交待。但我准确地记得，这是在12月14日至15日夜的午

后。我的父亲同农奴出身的家庭医助一起喝了一杯马德拉葡萄酒。这医助是我父亲从波兰带回来的一个犹太人，他瘦弱，矮小，皮肤黝黑，长着一副狮子鼻，两只闪烁的小眼睛深藏在眼窝里，下巴上有一处凹陷，身上穿着一身常礼服。马德拉葡萄酒是小食店店主谢沃尔达端上来的。这是一个中等个头，面色红润，长着浅色头发的胖子，他总是穿着蓝色的燕尾服，里边套着一件红色的绣着金银边饰的坎肩，脚上穿着袜子和矮帮皮鞋。这些我都清楚记得，是因为我记得这些人，他们的坎肩和常礼服。我出世的那一刻，我的父亲穿的是一件短上衣，而不是现在的袍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穿了一双波里斯绒长统靴，因为他也同那时候的老爷们一样患着痛风病。关于我的父亲以后再说。这里讲到谢沃尔达，是对他总是乐意地向我讲述我出生时的各种细节表示感激之情。谢沃尔达尚健在人世，不

夜之后。我的父亲同农奴出身的医助喝了一杯马德拉葡萄酒，这是他从波兰带回来的一个犹太人。他穿着一身常礼服——身材瘦弱，矮小，皮肤黝黑，长着一副狮子鼻，两只闪烁的小眼睛深藏在眼窝里，下巴上有一个小窝。马德拉葡萄酒是小食店店主谢沃尔达端上来的。这是一个中等个头，面色红润，长着一头浅色头发的胖子，他总是穿着蓝色的燕尾服，里面套着一件绣有金银边饰的红色坎肩，脚上穿着长袜和矮帮皮鞋。我还记得这两个人和他们各自穿的坎肩和礼服。在我出世的那一刻，我父亲穿的是一件短上衣，而不是现在这种袍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穿了一双波里斯绒长统靴，因为像那时所有的老爷一样，他也患有痛风症。这里讲到谢沃尔达，是向他表示感激之情，他总是十分乐意地向我讲述我出生时的各种细节。谢沃尔达尚健在人世，他讲的故事我从六七岁起即已熟记在心

过他的故事我从六七岁起即已熟记在心了。每次在村里的花园中跑得浑身冒汗之后，我都会到大食堂来休息一会儿，而每次都会看到谢沃尔达穿着同样的装束，手里拿着一只袜子，坐在一面大的，摆满醋瓶的橱窗旁，每次他都会问我，母亲很快就要从花园出来吗？我奔跑够了没有？我很快就会长大吗？我什么时候才会做真正的老爷？然后，又好像是自言自语似地说起我小时的时光，我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出生的。

言归正传，我出生在莫斯科波良卡大街，自己家的宅第里。这里属于科西马和达米安教区。给我行洗礼的是我的姐姐，舅父Я. Я. М.，还有当夜来到的一位与我家在罗斯托夫的世袭领地相邻的小领主Н. П. О.，这块领地就是委托他照管，后来传到我的份下，现在则被我卖掉了。所有这些提到过的人对我的一生都有过重大影响。

从我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到

了。每次在村子花园里跑得浑身大汗之后，我都要到大食堂来休息一会儿，而每次都会看到谢沃尔达穿着同样的装束，手里拿着一只袜子，坐在一面摆满醋瓶的大橱窗前。他会问我：母亲很快就会从花园出来吗？我奔跑够了没有？我会很快长大吗？我什么时候才能做一个真正的老爷？这时候，他也不管我是不是在听他说话，自言自语地讲述起我小时的时光，我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出生人世的。

所有提到过的人

从我出生起。

我开始说话和记事之时，我要先讲一下我们家族和几位先祖的起源，还要对你谈谈我的父亲。我们家族最早来到俄罗斯的祖辈，从俄罗斯纹章图册可以看出，出身于意大利的公爵和世袭邦君，他早就来到俄罗斯，可能是应某个封邑公爵之邀前来做客。他的后裔，即我的祖辈之中，最负盛名的，是在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皇上驾前任玉玺和国家档案总管①的阿方纳西·拉甫连蒂耶维奇·奥尔丁-纳肖金。我的亲祖父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有关他的业绩的材料正在收集，不久即可问世。至于我，我很少听到有关他的事，我只是听说，女皇安娜·伊凡诺夫娜曾向身边重臣提出逮捕别斯土舍夫，但谁也无此胆量，因为别斯土舍夫在其权势将尽

① 有一本历史材料关于他这样写道："这位显赫的大臣与利禄、追名逐誉以及出人头地格格不入，他在国务活动中的突出建树完全出于利国利民的宏愿，为此他舍弃了甚至对那些绝顶聪明的人士也是难于抗拒的人世间功名利禄的诱惑。"——纳肖金原注

时，仍然具有实力。于是女皇陛下将此重任赋予我祖父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纳肖金。而他也不负所望，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关于他的传闻总的说来都表明：他聪明、正直，执行任务时坚决、果断。

完成了任务。

我的父亲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我不仅深深怀念他，也怀念那些认识他和记得起他的人。我非常爱他。我的父亲早已不在人世，虽然他去世时我才5岁，但我觉得他时常在极力抚慰着我。他是一位真正可敬的人，因此，我是一位好父亲的儿子。这样一种自豪感使我避免了许多由于年轻心浮气躁而难免卷入的极不体面的事情。生活中时常会有十分困难的情况，尽管你性格坚强，但仍然对自己不满，于是便在别人身上去寻求精神力量的帮助，那么对我而言，这个别人就是我的父亲。对此我只能举例来加以说明：有时为了摆脱困难，我弄得精疲力竭，束手无策，这时我便躺下睡觉（一天的结束，在我看来，有些像任何事情

生活中时常会有十分困难的情况，尽管性格坚强，但我仍然对自己不满，于是便向别人寻求帮助，对我来说，这个庇护者就是我的父亲。对此我只能举例来加以说明：有时为了摆脱困境，我弄得精疲力竭，束手无策，这时我便躺下睡觉。

的了结），就在这样的心境下沉沉入睡，睡梦中我总是会看到我的父亲。大多数情况下，他面容模糊，似乎是在久离之后，从远处回到家里，这时，我的焦虑一下子消散了，虽然是在梦境，我仍是怀着热爱和恭顺的心情感到自己已处于一个强有力的人的庇护之下。而这个梦境中心灵的平静，的确使 我的力量和希望得到恢复。从小至今，无论是儿时伙伴、同事，还是现在的亲友，我从未从他们那里寻求过帮助和真正有益的忠告。在千百个同我有交道的人中，我从未从谁那里听到过任何我自己没有绞尽脑汁思索过的新东西。这里面最困难的不是建议，而是行动，这样的事他们谁也没有动手做过，即使做了，那么我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忍耐，内心的不安，而更多的还是金钱。因此，我可以断然地说，我在一生之中没有受惠于任何人，也不会对任何人感恩戴德。我继承了他的财产，而且是在刚能记住儿童特有的那种依依眷恋的感情和他

恢复了我的力量和希望。

是我自己没有绞尽脑汁思索过的新东西。在需要行动，而不是空头建议的地方，却没有他们的踪影。即使他们在场，那么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忍耐，内心的不安，更多的还是金钱。

对我的抚爱的年龄失去他的，因此，我对他怀有一种特别的、甚至胜于自己能力的感情，是不足为怪的。



有待考证的作品



在麦克菲森出版《莪相诗集》的时候……

在麦克菲森出版《莪相诗集》（究竟是译作、仿作，还是他本人的诗集——此疑问看来至今未能得到解答）的时候，人们无比激奋地拜读和反复拜读了这部作品。“谁也没有想到（维尔曼说），当他在为这浪漫古诗而惊叹不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为同代人惊叹不已，因此，谁也没有感到忧伤懊丧。大家都体验到一种没有掺杂其他感情成分的满足，也就是说，他们读着美妙的史诗，却用不着为这些史诗对任何在世的人感恩戴德。”不过后人们又开始猜疑、考证、查询（不知是真是假），认为这部莪相史诗不过是赝品，不过是一部现代作品，一句话，所谓莪相史诗乃是出自麦克菲森本人的手笔。著名的批评家约翰逊博士，一个极其粗鲁的人，向麦克菲森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称麦克菲森为骗子和蓄谋的赝品制造者。一场激烈的笔战开始了。请看当时论战的一个小例子，这是约翰逊写给麦克菲森的一封回信，因为麦克菲森对英国批评家辱没人格的怀疑态度高傲地表示了自己的遗憾。

詹姆斯·麦克菲森先生！

我已收到您那封愚蠢而无耻的来信。对于中伤我的任何

胡言乱语，我都将全力予以反驳；非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法律会替我办到。但愿某个恶棍的威胁永远也不能使我放弃我的追求——揭露骗局。

您想让我对您作出怎样的宽容和谅解呢？过去，我认为您的书是赝品，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为了确证我的观点，我向公众讲明了我的根据，并希望您能驳倒它们。我鄙视您的歇斯底里。您的荷马出版以后，您的天赋便显得不那么有害了；我对您的性格早有所闻，这使我不屑注意您将说什么，而是注重您能证明什么。这封信您可以发表，如果您愿意的话。

作为对这封信里某些词句的解释，必须说明，麦克菲森被自己的莪相所带来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又翻译了荷马的《伊利昂纪》。可译文所采用的却是莪相的文笔，而且译得十分糟糕。

我们介绍这封信，乃是要将它作为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推荐给我们杂志的批评家。为什么我们的艾迪生就不能成为我们的约翰逊呢？

新近出现的那些针对我们所谓的文学贵族的过激言行……[1]

新近出现的那些针对我们所谓文学贵族的过激言行，像从前一样，极不公正。在那些有可能被归入这一类的著名作家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曾想到过要炫耀自己的贵族头衔。正好相反，《北方蜜蜂》还记得，是谁在不停地指责波列沃依先生是个商人，是谁在替他鸣不平，是谁敢于嘲笑某些御用评论家封建把头式的狭隘和偏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指出：如果说我们的多数作家是贵族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明我们的贵族（不同于其他人）是有文化的，这没什么好笑的。假如贵族头衔对于我们来说没什么意义，那么，这也丝毫没什么好笑之处。但是，如果是为着害怕波列沃依、格列奇和布尔加林等先生的玩笑而轻视自己的祖宗，那可就太不值得称道了，不珍惜自己的权利和特权则更是愚蠢。非贵族（特别是非俄国贵族）允许自己嘲笑俄国贵族倒是较为情有可原的。可即便是这样，他们的玩笑亦应受到谴责。18 世纪民主主义

---

① 发表于1830年8月9日第45期《文学报》。据A·H·杰尔维格说，普希金参加了该期《集萃》栏目的撰稿，但不清楚他具体写的是哪一篇文章。普希金在《试驳某些非文学性的责难》一文中曾提到过这篇文章。

作家（不过，他们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能与我们的作家相比）的讽刺短诗注定要变成这样的喊叫："把贵族们吊到街灯上！"注定要变成一点也不可笑的歌谣："绞死他们，绞死他们。"给读者的敬告。[1]

① 原文为法文。

塔季谢夫[①]

阿斯特拉罕总督，二等文官塔季谢夫（瓦西里·尼基季奇），生于1686年。1704年从军，同年参加攻打纳尔瓦之战。曾参加波尔塔瓦战役（1709年），后转战亚述及普鲁特河流域。此后又被派往国外进修多门学科及德语和波兰语。1718年，工场手工业委员会主席、矿务总局局长及炮兵总监布鲁斯伯爵因参与奥兰会议，将地矿事务交托于当时的炮兵上尉塔季谢夫。1720年，塔季谢夫被派往西伯利亚监管官营冶铁厂。在他本人编写的辞典中曾有如下记述："1721年，在塔季谢夫的主持下，于伊谢季河畔开始兴建冶铁厂，并建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叶卡捷琳斯克城。"杰米多夫因受彼得大帝赏封，曾获得费季科夫工厂一座。此人竭力扩充自己的产业，超逾了应有的界限，并在其私营工厂使用官方工匠。出于对塔季谢夫将夺回官方财产的戒备和恐惧，杰米多夫向彼得大帝诬告塔季谢夫，以期将其排挤掉。此时，皇帝陛下委派根宁前往西伯利亚工厂对此争端进行调查。根宁对此案作了侦讯，将案情禀报皇上，同时还遣塔季谢夫前去觐见陛下。纠纷平息之后，塔

① 该文笔录附本现存于普希金文稿之中，但是否出于普希金手笔却未经证实。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对B·H·别尔赫文章《前矿务总局顾问及西伯利亚采矿厂督办二等文官瓦西里·尼基季奇·塔季谢夫传》（《矿山杂志》1828年第1期）的转述。

季谢夫官复原职，重返西伯利亚工厂。

“1722 年，当我即将重返西伯利亚的时候，”塔季谢夫说：“我前去接受安娜·约安诺夫娜公主的赦免。在对我行赦免的时候，公主问她身边的书吏季莫菲·阿尔希波维奇，我是否能很快回到彼得堡。季莫菲·阿尔希波维奇是从前的宫廷小丑，生性轻浮乖戾。他不喜欢我，因为我不信迷信，也不曾吻过他的手。因此，他回答说：“他会挖到很多矿石，还会把自己埋掉。”

1723 年，塔季谢夫应召进宫，在宫里呆了近一年之久。此因何故，他在宫中担任何职，却无人知晓。1724 年，塔季谢夫晋升为炮兵上校，被派往瑞典考察采矿厂、制定计划、设计机械模型。他奉命邀请某些矿业官员赴俄任职，安排与他一同前往的科学院学生学习各种矿业技能。塔季谢夫履行了自己的使命，并按矿业总局指示，在瑞士从事铜材交易。铜价为5 卢布50 戈比1 普特，此交易有利可图之处在于：运费可从瑞俄两国衡制的差额中得到补偿。1726 年，塔季谢夫经哥本哈根返回圣彼得堡，仅带回了一个雕琢工匠：列弗中尉，因为瑞士政府禁止他雇用工厂技师。1727 年塔季谢夫晋升为矿务总局顾问，与其他人一道承担了造币任务。1730 年他被加封为四等文官；1734 年被派往西伯利亚接替德·根宁职位，监管官营及私营工厂。抵达叶卡捷琳堡之后，他视察了所有属他管辖的工厂。经矿主和厂主们共同努力，制定了一部条例，即著名的《塔季谢夫工厂条例》。此条例未经皇帝陛下正式批准，但却施行于所有官营及私营的工厂。尽管后来按矿务管理局的意见作了多次修改，但各工厂办事处迄今仍然遵循此条例。此后，塔季谢夫给所有私营工厂指派了官方监督人，命名为矿长，并参考萨克森及瑞典的工厂管理条令向这些官员们下达指令。塔季谢夫对昆古尔、索利卡姆斯克及各地厂区矿业学校的创办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还将1000 多册藏书赠给了这些学校。然而，杰米

多夫却使自己的工厂摆脱了塔季谢夫的管辖。当时脱离他管辖的还有斯特罗加诺夫采矿厂及其盐场。

1736年，矿务总公司成立，取代了前矿务总局。在工厂管理方面，塔季谢夫服从于矿务总公司经理舍姆别尔格。这一时期，他直接参加了对巴什基尔人叛乱的镇压。这之前，1734年，他曾以食品装备援助捷夫克列夫上校。1735年，塔季谢夫亲自前往镇压奥辛斯克县巴什基尔人叛乱，得到马尔蒂诺夫和捷夫克列夫上校的支援，取得了重大胜利。他处决了叛乱分子，从归降者手中征收了1万卢布的赔款和大量马匹，用以供给奥伦堡远征军团。1736年，奥伦堡远征军团总司令、五等文官基里洛夫将此情况禀报了皇帝陛下办公厅，请求将西伯利亚方面主要军权交给塔季谢夫掌管。皇帝陛下办公厅于1737年正式批准该报告，于同年，即基里洛夫逝世之后，将奥伦堡远征军团一切事务交给了塔季谢夫。接此命令后，塔季谢夫遂留下高级文官赫鲁晓夫担任所有采矿厂总管，自己经水路赶赴缅泽林斯克。在那里，他找到了索伊莫诺夫少将，巴尔杰维克、捷夫克列夫上校及乌法军政长官五等文官舍米亚金。为了让巴什基尔人归顺朝廷，经共同商议，他们决定于外乌拉尔地区新建一个伊谢季省，与乌法省一并交由奥伦堡远征军团统辖。皇帝陛下办公厅批准了该决定。1738年1月塔季谢夫前往萨玛拉，预定从那儿向不归顺朝廷的巴什基尔人发起军事攻击。途中，他与随行工程师视察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地形，选定了迁移奥伦堡要塞的新址，因为要塞原址处于极为不安妥之地段。此时吉尔吉斯可汗尼比尔斯抵达俄国人营地。塔季谢夫按照礼节接待了这位统领，尼比尔斯宣誓效忠俄国。为了给奥伦堡地区带来贸易上的便利，塔季谢夫利用了这一机会。他派了一个商队前往塔什干，还派出两名官员随行前往，以便进行环境考察。商队绕过了一个中等汗国和一些小汗国，但却被一个大汗国打散。大约

与此同时，塔季谢夫建立了奥伦堡易货贸易，征收到第一批商品关税及贩酒消费税。待这些事务处理完毕之后，塔季谢夫便着手修建要塞。他把整个奥伦堡地区视察了一遍。在修建要塞这件事情上，埃尔通舰长和工程官员们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然而，巴什基尔人的安定并未持续多久。在伏尔加河草原上以游牧为生的卡尔梅克人突然叛乱，开始把畜群赶出新建要塞，抢劫从萨玛拉开往亚伊克城的商队。塔季谢夫派遣了好几批哥萨克前去镇压叛乱者。他们在所到之处击溃了卡尔梅克人，俘虏了其首领。1739年，塔季谢夫赶往圣彼得堡，向皇帝陛下办公厅递交了若干呈文，其中最主要的有：（1）将奥伦堡城迁移至克拉斯诺山边界地区。（2）将边界线沿亚伊克河往上划至维尔赫涅亚伊克港，再从那里沿乌伊河划至察列瓦哥罗吉夏，继而沿萨克马拉河延伸出去世。（3）在此边界线上部署边防军及地方军团。（4）准予为边远地区称职尉官升等晋级，不称职者，则使其退役。（5）准予上述地区扩大贸易。（6）制定吉尔吉斯-卡伊萨克管理条例。此时，服役于奥伦堡远征军团，具有巴什基尔血统的捷夫克列夫上校，先于塔季谢夫数月被召去圣彼得堡。为了当上从波斯来俄之大使的随员，他散布了一系列诋毁塔季谢夫的流言蜚语，并三番五次地告他的状。皇帝陛下办公厅审理这些诉状及塔季谢夫的辩解词，指派了该案侦讯委员会；同时指派国家海军委员会成员、海军少将瓦西里·乌鲁索夫公爵担任奥伦堡委员会主席。尽管如此，塔季谢夫上述呈文仍然备受重视。不知塔季谢夫案件侦讯委员会是如何了结此案的，但指控看来是不公正的，因为1741年，即数月之后，卡尔梅克可汗东杜克-奥姆贝去世，塔季谢夫再度被派去平息卡尔梅克人的叛乱，并很快被任命为阿斯特拉罕总督。由于与卡尔梅克汗国地方官不和，他于1744年被免除该职。离开阿斯特拉罕之后，塔季谢夫回到莫斯科近郊的故乡鲍尔金诺村，1750年7月15日在

当地去。他的遗体就安葬在离村子1俄里远的乡村教堂里。

列尔赫大夫曾陪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出使波斯，他在谈到塔季谢夫时说：

“1744年10月27日，我们抵达阿斯特拉罕。当地总督乃是著名学者瓦西里·尼基季奇·塔季谢夫。在任该职之前，他组建了新奥伦堡省。他说德语，拥有一个藏书极佳的大书斋。他精通哲学和数学，历史方面的学识尤为渊博。他著有《俄罗斯史》一书，在他死后，此书被皇帝陛下办公厅大臣伊万·切尔卡索夫男爵得到。”而切尔卡索夫又将此书转交给了罗蒙诺索夫。

塔季谢夫乃是一位地道的哲学家，他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他身体虚弱，但这并不影响他办事干练果断。他善于给予每个人有益的建议和帮助，尤其是商界人士，在那一地区，他们是经他一手重新扶持起来的。

塔季谢夫决意率先将各种有关俄罗斯的记述进行系统整理。他将这些记述与编年史对照，编著了一本从远古时代至1463年的《俄罗斯国家史》。该书以4卷本形式出版（1768—1784年）。塔季谢夫在其著述中提到，他对地理学的研究从未间断。他说：“我在阿斯特拉罕任职期间，曾派遣富有经验的人员到陆地和海上进行测绘，以制作地形图，我将制作好的地形图寄给了参政院及科学院。”

塔季谢夫分析研究过古俄罗斯法典，他以有充分根据的注解诠释了《俄罗斯真理》和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沙皇《法典》，并为《法典》增补了附加说明。《俄罗斯真理》刊登于《古代俄罗斯文库》续集第1卷；《法典》则先后于1768年和1786年两次出版。令人遗憾的是，塔季谢夫未来得及编完他的《辞典》。该《辞典》前3卷已编到字母Л，于1793年出版，其中包含了许多有趣的内容。塔季谢夫在《辞典》的序言中顺便提到了这样一件事：1735年，他

呈文皇帝陛下办公厅，要求改换矿务官员头衔的德式称谓。办公厅采纳了此项建议。但比龙得知此事后，对他极为怨恨。塔季谢夫还在其《俄罗斯史》里附加了有关俄罗斯国徽、俄罗斯君主家族史、官位等级、古代礼仪与迷信以及俄国地理学概论等方面的内容。在塔季谢夫的遗嘱中，记录了许多他个人的见解和看法，此乃他长期供职的经验之谈。塔季谢夫坚决反对开设小酒馆，再三证明它们是何等有害和危险。不过，当人们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却不会不想到，正是他本人在杰米多夫的工厂里开设了小酒馆。该遗嘱立于1733年，是塔季谢夫留给他的儿子叶甫格拉夫·瓦西里耶维奇的。遗嘱于1773年由谢尔盖·德鲁科夫佐夫出版。除此之外，塔季谢夫的许多作品均已散失，其中题材重要的有：(1) 萨尔马特、爱斯特兰及芬兰词语辞典。(2) 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沙皇及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传。(3) 论斯特拉连别尔格。(4) 基尔赫罗夫鞑靼人及卡尔梅克人年代记事释译。